

## “半天閣大學士”武宜三

### ——裴毅然（復旦大學教授）

題解：武宜三先生說，他是五年制大學生，但唯讀了三年，只能叫「半天閣」。不過，學校還是發了《畢業證書》，所以也算大學畢業的「學士」。年過七十，請友人刻了一顆閒章「半天閣大學士」，口氣雖大了一點（紀委書記包文拯同志也不過「龍圖閣大學士」），卻不失其真。是為題解。

與武宜三先生神交已久，至少七八年了，從他發在港刊文章到評論專集《「陳毅是個好同志」嗎？》，寫得淋漓，讀得痛快，Email 也好幾年了。奈何 2006 年後本人一直未再去香港，他也未來內地，緣慳一面。去年底，在他的慫恿下，我向香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遞交申請，再獲資助訪學，六月偕四名碩士生訪港，得晤吾兄。

#### 閩人北性

6 月 11 日他來中大聽我午餐講座，第一次握手，便感覺他雖為閩人，閩氣不重，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很有點東北豪爽勁，風貌烈然，稍一接談，果然在東北呆過五年。1963 年，武兄入東北工學院，直至 1968 年畢業流放西南大三線。周日，偕夫人帶學生拜訪元朗嘉湖山莊武宅。其居所似有五十平米，在香港也算「寬舒」了，只是滿屋滿地的書，弄得家裡挨挨擠擠，夫人嘖有煩言，多次催促清理騰空。我在走廊書櫥翻看，很喜歡港版《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十卷）、《民國大事志》（四卷），武先生豪爽揮手：「紅粉贈佳人，寶劍送英雄，這兩套書就送給你！」第二次見面便拿人家兩套善版書，有點不好意思，見他贈意真誠，借一拖兜將十四塊「磚頭」運回中大會友樓，成為此次訪港最大收穫。酒樓晚餐，武先生開了一瓶金門陳高（陳年高粱酒），約值六百港幣，真正好酒。嘉朋好酒，交談甚契，不免貪杯，十分盡興。本人好飲，但絕不過量，三十年從未醉吐（青年時代亦僅兩次），這回感覺「達限」——再多一點怕就不行了。

#### 初識國情

武兄大我一輪，同尚馬，本名凌文秀，常用筆名戴雨山、柳孚三、巴山雨、武夷山人、酒香書屋主人、流浮山寨主等。武宜三也是筆名，家鄉名山「武夷山」諧音。他生於閩東山區農村，1963 年考入瀋陽東北工學院，鋼鐵冶金專業。雖為共青團員、系學生會幹部，因學習成績較好，便有「只專不紅」的危險，加上父親的所謂「歷史問題」，成了「問題學生」，政治輔導員經常旁敲側擊：「要注意又紅又專」。這位輔導員經常炫耀他在反右鬥爭中「火線入黨」，並提前畢業成為「光榮的政治工作者」。

此時，學校開始貫徹 1963 年 7 月下發的中發（63）496 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的處理的通知》，每年都要在畢業生中抓住一定百分比的「反動學生」。為了表現革命立場，從校黨

委到政治輔導員，層層都會超額完成任務。因此，學生一入學，他們就開始此項工作，或依靠黨團員骨幹和爭取入黨入團的「進步學生」的小報告，或在個別談話談心時誘你暴露「活思想」，甚至將你學習討論會上的發言剪頭去尾，羅織比附、上線上綱，去完成任務。

文革之初，有人抄了這位政治輔導員辦公室，果然發現他收集包括武宜三在內多名學生的「反動言論」：如政治課奉命模擬反派的發言、《海瑞罷官》是政治問題還是學術問題；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看法等等。該班二十多位學生，竟有五六人同入黑名冊。這記悶棍打得此時還是「紅青」的他，稍稍有點頭暈，所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一發佈，很有一點被「解放」的感覺，仍是火熱革命青年。

文革初期，他雖然看到中共政權的專制腐朽，但停留於「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層面。他積極參加投入，炮轟學院黨委、瀋陽市委、遼寧省委、東北局，赴西安、福州串連，大造劉瀾濤、葉飛的反——反對他們鎮壓革命群眾，標標準準「紅青」一個呵！1967年，參與批判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因為陳「分裂群眾組織」、「破壞大聯合的帶槍資反路線」。

是年冬，他步行串連，途經河北唐坊，為當地農民挽留，在那兒搞了一個多月文革，革命熱情很高，很紅色浪漫呵！此是，他的人生願望是成為合格的紅色接班人。

他出身赤幹家庭，父親1948年加入中共遊擊隊，1949年4月入黨，雖然1957年「反地方主義」被開除黨籍，受盡打擊，但他還是不願自外於黨，還惦著「老子革命兒接班」，很想成為「革命主力」。其父1979年平反，恢復黨籍，享受離休待遇。

1968年，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他被打成反軍派，因他此前的積極造反，遭批判、挨鬥爭，畢業分配時流放西南三線攀枝花，檔案裡有一筆——「內控使用」。搬磚、砌牆、砌高爐、貨倉保管員、火車押運員、公司駐外催貨員。因會彈一手月琴、揚琴，得入公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革命京劇樣板戲《紅燈記》劇組樂隊。1971年調科室技術員。由於是監控對象，每有重大活動（如吳法憲來視察），便對他「緊張」一陣。一位同事提醒他：「你凡事得小心，我是受保衛科指令來監視你的。」此時，武宜山親身感受胡風說的「咳嗽都有人錄音」。

在政治上受歧視外，連交女朋友、談戀愛，都要被人查檔案；加薪晉級也遭百般刁難；出外參觀學習，保密單位不讓去；即使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臭老九」也要讓工人優先。

### 中年移港

他的聰明在於他很早覺醒，意識到大陸不妙，早早安排赴港，找了一位有香港背景的老婆。1979年以繼承遺產的名義，申請探望香港岳父，由於在少有人申請的四川三線，僥倖獲批，手續甫定，立即動身，車過衡陽，都不拐一下回福建老家，直接南下，生怕有變。來港後，冒著「不滿社會主義、嚮往資本主義」的罪名，留港不歸，申請移港。此時，與岳父擠居一屋。那時大陸的「革命人民」，

生活窮苦，政治嚴酷，一江春水向西流。但凡有一分外竄的希望，都做十分的努力。筆者叫沒辦法，「西流」無門，不得不蹲在大陸「愛國」。

1987年，被攔阻閩地多年的妻兒，才放行赴港團聚。這一階段，為搏生存，他很辛苦，不通粵語英語，大學文憑不被承認，1979~2000年，一直在工廠打工，從最低級的沙發工人做起，漸漸升到電鍍廠領班。其間，在摩托羅拉當了十年產品檢查員，熟稔電子產品，如今擺弄手機，比小青年還麻溜。

1997年前後，開始投稿《爭鳴》、《動向》，最初當然意在孔方。港刊一般都很愛國，很重視大陸稿，他言說大陸的稿件很快一篇篇被發表。《爭鳴》有時一期刊登他四五篇東東，必須化用筆名，因此用過的筆名連他自己都記不清。不久，《開放》、《蘋果日報》、《大紀元》、《民主中國》、《新世紀》、《觀察》等報刊網刊也開始發表他的文章。

1996年，一位大學同學升任四川攀枝花第十九冶金建築公司頭頭，慮及武宜三曾為攀枝花貢獻十年青春，也出於統戰，聘他為該市第四屆政協特邀委員。他去開了一次會，吃吃喝喝聊聊一周，感覺無啥意思，自動辭職。此後，該市領導來港，特地來慰問他，送上土產工藝品（惟此一次）。

武兄真正進入人生閃光期，當然是在棄工從文之後。2004年，他加入獨立中文筆會，接着加入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2007年參與組建香港「五七學社」，任總幹事。「五七學社」專門收集、研究、出版反右資料，專為右派及政治受難者搶救性出版回憶錄、論文集，現已出版60餘本。學社宗旨：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為右派分子樹碑立傳。

他著手編寫《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2008~2012年，吳弘達先生聘他為勞改基金會駐港代表。誰都知道從事「五七事業」，吃力不討好，更沒有「商業價值」，可他是「性情中人」，認定悠悠萬事，惟此為大。一個與右派無親無故者，完全為了「愛國」，無怨無悔地將晚年餘熱全發在「五七事業」上，令我輩後學肅然起敬。

### 武氏三定律

武先生的思想軌跡大致屬於「解放一代」，即其思想定型於「解放」的1950年代，青年赤紅狂熱；然後經歷文革，漸漸覺醒；歲逾天命，但知國憂；穿越耳順，歎息日沉；今過「不越矩」，心系黎元。他會為新華社記者孫振軍的牛屎一語——「我的一條阿迪達斯底褲就值兩千多塊」，跳腳直罵。含飴弄孫之年，還要天天為中國懷憂、為中共生氣，也只有經歷那個時代的人，才容易理解他晚年的不安分。

他最後看穿中共本質的是六四坦克，當鄧小平命令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將學生碾成肉餅，那句「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那麼虛偽、奸詐。

近年，他提出「武氏三定律」，沒有一條不戳國人心境——

定律一：中國人愛中國沒有好下場，中共黨員愛黨沒有好下場，在中共統治下愛黨又愛國，更加沒有好下場。

定律二：中國是冤假錯案最多的國家，中共是專門製造冤假錯案的政黨，所

以中共統治下「無案不冤，無反不平」。

定律三：只有拿了外國護照的中國人，才能做個像樣的中國人、才有資格愛中國、才可免除愛國時被扣上「愛國罪」的危險。

他還有更生猛的「武宜三猜想」——

猜想一：七七事變是中共挑動起來的。

猜想二：李公樸、聞一多乃中共特務所殺而嫁禍國民黨。

猜想三：大饑荒是毛共對中國人民有計劃有預謀的群體滅絕。

他解釋三定律「由一堆堆屍骸、一堆堆白骨、一灘灘鮮血、一灘灘淚水、一聲聲哀鴻、一縷縷冤魂論證出來的。說毛澤東殺國民黨狠，殺共產黨更狠……如此「反動」的武氏三定律、三猜想，如此仇毛批共，他感覺已經「自絕人民自絕於黨」，確實也被大陸網站《環球視野》、香港《文匯報》斥為「西方走卒」，不便也不想再回大陸，父子相見也只能勞請九旬老父赴港。同理，也只能囑我「多來香港」。

如今，武先生的反省相當深刻，意識到自己深受毛共之害，只能上二三流的東北工學院，只能學傻大黑粗非保密性的冶金專業，政治上受歧視，被當作「反動學生候選人」，前途一片暗淡、兇險。文革又使他五年大學唯讀了三年，弟妹則根本沒有上學機會，如今淪為弱勢群體。更重要的是全國也在赤色中受盡苦難，文化、科學、道德、傳統，通通被摧毀。「國在山河破，百姓怨恨深」，每言及此，齒聲可聞。

### 誠言性饑

近十餘年，筆者一直關注知識份子研究，讀傳（篇）上千，暗生規尺，晚年寫傳，是否涉性乃老不老實的一條分水嶺。武先生承認是「一個性饑渴者」。「大三線」基建工地，狼多肉少，女同胞稀缺，幾個從工人家屬中招來的少女，只願嫁給司機、炊事員、木工、電工等。他改編「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為「□□女兒多奇志，不愛瓦工愛木工」。木工可幫岳家打家俱，瓦工則百無一用。「臭老九」大學生，只能在工地當瓦工，砌磚蓋房子。即使個別女孩敢於親近大學生，不是被父母勸止，就是為政工幹部、支左軍人阻嚇。資源緊缺之下，「當了三年兵，見了母豬也覺親」的軍人，利用政治優勢和大學生爭奪女孩子。

屢戰屢敗之後，他退而求其次，31歲那年經人介紹回福建討了農村老婆。老婆農業戶口，農民世襲，生的孩子也是農業戶口，永無資格遷入城市。雖然他的專業為工廠所需，對工廠的貢獻也有目共睹，兩地分居卻不予解決。「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無奈之下，申請移港，做了第一批扔掉鐵飯碗而吃螃蟹的人，遞上申請那年，已35歲矣。

他的右派研究中也包括「性」，「我發覺右派分子不但是個龐大的性饑渴群體，而且他們實際上是中共權貴集團掠奪性資源的犧牲品。諸多個案顯示，許多人所以成了右派分子，是因為他們有個漂亮的妻子或女朋友。」他注意到劉賓雁給丁抒講的兩故事：(1)一位中學校長看上體育教員之妻，將丈夫定為右派送去勞改，再將其年輕貌美的妻子弄到手；(2)一位中學教員偶而撞見黨支書的姦情，被



扣右帽送勞改。

武先生的一首打油詩，寫得很到位，一口叨出老毛治國實質：

領袖禦民有奇招，禦民更勝禦牲口；

性欲食欲全鏟淨，人性滅絕好領導。

兩個毫不相識的中國人，為了對二十世紀國史的相同解讀相熟相識，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人以類聚，果真不虛。像武先生这样的移港者高达 150 余万，香港之所以对共产党反劲如此大，据说主要是有这支「生力軍」。

2013.8.10~11 於大暑

(作者是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现在流亡美国。2021)

憂國憂民直面血淚真相的“漢奸”

——序《我的“漢奸”情結》

“我的‘漢奸’情結”，好一個挑戰性的書名！武宜三怎樣做漢奸的？

這位“漢奸”發掘和匯集了許多令人震驚的事實，下面摘取些許：

1937年9月26日，毛澤東指示八路軍：“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引奧·鮑里索夫《蘇中關係》）

蘇俄把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全部轉移給中共軍隊。其中步槍 70 萬支，機槍 1.2—1.4 萬挺，各種炮約 4 千門，坦克 600 輛，汽車 2 千多輛，飛機 800 餘架，炮艇若干，彈藥庫 679 座。另外，1945 年底至 1947 年初，蘇軍還提供步槍 30 萬支以上；這等裝備就是中共宣傳的“小米加步槍”。

（政府對民族資本家）用你的利息“贖買”你的本錢：與強盜何異？

（夾邊溝右派 3 千餘人死亡約 90%）還有 415 勞教築路支隊、峨邊沙坪農場、白茅嶺農場、萬勝山林茶場、新密農場、錦西煤礦勞改隊、凌源新生焦化廠、思茅農場、東風農場、馬豆溝農場、興凱湖農場、白城子農場、北京清河農場、茶澱農場等，在具有中國特色的這些殺人魔窟中，國家的棟樑、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許多人是在受盡凌辱、捆綁、吊打、關禁閉之中，在饑餓、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斷地死去。

1959 年：那天毛澤東在大會上一邊吃飯一邊講話：“我今天要講一講為什麼說反對黨的領袖就是反黨。黨的領袖好象一個人的頭，你把他的頭砍了，人不就死了嗎？所以說你反對黨的領袖就是反黨。”（引張聞天秘書何方）

對血債累累的日本戰犯不判死刑，卻把老老實實的中國人殺了幾千萬。周總理及中央對日本戰犯的政策是“懲辦少數，寬釋多數”（武宜三按：對右派分子卻是“懲辦絕大多數，寬釋極少數”），最後寬釋了全部日本罪犯，“周恩來是日本人的好總理”。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誰先富起來呢？是鄧小平和他一夥“無產階級老革命家”的子女先富起來了。

用了全世界 31% 的煤炭、29% 的鋼材、8% 的石油、45% 的水泥，創造了可憐的全世界 4% 的 GDP。

中共竟然以世界教育總支出的 1.04%，擔負著全球 17.9% 的正規教育。

農民在共產黨殘暴統治下的深重苦難：2005 年兩會期間，衛生部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有約 48.9% 的居民有病不就醫，29.6% 應住院而不住院。有 70% 以上的農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因為看不起病。

工人抱怨：“人家一頓飯的錢，就是我們一年的工資，而且我們的工資還沒保障。”（引于建嶸）

其實中共也不是真的想要回釣魚島，他們只是在忽悠自己的“屁民”。……對他們來說，主權與人權都是不要緊的，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政權。為保住政權、穩定

統治，主權和人權都可以隨時犧牲。符拉迪沃斯托克 600 平方公里、外興安嶺 160 多萬平方公里送給了俄羅斯；藏南 9 萬平方公里，送給了印度；南坎 13 萬平方公里，送給了緬甸；長白山天池 53%面積和 3 個山峰送給了朝鮮……

《炎黃春秋》今年的元旦社論竟是《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至高無上的《憲法》居然還不是這個國家各階層人士的共識。（忽悠死你屁民）

夠了！再看幾條作者的“漢奸”言論：

（延安大種鴉片賺錢）為什麼從沒有人對此持批評態度呢？一位研究解放軍史的專家告訴我，這種事是可以理解的。原來如此！為了一人一幫的私利，種毒販毒，可以理解；殺人、放火、賣國、通敵，可以理解；圍困長春以幾十萬老百姓為犧牲、以中國一半人口作核戰爭賭注、餓死四千萬而拒絕認錯，也是可以理解。您把祖國當母親，但是誰把您當兒子了呢？毛澤東、江澤民、胡錦濤？柯慶施、陳良宇？……您在他們眼中只是一顆沒有感情、沒有性欲、沒有食欲、即用即棄的小小螺絲釘！

我們那個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黨私有國，是奴隸國（引張三一言）。山西黑磚窯、人民公社、勞改農場、血汗工廠和北京奧運會，都是一脈相承（把人當奴隸）。山西黑窯童工事件是國家犯罪，是執政黨違憲、失職！

中共 90 多年、“共和國” 60 多年，到底“解放”了什麼？我看，只解放了獸性、奴性，壓抑了人性、個性。

中國人愛中國，沒有好下場；中國人愛共產黨的中國，更沒有好下場。

必須充分揭露中共反動派與知識為敵、與知識分子為敵、與全體人民為敵的本來面目。

毛澤東共產黨對中國人民、西藏人民、新疆人民……所犯下的群體滅絕罪，必須得到也必定要得到徹底清算。

我們的國家多麼迫切需要思想、新聞的自由化、軍隊的國家化、司法的獨立化、文化的多元化，因為它是我們的民族走向民主、自由、富強、繁榮的關鍵。

武宜三為什麼說愛國沒有好下場？他指出：“從紂王到‘秦始皇加斯大林’的毛澤東同志，乃至小平、澤民、錦濤同志……都是把國家當作私有財產，你要‘愛國’等於干涉了他的家事，是大逆不道。”是啊，“朕即國家”當然沒有權力公有的概念，於是乎，我們的回國專家、提意見的右派和反官倒要民主的學生……不該打倒打死又該怎樣呢！你以為你愛的是人民的共和國啊？毛太祖早就教導你了：“許多國家都掛起了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是一點民主也沒有，中國現在的頑固派，正是這樣。”（引《毛澤東選集》第 3 卷，730 頁）

武宜三為什麼要揭露邪惡鞭笞“老大”？如他所說，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他知道，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高於少數權貴的利益，國家不可私有。可是根據我黨的邏輯，揭批黑暗反對政府就是反華，這些做法這些言論，無疑“證明”作者是個大漢奸。當剝奪殘害本國人民並且拿土地金錢媚外的統治者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時候，要民主自由的肯定就是“賣國賊”，這是極權國家的認識方式。

筆者剛才說“夠了”，不要誤解，不是說一般人看到這些已經夠傷痛義憤了，不

堪忍受了，相反，廣大群眾總是跟著當政者跑的。當政者剝削壓迫是對的，撒謊是對的，賣國是對的，暴戾屠殺是對的，可笑的是寬鬆平反也是對的，若干年後人們必定說實行民主也是對的……總之當政者就是對的，或不可代替的。這是筆者幾十年來最大的驚愕和最沉重的體驗。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海外的，往往過高估計國人對光明的嚮往對黑暗的憤恨，說得輕巧拿根燈草。知道了書中這些事實和議論的人反應會很不相同：社會主義新階級——權貴階級會咬牙切齒恨不得吃了作者，他們是“愛國賊”的主體；良民會背誦統治者的“穩定壓倒一切”，麻木不仁、恐懼迴避，即使他們有若隱若現的原初理性。只有個別人會真正感到傷痛義憤，會覺醒。筆者沒有奢望，有這樣一小撮“漢奸”就很高興了，這也是必然會有的，他們是正義的種子。正義將會成長，不懼血雨腥風，她將取得其應有的優勢地位從而帶領民眾進步。

武先生退休後何必要寫這些不討好的文字？即使是在香港。他喝喝茶唱唱濫俗的愛國調，緊跟中央迎合庸眾，日子不是過得挺“和諧”嗎？可是他說：“讓我最後看穿中共本質的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和槍聲。劊子手用帶血的手撕下自己的偽裝……當他的坦克把成千成百的中國人碾成肉餅的時候，他那句‘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就顯得那麼虛偽、那麼無恥！”兒子殺父母，在講究孝道的中國不會引起民變，驚醒的卻是少許“貳臣逆子”，這太具有諷刺意義了。讓筆者感佩的是，作者對正義的敏感與熱切追求，對大是大非的鮮明不苟，對民生疾苦的不捨關懷，這是落後社群最缺少又最可寶貴的品德。筆者對共產黨也長期懷有一定幻想，以為它可以改變。但是跟作者一樣，完全絕望并覺醒于八九屠城。當時，正義者的鮮血使我哭得撕心裂肺，肝腸寸斷，約半年時間茶飯不香。但是幾年之後我就看到社會主流由開明被引向狂鄙的民族自戀，民眾回過頭衛護皇權（改名叫人民的權力）。香港擁有中國歷史上想象不到的自由，但是公正大氣地看待國際族際關係也絕非易事，所以我讀了武宜三先生的書，大感臭味相投，欣然為序。

武先生的看法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例如“武宜三定律”未免絕對化。披露文革的著作英文版銷路較好，他認為是西方人覺得“新鮮”，中文版銷路較差是國人不新鮮了。其實一個有文化的國家的歷史按常理都是本國人士最關心，中國人冷漠自己的痛史，善於忘卻，不客氣說是一國的正義感缺乏。魯迅痛心於此特寫作《為了忘卻的記念》，不幸，現在的國人已百倍陷入權錢和麻木的深淵，魯迅的記念連同魯迅本人都被忘卻了。

此外，海內外自由知識分子搶救歷史揭露真相呼籲民主，可歌可敬。然而，我們還有待於擴大眼界，超越一黨一國的現象探尋一些普遍性的問題。

重慶 李海霞

2015-3-1

## 顛覆“愛國”惡棍的暴力話語——序《我的“漢奸”情結》

——蔡詠梅

漢奸這個詞原是指出賣本民族利益的漢人，但現在則泛指出賣國家利益的中國人。由於現代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雖然漢族佔多數，但中國並非只有漢族這一個民族，也有許多非漢族的民族，用“漢奸”這個詞來涵蓋所有叛變國家的人，實際體現的是一種大漢族主義的語言霸權，非常的政治不正確。而這個詞在今天更是成為中國狂熱的國家主義者打擊社會異端的一個暴力用詞。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維護國家政權的信仰系統是馬列毛主義，如毛澤東所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文革後，在中國民間這一套系統已經崩解，除了極少數的毛左份子，幾乎已很少人仍然相信共產主義，甚至包括中國大多數共產黨員和他們的領袖在內。而且毛後的中國已轉變成大陸學者朱學勤稱之為市場列寧主義（market-leninism）社會，即市場經濟加共產黨專政的後極權社會。因此共產黨過去依賴的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形態已不能使用，為了維護政權的合法性，中共政權轉而採用國族主義作為新的國家信仰系統，因而拋棄了毛澤東時代有強烈革命色彩的官方話語，接過民國時期，特別中國抗戰期間建立起來的一套愛國主義話語系統，開始大講國家崛起、民族復興、愛國主義教育。

而此時國家的敵人在官方話語中也就從毛澤東時代的反革命份子變成了叛國者和漢奸賣國賊。

崇拜國家權力、迷信權威、仇外排外，反智腦殘的五毛，猶如義和團轉世，被官方這一信仰系統所煽動，反美反日，反西方，掄起“愛國主義”的狼牙棒瘋狂打壓追求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人士。曾經的五毛網上陣地“烏有之鄉”竟然公佈一個所謂的漢奸名單，叫囂要以私刑吊死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們以“打到漢奸賣國賊”的口號圍剿著名自由主義學者茅于軾，阻止他發表言論和舉行講座。在香港，資深民主派李柱銘因反對北京申辦奧運會，被香港中共勢力瘋狂大罵他是“李漢奸”。這些二十一世紀的新拳民甚至以愛國的旗號瘋狂打砸搶，暴力株連使用日貨，開日本汽車的無辜老百姓。

太陽之下，本無新事。使用民族主義話語暴力鎮壓打擊異端不是中共獨家發明，是古來有之。所有獨裁專制政權都曾以所謂國家民族大義來維護自己的政權，及壓制一切敢於發出不同聲音的異議者。被權力操縱以愛國為民參與迫害異端的民粹份子也不止是中國的五毛。作家王朔就指出，“有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國叫納粹，在中國叫愛國者！”

現代文明價值排位，人的自由和權利應該是在國家之上，就如愛因斯坦所說，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統治階級鼓吹愛國主義，顛倒普世價值，將國家置於人道、正義與真理的原則之上，根本是為了便於他們不受挑戰的任意踐踏民眾的權利而維護其獨裁專制統治。因此看穿統治階級這套話語把戲的古今中外有識之士，無不對此予以痛斥。英國十八世紀大文豪約翰遜博士

(Samuel Johnson) 有句名言：“愛國主義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 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指出，“愛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了精神流氓從事語言殺戮和人格猥褻的道德合法性來源。”

這些人格猥瑣並且反智腦殘的愛國惡棍，他們自恃有強大國家機器撐腰，蠻橫不講理，五毛教授韓德強因為一位老人發表不同意見，指其為“漢奸言論”，竟然打了這位老人的耳光，事後還說以後遇到漢奸還要照打不誤。與這些愛國賊暴民無法理性溝通，因弱智是他們的死穴，對付他們的最好辦法，就是以嘲諷、幽默、惡搞的方式解構和顛覆他們那一套愛國主義話語系統。

惡棍以自詡為“愛國者”而驕人，將自由主義人士定性為“賣國賊”，於是自由民主人士就發明一個簡明傳神的詞語“愛國賊”予以回贈，戳穿他們貌似正義實際邪惡的本質。“愛國賊”這一名詞因此風行於網上，使得腦殘的惡棍們為之氣結。在抗戰國難當頭時，當漢奸人人喊打，是一個最讓人抬不起頭的壞人頭銜，現在愛國惡棍漫天飛舞漢奸帽子，對任何一個敢於批評政權，肯定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人士和異議者都扣上一頂，予以恐嚇威脅。現在自由主義者乾脆接過來自己戴上，將“漢奸”帽子除污化，使得惡棍們的語言殺傷力被化解於無形。香港天主教會退休樞機主教陳日君說，如果李柱銘的言論被指為漢奸言論，他也願意當這樣的漢奸。網上更有一群自由主義者建立了一個論壇，就取名“熱血漢奸”，自認漢奸，而且還不是消極怠工的漢奸，是熱血主動的漢奸。八國聯軍入侵中國，老百姓為聯軍帶路，被視為漢奸。但近來中國不少網友（其中還有名人）以調侃口氣自稱“帶路黨人”，說“美軍來了我帶路”，“你的國不是我的國，你的國我不愛，八國聯軍若再打你的國，我願意當漢奸帶路”，致使“帶路黨”一詞在網上頗為流行。

這些自嘲、調侃和惡搞顛倒了中共愛國主義詞語的褒貶含意，貶義詞正用，成功消解了這套將國家置於人權和正義之上的“愛國主義”暴力話語，將愛國賊氣勢洶洶的威脅和恐嚇化解成可笑的虛張聲勢，曝露出他們冠冕堂皇高調後面的滑稽和蒙昧，這也使得一些感受到這套話語暴力的人士獲得解脫。有異議人士笑說，對五毛的所有謾罵圍攻，他只看作是另類的鮮花和掌聲予以笑納。

武宜三先生這本文集《我的“漢奸”情結》反詞正用，相信也是為了消解“愛國賊”的話語暴力，為中國自由民主人士爭取言論空間，另一方面也是要揭露出愛國賊們隱藏在愛國面具後面的賣國禍國真相。

# 一部中共党史——无案不冤，无反不平

——在台湾北社“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研讨会上的发言

武宜三（2009年2月22日）

谢谢各位，我是香港来的；叫武宜三；是香港五七学社成员，我今天想讲一点中共党史。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这里在座的有两位专家，一位是凌锋先生，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的；一位是陈愉林先生，他是中共资深党员、中共高级干部；他们对中共党史有很深刻的认识，我在他们面前讲这个题目，有点班门弄斧。

## 武宜三定律和武宜三猜想

在上两个月，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校长戴茂林教授到香港来讲学，他讲什么呢？他讲的题目是《高岗事件和它的产生原因》，大家知道高岗是谁吗？高岗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他救过共产党和红军的命，是毛泽东的拜把兄弟；他后来被毛泽东出卖，成了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戴茂林教授讲完之后，我就跟着发言；我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据我看，不过是八个字，就是“无案不冤，无反不平”——我把这八个字命名为“武宜三定律第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一部中共党史充斥着冤假错案，戴茂林教授今天讲的内容，就给我的这条定律提供了有力证据。

但是，戴教授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我的发言是以偏概全。这时候，旁边一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马上对戴教授说，那你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所制造的所有反革命集团案、反党集团案、反什么什么的案，还有哪一件是成立的？

戴茂林先生想了半天，他也举不出一个例子来；那么那位教授又接着说，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搞的这么多案件，确实没有那一件是成立的。这从反面证明了，武先生讲的是对的。

中国共产党就是“无案不冤，无反不平”，这是铁的事实。

我的“武宜三定律第一”，就是“中国人爱中国，没有好下场；中国人爱共产党的中国，更没有好下场。”

我还有三条“武宜三猜想”，第一个猜想是，七.七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搞出来的；第二个猜想是，李公朴、闻一多是中共特务杀死的，然后嫁祸给国民党。第三个猜想：1958—1963年的大饥荒，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群体灭绝。

这是我的猜想，虽然还没有充分证据，但是我猜的也是有道理的。中国共产党干坏事、搞恐怖，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干不出来的。

## “名子之父”钱基博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以来干过的事情，都是非常可怕的。他的专制、他的恐怖，是非常精细的，是无孔不入，它渗入到每一个人的毛孔和血液里面去了的。

我先举一个钱基博（1887--1957）先生做例子。钱基博是个学问家，湖北省华中师范学院一级教授；他有个比他更出名的儿子，叫钱锺书；他算是“名子之父”。

1957年，他响应中共的号召，给中共提了些意见，被指“放出许多毒草”，划成右派分子，帽子还没来得及戴，就患重病而死去。学校领导认为，右派分子虽然已经死去，批判还得进行。批判会的规模浩大，全院数千名师生都得参加。但被批判者已经死去，怎么办呢？中共领导决定“父债子还”，由他的儿子钱锺书捧着灵牌代表父亲接受批判；捧着灵牌接受批判的，还有他的女婿石声淮，这个石声淮也是右派分子。钱基博的弟弟钱基厚，也是右派分子。

他一家三右派，还有一家有7个右派的，就是黄炎培、黄万里的黄家。

### 萧光琰爱国，没有好下场

我收集了很多案例，都是特别恐怖的。萧光琰（1920—1968）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萧光琰从小移居美国。毕业于美国坡蒙那大学、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是化学博士，任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1949年，因为参加美国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学生基督协会”等组织活动，产生回国的愿望，给高教部写信要求回国。1950年，几经周折，千辛万苦，带着日以继夜地搜集到的资料转道香港回到中国，在石油部做研究工作。

但是，回国不到9个月，“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人们追问他：“回国的动机是什么？”

中共怀疑他是美帝派回来的间谍；中共觉得你在美国生活那么好，怎么会回来？你能够帮中国共产党把情报搞回来，那么你一定也会帮美国搞情报搞出去。

他伤心极了：“我爱党、冒险回国，谁知党不爱我，把我关在门外……我有失恋的感觉……”1957年，被定为“内控右派”。1958年，被定为“白旗”。1968年，在大革文化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在连续残酷殴打后自杀身亡。3天后，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一起自杀，这是红色恐怖的一个例子。

一个非常美好、幸福的家庭，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因为回到他亲爱的祖国，就全被毁灭了！

### 印度尼西亚华侨的悲哀

我们这位凌锋先生及在座的林其銮老先生，他们都是基于爱所谓祖国、爱所谓民族而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的，结果都受到迫害，有的还被打成右派分子。所以说，现在你还想爱中国的话，请看看他们的例子。

那么红色恐怖到现在完了没有？还没有完。我接触一些老右派先生，他们受害一生，到现在仍心有余悸。如果叫他讲过去的经历，他们会说我现在生活过得还可以，请你不要干扰我，请你不要给我带来麻烦。

### 杨兆龙一家悲惨遭遇

上海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叫杨兆龙（1904--1979）；杨兆龙先生是大陆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最高检察长；1949年初，已接到加拿大、美国大学任教聘书，但是由于受中共地下党员的妻妹沙轶因奉中共命令竭力挽留、妻子沙溯因的反对，



没有走成。中共让他接受李宗仁的任命，以便下令释放政治犯，仅南京就释放 80 余人，上海释放了 360 人，全国总计释放万余个中共党员。

但是，1955 年肃清反革命运动时，他却被怀疑是潜伏特务，逼他坦白交代。

1957 年，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上海市长柯庆施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先后请他吃饭，鼓励他向中共建言，并对他在肃反中所受的委屈表示歉意；当然，这是阳谋——杨兆龙免不了也上当了。新闻界纷纷来采访，《光明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新闻日报》都发表他的消息和文章。反右揭幕后，他首当其冲受批判，连给董必武的信，也被截留，当作反面材料公布，终于被打成极右派分子；下放到一个研究所做杂工。长子杨任远(西安交大学生)、次子杨定亚(上海交大学生)、女儿杨黎明(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家财全部被没收；女婿陆锦碧(华东政法学院教师)也是右派分子。

1963 年，因想让有病的学生和次子出国求学，而掉进中共特工的圈套，以历史反革命罪和叛国投敌罪与次子杨定亚、学生饶大笏被上海市公安局一并逮捕。1966 年，文革中杨妻沙溯因不堪红卫兵的百般凌辱，自缢身亡。其女被逼而迁居浙江海宁农村。1971 年，杨被判处无期徒刑，再一次被抄家。

发配青海服苦役的女婿陆锦碧因写批判毛林集团的万言书，被判处死刑；幸好他的老师在那里当省检察长，就说他的证据还没搞清楚，暂时不枪毙，改判二十年徒刑；就这样捡了一条命。

### 幸存者的恐惧

我托上海的朋友打电话给杨兆龙的家人，想采访一下他们，但得到的回答是：不用来找我了，因为国家已给我父亲应有的评价，我们也过得很好了。

什么应有的评价？又没有平反、又没有赔偿，你们受那么多污辱、受残害几十年，家破人亡；可是，中共只给了你们一张白纸，就一笔勾销了？再给一顶什么委员之类帽子，你们便心满意足了？实际上还是由于恐惧。

还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甘肃省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是怎么回事。夹边沟劳改农场成立于 1958 年，有 3 千多个右派份子在那里劳改，由于寒冷、超强度苦役、过度饥饿，加上各种各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最后死得只剩下了 200—300 个；他们饿到什么程度？他们饿到可以把死了的同伴的肉割下来吃，把死人的内脏装到盆子里藏到被窝里偷偷的吃，不敢让人家知道，让别人知道了还得受批判、挨打骂。大家想想看，共产党残酷、恐怖，到什么样的地步！？

就这么一个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当我把我们出版社描写他们在夹边沟的遭遇的书寄给他时，他却把作者骂了一通。这个幸存者现在住在北京，他说你怎么把我的事情给写出来？我本来在这安静生活了 30 年，别人都不知道我是右派，现在谁都知道我是右派了。你看他恐惧到这个地步。有的是怕影响子女前途，也不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孩子们。

共产党就是这样，在心理上、人格上、身体上，采取恐怖高压，实施全面的专政，受到严重迫害和摧残的中国人不计其数。1949 年以来，在中共暴政之下

非正常死亡估计在 8 千万到 1 亿之间。

仅仅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间，根据叶剑英自己讲，就“非正常”的死掉了两千万人。这是怎么样的恐怖世界呀！

如果有人还说台湾要跟中国统一的话，我请你们一定要记住，中国没有民主化之前，你千万不要谈这个问题。要不，这个可怕的红色恐怖就降到你身上来了。好，时间有限，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 回答记者的问题

我想回答这个小姐的问题，什么叫红色恐怖？什么是恐怖？就是说你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这就是恐怖——这是胡适之先生的话。

其次，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让你活下去，你却活不下去；你要死，他也不让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自杀的时候还要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请问，狗会不会自杀？狗自杀的时候会写“毛主席万岁？”我们连狗都不如，这就是对红色恐怖的最经典的注释。请大家看看我的一篇文章：《狗会自杀而且会在自杀时写下“毛主席万岁”吗？》

谢谢。

# 狗会自杀且在自杀时写下“毛主席万岁”吗？

武宜三

狗会自杀而且会在自杀时写下“毛主席万岁”吗？狗有一下子活活地饿死4千万只的事吗？狗会在一个货柜里一下子焗死80多条吗？狗会一批又一批地、前仆后继地、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地逃亡，逃向台湾、逃向日本、逃向欧洲、逃向非洲、逃向美洲，甚至逃向子弹横飞的以色列和伊拉克吗？

## 一、忠狗的下场

江苏省南京市《现代快报》报导：该市有个叫叶晓芳的女人，担心养了7年的狼狗“黑虎”会弄脏刚装修的新屋，趁丈夫出差之时将黑虎送走，但这头恋主的忠狗每次都懂得寻路回家。第一次被放逐郊外，牠当晚就摸黑回家；第二次是咬断缚着牠的绳子逃回家；第三次被铁练锁着，牠却以绝食抗议，整天悲鸣，于心不忍的新主人只好把牠送回晓芳家。

晓芳对于黑虎的忠心耿耿不但不欣赏，反而下决心要置牠于死地：把牠绑起扔到河里淹死；但黑虎不断咧嘴狂吠，使4个充当杀手的男子汉无法近身，他们对晓芳说：“狗不咬主人，你自己来吧！”晓芳就把绳子绕在黑虎的脖子上，牠果然不反抗，只是眼泪汪汪地凝望着女主人，服服贴贴地被勒死了。

丈夫回家获知黑虎遭毒手后，伤心欲绝，悲愤莫名。他控诉道：“黑虎3个月大就到了我们家，7年了，牠一直很懂事，很忠诚，我一直将牠当作家庭成员。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女人会对牠痛下毒手，她的心怎么这样狠？黑虎的死让我感到害怕……不敢再和她生活在一间屋子里了，离婚是唯一的出路。”儿子也因为黑虎的死对母亲不理不睬，令晓芳顿感众叛亲离，十分难过，也十分委屈。

我不厌其烦地复述这个故事，是因为由此而联想到了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居然跟这条狗差不多，甚至于更加悲惨。

## 二、知识分子上了贼船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和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的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知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北京)中的一段话。这是《毛泽东传》作者们所承认、当然也是中共当局所肯定的结论。

但是，这一大批对国家无限忠诚、对中共毛泽东寄以殷切希望和信任、归国后又作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知识分子的下场，是不是比那条叫黑虎的忠狗

好一点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千千万万踊跃归来的知识分子可谓自投罗网，用毛泽东的话说，则叫“上了我的贼船”；毛共对留恋故国不肯离开大陆、或虽然离开了却又千方百计返回大陆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狠毒、卑鄙、无耻、残忍、凶恶，更胜过叶晓芳对黑虎的千万倍。

许多归国知识分子自踏入国门的第一天，噩梦就开始了，无一例外的受到无穷无尽、花样百出的折磨、羞辱，直至粉身碎骨、甚至尸骨无存。少数大难不死的，也是伤筋动骨、如剥了九重皮。

例如从英国回来的语言大师、剧作家老舍于1966年8月24日，被红卫兵批斗、毒打后，跳进北京太平湖自杀而死。从法国回来的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傅雷因不堪迫害，1966年9月3日与妻子朱梅馥一起上吊自尽。从香港回去的容国团，为党国争了殊荣、立了大功，却被污为“特务”而不得不自吊于北京龙潭湖边的槐树上以结束生命。

总之，毛共法西斯治下的亿万臣民之命运比狗还要悲惨，常常象蝼蚁般成群成群地被作践、被虐杀。中共发动暴力土改，至少屠杀了300万所谓的地主、富农；为配合“抗美援朝”而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自己公布杀了240万，实则则超过500万人；三年人祸期间，4千余万农民被活活地饿死；十年浩劫造成2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 二、对知识分子的群体灭绝

郭维敬编着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便记录了50年代知识分子被摧残、被屠杀的血泪历史。该书所记载的鲜血淋漓的故事，清楚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毛共对知识分子搞的阶级灭绝政策比希特勒对犹太人搞的种族灭绝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书揭露了河南省反右运动情况，全省共划右派9万人，占全国15%。学校教职员中被划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平均占23%，有的地区达50%，个别学校达70%以上。固始县把教师48%划了右派；遂平县则为52%。信阳地区书记王某在反右运动中要求所辖的19个县市开展向地委“报喜”的活动，结果划右派的人数一浪高过一浪。党校副校长董玉宝实在划不出右派来，这位书记便厉声斥责：“你就是右派！”竟真的将董打成了右派分子。

息县划右派稍迟缓，他亲自去召开大会，公开说：“难道平时就没有提过支书意见的？”经他一点拨，当天晚上该县就以“抓400多名右派”报了捷。他到汝南县视察，见有数十名男女教师画漫画讽刺县教育科长随随便溺，于是在大会上说：“这泡尿尿得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结果这一大批无辜的教师全都被打成右派。豫东永城县右派总数是1,976人。商丘地委宣传部长谢某把全系统的所有干部几乎全划了右派，最后只剩下“两个半”所谓好人；比如专署文教科9个人必须划8个之类，荒唐到了极点。

反右后，信阳地委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别山区谭家河建立了“万胜山森茶场”，共送去200多名右派，其中逾半数去而不归，埋骨深山；幸存者非伤即

残，亦未得尽天年。至今人们谈起谭家河都心有余悸、毛骨悚然。该场负责人视右派分子为不可宽恕的重刑犯，任意毒打、任意饿饭、迫使不分昼夜地超强度劳动达两年之久，在百般折磨、侮辱、虐待之下，许多人被饿死、累死、自杀；基建大队长徐蓝宇和办公室主任贾文明被人称作“活阎王”，一次强令右派们在恶劣天气中翻山越岭扛木料，以致途中倒毙、滑入山涧及大粪池、走不动而冻死7人(一说17人)。其余分散于各县各农场改造的右派，处境同样恶劣，死人亦不在少数；如平舆县共划了729人右派，到“改正”时已死了129人。

死了右派还不如死了个家禽家畜”(李说：《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共和国早期故事〉序言》，刊《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3期)，真是欲为狗而不可得了。这样的劳改农场，这样的法西斯集中营，这样灭绝人性的杀人魔窟，在中国大陆可是成千上万。以前有造成“犯人”死亡过半的甘肃省夹边沟农改农场、“模范监狱”---秦城，今有打死孙志刚的遍布大陆的收容所和拘留站。

#### 四、丧心病狂的酷刑和虐杀

右派分子、北大才女林昭因对反右和批彭德怀有看法，于1960年10月被捕入狱，她在狱中被百般折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狱警竟把她这么一个弱女子反拷180天，连吃饭和大小便也不给打开。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上海市公安局在1966年4月把林昭从病床上拖出去枪杀后，还要向伤心欲绝、病体支离的林昭母亲追讨5分人民币的子弹费，其丧尽天良以至于此！

再看毛共怎样折磨、虐待、残杀后来被他们捧为英雄、烈士的张志新吧。张志新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惨遭凌辱、被狱警轮奸，狱警还挑动流氓犯、盗窃犯无情地殴打和折磨她；1975年4月4日，当属于英雄的最后一个黎明来到时，没等她弄清怎么回事，就被几个窜上来的人按倒在水泥地上，头枕一块砖，强行切开喉管，再在喉管插进一个3寸长小手指粗的不锈钢管，并用线将连接钢管的金属片缝在刀口两边的肉上，剧痛使奋力反抗的张志新咬断了舌尖，血水淌满前胸；目睹这一惨状的一个女狱警，当场吓得昏厥过去……(《“文革”之谜》)

为了防呼喊“反动口号”，辽宁省把张志新的喉管切断，而江西省则把李九莲的舌头与下颚用竹签钉在一起，诸如此类举世罕见的酷刑，就是全无心肝的共产党反动派嗜血成性的表现。

#### 五、毛泽东是始作俑者

共产党从苏区肃反起，历来都搞的是逼、供、信，酷刑泛滥。其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1930年12月3日，毛根据刑讯“犯人”而得的口供，认定江西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等人为AB团分子，就给江西省行委写了指示信，并交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

“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予全部扑灭”，“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地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



和政府必是 AB 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将省行委、红 20 军主要负责人李白芳等 8 人逮捕并施以“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各种酷刑，受审者“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当场死亡。甚至李白芳等人的妻子前来探视，亦被当作 AB 团抓起来，“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在折磨、虐杀同类中获得欢愉和快感，是人类所特有的劣根性。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却把这种嗜血的欢愉和虐他的快感发挥到淋漓尽致、登峰造极的地步。

## 六、毛共作恶而能逍遥法外

晓芳勒毙了黑虎，立即受到丈夫、儿子的谴责，受到离婚、家庭破碎的惩罚，并有难过的表示。但共产党反动派从江西肃反开始，到 1989 年北京奢城，再到镇压法轮功，从来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认过罪，而且还要强词夺理、死不认账。历次整人、杀人的凶手，包括残害高岗、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陶铸等人的打手在内，一个都没有被追究责任、被处罚；甚至把清算他们的罪行、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划入禁区，不许老百姓研究、议论、批评，正像北京大学教授焦国标在《讨伐中宣部》中所指出：

中宣部 14 大病之“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出’。中宣部有过之品无不及，凡历史上之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事件、哈尔滨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

中共当局从上到下都在极力掩盖、抵赖、淡化，甚至美化他们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例如林昭从 1980 年“平反”至今，其亲友一直在上访，要求有关部门讲出真相。“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海相关部门对这一诉求一直采取推诿态度。对新华社记者的公务采访也是采取‘不说、不让、不给’的态度，具体做法就是既不接受采访，也不让别人接受采访，更不提供相关数据。”（渔翁：《不能向社会发出这样的暗示》，《杂文月刊》2003 年 12 期）

过去有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现在有人说：宁做外国狗，不做中国人。人而不如狗，令人悲哀、愤怒，然而却是事实。请告诉我：

狗会自杀而且会在自杀时写下“毛主席万岁”吗？狗有一下子活活地饿死 4 千万只吗？狗会有 80 多条一下子在一个货柜里焗死吗？狗会一批又一批地、前仆后继地、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地逃亡，逃向台湾、逃向日本、逃向欧洲、逃向非洲、逃向澳洲、逃向美洲，甚至逃向子弹横飞的以色列和伊拉克吗？

“人权”两字虽然写进了《宪法》，但只要中国共产党嗜血成性、摧残虐杀同类的本质没有改变，“人权”就永远不会比“狗权”更馨香、更值钱！

（2004 年 5 月 15 日《动向》）

##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胡锦涛先生，你还不肯为死难矿工下半旗吗？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是废纸乎？

胡锦涛先生，如果你真的想尊重《宪法》、以法治国的话，请你先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为死难矿工下半旗致哀，为一切天灾人祸而罗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致哀！

根据 1990 年 6 月 28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通过，1990 年 6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公布，由 199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 14 条规定：

“下列人士逝世，下半旗志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四）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的人。

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

依照本条第一款（三）、（四）项和第二款的规定下半旗，由国务院决定。

依照本条规定下半旗的日期和场所，由国家成立的治丧机构或者国务院决定。”

仅以煤矿矿难而言，2004 年大陆矿难死亡的人数是 6,027 人，平均每生产 100 万吨煤炭就有 3.1 个同胞付出生命。2004 年中国的 GDP 是 13.6 万亿元，但各类事故死亡 136,755 人，即一亿 GDP 死亡一个人，是美国的 20 倍。以人口计，去年每万人中就有一人死于各种事故灾难。

### 二，矿难如麻，人命如蚁

2005 年截至 12 月 8 日为止，可统计的矿难已达数十起，死亡超过 1,000 人。

1 月 7 日河南省浚池县矿难：4 死。

1 月 12 日河南省宜阳县矿难：10 死 10 伤。

1 月 16 日重庆南川市矿难：12 死。

1 月 21 日辽宁省调兵山市矿难：9 死 4 伤。

2 月 14 日，辽宁孙家湾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214 人。

2 月 17 日云南省富源县矿难：27 死 14 伤。

2 月 26 日重庆市铜梁县矿难：2 死 2 伤。

3 月 9 日，山西交城发生矿难：28 人遇难，69 人生死不明。

3 月 10 日，山西灵石发生矿难：6 人遇难。

3月17日奉节县苏龙寺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9名矿工遇难。

3月19日，山西朔州细水煤矿发生爆炸：72名矿工遇难。

4月5日重庆合川矿难确认23人死亡。

5月12日四川攀枝花金江畔海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7人死亡。

5月16日内蒙古煤井爆炸，造成5人死亡、7人重伤。

5月19日河北省承德市暖儿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50人死亡。

6月8日，娄底市资江煤矿303采区四石门发生煤与瓦斯突出21人遇难。

6月22日，繁峙县义兴寨金矿松洞沟零号脉王全全洞发生爆炸，造成矿井下37人死亡。

7月2日，山西省宁武县阳方口镇贾家堡煤矿原接替矿井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人数为36人。

7月11日新疆阜康矿难：83名矿工遇难。

7月14日广东兴宁矿难16名矿工遇难。

7月14日奉节金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人死亡。

7月19日陕西铜川市瓦斯爆炸26名矿工遇难。

8月1日，四川大竹县田坝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名矿工死亡。

8月2日河南省禹州市兴发煤矿矿难26人遇难。

8月3日，邯郸县康庄乡桃顶山煤矿井下发生特大火灾事故，13名矿工全部丧生。

8月7日，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黄槐镇大兴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23名工人死亡。

8月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湾子煤矿瓦斯爆炸，16人死亡。

8月19日，吉林省舒兰矿务局五井发生透水事故，当班入井工人152人，16人被困井下。

8月25日，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县下山煤矿因非法开采造成60人死亡。

9月10日，贵州省天柱县凤城镇大豪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0矿工遇难。

9月11日，黑龙江省双鸭山矿难，15名矿工遇难。

10月4日，新疆拜城县亚吐尔煤矿14人死亡。

11月27日，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171人遇难。

12月3日，河南新安县石寺镇寺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当时井下48人作业，6人获救。

12月7日，唐山市开平区刘官屯煤矿爆炸。死亡人数8日达到74人，仍有32人下落不明。(在矿井下几天“下落不明”只是死亡的代名词；以上只是公开的数据，被瞒报、漏报，被私了、被毁尸灭迹，见2003年4月号《当代》杂志：《矿难如麻》；林保华：《如此盛世---矿难如麻，人命如草》；《议报》等)

### 三，贱视生命，凶残冷血

像孙家湾矿、大兴矿、舒兰矿和七台河矿这样的矿难难道还不算“特别重大



伤亡的不幸事件”吗？1999年11月24日，从烟台开往大连的客滚船“大舜号”在烟台附近失事，船上304人中282人遇难；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大火造成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个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學生，36个是老师；2003年2月25日[新疆地震](#)，死亡近300人；2003年中石油川东北气矿“12·23”事故中的死亡人数达240多名，受伤近400人；洛阳市大火300多个无辜惨死；2005年6月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洪水淹死117个小学生的惨剧；都不算“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吗？

在当今世界上，为灾难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已经变成国际通例，它标志着国家及其政权对生命的敬重和珍惜，也以此来彰显生命的宝贵、来提醒全社会对生命的珍视。(刘晓波)

2002年5月5日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宣布，5日和6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下半旗致哀，以悼念4日在北部城市卡诺坠机事件中遇难的100多名死难者。(中新网北京)2002年5月25日，莫桑比克的莫安巴县发生火车相撞事故，死亡205人，400多人受伤。莫桑比克总统当即宣布此事故为国难，决定全国所有医务人员立即取消休假，投入抢救工作，全国为死难者默哀3天，动员全国人民为伤员献血。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在非洲。中共的电视和宣传强加给人们的印象是，那里只有仇恨和杀戮，并无温暖和入道；非洲与落后、野蛮、贫穷、战争联系在一起，成了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无私援助”、实践“伟大国际主义”的施舍对象。

#### 四，台湾行政院院长为4人死亡引咎辞职，中国死人无数“总理”却稳坐钓鱼船

1998年6月3日德国一列高速列车出轨，有100人死亡。德国政府立即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2002年4月27日，德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18人。德国政府同样下令全国哀悼死难者，下半旗志哀。(北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德国在中共眼中是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再如美国“9·11”事件；2000年8月12日，俄国“库尔斯克”号核潜艇遇难事件；韩国地铁纵火事件；意大利在伊拉克阵亡官兵；这些国家政府都郑重地下了半旗。去年为哀悼印度洋大海啸的10多万死难者，罗马、瑞典、挪威、芬兰、比利时和德国在新年来临的一刻下半旗。海啸影响最惨重的欧洲国家之一瑞典宣布元旦为官方哀悼日。比利时则决定从12月30日晚上开始的3天时间里降半旗致哀。荷兰呼吁欧盟25个成员国举行默哀活动并且下半旗。斯里兰卡除夕改为哀悼日，所有政府建筑物都下半旗，住所及汽车都挂上白旗，以悼念死者。

更有的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要引咎下台，例如台湾，2000年7月22日台湾嘉义县山洪突发，3男1女被困于洪流中的沙洲上，因军方救护队与警方救援单位之间互相推诿，使在急流中挽手苦苦待援近3个小时4名工人精疲力尽下被洪水卷走，这就是震惊岛内外的“八掌溪惨剧”。行政院院长唐飞、行政院副院长游锡堃为此先后请辞，警政署长丁原进、消防署长陈弘毅亦因此请辞。可是中共

反动派却装聋作哑、无动于衷，偶尔流几滴鳄鱼眼泪或说句没下文的自请处分，或牺牲一两个小混混，而后便厚颜无耻地继续赖在台上作威作福、为非作歹！

可见，无论“落后的非洲”、“腐朽的欧洲”，也无论亚洲、美洲和欧洲，那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懂得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但是，号称“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共寡头集团，比他们心目中的非洲更落后、更野蛮、更不文明、更不人道；对比被他们所咒骂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究竟谁先进、谁腐朽，谁先进、谁反动？中共分赃集团既与西方文明为敌，也并不尊重他们所吹捧的什么“亚洲固有传统价值”。

### 五，3,656 条人命也抵不过杨尚昆一条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公布以来，除了为中共的重要首领和外国大人物死亡而下半旗外，从未为“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下过半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对老百姓无异一纸空文。唯一例外是，1999 年北京政府为 3 名被美国炸死的驻南斯拉夫记者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下半旗致哀。这是因为他们死在外国，而且是被美国人炸死的。这 3 名记者的遗体 and 灵魂被当成政治道具，不但不得安宁和安息，反而受到侮辱和沾污。

但 11 月 9 日，死于约旦首都安曼连环恐怖爆炸案中的 3 名中国国防大学学员代表团成员好像并未得此殊荣，他们是潘伟，44 岁，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康平，42 岁，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官；孙靖波，41 岁，军委办公厅军官；从三人的职位推测，他们的军衔低则少校、高则大校。调查显示，此次恐怖惨案为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所制造。（刘晓波）

中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从 2001 年 8 月 19 日两名中国人死于发生于菲律宾南部的绑架案以来，已经有 29 名中国人先后在海外恐怖袭击中遇难。可悲的是，对国人惨死于恐怖袭击的悲剧，中国政府的反应却尽显荒谬，对死难者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实用主义态度。

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国旗法》的立法精神是为了“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在现代国家里，公民和国家是一种互相承担义务的契约双方。一个公民要服从国家的法律，要依法纳税，要服兵役保护国家安全，要用劳动促进社会的发展，要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这是义务；但是国家也负有保护公民安全的义务。《国旗法》所以规定可以为重大伤亡的同胞下半旗，正是昭示了这样一种国家义务，让每一个普通公民都感受到自己应有的尊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民，还从没享受过现代国家的公民待遇。（张金岭：《请为死难同胞下半旗》，《齐鲁晚报》5 月 24 日）我们的人民，在中共流氓集团眼中，是草民、子民、贱民、暴民、甚至是奴隶，在灾难面前，只能默默地消失，像一堆堆蝼蚁，像一丛丛小草。

1998 年九江大堤决口所造成的特大洪灾中，死亡人数达 3,656 人，北京当局并没有按《国旗法》为死难者下半旗致哀。约 1 个月后，国家主席杨尚昆逝世，却获得下半旗的哀荣。

两相对照，中共党国政要一个人的价值超过普通 3,656 人。自诩“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共法西斯政权所代表的仅仅是一党一派，甚至是几家几人的利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是两千多年前老子的诅咒。可惜的是两千多年过去了，老百姓反倒连刍和狗也不如，这大约就是中共所谓的“与时俱进”吧。

#### 六，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2003 年 5 月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不但很快就向宇航员所属的国家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表示慰问，而且还下了半旗。这是因为这 7 个宇航员是外国人。但是几乎同时发生的大陆海军舰艇部队失事的 361 潜艇 70 名遇难的官兵，却得不到江泽民们的眷顾，最歧视中国人的，原来就是中国的“领导人”。奇怪乎？不奇怪也。

中共是苏俄扶植起来的，所以俄国人是中共的爹；日本人救了中共的命，所以日本人是中共的恩人；现在山姆大叔有钱，所以美国人又成了有奶便是娘的中国共产党的娘。原来我以为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权向北京政府问一句：你们的国旗到底为谁而降？现在我知道错了。

孟子曰：“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五四运动领袖、伟大的启蒙大师陈独秀这样说过：“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每周评论》第 25 号，1919 年）

最后，我还得重复这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不爱自己的人民，那么这个国家有什么权力要求人民去爱它呢？

胡锦涛先生，你还不愿意为死难的矿工下半旗吗？你还不愿让一切死在你们专制独裁制度下的灵魂，得到安息吗？

（214 期《议报》，10dec2005）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后一宗“反革命案件”

## ——“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案的追踪和剖析

【导语：“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反革命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一起“反革命案件”，一定会被载入史册，载入思想史、政治史、法律史、政党史，载入中国的法学、刑事学、政治学、社会学教科书，甚至公民讲义。这个特殊个案，可供后人细细研究、讨论、品味和思考。设在悉尼的“中国政治与宗教受难者后援会”于2006年3月27日公布了本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一中刑初字第102号》和张思之律师、阎如玉律师《冯邵力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辩护词》，这两个文件虽在海内外几个网站流传，但并未引起普遍关注，故应知情人要求，把写于去年10月的本文在网上发布。】

### 一，“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案概述

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反革命案是北京市公安局所立案并“侦破的重大案件”，因为立案时间是1996年12月，所以本案通常被称为“12·20反革命案”。又由于“反革命罪”已为1997年生效的新刑法所取消，因此，“12·20反革命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一起“反革命案件”，一定会被载入史册，载入思想史、政治史、法律史、政党史，载入中国的法学、刑事学、政治学、社会学教科书，甚至公民讲义。这个特殊个案，可供后人细细研究、讨论、品味和思考。这就是这个案件已经过了9年，而本人仍要发掘和报导的原因。

毛泽东曾自嘲“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没有说错，因为毛时代除了一部《婚姻法》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什么法律了，所以他只好无法无天，“靠一部法治天下”。毛泽东大行之后，吃过他“无法无天”苦头的天罡星、地煞星们痛定思痛，大感立法的重要了。在历九死而一生的彭真委员长推动下，人大常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也确实立了几条法，搞得似模似样，好像英雄好汉们从此要改邪归正，以法治国了。

谁知不然，共产党积习难改。即使所立的“法”都是为了保护权贵集团利益的，但只要他们稍不顺心，仍可弃之如敝屣。例如这个“12·20反革命案”，如果根据新《刑法》，就应该撤案，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可是不！宁可杀错、□可放错，当事人只好倒霉了。

1997年3月，经“批准”后开始拘留、逮捕有关“案犯”：3月31日，钮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海淀区人民政府特约监察员、中国民盟盟员）在工作单位被公安人员以“涉嫌经济案件”带走。警方动用浩大警力包围并严密搜查其住宅和办公室，抄走照片、信件、字纸，并作高频摄像。

6月25日，唐志洁（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杂志常务副总编辑、中共党员、钮葆之妻）被捕，再次被抄家。前后被捕的还有冯邵力、宋旭民、

王怀武、李增春、王彦发、许海连，计 8 人。

1998 年 1 月 23 日开庭审理。案情：成立“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从审理结果看，8 个人分三种案由，一是参与开会等活动；二参与写作和修改《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章程》；三包庇反革命。请注意，新《刑法》虽然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但审理中仍然使用这个罪名。

1999 年 2 月 11 日宣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冯邵力有期徒刑十一年；

李增春有期徒刑 4 年；

王彦发有期徒刑 2 年；

钮葆有期徒刑 2 年，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唐志洁有期徒刑 2 年，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许海连有期徒刑 1 年 8 个月；

王怀武有期徒刑 1 年，缓期 1 年；

宋旭民另案处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一中刑初字第 102 号《刑事判决书》)

《一审判决书》、《二审裁定书》关于判钮葆、唐志洁夫妇的一段话如下：“会后，冯邵力将《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章程》交钮葆、唐志洁修改。1997 年二月初，钮葆、唐志洁在家中(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寺南里 20 号楼 4 门 401 号)，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章程》交还给冯邵力。”

《驳回钮葆申诉通知书》认定他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理由是：“经我院审查认为你参与对冯邵力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章程》的修改，删除章程内过激言辞的事实，有冯邵力及唐志洁的供述，你亦曾承认。”

## 二，中共特务自编自导自演的反革命案件

据知情人表示，涉案人员中确有天真的人，他们依据毛泽东“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最高指示”想试一试《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的权利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个想法刚一露头，很快就被无处□在、无孔不入的中共特务们盯上了。自称“保定公安局副局长，同情民运，‘六·四’时参与学生运动”的宋旭民在第三被告王彦发、本案“证人”马少华引见下，和第一被告冯邵力见面、认识，并很快成为“知己”。

冯邵力曾向朋友提起，说新认识的这个伙伴是个人物，很有头脑，很关心政局，很有本事，通着天，出版过一本书叫《东欧巨变》，是从理论上论述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体制改革。冯还说：“公安局长一级的干部了，置个人的升迁于不顾，关心国家大事，反对政府腐败，提倡为‘六·四’平反，很难得，很令人钦佩。”

宋旭民本人也表明过自己在保定受重用，中央和河北省组织部门都对他进行了考核，准备提拔为河北省干部的二梯队。宋表示自己有权可以动用 50 万元以内的经费支持政治改革。宋一直暗示自己认识高层领导，好像乔石等人。说有重



要情况可以直接向乔石反映。宋鼓动冯等向中央写材料，“要搞就搞大，造出影响，中央才重视。”宋旭民因此赢得冯邵力的极大信任，上窜下跳，因而成本案第二号人物，荣任“反革命集团副总干事长”。宋旭民鼓动冯邵力到英国去，向英国共产党寻求援助。正当冯成行之际，刑警行动了，开始抓捕。这时大家和宋之间一直畅通无阻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

虽然在《起诉书》中也罗列了宋旭民的“罪行”，且条条有份。但对这样的关键人物却作“另案处理”，实际上并没有处理，这才让人恍然大悟：是中共特务在自编、自导、自演了这场滑稽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的一宗反革命案。

据说在“六·四”中受过“处理”的“证人”马少华则始终在幕后。与宋旭民关系密切的关键人物王彦发，2004年死在南三环高速公路的“车祸”中，重要参与人物王怀武只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一系列神秘现象叫人难以理解。

### 三、张思之律师、阎如玉律师为主犯作的无罪辩护

据《起诉书》认定冯邵力的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论据有：(一)说“封建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思想土壤还很厚，在意识形态领域，专制的权利意识顽固地存在”，从而构成对社会主义的污蔑；(二)要搞什么“一党两治”、“第三共和”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气焰甚高，势如“叫嚣”；(三)开会串联，搞了非法组织。

对此，张思之律师和阎如玉律师在《辩护词》中说：(一)认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封建社会遗留给人们的东西，这符合客观实际，也与党的领袖们的观点相一致，它既不是出之于凭空捏造，又没有轻侮诽谤的表述，怎么能指控为“污蔑”呢？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论述了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在当今社会上的广泛影响；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这帝王思想比“封建统治的权利意识”讲得更为明确，更加深刻。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这棵老树却往往犹能发出新芽、绽出小花，难道还少吗？反对封建主义的种种表现是党一贯号召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必须进行的一项长期的重大斗争，对此难道应有疑问？

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冯邵力的提法并不正确，各种观点可以相互质疑，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把它同阴谋颠覆国家政权挂上钩！封建主义的表现本身都不能危害国家安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怎么指出封建主义是客观存在倒能够推倒社会主义江山了呢？如硬要把这一点作为论据，用为证据，那可真是“何患无词”了。

(二)《章程》中的“两治”与“多元”的提法，是基于冯邵力自建的原则和自定的任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地实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冯邵力在其《章程》总纲中写道：“在中国建立以现代民主为基础，党内多元政治结构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体制，这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既能全面体现中国人民政治意志，有利维护中国人民政治权利，又可保障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石”。他进而明确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他说：“在这个基础上，是单元还是多元化

的政治体制，不改变制度的政治属性”。他在1997年4月1日的《章程》中作出这样的总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把党的建设摆到头等重要位置”。他之所以这样讲，源于他的认识与体验，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有坚定不移地维护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才能保持中国长治久安、稳定的……”

迫切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并不是冯邵力的发明创造，中共及其高级领导多有指示，屡有论述。冯邵力在《章程》中清楚地表示，他认为他的观点与做法，是继承与实践着邓小平理论，他设想的“一党两治”、“第三共和”的格局，是“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后，党在建树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上，又一划时代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伟大贡献”。二位律师认为，在被告人的行为、语言、文字上，加诸不切实际的形容词、语意图加罪，这决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党“两治”，另立派别组织，毛泽东不仅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而且还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共党内斗争历史也证明了“派”的常有，是客观存在。从组织上说，《中国共产党组织条例》规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的……给予留党查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可见解决党内关系问题，应由党的纪律调整，决不允许将党纪上升为法律。冯邵力这种公开而非“组织秘密集团”的派别活动，极而言之，也只是违反了中共的《党章》，只能接受党纪的处分。

#### 四，党纪国法的混用

《辩护词》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就十分中肯地划清了这个界限。有人分裂党，党纪怎么处分都不为过，假如硬要用法律规范进行调整，那无论怎样“从轻”也是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常识，不言而喻。“解决党内的关系问题，应由党的纪律调整，决不允许将党纪上升为法律，党的纪律不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硬要用法律来代替党纪是原则性的错误，党纪国法应各有明确的规范。”

但是中共权贵集团却根据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地混淆党纪、国法的使用范围。对于各级官员及其子女、亲信的贪污腐败、甚至杀人放火，往往只是以党纪处分而避去国法的制裁；最近的例子是：中共广东省汕尾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金生，汕尾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敏，汕尾市建设局局长陈辉南，中共汕尾市公安局委员会副书记、副局长吴声，虽然他们是手上粘着东洲维权村民鲜血的刽子手，却因为他们维护了权贵的利益，便只处以不痛不痒的党内“警告”之类而逍遥法外！

偏偏冯邵力等普通党员明明只是犯了党规，却以国法来制裁。

#### 五，当今的“莫须有”：以思想、言论定罪

“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名为党内的政治派别，设想建立一个所谓的

“国工作委员会”但一无会址，二无经费，三无人员，四无办事机构，五无地方组织，六无任何政治势力或团体的支持。它对中共根本构不成威胁，构不成对党中央领导权的危害。

退一步来看，即使在党内建立派别这个事实构成反党，但也应该认识到，反党与反政府、反政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更何况反对政权与颠覆或者推翻政权是互不相同的法律概念。

公诉人当庭宣读的《技术鉴定书》，以及专政机关发出的《起诉意见书》，已将本案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然而新《刑法》已废除反革命罪，所以援引新《刑法》办理冯案就是适用法律上的错误。

至于“覆国家政权罪”，必须有两个要点：一是使用暴力推翻国家统治权利或相应的政权机关；一是阴谋篡夺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权。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冯邵力的行为仅限于改善党的领导，为改进党内政治生活、探讨新的政治格局、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起诉书指控他“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没有证据支持，缺乏事实说明。他主观上没有篡国夺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故意，客观上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犯罪行为，公诉人在适用法律上显然有欠斟酌。

钮葆、唐志洁等人刑满出狱后，多次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中共北京市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提出无罪申诉，但都石沈大海、杳无音讯。而已服刑9年的冯邵力先生目前仍在北京第二监狱之中。

## 六，暴力和谎言成了维持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救命稻草

从冯邵力、钮葆被捕起到本案宣判，拘押审理时间长达23个月，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任何实证，除了宋旭民上窜下跳外，既没有黑手控制，也没有间谍操纵，也没有经费来源，有的只是电脑中几篇文章。

所谓钮葆、唐志洁修改《章程》，除了“有人供述”外，控方也提不出物证。据1998年1月23日《庭审记录》显示：当钮葆的律师要求钮葆到公诉人席辨认一份用深蓝色钢笔水修改的《章程》，受到公诉人阻止，并明确指出，“经过刑事科学鉴定，那个笔体是别人的，不是钮葆的。”钮葆当即要求“出示有我修改痕迹的《章程》”，但公诉人和审判长都不予理睬。钮葆唯一相关人、证人冯邵力当庭也作了明确申述：“我想了10个月，唐志洁、钮葆确实没改过那份《章程》。”

与案人员均是学有所长、业有建树的各单位业务骨干，他们主观上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客观上也没有任何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

《判决书》说，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民主派”改名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讨论修改了该组织章程，确定了以被告人冯邵力为首的该组织分工和发展工作；提出在中共十五大前，召开该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计划向全国寄发该组织的宣传材料，将该组织章程寄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该组



织活动全面公开化，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

但是《判决书》没有说，将“中国共产党民主派”改名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讨论修改该组织章程，确定了以冯邵力为首的该组织分工和发展工作；提出在中共十五大前，召开该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计划向全国寄发该组织的宣传材料；将该组织章程寄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该组织活动全面公开化；为什么就是“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

例如，邓小平不是也把“政治改革”这四个字挂在嘴边吗？为什么冯邵力自认“政治改革派”就有罪了呢？那些宣判“中国共产党民主派”或者“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有罪的人，岂不是承认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反民主派”或者“中国共产党拒绝政治改革派”？“将该组织章程寄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该组织活动全面公开化”，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吗？难道中共非把反对派和一切不同意见全部逼入地下状态不可？

法院就是这样在没有物证、人证之下，把无犯罪动机和犯罪事实的守法人蛮不讲理判了徒刑。二审庭审时律师一致为被告做无罪辩护，认为“此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于是法院只好拒律师于庭外，只准他们作“书面辩护”。二审庭审在公诉人匆匆宣读完《认定书》后草草收场。这场被《起诉书》渲染成“除北京外的七个省市涉案”和北京市公安局在答复查询指“江主席很恼火，气得拍了桌子”的大案、要案，竟审结得如此儿戏。真是荒唐、荒谬加荒诞！

中共之执法和司法机关竟不顾毛泽东“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最高指示”，不顾《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的权利，公然践踏中共自己泡制的《宪法》，不惜使用特务导演、制造并收集“罪证”，不顾诉讼程序、诉讼时效，不要任何证据，置事实于不顾、置法庭调查于不顾、置律师一致的辩护辞于不顾，以周纳、罗织、构陷入人以罪，这到底说明了什么？这说中共腐朽集团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它对垮台和灭亡的恐惧也到非夷所思的地步。

近年来的冤案，仅涉及美籍华人的就有李少民、吴建民、方复明、董维、谢春仁等(《苹果日报》2005年8月20日)。现在又有“程翔间谍案”、“畚祥林杀妻案”、杨天水案、广东汕尾维权农民案、福建莆田维权代表黄维忠案、贵州毕节李元龙案等，千千万万由中共专政独裁政权所制造的冤假错案，都只能说明中共反动派确实是一个草菅人命、与民为敌、冷血残暴的流氓政权。暴力和谎言成了维持其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救命稻草。

(2005年19月7日写于北京，2006年5月29日修改于香港，首发《民主中国》)

# 看中共的南泥湾精神和小米加步枪

首先回顾由苏俄所催生的中共是怎样受苏俄的扶助、豢养而壮大起来的？

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从共产国际收到16,655元；

1923年头8个月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15,000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P47、P168，中共中央出版社，1989年，北京)；

1924年实得日常活动经费约36,000元；

1925年每月平均约领3,300元；

1926年每月活动经费已超过10,000元；

1927年每月仅日常活动费就达3万元以上。另外，组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用款3万元；党校开办费5万元，每月开支1.5万元；7、8月间为湖南开展农运用款近3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用款1万元；12月为广州起义和善后用款近10万元；

1928年，中共中央仅特别费一项就要求莫斯科拨款100万；

1929年每月仅活动费约4万元；

1930年党活动费每月约五万元；全年济难费11.4万元；全年团费7万元等；

1931年每月美金1.5万元，中国元5、6万元。(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187-189，三联书店，1999年，香港，以下简称《杨着》)

1936年9月莫斯科拟用150辆汽车来回两次把500--600吨军用物资运到中蒙边境交中共红军；10月莫斯科又策画把1,000吨军用物资运到新疆哈密交给中共；虽然中共因宁夏战役失败和西路军的覆灭而未能领到这些物资，但11月至第二年1月也收到了至少180万美元的巨款。(《杨着》P193)

1938年中共虽然每月从国民政府那里领取50万中国元(折合16万美元)军饷，仍要向共产国际索取30万美元款项和一批印刷机械等。

1940年根据周恩来的申请，季米特洛夫建议斯大林向中共拨款35万美元。(同上P197)1941--1944年仍不断有临时拨款。

所以毛泽东对苏共和斯大林是感恩不尽的，1939年为庆祝斯大林60岁生日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抒发他对斯大林的“敬爱”；1945年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至少有9篇的文章和讲话中大讲特讲苏俄和斯大林，而且充满敬重和期望之情。什么“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呀；什么“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呀；什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斯大林，他是我们的先生”呀。尽极吹捧献媚之能事。

明明是卖身投靠，却要羞羞答答。“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现在却不公开讲这一点，只是“为着避免反动派的攻击”(《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P123--189)。到了斯大林死后，自以为翅膀硬了，便干脆

反口翻案，说以前的话都是“违心的话”，以前的文章都是“应景之作”。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在和国民政府争夺地盘的阴谋活动中得到苏俄的紧密配合和大力支持；特别在抢占东北地区，得苏俄助力尤大。苏俄把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全部转移给中共在东北和华北的军队。其中步枪 70 万支，机枪 1.2--1.4 万挺，各种炮约 4 千门，坦克 600 辆，汽车 2 千多辆，飞机 800 余架，炮艇若干，弹药库 679 座。另外，1945 年底至 1947 年初，苏军还提供步枪 30 万支以上；1948 年前后，苏俄还向东北共军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制和捷克制的武器装备；但毛泽东 1949 年 2 月和来访的米高扬说，为了宣传的目的，1948 年 11 月东北野战军入关时都把苏式武器留在关外。

直到 1949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还向米高扬明确提出，要求苏俄援助反坦克炮、提供生产炸弹的铝、钢材、汽油、近 3,000 辆汽车以及其它生产武器的必要设备，并派一些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军队，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

明明拿了大量的卢布，却胡吹什么自力更生、南泥湾精神；明明是苏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偏偏宣传什么“小米加步枪”；中国的老百姓让共产党骗得多苦呀！

苏俄和斯大林何爱于中共呢？根据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 年）透露，斯大林在战后某天得意地对他的臣僚说，俄国东边的情况非常好，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了，萨哈林岛（库页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了，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

可见毛共是为了个人野心和一小撮人的利益，甘当苏联走狗，自愿为苏俄和斯大林掠夺中国领土和资源充当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罢了。但是，就这么样一伙里通外国的民族败类，几十年来却捧为什么“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1920 年初，毛泽东就有赴俄的愿望，随着毛泽东地位的提高和中俄二共勾结日深，毛之恋苏情结亦日炽。为效忠、为朝圣、为和苏联保持一致，毛泽东从 1946 年上半年开始到 1949 年初，三番五次地要求访问莫斯科，尤其在共军即将席卷大陆的 1948 年，更显得热切和迫不及待。只是由于苏俄本身的问题以及斯大林对毛泽东忠诚度的怀疑，毛泽东的要求始终为斯大林所婉拒。

当然苏俄并不会放弃中共这匹费了大力气和大本钱才养大的走狗，所以斯大林不得不于 1949 年 1 月 26 日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来对毛泽东们作一番安抚并面授机宜，从政治、军事、建立政权、外交、民族自治，到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现国有化的时间表等，无不耳提面命，巨细无遗。米高扬保证继续援中共，毛泽东则表示“中国是共产党人的，苏联也是共产党人的，但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暂时保留下来。”（《杨着》P234--268）

中国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卢布党”，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国有史以来受外国豢养时间最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成交量最多、为祸最烈的卖国汉奸集团。

# 郎咸平：享有「次治外法权」的高等中国人

武宜三定律第三：“只有拿了外国护照的中国人，才能做个象样的中国人，才有资格爱中国；才可以免除在爱国的时候被扣上‘爱国罪’的风险。”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教授郎咸平，近几年揭露弊案几乎是“指一个倒一个”：前有德隆系、顾雏军，今有陈良宇。当然威风八面，狠出了我一口鸟气，我盼望有更多的郎咸平出现。

然而，郎咸平又不是可以无限复制的。郎教授的成功除了他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之外，他还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更重要还有他的特殊身份：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知名教授---一个享有“次治外法权”的高等中国人。另一个重要的条件则是所谓“势”，即郎教授所“顺势一击”的“势”：恰好配合了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否则，再有勇气、再有智能、再有知识、再有知名度也白搭。如杨建利，如高智晟，如郑恩宠，如程翔。谁如果看不到这一些，谁就是一个糊涂虫。对此，郎先生倒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我的个人力量跟他们完全不对称”，“从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之中下手，确实”不容易，因而他并不沾沾自喜。

说到“次治外法权”，我很悲哀地在此提出一个新命题：“只有拿了外国护照的中国人，才能做个象样的中国人，才有资格爱中国；才可以免除在爱国时被扣上‘爱国罪’的风险。”这命题经中国人用无数的鲜血、骸骨和头颅的几十年浇灌，早凝成了一条铁律。姑且把这叫做“武宜三定律第三”吧，但声明：这版权不属于武宜三，命名权也可以随时出让。中国的事，历来要借重享有治外法权和次治外法权的洋鬼子、高等中国人来办，这不能不说是很悲哀的事吧。

周正毅再一次进局子了，郑恩宠仍然凄凄、惨惨、戚戚；陈良宇倒球了，郎咸平主持的电视财经评论节目《财经郎闲评》，也并没有复活。那些以为“中央的反腐决心和魄力”如何如何的想法，实在只是美丽的误会；至于“这一下能够还老百姓一个公道”，更属白日做梦。要知道，在中国从来只有“皇道”、“官道”、“党道”，而决没有什么“公道”。上海市东八块拆迁冤民之类的老百姓，只能永远“冤沉海底”了。

郎教授说：“上海官员的贪腐现象背后的最大问题是整个利益集团的勾结很深，互相呼应”，“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商人，共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而且有腐败的学者散布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给他们制造合法性。这样形成‘铁三角’，共同操纵媒体。我没想到他们那么强大。”

岂止上海如此，北京不也如此？郎教授说，“过去七八年来，北京市发生了很多怪现象，严重伤害了社会公平和利益，北京市的腐败集团，规模和势力都不会比上海的小。”实际上，如今的全中国，何处不如此？所以我以为郎教授的“官民一致共识是反腐”，“中国社会有了反贪这样一个难得的共识的开端，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共识面，制造更多的社会共赢的机会，从而让腐败分子再无藏

身之地。社会共识越多，才能越和谐。”只是一厢情愿。

中共如要“铲除腐败势力”，就要把中共自己连根铲除了。所谓“反腐必亡党”也。当年毛泽东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而自己却是最大的贪污犯。江泽民打击了陈希同所谓“北京帮”，却亲手培植了更大、更恶劣、更猖狂的“上海帮”。今天胡锦涛拚火了“上海帮”，而“安徽帮”、“西藏帮”、“团帮”也隐隐然成形矣。所以，中共要“铲除腐败势力”，到底从哪里铲起呢？

从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可以知道它的现在；从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可以知道它的将来。一个连《公布官员个人资产法案》都难产的法西斯团伙，您还能指望它和您有什么“反贪共识”？剩下恐怕只有“官人怕反贪，穷人盼造反”一条路了呢。（写于2006年国殇节）

## 国共第一、二次合作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

[按语：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即将再次成为共产党友党的国民党某些人在大发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美梦的时候，实在应该回忆一下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惨痛历史教训。第一、二次国共合作都是以苏俄、中共的机会主义为开始，以国共双方互相残杀为结束；那么，第三次国共合作将会有什么结果呢？让我们再翻翻那带血的记忆，在中共中央文件、毛泽东著作和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录》中，重温一下中共党人之阴谋诡计、鬼蜮伎俩吧。现在，国民党大获全胜、马英九成了中华民国第 12 任总统；我把两年前的这一篇文章作补充后，重新发表，算给国民党和马英九送个贺礼吧。希望他们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再中阳谋而跌入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陷阱。则台湾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 1，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苏俄赤化世界的产物

1918 年，孙中山受军阀制肘而无法推展护法大业的时候，为争取国际同情乃致电苏俄，贺其“十月革命”的成功。而苏俄方面当时正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攻，为了寻求国际友谊和发展共产势力，也正派代表在中国活动。苏俄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多次接触孙中山或其代表。为了帮助中共找到可资联合的朋友，苏俄建议孙中山“联俄容共”，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

苏俄和受其指使的中共，在谋求与国民党联合前，即已试探过与吴佩孚、陈炯明等军阀的合作。在争取朋友、减少敌人的考虑下，孙中山同意容共，但不承认“联合”，即允许中共党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遵守党纪，不得公开批许国民党。以为如此可以使中共“化为乌有”，又可以吸收中共人才为己用。但是，由于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例如给了苏俄顾问太大的权力、对中共党人没有适当的监督和及时的制裁等，而使中共坐大。

### 2， 中共怎样坐大？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 24 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谭平山、李大钊等 3 人为中共党员；17 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林伯渠、毛泽东等 7 人为中共党员。而中执委属下 9 部，只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为中共党员。可是这些中共党员人数虽少、能量却大。

谭平山控制的组织部，多派共产党员往各地发展组织，故广东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成立了 5 个县党部，却全为共党所控制。工人部长廖仲恺虽是国民党员，然同情共党，因兼职多而把部务委之中共党员的秘书冯菊坡，故广州的工会悉数被共党所操纵，并可受苏俄顾问直接指挥。中共策划主持的“全国劳工大会”，几年间连续多次在广州召开，代表劳工 50 多万，决定《劳动斗争纲领》。1925 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当年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



农民部长林伯渠、秘书彭湃均为中共党员，故农民讲习所、农民协会、农团军，皆由中共控制。有会员 20 万的广东省有农协，连续两年在广州开代表大会，决定《农民斗争纲领》，开始利用农民从事武装暴动。中共在湖南省发动的农民运动尤为蓬勃，农民协会会员在 1926 年时就达 130 多万。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即有包惠僧、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等中共党员在校中充任要职，国民革命军组建时，有 5 个军和海军局的政治部主任由中共党员担任。

地方党务凡是由中共党员所负责者，即发展共产党务。国民党改组后，中共对各地执行部的权力争夺，更是不遗余力。中共党员人数，1921 年“一大”时只有 57 人，到 1925 年“四大”时也不近 950 人，但 1927 年“五大”时即猛增至 5.79 万人。(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年，香港)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

国共合作本质上是苏俄和中共机会主义政策的产物。他们试图把中国共产党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凭借国民党的躯壳来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斯大林曾谓中国国民党只是一只“柠檬”国际共产党人不妨将之一挤再挤，挤干之后则可信手抛弃(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出版社，2000 年，台北)，最后攫取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共策画的 1926 年“中山舰事件”，使国共矛盾激化，引发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和《准备北伐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肇因。

北伐开始后，中共一面在工农中大肆运动、发展势力，一面分化国民革命军，把可能的势力拉为己用。为了阻止蒋介石东进上海和江浙财团结合而可能摆脱苏俄，中共在发动了工人武装起义，成立了“上海市市民政府”，并计划以武力对付北伐军。在汉口、九江、南京等地，也有中共发动的大规模工人运动。

特别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声势浩大，例如 1927 年的湖南省，农民协会可以号召的群众达 1 千万之多。中共依靠痞子、惰农等流氓无产者，在农村搞暴民政治、红色恐怖，没收地主土地、掠夺私人财产，随便打人、抓人、游斗人、杀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严重侵犯了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破坏北伐军的后方安定，动摇了北伐军心。

从已公布的大量中共文件看，也证明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确实是心怀鬼胎。例如中共四大所作的《职工运动议决案》，就非常详尽的规定了怎么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中也尽力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P44-54，档案出版社，1985 年，北京)

是可忍，孰不可忍！苏俄和中共这种不合作和捣乱的做法，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国民党人的抵制和反抗。为了实现孙中山统一中国的遗志，保证北伐的顺利进行，国民党在北京等地查获苏俄赤化中国的大量档案证据之后，坚决采取了以上

海“4·12事件”为标志的清共措施。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共产党人争权夺利、毫无道德底线的机会主义为开始，以尸横遍野、血流漂杵的大屠杀为结束。

#### 4，第二次国共合作，还是共产党的圈套

谁制造了“7·7卢沟桥事件”？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之被告证人的证词是：向日军开枪的是“学生”、“第三者”、“共产党人”（黄仁宇，P164）。经万里流窜，逃到陕北的只剩下2万余人的中共红军，此时不但疲惫不堪，给养困难，且仍处于国军的重重包围，随时会被消灭。毛泽东等人虽在1936年12月1日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深知中共本性的蒋介石坚持“攘外必须安内”，并不为所动。“不悛以最恶意的猜测”，我相信这时最需要“中日战争”的，只有共产党、毛泽东了。

1936年，在苏俄、中共和张学良同谋演出的“西安事变”后，国共要“团结抗战”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怎么纔能既得一个“爱国”的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的一点点本钱在抗日战场上拼光？中共内部的意见，相当不一致。

#### 5，坐山观虎斗，不当抗日英雄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南的一个村庄，召开了为期四天、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会议由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作《形势报告》，今天已被捧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的张闻天，先痛斥蒋介石如何仇视我党、如何背信弃义；最后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具体到中国，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

毛泽东支持张闻天，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免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戴晴：《翻案文章》）

#### 6，“游而不击”，渔翁得利

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对在晋西北的八路军作如下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社，1977年，台北）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的、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罗满宁（笔名：奥·鲍里索夫）的《苏中关系（1945-1980）》也指出：毛要求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周旋，用二分力量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这类被广泛引用的毛语录，虽未见于公开发表的毛着，但毛在1937年9月12日、14日、17日、21日、23日、25日和29日发出的、都在反复重申“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战略意见”的7封电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北京），可视作佐证。



事实也是如此，是年9月25日的“平型关战役”之后，八路军便转入所谓“敌后游击战”，实际是游而不击，把主要精力用于与国军搞摩擦、争地盘，收编国军流散队伍和地方武装，招兵买马，拚命扩充实力。8年抗战中，中共的军队由2万多人发展到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宁夏、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19省区内建立了19大块“解放区”，占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1万万。（《毛泽东选集》，P1041，人民出版社，1969年，北京）

尽管在抗战最艰苦、最紧张的最后阶段（1941至1945年），毛泽东置大片国土沦亡、人民被烧杀抢掠于不顾，把各根据地、各部队的领导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旷日持久地学习、反省、检讨、清算、斗争、清洗，既保存了实力，又大树特树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尽管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未离开过延安窑洞半步；但他仍可大言不惭地骂“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反咬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顽固派”、“投降派”、“顽军”的帽子扣到蒋介石国民党头上。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中共从戈培尔那里学来的搞宣传的本事，确实比国民党高明得多。

## 7，阳奉阴违，两面三刀

毛泽东在1938年11月5日写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说：“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3个师的番号扩编为3个军的番号，这叫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20万军队，这叫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开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坏统一战线，但又决不河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选集》，P505）这哪里是精诚团结，这是勾心斗角；这哪里是抗日救国，这是在通敌卖国。可见“不破坏统一战线”是假，借统一战线以售其奸是真；国共合作是假，扩充实力是实；抗日是假，夺权是真。阳一套、阴一套，两面三刀，这也正是毛一生的写照，是共产党几十年的真面目。

## 8，贪天之功为己有

在《新华网》一网友所罗列的抗日战争42次战役和会战中，与八路军有关的仅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而且平型关战役还是在国军配合下打的。就这两个可怜的战役，也为毛泽东所反对，决定打平型关战役的任弼时（实际周恩来）和决定打百团大战的彭德怀，都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批判，说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但毛泽东却吹嘘：我们“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百分之69和伪军的百分之95。”（《毛选》，P1041）

60年后，毛的接班人照样厚着脸皮，“着力宣传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功绩，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活动部署的通知》）贪天之功为己有，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的党”，应该更正为“无耻的党”。

1945 年 8 月 9 日，即苏军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宣布日本崩溃在即，中共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刻已经来临。8 月 10 日朱德命令所属部队，夺取日军占领的所有城市和交通中心并接受日军的投降及其军事装备；8 月 11 日林彪率领 10 万大军突入东北。养精蓄锐的中共百万大军“下山抢桃”了，得到苏俄撑腰的毛泽东自信抗战后的蒋介石军队已经精疲力尽、元气大伤，不是他的对手了。所以毛泽东下决定发动内战了，即使“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毛选》，P1032）

### 9，《黄克诚自述》的证供

最近再版的《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 年，北京）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数据，再次证明了中共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和谈、坚持内战的恶毒用心和卑鄙行径。

1945 年 9 月，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的黄克诚知道苏俄出兵东北后，即于 14 日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给蒋介石加了一个“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的莫须有罪名之后说：

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军事具体部署上，我建议：

1，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 5 万人，能去 10 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

2，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 10 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

3，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 15 万主力，待敌人缴枪之后，在济、徐、胶、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P222）

请看，这就是共产党人，一个看起来还很“正直”的共产党人，原来也是一个大大的阴谋家。他一面“仍进行谈判”，一面在抢占地盘，“进行决战”；一面攻击对方“对谈判毫无诚意”，一面却调兵遣将、磨刀霍霍，准备“消灭”人家。于是边谈边打，停停打打。利用“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欺骗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用“耕者有其田”的诱饵，裹挟和驱使农民当炮灰，果然在 4 年内消

灭了 800 万国军，颠覆了合法政府，窃取了国家政权。

### 10，国共再赌第三铺？

共产党在“合作”中把国民党吃掉了，在“合作”中暗杀了国民政府。第二次“国共合作”还是以苏俄、中共的阴谋为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屠杀、牺牲而告终。和中共打了长期交道的蒋介石先生，在 1937 年就对中共有了极深刻的认识：“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也（《蒋介石日记·1937 年 10 月 25 日》）。可是他仍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亏，仍不免堕入中共“统一战线”的圈套。可见对付共产党的难度是何等的高！

从共产党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从共产党的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凡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抱有幻想的人们，请先认清中共的过去和现在！

然而，自 2004 年连战、宋楚瑜败选之后，国民党内却出现了一股联共夺权的逆流。

连战、宋楚瑜在大陆自取其辱、自我矮化的不光彩之旅不说也罢。

### 11，中国国民党成了台湾国民党、农产品党，甚至中共第九个尾巴党

但 2007 年 6 月 2 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访问香港，却可以拿来说说。江丙坤在香港京华酒店搞了一个所谓“台湾大选与两岸政经关系”研讨会；研讨会在中方人员环伺下，由“亚洲华文作家协会香港分会、中观研究所、崇正总会”操作，请了几名不左不右或也左也右的评论家来讲几句不冷不热或不痛又不痒的捧场话。戏肉则是江丙坤和“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辛旗一唱一和的在那里大唱反“台独”高调，竞相往民进党和陈水扁身上泼脏水。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建的百年大党，江丙坤身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到了他的老弟中国共产党面前却成了一个温驯的小媳妇；竟然不敢接受听众提问和回答听众问题，连听众与之打招呼也唯恐避之不及，在中方人员护送下匆匆兔脱而去。

江丙坤炫耀几次陆见江泽民、胡锦涛的殊荣，津津乐道地显摆他们的献媚之旅，大做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美梦。连战、江丙坤之流包藏联共卖台之祸心，企图借中共的力量打败民进党，达到他们重夺台湾政权的卑劣目的。他们早把民主、自由、统一、宪政，都丢到爪哇国去了。所以他讲来讲去，也只能讲农产品、讲开放旅游、讲投资中国之类的废话，了无新意，令人昏昏欲睡。

毛泽东教导他的党徒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不以人废言，那么，即将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实在应该请国民党和一切关心台湾前途的人士，回忆一下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惨痛历史教训。第一、二次国共合作都是以苏俄、中共的机会主义为开始，以国共双方互相残杀为结束；那么，第三次国共合作将会有什么结果呢？让我们再翻翻那带血的记忆，在中共中央文件、毛泽东著作和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录》中，重温一下中共党人之阴谋诡计、鬼蜮伎俩吧。

希望连战、江丙坤们会有机会看到我这篇文章，别让个人私利、佳肴美食蒙

了心窍而再次坠入阳谋陷阱，希望他们不会因为我搅了他们的美梦而恼羞成怒。更希望马英九也能看到，在坚持“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人民共同决定”立场的同时，不要放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帮助中国人民早日从专制独裁的黑暗中走出来。〔首发《动向》2005年6月号，修改于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后；2010年再修改，作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征文〕

# 统购统销的创造和贡献

——纪念陈云诞辰 100 周年

今年是陈云诞辰 100 周年和逝世的 10 周年，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登了陈云子女联合撰写的文章，回忆了陈云生前的“一些事迹”，要学习他所谓“完全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顽强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文章说：

“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为了缓解日益紧张的粮食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在研究了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和日伪占领东北时期使用的方法，比较了德国和苏联使用过的方法基础上提出的。”这个“统购统销”大概可以算作陈云实事求是精神的表现和创造性的探索精神的“贡献”吧。

“统购统销”是中共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一方面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向松散的、毫无反抗能力的农民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掠夺，进而通过二元化的户口制和合作化，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变成现代的农奴。另一方面用统销卡住城市居民的脖子(毛泽东规定城市人口每天应为老秤 10 两，新秤 12 两)，进而控制人们的脑子，再以户籍制控制人口的流动。于是，全大陆就成一个不设防的大监狱。

所谓“统购”，据 1953 年 11 月 19 日公布的政务院《命令》：“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但在“全党动员，全力以赴”的号令下，所谓“余粮”被层层加码。众所周知，好大喜功、宁左勿右是中共的一贯作风，薄一波在他《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北京)中承认：“正如陈云同志所预计的，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毛主席在 1960 年说过，五十年代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有两次同农民搞得很紧张，第一次就是 1953 年。”

中国的农民，特别是中共严酷统治下的农民，是最驯服、最善良、最富忍耐力的。居然被逼得聚众闹事，可见压迫程度之厉害。这可以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上看出来：从 1953 年 7 月 1 日到 1954 年 6 月 30 日的粮食年度内，连农业税在内，全国实际粮食收入达 784.5 亿斤，超过计划 75.5 亿斤，比上年度多收 177.9 亿斤，增长 29.3%。(同上)

1954-1955 年度，在长江、淮河流域受到百年不遇的大洪灾之下，仍征购 891 亿斤。强迫命令和购“过头粮”现象更加严重，“加剧了国家与农民关系之紧张”。

我老家在福建沿海，是鱼米之乡。但在雷厉风行的“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恶政之下，生产粮食的农民从 1954 年就开始饿肚子了。记得我祖父怕干部进屋抄查存粮，强行收购，曾趁黑夜把一袋约几十斤的谷子藏到山上去，到后来取回时，因潮湿已经变霉发黑，但肚饿了，我们照样把它吃下去。

这就是我最早的“饥饿记忆”，这就是共产党的德政，这就是陈云同志“统购统销”的丰功伟绩，这就是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顽强创造性的探索精神”带给亿万农村人民的灾难。(2005-6-9)



# 黑帮子女最爱毛主席(外四章)

## (一) 黑帮子女最爱毛主席

邓拓收藏的一幅《太真上马图卷》，被专家评价为堪与国宝级的《簪花仕女图》和《韩熙载夜宴图》相媲美，业内人士估价：至少不会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才华横溢的邓拓不仅能诗善文，同时还是一位收藏家、鉴赏家。除《太真上马图卷》外，在 2005 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亮相的还有 48 件邓拓藏的书画作品。

邓拓者何许人也？是十年浩劫最早一批拿出来祭旗的“三家村”分子，“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三反分子。

我对《关于将 12 月 26 日法定为国家纪念日---“毛泽东日”的倡议书》上赫然有邓拓子孙邓壮、邓蕾的签名(《中国与世界网》2004 年第一期)，初则不理解，但知道了邓拓有 2000 万元以上的遗产时，便理解了。在《“毛泽东日”倡议书》上凑热闹、表忠心的还有彭德怀侄女彭梅魁，罗瑞卿的子女罗箭、罗峪田，陆定一的儿子陆德，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刘爱琴等。

朋友，你还不理解吗？因为死的或受折磨的是老子，享福的是儿女；老子留下的遗产，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都得到毛太祖的神庙里才可以兑现的。而且如果没有毛主席对老子狠下毒手，老子当年入股的股票就没有增值的机会，也就没有儿孙们今天的荣华富贵了呀！“狗崽子”们能不对毛主席感激涕零吗？

## (二) 《官员申报财产法》难产记

2005 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向大会提交议案，呼吁建立政府领导干部个人资产公布制度。(《新京报》)全国政协委员瞿世镜 2004 年、2005 年连续两年在两会期间，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拟订处级以上官员必须申报财产的法律。(《凤凰网》)2006 年有江苏代表当面质问吴邦国：为什么公开官员个人和家庭财产这么艰难，讲了十七年还不能实施？

吴邦国没有告诉这位“代表”，已经“研究”了十几二十年的《官员申报财产法》是因为在 2004 年的一次中共政治局会上遭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反对而搁浅的。理由是“立法条件尚不成熟”。(《动向》2006 年 3 月号)何时“成熟”？佛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共产党说：“国库不空，《申报财产》不成熟！”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经过不断地完善已成为反腐败斗争强有力的武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明知贪污贿赂行为而不能取得证据时，非法收入本身可以作为起诉或追诉的依据，因而有利于打击、惩治腐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行，就是中国不行；所以中国共产党就拼命多买军火以“提高执政能力”了。中共什么都可以不要，例如主权、领土、人格、党格，唯独不能不要“腐败”。所以它要把“打击、惩治腐败”的《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消灭在“萌芽状态”。

### (三)中国不道歉

中国拒绝为出现暴力活动的反日抗议示威道歉。中国外长李肇星告诉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说，中国从来没有做过需要道歉的事情。(《人民网》2005年4月17日)

“中国从来没有做过需要道歉的事情”，对极了！土改时杀了几百万，镇反时杀了几百万，肃反时杀了几百万，三年人祸饿死4千万，十年浩劫“非正常”死亡两千万……这都是共产党干的好事，跟“中国”有屁关系，为什么要“中国”道歉？

### (四)人民警察害人民

政法腐败，刑讯逼供，“可亲可爱”的“人民公安”不断地泡制一幕又一幕鲜血淋漓的人间悲剧。畚祥林因“杀妻罪”于1995年被判处死刑后又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为鸣冤上访，哥哥被拘留41天；母亲被关9个半月而含恨去世，家破人亡之外又欠巨额债务。因妻子的重现，虎口余生的畚祥林在坐了11年冤狱定后总算捡回一条命了！

然而，同样蒙冤的聂树斌却被枪决，而结束了他不满21岁的生命。茫茫的中国大地究竟还有多少畚祥林？还有多少聂树斌？真是天晓得！

人民警察，专害人民；

人民法院，专坑人民；

人民解放军，专杀人民；

人民公社，饿死人民；

人民银行，专偷人民；

人民领袖，是人民的剋星；

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地狱……

“人民”，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假你而行！

### (五)、太小看李敖了

《凤凰网》网友说：李敖如果在大陆，早就没命了。这位网友太小看李敖了。想郭沫若当年不也是反蒋介石的干将么？结果不照样当毛泽东的奴才！（《独立中文笔会》）



# 整顿文宣的情况通报

(机密件·传达至县团级)

〔记录并整理者武宜三按：此件在何时、何处所听或所看，是红头文件还是某要人讲话，均已不可考。如有出入，请以原件为准。巧合难免，皆因雷同。〕

多年来，我们按照有关指示，对所有出版、新闻、宣传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整顿。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人民出版社严重违反保密纪律，擅自出版毛泽东同志1945年9月27日《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一文，造成极恶劣之影响，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政治事故。公开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给敌对分子提供了攻击党、颠覆国家的口实。例如孙大午到处放毒，公然狂叫“民主宪政、军队国家化”，与李慎之、李锐等党内自由化分子一唱一和，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同志当年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为了争取国际舆论，孤立国民党，利用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书面提问的机会，说过：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又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

后来我们自己掌权了，情况有了变化。就发明了“特殊国情论”，连支部书记和小村长都是由上级指定，搞等额“选举”。原来讲的那套统统都不要了，这是形势的需要。

我们1960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就不选这篇文章。想不到保密了36年的应景文章，竟在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中出现了，使保密工作前功尽弃。这是后果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

所以必须追究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人民出版社有关人员的政治责任，并予以严厉处分。

## (二)

钟沛璋身为党员、摘帽右派分子，目无组织纪律。在海外出版《与江泽民一席谈》，公然向领导同志推销“还政于民”、制度改革、全球化价值等资产阶级货色。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击与抵制。但对此人亦应一分为二，他说：“小平同志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搞两个凡是，小平同志也一定不会同意别人对他搞凡是”，这句话对我们的政治理论工作，有一定启发性。

我们现在正组织力量，重新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小平同志的有关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批评文革、提倡所谓开放、议论政治改革、制度改革、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文章和讲话，都要重新整理、改写或删除，以求全面地、系统地体现小平同志的理论体系。当然我们的做法和朱元璋删《孟子》是有区别的。朱元璋是要把孟子赶出孔庙，而小平同志仍然是我们的总设计师，这点是应该明确的。

### (三)

立即停止宣传陈胜、吴广、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杨秀清和孙中山。最近播放的长篇电视剧《走向共和》，就是一部借古讽今、不利稳定、不利团结、与主旋律不合拍的坏作品，影响恶劣。所以决定停播并对有关单位和人员予以不同的处分。

过去毛泽东同志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曾大力歌颂过陈胜、吴广、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杨秀清和孙中山，并且引之为同志。对发动革命、夺取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现在我们在台上了，就要“稳定压倒一切”，就不能再宣传这些农民起义领袖和孙中山先生了。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审视，这些历史人物都是破坏安定团结、制造动乱的首恶分子。比如孙中山，就破坏了晚清的“君主立宪运动”，中断了中兴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启动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陷入长期的混乱、分裂状态，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削弱了国力，使日本侵华阴谋得逞。西方各种腐朽思想大量进口中国，造成思想界极度混乱，例如德先生、赛先生，就对我们永远执政威胁至大。这个历史教训要注意总结。

目前必须组织队伍，重新编写大中小学历史教材，要用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下一代，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永不变色。这项工作力争在一两年内完成。

### (四)

立即停止出版鲁迅、胡适等人的著作。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指出，现在已经不是鲁迅杂文时代了。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以至谬种误传。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抓住我们前进中一个指头的问题大做文章，讽刺挖苦，对主旋律造成极大干扰。

50年代我们对胡适的批判，也不够彻底，以至死灰复燃，这个教训是深刻的。胡适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由化的祖师爷。

胡适在1951年5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他给蒋介石写信：“最后我劝他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改党’，而第一要件为‘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

对于胡适这种分裂党、犯上作乱的反动言论，蒋不但不杀他、不抓他、也不批斗他，还给他写回信，称他为“先生”。简直有失领袖体统，乱了君臣之礼。对于这点，我们毛主席则不愧英明伟大、垂范千古。他决不允许王实味、彭德怀、刘少奇等乱说乱动。否则，“虽千万人，吾杀之矣！”何等英雄！

蒋也不对胡适秋后算帐，还请他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宽宏大量得离谱。国民党在第三代就丢了政权，这些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亦应吸取。

我们必须继续肃清胡适流毒，才能保证毛泽东思想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 (五)

某港区人大代表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何来怕 23 条立法？”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很博得维园阿伯(指每星期天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城市论坛》外旁听的、专为爱党爱国言论欢呼鼓掌的男性老年人)几下掌声。该人大代表是个大资本家，目前在敦煌开酒店，大挖我们的墙脚，是我们利用、争取、改造的对象。若干年后，我们就要革他的命、共他的产了。他的话有多少诚意？维园阿伯文化水平低，亦不能苛求。可我们的《大公报》、《文汇报》居然也把他这话推销出来，大捧其场，大喝其彩；就是不懂政治，不懂马列的表现。

试问，孙志刚做了什么亏心事？但我们有《收容遣返法》，照样可以把他抓起来，活生生打死。

张志新做了什么亏心事？但我们有《公安六条法》，同样可以把她抓起来，轮奸她，再把她的喉管割断，拉出去枪决。

我们的“法”就是专治那些“为人不做亏心事”的、无权无势的广大老百姓。那些做尽亏心事的人，除了位尊势重的领导同志，还有他们的配偶、情人、兄弟姐妹、子女、秘书之外，就是那些对领导同志的个人经济做了很大贡献的、先富起来的“先进分子”，我们能把他们怎么样呢？这是一般的常识政治的 ABC。

#### (六)

香港市民“七·一”大游行准确人数，经卫星监测系统核准：是 99 万 8 千 8 百 66 人。但不包括马路两边、建筑物内和各种车辆上，向游行队伍挥手、鼓掌表示支持的人们及半途退出游行队伍的前港府高官邝其志等人。

目前香港情况复杂，董建华颡顽无能，叶刘淑仪凶相太露；个别大员动辄散布“有鬼论”、“幼稚肤浅论”，亦大失人心；传统左派成了脱离群众的工人贵族；在在增加我们工作的难度。在暂时不能简单使用坦克车、达姆弹的情况下，只好耐心地施予收买、恐吓、拉拢等方法，逐渐分化之、瓦解之，最后再各个打击之、歼灭之。

#### (七)

据调查统计显示：这次反对 23 条立法的大部分，是文化程度高、收入高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大学生和中学生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反之，支持立法的只是一些文化程度低、年岁大、收入低的阶层，奉命行事的部份中资机构员工以及一些在内地有特殊利益的人士，总人数 14,444 人，少得可怜。所以不得不靠伪造

民意、强奸民意，欺骗家宝总理。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港英当局大办教育、广招大学生的险恶用心：为我们的管治理下制造麻烦、制造不安定的种子。这个反面教材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英明，他曾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几十年的愚民、残民、大革文化的命的结果，造就了世界上第一等顺民，造就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只知无限奉献而不知人权为何物的第一流农奴**。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税二税三税万万税。

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排除干扰，继续降低教育投入，在总量和人均两方面都要力争和保持世界倒数领先地位；继续大胆地挪用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继续两手都要硬地克扣教师工资促进教师自动流失；选一步扩大中小学校危房面积；进一步扩大城乡大学招生的歧视性分数线差；抓好教育产业化，以经济手段达到减少农民子女上大学的目的；在目前文盲、半文盲人数为 3.5 亿人的基础上，争取在 5 年内达到翻一番的目标。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发生香港“七·一”大游这样的动乱，才能长治久安，才能确保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局面，才能把余下的国有资产包括中银香港、中银纽约的存款量更快私有化，为实现地皮刮尽、“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长远规划创造更优越环境！

(八)

此件传达至县团级。

(九)

注意保密，严禁扩散。

(《动向》2003 年 9 月号)

## 旧公案：“三个代表”思想的知识产权属于林彪同志

【主题：不著名的党史不专家武宜三先生要拆“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同志的招牌】

头上有“著名党史专家”桂冠、僭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石仲泉同志曾应《人民网》“强国论坛”邀请与网友就“三个代表”话题进行了交流，据说反响热烈云云。

石仲泉说：“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思想既可以说是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同时总书记作为党的第一把手那种特殊的地位又对这个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个所谓“著名党史专家”、霸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个金茅坑的石仲泉，在我这个“不著名党史不专家”看来，实在不过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学阀；同时又是除了拍马之外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马屁精。

众所周知，“三个代表”思想是林彪同志的天才创造，林彪同志才是“三个代表”思想最早的表述者。然而石仲泉却借花献佛、罔顾历史事实地把它安在江泽民的头上，妄言“三个代表”思想是江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请看 1970 年 8 月 23 日下午，当时身为我们最最敬爱的副统帅的林彪同志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是怎么讲的？林彪同志说：“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于林彪这个讲话早已公开流传，不是什么党国机密了。最近出版的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有全文实录，这段话见该书第 62 页。

再看看江泽民又怎么讲？江泽民说：“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不是与林彪同志异口同曲、上下床同梦吗？

与其如石仲泉所说，“‘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倒不如说“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林彪同志思想的复活。与其说“三个代表”思想是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同时总书记作为党的第一把手那种特殊的地位又对这个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倒不如说这是江泽民一伙明目张胆的对林彪“卓越的贡献”的剽窃。

如果说江泽民是中国职位最高的学术剽窃者的话，石仲泉就是这宗规模最大、情节最恶劣、手段最卑鄙、影响最坏的学术腐败案的帮凶。当然，这也没啥子值得奇怪的。因为剽窃他人劳动成果，霸占他人知识产权，是中国共产党 80 年多来的优良传统，毛泽东、邓小平都做得很出色。

例如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6 字诀，是朱

德总结出来的游击战术，可是却记到了毛泽东的帐上；李普《朱德的扁担之外》一文说得很清楚，聂荣臻在 1986 年写的纪念朱德百岁冥寿的文章中也说这是朱德摸索出来的。再如，钱竹伟《廖承志传》披露：被当作邓小平伟大发明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都是廖承志首先提出来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兼台湾事务部长黄文放就证实：“没有廖承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的决策是提不出来的。甚至‘一国两制’也不见得就能提出来。”（黄文放：《解读北京新思维》）

再再如，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林彪“四个念念不忘”的翻版。请比较一下邓小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林彪同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到底有什么区别？

当然，更无耻的还有：毛太祖、邓太宗、江太上都把军机处、南书房、司礼监大小章京和秉笔太监们的心血结晶当作自己的思想，再印成《选集》、《文集》之类，然后强买强卖，最后把几个亿的民脂民膏变成“稿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王元化先生说：“我们对鲁索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当年张奚若的水平。如今肯像张奚若那样，在学问上下功夫的人实在太少了。”（智效民：《往事知多少》，云南人民出版社）我虽然不是什么“在学问上下功夫的人”，但我可以很谦虚地说：石仲泉这个“著名党史专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还没有达到我这个“不著名的党史不专家”的水平。

不为别的，一个丧失良知、曲学阿世、逢迎希旨、沽宠钓恩、为虎作伥的奴颜婢膝之徒能“研究”得出什么鸟学问来？！

（28OCT2006 于流浮山庄“不专家书房”《独立中文笔会》）

# 原来也是人祸

——从唐山地震、松花江污染的被隐瞒看中共的灭绝人性

【导语：由于对“灭亡”、“垮台”的敏感和恐惧，中共往往用第二个罪恶来掩第一个罪恶，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中国人民便只有永远陷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了。】

## 唐山地震的巨大伤亡原可避免

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钱钢着)，主要是写地震之后发生的事；2005年出版的《唐山警世录》(张庆洲着)，则是对地震前预报问题的调查。几乎30年过去了，唐山大地震比较完整的面貌才得以显现，并且告诉世人，这一次震惊全世界的天灾原来也是中国共产党法西斯政权制造的一次人祸。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当年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物候、数据的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作了震情紧急报告，但请求并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的要求前为国家地震局所拒绝。

当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介绍发言。但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只让他在晚间座谈会上说，而且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无可奈何，汪成民只好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向与会者作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通报。

青龙县县长冉广岐得到消息后，火速将震情通知到全县每一个人。结果在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爆发的、死亡24万二千七百六十九人重伤16万四千八百五十一人的里氏7.8级的唐山大地震这场天灾更是人祸的灾难中，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青龙县却无一人死亡。(新华社1996年4月11日消息)

据统计，1976年上半年覆盖整个唐山地区的地震群测点中，骨干点就达85个，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有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例如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就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7月6日即唐山大地震前的22天，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14日，国家地震局虽派了两位专家来了解情况，但却未予重视。7月27日，马希融于18时再次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强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马希融的警报有事实、有分析，此时距大地震发生的时间是9小时！



### 中共官僚的颯預和冷血終釀人禍

此外还有7月7日(距唐山大地震21天)的山海關一中地震科研小組呂興亞、7月14日(距唐山大地震14天)的北京市地震隊、唐山二中教師田金武、趙各庄礦地震台姜義倉、7月16日(距唐山大地震12天)的樂亭城關中學侯世鈞、7月22日(距唐山大地震6天)有山海關一中地震科研小組等一次或再次向省、市、地區地震部門發出臨震預報。

國家地震局在7月14日和21日連續兩次拒絕聽取北京地震隊匯報後，北京隊業務組副組長張國民只好直接給主管華北震情的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副主任梅世蓉打電話，請求他立即聽取匯報，但梅世蓉把聽匯報時間推遲到了26日。26日(距唐山大地震2天)那天，國家局來了15個人，但梅世蓉卻沒到。國家局的人聽取了整整一天的匯報後，傳達的梅世蓉意見竟是“四川北部為搞防震已經鬧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區再亂一下可怎麼得了？北京是首都，預報要慎重！”

7月27日10時(距唐山大地震17小時)國家地震局副局長查志遠等人聽取了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京津組長汪成民等人匯報。但查志遠卻決定下周再開會研究。7月27日的16時即距唐山大地震11小時的關鍵時刻，呂家坨礦地震辦公室的趙聲和王守信兩人也向開灤礦務局地震辦公室做出臨震預報。幾乎同時，北京地震隊的耿慶國也在三里屯看到螞蟻異動以及地下水上漲等臨震現象！

正如據耿慶國所說，“按照當時的預測水平，雖然報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時間段是可以報出的；雖然報不准7.8級，但5級以上是可報出的；雖然報不准唐山這個確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帶是可以報出的。事實上唐山地震前6個小時就出現了地聲、地光，如果當時能給老百姓打個招呼，減輕傷亡是可能的。”可是在專制獨裁的體制下，颯預無能又冷血的中共官僚對這一切或充耳不聞，或熟視無睹，地震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全白費了。迫在眉睫的大震警報，最終無法發出。歷史應該記住查志遠、梅世蓉這些中共官僚的名字，人民應該清算他們的罪惡，向共產黨討還血債！

### 三，中共的“穩定”是千百萬人的生命為代價

楊友宸作為唐山市地震辦公室的實際負責人，1968年上任後就着手建立地震監測網。幾年之內，他在唐山市區先後建立了40多個監測點，這些設在各廠礦學校的監測台站的負責人，大都是大學畢業的技術人員和物理化學老師，他們懂業務也極有責任心。楊綜合各台站的觀測在唐山防震工作會議上做出了中短期預測：唐山市方圓50公里內，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將有5到7級強震發生。眼看就要抓到這次大地震了，但只听報喜不听报忧的市长书记们怕杨友宸干扰他们的“革命大方向”，为了耳根清静和防止“地震预报被他嚷出去，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突然把杨友宸送去干校劳动，杨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

地震預測遭到漠視，使唐山人付出了巨大血的代價，《唐山警世錄》作者張

庆洲的大姐也在这次地震中遇难。正是撕心裂肺、永远无法弥合的痛苦，使张庆洲在遇到种种阻力的时候能坚持下去。调查难度之大，是张庆洲始料不及的。无论是当年成功预报了地震的人，还是因各种原因而不报地震的人，都不愿意开口，其中包括梅世蓉和冉广岐。冉广岐表示，“地委有话，不让说。”唐山大地震过去快 30 年了，中共当局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仍旧拒绝让老百姓知道真相。张庆洲希望“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记录，使唐山的大灾难不再重演。”但他经过长时间调查而写成的 20 万字长篇报告《唐山警世录》还是被压了 5 年。

就是今天，唐山抗震纪念馆里也看不到灾难的全过程。9 个展厅中有 8 个展示的是所谓“新唐山建设成就”。与地震预报有关的只有缩在角落里的四幅画着“鸡不上窝、黄鼠狼搬家”小图，当年唐山巨大的地震监测网没有了(《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当局颠预、冷血以及失职也没有了。青龙县事绩最后还是因 1995 年为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偶然获悉，才被外国媒体所报道；但可怜的中国人，甚至很多唐山入至今仍然不知道这件事。

人民和人民的生命在中共眼中一文不值，历来如此。2003 年蒋彦永医生不过说出非典型肺炎疫情真相，即遭当局疯狂迫害。2005 年 11 月份，在九省区大面积爆发禽流感，并出现人感染死亡个案的情况下，中共当局仍然坚持“防记者甚于防病毒”的反动政策，把到辽宁黑山采访的香港《明报》和内地多家媒体记者扣押。被《南风窗》评为 2005 年度人物奖的江苏省农民乔松举因向农业部说出安徽省天长市发生禽流感的事实，却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至今未得审理。

由于对“灭亡”、“垮台”的敏感和恐惧，保密文化即愚民政策成了中共保权的救命符，毛泽东就说过：“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所以为了隐瞒松花江污染大灾难，可以不顾千百万人的死活，说了几句真话的《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就成了最新的整肃对象。制造第二个罪恶来掩盖第一个罪恶，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中国人民便永远陷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原载《争鸣》2006 年 2 月号)

# 红朝余孽供毛神位

【毛泽东死了 29 年，但阴魂不散。即使是让毛整死了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的遗属和子女，也仍抱着毛僵尸不放。他们到底何爱于毛泽东呢？】

毛泽东死了 29 年了，但阴魂不散。大陆《中国与世界》等网站在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时发起以“12.26”为“毛泽东日”的签名活动，据说“反应热烈”。那些让毛泽东整死的老革命家的遗属和子女，竟是这个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彭德怀侄女彭梅魁在“毛泽东日”签名留言中写道：“历史伟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初即受冲击的“彭罗陆杨”中的罗瑞卿被隔离审查，“一时想不通”跳楼自杀时摔断了腿，但仍被用筐抬着去挨批斗。罗的儿子罗箭在“毛泽东日”签名留言中说：“永远怀念毛主席”，罗的女儿罗峪田写道：“毛主席万岁！”

陆定一夫妇在文革初首批受冲击，并长期系狱。可是陆的儿子陆德也参加了签名，并留言：“xx 的根基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与彭真一起被打倒的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死于文革中，他的夫人、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甘英也在这次签名活动中签了名。

被姚文元点名的三家村中，吴晗、邓拓含冤自杀，家破人亡。在这次“毛泽东日”签名活动中，邓拓的儿子邓壮和孙子邓蕾都签了名。文革中著名的“61 人自首变节案”，薄一波、刘澜涛等含冤受屈，九死一生。但是这次“毛泽东日”活动的参加者中，也有刘澜涛的夫人方林。

文革之初，毛林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把他折磨致死。贺的女儿贺捷生也参加了这次“毛泽东日”倡议签名活动并留言：“同意这个倡议”。文革中受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这次“毛泽东日”倡议活动中，刘的女儿刘涛写道：“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刘的另一个女儿刘爱琴写道：“祝贺纪念日成功”。

林彪也是毛泽东亲手消灭掉的。尽管现在有不少人在为林喊冤叫屈，可是林的女儿林晓霖(林豆豆)在这次签名活动时也写道：“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胡耀邦的冤魂至今还在神州大地上空徘徊，他不止在文革初受冲击，1975 年批邓时再受冲击，最后就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项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紧箍咒下。这次“毛泽东日”倡议活动中，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也签了名，并写下：“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胡乔木文革初也受冲击，对否定文革起过作用，他一家对毛泽东的态度又如何呢？这次“毛泽东日”倡议活动中，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写道：“早该如此！”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写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的时代”。

这次“毛泽东日”倡议活动中，征集到的革命烈士、元老的夫人和子女的签

名，已经统计出来的就有 200 人以上，其中有些烈士和元老曾在党内受过批判，建国前受过批判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建国后受过批判的如陈毅、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林彪等等。

## 二

某些人，包括拥毛派和批毛派，都难以理解：这么多受过冲击的老家伙的夫人和子女都表示“怀念和拥护毛主席”。怎么回事呢？据《中国与世界》“观察家”说，目前社会的腐败、两极分化、道德观念的普遍退化，给了人们以极大的教育。社会的现实，与老一辈出生入死干革命的初衷，相差太远了。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建国以后毛主席一再担心的问题和一再采取的措施，建国以后老一辈人之间的一系列分歧和争论，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纪念毛公是假，批判邓公是真。请问，毛主席一再担心的是什么问题？是中国会出修正主义。毛主席一再采取的是什么措施？是反修、防修，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老一辈人之间的一系列分歧和争论是什么？就是以毛泽东为一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一方的“究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呢，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争论。也就是“要社会主义的草呢还是要资本主义的苗”？

“目前社会的腐败、两极分化、道德观念的普遍退化”，是怎么造成的呢？坚定的毛主义者显然以为，这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走资本主义道路惹的祸。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而且越走越远。是可忍孰不可忍！毛毛小公主还写了本《我的父亲邓小平》，被认为“借着回忆自己父亲的名义，来践踏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所以被屏除在签名活动之外。

其实当前社会的腐败、两极分化、道德观念的普遍退化的罪魁祸首正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的独裁专制传统和苏俄的法西斯主义的集大成者。他窃取天文数字的稿费，早已是中共王朝的头号贪污犯。他到处盖豪华行宫，疯狂地玩弄女性，早已是中共王朝的头号腐败分子。他推行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强化并扩大了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他发动的各种运动正是摧毁了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良成分。邓小平只不过把毛泽东的反动路线发扬光大、把毛的掠夺型的叫化子社会主义变为抢劫型的权贵资本主义罢了。

这 200 多位革命烈士、革命元老的夫人和子女同时表示怀念和拥护毛主席，正说明他们对邓小平死保毛泽东是心领神会的，他们也完全明白毛邓江胡是一脉相承的。

## 三

什么“高尚和无私”，什么“不是从个人恩怨去看问题”。说穿了，这些革命家遗属和子女们的“广阔”胸怀和“水平”高度，其实是一钱不值的。君不见，被毛泽东整死的彭德怀、刘少奇、贺龙、林彪等人，本来和毛就是一伙的，是毛的忠实帮凶。他们整起人来的狠毒，和毛别无二致。1957 年反右派，邓小平是

头号刽子手。1958年彭德怀在南京军事学院搞反教条主义斗争，对刘伯承也是残酷无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四清运动，刘少奇打击一大片，搞得比毛泽东更左。四千万人饿死的三年人祸，他们和毛是同谋，陈毅就是个推波助澜、瞎起哄的一个。1966年文革初起，刘邓派出工作组，搞的还是反右派那一套，他们从来就是杀人不见血的魔鬼。

从《信报讯（记者王健）》的“喜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老革命给他们的遗孀子女留下了多么庞大的遗产呀：“在昨天举行的嘉德公司秋拍会上，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曾被邓拓收藏的《太真上马图卷》却没能拍出去；其它邓拓藏品共拍出579万元”。《太真上马图卷》已叫价1,100万，因无人承价而收回。原来这些老革命家给他们的后代留下极丰厚的遗产：除了政治遗产外还有巨额的经济遗产。而这些遗产必须在毛太祖高皇帝的神主牌下才能兑现。这就是他们对毛尸顶礼膜拜的原因，这就是他们的“品德”和“胸怀”。

不该忘记：受迫害的毕竟是老头子们，享受平反昭雪巨大成果的是他们的子女。而且老子们受迫害得越惨，子女们所得的回报越丰盛。以君子之心度之，一定有许多人很感谢毛太祖肯对他们的老子狠下毒手。如果没有残酷逼害、跳楼服毒、折磨致死，这些老头们也不过是老死林下的普通元老功臣，哪有现在的轰动效应----书可以多卖几本、收藏的文物可从拍卖得好价钱？真是名利双收。哪有不感激涕零、感恩戴德的？

当年在陈毅追悼会上，张茜偎依在毛泽东身上的媚态告诉人们，丈夫死了不要紧，还有毛的宠爱。不久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两家人也喝过团圆酒，王光美成了毛新宇的“亲切奶奶”，因为王光美们知道，毛太祖神主牌的含金量远远超过“刘卫黄”的假骨灰盒。文革后，王光美见到新风霞，王光美拉住她的手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新风霞事后说：“她男人都被毛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开放》2003年5月号）

于是“杀父/夫之仇、不共戴天”便被悄悄的颠复了；不共戴天成了普“天”同庆、皆大欢喜！明乎此，“这些革命烈士和革命元老的夫人和子女们，他们能有这样的胸怀和水平，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相比于那些只看到个人恩怨的人”的说法，便统统化成了虚伪和令人恶心。

我并不提倡以暴易暴，但我提倡辩明是非。我对于迷恋僵尸、为毛贼涂脂抹粉的“革命老太太”，对于认贼作父、“爱戴和怀念杀父之仇”的公子衙内，我只有四字为赠，就是“恬不知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日”虽扰攘有年，至今并未成事的缘故。（24-4-2005于香港，1-9-2005校正）



## 武宜三对《3,000 抗战忠骸出现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山坡》的按语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由于毛主席、共产党正确领导，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作战的结果，蒋介石国民党只会卖国投降。”60年来，中国所有的教科书、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是这样说。谎言只能有效于一时，捣鬼也不能长久，现在真相慢慢的露出来了，原来毛泽东、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卖国贼，他们在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时候就武装暴乱，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裂国家；“7.7事变”后，更奉行“一分应付（抗日），二分摩擦（和抗日的中央政府捣乱、打击国军），七分发展（裹挟农民、招降纳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政策，“坐山观虎斗”，还和日本、汪精卫勾勾搭搭（潘汉年就是执行联汪反蒋任务才被灭口）；毛泽东自己躲在延安窑洞8年，除玩女人、种鸦片、残杀同志外，对抗战只有破坏，没有帮助。但是他还要反咬一口，污蔑日夜奔命于各抗日前线、指挥战斗的蒋介石是“躲在峨眉山上”，其颠倒黑白，竟至于此。

刚刚被发现的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山坡上的大约3,000遗骨，不是八路军、新四军留下的，而是国军75军预备第4师将士的遗骸。铁的事实，还原了历史：真正抗战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政府，是蒋委员长指挥的国军。

更丧尽天良的是，这些英勇抗战的将士，已经牺牲的，坟墓、陵园被毁坏，许多人已经尸骨无存。侥幸活下来的，也遭受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或杀、或关、或管，株连九族，罪及妻孥。

1957年，在华东行政学院浙江省分校卫生队任内科病房主治医师的俞祖祥先生（1905—1987），就是因为曾经在75军当过军医，抗战有功，才被指“为反动政府卖命”，收缴了当作“罪证”的4枚奖章，而打成右派分子。先送萧山农村劳动，再送东阳县山区烧炭。在上海医第一学院读书的儿子俞致远，也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新疆劳动教养。

1979年，俞祖祥右派摘帽后，被安置在萧山一农村公社独自生活，每月工资只有29元（相当于学徒工）。1984年，才予纠正。但是，1957—1984年所欠工资分文不补。

像俞祖祥这样因为爱国、抗战而受难的，可是千千万万。

共产党哦，你们把日本当作恩人，对待日本战俘如贵宾，把他们养得肥肥白白的礼送回国。

给在东北奸淫抢劫的“苏联红军”颁发勋章。

对自己的抗战英雄却如此迫害，你们确实是汉奸走狗呀。

胡锦涛、温家宝，你们拿民脂民膏在全世界充胖子，把国库变为党库、再把党库变成你们家库，予取予携，却赖着右派分子20多年的工资不还，不向受到你们迫害几十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后代作出赔偿，你们不怕数以千万计的冤魂会你们索命吗？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记者唐宜贵、通讯员何英张国荣（2010年9月3日）报道〕昨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政府召集多名文史专家，对近日在该地一工地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大量人体遗骨进行了考证。专家认为，这些遗骨应该大多属于抗战时期国民党75军预备第4师的将士，数量可能多达3,000余具。

热血，曾经那么真实地浸透了我们脚下的土地。热血和生命，是世间最难抹去的痕迹和记忆。目前当地一些村民已提出申请，建议建立烈士陵园纪念抗日英雄。

### **修路发现抗战烈士忠骨**

9月1日，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村委背后的一片山坡上，宜巴（宜昌至巴东）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一场大雨过后，松软的土层里，露出了一些白骨，长短不一，最长的约50厘米，短的有5厘米，还有大量的白骨碎片。施工人员将其收集起来保存好。

负责这一段工程施工的刘先生向当地群众打听，听说这里曾是抗日战场，埋葬过许多抗日牺牲的将士。因此，他让施工暂停，等待有关部门专家拿出意见。

据当地多位村民回忆，他们过去在田间劳作时经常会发现遗骨，但由于历史太长，一些人也未曾太留意。当地的一位老人说：“方圆大约三十亩，当时都用来埋葬牺牲了的抗日将士。”从村旁的河边到山体陡峭处约两三百米宽的地方，当时都是抗日将士陵墓的分布范围。

### **血战4年3,000将士牺牲**

现场考察的夷陵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余国斌介绍，根据史料记载，这些遗骨应当属于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以下简称预四师）的将士。国民党迁都重庆后，为阻断日军入川的线路，预四师曾在这一入川要道与日军对峙、鏖战近4年。

夷陵区抗战史研究专家简兴安说，1940年6月，宜昌在抗战中失守后，时任预4师师长傅正模率部退居夷陵区晓峰一带，而师部就在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枣子树岭的一个大地主家里，该师野战医院在附近河边的平地上。数年鏖战，该师超过3000名将士牺牲。

预四师当年在此与日军激战，打了许多恶仗，作战期间，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艰苦。他们牺牲后，相对集中地葬在夷陵区黄花乡晓峰南边村一带。

73岁的村民秦德标出生于南边村，回忆起小时候五六岁时的经历，老人记忆犹新。“1942年，预四师师长傅正模在南边村买下30亩地用作阵亡将士公墓，并在旁边建了一所野战医院。”秦德标说，“将士在战斗中受伤后都被送到这里治疗，由于医疗条件简陋，不少人都不治身亡并葬于公墓。”

### **村民建议建立烈士陵园**

宜昌市夷陵区文化体育局副局长徐军说，此事已引起区里的高度重视，已向省市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区里已安排专家及专门人员到现场调查和进行保护工

作指导。

昨天，该区文物管理所文物普查办副主任余国斌等有关负责人来到现场，与当地群众共同搜寻散落的遗骨碎片，将找到的遗骨保存在罐子里。

秦德标等 20 多名村民已向当地政府提出联名申请，建议保护遗骨发现地，建立烈士陵园，以纪念这些为抗日战争付出生命的民族英雄。

### **抗战往事**

牺牲前还在高喊：“我还要杀敌报国！”

预四师老战士易行锡，是夷陵区人，当年与日军作战时，是预四师的一名通讯兵。1995 年，为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夷陵区政协工作人员通过易行锡的口述，整理出一篇回忆文章，编入《抗战专辑》。

两年后，年近耄耋的易行锡与世长辞。这篇写于 15 年前的文章---《回忆预四师在宜昌抗日的往事》一文中，详细记录了南边村野战医院和当年战事的情况。

易行锡回忆，他每天都能看到成批伤员从前线运回。由于日军封锁了运输线，医药奇缺，全靠人工运送，经长途跋涉才能运到野战医院。重伤的将士，存活的机会很小。

有一次，担架排 3 天没回后方，医院就有 60 多个伤员不治。有一次，有个重伤员无法医治，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喊：“我还要杀敌报国，杀敌报国啊……”在场者无不落泪。

预四师驻扎南边村的 4 年多时间里，野战医院后面的山坡共掩埋了 3,000 多将士的忠骨。凡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单独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刻在几块大石碑上。易行锡记得，其中一块石碑上就刻有 800 多士兵的姓名。

## 武宜三整理：一个右派分子和一条关于抗日战争的史料

右派分子朱席斋（1926—1995），江苏省连云港人；1957年是安徽省合肥市税务局科长。他的简历是：

1943年，上高中期间，跟着叔父参加新四军。

1944年，叔父和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一块死于打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中。

1945年，日本投降，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后期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仗：“我参加新四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打日本鬼子。叔父也答应，到了部队，就带我上战场，亲自教我射杀鬼子。可是直到日本投降，我都没见到一个鬼子兵。讲起来我还是个抗日干部，这真是我一生中很大的遗憾。”（朱席斋：《日记》）是年开始的国共内战时期，在第三野战军特种纵队司令部给政治部主任刘春（刘罗锅的后代）当文书、秘书。所谓“特种纵队”就是由苏联用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起来的炮兵，有6名苏联人和88个日本人（苏联红军的战俘）在部队做技术指导。炮弹是由苏军特管区的大连兵工厂生产的。“‘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八百万蒋匪军’这只是宣传而已。实际上，我军的火力要比国民党军队厉害得多。而且每次打仗，我军（加上民兵和民工）的人数都要比敌方高出8--10倍。这既是一场人民战争，又是国际共产主义战争”（朱席斋：《日记》）

1950年，转业在湖南省公安厅当处长，到全省各地搞调研，“游宦于三湘四泽之间。”（朱席斋：《日记》）

1951年，全国掀起“镇反运动”，凤凰县逮捕国军少将沈荃（著名作家沈从文的胞弟，多次负伤的抗战英雄），按“历史反革命”罪予以处决。为沈荃讲公道话：“沈荃是起义有功人员，他率部起义我很清楚，从头到尾我都参加接洽这件事的。”被指为反革命死刑犯说话，简直就是阶级立场问题，大祸临头之际，幸亏省厅有人说情，遂降级使用并调离政法机关。找关系调动到妻子的家乡安徽合肥，任市税务局科长。然而带有“黑材料”的档案已寄到单位，从此成了“运动员”，一次比一次挨整得厉害。

1957年，上级要求各机关按比率抓右派分子，自然成了首选。《日记》被搜出了，被断章取义，编进《合肥市右派言论集》，供人批判。

1962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给右派甄别时，因为这本《日记》仍然被以涉嫌“国民党特务”继续关押。在这之前，已由老首长、解放军炮兵政治部主任刘春写了证明材料，但地方当局却扣押不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刘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被打倒；刘春所写的证明材料反倒成了“美蒋特务”的佐证。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要把牢底坐穿了！后来刘春被平反，并出任驻土耳其大使和坦桑尼亚大使，刘春所写的证明材料才被正面解释。

1976年，被改正，恢复中共党籍和行政级别，任中共合肥钢铁公司机关党委书记。

1981年，离休。（朱席斋的家人提供资料）

# 谁种下了仇恨，它自己遭殃

——序万耀球《滚爬血腥路——忆我贱民、平民人生》

想当年，最大的罪名莫过于“对党对毛主席怀有刻骨的仇恨”，而被安上了这个“罪名”的人，下场多半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罪名”被杀死、打死、逼死，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罪名而被关进监狱、送去劳动改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弄得九死一生、家破人亡。

然而，杀光了没有、关尽了没有、改造完了没有呢？

答案是，中国共产党六十年来的血腥统治，残酷镇压，不但没有消灭“仇恨”，反而制造了更多、更深、更广的仇恨。只要看看遍布全中国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看看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看看无处不在的警民、官民流血冲突，就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权贵集团已为千夫所指，陷在它自己所制造的仇恨的汪洋大海之中。

万耀球先生的《滚爬血腥路——忆我贱民、平民人生》，是一部三代人的血泪史，也是对中共、对毛泽东怀有刻骨仇恨的自白书。

万耀球先生 18 岁时参加共军，为共产党卖过命、立过功，从来没有伤害过共产党、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但共产党却无缘无故的找岔子整他，不断对他实行打击和迫害。

万耀球先生最近有一篇文章，叫《哭我人生之乏爱》，哀嘆一生未赏有过父爱、母爱、妻爱、手足爱，读来催人泪下；堪称本书缩影，建议收作附录。

万耀球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每月只有 18 元生活费；因为要结婚，想向他荣任国务院参事的父亲借 80 元买必需物品，他父亲却不给。还居然说：“你得罪了共产党，划你为右派，你还结婚？你怎么可以结婚呢？给你 18 元钱劳动改造，不是惩罚你，而是共产党爱护你，只有艰苦才能改造好。我一分钱都不能给你。减轻艰苦就妨碍你改造。”这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说的话，为什么右派分子不该结婚？在没有人性的毛泽东、共产党统治下，人已经异化成了没有思想、没有感情、同样没有人性的猪——恐怕连猪也不如，猪也还有舔犊之情呢。

他的母亲和他父亲离婚后，为望子成龙，对他没有表扬只有批评；为了吃饭，母子离多聚少，没有什么家庭的温暖。到后来母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份子”，在文化大革命激烈批斗中被逼自杀身亡，终年 57 岁的母亲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 3、4 年。

万耀球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同父异母的妹妹无中生有的“检举”他的什么“反动”，还写了一封信：“大哥：你是一个革命干部，没想到你竟伤害亲爱的党成为右派分子，真令我伤心……”党妈妈诬陷他，妹妹也诬陷他。如此颠倒黑白，真是人间何世！

在家里，妻子要求他做怕老婆的男人，“结婚 47 年来”，妻子常斥责他：

“我嫁给你倒了大霉，受了大罪。当初若嫁给任何别的人，都会享福。”吵架是家常便饭，以致不知妻爱为何物。女性的温柔、体贴，只有小说里见到。

几十年来，毛泽东、共产党祸国殃民、罪恶滔天，神州大地被编织成仇恨、血腥的天罗地网，凶残暴虐的红色恐怖遍及全国。人性被消灭，百姓的人权被剥夺，野蛮、残暴泛滥。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爱”呢！“社会不爱我，反而害我。无中生有拿我当‘暗藏反革命’斗争打击，无中生有划我为右派，劳动改造21年。由此，造成我没有父爱，缺乏母爱，无手足爱，缺乏妻爱。如今我快80岁了，已到人生道路尽头，回首往事尽是泪。”

本来不是敌人，偏要往敌人那边推。反胡风和胡风集团时，本来是同志、朋友、硬要当敌人置之死地。反右，毛泽东设圈套、搞阴谋（“阳谋”）、找岔子，按指标打击、甚至超额制造敌人。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规模杀人、整人；北京、广西、湖南，还把地富坏反右及其家属子女集体杀掉、吃他们的肉。

万耀球说，我这一生，全被粗暴、莫名其妙的愤怒笼罩。我惟有暗自哭泣。这是什么？这就是仇恨。

把一个大好青年逼到这个地步，他能没有仇恨吗？

所以，一部《滚爬血腥路——忆我贱民、平民人生》就充满了仇恨。仇恨，决定了本书的写作手法——夹叙夹议，一边控诉、一边批判；一边描述个人、家庭苦难，一边细数共产党、毛泽东的滔天罪行。

这本书稿，2001年就送到海外了，由于种种原因，蹉跎至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写作手法的“非正常”，而我恰恰以为，这是一个非正常活着的人对非正常社会的正常控诉。我的朋友、苦难文学作家齐家贞说，常常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几千万，其实，非正常活着的人更多。万耀球先生显然就是一个非正常活着的人。

然则，在共产党暴政之下，中国人、包括施暴者在内，谁又活得很正常呢？

有一首“革命歌曲”《二月里来》唱到：

二月里来呀好风光，  
家呀家户户种田忙；  
种瓜的得瓜呀、种豆的得豆，  
谁种下仇恨、它自己遭殃！

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天良丧尽、恶贯满盈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权贵集团，将会遭到什么殃，且拭目以待。（暴政59年冬12月写于海角避秦山庄）

# 灭绝人性的年代，灭绝人性的国度

20岁出头、英俊帅气的冯志远，1958年到宁夏支教42个春秋后，现在成了可怜的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古稀老人。当年宁夏的水碱性大，喝了拉稀，他是教师，但“每次劳动都让人搀他到工地”。冯老师是结婚后第二年离开上海的，分居整整11年，直到40岁那年才有儿子，然而这个家仍不得团聚；冯志远只在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回家。冯76岁的妻子住在上海一幢老公房里，家简单得有点寒酸；长久年的分居生活，让她的回忆不再有甜蜜。今年37岁的儿子，对于父亲他欲言又止：“我对我爸爸印象并不是很深刻。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支边好多年了，所以我从小就适应了父亲不在身边的生活。应该说关心非常不够，特别对我母亲关心非常不够。”冯志远何尝不想家，觉得孤独时，就躲在屋子里拉一段二胡。他只能在梦中见到儿子、妻子，可是那毕竟只是梦。

冯志远喜欢唱上海的歌，每唱就哽咽。他动过回家的念头，然而他没有走。1977年母亲病故，所有的子女都赶回老家，只有冯志远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母亲、父亲和大姐的相继离世，留给冯老师的只是太多的遗憾。本来患有夜盲症的冯志远，因为用眼过度加上营养不良，终于失明了。失明后的冯志远没有离开讲台，开始他让学生念一些资料、课文，后来他就靠听收音机备课，又坚持教了五年书，直到脑血栓导致瘫痪，才告别讲台。即使这样，他还是没有离开学校，最近才被妹妹接回吉林去。（2006年4月15日《真情实录》）

这就是50多年来新中国老百姓“幸福、美满”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充满欺骗、愚弄、无耻、残忍、灭绝人性的年代，像冯志远这样地被牺牲、被出卖、被践踏、被遗弃的，不知凡几？据说冯志远的事迹打动了许多人，他被选为“2005年感动宁夏十大人物”和“2005年感动吉林十大人物”。我只感到愤怒，只感到悲哀！

冯志远唱道：

只有一颗炽热的心啊！  
祖国，母亲，  
我高高地捧出，  
收下吧，这份献礼！

痴心又一厢情愿的冯志远呀！您献出的是“一颗炽热的心”，但您得到是冷漠、妻离、子散、失明、瘫痪。您把祖国当母亲，但是谁把您当儿子了呢？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柯庆施、陈良宇？毛如柏、陈建国？统统没有！您在他们眼中只是一颗没有血肉、没有感情、没有性欲、没有食欲、即用即弃的小小螺丝钉！



## 人才是这样大规模被扼杀——沉思 1957

武宜三

从 1957 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和被他所绑架的中国共产党到底把多少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中共党员、各级领导干部、军队官兵，推下陷阱？由於当局封锁档案的关系，至今还不能准确知道。

但是，全国地方志和各种透露出来资料，我们可以做些基本测算。我翻看全国 2000 多本县志中的几百本，现在把看到的一些资料罗列在下面。

### 例如湖南省衡阳市——

1957 年只有 255,822 人（湖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湖南省统计局人口处编：《湖南省人口统计资料 1949—1991》，1992），“挖出右派集团 118 个，划右派分子 3,854 人（其中中共党员 187 人）（《衡阳市志》），占全市人口 1.5%，照此比例，全国就有超过 979 万的右派分子。

### 黑龙江省嘉荫县——

全县 6 千余人，打了 15 个右派分子。那么就是人口总数的 0.25%，照此比例，全国就有右派分子 162.5 万。

### 河南省——

有 9 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郭维敬编：《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占河南省人口总数 4,840 万的 0.186%。按河南省这个比例计算，全国有右派分子 120 万个。

当然，抓右派比例更高的应该是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省会城市等知识分子浓度比较大的，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而反右派最卖力的有四川、安徽、山东、河南等省。

1957 年 12 月底止 经北京市各级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右派分子就有 7,787 人（其中极右分子 1,779 人）（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整风运动进展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向中央的报告》，1958 年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在 1979 年 2 月 3 日《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一文中承认，北京大学划的右派分子有 715 名，未戴右派帽子却受各种处分的有 842 名。这些数字都是被缩小了的，因为仅仅 1958 年从中央机关一机部、文化部、教育部、商业部、外交部、建工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侨委、中央气象局、新华总社、对外文委及军委各部被送去北大荒劳动教养的右派份子就有 1,417 人（杨崇道：《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1958 年 3 月—1961 年 3 月）》）。部队其他系统，北京市机关、工厂企业、商店和大中专学校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右派分子还没有统计在内。

### 山东省青岛市——

到 1986 年为止，“纠正”了干部、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 4,608 人，工人、民警、营业员、联合诊所大夫、民办教师、社会人士、修女等人中的右派分子或戴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 737 人，因鸣放言论未戴帽子而受到各种不同处理的 617 人，总人数为 5,962 人。

### 辽宁省大连市——

全市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确定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右分子共 5,690 人，经复查改正 5,643 人，1979 年“不予改正”的还有 47 人。

由此可知，从 1957 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和中共把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打成的各类分子，其中除右派分子，极右派分子外，还有中右分子、右言分子、内控右派、右倾分子等，从“右派言论”引出的各色“分子”，“未戴帽而受处分”者；同时还以“同情”、“划不清界线”等罪名株连了更多的人。

喀左縣反右派鬥爭中，在農村批判鬥爭了“反社會主義分子” 546 人，全縣“鬥倒搞臭” 88 名右派分子，其中文教系統 55 名。對中右分子也重點批判 61 名。

如果算上“其他分子”，数字更加惊人。

再看一些例子。

#### 山西省——

1957 年全省总人口数为 1971.65 万人。1957 年仅右派分子就打了 10,241 人，1958 年以后，在右派补课、拔白旗插红旗、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又批判和处理了 295,791 人。山西省不是最左的，受害人数已经达到总人口的 1.5%，照此，全国受害人数可能达到 450 万。

#### 云南省普洱县——

1957 年只有 5.5 万人口，却有 226 人被打成右派等各种分子，照此比例，全国就有受害分子 257 万。

#### 湖北省沔阳县——

1957 年沔阳县人口 75 万左右，打了 946 个右派分子。假设中右等分子与右派持平，全国有右派分子和类右派分子 160 万左右。

#### 襄阳县——

襄阳县 70 万人，右派分子 852 名。假设中右等分子与右派持平，全国有右派分子和类右派分子也是 160 万左右。

#### 建始县——

建始县 296,700 人，共划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 420 名（其中：女性 16 人；年龄最小的 16 岁。处理结果是：枪杀 1 人，判刑劳改 7 人，降级留用 178 人，其中留用教师 81 人，机关干部 97 人，免于处分 2 人，其余均作开除劳教、管制劳教、保留公职回家监督劳动、开除或解雇回家等形式处理回家或送劳动教养。运动中自杀 5 人。建始县干部教师总数为 1,857 人，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共占 22.6%。文教战线总职工 700 多，就有 237 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三分之一；其中原文教局职工 5 人，就有 4 人被划为右派，占 80%；茅田区三岔小学 9 个教师，就有 6 个被划为右派分子，占 66%。）按此比例，全国有右派分子和“享受”右派分子待遇的人有 92 万个。

#### 福建省——

1957 年人口 1452.5 萬人，有 7,100 多人被劃為右派分子，4,584 人被劃為中右分子，比例达到 0.08%，如果算上“地方主义分子也是右派”的话，比例就更高。

反右派运动本来是违反《宪法》、於法无据的政治运动，但是在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指挥下，在唯上唯左的邓小平督办下，甚至没有任何程序，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标

准，中共各级党委和领导人就肆意妄为，随心所欲地把人们打成右派、某某分子而送去劳动教养，以致有些人劳改了20年，最后竟然被说“不是右派”。江苏省扬州市著名的评弹演员黄异庵，1957年被以“右派”罪名，送青海省劳改；到1979年要纠正的时候，又说他不是右派了，因为档案里查不到他的大名；黄异庵说：“不要做右派时偏要你做右派，要做右派时偏不给你做右派，真是苦啊！”

根据专家研究和个别材料的披露，全国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的，大约在180—310万之间。（丁抒：《阳谋——反右派始末》，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

现在流行的“右派分子552,877”或者简称“55万”，只是中共在1979年所“纠正”的数目。1979年后，各地仍然在继续在“纠正”，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由于种种原因（死亡、失去联络、档案被丢失、档案被销毁，甚至因为非法无序操作而完全没有档案等等）并没有被统计在内。

这180—310万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都遭受到长期、残酷的迫害，有的被枪杀、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杀；这180—310万人之中，除极个别如章伯钧、章乃器等头面人物被“养起来”，极少数如冯雪峰、陆侃如等被留原单位改造以外，绝大多数都被强行送到边疆、山区、农村及沙漠、寒冷、贫瘠地带等气候、生活和生产条件都极为艰巨的地方去服苦役。设立在这些地方的劳改劳教农场、林场、茶场、矿山、工厂，收容了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和其他各种分子；这些劳改劳教场所，实际上是中共集体屠杀知识分子的集中营、是对中国人民实行群体绝灭的屠宰场。

由于极度的饥饿、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服超体能、超时间、超强度的苦役，在这被非法地送去“劳动教养”、“劳动改造”的群体中，发生了大面积的死亡。

例如**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300人的右派劳改中队，死去227人，死亡率达75%。

关押了3,000多人的**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由于刻意饥饿、超体力超强度劳役、严酷的寒冷、精神和心理的摧残，以致在农场撤销的1960年，只有200多人存活下来，死亡率达90%以上。

戏剧表演家吴亚山（文彻赫恩，上海戏剧学院教师、演员）所在香日德农场是**青海省**第二大农场，有4万多劳改、劳教犯，到3年人祸过后，只剩两千多人了。死亡率达95%。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人，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顾雪雍（1957年的辽宁省《旅大日报》文教部主任）后来证实，这200个人最后还是死了；也就是说，锦西煤矿这1,200个劳改犯，是全部被饿死。顾雪雍就是在这1,200人快死光的1959年被补充去的劳动力。

毛泽东和他绑架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群体灭绝罪，一定要彻底清算，也一定会彻底被清算！

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都被株连九族，祸连几代；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

但在1979年只有“55万”人得到所谓“纠正”；即使被“纠正”，也只是白纸一张，叫《改正通知书》，一钱不值；受害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施害者至今不肯道歉，也没有悔改的意思。这个“纠正”，还长期被一些人误导或者误认为“平反”。

更甚者，这个历史被刻意隐瞒、篡改，受害者几乎完全“消失”，部分起而维权者，立即受到打压。

这次希望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五七精神 薪盡火傳——紀念反右運動五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许多被“敏感”人物，就受到“和谐”：“劝告”、阻止。

“我们（共产）党是从来不错，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反正不错，硬说有必要，如（19）57年反右。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几百）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计，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了。”这一段话，据说是赵紫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说的，我把它记在这里，等待历史的检验。

反右派运动摧毁、消灭了无数的知识精英、无数的天才，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各方面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温家宝在回答如何理解钱学森关于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时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但是“刺痛”了哪里？“鞭策”了什么？一向装痴卖傻的温家宝当然不会说。

大学要想培养出人才，首先就要接受1957年右派分子们提出的措施——中国共产党退出学校，把学校交给教师管理，开放言论，学术自由，提高教育投入。

但是，把个人权力、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人民更重要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分子们，愿意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岫在《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告诉我们：“云大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90%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消息曾被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

那么，这一条“应当消灭知识分子”的总路线被纠正了没有呢？我至今没有看到有关文字。所以，人才的“大规模被扼杀”、被毁灭，也还是继续在实行，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不过形式、手段有所不同罢了。

〔参考文献〕1、丁抒：《阳谋——反右派始末》。

2、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

3、有关省市地区县的地方志。（2011.12.8.《纵览中国》，2012.5.25.修改）

## 主權豈容擱置 開發如何共同 武宜三

“‘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佔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急忙忙要來‘統一’這塊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於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卻急於進攻邊區，忙於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

這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寫的《質問國民黨》中的一段話。時間過去五十三年了，“鷸蚌相持”，“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故事演完了沒有呢？答案是，還沒有。而且，老百姓永遠也無法知道，這樣的故事還要搬演多久。

你們看，日本已經完全佔領了我們的神聖領土——釣魚臺列島。他們的侵略行動是逐步升級的，先民間後政府，先文攻後武衛，直到完全佔領。

日本為甚麼這掠樣囂張，這樣霸道呢？就是因為我們國家還處在分裂之中，我們的共產黨和我們的國民黨還熱衷於“窩裡鬥”。從蔣介石、毛澤東到鄧小平、李登輝，他們對同胞甚至同志都是“絕不手軟”，偏偏對日本人一往情深，搞“以德報怨”。當年，為了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鄧小平搞了“新發明”，把釣魚臺問題“留給下一代解決”。即使到了今天這種地步，兩岸政府仍然沒有強烈的反應。連“我的陣營裡”的黃文放先生也在指摘“兩岸政府的軟弱”。

中國政府在領土問題上的一貫軟弱，不但鼓勵了日本的侵佔釣魚臺列島的行徑，也鼓勵了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瓜分南海群島的行徑。目前南沙群島除永暑、華陽、東門、南薰、渚碧、赤瓜礁等六島礁由大陸海軍守衛，太平島有台灣軍隊駐扎外，其他稍大點的島礁全被周邊國家侵奪殆盡。僅越南就佔了二十七座島礁，且把西沙群島劃入他的版圖。

據大陸海軍政治部出版的《中國海軍》透露：在南沙海域，越南、馬來西亞、汶萊、印尼和菲律賓，共打了六百多口油、汽井，每年有近二千萬噸石油、二百多億立方米天然氣，被白白掠走。

包括香港在內的我國漁民，在南中國海的正當捕魚權益受到嚴重損害。我們的漁船、漁獲屢遭扣押、沒收。我們的漁民隨時被打傷、打死或遭毆打、囚禁。至今仍有二十多名大陸漁民被囚在菲律賓。對於領土被侵佔，資源被掠奪，國民遭欺辱，兩岸當局到底有什麼回應呢？



台灣的保七總隊中途返航，放棄宣示主權的例行巡邏。大陸則派了個軍事代表團到訪菲律賓，向菲方保證：大陸的軍艦不會駛入南中國海。

最近海內外民衆抗議日本軍國主義之聲沸沸揚揚之際，兩岸當局竟異口同聲地大彈“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資源”的老調子，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

明明是我們的領土，為甚麼要擱置主權？明明是我們的地方，為甚麼要共同開發？請問，我們能讓日本把琉球群島的主權給擱置一下嗎？我們能和美國共同開發夏威夷群島嗎？

韓國為甚麼不和日本擱置竹島主權？日本能和俄羅斯共同開發北方四島嗎？英國和阿根廷可以共同開發福克蘭群島嗎？

別人不肯幹的事，我們貴國為甚麼願意幹？我猜想，大陸為了孤立台灣，正拼命拉攏日、菲等國(當然對日本還有一個日元貸款的問題)；台灣為了擴展國際空間，也對日菲等國眉來眼去；所以兩岸都不想得罪“友邦”。

何況老佛爺慈禧太后早有上諭：“寧贈友邦，不予家奴。”自家兄弟不妨打生打死，對友邦却一定要客客氣氣，畢恭畢敬。於是友邦們便得其所哉。

據統計，去年北京購買外國軍火近十七億美元，佔世界第一位。台北也不示弱，花了近十億美元。軍隊方面，一九九四年大陸有 293 萬人，又是世界第一；台灣有四十二萬人。同年大陸軍費支出是五百二十八億美元，台灣是一一五億美元。兩岸花了這麼多軍費，養了這麼多兵，買了這麼多軍火，是為了保衛國家領土么？好像都不是。

北京研究了清政府和鄭成功及其後代十次談判九次失敗的教訓，已確認了“因剿寓撫”、武力統一台灣的策略(《康熙統一台灣的戰略策略及其得失》，〈戰略與管理〉1996 年第一期)，所以幾次把導彈打到李登輝的衙門口。台灣則為了對付大陸的文攻武嚇，防“共軍來攻”，也在不斷增強威懾力量，甚至準備“以小吃大”。端的是，“內斗內行，外斗外行”，祖傳的痼疾，根深柢固。

如何醫治這個痼疾呢？兩岸政府只有順應海內外億萬華人和華僑的民心輿情，摒棄成見，在保衛神聖領土這個大原則下聯合起來，採取一致行動，反擊日本軍國主義和一切侵略者的猖狂挑戰。“寸步不讓，寸土必爭”，希望兩岸領導人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無愧於偉大的中華民族，無愧於列祖列宗。

(1999 年《東方日報》9 月 9、10 日)



## 从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看中国的民主化的挫败原因

关于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可以从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时间谈起。例如，可以从 1919 年五四运动谈起，可以从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谈起，也可以从 1945 年国共重庆谈判谈起，更可以从《中华民国宪法》通过的 1946 年谈起。但是，我这几年来在研究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反右派运动历史，所以，我想从 1957 年的角度来谈。

1957 年，不但是 180—310 万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子女的人生的分水岭，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命运的分水岭。1957 年发生的事，是民主与封建的大碰撞、大搏斗（无论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上还是从政治形态层面上分析，都是如此），是五四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1957 年发生的事，是中共建政八年来各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是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争取基本人权、要求参政议政权利的民主运动。这次民主运动因为遭到有甚于数十年前五四运动残酷万倍的镇压，也就必然导致此后几十年，直至目前的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毒瘤在中华大地的恶生疯长、空前泛滥，导致社会大倒退，给中华民族造成无与伦比的灾难。

没有反右运动，就不会有大跃进、大炼钢铁、反右倾；就不会有三年大饥馑，饿死几千万人；不会有十年文革浩劫；就不会有 1989 年天安门大屠杀。这一切，是反右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它的必然结果。终极的原因在制度、体制上---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没有成功，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没有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被镇压，被消灭了。

### 中共“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口号的发表

中国共产党在 1958 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个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消灭知识分子”，公开发表五十年了。这是一件不被历史学家所注意，但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件大事情。

“消灭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坚定不移的一条总路线，是一切战略、战术和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条总路线，一部中共党历史、一部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成了一盆浆糊。此所谓“纲不举、目不张”也。例如，川震中豆腐渣工程、大头娃娃奶粉、三聚氰胺奶粉、上学难、少儿失学率高扬、教育投入少且被贪污挪用、教育奴工（即被我的朋友刘飞耀纠缠不放的代课教师问题）……这一切怎么解释？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有了这条总路线，就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必须“从娃娃抓起”；消灭知识分子，就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之中”。

各位如不信，可看看流泪总理温家宝最近的表演，他说他对被迫过早曝光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感到不安”——他不是道歉，他也不会道歉！他们总是让日本人道歉，他们共产党就从来道歉，叫“不可能”——他老人家不是“道歉”，

是“不安”，寢食“不安”因为全中国的娃娃还没有都“结石”：所以他这回没有流泪了。

即使要道歉，也只对外国人，例如因为有毒水饺向日本朋友道歉；或者因为乳粉向台湾人道歉。例如，陈云林在台湾，显得多么谦卑、客气，就像周恩来1949年前对白区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那样。一旦被“解放”，他们就成了你的爷爷，不，是奴隶主，生杀予夺的暴君。

也许有好心人要批评我偏激了：不悛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共产党。但我只想问一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干的哪一件事不是伤天害理、不是断子绝孙呢？共产党干坏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

### “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总路线

谢泳先生非常尊崇陈寅恪的新史料学。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的出土，将有特殊的意义。一，承先后后，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连贯性；二，是一把钥匙，可以解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可以解释许多人盘桓心中几十年的疑问，让他们死而瞑目。

这史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发掘出来的：云大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消息曾被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父亲说：“知识分子是改造的问题，不是消灭的问题，这简直是借寇兵资盗粮！”（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云大，即云南大学。父亲，即李岫的父亲李广田，时为云南大学校长。这位仅仅对“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表示一下异议的诗人、作家、教育家，不久就被他的党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消灭---沉尸昆明莲花池了。在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的五十年后，我也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它为我解决了右派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中共内部是否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条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的“革命路线”或“反革命路线”？中共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样丧心病狂？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穷一生而未毕的功业。他的这个宏图大志，大约在1925年就定下来了。毛泽东在那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2月、《中国农民》2月、《中国青年》3月）就断言：“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引者注）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为“中产阶级”；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

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数学不及格的毛泽东居然会算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毛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但他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修改稿”）中却把关于“高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种种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分子——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并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们分为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份——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份——左翼，欢迎（革命）。”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确是由来以久。“修改稿”中虽然将这些可怕的文字删除，但删除的原因却非悔悟，而是出于掩盖和欺骗，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从来没有改变。（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以下仍有多次引用和转述，不再注。）

敌视知识分子方针早已定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在掌握权力、抓住刀把子，在井冈山，成为“朱毛赤匪”首领之后，才开始对知识分子举起屠刀、大开杀戒。

1928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需上级批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接着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李文林等数万人被肉体消灭；其中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杀光。1931年，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上“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达6,352人。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农村小知识分子）是“AB团”，胡耀邦本身因是读过初中的“小知识分子”，也被认定为“AB团”，险遭杀害；（陈利明：《胡耀邦传》）险遭杀害的还有陈毅、谭启龙、张爱萍等中共名人。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王实味被逮捕后，毛即把矛头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通过批斗、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大量“特务”。1943年，毛泽东在全校只有2,500人的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

他认为，行政学院里“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军委三局电讯学校 200 多人中，挖出 170 个特务；西北公学 500 多人，只有 20 人没有被抢救。“延安 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象李锐这样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都成了当然的特务而遭到关押、整肃。中共甚至把一二九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百分九十九点几都被抢救过，只有两个人幸免。（蒋南翔：《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不少人因此被消灭了。

### 连绵不绝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

从窃取全国政权后到寿终正寝，毛泽东所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荦荦大端者有 1949—1950 年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镇反”）、1951 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1952 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 年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 年的批判胡适思想、1955 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肃清反革命（“肃反”）运动、1957 年的反右运动及“拔白旗”运动，1964 年，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即发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6 年又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

土改和镇反，把地主、富农等农村中的精英分子以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民国时代党政团军教人员消灭了几十万。胡风本是中共的“党外进步作家”，只因文艺观点与毛泽东相左，也在消灭之列。毛泽东毫无根据地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全国涉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者共 2,100 人，逮捕 92 人，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 78 人，其中骨干分子 23 人。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整死了多少，更不得而知。

反胡风运动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肃反。许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或被“揭发”出“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消灭对象，被冤杀或关进监牢。毛泽东 1958 年 5 月 8 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打自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抗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同年 8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

###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7 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这个丧尽天良的政治流氓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



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请相邀，结果 180—310 万的大小知识分子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之”了。

这 180—310 万右派分子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份还被杀害。从此中国人便没有了人性、个性、公信、诚信；中国也从此进入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交织的时代。如今，无官不贪，腐败横行，坑蒙拐骗，豆腐渣工程压死学生，毒牛奶祸害婴儿，其原因就出在毛泽东这个无仁无义、无信无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头子身上。

毛泽东趁反右运动余威，开始编造“大跃进”、“人民公社”神话，指使吴芝圃、李井泉、柯庆施等人伪造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卫星田”；四川省郫县还吹出 824,525 斤的牛皮。然后再按“产量”征购，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农民的粮食统统搜光、刮光，竟至颗粒不剩，才肯罢休；以达到对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屠杀。

毛泽东用饥饿的办法，从 1959—1961 的三年间，基本上不费一枪一弹就消灭了 3,600 万农民和在各地各种劳改场所（农场、工厂、矿山）服苦役的右派分子等被共产党所认为的敌对分子。然而毛泽东这个屠夫，却把一手造成的大灾难归咎为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事实上，这 3 年中国的气候基本正常，苏联并无逼债相反还且给予一定援助。

###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记录

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旭副教授花了 10 年时间调查、采访，于 1994 年写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劳改基金会出版，香港田园书屋发行），蹉跎十多年后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人类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的一段历史的记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的罪证。本人仅向各位读者、各位朋友大力推荐：请看看《夹边沟惨案访谈录》，看看中国共产党怎样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看看中国共产党怎样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名义大面积地屠戮中国人民和它的知识分子。

对于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有和风鸣、杨显惠等写过，赵旭也在他的小说《风雪夹边沟》反映过；可是，他还想有一个由夹边沟幸存者自己谈、自己回忆的，比较全面、客观、准确、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的文本。赵旭将 1985 年起采访的记录整理、补充而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夹边沟仅仅是中共屠杀反右分子的一个屠场，全中国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

当然，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夹边沟农场、415 劳教筑路支队、峨边沙坪农场、白茅岭农场、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场、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兴凯湖农场、白城子农场、北京清河农场、茶淀农场等相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杀人魔窟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枪杀之外，许多人是在受尽打骂、凌

辱、捆绑、吊打、关禁闭之中，在饥饿、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断地死去。

夹边沟农场关押的 3 千多人，后来编辑《甘肃省劳改志》的幸存者刘文汉表示，夹边沟农场最高峰时的报表人数是 3,074 人。按幸存者、甘肃农业大学孙枢统计，死去的差不多 2,900 人，活着出来的不到 300 人，有的说只有 200 多人；死亡率大约 90%。1960 年 9 月转入明水滩农场的 2 千多人，到北京检查团来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时，只剩下 200 多人；死亡率高达 90%。张掖专署共送 360 人到夹边沟农，只 80 人活着回来，死亡率为 75%。天水地区共划了 1,146 个右派分子，遣送夹边沟劳教的共计 238 人，生还 22 人，死亡率为 90.75%。

明水滩地处河西走廊，冬季气温只有零下 20-30℃，加上每人每月实际只有原粮 12 斤即每天吃不到 4 两原粮，大批劳教人员被活活饿死、冻死，除了用“谋杀”两个字之外，还有什么词汇合适？

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讲：“30 年代的饥荒是反人类罪，是有凶手的，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还没有找到任何罪犯……人们可能找到谋杀一个人的凶手，但是对于数百万人受害的事件，却没有人负责。这也许就是乌克兰今天难以恢复法制、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原因。”（《参考消息》2005 年 11 月 28 日）对此，赵旭指出：中国活活饿死几千万的三年人祸、灭绝人性的反右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人去追究责任，而且不让说、不让写。然而，赵旭顶着各种压力写了。只是写了以后没有地方出版，被拖了十年后，才在海外付梓。

#### “消灭知识分子”宏伟计划如何被认真执行？

幸存者高学武回忆说：由夹边沟迁到明水有 2000 多人，在既无房舍又无粮食饥寒交迫的环境中，劳教人员在冰天雪地里延缓生命。他们从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因为遥遥无期的劳教，在饥饿、疾病、苦役下，逐步失望、悲观、堕落。那个时候，夹边沟的劳教犯人们衣衫破烂，五颜六色地套在一起，虚肿的脸上眼睛眯起一道逢来，头高高的扬起。看起来人非人，鬼非鬼，战士非战士，干部非干部，农工非农工，这是一群什么样的行尸走肉。1960 年 11 月份，每天死亡十多人，到了 12 月份连降大雪，天寒地冻，人们每天吃不到 4 两原粮，而且没有任何油水，被熬干了的人开始大量死亡。死了的人只有二、三十斤，皮包骨头。我赶马车此时已没有生产运输任务，先是拉煤，后来就专门拉尸体掩埋。那时，明水滩的死人被埋到靠近兰新公路沙枣林南边的沙窝中。埋葬组埋尸体的人此时也骨瘦如柴，没有力量深挖坑，多数是将尸体用本人被褥一裹，两根草绳头、腰、腿一捆，一车拉七八具尸体，用车拉到沙窝中掩埋。埋时将尸体放入浅坑中，撮土为坟。后来无力挖坑，只有将尸体放在沙上，用锨将四周沙土撮起来放在尸体上，堆成一个沙冢。每批死者都在一处，白天看时，一条一条能够辨出……到了 12 月 23、24、25 这几天，三个站每天死亡都在 40 多人以上。这时，埋人的活人已没有力气埋了……死亡笼罩在明水滩，人们彻底绝望了，都在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谋杀计划是这样被精心的执行着：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原为解放军的军垦农场，土地贫瘠盐碱太大，只能养活 300 人，却被关进了 3 千多人；原来粮食



由甘肃省酒泉市统一调拨，但仅仅拨了一年就让“自力更生”。关押的主要是甘肃本省的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大鸣大放中被揪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有右派言论的坏分子。但也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这些从外地来的犯人，由于没有接济，活下来的很少。

在饥饿的折磨下，人们吃沙枣树叶、死老鼠、蚂蚱、荒漠上的兽骨，吃癞蛤蟆、蜥蜴，吃死人的内脏、死人臀部的肉。他们约上两三个人一起去挖尸、剖腹、割肉，因为一个人害怕被狼吃了。甚至有犯人在大便里，尤其在干部们的大便里找东西来吃。甘肃省定西县粮食局右派分子邢树义，见地质队送来的贺守瑛的大便中有未消化的玉米颗粒，便抓起来用水冲一下就急忙送进嘴里咽了下去。（李景沆：《蒙恩历程》）所以，在饿死之外，还有中毒而死，暴食而胀死；为偷食被打死。

饿其体肤，同时劳其筋骨。夹边沟正常劳动一般都在12个小时以上，包干，打擂台，互相竞争，把人活活给争死了。幸存者计德成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夹边沟这么残酷的地方了，从古到今也再没有比这再残暴的暴君了。**抬筐运肥打擂台，一抬八筐、十筐的掣起来，五六百斤，还要喊号子“嗨吆，嗨吆。”把人压得起不来，还要进行劳动竞赛。挖排碱沟，每天跳到零下30—40℃的排碱沟里挖沙子，挖上一阵子，腿就不知是自己的了，劳动回来后吃的又是菜卷子。挖沟、运肥，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本来就喝着菜汤汤，扣了“饭”后就活活饿死了。天天大量死人，到了1960年冬天，连埋都埋不及了，足有一二百具尸体在土坎下面码着。

更不忘苦其心志，凡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除了斗批打关饿百般折磨、“每天从事超负荷的、以折磨人为主要目的的劳动，还有开不完的斗争会、批判会、帮助会、学习会、生活检讨会”（谭天荣：《我的右派经历》）外，有配偶的一定千方百计地强迫配偶与之离婚；有异性朋友的一定千方百计地强迫朋友与之脱离关系。在云南省东风农场改造的郭家源（个旧县政府秘书）在离婚高潮期间，向天长叹：“**难道用离婚可以改造人吗？天天说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难道我们都是十恶不赦的人吗？何必要搞到权利终身、家破人亡……**”（汪作民：《农场春秋》）郭家源先生，你如果早知道贵党有“消灭知识分子”的政策，你就没有这个牢骚，就可以死得瞑目了。许多右派分子都是由于家庭破碎的打击，思想崩溃陷入绝境，而自杀、而加速死亡。如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哈爾濱军事工程学院俞声朗中尉，正在饥寒交迫的北大荒苦苦撑持，想不到妻子一封“划清界线”要离婚的来信就要了他的命。（滕叙尧：《哈軍工傳》）许多人因受此而走上绝路。

### “消灭知识分子”全国一盘棋

在区区几平方公里的戈壁荒滩上，聚集着一批党国高级干部、有功之臣，民主党派人士，党、政、工、团，农、工、商、兵各色人物，他们都学有所长，有的身怀绝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们中大多数人还对共产党怀着赤诚的心，对国家民族寄予无限厚望。只因一言之出，而大祸临头，落得如此下场。他们都说这是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和中共张掖地委书记安振做的孽，其实张仲良和安振不过是执行党的“消灭知识分子”

方针罢了。安徽、河南、四川、广西等省市，那里并没有张仲良和安振，不是死人更多吗？

幸存者白育英认为，“夹边沟死这么多人与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有直接关系，从原则上讲，这些人的素质和结构很差，他们的水平低，品质也不好，包括刘振玉在内，都是认为夹边沟的劳教犯人是共产党为了达到目的，而采用的另外一种消灭的办法。”白育英说对了，这些“水平低，品质也不好”的管教干部也能正确领会和贯彻毛泽东共产党“消灭知识分子”的政策。

副场长刘振玉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列宁说过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枪毙人还要浪费一颗子弹呢。听了这话，幸存者邢德当时就明白：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哩。后来果然如此，大约90%的人死在这里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教养人员不被当人看，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实际上是按敌人对待。幸存者周孝理也听过这话，他当时心里就发毛，暗暗下了逃跑的决心。他看到场里要用饥饿和强体力劳动的办法把这些右派分子消灭在农场里；他逃跑了，他因此逃过一劫。

#### “消灭知识分子”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水平低，品质也不好的夹边沟农场管教干部如此，水平高，品质更不好的几任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书记也都如此。李书成在《光明日报》发表“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在云南大学大抓右派、大抓右倾、大拔白旗，把校长李广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一任党委书记高治国把李广田赶到厨房劳动，并对他说：“谁让你和我针锋相对，这叫君逸臣劳嘛！”1966年的党委书记胡洋生则说：“这次运动只搞李广田一个人，因为我们中间只有他一个人写文章，我们都不写。”（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

可见“消灭知识分子”不是一时的权宜，也不是一地的独创，更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它确实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贯穿一切工作的总路线。

赵廷祺死在夹边沟，他的妻子悲痛欲绝，她说是书害死了丈夫，她将家中的书统统烧掉，并让她的孩子们再也不要念书了；并嘱咐女儿们，以后要嫁给庄稼人，千万不要嫁念书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消灭知识分子”这一条总路线，不但深入官心，而且已经深入人心。

毛泽东死了，“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总路线没有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知识分子的冷血、残暴、恶毒、下流，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安定团结”，造成数以千计学生、市民死伤的1989年六四事件至今不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们及六四死伤者的亲属仍然受到歧视和迫害。

在中共的监狱中仍然关满着知识分子，如王炳章、秦永敏、何德普、朱虞夫、刘贤斌、许万平、郭飞熊、陈光诚、胡佳、张林等，曾宏玲(杉杉)因发表《地震亲历记》被抓，奥运后听说已经释放，但至今下落不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独立中文笔会一些成员人身权利受到严重损害。数百名法律工作者受到中共非法骚扰，无法正常工作。土匪的习气、流氓的基因，就这样代代相传。

**“消灭知识分子”，也消灭农民、消灭一切反抗者**

我在评论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一文写道，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看过《墓碑》之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 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冉云飞先生在《饿殍遍野时的颂歌》指出，他不完全同意 3,600 万这个数字，我也有同感，因为单是四川就饿死了 1,250 万人——这数字仍然有可能是被缩小的，因为这是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廖伯康从中共四川省委文件中看到的，而共产党历来是玩弄数字的高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中共四川省委都有缩小的动机与故意。冉云飞“其它地区加起来不可能只有二千多万，单是河南恐怕也有上千万”的意见，我也同意。当然，我和冉云飞一样也十分尊重杨继绳先生计算方法及严肃学风。）

“消灭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会思想；屠杀农民，因为农民已经开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县从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全县 33 个乡镇中有 29 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 116 个，部分垮台的 55 个。入社农户由 91% 降至 19%。被打干部 107 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 304 户。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 1956 年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 147 起，参加的有 5,520 多人。其中闹分社的 81 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 48 起，闹粮荒的 18 起。江苏省从 4 月中旬到 5 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 12 个区、47 个乡、436 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五万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 62%。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伙退社的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 458 个社解散，共有四万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 85% 下降到 46%，其中有 6 个乡、366 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 26 个社基本保持完整。（沈志华：《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

毛泽东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气，而是用饥饿法、冷冻法。《墓碑》中有大量论述，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中也有许多例子。如张掖地区实际上民勤县饿死了 13 万人；张掖县饿死了 7.8 万人，全家死绝 98 户，人吃人的 58 户；高台县饿死了 5 万多人；全河西 14 个农业县饿死超过 40 万人。1959 年 10 月修迎丰渠时，一场大雪就冻死 3,000 多人。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有一个叫孙守勤的共军，他参加过镇压西藏人民的战争，是因为批评队长“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子”而打成右倾分子的。他说：“1958 年藏民造反时，我们被调去平叛。当时，打得很残酷，一个村一个部落人几乎被全部打死了。我跟着部队从甘肃一直打到了青海。”“我们当时只知道烧了藏民的寺院将铜铁交到上面……”仅此数十字，就把毛泽东共产党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西藏人民、新疆人民……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必须得到也必定要得到彻底清算。

结语

最后，让我用赵旭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中国人民为了民主自由交出的学费太昂贵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对失败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在议事日程上，更没有让防止悲剧重演的民主宪政在中国出现的迹象。文化大革命时，林彪、五人帮搞封建法西斯浩劫的时候，高喊的是“枪杆子，笔杆子，革命靠的是这两杆子。”文革、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都是以“革命”、“跃进”、“共产主义”这些红色的外衣掩盖他们封建专制的面孔来蒙骗广大人民的，正是他们掌握“枪杆子，笔杆子”，所以他们可以信口雌黄、造谣污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枪杆子、笔杆子让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1989年的“六、四”遭到血腥镇压；枪杆子、笔杆子让1957年无数先贤生灵涂炭，至今还得不到彻底平反；正是这两杆子让一人一党之私利，代替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综观国际上，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波尔布特和一切对国内人民残酷镇压、对国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封建法西斯，之所以他们为所欲为、猖狂一时，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枪杆子和笔杆子，所以他们的权利无限膨胀，没有任何力量对其制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多么迫切需要思想、新闻的自由化、军队的国家化、司法的独立化、文化的多元化，因为它是我们的民族走向民主、自由、富强、繁荣的关键。夹边沟农场后来的张场长对王志说，“说句老实话，是死人救活了你们”。我想，能不能让这些死难的英魂唤醒我麻木的国民，让他们清楚只有还政于民，给于人民选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明天！

回到我的结论：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没有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被镇压，被消灭了。要想中国民主化的成功，就要重新启蒙，重新培养像储安平、彭文应、林昭、冯元春、张春元以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为终极追求的知识分子群体。

# 《零八宪章》签署者戴晴的香港行

武宜三

【导语：戴晴是从红色的营垒中杀出来的，对那个营垒的黑暗、血腥、无耻，看得格外清晰，所以反戈一击也显得不留情面、决绝得义无反顾；她也所以成了中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作家之一。二十年来，她采访、写作、发表的权利虽然被剥夺，但她独立的人格、宁折不弯的笔却谁也剥夺不了。】

## 一、戴晴是“军统特务”

《零八宪章》签署者之一的戴晴（图一）到了香港，香港为她刮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

在GOOGLE上搜索“戴晴”，有四万多条结果。戴晴是“革命烈士”之后，是叶剑英的养女；进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导弹专业；毕业分在中央军委总参三所；在解放军外语学院进修过；在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干过；戴晴后来因此被指为“国安部特务”，戴晴也因此调侃自己是“军统特务”。

有这样背景的戴晴，后来却和革命分手了。在《光明日报》做记者、主持《学者问答录》专栏时，采访过包括方励之、严家祺、金观涛等在内的异见知识分子。

戴晴自1989年开始公开对三峡水电站的环境影响、移民政策等方面提出异议。后来，因为六四事件被关进秦城监狱。释放后，又被监视居住三个月。

戴晴曾获国际报业联合会自由金笔奖、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人奖学金等多项国际荣誉。

奇女子戴晴，一生充满传奇。她从红色的营垒中出来，对那个营垒的黑暗、血腥、无耻，看得格外清晰，所以反戈一击也显得不留情面、决绝得义无反顾；她也所以成了中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作家之一。二十年来，她采访、写作、发表的权利虽然被剥夺，但她独立的人格、宁折不弯的笔却谁也剥夺不了。

## 二、解密张东荪“叛国案”

戴晴用了八年时间，追踪“张东荪叛国案”，写成《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图二）。张东荪（1886--1973）是近代中国不可回避却被刻意消失的人

物。他是最早的西方哲学译介者、著名报人、政论家、燕京大学教授；是1949年北平和谈国共双方第一居间人；是第一届中国中央政府56个委员之一。1951年获“叛国”罪，从此销声匿迹。本书以张东荪一生为主线，写了从清末到文革的一个个时代风云。此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得到海内外一些知名学者如余英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讲座教授）、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杰明（澳洲国立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的高度赞许和推荐。

他们认为，《在如来佛掌中》运用多方面的可靠数据，重构了这一段复杂离奇的案情，写出来的是一部最翔实的历史---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史。是一部最有历史价值的“洗冤录”，解开了“张东荪叛国罪”这一疑窦丛生的政治事件的谜团。

### 三、共产党毁了张家几代人

戴晴此次来香港，首先在中文大学做了一场《张东荪“叛国案”》演讲。演讲会由陈方正博士主持（图三），那天（12月16日）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会议室座无虚席，连大门外也挤了十几二十人。以致自以为嗓门大的戴晴也不得不用麦克风。

戴晴是讲故事的高手，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让几十个听众听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提问期间，大家争先恐后提出问题让戴晴回答和互相探讨。随后戴晴又为买书的听众签名、合影留念，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居住澳洲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张东荪的长房次孙张鹤慈先生（图四）也在演讲会上发了言，他控诉暴政毁了他一家几代人。

张东荪1952年蒙冤之后，1968年复遭逮捕，长子张宗炳（北大生物系教授）夫妇也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张宗炳因长年的孤独监禁生活被折磨成精神失常，出狱后才逐渐好转；更不幸的，是次子张宗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和三子张宗颖（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学习化学和社会学，后在开滦煤矿任职）夫妇的绝望自杀。

张东荪子女中，张宗燧才华最为突出：15岁考上燕大物理系，一年后转到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师从吴有训在清华当研究生。1935年考取赴美公费留学生，后改赴英国。在剑桥得博士后又往丹麦，在玻尔主持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作研究。1939年回国，任教中央大学。1942年得李约瑟推荐，赴剑桥大学与狄拉克合作研究量子场论，成为该校第一个讲学开课的中国学者，后来还去美国普



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与讲学。1948年回国后，先后任教北大、北师大。1949年后，又兼任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1956年在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开展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可惜因为父亲的问题与曾留学美国等问题，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愤然弃世。（互联网）

女儿张宗焯是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她也差一点因她爸爸“投（毛主席）反对票”而被赶出科学的大门。

张鹤慈是张宗炳次子，竟会和郭沫若的儿子一起陷入 X 反革命集团案而罹大祸，被关了 19 年。

年近八十的燕京大学校友张先生（图五），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的学校和老师，他力数历次政治运动对教育的摧残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 四、新书发布会

新书发布会于 12 月 17 日下午在天地图书公司召开。发布会首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小姐讲话（图六），接着戴晴讲了写作的背景和过程；戴晴语言生动、表情丰富，让我又一次领略了她演说的风采。（图七—十）

一些海内外媒体、学术研究机构、文化出版界的代表也出席了新书发布会。虽然，北国已经寒风阵阵，“千里冰封”，但香港这蕞尔小岛仍然衣香鬓影、笑语盈盈（图十一—十三），书香扑鼻、暖意融融。正如戴晴所说，“幸好还有个香港”。

张鹤慈先生也应主持人的要求讲了话（图十四、十五）并接受了有关传媒的采访。

#### 五、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戴晴备受关注

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戴晴与一起签名的一批学者、社会活动家一样，受到海内外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她先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和《亚洲周刊》的采访。

戴晴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直指中共一小撮打肿脸充胖子：“大宴宾客，要家里每个人都很富裕，很幸福，打开大门，大家痛快的吃一顿。问题是你背后都是灾民，恨不得把你给宰了。你折腾什么呀？赶紧把自己的国家先搞好吧。”

戴晴指出，《零八宪章》“太基本了”。“觉得中国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这算什么现代社会？除了有些人有点钱以外，而且他们的钱哪来的呀？还不

是牺牲了弱势群体？最弱的就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的河流，接着是矿山，再接着的是森林，然后是那些劳工。”

戴晴强烈批评中共拘禁刘晓波及对其它签署人的传讯问话，“太笨”了，令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管治缺乏自信。“现在，法国人见一下达赖也不行啦，2008年出事的，一件比一件笨，这已经不是坏的问题，而是笨。把宪章弄成这个样子，给大家说话的机会，就是因为他太笨了。”

性格乐观、开朗的戴晴，却对中国充满绝望。她说：“希望在中国实际上并不多，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人，唯一的希望就在这。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时，到了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前途时，可能中国的河也干了，资源和环境可能都完了。中国成为了世上最大的灾难，我是非常悲观的，最后看到的是时间来不及了，当政者太强大了，我们觉醒得太晚了。”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中国人民是不是觉醒得太晚，是耶、非耶？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至此，我想重复一下“武宜三定律”，其一：中國人愛中國沒有好下場，中國共產黨員愛中共沒有好下場；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上愛黨又愛國更加沒有好下場。被中国共产党毁了几代人的张东荪一家，便是明白的证据；当然，像张东荪这样上当受骗、落得悲惨下场的，可是数以千万计。

其二：中國是冤假錯案大國，中國共產黨是專門製造冤假錯案的政黨；所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案不冤、無反不平”的政黨和國家。从张东荪案、胡风案、右派冤案到天安门惨案、杨佳案，中共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是罄竹难书。

最后，祝回到北京的戴晴平安无事。保重啦，戴晴！

（首发《参与》）

# 聚天下英才而毀滅之

——序孔令平《一個苦難的靈魂——我的母親方堅志》

## 武宜三

1948年，孔令平第一次看到他的母親和父親激烈爭吵：“父親鑒於局勢的變化，曾要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外婆去臺灣，而母親卻堅決反對去臺灣，母親認為她的當年的同窗和老師曾在重慶一同參加抗日的活動。而這些同窗多半都去了延安，已經成為中共所依靠的各級幹部，她完全可以在中共佔領全國以後，重新找到安靜的生活。”爭吵的結果是：這個家就留在大陸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一個家——像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的家，從此跌入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

孔令平的父親孔祥嘉，1948年在顧毓秀的舉薦下出任過中央政治大學重慶分校校長，一介書生而已。在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却被逮捕，1956年瘐死獄中，一個教育家就這樣被毀滅了。

以為自己應該是中共統戰對象和“盟友”的母親方堅志，1941年創建嘉陵中學，一個對教育、對學生無限愛戀的教師，連“有一口飯吃”的卑微的夢想也破滅了。她，33歲就成了“寡婦”、“反革命家屬”，從此生活在惡夢和苦難之中。

1957年，正在重慶大學讀書的孔令平和母親一起跌入毛澤東的陽謀陷阱，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方堅志在領導的誘導下，委婉曲折、小心翼翼地向“黨組織”提出關於孔祥嘉被逮捕和去向不明的疑問，便被劃為右派份子，送去“監督勞動考查”，每月僅22元生活費，上攜年過七旬的老母，下牽年僅13歲的小兒。在重慶大學讀書的孔令平的罪名是：“趁黨整風之際與母親密謀策劃共同為反革命父親翻案。”孔令平母子犯的都是株連罪。

1960年，孔令平被逮捕，判處18年徒刑，送去勞改。

1961年，孔令平的外婆在饑餓和掛念大外孫的痛苦中死去；跟著，母親和弟弟被送到一家農村醫院去接受改造，受盡屈辱、折磨甚至毆打。

十年浩劫期間，孔令平因為直呼“打倒毛澤東”，被申報死刑(沒有批准)及加刑至20年。1967年，年僅23歲的弟弟無故被槍殺，母親痛不欲生，自殺未遂。

1979年，孔令平雖然被“平反”了，但入獄20年的工資一直沒有補發。

1999年，母親逝世。孔令平至此成孤家寡人了。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然而，共產黨卻偏偏“得天下英才而毀滅之”。一是毀滅作育英才的學校和教師，二是毀滅可以成英才的青年、少年甚至兒童。

孔家就被毀滅4個：兩個教師，兩個學生。

在 1949 年以來，在暴力土改、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風、肅清反革命、反右派運動中，到底有多少英才或者准英才被消滅？至今沒有準確的數字；但是，毛澤東夫子自道的“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 460 個儒，我們坑的比他多。我們在鎮反中，鎮壓了幾十萬反革命，我看有 4 萬 6 千個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坑掉了。”就夠觸目驚心了。

反右派運動後，幾十萬右派分子被送到勞改勞教農場、礦山，遭到集體虐殺。例如遼寧省凌源縣新生焦化廠的一個右派勞改中隊 300 人中，餓死、累死、病死、打死、自殺死 227 人，死亡率達 75%。

關押了 3 千多人的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由於刻意饑餓、超體力超強度勞役、嚴酷的寒冷、精神和心理的摧殘，以致在農場撤銷的 1960 年，只有 200 多人存活下來，死亡率達 90% 以上。

遼寧省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饑荒後，1,200 名右派、犯人餓死 1,000 人，沒有餓死的 200 人中的 198 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臥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戴煌：《九死一生》）顧雪雍（1957 年的遼寧省《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在 2009 年證實，這剩下的 200 個後來也全部餓死。

顧雪雍就是在這 1,200 人快死光的 1959 年被補充去的勞動力。

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一個文化落後、人口稀少、經濟不發達的地區，不少地方還是刀耕火種，有的地方還在刻木記事、結繩丟豆記數；但是 1957--1958 年間也抓了 1,040 個右派分子。

南華縣劃的 96 名右派分子中，67 人被送到元謀縣新民農場，結果被打死、累死、餓死、工傷死了 46 人；熬出來的 21 人，也都半死不活，剩下半條命了。所謂“勞動教養”，表面上是“最高行政處分，（受教養者）仍享有公民權利”，實際上也是“蹲監坐牢”的囚犯，而受到的迫害則更凶殘、更歹毒。

右派分子在這一場無法無天的政治迫害中，名譽被摧毀、人格被侮辱、精神被折磨、生活受虐待（饑餓、嚴寒、酷熱、有病不給醫、居無室、睡無床）、勞役的超時超限、肉體上的酷刑，長達數年甚至 20 多年之久。“南冠楚囚，倍受煎熬，一個個束手待斃，朝不保夕”，引起大面積死亡。

元謀縣新民農場關有幾個小腳老太太（也是右派分子，她們大都是以前的小商小販，公私合營的時候把她們變成“單位”的職員。反右派一來，就拿她們湊數。這說明一，那些地方知識份子確實太少；二，共產黨真的是沒有人性）。

還關了幾個未成年的兒童。楊洪祥、董發林是兩個 12 歲的小學生，一個小啞巴剛剛滿 10 歲，小水是 8 歲的兒童。

熊翔，是 15 歲的小學生。因為喜歡收音機，常常幫同學、熟人修理，被公安局當作特務抓了去勞動教養。“15 歲的特務”，也只有殘民以逞的共產黨“新中國”才製造出來的“奇跡”。

小狗蛋，是 13 歲的孤兒，拿無人管的廢鐵去賣，被定為“破壞生產”的“壞分子”送進勞改農場。（魏光鄴：《生命的祭壇》，作家出版社，2008 年，北京）

四川省王建軍的《五八劫》和楊澤泉的《回眸一笑》，寫的也是在中學生中抓右派的故事。雲南省不但在中學生中反“右派”，還在小學生中反“右派”。謝富治之滅絕人性，更甚于李井泉。

楚雄師範學校在把接近一半的老師打成右派分子後，又把 17 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宣佈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學生”並將他們送去勞動教養。

共產黨常常作出“關心少數民族”的樣子，例如它在這個楚雄師範就開了一個少數民族班，說什麼“體現民族政策”。結果卻把這個班的 5 個優秀學員打成“反動學生”、送去勞動教養。

祿豐縣幾喇山是彝族的一個村寨，那裏的小學校只有一個教師，由於條件艱苦和風俗的原因，很少有人願意去，可是共產黨卻把先後兩任教師都打成右派分子。不把農民和少數民族徹底文盲化，共產黨人是死不瞑目的。

從來的中原政權都是壓迫、剝削、欺負、坑害少數民族的，中國共產黨也沒有例外。所不同的只是，共產黨比他們的前輩更狡猾、更毒辣，心腸更黑罷了。不信就請看看幾十年來中共怎樣屠殺藏族和回族的人民，就知道了。

由此可見：共產黨對過去的破壞，固然不遺餘力，但對未來的摧毀更是非常徹底。對教育、生態環境、資源的糟蹋，是肆無忌憚。對“祖國的花朵”、“未來的主人翁”是心狠手辣。

新民農場 1958 年成立，先後送去 832 名的勞教人員，其中大部分是右派分子，到 1961 年底至少便死去 348 人。最嚴重時，一天死過 8 個人。新民農場就是對知識份子群體滅絕的人間地獄。

這樣的人間地獄，遍佈從黑龍江到雲南，從江蘇到新疆廣袤的國土上。

據吳弘達、廖天琪等編寫的、勞改基金會出版的《勞改手冊》統計，到 2008 年為止，中國還有 1,413 個勞改勞教農場、礦山和工廠。

當我這篇《序》寫到這裏的時候，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了高錕以及兩位美國科學家同時獲得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這條消息又一次證明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的確是毀滅英才、毀滅科學的劊子手。

高錕出生於上海，他有幸於 1944 年隨父移居香港，入讀聖約瑟書院，之後赴英國倫敦大學讀書、做研究，免於被毀滅而成為偉大的科學家。

李政道也是出生於上海，他 1957 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他的老師東星北卻在歷史反革命分子之外又加戴了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當李政道 1972 年“榮歸”而收到周恩來“光榮”接見的時候，東星北卻正在受著慘無人道的迫害；這個啟蒙了李政道的、在中國科學界“罕見的”、“集才華、天賦、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不但不能參與核武器研製，還被剝奪了教學、做研究的資格，連吃飽飯的權利也沒有了，他只能在極度的饑餓狀態下做超體能的苦役和打掃廁所。

1942 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的楊振寧如果不是在 1949 年前跑去美國，那麼他在 1957 年多半也要當右派而不會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了。

李遠哲生於臺灣，他在 1986 年獲諾貝爾化學獎。

崔琦生於河南，1951 年赴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1998 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達賴生於西藏，1959 年逃出中國，1989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高行健生於江西，因為 1989 年天安門事件而宣佈退出中共並選擇流亡，使他在 2000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使一個中等水準的中國學生在西方也可以成為世界知名科學家；然而最優秀的學生在中共的牢籠裏只能當“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大老虎”、“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右派分子”、“右傾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

總之，能逃出中國，哪怕就是到了香港、臺灣，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以發揮他的聰明才智，可以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學習和工作，都能對科學對人類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1949 年時不肯離開中國的，或者 1949 年以後主動以及非主動回到中國的，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所以，胡錦濤一夥所謂“輝煌 60 年”，只不過是毫無事實根據的、無恥的自吹自擂罷了。

武宜三定律說：愛中國絕沒有好下場，愛共產黨絕沒有好下場。

孔令平先生的這一本書，再一次為武宜三定律提供了證據。

武宜三正在編寫的《1957 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將為武宜三定律提供更多的證據。

2009 年 10 月 10 日於避秦山莊



## “半個丘八半個書生”傳奇

——序《“兩半堂”文集》

五七學社出版公司 武宜三

和葛獻挺先生認識，是一個緣分；但是，我們的一見如故，還由於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話題：從歷史到時事，從抗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從京劇到崑曲，我都能夠從他的豐富閱歷和淵博的學養中，得到教益。

葛獻挺先生，是安徽人；我對於安徽人有一種由衷的崇敬，古代就不說了，現代的胡適、陳獨秀，簡直就是中國僅有的兩個完人——《胡適全集》、《陳獨秀全集》是我狹窄的書房裏僅有的兩套全集。其次如戴安瀾、孫立人、朱光潛、劉文典、馮玉祥、陶行知、柏文蔚、張恨水等，都是我所崇敬和仰慕的。

獻挺先生，出生於一九三六年，一九四六年入新四軍，一九五〇年參加“抗美援朝”，一九五三年朝鮮停戰時回國，一九五四年到張家口速成中學上學，一九五八年進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六三年大學畢業，先後在北京市文化局藝術處及局屬藝術院團做管理工作，一九八三年起專職戲曲史研究，為副研究員和副所長。他的幾十年經歷，極富傳奇。

到了現在——二〇一二年，像獻挺先生這樣有新四軍、志願軍、大學生、老幹部經歷的，參加過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特別史無前例的是文化大革命全部過程的，仍然健在的老人家，肯定不多了；仍然保持頭腦清醒、認真思考、進而執筆為文的，更是鳳毛麟角，彌足珍貴了。

獻挺先生自號“半個丘八半個書生”，號書房曰“兩半堂”，是他對自己傳奇一生的概括。

我有機會閱讀本書稿，並且成為這本書的出版人，實在是一種幸運。

由於獻挺先生閱歷豐富、交遊廣闊、學養深厚，在戲劇史（特別是京劇史）和中國近現代史（主要是文革史）研究方面，有獨特的貢獻。他的《“兩半堂”文集》，收集了他的主要著作，是他平生的經歷、讀書、研究、看戲、看人的心得結晶。

獻挺先生雖然在演藝界與官場沉浮幾十年，但是由於他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受過嚴格的訓練，是商鴻達教授的高足，又經過翦伯贊教授等大家的指點，更由於他尊重事實、堅守良知，所以他又是一個嚴謹的學者。

史料征引與親眼目睹相結合，引人入勝；融辯誣闢謠、本事考訂和直接採訪對談於一爐，絲絲入扣。懷人處，情深意長，感人肺腑；反思處，則醍醐灌頂，發人深省。

他講京劇的產生和發展、講演員的家世和淵源，講藝術的流派和傳承，如數家珍，趣味盎然；講軍中歷練、戰火洗禮、學校生活、文化大革命之捲入、政治運動的參與、官場生態的體驗、人情種種之觀察，作者基本上是秉筆直書，少有

違心之語。

對於極左思潮、思想專制，特別是政治干預文藝，“階級鬥爭”摧毀藝術、摧毀人才，作者真是痛心疾首到了極點，他重申孔尚任的“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奚補也！”是建言，也是警告；讀《對京劇〈四郎探母〉的反思》、《人才難得——京劇〈打金磚〉觀後》、《從三劍客憶起三次送別羅忠恕》等篇章，一個老戰士、老共產黨員、老幹部、老文藝工作（研究）者的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熱愛藝術的拳拳之心無不躍然紙上。

獻挺先生是研究歷史的，他恪守“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史德、有“歷史看百年”的史識，加上他的史才，所以文章中不乏微言大義，春秋筆法，如“當年他如不去臺灣而留在大陸，其命運不知又能如何！”等等。

關於西安事變，儘管在資料短缺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指出：“民國已經百年，西安事變到今年已經七十四年，回頭來看，當年事變的當事人張、楊和蔣，可能都是受害者，最大的受益人是隔岸觀火的毛澤東。沒有西安事變，毛澤東是何種命運，只有天知道。至於這場事變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真正後果，後人會有評說。”

“這場事變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真正後果，後人會有評說”，可謂神來之筆，餘味無窮——即使在人云亦云的語境下，作者也沒有放棄獨立思考的權利。

作者又是講故事的能手，《“兩半堂”文集》，既有學術性，更有趣味性，是作者人生的經歷和感悟，也是時代的折射和剪影，文筆流暢，文采斐然，是值得向讀者推薦的一本好書。有研究興趣的讀者，可以從中看到許多歷史資料——許多事件的原始記錄（如老舍被揪鬥）、一些當年的大字報、會議記錄等，得到許多啟發。休閒的讀者，可以從中看到許多有趣的故事（如軍隊中男女之防——實質是保障高級幹部對性資源的壟斷特權等）、逸聞花絮（如韓復榘和《關公戰秦瓊》）、“黨國機密”（如西路軍失敗的玄機、統購統銷政策對農村農民的影響、駐外使領館把華人華僑劃為左中右九等而區別對待之類），本書提供你茶餘飯後的談資。

《松坡自汗天下計，知音不是小鳳仙》曾經受到北京出版藝術評論界好評，並獲得重要獎項；《革命軍興易俗社——恭賀易俗社創立一百周年》和《孔廟縱火——“八·二三”蕭軍、老舍被揪目擊記》被臺灣《傳記文學》及《西安日報》重點刊登。《京劇“四大名旦”產生的經過和歷史背景》被《中國京劇》雜誌連載七個月，上海東方衛視電視臺根據此文作了七個多小時的節目，都說明了這本書的價值。

由於本書的寫作時間跨度達三十多年，而且大部分篇章還是發表在中國大陸有關報刊上，所以也難免留有“時代的痕跡”，如“建國”、“解放”等辭彙。

也由於文章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發表，所以部分內容會有一點重複，這次結集出版，為了保證各篇文章的獨立性和內容完整，所以不予刪節。好在這些內容都很有趣，看起來並不沉悶。

有些行業的用語，如“坐科”、“出科”、“掛刀”、“工丑”、“打通兒”、

“裏子”、“票友”、“隨手”等，上下文聯繫起來看，不難明白。

有些地方性名詞，如“前門外”、“攤事”、“吃掛落兒”、“髮小(兒)”等，不是北京人也能看懂。還有一些屬於文史知識範圍的名詞，如“松坡”、“項城”、“樣板團”、“五七幹校”等，為了避免繁瑣，都不做注釋了。

有些是中國大陸地區或者某些特殊系統的用語，就不一定人人明白，我在這裏統一作個說明，而不在每一篇文章中加注釋：

“文代會”，就是“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

“總後”，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它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共中央軍委”或者“軍委”）屬下的三大總部之一。其餘兩個是“總政治部”（總政）、“總參謀部”（總參）。

“三野”，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一、二、三、四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是國共內戰中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武裝力量。

“志後”、“志司”、“志政”，是“志願軍後勤部”、“志願軍司令部”、“志願軍政治部”的簡稱。

“野政”，即“野戰軍政治部”。“政治部（處）”是共軍團級以上單位都設立的政治機關，它負責幹部管理，控制政治、思想、宣傳、**安全保衛**等工作；在“全國學習解放軍”年代，國家機關、工廠、學校、企事業單位，甚至城市的街道辦事處和農村的人民公社，也紛紛設立“政治部（處）”。

有些是地理名詞，如“成川”，是成川郡，在朝鮮。

祝大家閱讀愉快。

2012年1月17日於酒香書屋

# 為唐樺《今天是母亲节》寫的按語

本文的作者唐樺女士是唐錫陽先生的大女兒。唐錫陽先生是享譽海內外的環保活動家，他 1930 年生於湖南汨羅新市，今年已經是七十七歲的高齡了；但他仍然奔波於祖國的山山水水之間，為保護生態、為子孫有一塊潔淨的天空、有一片青山綠水而呼號，而操心，而忙碌，而辛苦。

唐錫陽先生 1952 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原是《北京日報》的編輯、記者。因為在 1957 年給《北京日報》編委會寫了一封信，被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定為“給市委提意見就是政治問題”，而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開除中共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工資降三級。下放北京郊區八寶山魯谷生產隊勞動改造。也在《北京日報》工作的妻子鄭兆南受株連，下放北京市五十二中學；文革中遭紅衛兵活活打死(《**環保活動家唐錫陽妻子之**

**死**》，《開放》2007 年六月號)。弟弟松陽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唐錫陽先生的右派問題被糾正後，1980 年調北京自然博物館創辦《大自然》雜誌，並任主編；他在先後考察了中國、蘇聯、德國、瑞士、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及香港等 50 多個國家、地區的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後，痛感中國的山山水水所受的摧殘和磨難更甚於中國人。從此他與綠化、生態、環保結下了不解之緣。寫了大量文章，發表了許多環保講話，出版了《自然保護區探勝》、《天鵝之歌》(蒙古文)、《珍禽異獸跟蹤記》(台灣版)、《到自然保護區去》、大型畫冊《從世界屋脊到三江平原》(香港版)、《環球綠色行》(中、英文)、《錯錯錯——唐錫陽綠色沉思與百家評點》等專著。

馬霞是唐先生第二任妻子，馬霞感人的故事在唐先生《錯錯錯——唐錫陽綠色沉思與百家評點》中有極生動的敘述。《今天是母亲节》則是一個女兒在母親節裡所表達的對她兩個母親的愛和懷念，征得作者的同意，我把這篇感人的作品介紹給我的朋友們。但願我們不要忘記過去了五十年的反右派運動，不要忘記過去了三十年的文革，不要忘記蹂躪了而且還在蹂躪着中國人民和中華大地的罪惡制度。

## 【附】唐樺：今天是母亲节

五月十三日，在廣播、電視及人群中，大家都在用各種方式向自己的母親表達感激之情，方知今天是母亲节。這使我想起 1966 年文革中，我的親生母親死於紅衛兵的亂棍之下。母親是一位優秀的中學老師，她有何辜?!年幼的我，歷經當時裂人肺腑的悲慘情景，至今歷歷在目，我不想說！今天母亲节，我也想起 1986 年，我的父親給我們帶

来了一位新母亲，她是来自美国的文教专家——马霞（Marcia B.Marks）。自从马霞走进我的家庭，就成了一位影响着我们一生思想轨迹的母亲。

第一次见面是1985年。我们和马霞一行八人，利用“十一”的假期，游览湖南的张家界。初见马霞时有些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在一起，生活习惯不一样，语言又不通。但她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又很有个性，还会说点简单的汉语，吃东西很随意，住宾馆住帐篷都可以。这一下我们没有了距离，开始交流说笑。马霞比较瘦，红色上衣系在咖啡色灯心绒的长裤里，精干利落，一幅双筒望远镜总挂在胸前。在爬“黄狮寨”的时候，我们都累得气喘吁吁，只有她一个人轻松地走在前面，时不时举起望远镜在寻找林间的小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还有“观鸟”这种活动。后来我加入“自然之友”的观鸟小组，每当翻山越岭追寻鸟的踪影时，耳边就很自然的想起马霞生前最后留下的录音讲话：“我在观察窗外燕子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们的尾羽之间分布着红色的斑点，立即查阅鸟类图谱，才知道它们叫金腰燕，是我从未见过的品种。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知道‘这是燕子，那是麻雀’，还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燕子，什么样的麻雀。我们希望别人理解我们各自的个性，我们也应该努力发现植物、动物的特点。”当然，马霞的这个讲话说的不是观鸟，而是给绿色营、给所有的青年讲人生与自然的真谛。她说：“大自然不仅为我们昭示着奇异，还蕴育着真理和力量。”她说：“你们首先要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去认识别人，然后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她说：“在这次旅程中，你们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难怪在父亲讲座后再放马霞的讲话录音时，总有那么多人聚精会神、甚至是噙着眼泪在聆听。

1987年的大年初二，下着大雪，我带着六岁的女儿在长沙火车站和父亲与马霞汇合，一同南下湛江，然后坐轮船过琼州海峡到了海口。把冬季衣服留在海口，又坐长途车到了澄迈县。热得不行了，我们就在地摊上买衬衣，买凉鞋。一路参观了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大田坡鹿保护区。到了昌江县，坝王岭自然保护区派车接我们一直驶向深山。因为这个大山深处还栖息着十三只长臂猿，我们是探访它们来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汽车颠簸，终于到达了保护长臂猿的核心区，有个长臂猿观察站就设在这里。我们背着背包，保护区的小伙子背着蔬菜、粮食，一起上山，在寂静的森林里大家沿着林间小路向上爬，突然女儿周帆觉得腿上不舒服，我低头一看袜子上有血迹，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立即从她腿上拔出一条山蚂蝗，并告诉我们，如果走在草地上，山蚂蝗嗅到人的气味就会牵起贴到你的腿上去。听起来真有点害怕。到了山上天完全黑了，大家吃了简单的晚饭，继续在漆黑的森林中行走，我想女儿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环境，一定非常害怕，没想到外婆带着外孙女在虫鸣鸟叫的林间跳来跳去，追寻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这时再看女儿，那漆黑的夜晚给她带来的恐惧早已无影无踪，她第一次走进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和她的外婆发出欢快的笑声。

夜十二点，山上的小马达停止了发电，大家进入梦乡，期盼着明日早早起床走进林中就能看见长臂猿。当然这种期盼很难实现，因为茫茫林海中要寻找这仅有的两个猴群，真好比大海捞针。但我们仍然不虚此行，在鸟类学家和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蹲在低矮的隐蔽棚里看到了定点投食引来的孔雀雉、白鹇和海南山鹧鸪。我们还看到了冲天的高树、粗壮的奇藤，以及热带雨林中所特有的板状根、寄生兰，树茎开花结果、



绞杀现象等各种奇观，我们捡拾掉在地上的“相思”红豆，呼吸着森林里潮湿的新鲜空气。这座美丽迷人的令人震撼的“热带雨林博物馆”使我们惊叹、留连忘返，一生都难以忘怀。

1993年，马霞因为转换单位，暂时没有住处，只好临时和我们住在一起。老少三代七口人挤在一个60多平米的单元房里，一住就是三个月。这确实难为了一个美国人。爸爸说，西方家庭人口很少，还至少有两个卫生间。但我们只有一个，特别是一早一晚，上厕所、漱口、洗澡都要排队。对于这种生活，马霞不但努力适应，而且做得非常好。为了和大家错开时间，她比平时睡得更晚，起得更早。晚上等大家都睡了，她才使用卫生间，要到十二点左右才睡。早上不到五点就起，她轻手轻脚做着每一件事，不弄出一点声响，然后打着手电，步下二十四层楼梯去户外锻炼身体。回来时电梯工还没上班，她又爬上二十四层。这段生活她不但不觉得别扭，反而觉得很有意思，就写了一篇既亲切又风趣的文章《七个人和十五只仓鼠》.发表在美国的“基督科学箴言报”上。说起仓鼠，我们在马霞的诱导下，算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热爱动物的课。周帆喜欢小动物，从官园市场买来一对仓鼠。金黄色的绒毛，圆圆的小耳朵，短短的尾巴，那样子简直是大狗熊的微缩，所以大家都叫“金丝熊”。但它属啮齿动物，那嘴和小黑眼睛又像老鼠，它们有空就咬它们的小木板房，以磨砺不断生长的牙齿。马霞每天在工作之余，总要来到凉台上看望小金丝熊，向它们问好，和它们说话。马霞说：“应该给它们起个名字”，大家讨论了很久，才一致同意：现已有七人，按序号接排，叫“小八”、“小九”。

每日吃完晚饭，就“放风”把它们从笼子里放出来，两个家伙扭着屁股跑得挺快，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过了一个多月，它们生了一窝“小的们”。由于我们经常给它们放风，他们要求自由的愿望加强了，经常用嘴掀动笼子的门，有几次已逃出来，跳到窗台上，又被我们抓回来。有一天忽然发现“小八”不见了。大家把犄角旮旯找遍了，没找着，后来看到地漏雨水管的盖没盖上，才惊悟到老鼠喜欢打洞的本性，一定是从这个小洞摔下去了。这个洞太深，从二十四层直通楼下二层，高50多米。根据这个推测，我们俯瞰二楼管子出口的平台，果然有一个金黄的小东西。大家都惋惜它的去世，外婆对周帆说：“我们应该用小盒把它装起来，埋在树下。”别人看来，大可不必对一只死老鼠这么费心，而我们照外婆的话做了，给仓鼠举行了一个简单而严肃的“葬礼”，实际是从心里表达了我们没有饲养好小动物的一种忏悔心情。后来金丝熊繁衍了一代又一代，最后累计到“十五”。

马霞所带来的新型文化和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氛围，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现在，就连十岁的小侄子“刀刀”表现也很突出。在参加“自然之友”观鸟小组活动时，我们听高老师讲鸟的种类、习性和生态。他总是蹦蹦跳跳紧跟在高老师的身后，仔细听，仔细记。鸟和植物是分不开的，他看到树上有标签，就记下树的名字，再捡一片掉在地上的树叶夹在本子里，回去用电脑纸打印好相关资料，再把树叶贴在旁边，用塑料膜包好，装订成一个标本夹。

在绿色营十周年青年环保大会期间，我们也去灵山徐凤翔老师的“小木屋”参加了自然体验的活动。“刀刀”正好放暑假，跟着外公来到灵山。台湾徐仁修老师在多功能教室生动地给大家讲解昆虫的种类和形态，讲毛毛虫哪种有毒，哪种没毒，怎样进行自



我保护，还打出幻灯片给大家辨认。“刀刀”听得聚精会神，老师说到风趣之处他就哈哈大笑。天黑了，徐老师领着大家在生态园里夜行观察昆虫，“刀刀”兴奋得不得了，赶忙向别人借来手电筒，背着妈妈的照相机，一步不落地跟着徐老师。他在作文中是这样写的：“最有趣的活动，是台湾来的徐仁修老师，带领大学生晚上夜行，观察小昆虫夜里在干什么，我有幸参加了今晚的活动。我们有好长的队伍，隔几个人有一个手电筒。我们看见了许多可爱的萤火虫，闻到了野草的芳香，看见了在睡觉的美丽的蝴蝶，手电筒照到翅膀上可以看到很清晰的花纹，我们还看到刚脱完皮的螳螂，看到一种叫电车的有毒的毛毛虫，这种毛毛虫是非自然颜色，五颜六色，异常鲜艳。它身体很短，身上有一些像窗户的斑点。又看见了像飞碟的毒毛毛虫，我都拍了照片。我们还看见两只野鸡，有一只差点被徐老师踩着了，仆地飞了起来，吓了我一跳，另外一只也在不远处飞走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又看见了好几只螳螂。”

观察完昆虫回到多功能教室又听徐老师做夜行总结。“刀刀”平时晚上九点准睡觉，那晚入了神，听到十一点，比平时上学勤奋多了。

父亲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环球绿色行》，这也是他和马霞的共同劳动成果，里面记述着他们用自己的双脚走过的一个一个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也是第一次用笔把自然界最生动最美好的东西展示给大家，当看到大自然遭遇破坏时他就像自己遭遇不公一样痛心疾首，竭尽全力地向社会呼吁要拯救大自然，保护大自然。马霞去世了，父亲继承着她的精神、力量和哲学，继续奔走在绿色的征途上。他们共同创建的大学生绿色营，迄今已经十二年，父亲继续写文章写书，继续到全国各地演讲环保。他在《七十五岁这样走过》的文中有这样一段：

“全年中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多，是从3月11日到12月7日期间，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巡回讲座。在十七个城市讲了130场，重点在96所高校讲了103场。如果按每场平均240人计算，则听我讲的人数是3万多人。如果把历年听讲的人数都累计在一起，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作个夸大的比喻，孔子有弟子三千，我有听众十万。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父亲毕竟高龄了，我们不放心，他到各地演讲时我们便轮流陪同。久而久之，就觉得这不仅是亲情照顾，也是体验环保、学习环保的好机会。和爸爸一起，我们接触了那么多事，那么多人，那种激情的场面，那种真挚的情感，那种环保的信念。马霞说：“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环保圈子里的人和社会圈子里的人就是不同，年逾八十的环保老人何存济前年读了父亲的《错错错》，便在清明节寄来200元，要求我们替他买两个花篮，献给我的两位母亲。也因为这点，我和这位老人便成了“忘年之交”，他赠送我书，还约我们去他们家乡的雁荡山。新疆伊宁天山林业局离休干部高志毅也因为读了《环球绿色行》而和爸爸结成“莫逆之交”，他说：“等有机会去北京，我一定站在马霞的墓前用英文和中文背诵她的那个讲话。”最近我妹妹全家去新疆旅游，还专程去看望了他。他激动得不得了，把妹妹送到机场还不够，一定要看到飞机起飞了才回家。这种扎根于绿水青山和子孙万代的绿色情结，不仅发生在父辈之间，而且传递到第二代、第三代。我们在缅怀自己的母亲，社会也在缅怀我们的母亲。

# 我奶奶也可以当法官

-----贺卫方教授讲从《法院组织法》的修改看中国司法改革

【记录和整理者武宜三按：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 2007 年 1 月 16 日在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从〈法院组织法〉的修改看中国司法的弊端和改革》的演讲，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贺卫方教授不仅是一个备受赞誉的法学专家，而且是一个直面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近年常到全国各地演讲，宣传法治、宪政理念；因而又有“巡回教授”、“社会活动家”的美誉。他的这次演讲同样以他广博的学识、道德的勇气、惯有的风趣、生动的言语，使座无虚席的演讲厅不时爆发出快乐的笑声。本文根据现场记录整理，大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 一，“国中之国”与“五十年不变”的落空

中国司法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但一定会对香港发生影响。例如《物权法》就使香港人在大陆的物业、财产可能有了保障；“居港权”、“二十三条立法”的争拗，也说明中港之间在法律上的关系十分密切。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法院享有司法终审权，有人认为这是联邦制；其实这不是联邦制，而是“国中之国”制。例如，美国是联邦制，美国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定可以被上诉到联邦法院，而联邦法院也可以否决或裁定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国的最高法院却不可以接受来自香港终审法院的案件上诉。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法律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依英国的法律传统，立法机关只管立法，而解释法律则是法官的排他性权力。因为一、后来的议员无权为以前议员所制订的法律解释其含义；二、议会是集体行为，所立的法例是混合了集体意志的产物；个别议员不可能清晰地认定法律条文的意义；另外，立法机关解释法律也不具可操作性，如果法院要依靠议会解释法律的话，那麽就有千千万万的问题等着议会来答覆。

法律五十年不变，但法律解释的方法变了，那“五十年不变”就沦为一句空话。谁来解释《宪法》，谁来解释法律？是普通法的基本规则；中国立法机关应该尊重香港司法机关对法律的排他性的解释权力。香港法官也可以为大陆司法改革树立范例、做点启发性的工作。

现在中国法律界、司法界跟香港交往很少，但跟美国又来往频繁。“睽在眼前常

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可能是大国心态作怪，对六百万人地域内行之已久、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反而不加以关注。

## 二，我奶奶也可以当法官

大陆司法改革的重大课题是对《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八十年代以来每次开全国人大都有人提出修改《法院组织法》；法官的选任，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后二十多年根本没有任何标准的，到一九八三年才规定“担任审判员的人应当具有法律知识”。这条规定和没有任何标准同样让人害怕，什麼叫“应当具有法律知识”？

我奶奶虽然是文盲、不识字，长期在农村生活；但我觉得她有法律知识，例如她经常说“小偷不犯死罪”，後来搞“严打”，把小偷也判了死刑，我奶奶就觉得违反了她的法律知识、不可理解；她还说过“不义之财不可贪呀”之类，这些都是法律知识。按《法院组织法》，我奶奶就可以去做法官。实际上，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国法官中有太多像我奶奶那样的人，但品德还远不如我奶奶。如山西省绛县法院的“三盲院长”即文盲、法盲加流氓姚晓红，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令人震惊。

## 三，王海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里

中国的《法院组织法》弊端丛生，有许多问题。

1、法院完全不能独立於行政与地方。《宪法》、《法院组织法》有“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规定，但故意漏去“不受任何政党的干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社会团体，它是超国家团体。

宪法也不列举人大(立法机关)，在宪政国家立法与司法要非常严格区分开的，但在中国则不然；《宪法》说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不说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里面的奥妙，就在於大家都知道全国人大并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现在人大与司法机关的关系非常混乱，如前人大委员长李鹏就特别热衷於“个案监督”，这样就把立法机关变成了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同时兼任司法机关，使司法程序也变得非常混乱。

说行政机关不能干预，例如总理、各省长虽然不能以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但他们可以用党的名义来干预，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党的领导人；温家宝是总理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省长往往都是各省的副书记。更严重的事实是：各地方法院的人事、财政都为地方所控制。财政方面受制於地方政府财政部门，人事则受制於同级党委组织部门。

2、法院内部等级森严，完全是行政化的体系。没有法官的独立性，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法院内部非常突出。院长权威至高无上，除了上级法院，没有人可以挑战院长权威。所以法官没有独立於他的上级和同事的所谓独立性。

3、上下级法院间也是行政化的关系。下级法院的案件审判往往要听取上级法院的指示，而上级法院也有直接指示下级法院办案的情况；这样一来，等於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是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所谓一审法院、二审法院也就形同虚设。

4、法院组织结构经常处在变化中。常设法院对保护人民权利有重要作用，如果司法机关结构不稳定的话，人民的权利也就变得不稳定。特别法庭、临时法庭盛行的地方，一定是没有人权保障的地方。例如经济纠纷调解中心、房地产厅、离婚法庭纷纷出现，使法院组织结构如孙猴子的脸七十二变，违反了《法院组织法》。中国司法方式的高度灵活性反映了司法原则以及法律规则的多变。

5、法院不能履行必要的法律统一功能。在中国，需要统一的东西从来没有统一过；不需要统一的偏要统一，例如人们的思想。跨地区的案件诉讼，如两省间的企业纠纷，在任何一省审理都不会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好象踢足球之主客场，在主场法院审理，结果多合乎预期，在客场则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

法律的术语的概念和含义，直接关系人民的权益。例如打假英雄王海先生利用《消费者权益法》四十九条来发财、致富，非常有创意。但是在什麼叫“消费者”的解释上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各地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什麼叫“消费者”都有不同的解释。让王海先生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里。

#### 四，诗歌治国的弊端

各省的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其主要功能应该致力於法律的统一和对《宪法》权利的保护，比如怎麼保证一个案件在不同地区例如上海和湖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审理？而不应该致力於案件事实的审理和政治控制。

充满严重的地方主义的中国，司法也陷入了地方主义泥淖而不能自拔。从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传统看，中国缺乏对法律统一规范的追求，缺乏专业化的法律系统；也没有追求司法专业的传统，古典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中都存在着压制或贬低法律职业的倾向。

科举考试也极大压制了法律专业知识。历史上除北宋的短暂时间考过律学外，绝大多数时间的考试都排斥了律学。苏东坡说：“读书万卷不读律”；通过科举考试准备做官、做官後要审理案件的读书人，都对看起来繁琐的、不那麼美妙的律学不屑一顾。

中国政治传统都有一种对美学意义上的追求：气势恢宏，羞涩含蓄，所谓为政不在多言，追求用文学的方式治理国家；领导人经常写诗。中国领导人动辄写诗在报纸上发表，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江泽民上一次黄山下来就有《诗二首》，末尾一句“日破云涛万里红”，便看得大家心惊肉跳；有人作了可能是过度的阐释：云涛、指胡锦涛；红、指曾庆红；这麼一演绎，问题就大了。当然，这样解释保不住也有些道理；例如余英时先生就发现了陈寅恪诗中的“暗码系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用这套“暗码系统”一看，原来陈寅恪的诗都是反诗；余先生眼光独到，从陈寅恪送太太几首诗中读出了他对太太的忏悔，因为当年他没听太太的话逃出大陆。

中国有诗人治国的传统。明朝时，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最大的感慨就是中国遍地都是诗人。大家见面都是问写诗了没有，法官也用诗来写判词，写起来讲究用典、对仗、文字色彩，读起来摇头晃脑。所以一直没有发展出一种专业化的司法体系，不追求司法职业本身应当追求的严谨、准确和稳定的目标。

法官独立於其他同事和任何权力机关，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是使案件判决变得明确、清晰并责任清楚，一个法官就要为自己的判决负责。可是中国司法却大而化之，变成“日破云涛万里红”那样的不可捉摸。

## 五，小河边、柳树下、坑头上的浪漫

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都强调中央动员这种社会模式，强调所有的人都服从一个人。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於举国动员，就象倾全国之力争奥运金牌一样。但这把不同行业、不同分工模糊了；例如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差别往往被忽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做一切事情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台湾人到法院打官司，但法院里没有人，守门的告诉他：因为有上级来视察，市长让院长带全体法官扫街去了。台湾人大为惊骇：“这是现代国家吗？法官还干这些事？”其实，我们的法官要干的事多着呢。如抓计划生育、收粮、收钱、修路……据说这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实际上，效率是建立在严格分工、尊重行业的基础上。比如，司法就得让它独立，上下左右都互相独立。有人写文章说，我们法院也要上下一条心；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最高法院是全国法院的头脑；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逻辑。几十年来，中国就因中央动员能力过大，造成了许多悲剧，大家都往一个错误方向使劲而没有纠正机制。这正是中央动员体制带来的问题。

费正清教授在一篇文章中问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会在美国发生吗？例如有一天总统号召人民要对民主党内的走资派开展斗争，全国人民都被发动起来了：教会说我们拥护党中央，工会也说我们拥护党中央……这种情况之所以不会在美国发生，是因为任何一件事，在美国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在多元化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正是它没有办法实现很容易的动员，才使得它不犯很严重的错误。人民，没有比人民更懂得处理自己的事务，更懂得主导自己的思想，更加发挥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根据社会主义司法学说，共产党有对司法的绝对领导权，法院内部也是党领导，法院院长同时是党组书记，所以司法本身没法独立。司法的大众化，可以在小河边、柳树下、坑头上随时随地审理案件，而反对审判的仪式化；以及突出司法的教育职能等社会主义司法实践，都对司法改革构成了障碍。

## 六，去法院“人民”化的风波

二〇〇三年下半年，最高法院请我和另一位学者张志铭教授主持搞一个《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我们兴冲冲地收集了世界各国的资料，搞了一部五十条的建议稿。其中第五到第八条确立了法院组织上的基本原则：

5、【法院机构设置的法定性】法院机构设置要稳定。非经修改本法，不得变动法院内部机构设置，不得设立特别法庭。

6、【法制统一的保障】法院的设置应有利于法律的统一解释和适用，以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

7、【法官独立】国家有义务保障法官独立裁判，不受来自法院内外的一切干预。（另外在下文里规定法院院长由法官兼任，即法院院长不在法官之外，也不在法官之上）；

8、【上下级法院互相独立】上下级法院应互相独立决策，以确保审判的审慎和公正。

中国司法许多弊端还因行政区划而产生。立法、司法也陷在行政区划之中，在行政权力控制之下。在三权由党所控制的同时，又导致立法权、司法权被行政权所



控制。为了克服这个弊端，需要设置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司法区划。有人提出设立七或八个大区法院；但我觉得民政部提出设立五十个省市的构想，更可能为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脱钩提供新思路：取消海南省和四个直辖市的高等法院，保留原二十九所省高等法院来管理港、澳、台之外的四十七省市的司法事务。这样高院管辖范围与各省市之疆域必出现犬牙相错现象，令高院的人事、经费脱离地方而归中央管理，实现司法的统一性及改善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

法院还叫不叫人民法院？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我建议把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去掉；因为叫“人民”叫得最多的国家，恰恰最不善待人民。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轩然大波。首先是愤青在网上大骂，把这上纲为去“人民”化而与陈水扁之“去中国化”相提并论；这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和不满，最高法院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说那是贺卫方的个人观点，决不能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将永远做人民的法院，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人民的司法工作。

## 七、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失败了

最後，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通过的《法院组织法》只修改了一条，就是把死刑审核权收归最高法院。对此，我只能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失败了。”

陈光诚案和高智晟案已经政治化了，程序已不能用法律人的眼光来看待；在美国，所有政治问题都可以用司法手段加以解决；而中国则相反，任何一个司法问题都可能转化为一个政治问题。

例如王天成告周叶中学术剽窃案，原是一宗普通的民事案件；只是因为原告人由於主持一个地下党派被判过五年徒刑，被告人曾在中南海给胡锦涛等人讲过法治课，是“南书房带刀行走”，是“皇帝”的老师；於是政治化了，於是有人放话：不能判王天成胜诉，不能叫“敌人”胜了。

现在确实存在党对司法的领导、控制越来越强的现象。由於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越来越稀薄，党对司法的领导已经变成了具体官员对司法的控制。地方官员是否代表中央的意志？没有人可以论证。但是，人们看到的是，各级党委的政法书记对法院、检察院的控制越趋向於严厉。而且政法委员会头头往往由公安部门首长来兼任。我在所谓新西山会议上说过：在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或号称走向法治宪政的国家，居然让最高法院院长向警察头子汇报工作；这是不可想像的，然而中国就是这样。

现在具体官员对司法的干预，已经完全失控，最高当局根本不能扭转这种倾向而

成为对许多恶行的背书，也许他们并不想这样做。有人说，因为现在法官素质低，所以需要上级监控。其实，这种监控适得其反；监控、干预的过程使决策责任变得模糊，弱化了法官的道德责任感、尊荣感；反正怎麼判决是上级决定的，他有什麼责任？从而使不少法官变成为一群无耻的人，什麼钱都敢拿，什麼饭都敢吃。他们没有权力，他们当然也不能为别人所尊重。所以，现在连律师看不起法官了，因为律师只要把院长“搞掂”，法官自然不在话下了。

其次，实行监控的上级之素质一定比法官高吗？例如法院院长就要比一般法官有更多的顾忌。法院院长见了市长、市委书记，要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於公他要向地方党政要钱，维持全院的生存；於私他可以在巴结之中得以升迁。所以，我不相信这种监控越多会越公正；相反，不要这种种所谓监控，倒会使判案责任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而让法官自己对自己的案件负责。

我明确主张判决书要在两小时内上网全文公布。当大家都能看到有一个法官对一个案件怎麼判决、一生中判了多少案件、都怎麼判的时候？就一定可以大大压缩法官腐败的空间。现在，有的判决书是假的，甘肃一个法官在判决书上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第三条判决如下……可是，你们知道，这个国家压根儿就没有《新闻法》。

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党委既变得地方化又变得个人化了，地方党委是为地方利益保驾护航，是地方利益的看门狗；已经没有了全国一盘棋和全党的概念。干预的结果，将使我们永远走不出这个体制。

## 八，尽管障碍重重，但我并不悲观

我把《宪法》一条条看下来，看得我心灰意冷，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节约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的权利”，很不规范。法院院长理论上同级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决定的；组织部门决定了，叫人大举手通过。

还有向人大报告工作问题。原来只有政府向人大作报告；後来法院提出，我国是一府两院体制，为什麼政府可以报告，两院不可以报告？结果，现在《报告》成了两院的恐惧，老怕被代表们投反对票。中国司法的改革，固然要高层的开明，但国民观念的改变也很关键。

我们要把党纳入法律的框架之内，党不能老在法律之外而无法无天。民主、宪政的目的就是把领导人变成关在笼子里驯服的动物，一定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危害人民。

这二三年执行死刑的数量听说有所减少，现在对贪官判死刑可真是少了；如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受贿加财产不明来源计一千三百多万，只判了死缓。中共中央是否决心大规模地减少死刑，既保障国内人权，又保持与国际对话途径？中国现在刑法中有六十七罪名可处死刑，中国刑法可否修改？以减少死刑数量。孔子赞赏的一句话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肃杀之气、暴戾之气越来越少，人就越来越珍惜生命。我相信废除死刑的目标最终会实现。至於冤假错案，这是由於过去从事死刑复核与二审经常是同一批人，覆核形同虚设；规在将把复核与二审分开，所以相信冤假错案一定可以减少。最高法院覆核时能有严格标准，也可以纠正一些冤狱。

生活在中国的人是不能悲观的。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有太多的灾难，对社会弊端、人们的冤屈，乃至高层权力的归属，居然周期性地依赖农民起义、战争来解决。现在中国人民应该感到乐观，因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社会主义已经不被我们所相信，当年的妄想、迷信全抛弃了；我们不再梦想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法官才是好社会。我们已经变得现实了，而上一代人革命失败的教训，也使我们相信暴力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都信奉只有通过和平的和渐进的方式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经过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失败试验，使我们相信只有法制、民主、宪政才是必由之路。司法改革是头绪很多的工作，可以从各方面、不弃微末地努力。如证人保护、律师制度、法官庭审模式、判决书公开上网等等，这些环节一件件地积累，便可一点点地提升司法的公正程度，取得人民的信赖，形成制度表现与人民评价之间良性的互动。人民对司法信赖度提高了，法院也越来越公正了，一来二往，最後发现政治制度也变了。

首發《信報月刊》2007年4月號

# 这是最后的斗争，也是最后的牺牲！

——序叔平先生《秋望三部曲》

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

##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秋望三部曲》出版了！

《秋望》在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呐喊声中，在庆祝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欢呼声中面世，将有特别的象征性、纪念性的意义。

因为叔平和刘晓波都是新中国的囚徒，都是以言论而获罪。

现在刘晓波先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叔平先生也许就是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为他确实写出了那个苦难的时代，写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和巨大不幸。

我的朋友焦国标副教授抱怨说，“60年来文学文献一片空白”。（《苹果日报》2010年11月1日）国标说的当然是中国国内的情况。

国外，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如宋永毅、丁抒等编辑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杨继绳的《墓碑》等等，都是了不起的贡献。

文学方面，现在也有了。

这就是1957年受难者殷叔平先生的《秋望》！

这是一部长达170万字的巨著。

这是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叔平先生的《秋望》，几经波折，终于在香港这个英国前殖民地出版了。

这是又一件让真诚的共产党员们蒙羞的事：不知老共产党员、老干部、老共军辛子陵先生又怎样为他“伟光正”的党难过呢。

2010年9月25日，辛子陵在欢迎被渭南警方绑架的《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被释回京的座谈会上说：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说：“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时间过去了7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

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

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这里，我想纠正辛子陵先生的一个说法，“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真的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吗？当然不是，当时不但有民办的报纸、刊物，如《大公报》、《文汇报》、《观察》等等如点点繁星，遍布中国各地；更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安定团结、破坏全国统一、叛国敌对的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公然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陪都重庆公开出版。

试问，现在国共又“合作”了，共产党敢让《中央日报》在北京复刊吗？

辛子陵先生又说：

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这个共产党太让它的忠心党员失望了，他们已经以这个自吹是什么“先进代表”的党为耻辱了。它既不如“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也不如被这些共产党员所打倒的国民党，更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多么可耻呀！

辛子陵们自认“有历史局限性”，他们念念不忘“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李锐诗句），虽然“廉颇老矣，一饭三遗矢”，仍然发起新的一波签名运动，辛子陵、李锐、胡绩伟诸老又给全国人民（被）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写了公开信：《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此信已经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

這封公開信將會繼《零八憲章》之後，而成為另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敝人忝列第二批連署人，不勝榮幸。

辛子陵说，去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是23万起，不仅是民心思变，而是已经是民变蜂起。维权运动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三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当局把工农兵都往绝路上逼，连有几十年中共党龄的老干部也成了“维稳”（专政）对象。辛子陵先生问：你这个政权还依靠谁？

其实，这个问题不问可知，当然还是暴力和谎言。

中共一小撮分赃集团和历代必定覆灭的王朝一样，一定会在挣扎中走向死亡的一一它也逃不出所谓“捣乱--失败--再捣乱--最后灭亡”之规律；只不过它现

在财粗气大，可以不断的增加维稳经费和军费，靠豢养的大批警察、特务、网警、五毛党和军队，而还能苟延残喘一时而已。

这也就是叔平的《秋望》和辛子陵的《放言救党论国是》、李鹏的《六四日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等等一样，都要在香港出版的原因了。

刘晓波虽然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就是中共分赃集团继续和国际社会、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证据。

《秋望》在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呐喊声中，在庆祝刘晓波得奖的欢呼声中面世，将有特别的象征性、纪念性的意义。

因为叔平和刘晓波都是新中国的囚徒，都是以言论而获罪。特此记录。

现在刘晓波先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叔平先生也许就是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为他确实写出了那个苦难的时代，写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和不幸。

《秋望》作者叔平先生，当过共军，是中共党员，写过歌颂共产党的小说、诗歌，是一个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跑的人，可是共产党却把他打成极右派分子。

叔平先生有什么罪过呢？一，同意“党天下”说；二，反对“以党代政”；三，为流沙河、张贤亮、南京的“探求者”叶至善、陆文夫、高晓声及《延河》编辑部的余念（玉泉）、王愚等辩护；四，说了一些主张独立思考和民主自由的言论等。

这些在全世界人看来，都不过是常识的东西，却被毛泽东、共产党看成洪水猛兽，于是被开除中共党籍、“开除公职”、送去马栏劳教农场和上矜子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

《秋望》共三部，长达 170 万字，是一轴苦难的漫长画卷，它记叙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正义良知、民主自由的百年痛史，血泪斑斑，尸骸遍野，是毛泽东共产党统治下中国这个 960 万平方公里大监狱的缩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共产党黑暗、血腥、惨无人道的半个世纪统治下的血泪帐；囿于资金，现在同读者见面的只是第二、第三部，这两部主要是写作者从 1957 年起被折磨、被迫害的 20 多年血泪记忆。

### 《秋望》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不同的只是，苏联只有一个古拉格，中国却有千千万万个古拉格。

作者作为 180--310 万（其中 55 万于 1979 年被“纠正”）各种各样的右派分子中的一个，在中国西北的监狱里被关押了整整 22 年的囚徒，他的记录是真实的。作者文风质朴，像写日记一样，给历史和后代留下了血淋淋的记忆，也给将来审判作恶者准备了呈堂证据，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小撮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部纪实小说中，有一段描述耐人寻味：

就在 5.1 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邵管教代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郑重地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解放台湾的进攻战



开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要剿灭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彻底解放台湾的决心付诸实施了！”几乎所有劳教人员，都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方式，振臂欢呼，指天划地，敲打身边一切可以敲打出声响的东西，是夜，我兴奋无比，彻夜激动亢奋！我甚至钦羨又崇敬地想象着我们正在海上浴血攻击，在漫天漫海的战火和枪林弹雨中，呐喊厮杀，瞬间负伤牺牲，仍一往无前的英雄群像，并深为自己未得亲自参与而羞惭……沸腾的思绪，喷涌的内心情感，使我情不由己，奋笔书写了一首欢呼台湾解放的诗。

自己都被当作反动分子关在监狱中，正遭受着种种非人的待遇，却还在表明自己也有爱党爱国的“进步”。人们不禁要问：就这样的都是反动派，那海峡对岸的岂不是更加反动透顶，死无葬身之地了。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这就是当时的荒谬现实。

右派分子遭受非人的待遇，饥饿、劳累、肮脏、酷刑、毫无人的尊严，但他们还是要活着，那怕连牲口也不如地活着。这不仅是 180--310 万各种各样的右派分子的悲哀，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当然，人们也可以这样问，这些人也是反动派？把这些好人当作反动派的毛泽东、共产党一小撮是不是疯了？确实，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毛泽东、共产党的反人类的反动本质。

毛泽东及其一伙，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同时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就要不断的制造恐怖和谎言。“团结 95%”就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最大谎言，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以“团结 95%”为借口，打击、杀害 5%的“一小撮”。但是，一次又一次的 5%，就使每一个人都有受到迫害、杀戮的危险。

例如，土改的积极分子可能是三、五反运动的大小的“老虎”，三、五反运动的积极分子，可能是肃反运动的反革命分子，肃反运动的打手有可能是整风运动的右派分子；1957 年的左派可能是 1959 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历次运动的得益者，在文革中又通通变成走资派、叛徒、特务……

所以，自中共上井冈山以来，死于中共屠刀和暴政之下的中共党员、中国人民估计达 1 亿之谱。

仅仅文革浩劫 10 年中，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承认：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就达到 2,000 万，受到迫害的更达到 1 亿人。按共产党的习惯，这当然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革命是疯狂的绞肉机，每一个“革命者”都有被绞进去的可能，被害、被斗、被关，被饿死、被杀害。

因为这个制度既然不能保证 5%的安全，当然也保证不了 95%的安全。从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到普通老百姓，概莫能外。

刘少奇（打倒王明、打倒高岗、打倒彭德怀、打倒彭真，最后打倒了他自己）、林彪、赵紫阳（手上至少有广东人的血）、彭德怀（批判教条主义和抓右派分子，绝不心慈手软）、罗瑞卿（镇压反革命的刽子手，最后自己成了反革命）、李震、刘传新（以上二人，在为毛泽东屠杀了许多仁人志士后，自己也悲惨的落得自杀

的下场)、陶铸(仅仅在两广,就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土匪”、“地富分子”、地方主义分子,血债累累)、江青、潘汉年、陈绍基,等等,在他们享有特权的时候,是从不把别人当人看的。一旦沦为阶下囚,别人同样也不把他们当人。

毛泽东一死,他的老婆、侄儿马上成为罪犯,他也就成了全中国最伟大的反革命家属了。

如果说这是报应的话,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只相信特权,而不相信制度。

中国人太不肯反思,不肯总结教训。你看,现在那些官员(从中央到地方)、警察、国保、特务、城管、拆迁队、文化稽查队、扫黄打非办,仍然穷凶极恶,与民为敌,实际是在自掘坟墓而不自知。

刘晓波的《零八宪章》是给了中共一个下台阶(这就是所以部分人士要批评和咒骂刘晓波的原因),而中共居然把他投入监狱,实在是利令智昏。

毛泽东说:“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3卷,730页)

现在拿来当年攻击、诽谤国民政府的话来批评他和他的党,不是更恰当吗?这真是天大的讽刺——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

李自成围困北京城时,有人建议崇祯皇帝拿出宫中的金银财宝来劳军,但是皇帝舍不得,结果城破自杀。

宁可死,也不肯把既得利益与别人分享,哪怕只是拿出一点点。例子代代都有——就是因为统治者太相信自己的权力,太相信镇压,太相信屠刀。

请中共领导人和一切既得利益分子好好想想这一类史不绝书的“教训”吧。

让别人活下去,是你们自己也能够活下去的最佳保证,请放过刘晓波,放过一切异议人士,平反包括反右派运动在内的一切冤案!把一切属于人民的权利还给中国人民。

为了留下记忆,留下证据,作者说,“我已将我的房改房向银行质押,贷了10万人民币。如果出书后我遭逮捕,我也不再需要住这个房子了;若不入狱,我就还贷。”

1979年,叔平先生大义凛然地拒绝了中共恢复他的中共党籍的决定,2010年,叔平先生又一次做出重要的决定——毁家出书。

对一个1936年出生、历经苦难的老人来说,这是他最后的斗争,这也是他最后的牺牲!

我向他老人家致敬!〔中华民国99年10月25日于流浮山寨,11月2日修订〕

## 代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起草《命令》

中共中央 中央軍委 國務院 中央文革  
命令中發[2010]250 號

-----

鑒於馮正虎同志成功佔領日本國成田國際機場第一空港南翼大樓入國審查大廳部分地區逾 82 天，根據國際慣例和中國“雖未稱國而王其土”（《宋史·夏國傳》）的傳統、國情，該大廳長 2 公尺、寬 2 公尺的地面及其附屬物，已經永遠歸屬於馮正虎同志。

為表揚馮正虎同志為國立威和鼓勵他的開拓疆土奮鬥精神，中央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田特區，並委任馮正虎同志為成田特區第一任總督兼特區三軍總司令，授予中將軍銜，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薪水比照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月工資 8,964 萬成田特區元。

中央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學習馮正虎同志，繼續出擊，更多地佔領其他國家的機場、碼頭、車站，以顯示我偉大帝國的和平崛起。

切切此令。

中共中央主席 胡某濤  
中央軍委主席 胡某濤  
國務院總理 溫某寶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江某青

2010 年 1 月 24 日於北京

## 香港五七学社代表致辞

武宜三

2012.6.10

小姐们、先生们、各位朋友，星期天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 5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其实应该在北京、上海或者广州开，应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举办，或者中共中央统战部，甚至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来举办。

但是，现在做不到，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做到，否则，我们中国就活该被开除球籍了。

我们五七学社算是“不自量力”了。廖天琪（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说，这个世界的正义和人性就是靠一些“不自量力”的人来维持的。她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的确，我们的研讨会得到很多好朋友的支持。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没有办法光临这个会场。

我们真想不到的，我们这个研讨会居然成了有关部门 2012 年的“监控重点”，全国许多地方的右派老人都受到劝阻、被谈话、被喝茶，有的被迫退去飞机票、火车票，有的“被旅游”，上海当局甚至愿意买机票让右派分子宋林松先生夫妇去美国“旅游”，目的就是不让他到香港开会。当然大多数态度还比较客气，这也算是进步吧；但是，其紧张、严厉的程度，却是 1979 年右派分子被改正以来所没有的。

就这样，很多人就来不了。例如北京的任众、博绳武、杜高、铁流（以上是右派分子）、俞梅荪（右二代），上海的张强华、宋林松、徐绍华、谢英、孙正荃、罗全欢、谭蝉雪（以上是右派分子），彭志一、李斌（右二代）、裴毅然（学者），云南余永庆、赵正荣（以上中共地下党员、打游击出身的离休干部、右派分子兼地方主义分子），重庆蒋文扬、刘培黎、张正洪、敖其美（以上是右派分子），谭松、周复甦（以上是右二代），等等。他们很气愤，他们说，**右派不是纠正了吗？为什么还限制我们的自由？香港不是回归了吗？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自己的土地上走走？**

**不能来的还有唐锡阳（右派分子），章诒和、章立凡（以上是右二代），叶永烈、汪孝直、周元川（以上是作家）等，我们只有表示遗憾。**

**北京大学右派学生、后来是在湘潭师院和青岛大学当教授的谭天荣先生也想来香港参加研讨会，而且已经到了深圳，结果被堵回去了。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被堵住的。**

但是不管怎样，今天还是有些右一代、右二代、甚至右三代来了。大家从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目标就是“五七精神、薪尽火传”，那么什么又是五七精神呢？

我以为，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大家知道，这 8 个字曾经被毛泽东、共产党批得臭不可闻，到谈虎色变的地步。

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还要感谢来自这8个字故乡法国的朋友——白夏教授、魏简博士和他们的同事，他们的机构法国文化中心（CEFC）是这次研讨会的合办单位，现在欧洲经济状况好像不太好，但是他们的单位还是拿了一些钱来支持这个研讨会。这是什么精神？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还要感谢另外一个合办单位，香港城市大学，它在这个黄金地段给我们提供了免费场地，也负担了一些费用，郑宇硕教授、张达明老师，牺牲了很多时间，贡献了很大精力，使我们的筹备工作能顺利进行。

我们还感谢今天出席我们研讨会的嘉宾，美国的魏紫丹先生，德国来的独立中文笔会廖天琪会长、学者潘永忠先生，澳洲的王旭先生，纽西兰的周素子老师，俄罗斯来的孙越先生，日本的瀚光先生、原博文先生，台湾的曾建元教授等。

还有北京来的著名记者高瑜女士、中共资深党员姚鉴复先生，右一代、右二代、右三代以及其他内地嘉宾，就不一一了。

我们感谢所有为研讨会出钱出力的各界朋友。感谢今天光临的所有中外朋友。

接下来，**介绍我们自己——香港五七学社**，香港五七学社是2007年成立的，主要成员是居住在香港的当年右派分子，右二代，以及同情者、研究者，很多人以为我也是右派，现在声明，1957年我还在福建读中学，福建没有在中学生里面抓右派，所以我不是右派分子。那么有在中学生里面抓右派的地方吗？有的。至少四川省是一个，**四川省在中学生里面打了很多“三类、四类”学生，这些学生不叫右派，但是享受右派待遇——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当干部，只能去农场、农村劳动改造，或者被升级为反革命分子。**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的年代裏》，讲的就是当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丰功伟绩。

香港五七学社成立5年来，在各方朋友、同道的支持下——

1、我们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40种（40多本）有关的回忆录、论文集、小说、诗歌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申渊（陈愉林）先生的《臥榻之側》、《五七疑雲》、《57右派列傳》（1—4卷）等。陈愉林先生1949年之前就参加了中共革命，是中共资深党员，党国的高级干部，可是他也是个右派分子，他晚年通过反思，开始潜心写作，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文章发表，是五七学社出成果最多的研究人员。

2、我们开通了网站57hk.com。每天收集、编辑《香港报刊论中国》，向超过12000个电邮地址发送。著名北京大学右派学生岑超南先生和难友合作出版了《北大精神，五七綻放》、《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1949年以來各界精英死難實錄》等。岑先生83岁了，仍然在为实现中国民主而努力，不断为五七研究出钱出力。他同时是香港优秀义工，北京大学模范校友等等。

3、我们在香港、台湾、日本等地方主持或者参与召开多次与反右派有关的研讨会。接受报纸、刊物采访。我本人正在编辑《1957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现



在已经收集了几万个案例，我们为抢救历史、保留记忆做了一些工作。

这一期《亚洲周刊》有五七学社的专访，非常感谢江迅先生和他的团队。

我们今天开会纪念反右运动 55 周年，那么什么叫做反右运动呢？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

所谓“反右运动”就是党国领袖、执政党对中国人民、中共党员，特别知识分子的欺骗、作弄、非法迫害甚至群体灭绝；“反右运动”的结果就是毛泽东、共产党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诚信，把这个党、这个国家，一步步引向说谎、欺骗、假大空。

55 年前的 1957 年，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信誓旦旦的保证“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各级领导反复动员，甚至说，你如果不提意见，就是不爱共产党；那么大家只好大鸣大放了，有的人还是挖空心思、没话找话来说几句。但是没有过几天，在 6 月 8 日这一天，毛泽东就翻脸不认人了，几乎把所有给共产党，给毛泽东，给中共党员，甚至给所谓“积极分子”提意见的人，通通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各种分子。

后来毛泽东自己说，他是搞“阳谋”，是“引蛇出洞”，就是有意叫你上当，然后“聚而歼之”——把你们消灭掉。

这种由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执政党给自己的人民、党员下套子，挖陷阱的事，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

这个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旦戴上这个帽子，就不得了，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九死一生，株连九族，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饿死，有的被自杀，有的被枪毙。这些苦难，下面的发言者还会介绍。

今天我特别提醒大家，随便“把你们消灭掉”的这个制度，还没有改变噢，从中共高级领导到普通老百姓，在这个制度下，都没有安全感，从过去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罗瑞卿，到今天的薄熙来、王立军，再到陈光诚、李旺阳，怎样从反右派运动吸取历史的教训，我想是今天研讨会的主题。

现在，有两个概念要纠正。

全中国到底打了多少右派分子呢？很多人都说是 55 万，现在我想纠正一下这个概念。所谓 55 万，只是中共当局在 1979 年“改正”的数字，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都保留一定数量的右派不予改正；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当时宣布不予纠正、平反的有：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涇、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甦、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勋（乐山市）、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等，共 21 名。（《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单》，冉云飞：《右派资料知见录》）1979 年以后又改正了几批。直到现在，还有人没有得到改正，北京大学数力系毕业班学生阎桂勋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严重的是，中共是个无法无天的党，一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就可以把别人随意打成右派分子，然后送去劳动教养，他不需要上级审批，更不要法院审判，所以



随意性太大，很难有准确统计数字。

大家知道甘肃省有个敦煌石窟，现在是旅游的热点。那里当年有个敦煌研究所，所长是常书鸿先生，研究所的中共支部书记是常先生的太太李承仙，研究所里有个画家，叫**毕可**，毕可因为是资格非常老的“老革命”，他没有把李承仙看在眼里，到1957年反右派中，毕可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给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结果在农场里被折磨死了。

多少年后一查，毕可的档案还在研究所常书鸿的文件柜里睡大觉，原来毕可被定为右派的申报，上级没有批准，把档案退回来了，但是毕可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档案就一直在文件柜里。这个毕可在不在这55万里面呢？我不知道。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毕可呢？谁知道？

据说，常书鸿先生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也是大大的好人，他死后，很多人写文章纪念他，可是在毕可这个案件里，他分明是个谋杀犯，至少负有领导责任，是个共犯。这可见，如果制度有问题，好人也会干坏事。

毕可的档案毕竟找到了，但是相信有更多人的档案没有了，因为中共的领导人都是农村、山沟里出来的，没有管理知识，不讲程序，没有规范，非常随意，根本不把人当人，根本不重视生命。加上它的统计数字也是为政治服务，所以更加不可靠。那么到底有多少呢？反右派研究专家丁抒先生，收集了100县的人口、右派数字，然后做了计算，他认为在180万左右。我也查了几百本县志，觉得180万这个数字，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个错误概念是“右派已经平反”**，很多右派分子本身也这么说，“我平反了。”告诉大家，右派分子只是被“纠正”、被“改正”，被“纠正”、“改正”的意思，说你不应该是右派，我把你错划了，现在让你恢复当年待遇、级别，如果曾经是党员、团员，被开除了的，现在恢复你党员、团员的资格。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你1957年是科员、工资60元，1979年改正了，还是科员、工资还是60元，同时1957到1979年被扣掉的20多年工资，也不补给你了。这合理吗？

不仅如此，它还让你感恩戴德，说“党给了你第二个青春”，于是有人就问了，“我的第一个青春到哪里去了？”

至于在这22年中，你受了多少罪，家人受到怎样的株连，受到多少精神、物质损失，都不管了。如果死了，被杀掉了，这里有个例子，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右派学生沈元，1968年，被迫害的受不了，用鞋油把脸涂黑，伪装成黑人，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去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被抓（告诉大家，跑外国大使馆，王立军同志不是第一个，第一个应该是清朝的康南海先生，他跑的是日本大使馆）；1970年，沈元以“反革命”、“叛国”罪被判死刑，杀了。到1980年，当局对他妈妈说，“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撤销”原来的《判决书》。“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人都杀了，“撤销”《判决书》，“宣告无罪”有什么用？非常荒唐。

**建议香港的青年学生、传媒记者，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和来到香港的右派老人交朋友，采访他们，帮他们做口述历史，留下记忆。这些老先生、老太太，**

都是国宝，而且是不可复制的国宝。大家一定要来好好珍惜一回。（演讲后有补充，首发《参与》）

## 衷心感谢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

新华网奥斯陆 10 月 14 日报道，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严厉批评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说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大错特错”的，“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

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公布一星期之后，我终于听到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批评，这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我们朋友遍天下”的论断并没有过时。

我中国共产党和胡锦涛同志除了有金正日这个讨债鬼之外，又多了一个欧洲朋友（但愿他没有向新华社索取昂贵或者巨额的采访费）。令我感动不已，这是一根救命稻草呀，证明毛主席的无赖阶级反革命外交路线还没有最后失败。

为了感谢科尔斯塔教授，我建议中宣部和外交部向科尔斯塔教授颁发“中国荣誉公民”状，最好动员他放弃挪威国籍，到中国当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代课老师，让他体验一下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中国岂止不是“不民主国家”，中国实在有太多的民之主。

科尔斯塔教授批评“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而科尔斯塔教授的居心却是非常“良”的。

科尔斯塔教授自己可以在外国记者面前肆无忌惮的批评挪威国政府和领导人，却不允许刘晓波批评他的中国政府。他的良心多好哦！

我非常感谢科尔斯塔教授把自己“平等”概念、“民主”价值、“居心”标准灌输给中国人民，帮助我党“维持稳定”，让我党能够千秋万代地把中国统治下去。功德无量呀，草泥马，谢科尔斯塔教授！

## 一副反动对联的故事

1961年春节，海南岛通什镇（现在五指山市），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团的五个独身的男性演职员，为了庆祝节日，一起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集体宿舍门口。

上联曰：

宫商角徵羽

下联曰：

陈黄林梁彭

横批是：齐鸣共和

宫、商、角、徵、羽，是古代表示音的符号，表现了歌舞团的特点；陈、黄、林、梁、彭，是这5个舍友的姓。对联无非表示，5个从事音乐歌舞的革命同志在一起庆祝佳节，自然可以通过合唱或者合奏（齐鸣）来表达欢乐的情绪，合唱或者合奏当然要合乎“和声”的原则。

但是，到了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开始，毛泽东号召大搞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什么狗屁事都可以被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于是这副对联就被打成了“反动对联”。

为什么是反动对联呢？就是因为有“共和”两个字。“共和”就是“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是宣扬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和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一唱一和。所以，罪莫大焉。

“陈黄林梁彭”中的“黄”，叫黄克，他原来是广东省惠州市的副市长，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下放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团当副团长，兼作曲，30多岁。是这五个人中“职务最高、年龄最大”，顺理成章的成了“头子和幕后黑手”，于是被逮捕“法办”，判了五年徒刑，送到矿山劳动改造。

“陈黄林梁彭”中的“林”，叫林可，小提琴手，27—28岁，是对联的执笔人，因为又是“历史反革命”，被送到林场劳动改造。

其余三个人，或者因为是“工人”，或者因为“态度比较好”，没有被处分。

1964年从广州音乐学院分配到歌舞团当小提琴手的黄来鸿，了解这个案件的全过程，认为是个冤案，应该给予平反。结果，他自己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为反动集团翻案”的坏头头，在1968—1972年间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实际上就是“劳改”。

## 给三妹并各同志信

三妹并各同志：武宜三向大家拜年！

谢谢你不断的耳提面命，我终于明白——

第一，刘晓波先生是个胆小鬼，他因为说了“我没有敌人”，才被轻判 11 年；他如果说“我有敌人”，那就一定没命了，所以他是由于贪生怕死才这么说。

第二，你们躲在最安全的地方高喊“有敌人”、“战斗”，当然也算是勇敢的战士，叫我佩服。只是，你们能否再勇敢一点，回到中国去（别告诉我，你已经入了外国籍，回不去了，呵呵），在北京或者什么地方，当面告诉共产党：你们是我的敌人。那样，我自然会更加敬佩。

第三，这个世界最轻松的一件事，就是叫别人当烈士，自己享受革命成果。例如，我就劝过你们中的一位朋友，不要真的动手杀共产党人；我就是怕他假戏真做，上了同志们的当。中国的烈士已经太多了。

第四，为什么“美國歷史，人家出現那么多的先賢智士”，我猜想，大概人家美国人不像我们贵国同胞这样喜欢咬来咬去，喜欢落井下石；见不得别人好；都是乞丐了呢，还要计较：你怎么要到了馒头，我才要到稀饭？都是狗了呢，还要眼红“你搶到的骨头比我大”。

第五，我的结论——姑且算“武宜三定律第四”吧——中国人不亡种灭族，那就没有天理了。

敬呈以上五点，供你和同志们口诛笔伐，以增斗兽场的热闹。

祝虎年

文运亨通，斗劲更足！

你的同志：武宜三

大年初三

-----  
【附】三妹 2010 年 2 月 16 日网上留言

中國苦難重重，似乎總看不到盡頭。我昨天與丈夫聊天，我說，回看美國歷史，人家出現那么多的先賢智士，一個接一個地不斷地涌現，甚至同時代就可以出現多人，這些人為了美國的民主前途立下豐功偉績。為什麼中國總是出現禍國殃民的小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是些心懷個人政治野心，投機取巧之輩。就我們的個人閱歷來判斷，劉曉波這個人實在不是我們可以相信的。（Diane Liu <dianeliu28@sbcglobal.net> 於 2010 年 2 月 16 日上午 5:30）

# 獨特的歷史景觀

## ——閑說太監現象

中國歷史上有一樣很獨特的東西，就是太監。太監文化或曰太監現象，很多人研究過了，但中共黨史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有這種太監文化或太監現象嗎？似乎肯公開承認的還沒有。我以為太監的歷史太悠久了，太根深蒂固了，要說沒有流毒，那是不可思議的。胡喬木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五十年代中宣部部務會議上，胡喬木當眾問陸定一：“你去(北京大學)擔任校長怎麼樣？”當時胡是中宣部付部長，而陸是部長。

中共建政後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也是由胡喬木以副部長身份主持會議，正部長陸定一反而充配角----做關於宗教工作的報告(《陸定一傳》，轉引自章世鴻《視野與思考》，中國文聯出版社.p33)。胡所恃者，他是毛澤東秘書，是毛派在文宣系統的“監軍”。

太監靠皇上，所以“毛主席是他依靠的支柱”，一旦失去皇上的信任，太監便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批鄧時，“這時毛主席對他不信任了，他覺得身敗名裂，看不到前途了，認為他可能翻不過來了”，“人就癱了。”(邢小群：《往事回聲·鄭惠訪談---我所瞭解的胡喬木》，香港國際出版有限公司，p23，以下簡稱《回聲》)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復出時，胡喬木作為鄧的得力幕僚，積極參與泡制《科學院的彙報提綱》等“大毒草”，或策劃于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竄下跳，以求一逞，可謂春風得意。但當毛澤東突然翻臉時，胡喬木便立刻臨陣倒戈，成了開敦義門納大順軍的太監曹化淳了。他一條條地把鄧的講話揭發出來，“最糟糕的是，他寫了一個詳細的揭發鄧小平的材料，這個材料除了一些事實之外，還有他自己的一些評價，這個評價也很不好。”鄭惠回憶說：“我記得有這樣的話：‘這個人(鄧小平)頑固虛偽’。這話就很曆害了。材料直接送給了毛主席，我們當時沒有看到。後來，在研究所裏發下來了，隔了多少年，香港《鏡報》不知是從哪里搞到的，全文發表了。這就使胡喬木的面目很難看了，這是喬木的一個很大的污點。”(《回聲》p22)

胡喬木雖然有了這個賣主求榮的“很大污點”。卻並不妨礙他後來收馬前復水，重投鄧小平懷抱，他為鄧起草“四個堅持”時，批判周揚異化論時，又儼然以鄧的秉筆太監或司禮太監自居了。



圍攻胡耀邦，顛覆趙紫陽，胡喬木再變成“奪門之變”中的太監曹吉祥，內外呼應，上下交攻，打倒了新皇帝，為太上皇作牛馬走。

因為太監是無性的，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天然的風派，胡喬木也不例外。李慎之先生對此有生動、深刻的描寫：

“胡喬木這個人，最左也是他，最右也是他，知道的沒有兩個。東歐事變，胡喬木給中央寫了個兩千字的東西，他的思想是加快改革！徹底改革，否則不行！陳雲給中央寫了二百字的東西，大意是我們必須警惕嚴防！陳雲二百字的東西，把胡喬木兩千字的東西壓得無影無蹤。他好幾晚上睡不著覺，胡喬木就是這麼個人。他怕犯錯誤，結果又犯錯誤了。胡喬木天然地就是這樣，或者說已經變成第二天性了，從此以後變了。”（《回聲》p53）

一九八七年撥亂反正時，胡喬木吹捧曼德爾《關於過渡時期社會的理論》“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一九八四年“清理精神污染”時，同一個胡喬木又“嚴厲批評”出版該書的人民出版社（吳江：《十年的路》）

一九八零年當他還要借助毛的餘威，還要靠吹毛保毛來表示他的堅定立場時，他曾含淚哽咽地制止他人批評毛澤東的錯誤，忠貞無比。一九八三年他需要向鄧邀寵了，這個胡喬木就又反對《人民日報》用四十個版面來紀念毛的九十周年誕辰：“那麼多文章，誰看？”不耐煩與不屑之情，躍然紙上。王若水先生“奇怪他為什麼變了”，繼而一想，才悟出：“毛畢竟死了六年了，而鄧還健在。”（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明報出版社）豈止是人情冷暖，豈止是世態炎涼，簡直把太監文化發展到極致了。

就這樣的一個胡喬木，卻被吹捧成“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忠誠的革命戰士”，“知識分子知心朋友”，“正道直行”……一些達官貴人爭著給他戴高帽子。原來這就是傳統，滿朝文武爭附魏忠賢，就是光輝典範，太監現象得以千秋萬代不絕種，不斷根，而成為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和傳統，實有賴於這些狗銜蠅營者，吹捧抬拉的轎夫們。

試看今日之香港乃至神州大地，不正充斥著無數的“五虎”，“五彪”，“十狗”和“四十孫”，他們跟在太監屁股後面，正與皇上和太上皇保持高度一致地幹著禍國殃民的勾當麼？

（2005,4,15 刊《新世紀》）

## 到底是你的還是我的？

——序山下清美《釣魚島為什麼是日本的？（圖片集）》

〔香港〕武宜三

由於中方“保釣人士”強行登陸釣魚島，引發了新一輪的中日外交風波。

在當代，對於解決領土紛爭等國家間的問題，只能在國際法的框架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

日本學者山下清美講師編輯出版了這部《釣魚島為什麼是日本的？（圖片集）》（以下簡稱“圖片集”）正是出於正視歷史、厘清真相的目的。她雖然不是專門研究歷史學和地理學的學者，但是她有常識，會根據事實來說話；她不搞機會主義，也不搞各取所需，所以她的著作值得各種立場和觀點的朋友的重視。

從日本井上清教授的《釣魚列島歷史與主權問題的剖析》出版後，40多年來中國和海外有許多這方面的著作出版。

我在30多年前就拜讀了井上清教授的著作，我敬佩他的勇氣，但是更讚歎日本社會的自由、民主、寬容、開放，日本政府和民眾都沒有把井上清教授打成“日奸”、“和奸”，沒有批判鬥爭他、沒有沒收他的著作、沒有送他去勞動教養。

### 一，“自古以來”不是理由

持“釣魚列島屬於中國”觀點的著作，大多數的根據是“自古以來”，但是我們知道，“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是變化的——從小變大，又從大變小，而且時分時合。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教授巨著《中國歷史地圖集》（1992年，香港三聯書店）再現了中國幾千年來領土的變化。譚其驤教授的得意學生葛劍雄教授在《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1994年，北京三聯書店）說：

*今天的中國領土已經不能包括18世紀中葉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華民國立國之初的領土，無法反映當時的實際。所以我們講歷史上的中國，應該以中國歷史演變成一個統一的，也就是最後的封建帝國——清朝所達到的穩定的最大疆域為範圍……事實上這一範圍並不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過鹹海之濱，元朝的北界遠達北冰洋，朝鮮北部曾經是漢朝的郡縣，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個布政使司（行省）。*葛劍雄又說：

*如果以歷史上中國最大的疆域為範圍，統一的時間是81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復前代的疆域、維持中原地區的和平安定作為標準，統一的時間是950年（見表）。這950年中有若干年，嚴格說是不能算統一的，如東漢的中期、明崇禎後期等。*

*如果秦始皇滅6國的西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為計算階段，第一標準的統一時間占總數的4%，第二標準的統一時間占總數的45%。*

如果從有比較確切紀年的西周共和（西元前 841 年）算起，前者約占 3%，後者約占 35%。

歷代統一時間起訖表

	第一標準統一時間	第二標準統一時間
年代起訖	1759AD—1840AD（清）	221BC—209BC（秦）
		108BC—22AD（西漢）
		50AD—184AD（東漢）
		280AD—301AD（西晉）
		589AD—616AD（隋）
		630AD—755AD（唐）
		1279AD—1351AD（元）
		1382AD—1644AD（明）
		1683AD—1850AD（清）
計	81 年	950 年

這樣我們可以有了一個結論：許多“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現在已經不是中國的領土了。而許多“自古以來”不是中國領土的地方，現在卻是中國的領土。（以下兩幅明代的中國地圖，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明成祖時期 1402—1424 的中國疆域

所以，我認為：到底是不是中國的領土，你盡可以找一萬個理由，但是千萬不要用“自古以來”做理由。



明神宗時期 1582 年的中國疆域，此時北疆萎縮至長城一帶，東北地區萎縮至遼東，西北地區萎縮至嘉峪關，青藏地區已不能有效控制，安南地在明宣宗時期恢復獨立。

山下清美講師“圖片集”收集了許多中日琉古代的地圖，這些地圖都被中方的“保釣派”學者、專家，當作“自古以來”“釣魚島屬於中國”的證據。他們的理由——

#### 1，是經過、發現、命名

“保釣派”學者、專家認為，釣魚群島是中國人經過、發現、命名的地方，所以是中國“固有”領土。但是，唐代玄奘和尚取經、明朝鄭和太監下西洋，都路過許多地方，其中難免有他們“發現”、“命名”的，並且做了文字記載的地方；特別是南洋一帶，就有中國人在明朝甚至明朝之前就在那裏居住、繁衍、生息，甚至有中國人在那裏當過“行政長官”，難道這些地方都可以當作中國的“固有”領土嗎？

#### 2，用中國話如閩南話、漢字命名

“保釣派”學者、專家認為釣魚群島是用閩南話命名的，因為閩南話是中國人的語言，所以釣魚島就應該是中國領土。

但是，世界上用中國話、中國字命名的地方，不知凡幾——日本、朝鮮、韓國、越南、蒙古、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境內，都有這樣的地方。現在被江澤民斷送給俄羅斯的庫頁島、海蘭泡、伯力、江東六十四屯……這些中國的“固有”的領土而今安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改為“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意為“東方統治者”），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不僅不以為恥，反而欣然接受，還高興地於 2012 年 9 月 6 日前往出席在該地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 3、塗一樣顏色

如鄭海麟先生在《釣魚臺列嶼——歷史與法理研究》（增訂本）中說，“淺草文庫藏林子平《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原圖複製，將花瓶嶼、釣魚臺、赤尾嶼等島嶼繪上與中國本土相同紅色，明確標示為中國領土。天明五年即 1785 年”。但是，臺灣卻被塗成黃色，難道臺灣就不是中國的領土了？

鄭海麟在同一本書中，又以法國人製作於 1809 年的《FORMOSE》來證明釣魚臺、赤尾嶼等為臺灣附屬領土，因為這些島嶼繪上與臺灣一樣的紅色；然而臺灣又與中國本土的綠色不同，仍然表示臺灣不是中國領土。這樣，這兩張地圖就發生矛盾了——釣魚臺等島嶼到底是屬於中國，還是屬於臺灣？鄭海麟先生在這裏提供了反面的證據——證明無論臺灣，還是釣魚島等，都不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

更糟糕的是，鄭海麟提供的約瑟夫在 1859 年製作的地圖《柯頓的中國》，它雖然證明瞭釣魚嶼等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卻又證明了東北、西北、西南等幾大片的土地不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做這樣賠本買賣的鄭海麟教授，是日本京都大學、東京大學等名牌機關培養出來的專家和學者。

### 4、“我的，是我的；不是我的，還是我的。”

例如用 18 世紀的地圖來說“琉球三十六島並不包括釣魚列島”等等，這個證據並不有利於中國。如果按照這些地圖來算賬，中國失去會更多。根據鄭海麟先生這種“原來是我的，現在還是我的；原來不是我的，現在也是我的”邏輯，來處理領土糾紛可以嗎？否則您就要準備拿回約為六平方公里多的無人海島，而失去一千幾百萬平方公里的東北、西北及周邊的疆域，原來這就是“學術保釣”？

**二，不管是民國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 1972 年以前，不是無視釣魚臺群島，就是把它“錯畫”給了日本**

1 月 21 日，香港一家民間智库《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在香港主办了第三届中美对话研讨会，主题是“与日本的三边对话”。会上提及钓鱼岛问题，中日双方有一番舌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智囊，内阁外交事务官房参谷内正太郎有篇书面发言，由原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滨田卓二郎代为宣读。谷内的发言稿讲到：“中国自二战结束至 1971 年，完全没有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对于这一点，中方与会者没有正面回应。

2003 年，台湾曾经举办了一场《钓鱼台列屿问题学术研讨会》（台湾人称钓鱼岛为钓鱼台——胡平注），时任台北市长、现任台湾总统的老保钓马英九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中国时报》对这次会议有简要报道，报道的标题就是《争钓鱼台，国际法不利台湾》。报道说：“多位参加《钓鱼台列屿问题学术研讨会》的学者昨天指出，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没有适时就钓鱼台列屿主权提出主张，战后更迟至 1968 年传出其周围海域有丰富油气才提出领土主



张，未来如要透过国际法来解决争议，恐怕对我方不利。”（以上三段引自胡平《钓鱼岛争端与禁止反言原则》）

岂止“没有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更有甚者——

1951年8月15日，中共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發佈《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三藩市會議的聲明》，指出“（琉球群島、小笠原群島、硫黃列島、西之島、沖之鳥島及南鳥島等）在過去任何國際協定中均未曾被規定脫離日本的。”

1951年9月5日，在三藩市會議上，蘇聯代表團團長葛羅米柯明確說明琉球群島屬於日本領土。

1953年1月8日，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在《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佔領的鬥爭》一文中又明確寫道：“琉球群島散佈在我國臺灣東北和日本九州島西南之間的海面上，包括尖閣諸島、先島諸島、大東諸島、沖繩諸島、大島諸島、土噶喇諸島、大隅諸島等七組島嶼，每組都有許多大小島嶼，總計共有50個以上有名稱的島嶼和400多個無名小島，全部陸地面積為4,670平方公里……”

1958年3月，《人民日報》社論指出：散佈“中國絕不放棄對琉球主權”的說法，目的在於打擊沖繩人民要求把沖繩歸還日本的強烈情緒。社論再次強調：這些島嶼在過去任何國際協定中均未曾被規定脫離日本，還指出我國報紙一再對要求把沖繩歸還日本的鬥爭表示了同情和支持。1961年6月，中國人大代表團與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發佈聯合聲明稱，堅決支持日本人民收復沖繩和小笠原群島。1962年北京地圖出版社發行的《臺灣地圖》中，不包括釣魚島。到1969年，中國國家測繪總局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集》則乾脆把釣魚列島寫成尖閣群島並將之歸於日本版圖。

現在有人出來辯護說，這個文字是從日本文翻譯過來的，但是堂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可以這樣說話嗎？《人民日報》為什麼不自己出來澄清呢？胡績偉先生說過《人民日報》除了日期，什麼都是假的。但是，日本和國際法庭願意接受這樣的辯解嗎？

中華民國方面，張其昀主編，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學研究所1965年聯合出版的《世界地圖集》，不但把釣魚島寫成魚釣島，還把釣魚島等寫成尖閣群島，而且畫入琉球群島版圖。這被鄭海麟先生說成是“誤將”。

到了1968年，出版的《中華民國年鑒》仍然說“臺灣極北為彭佳嶼”。這還是“誤將”？

1971年出版的第30期《臺灣省統計要覽》，還是把彭佳嶼標示為臺灣的最北端。仍然是“誤將”？這個“誤”和不“誤”有什麼根據，標準由誰來確定呢？

1971年美日簽署歸還沖繩協定之時，正值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但中方並未將釣魚島納入談判條件。

1972年，美國正式將釣魚島交給日本。但是，田中、周恩來就邦交正常化



會談時，對釣魚島的問題，卻稱“以後再說”。

中方明確表示“釣魚島與恢復邦交相比算不了什麼問題”，9月《中日聯合聲明》發佈，果然對釣魚島隻字未提。

其實，田中角榮曾經主動提出釣魚島問題，“田中說：您對釣魚島怎麼看？不少人向我提到這個問題。周總理：這次不想談釣魚島問題。現在談這個問題不好。因為發現了石油，這就成了問題。如果沒有發現石油，台灣和美國都不會把它當回事。”——這是日本政府公佈的《田中角榮首相周恩來總理會談》官方紀錄。

周恩來的話，被日本政府解讀為——中方主動放棄釣魚島主權，因此中日之間不存在領土爭議，更沒有“擱置爭議”的共識。

日本對釣魚島的佔領就由此成為既成事實。

現在日本認為釣魚島歸屬日本的一個重要理由是：1972年美國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沖繩正式歸還給日本時，中國政府不但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而且還明確表示，“中日建交不會涉及日美安保條約”，“釣魚島的問題沒有必要涉及，它與恢復邦交相比就算不了什麼問題。”中日雙方簽署的正式檔中也從未涉及釣魚島問題。

1972年周恩來還在接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說：“我並不瞭解尖閣列島，沒有關注尖閣列島，竹入先生您也不關心尖閣列島吧。”（現在中國政府說什麼“寸土必爭”倒顯得周恩來當時賣國、媚日的無恥、下流。）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日本仍然希望和中國討論釣魚島問題。例如1978年中日談判和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期間，日方還提到釣魚島問題，當時鄧小平重申周恩來的“擱置論”，其後鄧小平訪日，在記者會上回答釣魚島歸屬問題時，居然表示“實現邦交正常化的時候，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又表示“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總比我們聰明，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拋出所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你不要，人家就要，你有什麼好說。

雖然以前的地圖都不畫上釣魚島，有時畫上，還畫“錯”了——畫給日本。就是畫給自己，也不一致——一會兒畫給福建——1987年《中國歷史地圖集》，一會兒畫給臺灣——1994年《中國地圖集》。

### 三，日本實際控制、開發、使用釣魚島至今已經 107 年

1894年12月27日，在多次勘查釣魚台列嶼後，日本內務大臣在秘密檔中向外務大臣重提在釣魚島建立國標一事：今昔情況已不同，可再提交內閣會議審議。1895年1月14日，內閣會議決定正式把釣魚臺群島納入日本領土。

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清政府向日本割讓臺灣島以及附屬諸島。

1896年，日本政府將釣魚島租借給到釣魚島上墾荒的福岡人古賀辰四郎。1932年，日本政府又把釣魚島賣給古賀家族。到1972年，古賀家族將南小島和

北小島轉手賣給埼玉縣栗原家族的栗原國起。1978年，再次將釣魚島賣給栗原家族，這樣栗原家族就成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土地權所有者”。

據日本媒體報導，從2002年起，其名下的三個島嶼已經從日本政府手裏收到超過2.6億日元的租金。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與釣魚島“島主”栗原家族正式簽署了島嶼《買賣合同》，“購買”金額為20.5億日元（約合1.7億人民幣）。自此，日本當局對釣魚島實現了“國有化”。

多年來，日本對釣魚島主權問題表現了絕不退讓的立場，見保釣人士上島就抓，飛機、軍艦齊出動；絕對不是中國外交部那種口頭功夫（中國外交部因此被網民諷刺為“口頭外交部”，簡稱“口交部”）。這就是實際擁有，實際控制是“主權”的表現。而中國既不支持保釣人士出海，還要拼命打壓他們。雖然保釣人士打著五星紅旗，共產黨當局也沒有派兵保護他們，我當然不是希望兩國兵戎相見，只是想說明中共方面自己也覺得理虧——硬不起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等居然說：不要拿《國際法》做幌子——中共當局也知道自己於法無據，只是嘴巴還要“硬”一下。同樣的話，同樣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姜瑜也說過：不要拿法律做擋箭牌。實在道出了他們的存在既是非法的，也是“無法無天”的底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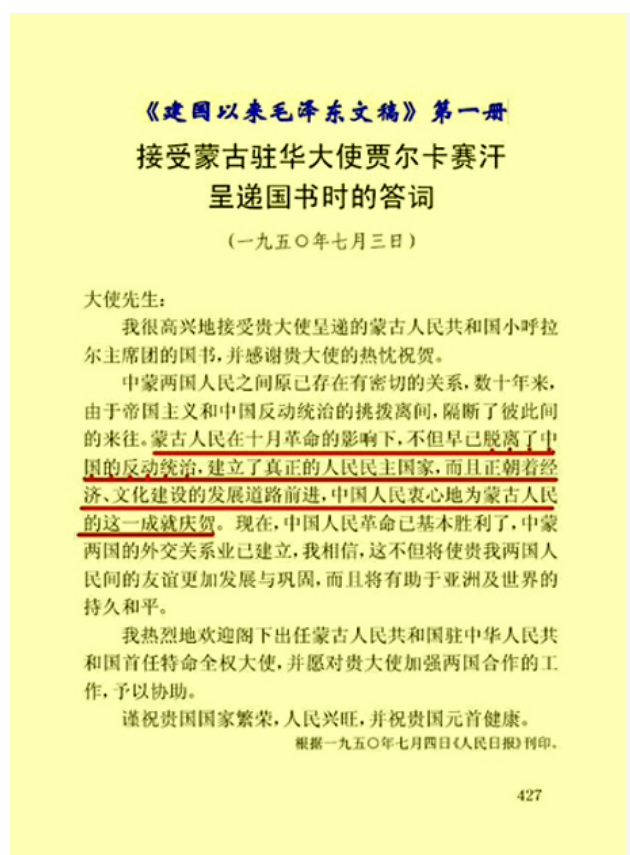
為什麼可以放棄遼闊的北方領土，卻對小小的釣魚島耿耿於懷呢？

其實中共也不是真的想要回釣魚島，他們只是在忽悠自己的“屁民”。因為中共利益集團早已經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它絕不會也不敢出兵保衛領土領海，對他們來說，主權與人權都是不要緊的，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政權。為保住政權、

穩定統治，主權和人權都可以隨時犧牲。符拉迪沃斯托克 600 平方公里、外興安嶺 160 多萬平方公里送給了俄羅斯；藏南 9 萬平方公里，送給了印度；南坎 13 萬平方公里，送給了緬甸；長白山天池 53%面積和 3 個山峰送給了朝鮮；由“浮水洲島、夜鶯島”被變成的白龍尾島近 10 平方公里、髮卡山、老山送給越南。這些不也是中國人用中國語言命名的中國的“固有”領土嗎？但是現在都不是中國的“領土”了。他們真的在乎那 6 平方公里多的釣魚島嗎？



9.96 平方公里“浮水洲島、夜鶯島”被變成了白龍尾島。



毛澤東和中共“勾結外國勢力分裂祖國”的罪證。

“釣魚島”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用來煽動“狂熱的愛國激情”以轉移民眾的視線，但是它也可能點燃群眾激情與憤怒，激化社會矛盾與政局的混亂，因為統治者的貪婪、無能與政治體制的腐化，已經讓執政合法性的流失殆盡。

以目前中國的政治局勢，民心的向背，中國經濟下滑，黨國體制的腐敗愈演愈烈而無法抑制，貧富差距擴大導致民怨鼎沸，在這種情況下，各派勢力借助釣魚島危機搞陰謀的搞陰謀，打砸的去打砸，發洩不滿的也不放過機會。結果，大陸街頭的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遊行反而讓世人看到了一個真正的“軍國主義”的影子——遊行人群舉起的五花八門的牌子，竟然有許多是崇尚暴力甚至反人類的政治宣言，亂世魔王毛澤東也被抬上了街頭。

“釣魚島”是日本的——不管从法理，还是从现状來說。

但是“釣魚島”有可能又是中國的，將來中國實現民主化了，日本和中國都成為類似歐洲共同體那樣的“亞洲共同體”甚至聯邦、邦聯的成員國時，大家又有什麼必要再分你的和我的呢？（作者為香港五七學社總幹事、《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主編）

〔首发《纵览中国》〕



# “三线建设”与“强奸母牛反革命案”

-----读《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而想起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毛》)不但让我知道了毛泽东许多我所不知的故事，也让我想起了许多我已知的故事。例如“三线建设”这个词，对于许多人也许很陌生，但对我这个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毛》使我回到了当年“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辉煌岁月。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甚至西南崇山峻岭间。这是毛泽东出于称霸世界野心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错误估计：敌人从东部进犯，沿海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此，许多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要全部或部分搬迁；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千一百多个大中型企业被拆掉，千里迢迢运到中西部去。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一个工厂要分散在几条山沟里，有的还要躲进山洞；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重复建厂、长途运输，管理不易、协作困难，成本过高、技术过时，造成了极大浪费。自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二千零五十多亿元人民币。让原本薄弱落后的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继“大跃进”折腾之后，又一次遭受浩劫。

《毛》举了甘肃酒泉钢厂作“三线建设”失败的例子，因为那里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钢。其实本人所在的所谓“西南钢铁基地”也不遑多让，那里的人命伤亡、资源糟蹋、物资浪费都是非常惊人的；由于缺乏前瞻性、野蛮开发、粗放生产，加上专制、愚昧、腐败、贪污所造的包括贫富、社会保险、就业、民族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仍使该地区至今不得安宁。1998年以来，由于当地政府错误地动用了大批的公安和武警部队镇压彝族自治州，导致至少有一万二千多彝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以及数十人非正常死亡。(《博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共产党眼中只不过是驯服的牛马。一条成都至昆明的铁路就是不顾铁道兵战士和民工的死活，在地质地貌异常复杂的横断山脉中，靠落后的技术和原始的工具硬凿出来的；野蛮施工和盲目指挥，几乎使每一公里的铁路就要赔上一条人命。

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我要骑毛驴进西昌。”为了早日出铁，让伟大领袖睡得着觉，我们只好“天作被地作床、荒山野岭摆战场；天下大雨不休息，黑夜当作白天干；破除迷信加拼命，没有条件也要上。”于是选矿技术不过关，就把含有比铁更值钱的多种稀有金属的尾矿白白放掉；污水处理技术不过关，就把焦化厂、选矿厂等厂矿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排入金沙江，毒水直冲崇明岛，整条长江全给污染了。

我们当年喝的水，早期是黄泥汤，后来是黄泥汤加上这些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先生产、后生活”，就是以建设者的生命和健康，来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作牺牲。因此，尿结石、肾结石、胃病、肝炎、癌症，就成了该地区的多发病。

毛泽东自己骄奢淫逸，豪华行宫无处不有，美女娇娥随叫随到；但却让全中国人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但用马列毛当作麻醉人民的鸦片，还把人们动物性需求也剥夺殆尽。吃的是喂牲口的粗粮和缺油无肉的咸菜，住的是易着火的茅草芦席棚，走的是崎岖泥巴路；最惨的是无数家庭被折散，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予解决。尤其基础建设队伍，长年转战南北，居无定所；重工业劳工阳盛阴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局又成心不考虑工人家庭困难，尤其是长期而普遍的性困扰。因此性苦闷、性变态、性犯罪(通奸、强奸、鸡奸、同性恋、乱伦)成了热门话题。

我记得当时公司里开了一个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其中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竟是“非法强奸贫下中农的母牛，破坏农业学大寨”。

#### 附：柳州一男子欲非礼母牛被逮

柳州 11 月 21 日讯，10 天前到柳州打工的三江籍男子谭某，路经柳北区长塘镇青茅村一处甘蔗地时，对一头母牛突发“淫心”，趁主人不备之机，牵牛进蔗地欲行“非礼”，结果被牛主人发现抓获并移交警方。

11 月 19 日下午 3 时许，长塘镇青茅村村民曾某赶着牛车，到自家甘蔗地拉甘蔗叶回家。当他把甘蔗叶装好车后，把拉车的母牛和一头牛仔一起拴在车旁，便躺在牛车甘蔗叶堆上看报纸，不一会便迷糊糊地睡着了。这时，谭某骑车刚好路过，看见正在吃甘蔗叶的母牛，悄悄拔起地上的拴牛码钉，牵起母牛便往甘蔗地里走。但仅走了二三十米，因牛与甘蔗叶磨擦发出的唰唰声把曾某惊醒，曾冲上去截住谭某并质问其“为何偷牛？”谭先是谎称这母牛吃了他亲戚的甘蔗，所以要“扣留”牛，后又不得不承认是想“搞牛母”。曾某听后觉得谭所言不可信，而且甚为荒唐，认定谭有偷牛嫌疑，于是把他扭送派出所。

据警方调查，谭某曾在家里“搞”过自家母牛三次，此次想“搞完后”再把牛放回去的，不想被牛主人当偷牛贼逮了个正着。

柳北公安分局法制科何科长从法律方面对记者作了解释：按照法律规定，构成盗窃罪必须符合两个要件：第一是行为人采取秘密窃取手法；第二是行为人在主观上故意占有。而根据警方掌握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谭某涉嫌盗窃，所以无法从治安上予以处罚。对于谭某的“人兽交媾”行为，目前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是属于犯罪，派出所只能对谭进行批评教育。（《重庆晨报》，2003-11-25）



## 虚伪冷血的温家宝

正在斯洛伐克访问的温家宝 12 月 8 日对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人员谈到连接不断的矿难时说：“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和事故，国家这么大，在不同的地方也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作为总理，我在出访时亦要牵挂国内事务。”

温家宝把矿难推给“发展过程”，推给“国家大”，制造“问题和事故难免”论，可谓无耻，可谓冷血透顶，可谓天良丧尽！

温家宝这句话的可恶之处在于：

一，因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国家这么大”，所以死人是“难免”的，死了也活该，而且死而无怨！

二，因为死的是普通的、穷苦的工人、农民，而不是温家宝的亲朋戚友，也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还要一直“难免”地死下去！

三，为自己的颀颀、昏聩、无能辩护，2003 年世界煤炭产量约 50 亿吨，煤矿事故死亡总数约 8,000 人。2003 年国内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 35%，事故死亡人数则占 79%。2003 年国内煤矿平均每人年产煤 321 吨，效率仅为美国的 2.2%、南非的 8.1%。而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 100 倍、南非的 30 倍。2004 年的“百万吨死亡率” 3.02，仍然是美国的 100 倍，是德国的 75.5 倍，是波兰的 10 倍，是印度的 13 倍。别的不说，印度在你们心目中不是比中国“更落后”吗？你们不是吹嘘你们是“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吗？

四，为腐败透顶的法西斯制度辩护，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讲：矿难的原因，“那就是事故背后的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造成的。就给了温家宝一记清脆的耳光。

铁的事实不胜枚举：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胡建昌受贿超过 10 万元，违规为事故矿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兴宁市煤炭工业局副局长曾锡良在大兴等煤矿入股取红利 51.4 万元，受贿 30 万元；兴宁市国土资源局主任科员李振权在大兴等煤矿入股分取红利 87.9 万元，受贿 27.8 万元；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彭国财，同时是七台河精煤集团公司新富煤矿的矿长。（《议报》第 227 期）

中共一小撮为了维持非法统治而欺骗世人，伪造政绩，片面追求 GDP，用了全世界 31%的煤炭、29%的钢材、8%的石油、45%的水泥，创造了可怜的全世界 4%的 GDP.吃了祖宗又吃子孙！

同时不顾人民的死活，长期对安全投入不足，仅国有煤矿就有五百亿的安全欠帐。李毅中说，2004 年，有 13.6 万人死于安全事故，相当于一亿 GDP 死亡一个人；即一百万居民当中有一个人死于安全事故。另外，去年有七十万人因安全事故导致伤残。再加上职业病造成的影响，去年因安全事故导致的伤亡人数加起来有一百 万人，一年就因安全生产事故为一百万个家庭造成不幸，按照一个家庭三人计算，二十年中就牵涉六千万人。真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

今年春节，温家宝给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遇难者副总工程师牛铁奇的遗属回信，假惺惺地表示“深情惦念和亲切关怀”，胡说“牛铁奇同志和所有遇难的矿工们是为国家建设而献身的，我们永远怀念他们。”“你们虽然失去了一位亲人，北京还有你们的亲人，我是你们的亲人。”这句话尤见虚伪！

每年死十三万人，你温家宝记住了谁？记住了几个人？你怀念得过来吗？十三万条鲜活的生命被你的贪官污吏、庸官恶吏断送，一句轻描淡写的“怀念”，就能洗清你们手上的血渍吗？虚情假意的“我是你们的亲人”，就能清偿你们欠下的如海血债吗？对六千万受害家属，你们“亲”得过来吗？

五，既然这样“牵挂国内事务”，为什么还要到处跑、到处出风头呢？为什么不把出访的人力、财力用于救灾？难道不去欧洲溜一趟，会比矿难死更多的人吗？

更虚伪的是，温家宝竟不要脸地说：“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一天到晚都是提心吊胆。有一句古话，叫夕惕若厉，为此，每天我都在思考，担心，忧虑。”（《明报》记者王争鸣唐山报导）既然这样辛苦，为什么不下台呢？首先，你不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其次，这地球也不会因为有了温家宝们就停止了转动！

## 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粗暴干涉我国内政

[武宜三 2月13日北京电]今天中国政府就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美国政府发出严重抗议，全文如下：

美国总统布什去年悍然宣布，“美国不应该成为世界各地腐败分子洗钱或者从事其它金融犯罪的天堂”，日前美国司法部在不经我国同意之下，非法起诉我中国银行开平支行革命干部许超凡、许国俊及其亲属等5人，指其贪污潜逃、犯有诈骗、洗钱等15项罪行。对此严重伤害中国人民和他们领导人的感情、损害了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及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利益的野蛮行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特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我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革命干部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等於2001年涉嫌携带4.82亿美元款项进入美国，这本是利於巩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也有利於改善美国财政状况的友好行动。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基本上是给予充分配合，并不追究他们在中国的犯罪行为。

到2004年底，中国与47个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与23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其中并不包括我党我国干部所向往的美国等热门国家和地区，就是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友好合作的证明。

但现在美国政府却单方面破坏这种默契，势必打击我干部外逃、资金外流的积极性，最终也一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中国人民把“损人不利己”的人叫做傻瓜，今天的美国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傻瓜。

美国司法部的错误做法后果十分严重、影响十分恶劣，据我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刘文宗表示，这次起诉对中共所有的外逃贪官打击相当大，美国不再是逃亡国外贪官避难的天堂，他们卷走大量钱财，即使逃到国外也不能逍遥自在过日子。

仅近年来，我党我国勇敢进军欧美各国的官员，超过4,000人，携走之资金约为500亿美元；美国政府的做法将使数以百万计的先富起来的官员无法顺利向美加顺利转移资产，转移子女，转移二奶、三奶，破坏了我干部队伍的团结、稳定和壮大。

为此，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 离婚为上岗，天下奇闻

《燕赵都市报》记者刘树鹏沧州 19 日电，“华北油田一些下属单位开始劝说离婚的职工赶快复婚。同时，华北油田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离婚证以 8 月 5 日为准，突击离婚者肯定不能上岗。”

这真是天下奇闻，离婚不离婚与能不能上岗有什么关系？

原来华北油田管理局最一口气开除了三万多名职工，为解决贫困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他们出台了“再就业政策”。该管理局在下发的《通知》上说，离婚人士(以“离婚证”为准)可以再就业，但并没有为离婚证规定期限。所以有些人为了能上岗，就去办理离婚手续。而且他(她)们也咨询过人事部门，人事部门答复说“只要有离婚证就行”。可是现在管理局却说，“下岗职工对再就业政策理解有误，以至出现了突击离婚现象。实际上，下发通知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离婚日期，但文件是 8 月 5 日发出的，肯定要以 8 月 5 日为准，5 日之后的突击离婚者肯定不能上岗。”

对此，不少已经离婚的下岗职工既感失望，又觉被愚弄。下岗职工王某认为，，所以她才和丈夫去离了婚。一名为争取妻子上岗而离婚的在岗职工说：“虽然上岗后的工资只有 430 元，但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份工作。孩子上学，老人有病，单靠我一人的工资实在很难支撑。”已经离婚的下岗职工李某说：“为了重新上岗而离婚的大多是中年人，所学的知识技能都和石油有关，下岗后无所适从。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人，离婚实在是无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工人阶级是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这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可是转眼间工人阶级却成了任人宰割的、可怜的“弱势群体”。这个中国共产党华北油田管理局的委员会竟一下子把三万多名“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分子开除了，可谓大刀阔斧，豪气干云，气魄大得不得了。

为什么当年大名鼎鼎的华北油田管理局，如今搞到要拿主人翁工人阶级来开刀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网易》网友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清查华北油田管理局，看有多少超标住房，子女出国、经商，超标办公室，他们的豪华小轿车。”“请政府先查一查中海油，中石油的高官与普通职工的工资比例，再查一查他们的效益奖比例。你们想都不敢想。”

可怜群众的眼睛虽然是雪亮的，但嘴巴却早已被箝住了。这点微弱的声息，根本无法上达天听，即使胡锦涛、温家宝们听到了又怎么样呢？因为他们也只是中共分赃集团的一分子罢了。这只要看看他们怎样对待层出不穷、死人无数的矿难，只要看看他们怎样包庇和放纵那些贪婪无耻、狼心狗肺的贪官污吏，只要看看他们如何穷兵黩武、强化暴力机器的穷凶极恶，只要看看他们如何不断推出监督舆论、打压不同声音的禁令，便可以知道中国人民，包括他们的老大哥---工人阶级，都注定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的了。

锦绣河山美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涯  
头顶天山鹅毛雪  
面对戈壁大风沙  
嘉陵江边迎朝阳  
昆仑山下送晚霞  
天不怕,地不怕  
风雪雷电任随他  
我为祖国献石油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石油工人之歌》)

当年“多荣耀”的石油工人，如今仅仅为了430元的工资，为了孩子上学，老人有病，就不得不搞得妻离子散，“不离婚上不了岗，离了婚也上不了岗”，因为石油已经“献”完，石油工人的“家”也就该破碎了，这就是今天石油工人的悲惨下场。

当年的豪情壮志，如今成了无情的讽刺。

〔20-aug-2005 于酒香书屋〕

## 毛澤東陰魂遊蕩紅朝餘孽供毛神位

### ——狗崽子最愛毛主席

毛澤東死二十九年了，但陰魂不散。即使是讓毛整死了的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人的遺屬和子女，也仍抱著毛僵屍不放。他們到底何愛於毛澤東呢？

一

毛澤東死了二十九年了，但陰魂不散。大陸《中國與世界》等網站曾在毛澤東誕辰 110 周年時發起以“12.26”為“毛澤東日”的簽名活動，據說“反應熱烈”。

那些讓毛澤東整死的老革命家的遺屬和子女，竟是這個活動的積極參與者。

彭德懷侄女彭梅魁在“毛澤東日”簽名留言中寫道：“歷史偉人毛澤東！”

“彭羅陸楊”在文化大革命初即受衝擊。羅被隔離審查時“一時想不通”，跳樓自殺時摔斷了腿，但仍被用筐抬著去挨批鬥。羅的兒子羅箭在“毛澤東日”簽名留言中說：“永遠懷念毛主席”，羅的女兒羅峪田寫道：“毛主席萬歲！”

陸定一夫婦在文革初首批受衝擊，並長期系獄。可是陸的兒子陸德也參加了簽名，並留言：“xx 的根基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與彭真一起被打倒的原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死於文革中，他的夫人、原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甘英也在這次簽名活動中簽了名。

被姚文元點名的“三家村”中，吳晗、鄧拓含冤自殺，家破人亡。在這次“毛澤東日”簽名活動中，鄧拓的兒子鄧壯和孫子鄧蕾都簽了名。

文革中著名的“六十一人自首變節案”，薄一波、劉瀾濤等含冤受屈，九死一生。但是這次“毛澤東日”活動的參加者中，也有劉瀾濤的夫人方林。

文革之初，毛林誣陷賀龍搞“二月兵變”，把他折磨致死。賀的女兒賀捷生也參加了這次“毛澤東日”倡議簽名活動並留言：“同意這個倡議”。

文革中受衝擊最嚴重的莫過於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在這次“毛澤東日”倡議活動中，劉的女兒劉濤寫道：“毛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劉的另一個女兒劉愛琴寫道：“祝賀紀念日成功”。

林彪也是毛澤東親手消滅掉的。儘管現在有不少人在為林喊冤叫屈，可是林的女兒林曉霖(林豆豆)在這次簽名活動時也寫道：“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胡耀邦的冤魂至今還在神州大地上空徘徊，他不止在文革初受衝擊，1975 年批鄧時再受衝擊，最後就死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一項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緊箍咒下。這次“毛澤東日”倡議活動中，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也簽了名，並寫下：“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胡喬木文革初也受衝擊，對否定文革起過作用，他一家對毛澤東的態度又如何呢？這次“毛澤東日”倡議活動中，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寫道：“早該如此！”胡喬木的女兒胡木英寫道：“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毛澤東的時代。”

這次“毛澤東日”倡議活動中，徵集到的革命烈士、元老的夫人和子女的簽



名，已經統計出來的就有二百人以上，其中有些烈士和元老曾在黨內受過批判，建國前受過批判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建國後受過批判的如陳毅、彭德懷、羅瑞卿、劉少奇、林彪等等。

## 二

某些人，包括擁毛派和批毛派，都難以理解：這麼多受過衝擊的老傢伙的夫人和子女都表示“懷念和擁護毛主席。”怎麼回事呢？

據《中國與世界》“觀察家”說，目前社會的腐敗、兩極分化、道德觀念的普遍退化，給了人們以極大的教育。社會的現實，與老一輩出生入死幹革命的初衷，相差太遠了。面對這樣一種現實，建國以後毛主席一再擔心的問題和一再採取的措施，建國以後老一輩人之間的一系列分歧和爭論，引起了人們的反思。

原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紀念毛公是假，批判鄧公是真。請問，毛主席一再擔心的是什麼問題？是中國會出修正主義。毛主席一再採取的是什麼措施？是反修、防修，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來一次。老一輩人之間的一系列分歧和爭論是什麼？就是以毛澤東為一方，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一方的“究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呢，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爭論。也就是“要社會主義的草呢還是要資本主義的苗”？

“目前社會的腐敗、兩極分化、道德觀念的普遍退化”，是怎麼造成的呢？堅定的毛主義者顯然以為，這都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惹的禍。鄧小平是全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而且越走越遠。是可忍孰不可忍！毛毛小公主還寫了本《我的父親鄧小平》，被認為“借著回憶自己父親的名義，來踐踏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所以被屏除在簽名活動之外。

其實當前社會的腐敗、兩極分化、道德觀念的普遍退化的罪魁禍首正是毛澤東，毛澤東是中國幾千年的獨裁專制傳統和蘇俄的法西斯主義的集大成者。他竊取天文數字的稿費，早已是中共王朝的頭號貪污犯。他到處蓋豪華行宮，瘋狂地玩弄女性，早已是中共王朝的頭號腐敗分子。他推行的城鄉二元化制度，強化並擴大了工農、城鄉、腦體三大差別。他發動的各種運動正是摧毀了中華民族傳統中的優良成分。鄧小平只不過把毛澤東的反動路線發揚光大、把毛的掠奪型的叫化子社會主義變為搶劫型的權貴資本主義罷了。

這二百多位革命烈士、革命元老的夫人和子女同時表示懷念和擁護毛主席，正說明他們對鄧小平死保毛澤東是心領神會的，他們也完全明白毛鄧江胡是一脈相承的。

## 三

什麼“高尚和無私”，什麼“不是從個人恩怨去看問題”。說穿了，這些革命家遺屬和子女們的“廣闊”胸懷和“水準”高度，其實是一錢不值的。

君不見，被毛澤東整死的彭德懷、劉少奇、賀龍、林彪等人，本來和毛就是一夥的，是毛的忠實幫兇。他們整起人來的狠毒，和毛別無二致。1957年反右派，鄧小平是頭號劊子手。1958年彭德懷在南京軍事學院搞反教條主義鬥爭，對劉伯承也是殘酷無情，必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四清運動，劉少奇打擊一大片，

搞得比毛澤東更左。四千萬人餓死的三年人禍，他們和毛是同謀，陳毅就是個推波助瀾、瞎起哄的一個。1966年文革初起，劉鄧派出工作組，搞的還是反右派那一套，他們從來就是殺人不見血的魔鬼。

從“《信報》訊”（記者王健）的“喜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老革命給他們的遺屬子女留下了多麼龐大的遺產呀：“在昨天舉行的嘉德公司秋拍會上，被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曾被鄧拓收藏的《太真上馬圖卷》卻沒能拍出去；其他鄧拓藏品共拍出579萬元。”《太真上馬圖卷》已叫價1,100萬，因無人承價而收回。原來這些老革命家給他們的後代留下極豐厚的遺產：除了政治遺產外還有巨額的經濟遺產。而這些遺產必須在毛太祖高皇帝的神主牌下才能兌現。這就是他們對毛屍頂禮膜拜的原因，這就是他們的“品德”和“胸懷”。

不該忘記：受迫害的畢竟是老頭子們，享受平反昭雪巨大成果的是他們的子女。而且老子們受迫害得越慘，子女們所得的回報越豐盛。以君子之心度之，一定有許多人很感謝毛太祖肯對他們的老子狠下毒手。如果沒有殘酷逼害、跳樓服毒、折磨致死，這些老頭們也不過是老死林下的普通元老功臣，哪有現在的轟動效應——書可以多賣幾本、收藏的文物可從拍賣得好價錢？真是名利雙收。哪有不感激涕零、感恩戴德的？

當年在陳毅追悼會上，張茜偎依在毛澤東身上的媚態告訴人們，丈夫死了不要緊，還有毛的寵愛。不久前，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家人也喝過團圓酒，王光美成了毛新宇的親切奶奶，因為王光美們知道，毛太祖神主牌的含金量遠遠超過劉衛黃的假骨灰盒（文革後有次王光美見到新鳳霞，王光美拉住她的手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新鳳霞事後說：“她男人都被毛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開放》2003年5月號）

於是“殺父/夫之仇、不共戴天”便被悄悄的顛覆了；不共戴天成了普“天”同慶、皆大歡喜！明乎此，“這些革命烈士和革命元老的夫人和子女們，他們能有這樣的胸懷和水準，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問題，相比於那些只看到個人恩怨的人”的說法，便統統化成了虛偽和令人噁心。

我並不提倡以暴易暴，但我提倡辯明是非。我對於迷戀僵屍、為毛賊塗脂抹粉的“革命老太太”，對於認賊作父、“愛戴和懷念殺父之仇”的公子衙內，我只有四字為贈，就是“恬不知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也許就是“毛澤東日”雖擾攘有年，至今並未成事的緣故。

〔24-4-2005 於香港，1-9-2005 校正。《動向》2005年9月號〕

**秃固然毒，不秃亦毒，转毒转秃，上下皆毒！**

——讀李昌玉老師《六十五元，灵隱寺买骂记》

### 一、從奸僧到奸相，都貪婪無厭

讀了李昌玉老師《六十五元，灵隱寺买骂记》，真是大快人心。不得不叫一聲：罵得好！

讀了李老師這篇大作，讓我想起蘇東坡對佛印的戲謔：“你们这些光头，不毒不秃，不秃不毒，转毒转秃，转秃转毒。”（馮夢龍：《醒世恆言·第12卷》）這“秃”與“毒”到底在邏輯上有什麼聯系？無非就是說有的和尚、尼姑開口閉口慈悲，自稱修煉人，其內心卻極其骯髒歹毒的意思，遠如《紅樓夢》裡饅頭庵靜虛師太之類，整天想的就是走王熙鳳等人的權門貴路，拉關係、找保護傘，專門幹些壞人婚姻、騙人錢財、謀財害命的勾當；近如李老師所痛斥的、“以最小的服务，捞取最大的利润”的灵隱寺奸僧。其实到了今天，豈止是這些假佛祖之名以斂財的假和尚、假尼姑，就是上至國務院總理、財政部長、公安部長，下到派出所警察、鄉村保甲長這些假公僕，也無一不是刮地皮的高手、無一不是吃人不吐肯頭的吸血魔王、索命夜叉。故可謂之曰：秃固然毒，不秃亦毒，转毒转秃，上下皆毒！

謂予不信，且聽我來講講中港兩地換領身分證過程之差別，便知溫家寶們的貪婪無厭到了怎樣的敲骨吸髓、竭澤而漁的地步？

### 二、香港換身分證不花錢

我先講我在香港辦理換領智能身分證的經過：提前通過電腦向身分證換領中心作了預約，當然也可以打電話預約；不預約也可以，去了中心以後，工作人員很快告訴您幾點幾分可以給你辦理，如果當天額滿，他們會在征求你同意的情況下和你約定辦理的日期、時間。

那天我如約而至，在一個窗口交上舊身分證，裡面的工作人員就給我一張表並退還我舊身分證，我拿着這張表和舊身分證交給指定房間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和我核對家庭地址和電話號碼（因為兩次換身分證之間，可能會出現搬家或改電話號碼的情況），然後掃描指模（現在香港人出入境只需憑指紋即可在自動驗證通道自助通關）、照相（一般照兩次或以上，讓本人挑選最滿意的印在身分證上），最後再去另一房間核對一下指紋並獲發一張領新身分證的通知單，便大功告成。一共不過五分鐘，清脆玲瓏，乾淨俐落，而且不用花一分錢。

### 三、閻王不怕鬼瘦：共產黨趁機斂財

反觀我們偉大的祖國，辦身分證不但費時失事，還要大破其財。我在《天涯社區》網上搜到《大家办二代身份证都被收了多少钱啊》及其跟貼，摘錄如下：

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照相加身分證工本费一共收 20 元；三明市 30 元（工本费 20 元、照相费 10 元）。

雲南省：昆明市 65 元（照相 15 元、办证 50 元）；丽江市宁蒗县 80 元。

甘肅省：兰州市 80 元。

廣東省：佛山市 15 元；廣州市 35 元(照相 15 元、辦證 20 元)；深圳市有的地方收 30 元(辦證 20 元、照相 10 元)，有的地方收 25 元；東莞市 75 元(照相 55 元、領證 20 元)；肇慶市 70 元。

江蘇省：徐州市、常州市、無錫市、南京市都收 20 元。

浙江省：樂清市 29 元(辦證 20 元、照相 9 元)；鹿城工本費 10 元；溫嶺 27 元；

安徽省：合肥市 30 元(工本 20 元、照相 10 元)。

北京市、天津市、重慶市、上海市 20 元。

四川省：成都市 20 元，也有說收 40 元的。

江西省：南昌市 50 元；井岡山市吉安 35 元(辦證 20 元、照相 15 元)；萬安、泰和 50-60 元；全南縣還在辦第一代身分證，收 52 元(照相 12 元，辦證 20 元，郵寄費 20 元)。

湖北省：武漢市 20 元。

新疆區：石河子市 20 元。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20 元；七台河快證 100 元，慢的不給辦。

陝西省：榆林市 30 元。

內蒙古區：呼和浩特市 33 元(辦證 23 元，照相 10 元)。

山西省：介休市 32 元(工本費 20 元、照相費 10 元、手續費 2 元，另手續費沒有收據)。

寧夏區：中衛 30 元。

吉林省：延吉市 51 元(20 元證錢,16 元郵寄費,10 元頭髮噴黑--頭髮有點發黃的就必须噴黑，洗頭 5 元)。

湖南省：南縣 105 元，衡山 55 元，臨澧 50 元，株州市 42 元，長沙市蔡鍔路派出所 30 元(20 元有定額發票，“圖像采集費”10 元沒有收費憑據)。

山東省：日照市 75 元；煙台市 50 元；濟南市 50 元(照相+辦證+郵遞)。

吉林省：長春市照相 10 元，辦證 20 元，如不交回舊證，再交 20 元。

遼寧省：大連市 40 元。

河南省：有 25 元，有 30 元，有的地方兩天兩個價；南陽、開封 25 元(工本費 20，照相 5 元)。

海南省：海口市 45 元。

貴州省：貴陽市 15 元；六盤水市 35 元(辦證 20，照相 15 元；舊的交上去，如過了期，又收 20 元的過期身份證錢)。

#### 四、亂象：四分五裂的中國

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說到王海打假案時，發了一通感慨：“中國看起來是個統一的國家、實際上卻是個四分五裂的國家！”這辦領第二代身分證的五花八門的收費情況，又一次證明了賀衛方的嘲弄。

對申領、換領“二代證”的居民收取工本費每證 20 元，經國家發改委、財政部批准的，公安部還專門有個“公治〔2003〕148 號”的《關於核定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证件工本费收费标准的函》，但各省市區就各出其謀。其中除浙江省的鹿城、贵州省的贵阳市等極個別地方收費略低於公安部規定标准之外，許多地方都超過 20 元；甘肅省的兰州市、雲南省的宁蒭县最黑，收 80 元。宁蒭县許多農村還非常貧窮，至今無公路、無电灯，农民缺衣少吃，可還要交 80 元辦身分證，真是閻王不怕鬼瘦！有的地方巧立名目，如吉林省延吉市居然收头发噴黑費、洗头費。

全國各省市區固然不同，一個省市區內也各處不同；廣東省雖有《粵价[2004]24 号文》規定收費 20 元，但各地仍是花樣百出。

### 五、考察学习、公費旅遊

福建省三明市成立了以副市长吴俊慰“为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市公安局副局长为副组长，市委宣传部、发改委、财政局等市十二个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指导全市开展换发二代证工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也都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具体统一组织领导各县、市、區的换证工作，确保换证工作的顺利进展。为了确保换证工作的正常开展，二〇〇四年五月初，市公安局派人到全国换证试点单位深圳、上海和浙江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考察学习”。

多麼隆重其事、大張旗鼓！辦領身分證也成了公費旅遊、雲游四方的籍口！

吴俊慰副市长大人還在全市换发二代居民身份证新闻发布会会议上，发表了又臭又長如老曾祖母的裹脚布般的《發布词》。雖然吴俊慰副市长大人談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民、执政为民的战略高度，保證“切实做到三个贯穿始终：一是把服务群众贯穿始终，千方百计地为群众提供便利；二是把确保质量贯穿始终，努力实现群众对证件质量的‘零投诉’；三是把监督检查贯穿始终，坚决杜绝借换发二代证之机搞创收。”屁話說了一籬筐，結果還是違法多收了十元照相費，以“创收”為目的，大撈油水，打破了“零投诉”！

### 六、共產黨黑過日本鬼子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假設有十億人“自願”辦証，每人平均收 20 元的話，“國家”便無端端的賺了 200 億元；一面讓老百姓納稅，一面又假辦身分證之類的服務性公務斂財！這些錢又都到哪裡去了呢？

從此可知，原英國殖民地香港比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更偉大！有網友還說：日本人当初办《良民证》还不收费呢，又可知日本帝國主義也比自吹偉光正的共产党的馬列主義好得多，“不那么黑”！社會主義、馬列主義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究竟哪個香？哪個臭？

莫言天下無公道，路上行人口似碑！

〔25Feb2007 於流浮山寨〕

## 李瑞环助学值得吹嘘吗？

### 一，大量穷困学生是谁造成的？

《人民日报》、《厦门日报》、《天津日报》、《新京报》及有关网站连篇累牍：李瑞环十年间拿出个人资产 53.3 万元，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资助了 148 名贫困大学生。今年，又捐出一笔稿费，委托天津市教委在今后 3 年内每年再资助 100 名贫困大学生。报道还称李瑞环已立下遗嘱，要求死后把遗产统统变现用以资助天津贫困学生。李瑞环说，“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上学，而由于经济困难不能上学，这将是他一生的遗憾”云云。

於是欢声雷动：说“令人肃然起敬”者有之；说学习李瑞环同志的先进事迹，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和在位的领导干部们都要从李瑞环同志身上接受教育，树立牢固的无产阶级荣辱观，为构建和谐社

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者有之；因李瑞环而痛骂贪官死有余辜，千刀万剐者有之；指望富人群体效法者有之。真是不一而足。

我并不以为然。我在《人民网》留言：“执政五十多年了，还有大量贫困生要靠人救济，这是可耻可羞的事，有什么好吹嘘的！乱拍马屁。”可惜被拒绝接受。

共产党之爱吹牛，常常是把痈疽当作宝贝来炫耀，以至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瞎夸李瑞环助学即为一例。

全国高校贫困生据统计达 300 万，占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小学、中学中的贫困生，比例更高，数目更是庞大。他们中有很多徘徊在失学的边缘和已经失学。这其中就有李瑞环的罪过！

李瑞环 1982 年开始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直至市长、天津市委书记。1987 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 年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2003 年在全国政协主席任上退休。他为政几十年，是所谓“党国核心”之一分子，他对中国教育状况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教育投入还不如乌干达

中共一方面吹嘘自己的伟大成就，喜形于色，顾盼自雄，说是截至 2006 年 2 月底，“鸡的屁”虽然只有日本一半，而外汇储备却达 8,537 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一。一方面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竭泽而渔，80 年代末以来大学学费涨了 25—50 倍，涨幅之大、涨价之快，举世无双。

中共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长期严重不足，如 2005 年的教育支出 3,951.59 亿元，只占 GDP 的 2.16%，2004 年为 2.79%，2002 年为 3.41%。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中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 1/4，在世界 153 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 145 位。2003 年 9 月，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所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 53%，另外的 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中共竟然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 1.04%，担负着全球 17.9% 的正规教育在校学生的教育。

### 三，贪污盗窃之外，浪费挥霍无度

中共窃国集团除肆无忌惮的贪污盗窃之外，还要大量浪费、拚命挥霍。2006 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他的一份提案中指出，1978 年到 2003 年的 25 年间 行政成本增长了 87 倍 行政管理费用平均每年增长 23%，触目惊心。《中国青年报》3 月 6 日报道，仅仅 2005 这一年，国家各级行政机关「武宜三註：仅仅是国家行政系统，可见还有中共系统、人大系统、政协系统、军警特系统、八个花瓶党、工会、共青团、妇女、工商联、作协等未统计在内；是否如此，希望《中国青年报》方面和精於统计的朋友出来澄清一下」公车消费就达到 3,000 亿元、公款吃喝 2,000 亿元、公款考察旅游 1,000 亿元，三项合计 6000 亿元以上，占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 20%，几乎相当于全部教育经费的 2 倍。

使“九年义务教育”，成了一句空话的还在於，花大量金钱搞政绩工程，如航天之类。据《晨报》报导，“神舟七号”飞船将于 2008 年升空：“神舟八号”，则在 2009 年至 2011 年之间升空，在太空中完成交会对接；随后建立空间站。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工程总体室主任王忠贵说，“目前我国航天技术的开发也正向国际接轨，这样将会使中国在国际间开展合作时更为便利。”但是，可怜的教育事业却与国际社会严重脱轨，成了中国人的耻辱。

中央人民电视第二台《凤凰卫视》主持人以“为了你的孩子上名牌大学，你会：1，每天工作十八小时；2，卖血；3，自杀”为题问英国一对夫妇时，英国人认为“这是伪问题。”

主持人再问：“如果你们在中国大陆呢？”那对英国人回答：“不会自杀。”

主持人告诉他们：“这三种情况在中国都会发生。”

国人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凤凰卫视》2006 年 4 月 9 日节目）

### 四，以“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为耻

朱健国先生在《以“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为耻》（《新世纪》）中为胡锦涛的“八耻八荣”增加了一条：以“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为耻，以中国平民皆能正常治病、上大学为荣。这是击中要害的极好建议。

可是，“考察中国的现状，深深感到这个国家没有魂。有人把我们国家叫做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 2005 年 10 月 30 日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社会发展座谈会》上说的两句话。對於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的一伙窃国分赃团夥来说，许多人怕都已经绝望了，这包括胡锦涛、温家宝他们自己在内；所以，不管“八耻八荣”，还是“九耻九荣”，都不过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罢了。

〔2006 年 4 月 9 日，《新世纪》〕

# 一个全民性饥渴的国家

——序汪孝直《沙坪茶場——宋家山勞動教養紀事》

武宜三[香港五七學社總幹事]

汪孝直先生這本《沙坪茶場——宋家山勞動教養紀事》(以下簡稱《宋家山》)，已經被耽誤了很多年。在中國，這樣的書當然沒有出版的機會；君不見，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捍衛一小撮權貴分贓團夥利益最賣力的鄧力群先生，也只好把他的《十二個春秋》拿到香港來印刷；說“人一走，茶就涼”也好，說“作法自斃”也好，總之還得承認“幸虧有個香港”。現在，汪先生的書也終於輾轉到了香港，由我們五七學社出版公司幫他出版了。

汪先生要我寫幾個字，我當然樂於從命。

## (一)一份珍貴的史料

我這幾年幾乎集中了所有時間在做 1957 年反右派運動的史料收集工作，汪先生雖然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和大多數的右派分子有同樣的經歷——都長期呆過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營。

請允許我在這裏保存一份 50 年前的珍貴史料：“逃港右派分子周鯨文公開發表”的《反共聲明》。周鯨文先生(1908--1985)，在我出生前就是我的母校東北大學的代理校長，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之一、民盟中央常委兼副秘書長，共產黨還賞了他一份閑差，叫“全國政協委員”。但是周先生卻拒絕繼續被利用；斷然在 1957 年“以處理私人財產的欺騙藉口逃”來了香港。

《反共聲明》全文如下。

我對香港並不生疏，我曾兩次在這裏主持《時代批評》半月刊，前後共六七年之久。這裏我有很多老朋友，同時，《時代批評》過去也有很多熱心的讀者和支持者，我關心這個社會和這裏的人們，正如他們關心我一樣。因此，我首先有責任把我過去參加中共政權和脫離這個政權的經過和原因，向關心我的人們略加說明。

我是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之一，我一貫活動是為求得中國人民的民主、自

由和幸福，尤其是主張政治問題用政治的和平的方法解決，而反對要用軍事的戰爭的方法解決。不幸自從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失敗之後，國內的政治局勢愈演愈糟，中共完全走上用武力奪取政權的路線。因此，當 1948 年底毛澤東電邀我們各黨派首腦一批 8 人北上共商國事的時候，我曾一度婉言拒絕。

1949 年 3 月下旬，民盟總部決定由香港遷到北京，我為了責任的關係，也一同去了北京，並且在 9 月以民盟負責人之一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但事後情勢的發展，使我原先所希望的“國事協商”、“聯合政府”，以及民主自由的理想全部落空。這主要是中共徹頭徹尾的實行了它的“一黨專政”，它曾經號召的“聯合政府”成了不兌現的謊言。如此，中共不僅欺騙了民主黨派，而且更威脅控制民主黨派作為它騙人的工具，使民主黨派人士成了中共的俘虜。

我抱著為國家做事，為人民服務的心情和願望而去北京，並且在名義上參加了中共政權，但事實上，我對於一切皆莫能為力，8 年時間目睹共產黨人以特權階級的資格，作威作福，過著奢侈腐化的生活。而對於廣大人民進行了最殘暴的剝削，和無人性的鎮壓屠殺，人民是呻吟於極端暴政之下。我原有的理想和良心的刺痛，不斷的促使我離開這個殘暴的政權。最後，托天之幸，我終於在 1957 年底來到了香港，進入了自由世界的懷抱。我雖然一直為我自己的幸運而欣喜，但一想到民主黨派的老朋友們，而今仍在中共的監視掌握之中，說不願說的話，做不願做的事那種痛苦無告的情況，是我自己深刻體驗領會的，我對他們是一直

在懷念和祝福，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像我一樣的脫離苦海。

去年 5、6 月間，在中共一貫的欺騙陰謀之下，許多民主黨派的朋友，再度上了中共的當，大鳴大放，不久就在反右派鬥爭中犧牲了。我對於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許多受中共迫害的老朋友，寄以無限的同情，但卻苦於無法援手。去年 10 月初民盟還沒有被中共公開迫害的朋友們，又在中共的導演之下，開除了我的盟籍，並且用中共的口吻對我譴責。他們這樣做法，完全受中共的強制壓迫，這是我絕對諒解的。因此，我對於民盟開除我，始終沒有表示意見。現在我敢說，民盟的朋友們都和我具有相同的理想，而對於中共也都有相同的看法，我相信如果他們能夠自作主張，他們是不會開除我，我也不會離開他們，真正要開除我的，是中共政權，而不是民主同盟。

我自己既然回到了自由世界，想到還有許多老朋友，仍在中共的魔掌之下，大陸上的同胞仍陷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我覺得我不能再沉默下去，我有責任代表他們宣洩內心的苦悶，發表公正的主張。因此，我決定恢復出版《時代批評》半月刊。今後我將以中國人一分子的身份，同中國各方面的反共力量一起合作，為我們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而奮鬥。同時我也將以實際的經驗，揭露共產黨的殘暴黑暗，俾自由世界中未受其害的人們，知所警惕。這是我個人的態度，也是即將出版的《時代批評》這個刊物的立場和方針。（新華社香港 1958 年 8 月 2 日電）

## （二）中共控制一切資源、包括性資源

《反共聲明》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欺騙中國人民，而中國人民特別

是知識份子又是怎樣的被中國共產黨所欺騙，包括汪孝直先生在內的善良的青年是怎樣的被愚弄、被迫害、被摧殘、被屠殺。

50年過去了，周鯨文先生所批評的這個政權有了一點改變沒有呢？一點也沒有。反右派運動以來，中共又搞了許多運動，僅僅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所引起的3年大饑荒，就餓死了3,600萬（楊繼繩：《墓碑》）到6,000萬（其他專家估計）人，一般估算，中共建政60年，“非正常”死去的中國人當在1億之譜。

其中許多人就是死在像宋家山沙坪茶場這樣的“法東斯”集中營裏。將來，在清算中共暴政的時候，《宋家山》就也是一件呈堂的証供。

《反共聲明》與《宋家山》是前生後世，都是對中共暴政的揭露和控訴。

中國，一切資源、包括性資源，歷來都是掌握在皇帝和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手中。到了中共寡頭統治下的人民共和國，更是登峰造極。毛澤東和各級黨政軍幹部，只要有一點權力的，哪怕是個農村生產隊的小隊長，都享有絕對的性自由。無權無勢老百姓，他們的性權利和其他權利一樣，都受到剝奪和侵犯，許多工人、知識份子、農民工的夫妻曾經或正在過著長期的兩地分居的生活，老、少、邊、災、山區的農民很多娶不起老婆，甚至是一妻多夫；勞改、勞教人員尤其悲慘，有老婆的被迫離婚，有女朋友的被迫脫離關係，幾乎所有“犯人”都被迫禁慾。其實，不光在勞改隊、集中營中的“犯人”們感到性饑渴，就是在960萬平方公里的這一座大監獄中，也到處充斥著性饑渴症患者。“我的朋友”陸文先生的《夢蓮》，就是全民性饑渴的寫照。我敢斷言，《夢蓮》必定在《性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

性，也天然地成為勞改、勞教題材中的不盡話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張賢亮），《右派兄弟之歌》、《映山紅和小沙彌》（齊家貞），都是非常精彩的傑作。

汪孝直先生當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引用哲學家的話說，動物的最基本欲望只有兩個：第一是食欲，第二是性欲。食欲，他寫了饑餓；性欲，他寫了強姦和通姦。所以本書也有多處性描寫。

他，猛虎撲羊，一把緊緊摟住她，越摟越緊，額頭在她的臉上、頸脖、前胸上下磨蹭，濕潤的舌頭像母牛舔著牛犢，舔遍她外露的所有肌膚，甚至隔著衣裳咬她的乳房，接著又把舌頭擠進她兩片薄薄的嘴唇.....他們隔著至少兩層布，她也感到雄性器官咄咄逼人.....她結婚了，感受過。正因為感受過才沒有處女的恐懼，只有一陣緊張，緊張的感覺也加快了心跳，她對他太陌生，那陌生反成了一種刺激.....

她感到他發抖的手在解自己的扭扣，她只盼這一切快些結束，心裏反恨他這時候笨腳笨手。當她感覺背後冰涼，才清楚自己是光著身子躺在草地上。經他一陣頻繁的在身上壓迫活動以後，她控制不住自己胸脯起伏，是他在施暴，自己也很累！

鄉間女子.....除了手腳粗糙、黝黑一點，從未外露的肌膚反而比城裏姑娘更細膩、白嫩，依靠暴力征服了小女子的野獸，哪里見過。三十多歲的強壯漢子，山野村夫的粗獷男人，無文化，無知識，無法紀，只有欲火，只有本能。因為強壯，要釋放，要發洩，平日有饑渴，今日要暴飲，征服更有快感，瘋狂更有快樂。一次發洩不夠，要重複。又一次，再一次.....

### （三）全民性饑渴的記錄

或者有人會問，作者不在現場，為什麼會知道得這麼詳細，甚至連當時被殺害的女人的心裏活動都寫得出來？作為記實的回憶錄，是不是失去了真實性呢？

我以為，這恰恰就是另一種“真實”。不要忘記，作者曾經也是個性饑症患者，在這個案件發生時，他正被困在宋家山上，有著最充分的時間來幻想、來描繪那個強姦的畫面。這個性幻想的結果，幾十年後，作者用文字把當年的那個個人，也許是集體的“創作”記錄下來了。所以，這仍然不失真實。

Z 幹事跨前一步一把摟腰抱住了她，“我喜歡你”。她只聽到這一句話。她真的還是一個姑娘，沒有被男人這樣緊緊摟抱過。她慌亂，她緊張，她心跳，已經失去了思想，沒有了意志，也忘了掙紮、抵抗，似乎正在慢慢暈過去。Z 幹事顫抖著手解開她胸前單衣的扭扣，脫掉她僅有的一件衣裳，很快又退下她的胸罩，有力粗壯的手捏揉著她結實的乳房。她感覺像關閉了呼吸的氣門，一顆心快



跳出胸膛，說不出一句話，像全身沒有了筋、沒有了骨頭，還感到已經站立不穩，從來沒有過的癱瘓了……Z 幹事對她沒有要求，沒有商量，沒有詢問，似乎認為他對她要幹的一切她都會同意；她沒有掙紮，沒有拒絕，沒有反抗——在恍恍惚惚中，感到被人放在一個平坦的地方，身子什麼時候光了也不清楚知道。只覺得一個實結的身子壓在自己身上，壓得自己閉了氣，又感覺沒有死，儘管喘不過氣，但還能呼吸。Z 幹事是結過婚的人，在這“盛餐”面前還能稍有忍耐，不用說忙壞了雙手，對這個軟玉溫香的雪白胴體，要先享受細嫩、滑膩。從上到下，從下到上，一遍又一遍，時而魯莽，時而輕揉，撫摩、按壓、搓捏，據說貓狗還要先舔後幹。共產黨的幹部畢竟是人，還不同於畜牲，不同於野獸。她已經大半昏迷了，如在夢中又感覺實在，最討厭 Z 幹事那張嘴，先吻脖頸，再吻乳房，直到大腿，還輕輕咬她的乳頭，那舒服又怪不舒服的感覺，每一咬都直鑽心！她順手抓住 Z 幹事的頭髮，用力扯，使勁拔，他的頭正沿著腹部往臍下……說無意識也有，她又怕真扯掉了他的頭髮，鬆開了抓緊的手，她真的要叫了，又真的沒有出聲。當感到自己身體某個地方，像被注射打針輕重地刺了幾下，是痛還是癢都不能確定的時候，更迷糊了，只感覺腰部以下很脹！不自禁的用盡全身力氣來挺住，還控制不住自己要呻吟，昏昏地覺得自己像飛了起來，飄在空中晃晃搖搖落不下地，這感覺真好！自身的重量沒有了，也像失去了壓在身上的重量，時間不知過了多久，感到 Z 幹事正匍在自己身上喘氣，自己也感到很累、很累；從脖頸到胸前都出汗了，兩個重疊的胸膛間已積了許多汗水。還覺得自己眼眶有

淚，滴不出來，只沿著眼眶向外浸，她不認為這是傷心的眼淚，心裏並不痛苦，只是有些後悔，一個姑娘身給了一個己婚、有妻子的男人！事先沒有任何心理準備，這一切都突然發生。

同樣，作者也不在現場，Z 幹事不久就自殺了。他如何知道他們的動作和心裏活動呢？我以為，作者所描述的仍然不是這一對偷情男女的“真實”，而是作者，甚至是當時所有性壓抑者的性幻想的真實。

《宋家山》記錄了中共的暴政，也記錄了病態的社會和作者自己被扭曲、被傷害的心靈。

《宋家山》不但具有歷史、政治、社會方面的意義，《宋家山》更會做為《病理學》、《心理學》的個案，為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所注意。

#### （四）人才被摧殘，仙境成地獄

汪孝直先生系出名門，生長於人文薈萃的古都錦官城，是四川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後又混跡於三教九流，與牛鬼蛇神為伍。所以，他既有市井的詼諧，又有雄辯家的汪洋肆恣；俚語俗諺隨手拈來，古書舊典也能旁徵博引。加上夾述夾議的手法，給人以一種痛快淋漓的感受。請看：

古文有“渭流漲膩，棄脂水也。”那是形容秦始皇擄掠了很多女人，而我們宋家山一日便溺可成塘也！人也不少。這古、今、男、女拉在一起相提並論，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用強權把人弄在一起，絕非本人自願。兩者也有點差別：一是養起來供玩弄，享樂用；一是圈起來搞生產，圖強大。一個要征服四海永久稱帝，一個要一步跨進共產主義。從不關心人民苦樂，都把人民當成工具；一個憑殺戮取勝，一個更加“陽謀”心計。都恃強權制國，一個還多一分好聽言語。一個是明確的要建立霸業，一個是粉飾為馬克思主義……

相隔兩千年的兩個人，作者卻用兩件看來不相關的事給串聯起來了。從而揭露了中共和毛澤東的獨裁專制本質。再如：

原來故事開始是這樣：要怪陽春三月，氣正溫和，葉綠花紅，蜂蝶亂飛，籐蔓抽條，日可盈尺，含苞花蕾，迎日綻開，芽展葉，草舒腰，處處生機盎然，生命奔放，讓人衝動。Z 幹事卅出頭，身強體壯；S “醫生” 正值妙齡剛滿廿歲，是含苞的花朵，正等宜人氣候開放；還要怪那些孩子家庭為小事糾纏不清，不肯爽快收人；也怪相關派出所本系統也打官腔，刁難入戶；怪山城重慶公交不便，一件事三天辦不完，跑路多於辦事時間；怪工作不順利，久在城市留連；怪旅館

空間太小，男女相處只有睡覺的地方，會讓人浮想聯翩；怪 S 護士熱心、慇懃，把壯漢當病人侍候，不避男女之嫌；怪 Z 幹事在美色當前忘了自己是專政公幹；怪她起伏的胸膊太豐滿，怪她桃花臉頰笑得太燦爛，怪她腿長腰細臀部圓；還怪天熱又衣單；怪他脖子不長也不短，下面五寸惹人饞；還有那櫻桃小口，唇如花瓣，長睫毛護著的大眼睛，深如秋潭；怪 S “醫生” 不該給他端茶打水，常去 Z 幹事房裏周旋，晃來晃去的身子，讓他聯想同自己年輕妻子的早晨溫柔、夜半纏綿.....

#### （五）以前是饑寒交迫的奴隸；現在是饑寒交迫的的主人

作者對 Z 幹事與 S “醫生” 之間姦情來龍去脈的描寫，也很見功力，他調動了幾乎全部的修辭手段，如一連串的排比和對偶句等，把二人心理描摹得何等細膩，何等入情入理。

這真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作者的確參透了人性、人情中的三味。所以本書還有很精彩的議論，值得讀者細心品味。

至此，武宜三先生要很認真地告訴讀者朋友：《宋家山》絕不是一本低俗的色情小說。汪孝直先生雖然身困宋家山，但是做為知識份子，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思考。他在本書中，從國家、政黨、法律、社會，到種瓜、養豬，都有他的高談闊論，真知灼見。

汪孝直先生善於從小見大，一景一物，一鳥一蟲，一張明信片，哪怕一隻蟲子，都能引出他的微言大義。

我們以前是饑寒交迫的奴隸；

現在是饑寒交迫的的主人。

說的多好啊！

一下子顛覆了共產黨宣傳了幾十年的謊言。

凡壓得人心的只有依靠強權來維持。是強權就不可能長久，製造恐怖就證明不是真正強者。讓人害怕的一定不是好事、好人。

汪先生說的是常識，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權貴集團同歷來的統治者一樣，偏偏無視常識，唯暴力、恐怖是尚，所以才有今天烽煙四起的抗暴維權運動。

汪先生是寫景的高手，峨嵋山背後、大渡河邊的宋家山在他筆下是如詩如畫、滿目青翠的人間仙境：一群山羊，數條耕牛遊蕩其間，給人以一種超脫世外、遠離塵囂、淡薄名利、回歸自然的閒逸心境。然而在中共法西斯暴政下，人間仙境成了人間地獄。這種強烈的對比，給人以極大的震撼。

汪先生寫情也特別細膩，無論施害者與受害者，他都能從人的本性出發，揭示人性的複雜，而不是簡單的以性善、性惡做二分法的圖解。蔣光平、背篋大嫂、賣大蒜婆婆的身上，閃耀著的卻是善良、真誠的光輝。

寫回憶錄，是胡適先生所提倡的。他不但自己寫，作口述歷史；而且非常積極地鼓動別人寫回憶錄。

同濟大學文法學院前院長施建偉教授也提出了一個命題：把“個人記憶”從私人空間融入“集體記憶”的公共空間。

歷次運動中的那幫精神劊子手們在迫害受害人時，最惡毒的計謀就是盡可能用不堪的、甚至下流無恥的招術，讓你羞恥得難以啟齒；讓你難堪得無地自容；讓你卑賤得不如牲畜；叫你像狗爬學狗叫；抹臉掛牌戴高帽剃光頭剃陰陽頭等等流氓行為，把你非人化、汙名化、妖魔化，傷害到使你日後不敢面對過去的傷痛。這樣，在你的忘卻中，他們就逃脫了被追索清算的命運。所以，在討回尊嚴的程式中，說出自己所受的屈辱是必要的程式之一。但為什麼許多受害人寧可“忘記”也不願說出“真相”。這是因為這真相太殘酷太可怕，這真相踐踏了人類尊嚴的最後的心理領地。因此，為了保留僅有的一點自尊，許多人寧可選擇遺忘，這不正好中了迫害者讓受害者自動放棄記憶的奸計了嗎？所以，對受害者來說，留下記憶就是讓真相浮出水面，為

未來的審判提供歷史的證言證據和證人。您應拒絕遺忘，說出來、說出真相，也許會輕鬆一點。（《施建偉訪談錄》）

汪先生也說，“普通百姓，無能立言、立德、立功，但除一捧骨灰以外，總該留下點什麼。至少每個人都會有一段人生中銘心刻骨的經歷，沒齒難忘的情懷，能記錄下來，想來對後世或多或少還是有益的。”

其實，汪先生做的正是立言、立德、立功的事——把一個食言自肥、殘民以逞、通敵賣國、貪汙腐敗、消滅文化、摧毀未來的無恥政黨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

為此，我們願意幫助任何一個想留下自己生命痕跡的作者出版他的永恆記憶。

[2009年8月18日於流浮山寨]

汪孝直《沙坪茶場——宋家山勞動教養紀事》已經出版。

代理商田园书屋：[http://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new\\_page\\_7.htm](http://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new_page_7.htm)

Tel：23948863/23858031 Fax：23937051/27702484

## 中共独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

-----2009 年矿難不完全记录

武宜三

2008 年，有 3,800 名矿工在各种事故中丧生。

2009 年又怎么样？仅仅上半年，煤矿就发生 749 起事故，死亡 1,175 人。根据官方数据，中国 2009 年发生煤矿事故 1616 起，造成 2631 人死亡，比 2008 年减少 584 人。

果然，“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

这句话，是刚刚被“我党”关进“小监狱”---小监狱外面是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监狱---的刘晓波先生说的。然而，这句话却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写入《起诉书》、《刑事判决书（2009）一中刑初字第 3901 号》，被作为“被告人”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

先不说“国家政权”本来就是用来颠覆的（我党不是颠覆过民国政府吗？），现在只说刘晓波的这句话有没有事实根据，是不是“造谣”？

翻开我党光辉的历史，看到的就是堆积如山的白骨，听到的就是无数无辜冤魂的呻吟：在江西苏区被杀的 AB 团、在暴力土改中被杀的地主、在三五反中被杀的资本家和我党干部、在镇反肃反中被杀的民国时代的党政军特人员、在文革中被杀“五类分子”（北京、广西、道县尤其惨烈）、在劳改劳教场所中被大量肉体消灭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右派分子、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杀的（不断地按需制造的）“反革命分子”、死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受迫害而死的法轮功信徒和维权人士；更不提在夺权战争中死去的几百万国共军人，把四方面军和新四军“指挥”到敌方的包围圈中以借刀杀人，强迫去朝鲜送死的几百万炮灰，在人为大饥荒中饿死的几千万农民，这些都是我党的领袖（或曰独裁者）为夺取和巩固权力而制造的无辜死亡，中共从来没有道歉。

由于我党“最不在乎”人的生命，也引发许多人为伤亡事故，如空难、海难、矿难、“火难”、交通灾难、工业灾难；即使是台风、暴风雪、水旱、地震、流行病等天灾，也会由于我党特权集团的骑在人民头上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所产生的官僚主义、瀆職、玩忽职守而增加伤亡数字。如四川地震中的隐瞒、豆腐渣工程、



拒绝国际救援、调度不力、贪污腐败而致许多人枉死。对于这些，中共也是拒绝道歉。

对于矿难等天灾人祸的死者，几年前刘晓波等人就请求国家应该按照《国旗法》给予下半旗致哀。然而，最在乎的自己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老百姓生命的中共特权集团一直充耳不闻。就是在新闻报道中，也不肯稍做让步。

《博客中国》著名网友李梅之指出：“60年来，中国官方媒体将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新闻永远当作首要、第一重要新闻，彻底暴露了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在中国是何等根深蒂固。这种典型的本末倒置思维方式，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羁绊，是李梅之的‘我党’最终不能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梅之在2009年11月22日曾经做梦---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会打破几十年形成的“先领导，后人民”的新闻报道“铁律”，将黑龙江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11·21”瓦斯爆炸事故的新闻当作头条新闻予以详细报道。而胡总书记、吴委员长、温总理和贾主席等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党国事务活动新闻，则在新闻联播临结束之时进行简短的报道。

然而，梦想很快破灭了。CCTV“先领导，后人民”的新闻联播次序，却雷打不动。国计民生的重要新闻，天灾人祸的大灾难，竟不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般日常活动。“以人为本”就是“以领导人为本”。

“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中国，还是那个中国；CCTV，还是那个CCTV！”晚上7时，当李梅之打开CCTV新闻联播节目之时，首先传来的仍然是：

“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结束了对菲律宾的正式友好访问之后，今日抵达秘鲁，开始进行对秘鲁的正式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2日上午10时许，贾庆林乘坐的专机降落在秘鲁G8空军基地。秘鲁外交部高级官员、中国驻秘鲁大使赵五一、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代表等到机场迎接。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及其他陪同人员同机抵达。贾庆林微笑着走下舷梯，与秘鲁高级官员亲切握手，向欢迎人群致以亲切的问候，并接受了中国驻秘鲁使馆女青年献的鲜花……”

贾主席访问秘鲁的新闻过后，才传出了一位女播音员的声音：

“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11·21瓦斯爆炸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今天15:30举行最后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截止目前，事故发生当班528名井下

作业人员中，420 人安全升井，104 人遇难，其余 4 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遇难矿工遗体已全部运送地面。据了解，目前仍在搜救中的 4 名矿工位置已经确定，均位于事故爆炸点附近，但由于巷道破坏严重，搜救难度较大……”

中国的人太多了，所以，人命还真不那么值钱！---不是吗？死了 108 人的特大矿难新闻，还不及政协贾主席访问秘鲁的新闻重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以人为本”竟是中共共产党用以欺骗中国人民的最无耻、最廉价的遮羞布。

于是李梅之想起他那位“老本家”李勉映老弟十分“雷人”的话：

“人民，哭吧！”

-----  
**【附】矿难日志（不完全记录）**

1 月 6 日，江西萍乡矿业集团宜萍煤业公司顶棚发生漏垮事故，6 人死亡。

1 月 10 日，云南曲靖市富源县大河镇篆湾煤矿 1 号基建井地面煤场，发生坍塌事故，造成 5 人死亡，5 人受伤。

1 月 14 日，吉林卓隆矿业公司井下罐笼升井发生事故，4 人死亡

1 月 19 日，广西柳州市融水县永乐乡洛西村非法盗采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2 人死亡、1 人被埋。

2 月 12 日，四川达州市达县新荣煤矿井下瓦斯窒息事故，5 人死亡。

2 月 13 日，贵州毕节地区织金县珠藏镇织河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8 人死亡。

2 月 14 日，重庆市奉节县兴隆镇石乳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造成 3 人死亡。

2 月 22 日，山西西山煤电集团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 74 人死亡，住院治疗 114 人，其中危重伤员 5 人。

2 月 22 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矾山镇矾山磷矿井下发生炮烟中毒事故，3 人死亡。

3 月 5 日，四川省达州市金龙集团寿田嘴煤矿在连南巷维修时发生顶板垮塌事故，

造成 4 人死亡。

3 月 8 日，安徽池州市东至区，迈捷矿业公司花山梯金矿井下掘进施工时发生炮烟中毒事故，5 人死亡。

3 月 8 日，四川省宜宾市高县白庙乡芙蓉村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 人死亡。

3 月 9 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聚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路鑫聚煤矿井下发生中毒事故，6 人死亡，3 人受伤。

3 月 12 日，甘肃天祝县隆德煤业公司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6 名矿工遇难。

3 月 13 日，甘肃白银市平川区丰源顺煤矿发生有毒气体泄露，7 人遇难。

3 月 18 日，贵州六盘水市盘县特区羊场乡羊场煤矿发生顶板事故，5 人死亡。

3 月 21 日，湖南省常宁市矿井发生透水事件，13 名矿工遇难。

4 月 4 日，黑龙江鸡西市鸡冠区金利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2 人遇难。

4 月 6 日，重庆巫溪县下堡镇八字庄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3 人死亡。

4 月 12 日，四川宜宾市珙县马鞍山煤矿瓦斯爆炸事故，3 人死亡，5 人受伤。

4 月 17 日，湖南郴州市永兴县樟树乡大岭煤矿炸药爆炸事故，19 人死亡，1 人失踪。

4 月 27 日，湖南益阳市安化县梅城镇清水村皮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 人死亡。

5 月 4 日，辽宁朝阳市北票市平房金矿发生透水事故，5 人遇难。

5 月 15 日，云南昭通地区镇雄县五德镇干沟村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0 人死亡、3 人轻伤。

5 月 16 日，山西大同矿务局麻家梁煤矿主立井工程发生炮烟窒息，11 人死亡，4 人重伤。2 人轻伤。

5 月 17 日，湖南娄底市冷水江市龙盘山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6 人死亡，4 人

受伤。

5月20日，四川宜宾市长宁县玛瑙煤矿发生透水事故，6名遇难。

5月24日，湖南郴州市永兴县马田镇二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4人死亡。

5月28日，云南省开远市妈达煤矿地表水涌入矿井，1人死亡、2人下落不明。

5月30日，重庆市綦江县同华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0人死亡，77人受伤，其中12人重伤。

5月31日，四川雅安市天全县泉水煤矿发生垮塌事故，3名遇难。

6月2日，新疆兵团农十二师，昌平矿业公司瓦斯爆炸事故，3人死亡、5人轻伤。

6月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昌吉州白杨河煤矿瓦斯突出，7人死亡，81人获救。

6月6日，黑龙江绥化市庆安县帝圣矿业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窒息，3人死亡。

6月11日，辽宁阜新市阜新县河东煤矿瓦斯爆炸事故，3人死亡，15人受伤。

6月13日，湖南省娄底市金胜煤矿发生透水突泥事故，5人死亡、3人失踪。

6月16日，山西霍州煤电集团庞庞塔矿发生吐库事故，3人死亡。

6月17日，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中营镇新桥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5人获救，16人死亡。

6月19日，贵州黔南布州贵定县新巴镇田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6人死亡。

6月21日，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县章驮乡煤矿一氧化碳中毒，3人死亡。

6月23日，云南曲靖市师宗县宏兴煤矿发生顶板事故，3人死亡。

6月24日，河南洛阳市伊川县奋进煤矿黄运输皮带巷皮带着火，6人死亡

6月29日，山西晋城市陵川县北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井下事故，3人死亡，1人

受伤。

6月30日，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地湖煤矿瓦斯爆炸，3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8人受伤。

7月1日，贵州省毕节地区纳雍县鬃岭镇狮子村采煤窝点发生事故，5人死亡。

7月4日，湖南省嘉禾县袁家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6人死亡。

7月4日，重庆市合川区康佳煤业公司发生煤与瓦斯突出，5人死亡，1人受伤。

7月8日，福建永定老寮坑煤矿发生透水事故，4人死亡，3人失踪。

7月10日，河南济源市济源煤业公司八矿，发生坠罐事故，11人遇难。

7月11日，河北钢铁集团石人沟矿发生爆炸，8人死亡、6人受伤。

7月12日，山西长治市长治县王庄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3人被困井下。

7月13日，安徽宣城市广德县劲羚矿业公司井下发生冒顶事故，3人死亡。

7月14日，贵州毕节地区大方县大方镇高店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4人死亡。

7月16日，黑龙江鸡西矿业集团城山煤矿发生片帮事故，3人死亡、6人受伤。

7月16日，江西乐平矿务局涌山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4人被困。

7月19日，云南大理州祥云县云南驿镇，明凯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3人死亡、2人受伤。

7月21日，贵州安顺地区平坝县齐佰乡下寨村煤矿，巷道塌方，4人死亡、3人受伤。

7月21日，湖南郴州市嘉禾县夹木岭煤矿井下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人死亡。

7月21日，北京市房山区发生矿工韩某被人用石头砸死后埋在两米多深的矿井

里，作案的竟然是其亲属，目的是骗取赔偿金。

7月22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鑫永丰煤矿发生漏水事故，5人死亡，18人失踪。

7月23日，内蒙赤峰市林西县琥珀南沟萤石矿通风井进水，3人死亡。

7月26日，江西吉安市井冈山市龙泉矿业发生透水事故，3人死亡。

7月26日，云南昭通地区威信县菜子湾煤矿瓦斯爆炸，3人死亡。

7月27日，四川凉山州益门煤矿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生垮塌事故，8人死亡，8人受伤。

7月29日，云南曲靖市富源县雅口煤矿发生水害事故，3人获救，5人死亡。

7月31日，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大块田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6人死亡。

7月31日，陕西榆林市神木县孙家岔镇赵家梁煤矿冒顶，1名被困。

8月1日，四川乐山市沐川县宇业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6人死亡。

8月1日，云南曲靖市宣威县双河煤矿瓦斯爆炸，5人下落不明。

8月1日，湖北宜昌市秭归县梅家河乡大块田煤矿瓦斯突出，6人下落不明。

8月1日，河南平煤集团平禹煤电公司四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14人死亡，9人下落不明。

8月3日，贵州黔东南州天柱县石坪大湾煤矿发生瓦斯窒息事故，3人死亡。

8月4日，江西省萍乡市新岭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故，3人死亡。

8月5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世纪通煤矿塌方，1人死亡。

8月6日，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富通煤矿瓦斯爆炸事故，5人死亡。

8月7日，湖北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顺银煤矿发生窒息事故，3人死亡。



8月9日，湖南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铺镇测水煤矿发生顶板事故，3人死亡。

8月13日，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郎岱镇青菜塘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63人获救，3人死亡，1人受伤。

8月17日，广西河池地区环江县大沙坡煤炭探矿普查区瓦斯爆炸。5人死亡，1人受伤。

8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尚岗煤矿发生巷道垮塌事故，至少7名遇难，3人下落不明。

8月18日，辽宁沈阳市法库县柏家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26人死亡。

8月22日，重庆南川县韦家湾煤矿井下发生一起顶板事故，4人获救，3人死亡。

8月24日，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发生瓦斯窒息事故，4人死亡。

8月24日，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山西星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4人死亡。

8月24日，贵州毕节地区纳雍县阳长镇么公营煤矿煤与瓦斯突出，3人死亡，5人受伤。

8月25日，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季家老林发生瓦斯爆炸事故，4人死亡、1人受伤。

8月25日，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虎塘冲煤矿发生透水事故，7人死亡。

8月26日，贵州毕节地区黔西县江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7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8月27日，河北开滦集团赵各庄分公司发生被困案件，9人被困。

8月28日，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原鲁塘镇积财石墨矿发生中毒窒息事故，15人死亡。

8月28日，新疆巴音郭楞州库尔勒市塔什店矿区巴州煤矿五号井洪水冲毁防洪坝，3人失踪。

8月30日，重庆天府矿务局三汇三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人获救，7人死亡。

8月30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五峰山煤矿发生顶板事故，死亡4人。

9月4日，广东韶关乐昌市北乡镇大湾萤石矿发生中毒事故，4人死亡。

9月5日，重庆市荣昌县治安煤矿发生跑车事故，3人死亡。

9月6日，湖南娄底市冷水江市铎山镇茶子山煤矿发生局部瓦斯爆炸事故，6人获救，6人死亡。

9月8日，河南省灵宝市金源矿业公司王家峪矿井下发生火灾事故，13人死亡。

9月8日，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新华四矿井下瓦斯爆炸，79人死亡。

9月10日，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长安煤矿发生运输事故，7人死亡。

9月12日，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巡司镇金鑫煤矿瓦斯爆炸，4人死亡。

9月19日，甘肃酒泉肃北县凯富矿业公司金庙沟煤矿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4人死亡，1人轻度中毒。

9月25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灵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放炮作业时发生中毒事故，5人死亡。

9月28日，湖南郴州市永兴县蜈蚣岭处的非法煤矿发生瓦斯中毒事故，3人死亡，1人受伤。

9月30日，吉林白山市江源县砬子煤矿发生跑车事故，3人死亡，受伤7人。

10月7日，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东风镇拱桥村采煤窝发生窒息事故，10人死亡，4人受伤。

10月8日，安徽宣城地区宁国县乌石矿业公司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人死亡。

10月8日，湖南娄底市冷水江市锡矿山闪星锑业公司南矿发生钢丝绳断绳事故，

26人死亡，5人重伤。

10月9日，辽宁阜新市海州区中兴煤矿有限公司发生火灾，6人死亡，7人下落不明。

10月14日，宁夏神华宁煤集团大峰矿羊齿采区发生爆炸事故，14人死亡、2人重伤、5人轻伤。

10月15日，浙江绍兴市诸暨市浣东街道盛兆坞三村俞高坞石灰石矿土石方坍塌，3人死亡。

10月20日，湖南湘西州花垣县太阳山邓克松矿峒发生冒顶事故，3人死亡，1人轻伤。

10月22日，湖南衡阳市耒阳市南阳镇严家冲煤矿南翼发生一起透水事故，4人死亡，2人失踪。

10月22日，北京房山区史家营乡黑煤窑发生事故，1人死亡。

10月26日，云南昭通地区巧家县小河铅锌矿炉房沟3号矿，井下放炮后矿洞内冒顶，4人死亡。

10月29日，贵州黔南布州福泉县，双龙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3人死亡，5人受伤。

11月7日，北京房山区史家营乡龙王庙煤窑发生事故，3人死亡。

11月7日，贵州遵义市桐梓县龙会场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4人死亡。

11月10日，四川甘孜州康定县雅拉乡康定金矿发生塌方事故，4人死、1人伤。

11月10日，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县福利厂沙巴台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8人死亡、11人受伤。

11月12日，黑龙江双鸭山市宝清县国明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7人被困井下。

11月16日，山西吕梁中阳黄土崩塌事故，13人遇难。

11月21日，黑龙江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瓦斯爆炸，108人遇难。

11月22日，湖南怀化市辰溪县郭家湾煤矿井下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11人死亡，1人重伤，3人轻伤，3人失踪。

12月27日，山西省介休市煤矿井下爆炸，12人丧生，4人送医院观察。

12月28日，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麻栗树煤矿瓦斯爆炸，11人都被掩埋，至少5人死亡。

11月28日，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和煤矿溃水事故，16名井下作业人员被困。

# 中共分裂中华民族的卑鄙用心昭然若揭

-----长沙援藏重点项目，竟是送全国最大毛泽东雕像

为西藏贡嘎县捐赠全国最大的毛泽东石雕像，竟是湖南省长沙与贡嘎共商确定的第四批援藏工作重点项目之一。毛像将安置在贡嘎县“长沙广场”，该广场将是全西藏惟一拥有毛石雕像的广场，这是贡嘎乃至西藏的标志性建筑，仅修广场便花去 650 万元。（《世纪中国》）

毛像由长沙雕塑院院长、雕塑家朱惟精设计，由长沙湘禹有限公司用望城县丁字镇的 80 吨重的整块上等麻石精心制作。毛像连基座高 12.26 米、重 35 吨。雕像净高 7.1 米，比韶山的毛像高出 1 米，比省会东方红广场的毛像高出 0.7 米。“为了全面展示伟人风采，朱惟精等专家曾多次到北京等地查阅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充分考证、论证，方案数易其稿。”毛像的资料哪里没有，非得去北京？这不知又花了多少老百姓的冤枉钱。

毛像于 3 月 29 日从湖南望城县丁字镇启程，将经过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甘肃、青海，从青藏公路抵达西藏，运送车队由两辆警用开道车、一辆大型平板车组成，路途用时为 8 至 10 天。更是劳民伤财！

在启运仪式上，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与中共贡嘎县委副书记、县长艾啦相互交换了毛的石雕像制作及收藏证书。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余合泉在启运仪式上“饱含深情地说，藏汉人民亲如兄弟，情同手足。这一尊石雕像凝聚了 600 多万长沙人民的深情厚意，饱含着设计、制作者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我们相信，这尊石雕像将会在祖国的雪域高原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毛像“将作为长沙人民与贡嘎人民深厚友谊的永久见证”云云。这是弥天大谎，是中共再一次强奸民意的可耻证据！

网民对此有强烈反弹：“毛泽东雕像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有这钱为什么不支援点实在的东西？”

“完全没有意义，建几个佛像还有弘扬藏族文化的美誉，建毛像实在搞不懂有什么用。”

“送这玩意儿，不但没有实用价值，西藏人民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运输、安装、维护；将来还不敢拆。长沙人民智慧高。”

“为了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在西藏再搞一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好了。西藏人民会自己树一座更大的毛泽东塑像的。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具僵尸想必都会为此激动的颤抖。”可谓极尽挖苦奚落、冷嘲热讽之能事。

呜呼！中国共产党一面置达赖喇嘛和平呼吁于不屑一顾，一面又把杀害各民族人民的刽子手、窃国大盗、卖国贼、魔鬼塞进了西藏，让牠继续污染那里的山河、天空和大地，继续愚弄和窒息善良纯朴的西藏人民，刺激西藏人民把民族独

立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一小撮分裂中华民族的卑鄙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11-apr-2006)



# 中共“特別黨員”的歷史和現狀

【導語：“如果中央把香港的地下黨員名單公布出來，起碼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知情人估計，近二十多年單程來港名額中，有15—20%被中共各個情報機關佔用。香港某黨除了主席外，所有頭頭都是共產黨員。香港的一家主要電視臺老板就是由總參二部派出的特務；另一家主要電視傳媒的第一股東是中國國家安全部。連各大商場、酒樓、酒店、電影院等地都有人在監聽，以搜集社會上的反共情報和了解香港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所以必須研究中共“特別黨員”的歷史和現狀。】

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於十月二十九日病逝，中共在訃聞中指他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表面上是“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暗地裡卻是中共黨員，類似榮毅仁這樣的秘密高級黨員，就是中共的“特別黨員”。他是一九八五年就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從不正式公佈。一個超級大黨，執政了五十多年，還要這樣鬼頭鬼腦、鬼鬼祟祟地搞地下活動，而不能堂堂正正以真面目示人，這除了說明這個來路不正的法西斯團伙實在有太多陰暗心理、有太多見不得人的東西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 一，什麼叫“特別黨員”？

什麼是“特別黨員”？張聞天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說：“凡黨員處於特別地位，而不過一般黨的組織生活者，謂之特別黨員。”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研究館員葉成林先生則定義為：“民主革命時期，有一批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的人，秘密從事着革命工作，發揮了其他人所不可替代的特別重要的作用。這些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却不編入支部，不過普通的組織生活，其黨員身份也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其革命事迹更鮮為人知。他們就是中共特別黨員。”

特別黨員有何特別？葉成林舉了四點：1) 階級、階層出身特別。指其與普通黨員基本上“是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不同，特別黨員主要是當時社會的“中上層社會出身或其社會地位與中上層有聯繫的分子”，即所謂出身於官吏、軍官、資本家、社團領袖、社會名流、與上層社會人士有聯繫等，屬於官僚階級、大資產階級、買辦階級或地主階級範疇的人；2) 具有特別的社會地位。中共要求在國統區工作的特別黨員在公開組織中“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處於社會中上層。3) 擔任特別任務，如情報、策反、統戰等工作，發揮普通黨員難以發揮的作用。4) 在黨內受到特別管理的黨員。由於該黨員負有特別重要任務，要特別保守其秘密身份而採取完全不同於普通黨員的管理措施，這措施包括入黨手續與程序、入黨後的管理與教育等。（《重慶社會科學》2005年7月號）

## 二，“特別黨員”專搞策反、策動嘩變

張聞天的說法只強調特別黨員地位和過組織生活與否；葉成林之前兩點按出身和社會地位分，後兩點按作用分；二人之概念均難言準確。從廣義來講，中共每個黨員都是特別黨員，毛澤東是瘋狂拔扈的皇帝，周恩來是逢君之惡的佞臣，江青是潑婦，張思德是生得不偉大、死得更倒霉，江澤民特別賣國，溫家寶擅長演戲，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狹義來講，“特別黨員”只是見不得光的、專搞偷雞摸狗、偷呢搶騙的中共秘密黨員。他們在武裝奪權時期的任務是策反、情報、宣報、統戰。

1922年在德國由張申府、周恩來介紹，經中共中央批准加入中共的朱德，可能是中共最早的“特別黨員”，他破壞北伐，武裝暴動，分裂國家，是非法奪權成功的“開國元勳”；

1929年加入中共的羅炳輝任國民黨江西吉安縣靖衛大隊長，同年率部600余人投共，改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五團；

1931年加入中共的國軍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於同年伙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1.7萬人在寧都叛變，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

1939年加入共黨的國軍111師師長常恩多人駐山東後，與八路軍互通情報，狼狽為奸，和1938年加入中共後潛伏在該師並由團長升333旅旅長萬毅共同脅迫二千官兵於1942年投共；

1938年加入中共的漢奸魏鳳樓，在日本投降後率汪偽第四軍獨立師二千余人投共，為毛共下山搶奪抗戰果實效勞；

1936年發動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的張學良，吃裡扒外、破壞抗日；死了之後人們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員；

1939年加入中共時是國軍77軍副軍長的何基澧，支持軍中共黨員朱大鵬等人在安徽桐柏組建77工作團，後來77工作團全部匯入李先念的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幫助共產黨破壞抗戰；1948年升任國軍第三綏靖區付司令兼第77軍長的何基澧伙同付司令、1929年加入中共的張克俠在華東野戰軍指令下，於11月8日率59軍和77軍共三個半師共2.3萬人在賈汪反戈投共，使無數國軍官兵在後來的歷次運動中慘遭殺害和摧殘；

1946年初，國軍新編第六路軍郝鵬舉部二萬余人在臺兒莊宣布“起義”，郝部第三軍軍長兼第一師師長乜庭賓(1945年成為中共特別黨員)和第二師師長張奇(1945年成為中共特別黨員)，以及第六集團軍付司令張克俠都對郝做了大量策反工作；

1948年擔任國軍23師46旅正付旅長的乜庭賓、張奇，共同策劃“起義”失敗，乜僅帶一個排逃入“解放區”，1949年升任282師師長的張奇率該師五千余人投共；

1944年加入共黨的汪偽第二方面軍第四軍付軍長謝慶雲，是徹頭徹尾的漢奸，1948年在淮海戰役中遵照中共華東局指示，策反國府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兼107軍軍長孫良誠和該軍260師師長王清翰，並發展王清翰為中共特別黨員，致

使 107 軍軍部如 206 師在江蘇睢寧投共；

同時在 1947 年 10 月被發展為中共特別黨員的國防部三廳少校參謀兼要塞工兵營長唐秉煜、砲臺總臺長唐秉琳、守備總隊長王德容，陣前反戈，炮轟江防守軍 21 軍，使華東野戰軍東集團在毫無威脅下渡過長江；

奉命談判卻率領談判代表團投共的中共特別黨員張治中，賣國求榮，致政府敗退臺灣，使大陸歷數十年蹂躪。

張聞天說過，“注意吸收官長中的特別黨員”，陳毅就郝鵬舉起義向中共中央報告：“郝部中有兩個師長是特別黨員；另外我們由淮北區打入十幾個秘密黨員，均擔任官佐。”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就把“解放臺灣”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特殊中共黨員“作內應可能提早去佔領。”（《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可見中共歷來強調爭取、利用中上層分子。

### 三，“特別黨員”即間諜：竊取情報

在大革命時期就打入國民黨內、潛伏在南京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身邊任機要秘書中共黨員錢壯飛，1931 年竊取了中共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的密電，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避免了覆滅之災；

1927 年成為秘密中共黨員的葉劍英時為國民黨武漢政府第二方面軍第四軍參謀長，他獲得汪精衛要扣押葉挺、賀龍的情報後，即令葉、賀率部赴南昌，策劃八一暴動；

叢德滋和中共特別黨員于千在蘭州辦民眾通訊社，為八路軍蘭州辦事處搜集了大量情報，1938 年加入中共後由謝覺哉安排，打入國民黨第八戰區政治部主任曾擴清的秘書；

1939 年加入中共的鄭漢，以國民黨安徽省青陽縣黨部書記長身份，在與黨政軍各界交往中收集情報，特別是有關共產黨、新四軍的文電；

1946 年加入中共的特別黨員趙良璋以國軍北平第二空軍司令部中尉參謀身份，廣搜國軍空軍情報；

尤其在抗戰後的國共內戰中，中共“特別黨員”遍布國民黨軍政各部門，如入無人之境，予取予携，以至政府全無機密可言而加速崩潰。

熊向暉是中共打入國民黨高層的“臥底”，然而，直到一九九一年熊向暉親自撰写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出版后，他的传奇经历才为人所知。他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受周恩来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并博得了胡宗南的赏识，获委任为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潜伏十二年之久。一九四三年六月，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消灭中共首脑机关，但行动被熊向暉及时密报中共，遂使国民党功亏一篑。为此，毛泽东曾称赞熊向暉“一人顶几个师”。

一九四七年正值国共战争白热化之时，熊向暉又把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计划通报了中共，为共产党争取到了充裕的转移时间，使得胡的部队，一连几个月四处搜寻共产党军队而一无所获。共产党避免了与国民党军队的一场恶战，此次事件

成了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两年后，解放军进入北平。（2005年第二十期《财经》）

#### **四，輿論欺騙、統戰拉攏**

1927年在南昌暴动後加入中共的郭沫若，抗日戰爭中以無黨派人士混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窃取了第三廳廳長職務；

193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9年与张治中在新疆宣布“起义”后转为中共黨員的包尔汉，長期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隱瞞身份欺騙中国的廣大穆斯林；

1933年加入中共前後，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秘書長、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的王昆侖，在重庆參與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與共黨彼呼此應，大拆抗日救國的臺；

1934年就秘密加入中共，1947年成立农工民主党反蒋，又跨党进入民主同盟，後担任农工民主党主席的季方也不遑多讓；

1933年加入中共的胡愈之以民主人士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救援被政府抓獲共產國際遠東局秘書、蘇俄特务牛蘭夫婦，抗戰期間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等不利穩定、團結的團體，破壞抗日，1945年以後，在新加坡、馬來亞、緬甸、越南、泰國、印尼等地組織民盟，聯合境外反華力量顛覆政府；

1938年加入中共的杜重石，1939年起以國軍29軍駐成都辦事處少將主任、川康綏靖少將參議以及袍哥大爺等身份在四川發展黑社會組織，糾合反政府力量；

1937年由王若飛介紹、由劉少奇批准加入中共的前清貢生、民初山西省議員劉少白，以開明紳士身份創辦尚縣農民銀行，為八路軍籌措軍需，1942年担任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副議長，為鞏固中共根據地大賣其力；

1937年加入中共的盧緒章在重庆中统、軍統中廣交朋友，還成為陳果夫座上客，使其主持的廣大華行生意蒸蒸日上，從而為新四軍提供了大量藥品，為中共籌集大量經費；

為中共反政府提供經費的還有1939年入中共、時為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主席、寧紹保險公司總經理胡咏琪，中共特別黨員楊建平等。

#### **五，中共廣收特別黨員，實乃招降納叛**

1929年由潘漢年介紹、周恩來批准加入中共的楊度，是支持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1946年加入中共的周之友，是大漢奸周沸海之子。做的都是招降納叛的勾當，所以必須十二分小心、十二分神秘。1942年毛澤東親自招收時任國軍38軍軍長的趙壽山入黨，居然還要對周恩來保密，別盡顯黑幫團伙的本色。

值得一提的是續范亭是1938年由關向應介紹加入中共、由羅貴波和南漢宸聯系的特別黨員，他以國民黨第二戰區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身份，活躍在



山西和西北國民黨上層人士閻錫山、傅作義、趙承綬、鄧宝珊、馬占山、楚溪春之間，為中共大做統戰工作，可是他的中共黨員身份卻是在 1947 年他臨終前的遺書中申請加入中共，並經中共中央批准的方式予以公開。這究竟是因為續范亭對自己身在漢營心在曹於心有愧呢，還是中共為了掩盖挖人牆角的卑鄙行徑？

在敵對的機構中招收特別黨員，挖人牆腳、窃取機密，還可理解；但在自己的陣營中也安置特別黨員又為了什麼呢？如陝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技正李世俊是由時任中央委員、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在 1938 年介紹入黨的特別黨員，原來共產黨要派他到晉綏軍做統戰工作，以非中共黨員身份出現，以更收欺騙之效；

新四軍軍醫處處長沈其震 1941 年秘密加入中共成為特殊黨員，則“為了便於我外出工作，繼續動員醫藥等方面專家以及爭取急需物資到解放區。”後來也成為中共特別黨員奧地利醫生羅生特就是由其所招致。

執政前偷偷摸摸，採取地下、秘密方式工作可以理解，執政後還繼續偷偷摸摸，裝神弄鬼，又為了什麼呢？一個靠陰謀詭計起家的黨，始終不能光明正大，不改其招搖撞騙、欺騙老百姓和“朋友”的本性，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留在黨外，起更大的作用。”

劉少奇在 1949 年《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中寫道：“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一百卅四人，其中黨員四十三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間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間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進步人士中有十五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在籌備委員會中另組織常委會委員，委員二十一人，同樣可保障我黨領導。”“籌委會已決定將來參加新的政協會議的黨派十四個，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區代表一百〇二人，軍隊代表六十人，人民團體及少數民族與海外華僑代表二百〇六人，總共四十五個單位，五百一十個代表。代表中黨員將佔多數。”從中可以看出中共怎樣可耻地玩弄民主、怎樣玩弄各民主黨派，也可以看出共產黨所謂“肝膽相照、互相監督、真誠合作”的虛偽。

## 六，香港遍地是中共特別黨員

香港自中共成立那一天起，都是中共活動的重要據點，當年香港是中共顛覆政府、奪取政權的“反國民黨基地”，今天香港又成了中共撲滅自由、民主、人權運動的前哨陣地。共產黨在當年的暴力奪權中，稱作第二條戰綫的地下秘密工作起了關鍵作用，今天在維護非法統治的掙扎中仍要依仗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動。

中共除大量派遣特殊黨員到香港以外，又在香港大舉招兵買馬，發展地下組織。1985 年香港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一位叫毛鈞年的中學教師出任副秘書長，後來他出席中共的黨代表大會並當上香港新華社副社長，港人才知道他是隱藏多時的中共地下黨員。(林保華：《中共地下黨在行動中》)像這類從地下冒出的“特殊黨員”將隨着自由和專制、民主和獨裁的鬥爭激化，會不斷的增多。

據說當初李長春接管廣東時，給江澤民打過一個報告說：廣東省有二十二個“辦公室”，全是軍、警、憲、特。比如說，“一辦”和“二辦”是省公安廳的，

三办是“港澳工委”的，“四办”是总参二部的，“五办”是广州军区情报部的，而“保利集团”是“十六办”，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是“十七办”，刘华清的儿媳妇郑莉是“二十二办”。共產黨對暴力和恐怖手段的依賴居然到了這種程度，真是匪夷所思！

在香港回归前后，港澳工委下面挂靠了很多人，因为港澳工委分管香港的情报。尤其是当时为了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保证香港的稳定，中国政府曾派了大批的特工人员潜伏在香港。例子：在香港的亲共党派某组织当中，除了主席之外，其他的所有头头都是共产党员；香港的一家主要电视传媒的老板就是由总参二部派出的特务；另一家知名的电视传媒的第一大股东已经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不过是以某公司的名义出现罷了。

二十多年來的來港單程証，据知情人仕估計，其名額的 15—20%為中共各情報機關所占用。現在逃亡加拿大的“遠華大走私案”主角賴昌星就是身兼軍情、国安、公安的三重特务，僅他所認識的新潛入特务就有五十个以上。有一个退伍共軍已经拿到香港的居留权了，他是带着任务被派到香港的，这个前战士在香港的任务就是到各大商场、酒楼、酒店、电影院等地听人“聊天儿”，搜集香港社会上的反共情报，和香港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材料。

所以，中国情报圈内有句话：如果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产党员的名单公布出来，起码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盛雪：《訪問賴昌星》）

## 七，中共特別黨員的可悲下場

中共“特別黨員”通常都是合法身份做非法勾當，往往社会地位越高，所負任命越重，所冒风险也越大。1925 年加入中共為特別黨員的《京報》創辦人、社長邵飄萍，為中共張目，言論過激，為張学良父子所殺。叢德滋窃取情報事敗，於 1942 年被殺害，年僅 32 歲。

謝庆云和周鎬(1946 年加入中共)、王清翰等受中共華東局和華東野戰軍派遣，偕周孫良誠去策反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司令劉汝明，不料孫良誠反水，周鎬、王清翰在蚌埠被捕，謝庆云在南京被捕，三人均為國民黨所殺。

中共“特別黨員”，由於特別保密的緣故，多採單綫聯系，如此一來往往因為介紹人或聯絡人死亡、失蹤，或者干詭不認賬，這些“特別黨員”就只好自認倒霉，甚至被認為漢奸、叛變、歷史反革命而被殺、被關、被管制、被歧視、被迫害。

袁殊是中共情報史上“孤胆英雄”，在潘汉年的导演下扮演分別為軍統、中統、青紅幫、日偽、中國共產黨服務的“五重間諜”角色，屢建奇功。1955 年受潘汉年事件牽連被捕，判刑 12 年，刑滿後再被關押 8 年，1975 年被解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就业”，1982 年随潘案一起平反，但始終不得安宁，直至 1987 年離開人世。他的妻子端木 1968 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葛佩琦 1935 年参加革命，1938 年由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八



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招收為中共黨員。受中共指派潛伏国民党内部，歷任第一战区暫編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参议，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1940年策動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他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1957年却在中國人民大学受《人民日報》和毛澤東的誣陷，划为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妻离子散，双目近於失明，吃盡無產階級專政的苦頭。

“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共“特別黨員”大都沒有好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特別黨員”下場会好一點嗎？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官員陈瑜林等，被控“英国当间谍”，以及那个老黨員、老報人、老作家被圈禁北京十年都是很好的例証。

希望中共順應民主潮流，落實《基本法》，不折不扣把全面普選和高度自治的權利還給香港人民，把一切自由、民主、人權還給中國人民，這才是長治久安、建設和諧社会的不二法門。否則派再多的特务，吸取更多的特別黨員，都是無濟於事的。（《爭鳴》2006年1月號）

## 日本会变成中国的第 32 个省吗？

前些日子，本人应朋友之邀请，到日本呆了几天，除了看看枫叶之外，就是和朋友谈天、吃东洋美食。想不到，当年差不多占领过大半个中国的日本，现在它的国民居然在焦虑着“日本会不会变成中国的第 32 个省？”令不熟悉日中关系问题的笔者，大吃一惊。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于是，日本朋友向我大摆鸠山政府投靠中国、亲共媚共的种种言论、举动；大谈中共对日本的种种渗透。

由于中共权贵集团通过 60 年的搜刮、抢掠，变得越来越财大气粗。俨然全世界都要看它的脸色，但世界上也偏偏有逐利之徒，要仰其鼻息。上台不久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和他的老婆，就是一对典型。鸠山夫人亲自制作五星红旗花束送给中共驻日本大使的举动，就成了日本的政治丑闻。（图一）

中共用大量的民脂民膏收买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人才之外，还大力向外国的媒体渗透，日本《朝日新闻》、日本共同社以及一些报刊、电视台，已经成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日本的代言人。

日本政府允许大量的中国人进入日本，这些中国人包括留学生、结婚移民（嫁到日本的女人，每年就有 1 万个）、经济移民、实习人员、偷渡客（仅仅大阪地区据估计就有 1.6—2 万人）；应该说，在中共党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大都品质低下，文化素养差，为中共窃取情报、作奸犯科的为数不少，这些都对日本的社会传统，固有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许多日本人对此都表示担忧，惊呼“日本淪陷”、“日本就要成为中国殖民地”。

怀疑受到中共策划和指挥的“外国人参政运动”，引起日本人的强烈反对。这里的所谓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日本人说，中共不让中国人在中国参政，却鼓励中国人到日本参政，真是岂有此理。日本人还说，外国人在日本参政，是违反日本宪法的，中国人应该回到中国去争取参政权利，才是正经的。（图二）

中国副主席习近平 15 日在东京拜会明仁天皇事件，就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日本明仁天皇与外国政要会晤，按照皇家礼节，对方至少要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而中国是在中国外长杨洁篪访日时，才提出让天皇接见习近平。11 月 20 日杨洁篪与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在国会内会谈时要求协助安排习近平与天皇见面，当天在场的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山冈贤次表示，将与宫内厅协商。外务省 11 月 26 日向宫内厅正式提出习近平与天皇见面的要求，次日宫内厅以违反规定的理由拒绝。

12 月 4 日，小泽与首相鸠山由纪夫会谈后，鸠山出于对北京献媚的目的，指令官房长官平野博文打电话给宫内厅施压，宫内厅再次拒绝。12 月 9 日，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拜访小泽后，平野再以强硬的口气施压，终于迫使宫内厅接受。

鸠山政权迫使天皇为习近平破例，日本传媒和舆论哗然连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指责当局利用天皇达到政治目的，此举违反了日本宪法。指鸠山政权此举可能令日本出现二战前夕，把天皇作为政治工具的危机。

批评最尖锐的竟是日本亲中共的传媒、舆论。亲中共的大报《朝日新闻》和同样亲中共的日本共同社不断报道中国破坏规矩、强迫日本安排习近平与天皇见面的问题。《朝日新闻》用了半个头版和第二版整版做详尽的报道。

《朝日新闻》星期六晚报的头版登了类似打油诗的“一衣带水、一个月规定、一郎访华”，意思是说：“一水之隔的彼岸来人，此岸尽力迎接实属当然；但一国必须有遵守的规则，日本还有把天皇作盾，军国主义狂妄的历史，天皇不能被政治利用；一郎总不至于为换取对方欢迎把天皇抬出去吧，否则真是太过分。”

朝日电视台的《周日政经讨论会》主持人田原总一郎说，天皇破例会见问题是日本“重大事件”，而所有出席讨论会朝野政党代表罕见地一致表示反对这种破例，最后民主党议员渡边周承认，民主党内对事件有很大争议，他说，“如果可能，希望终止这个日程。”

因为这个破例见天皇的事件，习近平的访日目的已经大大折扣，变得“不重要”。他“访日本来作为新一代领导人外交亮相的初衷在日本可能已失去意义”。

与此同时，率领超大型访华团去了北京的小泽带着 143 名民主党国会议员在人民大会堂排队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握手、拍照，也为日本国民所厌恶，被日本传媒、舆论讽刺为“朝贡”。

中国公民冯正虎被中国八次拒绝入境，扔在日本机场已经超过 40 天了。按照国际通行常理，日本政府完全可以向中共政府提出抗议的。但是，鸠山政府居然屁都不敢放一个，看来鸠山政府的确是个胆小怕事的政权。

“日本会不会变成中国的第 32 个省？”不是空穴来风！

(2009.11)

作者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主编）

鳩山首相夫妻が十月九日に北京空港に降り立った時、そこでは催天凱駐日大使だった。大使に鳩山幸が手渡したのは、深紅のバラの花でアレンジした「五星紅旗」であった。前夜、手作りしたものだという。これには翌日の「日中韓首脳会議」で鳩山首相が何を発言したかよりも、共産党幹部たちは感動したのだそう。

中国の「新華ネット」が全世界に、鳩山幸が手作りしたバラの五星紅旗の写真を配信したが、そこには「鳩山首相夫人の幸は一九四三年上海生まれである」と日中友好の架橋を強調していた。

鹿児島では日の丸を引き裂いて党旗にした民主党が、「五星紅旗」なら深紅のバラで手作りするという一軸足がどこの国に在るのかよく分かる一例だ。

そんな「五星紅旗」が好きなの!?



(图一)

# 絶対反対！危険な日本解体法

## 外国人地方参政権



### ◆ 多様な共生社会の実現という綺麗な言葉のまやかし

母国に国籍を置いたまま、日本で税金を納めているからという理由だけで「日本国民固有の権利であり義務」である「選挙権」を外国人に差し上げていいのでしょうか？ 子供たちの未来のためにも他人事ではすまされません！



民主党は「外国人地方参政権付与」をマニフェストから削除したにも関わらず、民主党小沢幹事長は来年一月の通常国会に政府法案として提出することを決定しました。(11.11 付産経新聞) 民主党は国民の意見も聞かず、外国の意を汲んで、公明党、共産党、社民党と共に数で強引に成立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ます。小沢幹事長は韓国民主党代表に参政権は「やがて片がつく」と暴言。(11.12 産経新聞) 鳩山首相は外国人参政権について「地球が誕生して以来の愛のテーマである」とわけの分からない国会答弁で逃げ切りました。また「日本列島は日本人のものではない」とも公言しています。岡田外相は90万人に達する永住外国人の最大を占め、毎年1万人以上のペースで増え続ける中国人にも選挙権を与えると公言しています。一部新聞は報じ始めましたがテレビでは報じようとしません。予算分付けという財務省から指南された自作自演の茶番劇(政治ショー)ばかり持ち上げ報じています。

### ではなぜ危険か?というところ・・・

- ◆ **いつでも母国に帰ることができる外国人に日本の運命を託すことばれません。** 外国人は母国を第一に考え、忠誠を誓っています。このため移民国アメリカ合衆国では外国人参政権は認められておりません。ヨーロッパでもEU連合国内域のみに認められているにすぎず、それでもドイツ、フランスは国家の根幹に関わるため、憲法を改正しています。どこの国でも未来を左右する重大な問題なのです。
- ◆ **外国人票は大きな影響力を行使できます。** 票が拮抗している地域や人口の少ない過疎地域に住民票さえ移動すれば簡単に日本人の意思を封じ込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す。特定の宗教勢力、外国団体、政治団体が積極的に“外国人票”を利用します。また納税は参政権付与の理由という暴論がありますが納税は行政サービスの対価であり、国の将来を決める参政権とはなんら関係ありません。外国人の選挙応援次第で候補者の当落が決定されて良いのでしょうか？
- ◆ **外国による内政干渉が容易に増えます。** 拉致を実行するために工作員を潜入させる北朝鮮、歴史教科書編纂に介入し、鳥根県竹島を不法占拠し、長崎県対馬も領土と憚らない反日教育をする韓国、釜ギョーザ事件をうやむやにし、沖縄県尖閣諸島を一方的に領有主張し、チベット・ウイグル人虐殺を行い、自国民にすら普通選挙を与えない独裁軍事国家中国から来た人に参政権を差し上げて良いのか？北京オリンピック聖火リレーで中国人が紅い共産党旗で埋め尽くした長野市を思い出して下さい。
- ◆ **外国人参政権は憲法違反です。** 平成7年以降最高裁で三回も違憲である判断を出しているにも関わらず、民主党・公明党、社民党、共産党は違憲判決を触れません。憲法15条1項に参政権は「国民固有の権利」という明記を無視する暴挙です。憲法に保証された国民の基本的権利が侵害され、法治主義が崩壊してしまいます。
- ◆ **外国人優先法が成立し移民が増え治安が悪化します。** (2003年の時点で日本の外国人犯罪者は2500人、うち80%を中国人が占める。外国人発生率は日本人の4倍、中国人はさらにその2倍もの高い発生率を記録している 日本華字紙より) 民主党は「移民一千万人推進法」、「人権侵害救済法(外国人権利拡大、言論・表現統制法)」、不法滞在者でも3年間検挙されなければ自動的に日本人と同等の権利を与える「外国人住民基本法」や外国人に都合のよい二重国籍を付与する「重国籍法」、外国人との区別をなくす「戸籍廃止法」も準備に入っています。
- ◆ **※民主党は国民の生活が第一といっていますが、果たしてどこの国の国民を指し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

( 图二 )



# 右派分子吳祖光的兒子吳歡如是說

2004年7月号《明报月刊》发表名公子吴欢投书《母仪天下，不了了之》，拜读之后如苍蝇入喉，恶心到了极点，至今难以释怀。虽然他有忘记家仇身恨的自由，虽然我佩服他有卖父求荣的“勇气”。但事关大是大非，我仍要出来和他辩一辩。

斯大林是个什么东西，如今还值不值得拿他来炫耀，姑且不谈。只先问一下“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句话，对也不对？

對被强奸者，强奸犯是胜利者；

對被抢劫者，抢劫犯是胜利者；

對被杀害者，杀人犯是胜利者；

对1989年死于坦克车和机关枪之下的亡灵，邓小平、李鹏之流是胜利者；

对千百万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江泽民们是胜利者。

这些胜利者都可以不受谴责么！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这付挂在四川新都“宝光寺”大雄宝殿外的对联，是四川金堂何元普(字麓生，清代人)撰写的。不知名公子从哪里抄到的，连标点符号都弄不清楚，竟妄言是什么“佛家语”。

他标榜他母亲虽“受尽奇耻大辱，便是以‘不了了之’作为准则而终其一生”，号召受害者和害人者“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是“一家人”。

想当年，他父亲吴祖光上了毛泽东的当，被田汉出卖，打成了大右派，遣送北大荒服苦役。他母亲新凤霞不听刘芝明的劝告，不肯和吴祖光离婚改嫁以示划清界线，也被刘划为右派分子。那时候，吴欢一家在毛泽东、田汉、刘之明们的眼中连猪狗都不如呀！到如今，好了疮疤忘了痛。竟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和当年残害他一家的阴谋家、权术家、迫害狂攀亲认戚，许为“一家人”。天下有如此鲜廉寡耻，认贼作父的昏蛋么？

“家庭需要家长，公司需要董事长”，就一定表示“人民也需要主人”吗？这在逻辑上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按常理来说，家长必须负责任，爱护子女；这董事长必须为公司创造赢利，善待员工。可是中国人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所遇到的却是一个鱼肉百姓、与民为敌、狼心狗肺、无比凶残的家长 and 董事长。如果仍然要这样子的家长、董事长继续做我们的主人，岂不表示中国人民要永远成为万劫不复的奴隶！

名公子说，“共产党绝对不是很坏的人，他们支撑着整个中国，为中国人民做了无数的好事”。那真是谢天谢地罗，如果共产党不肯支撑中国，我们不早就亡国灭种了！只是我不明白，没有中共以前的中国是怎么过来的？五千年的中

国，竟要靠八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来支撑，听起来就像“苍蝇扛起了泰山”一样，不可思议。没有了中国共产党，地球就不转了。谁信这天方夜谭？

中共确实做了无数“好事”：反右派运动使数十万民族精英家破人亡，大跃进饿死了四千万人，文革让一亿人遭殃、二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官级别越来越高，贪污赃款，越来越巨额，暴力拆迁，野蛮征地，告状上访冤民络绎于途，充塞首都。有冤无处诉者在天安门前自焚，金水河投水……这就是中共的德政。森林砍光，土地沙漠化，江河污染，豆腐渣工程无处不有，儿童失学、工人失业、农民失地……这就是中共的丰功伟绩！

是的，“人生不过百年而已，和为贵，忍为高，一切顺其自然”，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安心做奴隶吧，反正“人民任何时候都做不了主”，那就当个奴才吧。共产党岂止“不是很坏”，简直是吴欢的大恩主加再生父母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铁骨铮铮的吴祖光先生，他曾在特务环伺之下，拍案而起，大骂毛贼：“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贼的像，为什么还要挂毛贼的像？毛贼搞极左，搞文革，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罪孽深重，应该彻底清算，批倒批臭，天安门上他的像早就该取掉了！还有，不是说了共产党员死后一律火葬吗？他那死尸为什么还要霸占着那个地方？”并在全国政协大会上要求平反“六四”。在吴欢看来他老子这番言论不但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乱骂”，而且有了“有欠公道”的罪名了。可怜的吴祖光先生刚死去不到两年，可谓尸骨未寒，就被他宝贝儿子拿出来作为向当权者献媚取宠的祭品了。

吴欢别有用心地问：“几千年的案翻得过来吗？有必要翻吗？”一副帮闲的嘴脸。他恰恰忘了，如果他父母的案不翻的话，他现在还得是人人得而骂之、人人得而打之、人人得而唾之、人人得而践踏之、人人得而虐杀之的狗崽子！如果他父母的案子不翻，他今天能把双脚放在明式家俱上，悠哉悠哉地靠他父母的余荫享清福----混迹于名流、吃喝玩乐吗？

对于这无父无母的东西，对于这为独裁专制涂脂抹粉的箴片，无以名之，且谥之曰：认贼作父，无耻之尤。

（2005,2,18）



## 什麼叫“民主”？

——《認賊作父，無恥之尤》（續）

### 在民主社會中，人權包括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

吳歡在《明報月刊》2004年7月號拋出《母儀天下，不了了之》之後，又在9月號拋出《談“民主”》。吳歡在這篇妙文中這麼說：“在美國，哪個人民(原文如此---引者註)能作主撤掉最有錢的比爾·蓋茨？在香港，哪個人民能作主撤掉最有錢的李嘉誠？”

吳歡想用這兩個問題來否定民主，正說明他對民主的無知。他不知道他的兩道問題正好證明了美國和香港這兩個地方還有點民主。民主制度保障了人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在民主社會中，人權包括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哪個人民”都無權作主撤掉比爾·蓋茨或李嘉誠，才是正常的。

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撤掉”比爾·蓋茨和李嘉誠這樣的事卻絕不新鮮。中共曾“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劉少奇：《給斯大林的信》，1952年10月20日)，於是有“資本家白天敲鑼打鼓(要求公私合營)，晚上回家抱頭痛哭”的情景。榮毅仁“是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的一個人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裡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這是周恩來1955年1月1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直到今天，中國大陸“最有錢的”還會隨時隨地遭中共“撤掉”，例如河南的孫大午，遼寧的楊斌和仰融……連赫赫有名、德高望重的霍英東，在南沙的巨額投資也差點被“撤掉”。用霍老顧問、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長何銘思先生的話說，就是被人“對着幹、飛腳橫踢、公開拆牆角”，被辱罵、被勒索，船廠被整垮，投資四十多億，一文也收不回來。“十幾年來，我們一直在受氣，還幾乎被人趕走。”(何先生文章連續五天刊登在《信報》上，題目叫《霍英東開發南沙》)霍老在港澳屹立數十年，從來沒有吃過虧，可是在大陸卻受盡烏氣。為甚麼？這就是有民主和沒有民主的區別了。

香港當然也會有商業糾紛，但可以依法處理，直至對簿公堂，由法院判決。可是在大陸，合約可以被公然篡改，借錢可以不還，“總是賬目不能公開，又總是無人能管，更總是狀告無門。”

大概吳歡對中共“代表人民撤掉最有錢的資本家”理解到了家，才會對共產黨共榮毅仁的產拍手稱快，對作踐霍英東的事熟視無睹；才會對美國不能撤掉比爾·蓋茨和香港不能撤掉李嘉誠感到遺憾吧。

吳歡說：“我是連我兒子的主都作不了的”。這說明他兒子有民主意識，他也不大反對民主。他既然在家裡容許民主，為甚麼對香港人談民主就這麼反感(吳歡所謂“煩”)呢？原來他把撤掉比爾·蓋茨和李嘉誠當作“民主”。這是他對民主的誤解、歪曲甚至誤導。他以為他還是毛主席的紅衛兵，還在大造資本家

的反呢。

**中共以知識分子和一切善良的人們為仇敵，以整人、殺人為最大娛樂和享受**

吳歡教訓我們說：“要緊的是自己幹好自己的事情，這是最實際的。”這話倒很有道理。這句話使我想起吳歡的父母----吳祖光和新鳳霞。我奉勸吳歡不妨讀讀乃父《從 1957 年說起》和乃母《祖光是個男子漢》(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經濟日報出版社)。吳、新二位字字血、聲聲淚，控訴的就是從 1949 年以後“自己想幹好自己的事”而不可得的悲慘故事。

例如“愛國”總算是每一個正常人都想幹好的事吧，可共產黨就是要剝奪人們這個正當的權利。吳祖光先生把 241 件國寶級的文物貢獻給故宮博物院；“把自己從香港帶回來的錢，買了一所地段最好的、坐落在王府井的四合院捐獻給國家，自己落得一無所有。”新鳳霞先生“把多年唱戲的戲服全部捐獻給國家，為了國家，只有獻出，不計得失。”他們倆對國家充滿了愛，是真正的赤誠的愛國者。可是“國家”又怎麼樣對待他們呢？從“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到具體工作的幹部，就沒有拿祖光當成自己的同志，都帶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成見，這就是對知識分子歷來的不公正，把好同志當成內奸。”因為中國共產黨需要的是奴才，不需要吳祖光這樣有本事“干好自己的事情”的人才。

吳祖光先生是偉大的劇作家，他為了“幹好自己的事情”，所以主張創作、寫作自由，認為“文學、藝術本是給廣大的讀者和觀眾讀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寫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應當給作家、藝術家絕對的自由。平常談論、討論、寫作、理論都是這樣……”就為了這點基本的要求，就跌進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陷阱，被田漢所出賣，成了文藝界第一個大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受盡折磨和屈辱。

新鳳霞先生是傑出的表演藝術家，她不屈服於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的威脅和誘騙，拒絕和吳祖光先生離婚以示劃清界綫，劉便立即宣布她為右派；不久又把她趕下舞台。她難道不想演戲和演好戲嗎？是有人要踐踏她嘛！

十年文革中他們遭抄家、批鬥、毆打，新鳳霞先生更被打殘，三個孩子(吳鋼、吳歡、吳霜)都不許上學，備受歧視，摧殘，“幾乎家破人亡”。這些為吳祖光先生切齒痛恨的“國家、民族的災難，加給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財產的損失，這歷史的孽債”，家庭恨、個人仇，吳歡通通忘記了。請問吳歡，毛澤東、田漢、劉芝明、打了吳祖光耳光的李振玉、佔了吳宅的萃華樓飯莊黨委書記姜□、拉平板三輪車到吳家搶走大量書籍的陳湘、把吳祖光告上法庭的國貿老板和不許吳、新開書畫展的陳希周，都是你的“自家人”，而且他們也當你是“自家人”么？

吳祖光說：“一場反右鬥爭，視知識分子為仇敵，以凌虐知識分子為最大的娛樂和享受”，其實，中共從 1949 年（應該修正為井岡山以來——武宜三）以來，每次運動都無不以知識分子和一切善良的人們為仇敵，以整人、殺人為最大娛樂和享受。而吳歡卻說“自家人無是非”，真是自作多情，白天發夢。

**祖光是個男子漢**

我珍藏着一篇吳祖光十年前寫的《祝賀〈明報〉三十五周年——記幾件小事》一文的剪報。文中記述了“國貿案”和書畫展等幾件小事。先後四次應邀舉行的吳、新書畫展，都被北京市領導人千方百計的破壞了。至於吳歡“要自家的仇恨最終要自家消化”的“六四事件”，吳老是這樣寫的：

“六四”屠殺是一場曠世的民族悲劇，已過去了五年。大錯已成，至今卻連一個負責的人都沒有。事已到此，我看也只有使人淡忘之一法。但幾年來每到此時便警備森嚴，氣氛緊張。說來慚愧，我都把這樁慘劇快忘記了。然而每一接觸到這種緊張氣氛，立即如聞當年的血腥氣，那一幅幅血洗長街的慘景便立即湧上眼前。這種每年成為定律的警戒完全是心虛引起恐懼的原因，使已經淡忘了往事的人又恢復了那時慘痛的記憶。而且這種警戒必將會一年比一年加劇加深，時間會越拖越長，使軍警的警戒任務越發加重。我就聽到過不只一名戰士的抱怨，這純粹是少數幾個當事人心虛胆戰、內心恐懼的表現。“自己嚇自己，終會被自己嚇死的”。但是戰士的任務和負擔太重了。國家的負擔太重了……

如今十五年了，北京當局之緊張、恐懼、警戒，果然如吳老所說，一年甚於一年。可見不肯“不了了之”的關鍵在那劊子手和其一小撮同夥身上，你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其可得乎！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279頁的注釋說：

1989年6月3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部份戒嚴部隊奉命進駐北京城內一些重要保衛目標。一部分入城部隊行動受阻，一些暴徒攔截、焚燒軍車，沖擊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和廣播電視等國家機關，搶劫槍支彈藥，殺害解放軍戰士。在事態急轉直下的形勢下，當日晚和4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採取果斷措施，迅速平息了由動亂進一步發展而成的反革命暴亂。

《鄧小平年譜》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經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是代表中共當局立場的。“六四事件”仍舊是“反革命暴亂事件”。想不了了之，門都沒有呀！因“六四”事件下台的趙紫陽，被軟禁十五年之久，到死仍不得自由，仍戴着“犯嚴重錯誤”的帽子進火葬場。既不經黨代會批准，又不經法院判決，而遭終身監禁，叫人如何“不了了之”？那些死了親人的丁子霖教授們，那些受傷致殘的人們，那些受事件影響而失去工作、找不到工作甚至還在逃亡和流離失所的人們，叫他們如何“不了了之”？我實在不明吳歡怎麼樣得出中共“對自己錯誤的反感和認知，比我們深刻得多了(原文如此)”呢？

**中國共產黨必須兌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的公民的民主權利**

吳祖光固然不會“不了了之”，新鳳霞也不曾“不了了之”。否則她為甚麼要寫《祖光是個男子漢》，為甚麼要歌頌“有骨氣的男子漢”吳祖光？

什麼是民主？《辭海》(1999年縮印本)有“民主”、“民主主義”、“民主權利”等條目，吳歡可以看一看。

——民主：1、庶民之主宰。2、“專制”的對稱。3、“專政”的對稱。4、“集中”的對稱。5、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領導幹部的一種優良作風。

——民主主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指導思想。17—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

啓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盧梭等提出。以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為基礎，提出“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反封建等級特權和君主專制制度的綱領。如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美國南北戰爭中林肯提出“民治、民有、民享”的主張。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國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的理論。

——民主權利：憲法和法律規定公民享有的各種民主、自由權利的通稱。是公民基本權利的主要部份。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選舉權、被選舉權；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和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監督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

我不厭其煩地抄下這些，是想告訴吳歡，民主不是什麼可怕的東西，不是洪水猛獸。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民主權利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的，雖然現在只是裝樣子、擺門面，並沒有兌現的意思，但講講總不犯法吧。怎麼就有“毀了自己的可能”呢？怎麼“最壞的情況就會隨時發生，一切將毀於一瞬間”呢？怎麼就要“有理由警惕自己不被某種不合時宜的意念所利用”呢？

### **道德、人品不能遺傳，文化、藝術也不能遺傳”**

什麼叫“天花亂墜”？“搗亂了”什麼？“煩”什麼？台灣普選總統，是“貌似民主”。我們槍選總書記，倒是真民主？

台灣徹夜抗爭，“人民慘了”，我們二三十萬冤民集聚北京，或被打死、或被打傷、或被抓、或被趕、或被勞改、或被判刑、或自焚、或跳河，倒是幸福啦？

台灣的“亂七八糟”，香港的“天花亂墜”，人們只是在法律範圍內行使自己的權利，又不是打家劫舍，又不做車匪路霸，你“心寒”什麼？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先生說：

就說“西方的”民主、人權吧，國人有的喜歡，有的厭惡，有的認為是“虛偽的”，有的則認為很真實。但實際上我們對民主、人權的態度還是由我們自己的問題決定的。我們喜歡民主、人權並不是因為洋人宣傳還是抵制它們，也不取決於他們的宣傳是真心真意還是虛情假意乃至別有用心，而是因為我們從自身的經歷認識到：若有民主就不至於因為老爺們好大喜功、嘩上取寵而導致數千萬人活活餓死的三年“人禍”，若有人權就不會發生瘋狂暴虐、摧殘人性的十年“浩劫”，若有自由就不會出現引蛇出洞、大舉坑儒的五七“陽謀”。（《問題與主義》，長春出版社，P7）

我非常不明白，一個經歷了陽謀、人禍、浩劫而身受其害的吳歡，為甚麼對民主如此深惡痛絕，連篇累牘地討伐之、批判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不明白一個經歷過被抄家、住宅被侵占、財產被搶劫、人身以至生命安全毫無保障的人，還要把不能撤掉比爾·蓋茨和李嘉誠做為“人民作不了主”即不民主的例子？

一個人忘了自己的苦難，是可悲的；還來美化苦難的製作者，則是可鄙了；再要教導大家都忘記苦難、都來對苦難的製作者感恩戴德，就更可惡了。人各有志，吳歡也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可是我不知道他這樣殫精竭慮、喋喋不休地教訓、開導香港人，是為了什麼，邀寵乎報恩乎？吳歡說：“共產黨在內地不搞運動了。”那不是穩定得很了嗎？可他又說：“我從內地來香港，追求的正是穩定。”看來他還真有點思維不“綿密”，邏輯不“嚴謹”了。把“哪個”和“人民”搭在一起，似乎連文字也欠通。吳祖光和新鳳霞二老不但道德高尚，而且都是寫作高手、語言大師。可他們的寶貝兒子却從思維、邏輯到文字都欠缺。難道“道德、人品不能遺傳，文化、藝術也不能遺傳”的說法是真的了？可惜呀可惜！（2005年4月12日《議報》周刊193期）

# 共產黨吃掉了它的總書記——胡耀邦

【導語：十四歲參加共產革命的胡耀邦，到 1989 年含冤去世，六十年間，他不但在對敵戰場上歷盡九死一生，而且在內部的殺戮中也屢遭凶險。胡耀邦宿命地死在他的同志和戰友的陰謀詭計之中，革命終於吃掉了它的兒子——胡耀邦。】

## 在蘇區肅反時，胡耀邦也險些人頭落地

為了鞏固“山大王”的地位，達到稱王稱霸的目的，毛澤東親自發動和指揮了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肅反運動，不惜用血腥手段消滅反對派和不同意見者，甚至以濫殺無辜來製造恐怖氣氛。在這次叫“殺 A B 團”的大屠殺中，據李銳統計至少死了十萬人，胡耀邦也差一點成了犧牲品。

1915 年出生的胡耀邦，十四歲就跟共產黨鬧革命，殺 A B 團時他也不過十七歲。只因被人告發他和比他大一歲的譚啓龍一起對大抓大殺自己同志表示過不滿，加上他的一個老師被當作 A B 團遭殺害，他本人又是讀過初中的“小知識分子”，所以他和譚啓龍就被省委政治保衛局和肅反委員會列入 A B 團成員的名單，並立即逮捕。恰巧在湘贛區視察的少共中央局巡視員馮文彬，對他們有些了解，於是就要求把他們帶回中央蘇區“審查”，從而救了他們一命。

這次死裡逃生的遭遇，幾十年後仍令胡耀邦心有餘悸，胡對譚啓龍說：“我們倆也險些人頭落地，多虧馬克思保佑，才幸免於難。”胡耀邦在去世前的幾天，還對去醫院探望他的馮文彬說：“當年如果沒有你把我帶出來，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胡耀邦這次死裡逃生確實只是一個僥倖，據譚啓龍回憶，僅他熟悉的人就有幾十個人被殺。

## 劉瀾濤欲置胡耀邦於死地

1964 年冬，被任命為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兼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胡耀邦，為了扭轉陝西省的極左局面，穩定人心，發展生產，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議召開省委和省政府會議並作出以下安定人心、有利生產的幾項決定，如捕人暫停；“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暫停；全面奪權暫停；省地縣三級抽調幹部到農村基層，參加生產、領導生產；向國務院申請減輕糧食征購任務，建設小化肥廠和增撥化肥等。

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只有生產不斷發展，才能談得上大好形勢，只有領導群眾增了產，才能稱得起是為人們忠誠地服了務。”“一切領導增了產的幹部，特別是在困難條件下領導增了產的幹部，就是好幹部，就是真正過得硬的好幹部。”“一手抓糧食，一手抓多種經營。”他還立足民生，倡導開放集市場貿易。建議“發展鄉鎮工業，解決城鎮就業問題。”胡耀邦實事求是的意見和方針，放寬政策、搞活經濟的“新政”，獲得了廣大幹部



和群众极力拥护，也產生了巨大的成果，但却遭到刘澜涛一伙的“围剿”和“扼杀”。

刘澜涛和胡耀邦本是西北局第一书记和第二書記之间的关系，但劉對胡有意見，卻不與胡直接討論，偏要反映到北京，然後用中央和西北局的名義来压胡。迫使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時間裡在中共陝西省委或各種會議上作多次檢討。例如3月16日勒令胡在陝西省贫代会上作公开检讨，六天的批斗和公开检讨，终于把胡整垮了，生命垂危。即使在医院抢救中，胡耀邦仍要趴在病床上痛苦地写《关于陕西工作的自我检讨》。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再召開扩大会议批斗胡耀邦，並把他的第五次违心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和分发山西省各市地县，企圖搞臭他。

在胡耀邦“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的最困難時刻，和張爱萍、张宗逊到陕西视察军事工作叶劍英就要求把胡帶回北京。胡耀邦离开西安后，劉瀾濤繼續指使西北局和陝西省委批判胡耀邦，而且一批批了十二年。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不是葉劍英的“偶然”出現，胡耀邦大約是逃不過這一劫的。

支持胡耀邦“新政”的省委第二書記赵守一、省長李启明等人，則受到嚴厲的批判和打击。省委常委、老紅軍刘子义因抵制对胡耀邦和赵守一的批判，竟被迫在批判胡趙的省委擴大會會場上吊自杀，妻离子散。到1966年2月，陝西省委已經把胡耀邦問題上綱到“兩條道路的問題”、“反對社會主義的問題”的嚇人高度了，還要給他加上反劉少奇、反彭真的罪名。把他們說成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代理人，是“右傾機會主義集團”。並株連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等四十多人，這些人或被圈进了“集训班”，或被投進了监狱。

西北局和陝西省委起草的《關於胡耀邦同志和反黨分子趙守一等相互勾結進行反黨活动的材料》中說：胡耀邦“在陝西工作期間，很快同習仲勋反黨集团在陝西安下的釘子、培養的接班人趙守一和李啓明結成一伙，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西北局、反對中央。”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

### 毛澤東說胡耀邦“沒有好下場”

文革初期，共青團中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北京市各中学派出工作組，後來被毛澤東批評為“鎮壓學生运动沒有好下場！”胡因此受到強烈冲擊，遭到紅衛兵揪头髮、拳打腳踢、坐“噴氣式”等慘無人道的批斗，受盡漫罵和侮辱。即使痔瘡复发，住了医院還被揪斗，有次竟被打得鼻青臉腫、腰椎骨挫傷，如果不是協和醫院女醫生挺身而出，制止紅衛兵繼續揪斗他，宁折不彎、不講違心話、既不損害任何同志又維護自己尊嚴的胡耀邦，能否逃過被毆打至死的“好下場”，實屬疑問。

毛澤東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又讓胡耀邦陷入沒頂之災。隨鄧小平的下臺，胡也被停職反省，再次遭到拳打腳踢、坐“噴氣式”的批斗。1976年還被揪去大連批斗，後因醫生估計胡有胃癌可能，才又把他送進醫院，在由大連返北京的那天晚上，唐山大地震爆發，火車差点被顛翻，胡耀邦幾遭不測。

當上總書記的胡耀邦根據鄧小平在 1980 年就提出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1986 年發表要求“中央委員會成員一到六十歲就退休”，“那些已經超過八十歲的老同志更應該往下退了”的講話，竟引起鄧小平的忌恨。

可憐的胡耀邦幾次大難不死，最後卻徹底沉沒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政治家鄧小平及其一伙深謀遠慮、無比倫比的陰謀詭計之中。一個厚重直言、不設城府、公道正派、待人寬厚、與人為善的人，遂為一群嗜權如命、反覆無常、專搞陰謀詭計、以私廢公、目無法紀、過河拆橋、忘恩負義、死不認錯、殘民以逞的權術家、陰謀家、野心家所暗算。一出現代版的《逼宮》丑劇，不僅奪去了胡耀邦的性命，也斷送中華民族再次振興的機會，令人惋惜。

### **“革命吞吃掉了它的兒子”，這是宿命**

胡耀邦在 1978 年的一個批示中說，“我們黨從有政權以來，已經有五十一年的歷史了。五十一年以來，經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極其錯誤的審干政策和肅反政策……這種政策可以發展到極端荒唐、極其野蠻的地步。”也就是說，中共從 1927 年有了井岡山根據地時起，就已經成了一部純粹的殺人機器。

即使以“一生多厄運，到老不欺心”自命的胡耀邦，也不得不成為這部殺人機器的一部分。他深有感慨地說，我回顧一生，有兩件事是難以原諒自己的，提高來看，也是做人道德的問題。一件是 1959 年廬山會議上，我明知彭老總是對的，但因為相信中央，也舉了手。第二件是 1968 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一看到說少奇同志是“內奸”的材料，就知道是不可靠的，這時我已經並不以為上邊說的一定正確了，而是抱著“夫復何言”和“不得已”的態度，勉強舉了手。在中共這部龐大的殺人機器面前，每個人都可能是殺人兇手，每個人也都可能是被殺者。尤其當這殺人機器瘋狂轉動的時候，誰就都無法逃脫被吞噬的命運，即使是“位高權重”的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元帥、將軍、部長。這就是胡耀邦們的悲哀，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哀。（6-NOV-2005 於深圳河畔）

# 共产党仍然是没有忘记坑害穷人的党

-----评林田《西方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武宜三

主题：“新华社离休老同志”林田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西方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愿与大家讨论”。

林田先生：

1、你说，“共产党来领导，这是由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内外形势决定的。”不错。但是，嬴秦、刘汉、赵宋、爱新觉罗的“领导”，难道“不是由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内外形势决定的”？

而且，国民党为什么就不能领导中国呢？

2、你说“把握好和平发展的机遇，大约40年后，我们就将赶上或超过美国”，很好、很好。只是我想，这个美梦的实现，必须让美国人在未来的40年中，每年增长不得大于2%。但谁有这个本事呢？就以我们贵国的文化教育水平、科学水平、人口素质、资源、环境，如何保证每年都有8%增长呢？

3、如果我们贵国能在1945年“把握好和平发展的机遇”，早就跑在日本前面去了（起码也不相上下），何至于今日还在找什么机遇？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参考武宜三：《评〈黄克诚自述〉》）

4、“实行美式民主，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何以见得？再说，“成为美国的附庸”，有什么不好？看看日本、韩国、台湾。他们至少比当苏联（俄国）附庸的中国、朝鲜、蒙古强多了吧。请你看看毛泽东在1945年时，是怎么吹捧“美式民主”？美国至今没有占领中国一寸土地。美国不但在抗日战争中帮助中国人、在国共战争中帮助共产党，而且现在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可靠的后方和避难所。看看现在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不是“美国人”的爸爸或爷爷？有哪一个先富起来的中共党人不把进入美国当作第一选择？

妖魔化美国，如果不是骗人，就是被人所欺骗。骗人者可耻，被骗者可怜。

5、“幸亏邓小平下决心果断处置，保证了中国有20年的稳定发展”。用杀人保证稳定，值得“幸亏”吗？而且稳定了谁呢？

是千千万万下岗工人？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是千千万万的农村失学儿童？是千千万万的访民……

6、“共产党仍然是一个没有忘记穷人的党”，只是不肯公布财产、不愿意受监督，“从省到市县乡镇的党政机关以至所属部门，争先盖豪华大楼或楼院，搞劳民伤财的什么‘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公款旅游（包括出国）等等更是成了理所当然的待遇和享受，而这许多问题都是中央三令五申，屡禁不止，不了了之的。少数（？---武注）领导干部甚至向‘问题大款’和‘黑帮老大’看齐，胡作非为，腐化堕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应该说，共产党仍然是没有忘记坑害穷人的党。

于香港

2009、5、13

-----  
**【附】林田：《西方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近年来，我国知识界一些人士中流行着一种观点：中国现行的共产党领导体制，是一党专政，也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延续。现在严重的官员贪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弊病都由此而来。

这个说法，正是当今倡导在中国照搬西方民主的人们的主要论据。他们赞成有人提出的“回归‘五四’”的口号，也是由此论据出发。而所谓“回归‘五四’”，就是从从来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掉封建主义的东西。据此，他们主张的政治改革，就是要改掉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国内有的报刊杂志，也隐隐约约地向读者灌输这种观点。有人还把这种观点加以包装，拿来向中共中央献策。

上述看法，涉及到以下几个根本问题，现在我想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是走错了路？其后果是否使中国社会倒退到了“五四”以前的状态？**

上述观点的论者认为，上世纪初中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如果发展下去，就会使中国进入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可惜时间不长就被“新启蒙”运动打断。这个所谓“新启蒙”，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结果导致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后果是时至今日，中国仍处于类似“五四”前的专制主义统治之下。按这种说法，中共领导的革命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倒退。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前夕，中国正处于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推翻帝制后也处于低潮之中。高举科学与民主旗帜的“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生机，明确了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稍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工农为阶级基础的中共

党宣告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它虽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但近期革命目标与孙中山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认识到自己领导的国民党因部分上层腐败并向右滑落，因而难当革命大任时，决计与共产党合作，吸收共产党的骨干成员加入本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一决策的实施，使国民党获得了青春活力，于是才有了北伐战争的初步胜利。但正当这个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以蒋介石为总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发动了叛变，他们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骤然变成了白色大恐怖。这使人想起了马克思描述的十九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情景：每当法国资产阶级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发动反封建的起义时，工人阶级总是以小兄弟的身份去冲锋陷阵，而当起义胜利、工人阶级提出自己的要求时，掌了权的资产阶级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并把他们置于血泊之中。这是带有一点普遍性的历史规律。蒋介石也是这样干的，只是他背后站的已经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地主、买办和帝国主义。但中国共产党没有像法国工人那样重复城市的街垒战斗，而是到农村去，建立、发展起了自己独立的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经过艰难惨烈的红军反围剿的十年内战、付出重大牺牲的国共合作八年抗日战争和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到，不是在“新启蒙”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打断了“五四”的启蒙运动，而是共产党代替并战胜了已堕落成革命对象的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把这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了到底。

建国以后，共产党领导全国过早又全面地改造私有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看来是不利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的，以至最后搞成了“穷社会主义”。但计划经济在一定条件下，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集中全国力量建设了若干重工业基地，抗住了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政治、军事压力等。应当说，当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济政策，都带有试验的性质。后来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就加以改变，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严重的是，这一时期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包括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给全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些反复折腾不仅使成百万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受到迫害，而且造成了农村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这些严重错误，确实都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有关，突出表现就是党的领袖人物的独断专行和个人迷信与崇拜。但发生这些错误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一是当时党的领导还比较幼稚，教条式地理解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是受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实践的影响。从红军时代开始就多次重复的左倾路线，到全国解放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至进行“文化大革命”，都与此有关。二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脱离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幻想通过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以至采用行政手段，加速实现社会主义，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过这些错误，在以后的年代，都陆续由共产党自己做了纠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并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我们在评价建国以来 60 年的这段历史时，应当看到，前 30 年虽然因共产党的领导的多次严重错误给全国人民带来过灾难，但毕竟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坚持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并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而后 30 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开始了现代化与“和平崛起”的征程。总之，把建国以来的 60 年说得一团漆黑，并说中国已经倒退到“五四”以前的状况，只能被认为是不顾事实的胡说。现在，共产党的党政领导体制、制度和作风，确实存在着官僚主义，缺乏民主，以及少数官员贪污腐败、特权思想严重等弊病，急待通过整治和深化政治改革加以解决，但说整个党政领导已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集团或阶层，则是耸人听闻。真实意图是为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制造舆论。其实，这种“革命”1989 年已经预演过，幸亏邓小平下决心果断处置，保证了中国有 20 年的稳定发展。当然，与此同时，党政机关和官员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也越严重了。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 2、官员贪腐普遍化与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怎么来的？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绩，但也积累、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群众意见最大的，一是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官员贪污腐败的日渐普遍化，二是社会的不公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社会上有各种看法。

按照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人士的说法，这些弊病都是由于旧的政治体制中存在封建特权和缺乏民主监督，经济改革不彻底和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总之，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东西带来的，只有改掉封建专制主义，这些弊病才能消除。

我则认为，官员贪腐和社会两极分化等弊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而封建专制思想残余及特权思想的影响，更助长了这些弊病的发展，并使这些弊病带上了中国特色。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带有空想成分和封建思想残余的社会主义，当时由于社会普遍贫穷，官员贪污还不是社会主要弊病，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在少数领导干部生活上谋求超过制度规定的特殊待遇。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体制、价格等方面“双轨制”的漏洞，通过自己或由亲属经商和倒卖批文、批件等捞取大笔财富，这就是一时为群众痛恨的所谓“官商”、“官倒儿”。接着是在国企承包与国企改革中，一些官员和企业领导者与商人相勾结，以巧取豪夺、掏空企业和剥夺生产者等各种方式，大发横财，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大批生产者下岗失业。再后是随着城市房地产业和证券市场等的兴起，一些官员又通过审批项目和批售土地以及与券商联手操弄股市等大肆索贿、受贿和通过内部交易敛财。最后，贪腐之风侵染及整个官场，买官、卖官，贪赃枉法，官员与黑社会勾结，贪官携款外逃等等，也屡见不鲜。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逃亡北美和欧洲的腐败官员达 1 万多人，携带外逃款项合人民币 6500 多亿元，干部每年公款吃喝开支 2000 多亿元，公车私用造成国家每年损失 4000 多亿元。估计腐败官员每年吞噬的财富也不会只有几千亿元吧！



不仅如此，而且伴随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多多少少出现了恩格斯描述过的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情景：商业日益变成欺诈，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同时由于权力的商品化和其他本身不是商品的东西“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也可以被它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资本论》1975年版一卷120页），于是“惟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由激烈竞争形成的所谓“动物精神”（又称“丛林法则”，即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也如动物界一样，“弱肉强食”是必然法则）等，也理所当然地泛滥开来。这一切，都为官员的贪腐既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又提供了作为时髦观念的意识形态。而官员贪腐的普遍化，又导致了社会风气恶化。

至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除了由官场腐败和所谓现代“红顶商人”现象引起的社会分化以外，与改革开放中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和政策有关。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继续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工业品等的价格都已陆续放开，而粮食、油料等农产品却保持着征购或半征购的制度，当时自由市场小麦每斤二、三角，征购价却只给一角多。光是粮食征购一项，国家每年就白白从农民手中拿走二、三百亿元。进入90年代以后，农产品价格也放开了，但又来了一个“打白条”，国家指定银行发给粮食收购部门的贷款，银行却从明道暗道贷给了各种名目的开发商、投机商。结果农民排队交了粮食，得到的是粮站开给的一纸白条，不知等多长时间才能兑现。这以后，县市、乡镇干部和编外人员大量增加，开支膨胀，国家预算中没这笔钱，于是又加到农民头上，这就是农民难以负担的名目繁多的税费的问题。在税收方面，沿海开放地区税率低；而中西部地区税率高。比如80年代，广东珠三角地区，进口工业设备免税，而粤北山区与内地则按15%以上的税税率收税。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为了使GDP快速增长，以显示政绩，并为迅速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惜一切代价竞相为投资者创造优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血汗工资制度可以容忍，工人生命安全可以不顾，失地农民生活可以不管，环境严重污染可以不问，矿山、森林等自然资源可以低价或无偿占用，结果投资者的经营成本压到最低，利润率也就最高，劳动者收入也就最低。于是一极是改革开放受益最多的人，包括那些靠不正当或非法收入暴富的人，另一极是受益最少、付出牺牲最大的人，主要是下岗失业工人和部分农民。大多数工农群众生活虽有所改善，但相当大一部分人仍处于贫困状态，相对来说，贫富差距是进一步扩大了。据国际有关机构公布的资料，中国改革开放前基尼系数为0.16，改革开放初期为0.2左右，80年代为0.3左右，2006年就升至了0.46，超过了社会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客观地分析，在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期，有些政策是当时的形势决定的，是必要的，或说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经济要启动，不可能齐头并进。当时适应市场经济的法令制度也不可能一下子都很完善。要调整那些现在看来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的政策，也需要国家经济和财政有了一定实力以后。而更根本的原因是，

我们既要恢复、发展资本主义，就必然要付出代价，而这代价又必然是由劳动群众承担的。因为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建立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对立上的生产方式和剥削制度，它既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有它的很大的积极作用，也有它的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和影响。马克思早已揭示：资本家的动机“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资本论》一卷 649 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可以快速地发展生产力，并为将来的更高级的社会（共产主义）创造作为现实基础的物质条件。但同时，又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因为“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象货币储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多少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同前 6 5 1 页）。“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三卷 2 9 7 页）。简单说来就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又是它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这种现象就不可能根本消除，只能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把它控制在合理的（社会可以接受的）限度以内。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则已经具备了这种条件，中央已经在采取措施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改革。因为谁都知道，中国不搞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也不是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而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占社会总生产大约 1 0 % 的情况下，急急忙忙通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若干年后，又不得不如刘少奇当年所寓言地那样，把资本主义“再请回来”。但是，我们今天在庆幸请回资本主义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它带来的社会弊病和负面影响。

有些人会说，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都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们的政府官员腐败现象却很少见，社会贫富差距也比中国小得多。我们说，情况确实如此。但简要回顾一下欧洲一些国家近代的历史就会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为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而采取的罪恶手段，从虐待童工，掠夺和贩卖奴隶，推行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在美洲大陆猎杀土著印地安人和红种人，到官场、商场上的贿赂、诈骗、投机等等，都是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存在的，有的就是由政府推行或支持的。政权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等弊病更是极为严重。这些罪恶、腐败现象一方面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又从一开始就不断破坏着体现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阻碍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并引起公众愤恨。所以一旦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首先是那些与贪官没有瓜葛的资本家）就再不能容忍这些罪恶和腐败现象的存在，于是资产阶级政府才通过立法等措施来消减这些现象。工人阶级为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也不能不

迫使政府以法令来控制劳动群众极端贫困化的趋势。这样经过长期的博弈和斗争，才出现了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现在的情况。不过，就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上层腐败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也并未根除，而是改变了表现形式。比如不久前由美国引起、现已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由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疯狂地进行投机、诈骗以及政府有关部门有意放纵和监督失职搞起来的。连美国的评论家也惊呼：这是美国金融界上层道德堕落的结果（金融界上层虽然名义上不属于官方，但他们实质上是更有权力的统治者）。还有最近被披露的美国驻伊拉克高级军官与美国承包商互相勾结，通过行贿、受贿和诈骗等手段，致使 1200 多亿美元的对伊援建款中有 500 多亿美元竟然不知去向，因而被媒体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诈骗案件。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毕竟比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要好得多。中国如果经济、政治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其结果只能是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或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状况相似。政府廉洁和社会公平的程度要达到现在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必然也要经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劳动人民还要作出第二次牺牲。

至于所谓经济改革不彻底和政治改革滞后导致了官员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的说法，更是一种貌似有理而实质上是全盘西化论者一种巧辩之词。因为他们所说的经济改革不彻底，是指国有经济私有化不彻底，怎么算彻底？现在是“公有制为主体”，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概就彻底了。他们所说的政治改革滞后，是指共产党迟迟没有退出执政地位。总之，他们认为只有从经济到政治全盘西化了，才不会出现社会弊病。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当然，我们也认为，我国的经济改革还需要继续深入，但不是为了削弱公有制经济，而是在巩固、发展、健全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使整个国民经济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运行。政治改革也确实需要抓紧和加大力度展开，因为只有通过政治改革，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使党政机关和官员受到人民群众的严格监督，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但这种政治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不是为了取消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通过发展、扩大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反过来说，只有在党的正确有效的领导下，才能搞好政治民主建设。

### 三、照搬西方民主是自甘堕落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即使是法制健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根除其社会弊病，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中国，要想通过实行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幻想便是骗人。因为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不可能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根除，它只能把这些社会弊病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而且要在生产力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国民的政治、文化素质等都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之后。

唯物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人们不是凭空地创造历史，而总是在已有的现实环境中选择和开辟前进的道路。按迷信西方民主的人们所言，如果中国在“五四”以后，不走共产党领导的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之路，而是走照搬西方民

主之路行不行呢？我们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行不通。为什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讲过，不是中国人不想走那条路，而是有人不让走。道理很简单，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控制之下，经济、政治力量都很薄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掌握政权，形式上学了西方民主，最后统治权还是要落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表手中。孙中山一时闹成了革命，最后还是不得不把大总统的宝座让给袁世凯，就是显著的例证。再来一次，其结果会依然如此，只是统治者中会增加一个开始成长起来的官僚资产阶级。所以，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而这个革命，就必须由工人阶级的党——共产党来领导，这是由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内外形势决定的。前面已经谈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在自我纠正以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终于走上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基本通行的政治制度，而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又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它代表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现在的最高成就。也正因如此，我国一些迷信西方民主的人士，宣称这种民主制度具有全世界的所谓“普世性”，并认为是人类最终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如同他们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最终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一样。但在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史中最后一个建立在剥削制度上的社会，同样，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也只是建立在最后一种剥削制度和金钱上的民主。与欠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的民主相比，它是进步了，完善了。但正如列宁曾一针见血指出的，它仍然是“只供少数富人享受的民主”。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由美国引起的国际经济危机，再次打破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完美无缺的神话，也打破了美国式的民主能够制约、监督上层权力人物任何贪腐与恶行的神话。这再一次证明，这种为少数人享用的民主最终要被为人民大众所享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所代替。当然这也许是较远的将来的事。

现在，我们国家在生产力和现代化水平方面，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一段距离，但在社会和国家制度的主要方面，其优越性已超过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原因就在于我们一方面实行市场经济，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占了约 70% 的比重，但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中，社会主义因素则居于主导地位。正如胡锦涛在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我们“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了。这不仅保证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而且保证了我们的国家政权有意愿、有能力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自从党中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一系列重视民生、惠及劳动群众的政策措施的持续实施，显示出我们的党和政府在照顾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同时，把劳动人民的利益，特别是贫困群众的利益，放在了心上。如果按群众以前通俗的说法，共产党是一个穷人的党，现在就可以说，共产党仍然是一个没有忘记穷人的党。与此同时，中共

中央对反腐败也在加强推进。应当承认，我国在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方面，在公民权利的实际保障方面，还存在许多落后和不足之处，这是我们今后必须下大力解决的问题。从形式来看，我国公民享受民主的程度，远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从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来说，已经超过了他们。时至今日，再回过头来照搬西方民主，只能是走回头路。而且我们看到，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照搬西方式的民主，只能带来纷争以至战乱不止的局面，结果就会落得连印度也不如（由于英国的培植，印度效法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里是作得较好的，但它的上层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恐怕比我们还要严重）。从世界战略形势来说，我们按照美国制华的意图，搞颜色革命，实行美式民主，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加强美国称霸的“一极”格局，在世界全球化中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延缓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总之，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照搬西方民主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自甘堕落之举。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得通吗？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 20 多年的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中经历了多次挫折，最后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才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30 年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使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虽然存在社会分配不公等现象，但总算结束了长期成为笼罩中国阴影的农村贫困人口饥饿的历史，不算少数“先富”的人，至少一半人口过上了接近小康水平的生活。从邓小平 1981 年 7 月会见香港作家《明报》社长金庸时，提出“中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到 2007 年 10 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所作政治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定义性的阐述以后，这条道路的理论、体制框架和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已明确。今后只要在实践中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不断完善，这条路应是走得通的。但从今天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来说，这条道路上仍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胡锦涛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大会讲话中说：“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说明中共中央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承认有失掉执政地位的可能性。我认为，即使排除被战争打断的情况，至少有三种发生“改旗易帜”的可能。

第一是党政上层领导自己搞政变，抛开共产党领导，实行西方民主。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这样搞的，导致了苏共下台，苏联解体（苏联的弊病另当别论）。2002 年中共举行十六大以后，西方媒体曾经报道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一次谈话。他说（大意），中共领导人更替以后，美国政界有人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会持续下去？他的回答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中共不管谁接班，都不会改变这个方针。接着他说：美国有些人总想从外部施加压力改变中国政权，这只能引起中国人反感。他劝美国不必性急。他认为，江的下一代（领导人）政权不会改变，因为他们受过共产党的传统教育。再下一代以后，就

有可能改变了。李光耀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的这番话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西方反华势力以各种方式资助国内打着民主旗号的持不同政见者，煽动、扩大因政府某些错误举措引起的群众动乱，重新搞 1989 年预演中破产的“颜色革命”，由其代理人夺取政权。现在由于党政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严重，所谓“群体事件”不断出现，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也有一些人向往西方民主，所以不排除发生这种事件的可能。

第三，党政领导机关官僚化，官员腐败普遍化，如同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年代，失掉了民心。结果，或是党的执政地位很快丧失，或是执政地位虽然得以维持，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变质。到一定时候，社会主义的牌子也会被扔掉。

怎样防止和克服这些危机？中央已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战略、政策措施。但令人担忧的是效果并不显著，特别是在消除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方面，进展不大，危机仍然存在。温家宝在 2009 年 3 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与网友对话中说：“我以为，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府廉洁是支撑一个社会稳定的三个顶梁柱。而在这三者当中，政府廉洁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社会公正。我懂得百姓之所以关心反腐败，是关心我们政府的基础，就是要建设一个务实、高效、廉洁、让人民放心和满意的政府。”他是从政府角度讲的，如果从执政党的角度讲，要作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政府廉洁，共产党本身必须是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朝气，能在内外资本主义包围并与其共处中拒腐防变、保持先进性的党。一句话，就是必须解决好执政党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

这是一个关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领导人讲话也多次作了系统阐述，无需我们全面展开谈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和教育问题。二是对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恰恰在这两点上，还存在着有不少问题。现在我们的干部选拔，基本上是由领导决定。少数地方、部门选拔干部搞“任人唯亲”，以领导好恶来取舍，有的地方甚至搞“任人唯钱”，于是一些善于弄虚作假、阿谀奉承之徒以及用钱打通“关节”的人得到提拔重用，正直廉洁之士受到冷落排挤。致使一些坏人也挤进了我们的干部队伍，甚至进入了领导岗位。干部的考核、培训、组织学习等相当程度是做样子，走过场，流于形式。由于一些部门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失去了监督，特别是自下而上的监督，致使官僚主义盛行，奢靡之风泛滥。近年来，从省到市县乡镇的党政机关以至所属部门，争先盖豪华大楼或楼院，搞劳民伤财的什么“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公款旅游（包括出国）等等更是成了理所当然的待遇和享受，而这许多问题都是中央三令五申，屡禁不止，不了了之的。少数领导干部甚至向“问题大款”和“黑帮老大”看齐，胡作非为，腐化堕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这些问题如不解决，要使共产党不变质、不丢掉执政地位是不可能的。



对领导干部的选拔和监督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提出的（马克思在 1871 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提出来，恩格斯在 20 年后为此书写的导言中进一步明确），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怎样“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当时他们得出的经验有两点：一是所有行政、司法等公职人员，都由普选产生，选举者随时可以撤换他们。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是巴黎公社在当时的非常情况下采取的非常措施。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与巴黎公社所处时代和情况已大不相同，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这些措施。但它的精神实质值得借鉴。如同我们已经和正在借鉴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某些有益的成分一样。我们至少可以逐步实行：所有公职人员都应当由人民当家的民主程序产生，并接受人民的监督，使投机分子和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人难以进入公职人员队伍。他们的工资、生活待遇等应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他们的财产应予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使贪污腐败分子难以藏身。总之，防止党政机关和官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要靠实行民主，反腐败要依靠群众。

在推进民主这一点上，我们和主张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人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分歧在于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认为，只要有共产党领导，就无法对它进行监督。我们则认为，在中国当今情况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人民的民主。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原则和措施，一条重要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可以看作是对主张实行西方民主的人们的挑战的答复。问题是如何落实这一原则，既坚持党的领导，又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问题，现在还远未解决。我觉得，我们的政治改革，从理论到实践，从方针政策到具体措施，都应围绕这个问题深入进行。特别是实行和扩大政治民主问题，首先要从党内严格做起。

如果通过深入政治改革，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措施以及根据情况发展变化进一步采取的措施都能得到落实，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并通过加强人民的民主监督，搞好了党的建设和政府的廉政建设，真正作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政府廉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走下去。如果这些原则和措施只停留在口头和书面上，这条道路迟早会走不下去。

2008 年，按当年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 GDP 大约是 3200 美元；美国的人均 GDP 是 47000 美元。假设今后我国经济每年增长 8%，美国每年增长 2%。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变质，不下台，又能善于应对国际局势，把握好和平发展的机遇，大约 40 年后，我们就将赶上或超过美国（如果按实际购买力来计算两国的人均 GDP，也许不到 30 年）。这正好达到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步的战略目标。到那时，人们也就不再羡慕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民主制度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也就算真正走通了。现在，迷信西方民主的人们说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走不通，是言之过早；我们自己说走得通，只能算是表达决心和信心，作为结论，也言之过早。（林田 2009 年 3 月 24 日于兰州）

〔在台北 2010《中国民主化前景展望与探索》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扩充版）〕

## 纪念“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发表 52 周年

-----香港五七学社武宜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他的博客中透露，最近他在江西某地演讲，呼吁地方政府不要强拆民房和强征农民土地，一位中共县委书记反驳说：“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一言论引起我许多感慨：1、中共号称改革开放 30 年，要与世界接轨云云，可是一点没有长进。连最基本的问题，究竟谁养活谁？都没有搞清楚。2、中共歧视、仇视知识分子的的二流子、流氓、土匪基因，仍然代代相传，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3、回应这次大会主题，如果中国要实现民主化，就要揭露和批判中共歧视、仇视知识分子，仍然在执行的“应当消灭知识分子！”的总路线。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 1958 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公开发表 52 年了。这是一件还没有被历史学家所注意，但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件大事情。

“消灭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坚定不移的一条总路线，是一切战略、战术和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条总路线，一部中共党历史、一部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成了一盆浆糊。此所谓“纲不举、目不张”也。

例如，几十年来的不断政治运动，都是针对和迫害知识分子，文革十年，更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把大中小学通通关闭，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山区。

再例如，川震中豆腐渣工程、大头娃娃奶粉、三聚氰胺奶粉、上学难、少儿失学率高扬、教育投入少且被贪污挪用、教育奴工……这一切怎么解释？但是，有了这条总路线，就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必须“从娃娃抓起”；消灭知识分子，就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之中”。

也许有好心人要批评我偏激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共产党。但我只想问一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干的哪一件事不是伤天害理、不是断子绝孙呢？共产党干坏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

复旦大学孙大雨教授曾经指责当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是“反革命”，为什么呢？据孙大雨说，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亲耳听到潘汉年在一次报告中说：“解放后的中国，少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根本无所谓。就是把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枪毙也没有甚么了不起。”

### “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总路线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的出土，有特殊意义。一，承先启后，证明中国

共产党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连贯性；二，是一把钥匙，可以解开“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

这史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发掘出来的：

云大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90%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消息曾被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父亲说：“知识分子是改造的问题，不是消灭的问题，这简直是借寇兵资盗粮！”（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云大，即云南大学。父亲，即李岫的父亲李广田，时为云南大学校长。这位仅仅对“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表示一下异议的诗人、作家、教育家，不久就被他的党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消灭---沉尸昆明莲花池了。当年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来批判共产党，现在我引用这条史料来解决右派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中共内部是否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条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的“革命路线”或“反革命路线”？中共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样丧心病狂？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穷一生而未毕的功业。他的这个宏圖大志，大约在1925年就定下来了。毛泽东在那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已经把知识分子当作“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中“修改稿”虽然将这些可怕的文字删除，但删除的原因却非悔悟，而是出于掩盖和欺骗，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从来没有改变。（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

敌视知识分子方针早已定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在掌握权力、抓住刀把子之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成为“朱毛赤匪”首领之后，就开始对知识分子举起屠刀、大开殺戒。

1928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

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数万人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党员和红军官兵被肉体消灭；其中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杀光。

1931年，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上“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达6千多人。胡耀邦因是读过初中的“小知识分子”，也险遭杀害。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知识分子又成为抢救的重点，不少人因此被消灭。

### 连绵不绝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

窃取全国政权后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荦荦大端者有：

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镇反”）；

1951 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

1951--1952 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3 年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1954 年的批判胡适思想；

1955 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肃清反革命（“肃反”）运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及“拔白旗”运动；

1964 年，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即发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

1966 年开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文革这个大运动中还套有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许多小运动；

1983 年，所谓清除精神污染；

1987 年反自由化；

1989 年 6.4 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及共产党反动派打击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

土改和镇反，把地主、富农等农村中的精英分子以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民国时代党政团军教人员几十万消灭了。

胡风本是中共的“党外进步作家”，只因文艺观点与毛泽东相左，也在消灭之列；全国涉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者共 2,100 人，逮捕 92 人，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 78 人，其中骨干分子 23 人。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整死了多少，更不得而知。

反胡风运动后的肃反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又成为消灭对象，被冤杀或关进监牢。毛泽东 1958 年不打自招：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 460 个儒，我们抗了 4 万 6 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同年 8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

###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7 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这个丧尽天良的政治流氓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了。毛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请相邀，结果几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以及无辜民众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之”了。

到底 1957 年有多少受难者（右派、中右、内控右派、享受右派待遇但是不

叫右派的其他分子)，我估计在 180 万(丁抒：《阳谋》)—310 万(《炎黄春秋》郭道晖文章)之间。下面一些例子可以作为参考。

#### 一是山西省

1965 年全省總人口數為 1971.65 萬人。1957 年僅右派分子就打了 10,241 人，1958 年以後，右派補課、拔白旗插紅旗、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等運動中又批判和處理了 295,791 人。山西省不是最左的，受害人數已經達到總人口(假定 1965 年人口數與 1957 年持平)的 1.5%，全國可能達到 450 萬。

#### 二是黑龍江省嘉蔭縣

全縣 6 千餘人，右派有 15 人。也假設中右數量和右派持平(丁抒根據有關資料估計，一般中右大約為右派的 1—2 倍)，那麼就是 0.5%，全國就是 300 萬。

#### 三是河南省南陽縣

80 萬人口，右派數達 1,164 名。(《南陽縣志》)也假設中右數量和右派持平，那麼就是 0.28%，全國就是 168 萬。南陽縣在河南省也不是最“左”的。

#### 四是遼寧省大連市

據 2010 年 5 月 21 日上網的《大連市史志》說：大連市 1959 年 9 月～1980 年 8 月，分批進行了右派復查改正工作。據統計，全市在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確定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中右分子共 5,690 人，經復查改正 5,643 人，不予改正的只有 47 人。

#### 五是四川省綿陽地區

1981 年為被劃為右派分子 4,794 人做復查，屬於錯劃已改正的 4,741 人，不改正的 40 人。(《綿陽地區志》)

#### 六是山東省青島市

到 1986 年為止，糾正了幹部、大學生中的右派分子 4,608 人，工人、民警、營業員、聯合診所大夫、民办教師、社會人士、修女等人中的右派分子或戴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的 737 人，因鳴放言論未戴帽子而受到各種不同處理的 617 人，總人數為 5,962 人。

這數量龐大的右派分子全部被迫“勞動改造”，一部份還被殺害。從此中國人便沒有了人性、個性、公信、誠信；中國也從此進入史所未見的恐懼與謊言交織的時代。如今，無官不貪，腐敗橫行，坑蒙拐騙，豆腐渣工程壓死學生，毒牛奶禍害嬰兒，其原因就出在毛澤東這個無仁無義、無信無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流氓頭子身上。

毛澤東趁反右運動餘威，開始編造“大躍進”、“人民公社”神話，指使吳芝圃、李井泉、柯慶施等人偽造畝產幾千斤、幾萬斤的“衛星田”；四川省郫縣還吹出 824,525 斤的牛皮。然後再按“產量”征購，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把農民的糧食統統搜光、刮光，竟至顆粒不剩，才肯罷休；以達到對中國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集體屠殺。

毛澤東用飢餓的辦法，從 1959—1961 的 4—5 年間，基本上不費一槍一彈就消滅了 3,600 萬農民和在各地各種勞改場所(農場、工廠、礦山)服苦役的右派

分子等被共产党所认为的敌对分子。

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旭副教授花了 10 年时间调查、采访，写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这是一部人类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的一段历史的记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的罪证：看看中国共产党怎样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看看中国共产党怎样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名义大面积地屠戮中国人民和它的知识分子。

夹边沟农场关押的 3 千多人，幸存者刘文汉提供的数字，夹边沟农场最高峰时的报表人数是 3,074 人。按幸存者孙枢统计，死去的差不多 2,900 人，活着出来的不到 300 人，有的说只有 200 多人；死亡率大约 90%。

张掖专署共送 360 人到夹边沟农，只 80 人活着回来，死亡率为 75%。

天水地区共划了 1,146 个右派分子，遣送夹边沟劳教的共计 238 人，生还 22 人，死亡率为 90.75%。

当然，夹边沟仅仅是中共屠杀反右分子的一个屠场，全中国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据劳改基金会资料，到 2008 年，中国还有 1,400 多个劳改、劳教场所。（劳改基金会：《劳改手册 2007—2008》）

所以，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夹边沟农场、415 劳教筑路支队、峨边沙坪农场、白茅岭农场、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场、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兴凯湖农场、白城子农场、北京清河农场、茶淀农场等相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杀人魔窟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枪杀之外，许多人是在受尽打骂、凌辱、捆绑、吊打、关禁闭之中，在饥饿、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断地死去。

### “消灭知识分子”宏伟计划如何被认真执行？

幸存者高学武回忆说：由夹边沟迁到明水有 2,000 多人，在既无房舍又无粮食饥寒交迫的环境中，劳教人员在冰天雪地里延缓生命。他们从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因为遥遥无期的劳教，在饥饿、疾病、苦役下，逐步失望、悲观、堕落。夹边沟的劳教犯人们……看起来人非人，鬼非鬼，战士非战士，干部非干部，农工非农工，这是一群什么样的行尸走肉。1960 年 11 月份，每天死亡 10 多人，到了 12 月份连降大雪，天寒地冻，人们每天吃不到 4 两原粮，而且没有任何油水，被熬干了的人开始大量死亡……到了 12 月 23、24、25 这几天，三个站每天死亡都在 40 多人以上。这时，埋人的活人已没有力气埋了……死亡笼罩在明水滩，人们彻底绝望了，都在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谋杀计划是这样被精心的执行着：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原为解放军的军垦农场，土地贫瘠盐碱太大，只能养活 300 人，却被关进了 3 千多人；原来粮食由甘肃省酒泉市统一调拨，但仅仅拨了一年就让“自力更生”。关押的主要是甘肃本省的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大鸣大放中被揪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有右派言论的坏分子。但也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这些从外地来的犯人，由于没有接济，



活下来的很少。

在饥饿的折磨下，人们吃沙枣树叶、死老鼠、蚂蚱、荒漠上的兽骨，吃癞蛤蟆、蜥蜴，吃死人的内脏、死人臀部的肉……甚至有犯人在大便里，尤其在干部们的大便里找东西来吃。甘肃省定西县粮食局右派分子邢树义，见地质队送来的贺守瑛的大便中有未消化的玉米颗粒，便抓起来用水冲一下就急忙送进嘴里咽了下去。（李景沅：《蒙恩历程》）所以，在饿死之外，还有中毒而死，暴食而胀死；为偷食被打死。

夹边沟正常劳动一般都在12个小时以上，包干，打擂台，互相竞争，把人活活给争死了。幸存者计德成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夹边沟这么残酷的地方了，从古到今也再没有比这再残暴的暴君了……**挖排碱沟，每天跳到零下30—40℃的排碱沟里挖沙子，挖上一阵子，腿就不知是自己的了，劳动回来后吃的又是菜卷子。挖沟、运肥，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本来就喝着菜汤汤，扣了“饭”后就活活饿死了。天天大量死人，到了1960年冬天，连埋都埋不及了，足有100--200具尸体在土坎下面码着。

凡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除了斗批打挨饿百般折磨、“每天从事超负荷的、以折磨人为主要目的的劳动，还有开不完的斗争会、批判会、帮助会、学习会、生活检讨会”（谭天荣：《我的右派经历》）外，有配偶的一定千方百计地强迫配偶与之离婚；有异性朋友的一定千方百计地强迫朋友与之脱离关系。在云南省东风农场改造的郭家源（个旧县政府秘书）向天长叹：“**难道用离婚可以改造人吗？天天说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难道我们都是十恶不赦的人吗？何必要搞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右派分子都是由于家庭破碎的打击，思想崩溃陷入绝境，而自杀、而加速死亡。

### 全国一盘棋，“消灭知识分子”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有功之臣，民主党派人士，党、政、工、团，农、工、商、兵各色人物，他们都学有所长，有的身怀绝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们中大多数人还对共产党怀着赤诚的心，对国家民族寄予无限厚望。只因一言之出，而大祸临头，落得如此下场。夹边沟劳教农场的受难者都说这是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和中共张掖地委书记安振做的孽，其实张仲良和安振不过是执行中共的“消灭知识分子”方针罢了。安徽、河南、四川、广西等省市，那里并没有张仲良和安振，不是死人更多吗？

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书记李书成在《光明日报》发表“应当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在云南大学大抓右派、大抓右倾、大拔白旗，把校长李广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一任党委书记高治国把李广田赶到厨房劳动，并对他说：“谁让你和我针锋相对，这叫君逸臣劳嘛！”1966年的党委书记胡洋生则说：“这次运动只搞李广田一个人，因为我们中间只有他一个人写文章，我们都不写。”（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

可见“消灭知识分子”不是一时的权宜，也不是一地的独创，更不是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它确实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是贯穿一切工作的总路线。

毛泽东死了，“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总路线没有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知识分子的冷血、残暴、恶毒、下流，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杀 20 万，保 20 年安定团结”，造成数以千计学生、市民死伤的 1989 年 6.4 事件至今不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们及 6.4 死傷者的亲属仍然受到歧视和迫害。

直到现在，中共反动派仍然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手段，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加是赶尽杀绝。

在中共的监狱中仍然关满着知识分子，如刘晓波、王炳章、秦永敏、何德普、朱虞夫、刘贤斌、许万平、郭飞熊、陈光诚、胡佳、张林等，曾宏玲(杉杉)因发表《地震亲历记》被抓，奧運后听说已经释放，但至今下落不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独立中文笔会一些成员人身权利受到严重损害。数百名法律工作者受到中共非法骚扰，无法正常工作。土匪的习气、流氓的基因，就这样代代相传。

### “消灭知识分子”，也消灭农民、消灭一切反抗者

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看过杨继绳《墓碑---中国 60 年代大饥荒纪实》之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 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3,600 万这个数字，我有怀疑，因为单是四川就饿死了 1,250 万人---这数字仍然是被缩小的，因为共产党历来是玩弄数字的高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中共四川省委绝对有缩小的动机与故意。虽然如此，我也十分尊重杨继绳先生的计算方法及严肃学风。)

“消灭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会思想；屠杀农民，因为农民已经开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县 1957 年 4、5 月，全县 33 个乡镇中有 29 个先后发生闹事事件，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 116 个，部分垮台的 55 个。入社农户由 91%降至 19%。被打干部 107 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 304 户。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

山西省自 1956 年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 147 起，参加的有 5,520 多人。其中闹分社的 81 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 48 起，闹粮荒的 18 起。

江苏省从 4 月到 5 月，先后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 12 个区、47 个乡、436 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 5 万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 62%。

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据统计，全县只剩下 26 个社基本保持完整。(沈志华：《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

毛泽东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气，而是用饥饿法、冷冻法。毛泽东不费一枪一弹，在 4—5 年间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潜在的反抗者。

饥饿法、冷冻法之外，当然也用刀枪子弹，《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有一个叫孙守勤的共军，他参加过镇压西藏人民的战争，是因为批评队长“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子”而打成右倾分子的。他说：“1958 年藏民造反时，我们被调去平叛。当时，打得很残酷，一个村一个部落人几乎被全部打死了。我跟着部队从甘肃一直打到了青海。”“我们当时只知道烧了藏民的寺院将铜铁交到

上面……” 仅此数十字，就把毛泽东共产党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西藏人民、新疆人民……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必须得到也必定要得到彻底清算。

### 结语

中国人民为了民主、自由交出的学费太昂贵了，我们应该对失败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充分揭露中共反动派与知识为敌、与知识分子为敌、与全体人民为敌的本来面目。

否则，中国的民主化，思想解放、新闻自由、文化多元化，人民民主、自由，国家富强、繁荣都是一句空话！（2010年11月12日在台北《中国民主化前景展望与探索》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扩充版〕）

## 有这样不要脸的政府，有这样不要脸的官员么？！

——评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和疾病控制司副司长郝阳拜会高耀洁医生

80岁的高耀洁老太太，原定2月4日到北京美国驻华使馆办理赴美的签证，准备3月份往美国领取美国联邦参议员、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颁发的一个人权奖。然而，老太太却被河南当局拦劫了。早在2001至2003年，河南政府就曾经不止一次地限制老人家出国访问、领奖。

据胡佳先生获悉，高耀洁医生早在2月1日就被河南政府派人非法拘禁在家中。河南省妇联官员和一位副省长曾经到高耀洁家中，劝阻老太太不要赴美，但被老太太严词拒绝。于是，老太太家门外、楼道和楼下便出现大量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凡前往高耀洁家中探望的朋友和志愿者，均被警方扣留、调查。甚至发现有北京的警察在其中，老太太的子女也受株连、受到跟踪监视。

胡佳指出：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对民间防艾人士人权侵害令人发指，尤其是对一位从事民间防艾工作达11年的老人家。河南的徐光春之流既无人道，亦无廉耻。中国在即将举办奥运会之际，发生这类恶劣事件，联系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对《人权观察年度报告》的无理指责，让人相信中国政府的任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保证都是天方夜谭。

结果，搞到天怒人怨、万众声讨，要劳驾希拉里·克林顿亲自写信给胡锦涛和吴仪，才迫使中国当局解除对老太太的非法软禁。看到「崛起」的胡锦涛们在一个洋婆子面前的胆怯心虚，可知不可救药的可哀中国也还没有走出100多年来「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怪圈。

老太太终于在22日到了北京，到北京机场接老人家的只有胡佳、曾金燕夫妇。据说「在机场还稍有曲折」，难道又有人想劫持她？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不幸的是，颀颀、虚伪又无赖的中国高官还要继续不要脸一番。22日下午8点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和疾病控制司副司长郝阳，还要厚颜无耻地代表什么吴仪到酒店房间「拜会了高耀洁教授，并与她会谈了90分钟」。

看那王陇德们在父母辈的高老太太面前架着二郎腿、皮笑肉不笑的嚣张又得意的丑态，他们可有一点「拜会」的诚意么？王陇德们连做人的一点基本礼貌、起码礼节也不懂，居然还高踞庙堂、腆颀为官。至于王陇德「希望能多从高教授那里获得基层真实的情况」，更是不要脸的屁话。

我真不知中国官员的心为什么这样黑！请问吴仪、王陇德们：年轻力壮、靠吃中国人民的肉喝中国人民的血养得又肥又白的你们，难道除了作威作福之外，便只能永远赖在北京城里吗？「基层真实的情况」还要靠一个80岁的老妪帮你们去「获得」！真是的，你们给了80岁的老太太多少劳务费？

世界上还有这样不要脸的政府，还有这样不要脸的官员么？！（23Feb2007）

# 宋永毅暢談文革研究新動向

-----宋永毅先生 2006 年 3 月 3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一個研討會上的講話和答問

研討會由南京大学高華教授主持。高華簡單介紹宋永毅先生的情況並贊揚了他在文革文獻學上所作的貢獻，接着宋永毅作了題為《一個亟待澄清的歷史真相：造反派和「三種人」問題》的報告，因為這個報告部份內容已在《動向》三月號發表，所以這裡刊登的，只是報告的摘要。

## 歷史真相、集體記憶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發生四十周年，文革發生於 1966 年，現在是 2006 年，轉眼四十年；文革爆發時，我是初中三年級學生，當時十六歲，現在垂垂老矣；再過十年可能講不動了，所以要趁機講掉。先講一個背景情況，因為造反派和「三種人」問題，如離開文革研究新動向、新趨勢，就不太容易講清楚。那麼，文革四十周年與三十周年在研究上，在文革真相揭露上，有些什麼區別？過兩個月在紐約市立大學要開文革四十周年討論會。我在預備會上提出兩個概念，一是歷史真相，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被揭露出來；第二個概念是集體記憶。

歷史真相，如上層歷史真相，哪些人願揭露？常是權力斗争中被打下去的人和他們的家屬。但是即便是打下去的人，或被搞死的人的家屬，他們也還是願意為黨保守秘密，王光美就是典型例子。劉少奇家屬，你可以理解，劉少奇有個女兒在洛杉磯，別墅就值幾百萬，他們的利益還在那裡。所以王光美對新鳳霞說，「你和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結果把新鳳霞氣壞了；新鳳霞說，你老公都被毛主席害死了，你還說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這是一類。

還有一類，如陳伯達、王力、林彪集團那些人，他們和他們的家屬斷斷續續都有書在出，想辦法在海外出版回憶錄。這對揭露歷史真相有好處，中共歷來挑動群眾斗群眾、群眾整群眾，現在出現原來是首長、領導的，願意斗斗他們的老首長、老領導，也很好；領導斗領導，也可以揭示出歷史真相。

關於文革的英文著作中，今年出的最多的就是私人回憶錄，而且暢銷。以前是張戎《虹》，印了一千多萬，有英文、日文等各種語言版本；紅衛兵回憶錄很多，自張戎以來有二三十種。中文的，就差些，因為都經歷過，看起來不太有勁，故事不新鮮；英文的，在美國人看起來，就新鮮些，比較暢銷。

真相和十年前比，有很大差別了，很多事已經被提出來。今天研究文革的人，很少有人再說「林彪想謀殺毛澤東」呀，什麼「林彪反革命集團」呀，什麼「廬山會議篡黨奪權」呀的外行話；林彪問題明明是毛在那裡胡攪，當然林彪也不是好人。

為什麼要強調集體記憶？因為時間沖淡了記憶，宣傳模糊了記憶，對現實的不滿導致錯誤的記憶，記憶越來越被扭曲。

時間沖淡了記憶。講文革開始，千篇一律是 1966 年 5 月 16 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5·16」通知，文革就爆發了。實際上「五·一六」通知到 1967 年 5 月 17 日才廣播，一年以後。之前是絕密文件，十三級以上幹部才可以看到。再如 8 月 18 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說毛走下金水橋和紅衛兵一一握手，實際上那一次毛沒有下來。這還是小事，是常識錯誤，還有大的事。

宣傳模糊了記憶，年青的未經歷過，報紙怎麼說就怎麼信。整個中共集團，有意把責任往上推到林彪、四人幫頭，往下推給造反派。把造反派妖魔化了，這些例子很多。

對現實的不滿導致錯誤的記憶，大陸有些老百姓，因為現在階級分化很厲害，財富不均，鴻溝很大。以為毛澤東時代大家比較平均，心裡比較好受。那怕今天吃肉了，還想以前你白飯我也白飯的「平等」，對現實不滿就忘了以前，把歷史浪漫化了。文革時沒有特權？實際上文革時特權也很厲害，文革時貪污也很厲害，當然不如今天數目這麼大，今天小小銀行行長，就可以拿幾個億逃到美國去了。

目前從海外的文革研究來看，美國漢學界有三句話：文革研究對歷史學來說太年輕，文革畢竟不遠，才四十年，對歷史學來說太年輕，西方願意研究先秦、老子等等。

作為政治學來說，又太老；不如鄉村研究、農村問題、選舉問題、浦東金融，在美國很容易拿錢，有的一下子可從某基金會拿個一百萬，不知怎麼花；但文革研究，在美國想拿一萬也難得不得了。

作為社會學來說，缺少必要的信息。想做模型數學研究，文革數字怎麼統計？比如文革剝底死了多少人，西方也有學者硬做模型研究，例如哈佛大學有個教授，申請了一大筆錢，僱了好多研究生，把所有縣誌、市地誌中記錄的死人數字輸入電腦。

這樣做，有好多問題，因為縣誌都靠不住。縣誌有兩個版本，兩個版本在講武斗



死人、殺人時，差距實在太大。像道縣文革大屠殺，全家死光了，只寫一個人戶主名字，所以即便親自去查，也靠不住。

## 文革研究新動向、新趨勢

目前一些動向。第一個，研究相似性和差異性。高華研究劉少奇搞「四清」，就看出毛劉之間有很多相似性。毛劉鄧的差異性以前講得多；差異，當然有，比如經濟問題，就很明顯。鄧復出後，就是要講他與毛有區別，他要比毛高。現在人們開始注意到他們之間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搞階級鬥爭上的相似性，認為他們都是老共產黨，都是一個模子出來的。

我正在寫《論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你不知道的故事》，劉少奇在四清時很多東西搞得比毛澤東還要左，這是體制的原因。

第二，是當代性與歷史性概念，即遠和近的問題。以前把文革當歷史來研究，文革錯誤發展到頂端，大家就都想改，但又很難改。第一代、鄧小平，改也難，但胡錦濤同志，比我大不了幾歲，但他現在搞的東西也還是文革那一套。這與他文革經歷也有關係，他是又紅又專的指導員，文革中是清華大學的「四一四派」，雖然不太活躍，但很堅持「四一四」思潮理念，他們認為中國的黃金時代是文革前的十七年。

文革前的十七年是黃金時代？不是，反右派、餓死那麼多人、反胡風。胡錦濤上臺後訪貧問苦、控制宣傳、控制輿論，還是「十七年」那一套。像胡錦濤、溫家宝現在貪污腐敗問題上，還未發現。有些輔導員真的很艱苦朴素，忠心耿耿，因為他也被洗了腦。有個美國教授在研究胡錦濤經歷和執政方針關係。

研究文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劉少奇要在大學生中抓百分分一右派，高中生中也要抓右派；1989年鄧小平決定鎮壓；其中有沒有思路上的關係？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當代與文革的關係沒有割斷，這是研究的第二個動向。

第三個動向，一個輪廓性與具體性。例如中國文革史，有嚴家其、王年一、金春明，還有好幾本，越寫越差，美國則很少有學者去寫文革史，首先他很難了解那麼多東西；其次他們做研究方法非常具體，有研究唐詩中的馬，拿到了終身教職的，還有研究唐詩中馬的顏色。

以前為了不爭論，搞宜粗不宜細；現在要宜細不宜粗；過了四十年，再不認真地仔細研究，不行了。

## 造反派被妖魔化

如造反派，至少是幾千萬人的概念，涉及時髦的人權問題。人權高於主權。造反派成了文革所有罪惡代名詞，概念被無限外延。有位老先生是右派，他對我說，反右中受到了造反派迫害，錯到什麼地步了？

文革開始時，是劉鄧主持工作。1966 六月至八月份，他們批了十幾個文件，点了一百多至二百多人的名，如烏蘭夫是鄧小平搞下去的，而不是毛澤東；周揚、夏衍、林默涵等「四條漢子」，是劉少奇在他批的一個東北局的文件中点的名，說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現在這些文件，都被緊緊捂住；偶爾在紅衛兵小報上也可以看到，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丕南，是劉少奇在 1966 年七月十二日批的，把他打倒。

工作組是劉少奇派的，「反工作組就是反黨」。但劉少奇恰恰批判過這個觀點，劉跟毛跟得很緊。他說王丕南的概念，「學生反對王丕南、反對黨委、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是完全錯誤的，所以他就把王丕南揪出來了。

現在再看這些人的回憶錄，就有問題了。他們都說這時受的是造反派的迫害。例如巴金就有這個問題，巴金當年一回上海，立即就被作家協會所謂革命群眾揪斗，其實這是上海市委的命令。巴金經歷了好幾段的迫害，「革命群眾」、接着是造反派、1968 至 1969 沒有造反派了就有革命委員會專案組，以後又有軍宣隊、工宣隊，巴金在牛棚時間長了，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只好統統歸於造反派。

老幹部本來很清楚。雖然搞得清楚，但怎麼算賬？還算鄧小平的賬嗎？敢算鄧小平的賬嗎？烏蘭夫敢嗎？那麼只好上推四人幫、下推到造反派頭上了。

造反派是 1966 年八月份左右到十二月份左右，受到工作組和黨委打擊的群眾和學生，在毛澤東的人權牌下起來造反。毛澤東突然回北京，說劉少奇派工作組不對，其實是他同意派的。《劉少奇年譜》上寫，每星期劉向毛電話請示一次。毛歷來倒把一耙，不管劉怎麼辦都不對。不派工作組，放棄黨的領導；派，鎮壓群眾；反正總要打倒他。因為他早就下決心打倒劉了。這一時期有一批反領導、反體制訴求的人，起來造反了。

北京老紅衛兵，他們六月份就成立了，造反了。「造反有理」還是他們提出來的，但他們不承認自己是造反派的。他們自認血統高貴，「造反派」在他們眼中都是「王八羔子」、是「黑五類」。他們的造反與底層受打擊、受壓迫的群眾造反，有很大區別。他們高幹子女不過先知道了風聲，然後開始「造反」，而且帶有暴力傾向，很厲害，運動初期打人、殺人的就是他們。高干子女打死人，現在都算到

一般造反派頭上去了。造反派被妖魔化，涉及人權，要認真解決它。

集體失憶，造反派概念主要來自宣傳。剛粉碎四人幫時，《人民日報》平均每天有兩篇罵造反派的文章。季羨林先生寫過《牛棚雜憶》，季本身是造反派，他是東語系革委會委員，那時叫勤務員。我還有他寫的大字報，很激進的大字報。現在倒打一耙，他說他不是造反派，光聶元梓是。這不對，這是推卸責任，從眾心理。

中共在粉碎四人幫後，從 1977 年開始搞「揭批查」運動，運動中抓了很多人，如四川一個地區被整的就有好幾萬，抓了上萬人。主要是派性問題。有一本書，是西藏女作家唯色寫的，她訪問了七十七個參加文革的人。西藏文革也是兩派，都是造反派。一派大聯指，支持十八軍即支持張國華的；一派造總，學生、大學老師，反軍區的。等清查來了，造總頭頭全部被抓，所有大聯指頭頭全部升官。

北京學生運動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除譚厚蘭因癌症晚期外，四個人全被抓，判刑非常重。《歷史的審判》中，看他們「罪狀」，很可笑。如「在文革爆發的時候，跟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當時這個集團，還沒有形成。最高人民法院《起訴書》、《判決書》這麼寫，真丟人！明明是跟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造反，鄧小平、陳雲都投了贊成票的，要發動文革，因為不好說毛澤東，只好推給林彪、江青。

鄧小平們整造反派，是出於狹的報復心理。看《聶元梓回憶錄》，她沒有參與迫害鄧小平兒子鄧朴方，有說鄧朴方被人推下去，顯然不是；（一說自殺；）現在鄧朴方自己說，是因為被關在一個有放射性的實驗室裡，他怕會死去，所以逃跑，從水管爬下去，滑了摔傷。至少聶元梓沒有參與此事，這是一；第二，是下面的事；第三，鄧朴方自己逃跑摔傷。

鄧朴方在文革，組織貧協，在北大高幹子女中組織仿四清中的貧下中農協會；鄧小平當時說，未來中國應是高幹子女掌權，所以高幹子女應在文革中演習演習。這個設想，現在達到了。鄧朴方當時是系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很賣力，貼大字報，加上派性和鄧小平被打倒，所以被抓起來。但加在聶頭上沒有道理，而且還算重要罪狀。

### 聯動、西糾、韋國清、滕海清、李源潮逍遙法外

1983 到 1989 年，大陸在搞清查三種人：一林江幫派思想嚴重的人，什麼叫幫派思想嚴重？怎麼樣定？二造反起家的人，什麼叫起家？三打砸搶分子。如果沒有八九民運，出現了年輕的反革命分子，這個運動會一直搞下去。

但高幹子弟、老幹部中的三種人，却逍遙法外。聯動、西糾這樣，韋國清、滕海清也這樣。滕海清在內蒙古搞「內人黨」，當時他是中將、北京軍區付司令，是內蒙古革命委員會主任，他搞的，完全是軍隊下去搞的，官方承認殺死了一萬六千多人，實際上有十萬人；打傷致殘，官方數字八萬七千多人，實際上有二三十萬；他手里有那么多血債，但他沒有事，因為他是老干部。當年滕海清做檢查時，下面家屬都冲上去，要一人一口咬他，結果靠警衛部隊用槍彈來保護。

「內人黨」明明是滕海清干的，卻推到造反派頭上，但堅決反對搞內人黨的恰恰是造反派；內蒙古東方紅，頭頭叫高素華，剛死掉，是內蒙古師大俄語老師，中共黨員，貼了大字報反對搞內人黨的。他們把高關了五年，最大罪狀是「製造內人黨冤案」，他有什麼權？只是當花瓶的一個革委會常委而已。

現在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當年是我同學，是武斗干將，但他是高幹子弟，沒事。有什麼公平、公正？

毛澤東體制是不容許造反的體制，他臨時利用了一下造反派，去冲击劉少奇。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開始，造反派就創霉。一打三反、清理「五·一六」，外交部三分之一的人打成了「五·一六」分子。

1969年後一直被整，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聶元梓，1970年是从隔離審查的房間里上廬山的，工宣隊一進去，就把她關起來了。在廬山會議上，她附和「天才論」講了幾句，又讓吳德告了黑狀，向毛奏了一本，說造反派還在串聯。聶元梓冤枉得不得了。

劉鄧在文革初把群眾、學生打成右派，是中共迫害人民一貫手法，不對。毛澤東打人權牌，讓他們批反動路線，造反了，得到一時的解放。可是，以後不停地被當作假想敵，不斷受迫害。王洪文不是上海工總司原汁原味的總司令，潘國平才是，現在紐約做古董生意。潘和廠裡支書搞不到一起，抓他反革命，他揭竿而起。潘國平在四人幫倒臺前與許世友、與軍隊關係很好，是第一個向中央匯報上海市要搞武裝兵變，立了功。但鄧小平一出來就把他抓起來，管你有功沒功。鄧有文革情結，鎮壓八九民運，就認為文革又來了。

今年有兩本書出版，一本劉國凱《論人民的文革》，一本周仁左《文革造反派真相》，很有深度。

[宋永毅為聽眾解答問題](#)

在回答「文革中黨的領導」問題時，宋說，文革中黨的領導是存在的。第一，毛當時如日中天，他的最高指示是原汁原味貫徹下去的，中央電臺一廣播，直接傳達了，都不需要層層傳達。第二，軍隊沒有動，而且成立的革委會 75%都是軍人當一把手。公檢法雖然砸爛了，但專政效率並未削弱。管理體系的中间去掉後，毛和老百姓直接接觸了，搞群眾專政，讓所有鄰居、居委會所有小脚老太婆都天天盯着您。高華補充說，1967 年宣佈軍管、公布《公安六條》後，專政機器反而強化了。

文革殺人最厲害的既不是初期，也不是武斗時期，最厲害是 1969-1970 年之間，是在革委會成立後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運動中，是國家機器、政權在殺人，所以黨的領導是存在的。毛搞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民主、但四個堅持並不放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四大。

文革中也有右派利用造反機會為自己平反，達到反體制目的，楊小凱《牛鬼蛇神錄》中有個劉鳳翔就是，結果被處決了。當時有句話叫：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宋永毅說，文革中人人有罪，這句話不對，文革中地富反壞右作為一個整體來說，他們沒有資格參加文革，所以他們沒有罪。

有個聽眾介紹了蒯大富近況，蒯自認是小蝦米，受了利用。1970-1978 年被雙規，後來又被判刑。有文革情結，對毛、江青、張春橋還有感情。宋永毅為這一些人感到悲哀，他們這些人是活化石，他們當時最風光，和權力最接近，後來又沒有很好反思。宋認為，造反派中的楊小凱最有出息，楊研究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但他對文革作了認真反思。其他一些人就老是胡傳葵的當年，成了活化石。

當聽眾提到姜義華、余英時二位對文革思潮論述時，宋永毅稱：這二位都是大家，他們看的是大問題。無論造反保守，實際是在比□革命，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口號比你更激進。比誰對毛最忠，中共上層領導也是在比賽革命，如劉少奇四清夠利害了，提出黨內外矛盾交叉論，中央出修正主義論。他毛比他更革命，還要揪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理論比你更高，這就是比□革命。這還因為毛對劉有個人成見，把分歧理論化，把權力鬥爭合法化了。這是他慣常搞的。我同意余英時先生的比□革命說。這麼大的事件，從社會學角度，從上層鬥爭角度，從各個角度都可以做分析。

有人提當年《紅都女皇》事件，宋指出那是謠言，但怎麼出來的，不知道。中共內部鬥爭，常常以謠言殺人，可能出於上層，也可能出於下層。但《紅都女皇》顯然是為丑化江青，是傳統伎倆。聽眾說，後來追查政治謠言，最後追到葉劍英那裡，追不下去了。宋說，可能，象反走後門，就反到葉劍英頭上去的，最後又反到毛頭上，因為毛把他的女友們送去讀大學。所以毛批示：前門走進去也有壞

人，后门走進去也有好人。說了等於沒說，只好不了了之。

對群眾運動，文革整人，清理階級隊伍，海外關係，勾結外國勢力帽子給你戴上去。像劉少奇，叛徒、工賊、內奸；像彭德懷，就說他裡通外國。現在雖不說反革命，但還是說顛覆政府、勾結海外勢力。

聽眾提到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時，宋永毅說，毛搞大躍進，闖了那麼大的禍，餓死了幾千萬人，老毛被迫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個不像樣的檢查。毛一直想翻這個案。毛澤東確實如王若水所說，总是用第二個更大那錯誤去掩蓋前一個錯誤，結果惡性循環，引致文革爆發。追溯到八屆四中全會提出階級鬥爭，以後四清，完全是在理論上、實踐上為文革作了準備、預演。毛劉鄧在政治理論、意識形態上沒什麼太大差別，毛提出抓走資派、《二十三條》，下面那些人並不覺得太突然，甚至還糾正了劉的左的東西。

毛常常裝出民粹主義的樣子，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插話打斷了毛的話，鄧小平請他不要出席閉幕式，觸犯龍顏，他拿出了《黨章》、《憲法》出來。中共的主席、國家主席，都是在危難時、受了委屈時，就拿出《黨章》、《憲法》，但他搞人家時從不想到《黨章》、《憲法》。毛澤東歷來出爾反爾，四清、文革中，劉的東西，如桃園經驗、派工作組，都是毛自己同意的。

三十年以來毛熱，為什麼？有1963年出生聽眾認為，文革中，學軍、學工、學農，是否說工农兵地位提高了？從歷史上工农的地位那麼高，從來沒有過。

有個當過下鄉知青的聽眾介紹了當時农民的慘狀，作為回應。她說她們一下鄉就看到干部吊打農民，學大寨、消滅自由市場，堵資本主義道路，自留地沒有了，買賣幾個雞蛋，要挨斗，對農村造成極大破壞。所謂學工、學農，只是口號而已，當年农民是最慘的，哪有什麼地位？

有人問小學校普及、赤腳醫生，是不是文革的功勞？當年知青回答說，這只是宣傳上說的，階級鬥爭、政治運動不斷沖擊、破壞农村農業生產。也有聽眾認為，农民因受宣傳上謊言的誤導、對暴力的恐懼、對文革情況的不了解，可能會產生模糊、錯誤的印象、虛幻的幸福感。

筆者當年是大学生，響應毛澤東揪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物的号召，起來造反。可是揪了黨政的走資派后，軍內的走資派就不讓揪了。揪了就是反軍，就是毀我長城。我一直咽下去這口氣。另外，毛澤東這個人总是以右開始，以左結束，從延安整風、反右、廬山會議、文革……無不如此，如何解釋？



宋回答：軍隊問題，何蜀寫過《論揪軍內一小撮》，說是毛開始是想揪軍內一小撮，但文革中其他國家機器都垮了，主要靠軍隊維持局面。毛歷來注重軍隊，把軍隊置於他絕對控制之下。一旦群眾運動觸及到軍隊，當然引起反彈，幾個老師、軍區、許世友這些軍閥一反彈，毛澤東就只好犧牲群眾了。毛澤東理論有很大實用性，他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他在《十六條》中明明說過搞巴黎公社，搞選舉，最後都給他否定了。他騙人嘛，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是早設計好了成心騙你，他只是心血來潮，他覺得真理都在他手裡。一旦他的理論動搖他的權力，他當然就犧牲他那些不牢固的理論。理論只是為他製造合法性、正確性吧了。

宋永毅認為，文革絕對失控，毛一會兒說文革搞一年，一會兒說文革搞兩年，可老結束不了，直到他死了才結束。毛不是神，什麼「跟着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前進」，有什麼部署？實際上他也是和鄧小平一樣，摸着石頭過河。他並不是計劃好了的，是失控。

至於文革目的，王力雄《論毛澤東和他的人間天堂》，一般認為文革是毛的權力鬥爭，認為大權旁落，認為劉少奇是赫魯雪夫。但王力雄強化了毛的詩人氣質，是理想主義者，是烏托邦主義者。毛要在人間建他的天堂，這就糟糕。像毛、薩達姆這樣的人為害最大。毛搞《五七指示》，讓有問題的人來建設沒有問題的人間天堂，結果倒退到封建、獨裁那裡去了。

文革四十年的教訓，還是民主、法治兩點。中國不缺「位卑不敢忘國憂」的士，也不缺乏能人，關鍵是制度。中國制度是反淘汰制度。現在言論空間大了，因為中共權威性減弱了，胡錦濤沒有毛澤東那樣絕對權威。每個人都想當戈巴契夫，中國的變化就大了。

(6-mar-2006 武宜三記錄，縮寫本發表於《動向》2006年3月號)

# 我的写作与文化大革命

【摘要：东北工学院钢冶系主任周自定教授，虽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却不甘当逍遥派，私下在帮红卫兵传抄大字报。这位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正直的留美炼钢专家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联合宣传队”进驻后，不堪迫害而跳楼自杀了。当年滞留海外的许多知识分子，轻信中共的宣传和统战而上了贼船之后，也不知历经了多少劫难，经过了多少运动的煎熬。像周教授这样可怜地惨死的，在东北工学院有好几个；在辽沈、在东北、在新中国就更不知有多少了。】

## 我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文

大字报《院党委抛出“死老虎”，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大约可以算是我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文。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各大学都停课“闹革命”了。当时是东北工学院三年级学生的我，本来是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才投考工科专业的，所以非常喜欢读书；想到四年级就开始学习专业课了，心情十分激动。

可是，当年想把书读好也不容易，因为有“只专不红”的危险。我虽然是共青团员、系学生会的干部，但因为读书成绩比较好一点，加上父亲有所谓“历史问题”，便成了“问题学生”。常受到“政治辅导员”的旁敲侧击：要注意“又红又专”。他经常炫耀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火线入党”并提前毕业而成为党的政治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以及一年一度在毕业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战绩。我隐约觉得，我就是他心目中的反动学生的“候选人”。后来文革中有人抄了他的办公室，果然发现他收集了很多我的“反动言论”：例如上政治课时奉命模拟反派的发言；例如《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例如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等等。

学校每年都要在毕业生中按比例5—10%来抓“反动学生”。为了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立场，政治辅导员往往都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因此，从学生一入学，政治辅导员就开始收集他们的黑材料，他或者依靠党团员中的骨干分子和争取入党、入团的“进步学生”的报告，或者在个别谈话、“谈心”时引诱你暴露“活思想”，甚至是政治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然后剪头去尾、罗织、比附、上纲上线，再装入档案袋。我班廿多个同学中，竟有五六人与我同入黑名册。在这里，我应当记下我的政治辅导员王X昌和马列主义理论教员金蕴X的姓名，他们两位曾密切地配合着在我们班上作了十二分精彩的表演。

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点不错！共产党员们那么残忍、那么冷血、那么伪善，而又那么暗藏杀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毁掉一个青年学生的政治生命，可以轻轻松松地断送一个人和他一家人的幸福；可以毫无

内疚地把他的学生、同学、“同志、阶级兄弟”，推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可以心安理得地为别人制造悲惨的灾难。

这些当年或昧着良心，或丧尽天良地以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政治工作者”们，可有一丝一毫的忏悔，好像还没有，至少我没见过。我倒知道这些人后来都混到教授、博导什么的，先是红、后是专，所有好处他们都捞足了。

### 共产党是迫害狂

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向东北各高校派工作组，6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哪里鼓包鼓的大，哪里派的就多。”（《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铜墙铁壁》第26号，1967年8月13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中共沈阳市委联合工作组策划和指使下，同时为转移斗争方向和保护自己，以郝屏奋、王太明为代表的中共东北工学院党委抛出早在1965年就被整下台的原党委书记兼院长柳运光和所谓“柳运光反党集团”，对他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野蛮批斗：批斗者作饱含无产阶级义愤状，声嘶力竭地读着经上级批改过的批判稿，控诉柳运光的所谓罪行，并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但不许他申辩，只允许他回答“是”与“不是”；只要一申辩，就马上抢走他的话筒或拔掉电线；再用高昂的“不许柳运光放毒”、“只许柳运光老老实实”、“柳运光要低头认罪”、“打倒三反分子柳运光”、“誓死保卫院党委”、“柳运光扁茄子了”等口号来掩盖他的“放毒”及羞辱他，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经过严格和精心彩排的。

40年后的2006年，我写了一封信给柳老院长---这位终身坚守理想主义的老革命家：“数以千万计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最后不过是摧毁了一座旧监狱；但又建造了一座更大、更坚固、更黑暗、更恐怖、更血淋淋的新监狱，然后再把他们自己和全中国人民都关了进去。”

我说：“对于您，把一生奉献给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老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许是您所不能接受的、痛苦的、残酷的结论。但这却是事实！”

学院同时又以反右派、反右倾的老办法在各系各专业各教研室老教师中抓了一大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例如教我们高等数学的赵惠元教授，是非常受同学爱戴的老师，却被当作“与党争夺接班人、反对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送到各班接受巡回批斗。我曾通过当时是他助教的杨老师向赵老师表示了讪悔，我现在再次公开向赵老师说声“对不起！”我当时说他“乱砍教材是破坏和抵制教育革命”，其实当时学校是在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的压力下才大搞压缩书本内容的所谓“教育革命”。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1966年6月29日的一次会议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学生“右派”。不久又在沈阳三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说：“批判比例多大？百分之一、二、三，学生5%左右。”（《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宋任穷的工作组专政下，院党委也在学生中大抓反动学生和右派学生，李奇、吴蓓莉等几位学生是全院批判的重点。那两三个月，校园里笼

罩着“白色恐怖”，像我这样的“问题学生”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据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统计，沈阳六所大学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即达1133人，占总人数9%。可是文革后邓小平们却把亲自部署的打倒老干部、整知识分子和整群众的罪恶都推到所谓造反派头上，可谓插赃嫁祸、颠倒黑白，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条》)在1966年8月8日晚上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我搬了张靠背椅坐在走廊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市组织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收听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现场转播。东北工学院的学生们因不满被安排在偏僻街道，便举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牌冲击主会场。除了个别警察、老工人和学生有碰撞外，学生队伍基本畅通无阻。当时我们热血沸腾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气宇轩昂地“走在大路上”，确实有一种被解放的轻松：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  
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的万丈光芒！

从此，沈阳市的大学生一面批判本校党委和工作组，一面杀走上了社会。当时学院里大字报内容最生动、最活泼，可谓生机勃勃。这里介绍两条很有学问的对联以为后人鉴赏：

曲率半径处处相等；  
摩擦系数点点为零。  
横批：又圆又滑。  
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

横批：奋起保皇。(乃因当时中共东工党委书记是“郝屏奋”也。)

后来有《西安告急》大字报说，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因受中共西北局和

陕西省委迫害而自杀，要求全国声援；我为了躲避班上出现的分歧，就写了一张“兹有本校学生某，家庭成分贫农，准予外出串联”的介绍信，先找王X昌签名，再到院文革办公室盖公章，和比我一级的本系几个同学坐上不收钱的火车到西安去了；动身前贴出了题目是《我们要造东北局、省市的反！》的大字报。在西安碰上的几个福建籍的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学生，便一起“杀回福建，去造叶飞的反”了，直到1966年底才冒着严寒回沈阳。在这两地，除了演说、辩论外，自然也写了许多大揭露、“大批判”的文章。

### 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

探索文革成因的文章汗牛充栋，但大部份只分析上层的权力斗争、毛泽东的阴谋和威望；近年刘国凯等人的“人民文革”说，却从广大人民群众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引起热烈争论，深得我心。

比如，上海市1967年1月6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以曹狄秋、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100多万人为何能在寒冷的雨雪之中坚持站立数小时之久？说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煽动”，是徐景贤、王洪文的“策画”，说得通吗？

我本人参与和组织的西安市《揭开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路线斗争盖子大会》和福州市《批判福建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及许多街头辩论会，规模少则数百，多则数千、数万人；在“徒步长征”途中也应邀到河北廊坊附近的农村搞了一个多月的文革运动，帮助当地贫下中农打倒了他们的中共大队支部书记，并成立了大队革命委员会，大受群众欢迎。几个外来大学生就能“所向披靡”、有那么大的能量吗？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亿万人民累积在心中的、对中共各级政权怨恨的总爆发罢了。

17年里，中共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暴力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派、工商业改造，尤其是三年人祸饿死4000万人，仅四川一省当时就饿死1250万，这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从省委内部档上看到的，并到北京向杨尚昆、公安部、民政部作了汇报，得到杨尚昆等确认的数字。（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年第1期）随后又有反右倾、四清等运动，斗争不断，老百姓不得安生，且贫困不堪；而各级党政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尤其高级干部骄奢淫佚、夜夜笙歌。例如，各省市都有高干娱乐部，狗马声色，五毒俱全。毛泽东的豪华行宫几乎遍布各省市，就是中共腐败的典型代表。对于广大工、农、复退军人来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是奴隶的奴隶。”（鲁迅）“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尚书》中这句话大概可以解释当年“一人奋臂，万方景从”的群众心理。

就这样的17年，如今居然成了一些人口中的“黄金岁月”；这是因为邓小平的分赃社会主义比毛泽东的叫化子社会主义给工农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谁先富起来呢？是邓小平和他一伙“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子女先富起来了。

靠什么先富起来呢？靠老子有权好办事，狗仗人势，巧取豪夺，把国有财产、



国营资产、人民血汗装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

邓小平把“改革”叫做“摸石头过河”，可是摸了二十多年，到如今也没过到河。他们自己倒摸了不少好处去。工厂改制、工人下岗，城市暴力拆迁，农村野蛮征地，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地产暴利化。把老百姓摸进更加一穷二白的烂泥潭。

马克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此之谓也。我问我的老院长：“老院长当年满腔热血沸腾地参加革命、领导天福山起义，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新中国’吗？”

### 我一家的苦难

我祖父出生于光绪 23 年(1897 年)，只读过一年私塾，25 岁才结婚。他是个多面手，除耕田的犁耙插割外，也会烧炭、捕鱼、打腊；还靠自学掌握了堪舆、择吉、合婚、卜卦、简易中医等技能，文化程度达到通解《三字经》和代人写楹联的水平，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因此土地改革时他被任命为乡农民协会秘书，专责丈量土地和填写《土地所有证》。我现在保存的两张盖有县政府大印的《土地所有证》上，就有先祖父的手泽。

土改后，他辞去农会职务而安心务农，一边买牛种田，一边在分得的山地上广种松、杉、竹、桐等经济林木；农业合作化估值入股时，林木已值 1000 多元，是乡中林业大户。可惜他的劳动成果全毁于后来的大炼钢铁和盗伐，今天只剩荒山秃岭矣。

从我懂事起，祖父几乎过没有什么顺心的日子。三反运动，父亲被诬为“贪污分子”，祖父为“退赔”事四处奔波、心力交瘁。1957 年父亲被视为“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公职回乡强迫劳动改造，给祖父打击巨大。大饥荒期间每人每天只有 4.5 两米(16 两为一市斤)，祖父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饥，苦不堪言；家母就是因饥饿致水肿，而于 1962 年逝世，年仅 41 岁。

文革中我家遭五次抄查，几代积聚的万余册新旧书籍被当“封资修”抄走。而祖父因顶撞了当地游民分子，被挂牌在各自然村中游街示众，从此悲愤交加，病卧不起，于 1974 年含恨去世。

父亲生于 1923 年，念过几年私塾和新式小学，做过小店员、山区私塾教师。1948 年 9 月参加中共地下游击队，1949 年 4 月成为中共党员。中共建政后任中共区委书记、县总工会秘书等。1957 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被当作“不纯分子、投机分子”而开除党籍、清洗回乡，受尽歧视和打击。文革中更被列为“坏分子”遭管制，被批判、斗争之外，更服无偿苦役达 1620 天(次)。1977 年遭公社武装部无故扣押 18 天。我弟弟的缝衣机、父亲养子的木工工具被大队扣留 10 个月；以“地下黑工厂”之罪名罚款 150 元。受冤遭罪 20 多年后，父亲于 1980 年获“平反改正”，恢复党籍、工资待遇，办理离休。

但他二十多年的损失却是不可估量，也无法弥补的。他 20 多工资不给补发外，政治等各方面损失尤大。如果他不失去公职，我母亲断不会在三年人祸期间



饿死。因为父亲被诬陷蒙冤，上累及祖父母；下累及我兄弟妹，我从初中起就背着沉重家庭包袱，只能上东工这样二三流大学、学冶金这样傻大黑粗的“非保密性”专业，政治上受歧视，被当作“反动学生候选人”，前途一片暗淡、凶险。弟妹则根本没有上学机会，如今沦为“弱势群体”。

## 我的遭遇

文革中虽然看到中共政权的专制、腐朽，但也只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平。自解放军奉命介入文革后，由于高级将领与地方首长同属特权阶层的关系，他们天然把原来官办红卫兵当作依靠和扶植的对像。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和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运筹帷幄之下，原本已经出现大联合局面的辽沈地区出现了三派鼎立的大分裂。在军队支持下，成立了以尉凤英、李素文等劳动模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为骨干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辽革站于1967年6月1日凌晨以揪斗东北局走资派为借口，出动10万人围攻东北工学院；由陈李凌蓄意挑起的以屠杀造反派为目的的武斗，从此在辽沈地区越演越烈。

这时期我写过《批判沈阳军区带枪的反动路线，解放宋任穷》、《就目前辽沈形势答〈辽沈战报〉记者问》等大量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多被同一派的工人、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组织转抄、翻印，贴满沈阳市大街小巷。

有一次，钢冶系主任周自定教授跑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核对一条毛语录，原来他虽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却不甘当逍遥派，也私下在帮红卫兵传抄大字报。可惜这位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正直的留美炼钢专家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联合宣传队”进驻东工后，不堪迫害而跳楼自杀了。

当年留学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轻信毛共的宣传和统战，为了建设所谓“新中国”，放弃了彼邦优渥的待遇而上了贼船之后，也不知历经了多少劫难，经过了多少运动的煎熬。最后像周教授这样可怜地惨死在毛泽东·林彪·陈锡联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的，在东北工学院有好几个；在辽沈、在东北就更不知有多少了，令人扼腕叹息。

乱伦分子陈锡联(罗点点：《回忆录》)当权后，辽沈造反派受到严重报复和严厉清算；我背着装满了黑材料的档案袋，发配西南去参加“三线建设”，“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作为“内部控制”人员使用。每有重大活动，例如吴法宪亲临视察之类，我便是受监控目标；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他是受保卫科指令在监视我的，提醒我凡事小心。胡风说：“咳嗽都有人录音”，我算有了亲身的体验。

在政治上受歧视外，连交女朋友、谈恋爱，都要被人查档案；加薪晋级也遭百般刁难；出外参观学习，“保密单位”不让去；即使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臭老九”也要让工人优先。在事事不遂心，前路暗淡之下，1979年冒险“申请赴港探望岳父”，侥幸获批，从此定居香港。所谓“冒险”，是指一旦申请不获批准，就会背上“不满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的罪名。我从1968年12月26日那天到金沙江畔，至1979年6月1日离开，把差不多10年的宝贵青春

贡献给了“三线建设”。

我因在少有人申请出境的“三线”四川某地，所以比较容易得到批准；但妻子儿女在福建却因政风腐败而受尽拖延，直至1987年才获成行，一家得以团聚。

“家庭团聚”这条最基本之人权，在中共来说也是不屑一顾。夫妻分居满一年，才有七天探亲假。许多夫妻分居数十年是常事，不少家庭悲剧和社会问题就因此而产生。

### 所谓“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甚至西南崇山峻岭间。这是毛泽东出于称霸世界野心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错误估计：敌人从东部进犯，沿海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此，许多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要全部或部分搬迁；几乎在一夜之间，1100多个大中型企业被拆掉，千里迢迢运到中西部去。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一个工厂要分散在几条山沟里，有的还要躲进山洞；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重复建厂、长途运输，管理不易、协作困难，成本过高、技术过时，造成了极大浪费。自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2050多亿元人民币。让原本薄弱落后的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继“大跃进”折腾之后，又一次遭受浩劫。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举了甘肃酒泉钢厂作“三线建设”失败的例子，因为那里花了27年才出钢。其实本人所在的所谓“西南钢铁基地”也不遑多让，那里的人命伤亡、资源糟蹋、物资浪费都是非常惊人的；由于缺乏前瞻性、野蛮开发、粗放生产，加上专制、愚昧、腐败、贪污所造的包括贫富、社会保险、就业、民族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仍使该地区至今不得安宁。1998年以来，由于当地政府错误地动用了大批的公安和武警部队镇压彝族同胞，导致至少有12000多彝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以及数十人非正常死亡。（《博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共产党眼中只不过是驯服的牛马。一条成都至昆明的铁路就是不顾铁道兵战士和民工的死活，在地质地貌异常复杂的横断山脉中，靠落后的技术和原始的工具硬凿出来的；野蛮施工和盲目指挥，几乎使每一公里的铁路就要赔上一条人命。

毛泽东装模做样的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我要骑毛驴进西昌。”为了早日出铁，让伟大领袖睡得着觉，我们只好“天作被地作床、荒山野岭摆战场；天下大雨不休息，黑夜当作白天干；破除迷信加拼命，没有条件也要上。”于是选矿技术不过关，就把含有比铁更值钱的多种稀有金属的尾矿白白放掉；污水处理技术不过关，就把焦化厂、选矿厂等厂矿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排入金沙江，毒水直冲崇明岛，整条长江全给污染了。

我们当年喝的水，早期是黄泥汤，后来是黄泥汤加上这些化学物质和重金属。

“先生产、后生活”，就是以建设者的生命和健康，来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作牺牲。因此，尿结石、肾结石、胃病、肝炎、癌症，就成了该地区的多发病。

毛泽东自己骄奢淫逸、糜烂透顶的生活，豪华行宫无处不有，美女娇娥随叫随到；他的党徒以前有高岗、陈再道，如今有陈希同、陈良宇、李二江之流也不遑多让；但却让全中国人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但用马列毛当作麻醉人民的鸦片，还把人们动物性需求也剥夺殆尽。特别是三线工人、知识分子和低级干部，吃的是喂牲口的粗粮和缺油无肉的咸菜，住的是易着火的茅草芦席棚，走的是崎岖泥泞路；最惨的是无数家庭被折散，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予解决。基础建设队伍，长年转战南北，居无定所；重工业劳工阳盛阴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局又成心不考虑工人家庭困难，尤其长期而普遍的性困扰。因此性苦闷、性变态、性犯罪(通奸、强奸、鸡奸、同性恋、乱伦)成了热门话题。我记得当时公司里开了一个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其中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竟是“非法强奸贫下中农的母牛，破坏农业学大寨。”

毛共政权完全是邪派教主洪秀全及其太平军的翻版，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是不折不扣的灭绝人性的流氓法西斯政权。“[三线建设](#)”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

### 庆父不死，鲁难不止

让我最后看穿中共本质的是 1989 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枪声。刽子手用带血的手撕下自己的伪装，露出了他那青面獠牙的狰狞面目。当他的坦克把成千成百的中国人碾成肉饼的时候，他那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就显得那么虚伪、那么奸诈、那么无耻！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不把毛泽东共产党滔天罪恶彻底揭露，不把共产党反动派骗人、害人的歪理邪说批臭，中国人就永远没有民主宪政，永远享受不到“言论与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国就永远无法摆脱专制独裁的陷阱而走向现代化。我愿意和一切有志于此的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

31AUG2006 定稿于流浮山庄

26dec2006 补充

《自由写作》14 期

## 爱国爱党的悲歌

——武宜三

五千年古国，爱国的悲歌代代不断。从比干、屈原、宗泽、岳飞、辛弃疾、于谦、袁崇焕、彭德怀，以至于傅雷、容国团、老舍，凡爱国者都要受到冷遇、打击、迫害，甚至不得好死。

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同志，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党的香港地下党委一直教育党员和左派组织，要坚持用小平同志的言论作为判别一个人是不是“爱国者”的标准。可谁曾想到，原来小平同志就尝过当“汉奸”的滋味。1976年3月2日江青同志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座谈会上，就把邓小平同志定为“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北京）

说来问心有愧，我们今天大喊高举邓小平旗帜、大捧邓小平理论的，把邓小平“爱国论”挂在嘴边的头面人物，哪一个不曾对小平落井下石过？胡乔木同志就大杀小平同志的回马枪。就是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当年他敢站出来为邓小平辩护吗？他敢不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吗？

从纣王到“秦始皇加斯大林”的毛泽东同志，乃至小平、泽民、锦涛同志，历代帝王、总统、主席、总书记，都是把国家当作私有财产，你要“爱国”等于干涉了他的家事，干涉了他家的“内政”，是多管闲事，是大逆不道。即使是说“皇上的龙袍上有一粒灰尘”，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比如方孝孺，人家是侄儿做皇帝，还是叔叔做皇帝，不都是姓朱家的事么？关你屁事。偏他多管闲事，结果自己死了不算，还搭了“十族”一万多人的小命。岂不冤哉！再如彭大将军打日本，够爱国了吗？但我们的毛皇帝批判他“爱了蒋介石的国。”原来“蒋介石的国”和“毛泽东的国”是不一样的，彭大将军为自己爱错国赔上了一条老命。可见中国人“爱国”之难、“爱国”之危险。

怎么办呢？也不是没办法。例如，张邦昌、贾似道、阮大铖和康生这些“先进代表”就值得我们研究。为什么他们无不享尽荣华富贵？就是他们懂得怎样“爱国”，爱得既安全，又爱得保险，其窍门就是：“和中央及其领导核心保持高度一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乎，请看有多少人紧跟在总书记、主席、部长、秘书长、联络办主任的屁股后面，您就知道这些“爱国老前辈”的经验是多么的得人心呀。

如今香港这个蕞尔小岛，几年间就冒出了数不清的时髦“爱国者”，这些人当中有身藏外国护照的，有被英女王封了爵士的，有偷渡客，有老反共分子。把咱这“爱国阵营”都当成垃圾箱了，就是拜这些宝贵讲经验深入人心的结果！

“爱国”固然不易，“爱党”也难。翻开我们党的八十年党史看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党从江西苏区杀AB团开始，到十年浩劫、血洗天安门广场，也不知杀了多少共产党员。“据初步统计，中国共产党自己杀掉的共

产党员，就比中国国民党杀掉的共产党员还多好几倍。”（李慎之：《被革命吃掉  
的儿子》）柳直荀、袁文才、王佐、高敬亭、段德昌、高岗、潘汉年、陶铸、林  
彪、刘少奇，真是不胜枚举。

胡绩伟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  
“毛泽东主持的党中央，富有诬陷加罪于领袖人物的‘优良’传统。”他诬陷第  
六届总书记张闻天“加入军事娱乐部”、“反党”；他把八届党中央副主席兼国  
家主席刘少奇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他把八届总书记邓小平打成“全国  
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当邓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他又怎么样呢？他继承、发扬了毛泽  
东的这一套传世法宝，又像毛泽东一样，无法无天地把总书记胡耀邦赶下台。结  
果，胡耀邦含冤辞世。紧接着，无视党纪国法，再把总书记赵紫阳赶下台，并非  
法把他软禁起来。

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核心再接再厉，继续非法软禁赵紫阳十五年，直到  
他含冤死去。这说明我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并没有丢掉。胡锦涛是不愧是毛主席、  
小平同志信得过的革命接班人。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一个连自己党员都不爱的党，他怎么会  
去爱所谓“爱党”的老百姓？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他老人  
家把农民饿死四千万，却不肯下“罪己诏”就是他“爱人民”的证据。他有时装  
模做样地说“不吃猪肉”（实际是改吃牛肉、鱼等等），可是却花大把大把的钞  
票，为他在各地建做豪华行宫：

例如北京市西郊新六所一号院、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北京玉泉山别墅一号、  
北京西山一号、北京密云水库湖心岛别墅、人民大会堂北京厅（118 会议室）；

河南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

河北省北戴河燕子窝一号、北戴河莲花山别墅；

辽宁省大连棒捶岛一号；

上海市西郊宾馆（414 工程）一号；

浙江省杭州西湖徐庄、杭州汪庄、杭州刘庄宾馆、金华 601 别墅；

湖北省东湖梅岭别墅、武昌东湖宾馆一号；

江西八二八宾馆、庐山芦林一号别墅；

湖南省长沙蓉园宾馆一号楼、韶山滴水洞（203 工程）；

江苏省南京紫金山宾馆、南京伊村饭店；

广东省广州珠岛宾馆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

四川金牛宾馆；

山东省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等。

胡锦涛同志号召我们“保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之谓也。如此，就必  
定先肯定一个前提：我们中国共产党以前所干的所有伤天害理、断子绝孙的罪行，  
都合乎所谓“先进性”。但是这样的“先进性”能为愚蠢的中国老百姓所接受  
么？如果胡锦涛同志的保先是指“保鲜”，那更成问题；因为世界上只有死掉了

的东西才需要保鲜，谁听说过活蹦乱跳的东西有保持新鲜的必要？！

**重申武宜三三定律如下——**

**武宜三定律一：**中国人爱国没有好下场，中国共产党员爱党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爱党又爱国更加没有好下场。

**武宜三定律二：**中国是冤假错案最多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专门制造冤假错案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案不冤、无反不平”的政党和国家。

**武宜三定律三：**只有拿了外国护照的中国人，才能做个像样的中国人，才有资格爱中国；才可以免除在爱国时被扣上“爱国罪”的风险。

(26-5-2005 于深圳湾畔)



# 歷史被掩盖，被篡改

2005年2月5日，原張聞天秘書何方在鳳凰台《口述歷史》節目中，回憶1959年在北京召開軍委擴大會和外事工作擴大會聯合批判彭德懷和張聞天的大會情況。那天毛澤東在大會上一邊吃飯一邊講話：“同志們讓不讓我一邊吃點東西，一邊說話呀？我今天要講一講為什麼說反對黨的領袖就是反黨。黨的領袖好象一個人的頭，你把他的頭砍了，人不就死了嗎？所以說你反對黨的領袖就是反黨。”

毛澤東歷來驕橫傲慢，看似率真，實是不把同夥看在眼裡。穿睡衣倚在床上召開政治局會議，連年高德劭的朱老總也要忍氣吞聲。在游泳池中會見赫魯曉夫。一邊做報告一邊吃東西，固然更加惡劣，但也符合毛一貫惡霸的作風。報告內容也正是他強詞奪理、流氓秉性的表露。

如果反對黨的領袖就是反黨的話，那毛澤東本身就是最老資格的反黨分子。想當年從江西向西潰逃途中，正是毛澤東拉幫結夥，組織反黨小集團，發動政變，把博古趕下臺。從而真正開始了他篡軍、篡黨、竊國的罪惡生涯。而彭黃張周充其量只是告訴那顆頭，“你上面有癩痢，趕快醫治”而已。而毛卻誣陷他們要殺他的頭，真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詞。更無恥的是毛下令收繳與會者筆記本，從此由文件到書本都沒有了這次會議的一切內容，歷史就這樣被淹沒、被掩盖。

“今天披露的材料證明，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高智和羅元祿隨手記錄的任何紙片，也被毛澤東命令立刻燒掉了！也難怪針對‘水門事件’，毛澤東曾譏笑美國的政治‘帶奶味’。中國人對付政敵是根本用不著竊聽器的，中國政治家也決不會愚蠢到把自己一切所作所為全部記錄下來。”（廣東人民出版社《告別“萬歲”》P27）其實竊聽器並不是不用，看對付誰，楊尚昆就因在毛的專列上安裝錄音機而倒了大黴。全部或部份記錄自己所作所為，在中國歷史上也許不乏其人。但共產黨絕對害怕記錄自己的言行，為什麼呢？當然是做賊心虛，這所以要把重印《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社論和毛劉周等1949年前言論的笑蜀先生抓到牢裡去，把《歷史的先聲》打成禁書。毛曾自吹：“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但毛和他的黨卻有太多可怕的東西：怕資產階級、怕中國的赫魯曉夫、怕老百姓、怕知識、怕批評、怕民主、怕自由、怕選舉、怕被監督，甚至怕自己講過的話、怕自己的總書記（從陳獨秀到趙紫陽）。什麼唯物主義者？簡直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者。唯心到了毫無自信的地步，成了不可救藥的被迫害狂和迫害狂。

1989年“六.四”屠城之後，中共中央發文指示，為了“安定團結”，黨史研究著重點要放在建國後。中共中央黨史辦公室主任薄一波也在《人民日報》撰文強調黨史研究重點在建國後，例如浙江海寧地方誌辦公室只好奉命把研究中共創黨黨員的研究資料封存起來。建國前的黨史研究為什麼會影響安定團結呢？難道研究建國後黨史就不怕影響安定團結了？當然不是，否則請你們把高崗、饒漱

石案公佈出來看看！把潘漢年、楊帆案公佈出來看看！把鎮壓反革命運動檔案公佈出來看看！把“六.四事件”公佈出來看看！

中共從他誕生那一天開始，每一天都充滿著罪惡、血腥，所以它沒有哪一天的歷史是不需要掩蓋的。沒有哪一件事是不需要欺騙的。掩之不足，再加之以偽造。於是篡改歷史、偽造歷史，又成了中共拿手好戲。

1997年第8期《炎黃春秋》發表了一篇林修敏、邱春玲寫的文章，文章說：“八.七會議”的參加者，鄭超麟是唯一還健在的人，據他告知，8月7日這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根本沒有作記錄，參加會議的只有十幾個人，李維漢也沒有參加。現在中央檔案館的一份《八.七中央緊急會議記錄》，寫得如此整齊清潔，說有56人參加，顯然不確切。而且，當時也沒有人叫它作“八.七會議”的，就象朱元璋沒死就叫“明太祖”是笑話一樣。可見所謂《會議記錄》是後來補搞的。據八.七會議參加者，後遭國民黨槍殺的朱其華所寫的《紅色舞臺》一書所描述的情況判斷，中央檔案館所存之所謂記錄是偽冒假劣產品。（《陳獨秀與中國》，2005年01期）

據專家對《毛澤東選集》一至五卷的研究發現，第五卷文風與前四卷有很大不同。第五卷有許多“嘛”，“呀”，“呵”等口語助詞，而一至四卷則無此現象，文章結構嚴謹、語調鏗鏘、聲情並茂、煽動性強。這全得力于田家英、陳伯達、胡喬木諸秀才的改造。有許多名篇更是諸秀才捉刀代勞。而第五卷出版時，秀才們死的死(田)、關的關(陳)、鬥的鬥(胡)，所以第五卷就遜色得多。

毛弄虛作偽的文章中，民憤最大的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錄音本是號召大家“知無不言，言者無罪”，文章版卻變成了“言者有罪，治罪的標準”了。害得一百幾十萬右派分子家破人亡，許多人死無葬身之地。這是因為兩個版本相隔幾個月，其間毛和他秀才對該文大搞翻新改造之故。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中國人本有講信用的傳統，失信是嚴重的過錯，可是毛卻把自食其言說成是“陽謀”，而洋洋得意，可見其無恥。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改寫則掩蓋許多殺人放火的血腥和暴民政治的恐怖。把毛澤東文章的最初版本重新刊印，將是徹底認識，清算毛共罪惡的重大舉措。已有專家學者在進行這項工作了，我則希望有更大成果出來，讓中國的老百姓早日脫離暴政的深淵。（《新世紀》2005,2,10）

# 我們這一代人：恐懼、饑餓、屈辱、絕望

----讀李大立《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

時事評論員和網路作家李大立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處女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2007年，香港；以下簡稱《故事》）。他雖然從八十年代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並深受讀者歡迎，但從來沒有將寫作看成是一種職業；只是2003年在美國因病開刀，突然面臨生死抉擇，才思想大變，決定執筆寫這本回憶錄。《故事》展示的是從香港回到「祖國」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識分子、職員、小市民五十多年來種種際遇的圖卷。由於作者人生閱歷豐富、讀書面廣、記憶力驚人、觸角敏銳、描寫細膩、文筆流暢，可讀性非常高。尤其我與作者有相似的經歷：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十年大三線山溝生涯、夫妻長期分居兩地、工作調動艱難；讀之如舊友重逢話當年。那個令人恐懼、饑餓、屈辱、絕望的時代，似乎又重現眼前：我們讀書、愛情，甚至性趣固然被無端剝奪，事業、理想也被摧毀殆盡；那種青雲無路、報國無門的無奈，至今讀來仍憤恨難平。

## 恐懼

中共掌權伊始，便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被殺害人達數百萬之眾，且有人數更多的親人、家屬受到株連。「我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同學裏，都有親屬被殺關管的。他們一生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年紀小小又或青春年華，就已經失去了天真活潑的童真和充滿活力的青春，個個都不苟言笑，謹小慎微。長期生活在整個社會無時不在的歷史陰影下，精神高度壓抑，過著政治賤民的生活。」共產黨毛澤東取得政權後，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人實行大規模屠殺，以殘忍地消滅肉體的方法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這種暴行是前無古人的。遍地血腥，滿天冤魂，國家、民族從此陷進入了一個殺氣騰騰、陰森恐怖的世界。

1952年的一天，7歲的作者放學回家，看見「穿著藍制服，斜垮著帆布子彈帶，背著步槍的民兵」站在門口，原來是鄉下來人抓外婆回去「鬥地主」。後來舅父和母親通過「華僑事務委員會」多方交涉營救達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來。外婆在香港住了四十年，鄉下的房屋、田產只是她夫家留下的，和抗戰前在美國經商的外公寄一些錢回來買的，一直委託鄉下親戚打理，外婆並沒有親身參與「剝削」；相反她還經常減租戶的租，分穀子給租戶。不過，在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下，就算真有這樣的事情，也不允許相信，因為這是「階級調和論」。「土地改革」中，中共殺了100多萬地主，廣東省由於陶鑄、趙紫陽執行「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極左政策，殺人尤多；作者外婆得逃此劫，真是例外的僥倖。

學校也是階級鬥爭的熔爐，作者讀大學的班上有個叫周文德的同學，本是江西省高考狀元；可惜中了階級鬥爭的毒，可以把一兩稀飯、穿衣戴帽等生活細節都上綱為「資產階級思想」。諷刺的是，像他這種以整人為樂的人，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的紅色恐怖中，也因為說了毛江幾句不敬的話，而被逼跳樓自殺。作

者那個二十八人小班，就揪出了四個「小爬蟲」即「反動學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終日，唯恐陷入「全國特務網」或「反革命小集團」之類，隨時會被扣押、隨時失去自由、隨時被拉去批鬥。僅在清隊中，同濟大學就有四十多人自殺，作者親眼便見到五六個：同濟大學副校長蔣梯雲、高等數學教授孫國楹等。《故事》中的這類故事，對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都是耳熟能詳，或是及膚舊疼。

魯迅說「革命是讓人活，而不是讓人死的」，然而共產黨所有的革命包括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卻都是讓許多人去死。作者問道：「讓包括我自己在內更多的人都活得那麼恐怖，那麼痛苦，到底這是一種什麼革命？」真是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毛共政權的反動本質。

### 饑餓

1959至1961年，中國餓死三千多萬人，是千古奇聞，也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三年人禍期間城市的饑餓，學生在學校食堂裏吃「雙蒸飯」、蕃薯苗、「豬糞菜」，沒有一點油星。最困難時，學生還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飽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餅」。更有甚者，吃用尿水培養出來的「小球藻」。作者至今仍為當年饑餓難耐偷吃炒河粉而愧疚。作者在香港謀生、年近六十的姑母，每次回廣州都要肩挑背馱的帶一大鋁鍋紅燒肉，在眼下的年青人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

我當時也是中學生，也有強烈的饑餓記憶。當時農村極悲慘，農民是賤民，沒有如城市居民般有最低定量的糧食供應，所以三年中餓死的都是農民。那時我老家農民每人每天只有四兩半（十六兩為一市斤）米，以致年屆六十的祖父要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饑；家母就是因饑餓致水腫，而於1962年不治去世，年僅四十一歲。

就是這個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無能又殘暴的中國共產黨，卻自稱是「人民的救星」、是「人民的解放者」、是「偉光正」，還要讓饑腸轆轆的老百姓對他們感激涕零、感恩載德，你說他們可恥不可恥？

### 屈辱

毛澤東共產黨專與中國人民為敵，他們憎恨、仇視知識和知識份子。作者在大學裏學的是城市建設工程測量，但偏偏分配他去煤礦建設單位。把他分到了廣西省來賓縣北泗區一個叫石村的山區。在「一個陰沉沉日子，經過了大半天汽車的顛簸，我終於來到了平生第一次親歷其境的山溝，而在這個偏僻的荒野裏，還不知道要渡過多少日子？付出多少寶貴的青春？從這一天開始，我就告別了城市，開始了長期山溝荒野的生活，從一個學生變成一個工人，成了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那時是1968年11月。」

讀到這裏，一聲長歎；普中國的臭老九都有一本血淚賬。我與作者竟是相憐同病，作者到石村的時候，也是我從東北發配大西南的日子。當時成昆鐵路還在施工，我一個人背著、提著行李從瀋陽出發，坐了幾天硬座到了西昌，改坐解放牌卡車去渡口（後來改叫攀枝花）。卡車彎彎曲曲地顛簸在崇山峻嶺之間，除擔心塌方和交通事故外，還擔心深山野嶺裏的土匪，一車人都憂心忡忡。因為車程是



兩天，所以要在米易住一宿；睡到半夜，來了一夥武裝人員查戶口，好在我們都是外地人，證件也齊全，擾攘一會之後也就平靜了，落得一場驚嚇。

我與作者都屬專業不對口，學非所用。我學的是熱工，卻當了砌磚工人和倉庫保管員。在大山溝裏，缺肉少菜，長期吃茄子：煮茄子、蒸茄子、炒茄子。一周或見一次肉，而且是臘肉。更可恨的是「臭老九」帽子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外出參觀學習、轉正加工資、評選先進分子、工作調動，甚至在勞保品發放、宿舍安排、辦公桌椅使用等，都備受歧視。連交個女朋友，也有人去查我的檔案。

當時的大學畢業生，在廣西的「起薪點」為 45 元錢。我在攀枝花，也不相上下。但在那物質缺乏的地方和年代，一個雞蛋的黑市價是二角，即一天所得不過七、八隻黑市雞蛋，實在可憐。本來畢業工作一年，可以轉為十三級，一級一級升上去，到九級就是工程師或者講師而成為高級知識份子了。可我們這批畢業生，一直拖了六、七年，直到林彪死後的 1973 年才予「轉正」，獲得第一次加薪。第二次加薪則難於上青天了，因為加薪名額既有限，又要讓黨團員、積極分子、進駐科室的工人們優先。我當時是工廠裏獨當一面的技術人員，但在加薪的順序表上卻排在一個描圖學徒工後面，她唯一的本事就是在 1978 年就開始寫 1980 年的學毛著日記了。《故事》對此也有詳細描述，真是斯文掃地，屈辱到了極點。

### 絕望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最讓人絕望的是，有才華的人、正直的人，總是被扼殺、被摧殘。像《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親是普通知識分子，做過廣州火車站、佛山火車站的站長。他只「求安穩，只會安安份份地打份工」，然而這點卑微的願望，在共產集權之下也無法實現。他愛妻子，愛自己的小家庭，所以選擇了安分守己一途；但不曾料到，當日由香港返回大陸的一念之差，令他自己和他心愛的家人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所謂「解放」，失去的不只是財富和地位，更是最寶貴的自由。從 1956 年開始，隨著共產黨將中國變成黨天下、變成特權階層的私有財產，對全體老百姓進行壓迫剝削和鬥爭摧殘，他也和中國大陸千千萬萬善良無辜的老百姓一樣，開始了他們的厄運。而且隨著「階級鬥爭」愈來愈激烈，社會愈來愈黑暗，他們所遭遇的打擊和災難也愈來愈深重。「父親也飽嘗了被人無端撤職降薪、被人監禁鬥爭、罰跪毆打、強迫勞動；被人視作階級異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著被人糟蹋，上學讀書參加工作都備受歧視」；1958 年，被下放勞動；晚年又因心愛女兒的早逝，備受精神折磨。他的一生中，「光明幸福的新社會」帶給他的痛苦和災難，千萬倍於「罪惡黑暗的舊社會」帶給他的挫折和驚險，作者說：「從父親的身上我完全體會到兩種社會的優劣，也更加痛恨禍國殃民的毛澤東共產黨。」

作者的伯父也是留用的舊職員，1949 年至 1952 年曾任廣州機務段副主任，後改任廣州鐵路第一職工學校副校長和廣東交通學院總務主任，但是 1956 年肅反運動中卻因「莫須有」受到處分，以致影響到他大女兒的入黨和留學蘇聯。1961 年至 1963 年黨把他送到三水農場勞改，連「莫須有」三個字也不要了。最令這個苦難家庭雪上加霜的事情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伯父一個兒子在海南島生產

建設兵團插隊落戶，不幸溺水而死。趕到海南島辦理兒子後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兒子墳上，看了令人神傷。然而因為是刑滿釋放的勞改犯卻備受冷遇，不但沒有一分一毫的撫恤金，那些軍隊幹部態度還十分野蠻無禮，多麼冷酷，多麼荒誕！

作者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大機構做事，卻誤信了馬列主義而秘密參加中共地下黨。1938年發起組織「香港華員會」並首任會長。他在中共指揮下領導九龍海關「起義」，以接收大員身份接管了廣州海關。但他不獲信任，備受歧視，只因他是地下黨，是知識分子。像他舅父這樣的，僅廣東省就有古大存、方方、馮白駒、吳有恆等為數幾萬人，幾乎全被以「不純分子」、「特務嫌疑」、「地方主義者」等各種罪名加以打擊、清洗甚至肉體消滅。

更加令人絕望的是，共產黨的兇殘、暴戾的本性至今不但沒有改弦更張，反而變本加厲、更加發揚光大。作者說：「當年國難當頭，共產黨趁機打出抗日和民主的旗幟，迷惑了很多像我舅父和他的朋友們這樣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如今，我更深一層地想到，假若當初這些天真的青年們能夠像胡適、傅斯年、儲安平一樣看透共產黨專制、反民主的本質，不去盲目地充當共產黨的擁躉，中國不但可以避免一場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更可避免其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災難，我的一家和千百萬老百姓的命運就完全不同了。」他引用司馬璐先生的話：「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有罪的，雖然很多黨員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但是參與了一個邪惡犯罪的組織，本身對中華民族就是有罪的」。誠哉斯言！其實豈止共產黨員，就是黃炎培、章伯鈞、章乃器等這些所謂民主人士，也都曾經在共產黨謀殺國民政府、切斷中國民主憲政之路的罪行中充當了幫兇角色，有愧於中國人民。

在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之際，必須全面檢討反右運動的歷史成因和每個人的歷史責任，吸取歷史教訓，如果僅因右派分子受過迫害，特別對右派的頭面分子，只一味同情或歌之頌之，那就失去了紀念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與作者的心是相通的。

### 結語

李大立這本《故事》的珍貴之處還在於他保存了很多民間記憶、平民生活情景，大如昆侖關大捷，廣西「聯指」在軍隊的支持下對「四二二」派的屠殺，廣西省賓陽縣五千多名五類分子被處死，廣西、湖南的吃人事件，工礦頻發的工業傷亡事故；小至十類地區的工資差額，夫妻分居慘狀和探親制度，工作調動的艱辛，排隊買火車票時的憤怒，山區農民生活的悲慘，各種購物證券的繁多以及各種物價；《故事》還保存了大量的舊照片；《故事》及其附錄為國共黨史、政治運動史、教育史、經濟史、工業史、報業史、中外交流史，甚至物價史和服裝史的研究者都提供了真實個案。書中對他表姐、妹妹的婚姻悲劇，也寫得迴腸盪氣，予人印象深刻，囿於拙筆，就不一一評述。

寫作上作者用了夾述夾議的辦法，直抒胸臆，月旦人物，讀來如飲醇酒、如品濃茶。故事看起來似乎面面俱到，顯得拖拉冗長；但這正是作者「保留歷史在細節之中」的苦心經營，讀此書者不可不留意，我誠懇地向各位推薦這本書。（首發《新世紀新聞網》，此處是補充本）



## 把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

----从习近平、李源潮、王岐山、温家宝、胡锦涛政绩看中共和中国的前途

【内容摘要：导语：中国共产党欠下中国人民太多的血债，仅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便因冤狱而死了九千八百零四人，所以毛泽东死去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便在一棵树上吊死了。中共作恶之多，由此可见；中共对失去政权的恐惧，亦由此可见。一面高唱“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一面把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这就是胡锦涛、温家宝的“既定方针”。他们已经到了如此疯狂、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连八十岁的老太婆、连瞎子、连十三岁的儿童、连艾兹病患者、连高位截瘫病人都都不肯放过了。于是，就有了结论：一这个党救不了了！二中国没有明天！】

### （一）习近平的政绩

萧山教案，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教案。去年七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使用暴力强行拆毁萧山独立教会自行兴建的教堂。数十名教徒遭残酷殴打，数十人被非法羁押，引起数千名教友与警方对峙。其后有八名基督徒被判处重刑。《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记者晷爱宗，因独立调查和报导了萧山教案，被行政拘留七天，并被报社开除、被禁止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和到香港出席国际笔会亚太会议。晷爱宗只是继《纽约时报》赵岩、新加坡《海峡时报》程翔等秉持良知、说出真话而遭受中共当局野蛮迫害的千百个记者中的一个。

今年3月初，浙江上访人士徐江娇、孙明丰、张小明、裘先恩、丁秋月、陆冬菜等被非法关押。温岭失地农民代表王妙增等六人被软禁。3月中，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诗人、作家、《爱琴海》网总编辑张建红（力虹）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审理，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六年徒刑。3月末，浙江民主党人池建伟以莫须有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艺术家、作家严正学于今年4月13日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此案虽然是在习近平离开后判决的，但是去年十月习近平在任时抓的，严在台州市的家被公安局国保大队查抄，他在北京的家也被查抄，计算机和大批文字数据被抄没，但不履行法律程序及时通知家属。张建红、严正学都仅仅在网络上批评一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被判重刑。这个国家真是这么脆弱、不堪一击吗？李建强指出：“法律信仰已彻底崩溃，公正司法和人权保护正在成为一个被嘲讽的对象！作为一个视法律信仰为最高价值的知识分子，今天听到法庭判决时感到欲哭无泪。”

然而，制造这些冤狱、惨案的，主宰浙江省多年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却因这些“政绩”而调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还得了吴官正“民意、党内评议，都较出色”的考语，而成为中共第五代新星。吹捧者如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说，他廿多年前就认识当时仅是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习近平给他的印象很有文采，

文笔超过许多省委书记”。还最欣赏习近平的法学博士学位，懂得“依法治国”呢。

确实，习近平很有文采，他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会上的讲话《作风建设是上海发展的根本保证》，便很有党八股的文采。什么“六个始终不能忘记”呀，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呀，什么“两个务必”呀，什么“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呀，什么“共产党员该具备的品行和操守”呀，全是吹了几十年的假、大、空话，没有一句是可以作数的。

### (二)、李源潮的政绩

江苏省南京市几年来在拆迁征地过程中，也制造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血案。2005年4月一天，中山陵园管理局副局长许永善带领玄武区公安、中山陵经警及外号“小七子”的黑社会人员约300多人手持自来水管，头戴安全帽，来到前湖村、平桥村、卫桥村非法强拆民居，打伤萧国忠、任梅花、孙小月、萧兰英的女儿和女婿、萧荣氏(女，83岁)、曹金(女，63岁)等10多个手无寸铁的农民，叫嚣：“给我打，打死人我兜着，中山陵有的是钱！”“拆！砸死活该！死了中山陵顶！”甚至前湖村集体拥有的大队部并多间1000多平方米房子，也被全部拆掉。

对农民作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人身、财产伤害的是谁？就是“在中国问题观察家心目中可能成为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少数省级领导人之一”、文革打砸抢分子、自吹江苏每年的命案发案率“为全国最低水平，比日本还要低”的李源潮。李源潮2001年任中共江苏省南京市委书记，2002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003年更“当选”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源潮据说要“努力解决从环保到暴力犯罪等诸多问题”。然而江苏省却成了贪污大省，南京市却因暴力拆迁和砍伐中山林而臭名远扬。

### (三)、王岐山的政绩

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堪称沙尘暴之都、贪污之都、罪恶之都、黑社会之都、冤民之都。陈希同、王宝森、贾庆林、刘志华等英雄辈出；北京警方对访民的迫害可谓不遗余力，他们拆除访民的窝棚，任意抓捕、拘留、劳改访民，并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处以劳改。北京的黑社会横行无忌，侵吞外资、抢劫商行。

高智晟去年八月在山东被北京市警察秘密绑架。据《亚洲周刊》报导，高在看守所里受尽酷刑。高对著名维权活动家胡佳说，从8月至12月间，他被警察用铁链固定在铁椅上累计达580多小时，其中有一次就长达109小时，双腿至今留下黑色的疤痕；双手被拷住达600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近600小时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局完全不顾人性和廉耻，警察如土匪般侵入高家，骚扰和控制他的妻子耿和与两个孩子，围殴并禁止他们提取存款，要断其生计。每天5、6名便衣警察跟着13岁的耿格去学校，使耿格心理受到严重创伤。去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判处高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目前，高家每天遭到百多个特工和警察持续监控。高家成了一所监狱，高的家人成了人质。

可是路透社却有好消息：以铁腕治理北京的现任北京市长王岐山，近期即将升迁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据说习近平、李源潮、王岐山还有已经调迁或即将调迁的张高丽、赵洪祝、赵乐际、李建国、强卫、王安顺等都是“亲民、实干”派云。

#### (四)、温家宝、胡锦涛政绩

温家宝在面对记者也说些“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门面话，什麼“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呀；什麼“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呀；至于什么时候“让人民当家作主”？他不肯说。

1944年，温家宝的前辈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质问国民党：“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有实行民主。”（笑蜀：《历史的先声》）何等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呀！可怜的周恩来他不能也不会再问：“共产党执政快要60年了，至今为甚么还不肯实行民主？”

正是中共一小撮长期独霸权力，以致腐败丛生；穷凶极恶的掠夺，使不堪压榨、奴役、虐杀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复转业军人，不断地奋起维权。今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继3月5日北京市61名右派分子联名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上书之后，上海、浙江、重庆、山东等各地右派分子及其子女、同情者也纷纷响应。北京30位右派更在4月6日聚会“纪念反右斗争五十年”。

50年前的1957年，毛泽东伙同邓小平、彭真等人，以卑鄙下流的手段，把至少180万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中右份子和内控右派（丁抒：《阳谋》，开放出版社，2006年），又对其中的绝大多数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在20多年漫长血腥的岁月中，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被捆、被绑、被吊、被打，在饥饿、酷暑或严寒中做超强度苦役，有的更被戴脚镣、扣反铐，关小监、进死牢，被饿死、被虐杀、被枪毙。

位于甘肃酒泉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据官方数字，从1957年10月开始，有3000多名右派份子在此劳改。到1961年10月农场撤销时，苟延残喘者不足千人。（黄英：《夹边沟祭》）像这样的“右派分子奢场”，仅在甘肃省便有安西农场、边湾农场、饮马农场、小宛农场、十工农场、四工农场、敦煌棉花农场、玉门黄花农场、下河清农场、丁家坝农场、长城农场、新华农场等14处；全中国则更多，臭名昭著的有850农场、团河农场、415筑路队、塔克拉玛干农场、马宗山煤矿、万胜山林茶场……

#### (五)、温家宝、胡锦涛继承了一大笔血债

然而胡温当局对右派分子追讨赔偿的呼吁，仍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但对完全符合《宪法》和任何法律法规、丝毫未危害国家安全的右派集会却反应迅速。从4月9日起，突然有3辆小车从早到晚跟踪右派聚会组织者铁流（黄泽荣、晓枫）先生，致使其一家老小惊恐不安。铁流在《有关部门为什么要监控我这个老右派》之后，又与任众、燕遯符、俞梅荪等同难人和难属联名再次上书胡锦涛。

铁流质问：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和车不去跟踪贪污犯、走私贩毒犯或违背国家安全的间谍，为什么要死死盯住我这个 74 岁的老右派，不知有何价值？

铁流先生当然知道，“尊敬的胡主席”永远也不会告诉他“到底为何如此？”不是胡主席不懂，而是胡主席有难言之隐。“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不知欠下了中国人民多少血债？1949 年以前，杀 AB 团、肃反、肃托、整风、抢救，杀掉的党员、干部、红军将士、仁人志士数以 10 万计；夺得政权后更把中华大地变成杀人场：

1946 年至 1950 年的“土地改革运动”，3000 万地主、富农被剥夺土地。200 多万地主、富农被杀，几千万地富及其家属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1950 年至 1953 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杀关反革命份子 300 多万人，240 万被肉体消灭；其中许多是起义和投降的旧党、政、军、宪、特人员，中共背信弃义地推翻了“既往不咎”的承诺。

19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95%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小业主)遭受打击，有卢作孚等 280 万余人自杀或被害；

1954 至 1955 年由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引发的“肃清一切反革命份子运动”打击面扩及全国。有 400 多万人受到冲击；仅“胡风集团”便牵连 5000 余人，500 余人被捕，60 余人自杀身亡，12 人非正常死亡；“肃反”则有 21300 余人被判死刑，4300 余人自杀或失踪；

3 年人祸，饿死 3600—6000 多万；

对于 10 年浩劫，当时的中共中央付主席叶剑英在 1978 年 12 月 3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死了 2000 多万人，胡耀邦也说：当时有约 1 亿人受株连。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谭宗级在《“5.16 通知”评析》中说：“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 9804 人之多”。（《10 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王友琴曾向谭教授问数字来源，谭教授说，这是从中央文件里引用的，绝对可靠。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作恶之多，由此可见。所以毛泽东死去不久，他便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六）、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只有把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

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必须、也只有把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所以，习近平到了上海，随的还是陈良宇、韩正的旧规：郑恩宠仍被软禁，电话遭到无数次的骚扰和切断，每天 24 小时仍然有两辆警车停在他居住的宝昌路 72 号后门，每天至少有 4 名便衣警察和 10 名社工轮流监管他。上海拆迁户仍然受迫害，有 370 多位冤民给习近平写信，反映他们在上海政府欺压下，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家庭都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冬去春来，从城市的一个角落被赶到另一个角落。他们还要忍受非法的监控、搜家、遣送、刑拘、劳教、判刑、关精神病院，电话监听、骚扰等各种形式的打击报复。然而，习近平也在装聋作哑。

据《亚洲周刊》等海内外媒体透露，高耀洁在美国领奖返回郑州后又被软禁，高耀洁说：“我现在被监控，变得又瞎又聋又哑，当局的行为严重违法。我死了，他们就安心了，一了百了。但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被这些腐败官员逼死的。”

本身也被软禁的胡佳强调，“这对老人家而言确实是打击很大，因为老人家感到身边的环境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严峻。”今年2月份，为阻止高耀洁赴美国领奖，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直接指挥下，高耀洁遭非法拘禁两个多星期，期间中共动用多达50多个警察的警力，包围她的住所，切断她的电话线，阻止外人甚至她的子女与她接触。直到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莉写信给胡锦涛，高耀洁才得勉强成行。

胡锦涛、温家宝一面假惺惺地高唱“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一面却连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都不放过，连救治艾滋病的善行、爱心都要受到如此严酷的迫害；连被冤屈了几十年的老右派，也实行恐吓与打压；2007年4月23日，江苏省常州市出动了7、8个警察到高位截瘫的张建平家裡，指责他浏览反动互联网页，要他签字承认“颠覆国家政权”，并禁止他上网半年。可见，这个政权的反动、无耻、灭绝人性、丧尽天良，已经到了什麼地步！

《如焉》电子版上有印刷版上没有的话：恐惧，恐惧，一个民族，苦不怕，难不怕，饥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种莫名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

“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不然，会有那么多人往外跑？当年抗战的时候，多少在南洋在欧美过得锦衣玉食的，都越洋跨海地奔回国来，投笔从戎，教育救国，是因为心里没有恐惧，只有仇恨，只有豪情与崇高。”

“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那伤痛太深，或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直到下一次大悲剧发生，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周而复始。”于是，就有了结论一：这个党救不了了！“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谢韬：《给丁弘的一封信》）结论二：中国没有明天！（黄河清：《中国没有明天》）〔《观察》首发〕

# 毛像能保平安？

左報載，值毛澤東誕生 110 周年紀念日之際，鄭州市推出一些構思巧妙、工藝精美、純金或純銀的毛像章。據說毛像章是“中國百姓的最愛，甚至成了許多人的精神寄託，這是中國人對他的崇拜是永遠不會消失的緣故，所以購買毛像的人非常之多，體現了老百姓對他老人家的緬懷之情”。“有的是為了收藏，有的是放在家裏‘保平安’。”

我不知道這篇報導有多少真實性，至少我對毛像可以保平安就表示懷疑。試想，毛澤東在生時是個殺人的魔頭、害人的首領。他對外殺國民黨，從扯旗造反、上山為寇開始，打了二十多年內戰，僅 1945 至 1949 年間，就“消滅”了國民黨八百萬軍隊。毛澤東殺國民黨的人固然狠，但殺共產黨的人更狠。他從江西蘇區殺 AB 團、延安搶救運動、大肅反到五十年代後土改、鎮壓反革命、反胡風、反右派、十年浩劫，五十多年間可有一天不是以殺同志害“自己人”為樂的？十個元帥中，直接被毛迫害死的有四個；高崗是毛的救命恩人，劉少奇是把毛抬上神座的始作俑者，毛對此二人均是恩將仇報，非要把他們整死不可。而老百姓則在紅太陽烘烤之下，一場人禍便死了四千萬人。這個讓幾千萬人生靈塗炭的惡魔，死後居然會保佑你平安，簡直是癡心妄想，把肉麻當有趣了。

試看今日之域中，上皇原獨裁，少主更專制；官吏暴斂是務，百姓苦於水火；利入戚紳，國庫為空；獄囚累累，冤氣沖牛斗；民窮財竭，誓與汝偕一亡。中共分贓集團實已處於即將爆發之火山口之上，如今他們一方面要重振無產階級專政威風，鉗民以口；一方面祭出毛之亡靈，再煽造神之風；企圖雙管齊下，把奴役人民、盤剝人民的特權永遠“代表”下去。毛像能保其“平安”？自我安慰吧。

（《爭鳴》2004 年 1 月號）



## 践踏人权、群体灭绝：一笔赖不掉的账

——读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世界人权宣言·序言》

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历史和现实意义

由丁抒主编、香港田园书屋发行的纪念反右运动 50 周年美国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50 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以下简称《论文集》，引文出自本书者不注出处）的出版，是 1957 年学领域的一件大事；是对中国人民反专制、争民主运动历史的一次全面回顾和深刻总结。

《论文集》分为“50 年后重评反右”、“反右运动前前后后”、“国际风云下的 1957”、“反右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和大陆民间思潮的承传”、“一个人的遭遇和一个历史时代”、“史料学和 1957 年学”，从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制度原因和个人原因，发展过程和影响，作了多方面的探讨、研究和争鸣。

这本作为宋永毅主编的《21 世纪中国丛书》之一的《论文集》，作者阵容鼎盛，几乎囊括了海内外最有成就的中国当代史和 1957 年学专家，还有当年遭受迫害的右派分子、极右分子以及他们亲属的代表。专家、学者有林培瑞、丁抒、郭罗基、吴国光、齐戈、叶永烈、姚监复、程映红、张轶东、陈彦、高瑜、陈奎德、戴晴、邵江、钱理群、徐贲、胡平、朱学渊；受迫害的右派分子有许良英、邵燕祥、杜光、陈奉孝、刘宾雁、李慎之、张成觉、朱正、陈斯骏、杜高、叶国荣、巫宁坤、流沙河、龚定国、魏紫丹；右派分子亲属有方励之、章立凡、沙尚之、巫一毛、谢泳。当然，这个分类并不准确，因为许多作者具多重身份。例如，受迫害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亲属，同时也是都是 1957 年学的重要研究者、影响很大的专家和著名作家。

反右运动虽然过去 50 年了，但作为“学术问题”的提出，是在这运动发生后近 30 年的 1986 年。当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等首议的反右历史学术讨论会，由于钱伟长的告密而流产，方励之、刘宾雁的中共党籍亦因此被开除。现在方励之的发言《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1957 年和我》、许良英的书面发言《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可以堂而皇之地刊在《论文集》中了，这不啻是对叛卖者钱伟长、扼杀者邓小平的无情嘲弄。正是：尔曹身虽灭，

羞辱万古随。

纪念反右运动 50 周年活动，海内外举办了许多起。对中共当局冲击最大的当然是发生在北京市、重庆市、成都市、浙江省、新疆区、湖南省邵阳市、云南省弥勒县等地右派分子们的公开集会、上书、告状、要求平反、索取赔偿、追讨欠薪的英勇行为。但规模最大和学术成就最高的，应当是在美国东西岸举行的两次研讨会。

2007 年，临近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也开了 5 次研讨会：一、二月份由本人组织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后人和写作人在香港北京宾馆的小型讨论会（武宜三：《与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后代座谈反右运动 50 周年》）；二、9 月份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主办的《被埋葬的青春——反右 50 周年》将军澳研讨会；三、12 月亚大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主办、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等协办的《生的权利：反右运动 50 周年暨中国生态危机与维权运动》恒丰酒店研讨会；四、12 月 18 日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未来民主化是否可能？——由转型正义观点看中国共产党反右运动 50 年》论坛；五、12 月 20 日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主办的《台湾的感化与大陆劳动教养之异同》讨论会。

但这几回研讨会或讨论会都由于中共当局阻挠和破坏，及经费、时间的不足，都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和效果。出席嘉宾或者在原居地被恐吓阻止，或者在北京、深圳、珠海等海关被扣查、拦截；甚至有人到了香港仍不能出席会议，因为公安国保就赖在他们家中；在这中间，号称与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享有“高度自治”的香港政府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帮凶，它野蛮地阻止了研讨会主讲嘉宾、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关系研究所徐文立研究员等人进入香港。也由于一些讲者仓促上阵、准备不足，把研讨会变成了诉苦会，因此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报告并不多见（即使如此，这些大大小小的研讨会、讨论会仍具有催命符的作用，仍是加速中共非法政权早日崩溃一股冲力）。

### 《论文集》：立此为据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并颁布的，它的《序言》说：“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1954 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当年 9 月 20 日颁布并实施的，它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

信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没有想到《世界人权宣言》颁布近 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墨迹未干，《世界人权宣言》所描述的状况就在中国发生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大规模镇压、迫害知识分子的群众性反右运动，公然撕毁它亲手制订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大法”，撕毁了它在夺权时期开给中国人民的美丽支票。反右运动不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了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消灭了批评的声音；而且使中国共产党本身轻诺寡信、说谎欺诈的“光荣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以至使它本身也堕落成古今中外第一等的无赖、无耻、无德、无道、无行、无良、无信、无义的流氓黑帮，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这可以解释：在 2004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之后，加入联合国并承认《世界人权宣言》一系列文件 30 多年的今天，中共反动派仍然在不断地以国家权力粗暴地践踏人权，随意剥夺工农大众财产权和生命权，对异议人士、维权者、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有增无减，且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致引发每年有数以十万宗计的群体性反抗事件。

1957 年反右运动，是许良英所说的“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它与其后的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4 大屠杀并列为“当代中国的四大灾难”。所以“研究和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它的当代意义和迫切性。从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 1957 年对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呐喊，到 1989 年天安门广场上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乃至今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和推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民主自由思想的发展轨迹，一个值得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的当代研究课题。”因此，《论文集》不但填补了中国历史的空白，而且也颠覆了中共官方对历史的歪曲、隐瞒、虚构和篡改。把中共欠下的巨额历史债务记录在案。

## 阳谋还是阴谋

1957 年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的阳谋还是阴谋，是主动下套还是被迫出击？其实，从现在披露的大量事实来看，不管是阳谋还是阴谋，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都不能改变毛泽东及其一伙是阴阳家，是刽子手的本质；都不能改变毛泽东及其一伙仇视知识、仇视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本性。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特殊的仇视，在他 1926 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表露无遗。在苏区肃反、大杀 AB 团、肃托等事件里，知识分子都是被整肃的

主要对象；自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毛泽东多次羞辱、漫骂知识分子，如“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蚂蚁”、“乌龟王八蛋”之类随口而出，与市井流氓毫无二致。长期追随在毛左右、深知毛心态的胡乔木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的心理。”

1957 年，再三动员、引人入彀，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已令人不齿；以考试的方法抓右派，更匪夷所思。芜湖市教师暑期学习班竟让人在“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对吗？”后面划“十”、“一”号。结果大部分教师觉得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当然是共产党的天下，于是纷纷划了“十”；而所有划“十”的人全成了“储安平的爪牙”，划为右派分子。同样荒唐的事，还出现在四川等地，那里用流沙河的《草木篇》做试剂，不消一分钟便“多快好省”地判定谁是、谁不是右派分子。古今中外有这样愚弄、坑害子民的皇帝，有这样愚弄、坑害自己国民的政府吗？

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卑鄙和无耻，不仅表现在阴谋诡计、口说无凭上；在白纸黑字面前，他们也是无赖到极。他们自己宣布不在工人、农民里划右派，但工人、农民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仍屡见不鲜。中央各部委送北大荒 853 农场劳动教养的，就有通信员、保管员、制图员、工人，有司机、服务员、保管员，其工资有低至每月 32 元、25 元；军队中的右派分子有文化低至小学程度的下士付班长、列兵战士。本人在今年 1.13 香港市民要求双普选大游行中，又认识到一个往日假右派、今天真右派的老先生，他叫李学成。李老先生根红苗正，14 岁入共军、15 岁入共青团、19 岁入共党，在南昌步兵学校任少尉资料保密员；本是共产党最信得过的依靠对象；可是在一句话没鸣放，一字大字报没写的情况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共产党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吗？毛主席不是人民的大救星吗？

“放屁！”三二十年来瓜分国有资产、盗窃国库、野蛮征地、暴力拆迁，它们豺狼本性终于更彻底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了。

## 把西方理论的应用于反右运动

我和作者中的徐贲教授有数面之缘，皆因我听过他的几场讲演。徐贲善于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阐述中国的事件，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反右，徐贲又运用了历史事件的两种认知模式：“客观发生”和“文化构建”来讨论事件发生 50 年后的创伤记忆特征。如何去理解这种创伤记忆的构建特征和因素呢？徐贲把亚历山大对“文化创伤的社会化过程”的分析模式简化为：一，灾难诉说的叙述和接受关系；二，对创伤性灾难的认知因素；三，叙述灾难的话语样式。他在分别讨论这三个方面的时候，把反右记忆和文革记忆作了比较，揭示了灾难记忆构建的复杂因素，可以把讨论引向更深入、系统。指出反右之所以特别邪恶，乃是因

为它结合了现代专制国家的政治欺骗(“阴谋”)和制度暴力(流放、劳改、戴帽等等的惩罚),以恐怖和残害的手段公然剥夺本国人民的宪法权利(自由言论)。尖锐地提出:是谁造成了反右运动中几十万的“冤假错”案?谁该为此负责?是各个单位的“领导”,是“运动积极分子”,还是另有其人?是“失误”,还是侵犯公民权和人权?是办事人的“个人水平不够”,还是整个统治制度本身就被设计成为一部暴力和恐怖的机器?

徐贲说,“历史比照让我们看到了法律在反右创伤记忆构建中完全缺席了”。文革之后,至少还有一场对“四人帮”的审判来确定这场灾难的刑责罪行。但是反右的情况却不同,虽然官方承认了反右的“扩大化”,造成了几十万右派的冤假错案,虽然有成千上万人遭受折磨、摧残甚至死亡,但却没有任何人必须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作为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性道德权威的法律至今没有做出裁决,使得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反右“没错”。比照由纽伦堡审判而发展而成的普遍人权和公民权观念,一国的人民对政府和执政党提出批评,只要是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范围之内,就不应该因言获罪。批评是公民权利,与出于什么动机没有关系。一个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对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进行迫害,无论被迫害者是否忠于这个政府,错都在这个政府。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普遍价值观能帮助反右创伤记忆把反右受害的性质从“好人受冤枉”转变为“公民权利受到国家政府侵犯”。从违反人权和公民权来看,反右就不再是一个平反的问题。历史比照和同类联想至少可以让我们提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反右”错了,那么犯错政权的继承者应该怎样对公众有一个交待?第二,在这种罪行发生时,其它公民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负有怎样的集体责任?

从国际人权共识来看,反右是一次制度性的作恶。这种制度之恶是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是“国家之罪”,是“蓄谋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暴力,这种暴力针对某个打上污名的集体的成员,而污名集体则是用原初特征的方式或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划定的。”“右派”就是这样一种打上了污名的集体。国家曾经对“右派”这个污名集体施加了蓄谋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暴力,进行了迫害和摧残。污名曾经有效地把右派同中国社会的其它部分分割开来,使他们在受迫害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社会的其它部分对他们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

孤陋寡闻的我,自然可以把徐贲的演绎叫做“理论创新”。

共产党的本性:剥夺

《论文集》的“理论创新”当然远不止于此。我在台湾政治大学的讲题为《中共剥夺资本家财富并把工商大户、知识大户、民主大户变成右派大户的》。我指出共产党的本性是剥夺:它剥夺人们一切有形的资产和资源,从土地、工厂、矿山、

商店到柴、油、盐、米、醋、茶、草纸、月经带等，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都不放过，甚至连性资源也要垄断和控制，如反右运动中，不少人是因为有漂亮的妻子或女朋友遭权势者垂涎而罹难的，如吴祖光一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部副部长刘之明便立即威逼新风霞离婚；它同时也剥夺人们一切无形的资产和资源，把人们头脑中的知识也剥夺干净。当时我很想用一句话把它总结出来，终于没做到。

但是，陈奎德先生做到了，他用了“国有化”这三个字概括了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城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1957年反右运动。确实是神来之笔。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依附于资本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土地的农民，都由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再也不可能对新王朝体制构成威胁。而知识分子仍可依赖知识而保存独立思考，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与理念。这就必然会构成对专制体制的极大威胁。毛泽东、共产党要巩固它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制度，就必须强力驯服这个有思想、有能量的阶层。

所以，整风就势在必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铲除潜在的民主力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从教授到青年，从民主党派到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统统在围剿、镇压之列。对于党内知识分子，毛泽东另有一番恐惧。1956年8月3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一千多万共产党员中，有一百多万大中小知识分子，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在1957年《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又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是“共产党的右派”。

对此，在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要求“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的，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说党内右派分子和党外右派分子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危害愈大。指示要求全党克服温情主义，不能姑息宽容。特别是对其中的老党员，更不能心慈手软，下不了手。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屠刀下，不少党内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中共党组副书记王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孙作宾等。而且必有一个“反党集团”拖出若干厅局级的“反党集团”成员，一网打尽。

最后殃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师、医务人员



等等，这些通常被称为小知识分子，甚至还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的弱势群体。

## 建立起 1957 年学：拒绝遗忘

反右不但使一二百万右派分子本身和几百万亲属、子女受迫害，受歧视，劳教、劳改的超体力劳役和饥寒交迫、虐杀、枪杀，造成右派分子大面积死亡；也为其后的三面红旗人祸、饿死 4 千万人，十年文革浩劫、非正常死亡 2 千万，6.4 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但中共当局至今对右派分子只作所谓“改正”，而且还保留了“不予改正”的：中央级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林希翎，各省市又都有许多位，如四川省有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涇、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苏、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勋（乐山市）、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冉云飞博客》，而拒绝平反、拒绝赔偿，并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不许写文章、不许出书、不许讨论。企图抹然这宗反人权、群体灭绝的反人类罪行。

钱理群教授惊呼：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一九五七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钱理群认为，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 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是时候了”！

1957 年学在许多有心人努力下，正日益成长。据我所知，叶永烈先生在 80 年代就开始采访有关当事人，收集反右史料，他的《沉重的 1957》、《历史悲歌》在海内外广泛流传。谢泳教授以“一个人、一本周刊、一所大学”在史学界独树一帜，对反右史料的收集，也成就斐然。丁抒教授的《阳谋》是开山之作，影响深远。朱正先生的《两家争鸣》，风行两岸三地。冉云飞先生《右派日知录》，为 1957 年学建立了最完整的目录，他也是右派名录收集者。美国“自由人网站” <http://www.ziyouren.org/> 已经收集了上万名右派分子名单，本人有幸是该站的义工，希望继续得到各方志士仁人的支持和帮助。与官方的打压、强迫遗忘成强烈对比的是：许多当年的受难者及其亲属都在撰写回忆录一类的文章，并利用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和互联网在广泛传播。

宋永毅丁抒等学者在编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又着手编撰《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年学将成为一门显学，将在中国民主化、现代化运动担当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论文集》不愧是构建1957年学大厦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金砖。

2008年1月于香港流浮山庄

## “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果，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

——为蒋文扬《我是一个被监控“关怀”的右派老人》写的按语

武宜三

因为收集 1957 年史料的缘故，最近看到了由吉林省教育科学院基教所副研究员刁振玉执笔的《吉林教育史》，他在《教育战线的反右派斗争》一节说：

“由于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极少数人疯狂向党的社会主义进攻，导致了整风性质的变化，由解决人民内容矛盾变成了对敌斗争……”

“反右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子。当时省教育厅副厅长黄颖以及吉林大学的余瑞璜教授，东北师大的蒋锡金教授、杨清教授，吉林工大的徐祚教授等知名人士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东北师大中文系有一个班，1/3 的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些学生有的被下放劳动，有的被开除学籍，有的还被逮捕入狱。‘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伤害一部分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内人士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虽然如此，刁振玉仍然认为，“吉林省教育战线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果。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争取、教育了中间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真他妈的混蛋透顶，我就不相信道这个丧尽天良的刁振玉，他家人中、他的亲戚中、他的老师同学中，会没有一个右派分子！刁振玉应该受到他们的最恶毒的诅咒。

这部刁振玉的《吉林教育史》是 2008 年 10 月上网的，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死不认错流氓团伙；而中国共产党又有刁振玉这样的无耻辩护士。

这说明了，为什么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是死皮赖脸的不但不给右派分子作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连拖欠的二十多年工资也不肯发还。原来他们仍然把右派分子当作“疯狂向党的社会主义进攻”的阶级敌人。

这说明了，为什么北京当局仍然在管制、跟踪、打压右派分子，剥夺他们的言论权、出版权、出国权，把《往事微痕》当作“打黄扫非”的对象，严加堵截。原来他们仍然认为“反右派斗争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

连一个 75 岁老人家都不放过，这让人想到中国比奥威尔所描写的《一九八四》更恐怖。和平部(防暴警察、警官)、仁爱部(思想警察部，各级政府包括居委会)、真理部(谎言部、报纸、电视)到了无孔不入、如影随形，使人民生活生活在恐惧中。中共权贵集团希望让人民永远生活在恐怖与畏惧中。因此，他们需要大批警察、特务来监视人民。所以，严家祺担心“中国沦为警察国家”。

严家祺说，毛泽东的专制也没让中国变成警察国家，今天中国才出现沦为警察国家的危险。

严家祺是政治学家，他说的当然有他的依据。但是，毛泽东的军事独裁与警察国家有什么分别？

奥威尔是预言家兼寓言家，他在《一九八四》所描述的党决定一切、“老大哥”高于一切的时代，早就在中国实行 60 年了。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比起毛泽东共产党的中国，真是小巫见大巫。《一九八四》的恶梦仍然笼罩着中华大地，笼罩在中国人、香港人甚至台湾人的头上！

武宜三写于暴政 60 年夏 8 月 28 日，洋紫荆洲避秦山庄

## 我是一个被监控“关怀”的右派老人

蒋文扬

昨天（8 月 26 日）下午，突然有人敲我的门，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奉命前来对我表示“关怀”，他单刀直入：“居委会叫我来看看你在不在家？”我想，我在不在家与居委会有何相干？他们为何不来？为防不法之徒上门敲诈勒索，我请他通报姓名，出示证件，均被拒绝，我只好请他把“居委会叫我来看看你在不在家？”这句话写下来，签个字，以便记录在案，证明他并未虚此一行。可是这位仁兄死个舅子不干，他既不写，又不签。我对这位来历不明私闯民宅的陌生人极为警惕，只有紧紧拉住他请他签名，逼其就范。双方正僵持不下，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派出所的王警官，亲自登门拜访，“关怀”我这个老右派，我正在笑脸相迎，又出现了一位来自 110 的防暴警察，据他说，也是前来“关怀”我的生活。

顷刻之间居然先后来了三位政府官员“关怀”一个 75 岁的老右派，实在令我受宠若惊。可是不久，我便疑窦丛生。这种“关怀”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为防不测，我连忙声明：“我是一名遵纪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人权。如果你们认为我有违法行为，必须依法办事，出示传讯，逮捕，判决的法律文书和相关证件。如果你们是来‘关怀’我，我正患严重颈椎病，需住院开刀治疗，干脆请派出所把‘人情’做到底，送我去医院、为我免费治疗。治好后，随你们去派出所，要管吃、管住，长期养老……”话还未说完，两位警察面面相觑，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应，一边由 110 来的防暴警察陪我聊天，一边由派出所来的王警官悄悄放走了那个来历不明的中年男人。

不久，二人便起身告辞。于是，我又和两位警官亲切握手，笑脸相送，双方态度极为友好热情。

送走二位不速之客，陷于一片迷茫，至今仍一头雾水。公安部门为何要监控“关怀”一个 75 岁的右派老人？说穿了无非是因为我们曾要求中共中央发还被

拖欠了二十多年的血汗工资。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此，我们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写了不少信，均石沉大海，渺无音讯。至今不仅未能得到善意的回应，反而招来颇具戏剧性的监控“关怀”。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了。“欠债还钱”这一古老的法则在当今中国已扭曲变形。

我希望“执政为民”的人民政府各级官员，不要被讨债的右派老人吓得惊慌失措，我们决不可能“颠覆国家政权”。要求政府补发工资，于理于法都是正当的，该补你们就痛痛快快地补，不该补也要痛痛快快地说个理由，正式给个答复。

现在，共产党已是执政党，做事应该光明磊落。不要偷偷摸摸，搞些为人不齿的小动作，派些公安警察上门软硬兼施、呵哄吓诈。如此低劣的“执政为民”恰恰暴露了官员们理论政策素质太差。如此猥琐的执政方法，只能证明其政治智商之低下。

亲爱的执政党，你们为什么不学习一下胡耀邦同志的处事精神：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哪一级领导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把它纠正过来。这才是政治家的风度，也是赢得民心的上策。

75岁右派老人：蒋文扬

2009年8月27日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九杨兴村8幢13单元4-4

电话：023-68108800

邮编：400051

【導語：《天涯》、《世紀中國》等網站在新一輪整治運動中被扼殺之際，因創辦《思想的境界》網站而聞名的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李永剛教授發表了《中國網絡審查》研究報告。這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記錄；記錄者，武宜三；時間，2006年8月】

## 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管制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李永剛教授以創辦《思想的境界》網站而聞名，該網站主要討論學術思想與一些熱門的學術話題，很受知識分子的歡迎，但於2000年10月14日被迫關閉。(李永剛：《未完成的任務：寫在思想的境界關站之後》，《二十一世紀》2001年第一期)多年來，李永剛一直在關注互聯網，最近完成了一個研究報告《中國網絡審查》。與此前後又有香港大學馮廣超《長城在我家門口----香港網站被內地禁封情況調查》(《二十一世紀》2006年六月號)，胡化《不留一個透氣孔？》(《明報月刊》2006年九月號)以及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發表或出版，一時間中國大陸互聯網管制竟成了熱門話題。本文主要介紹和評論李永剛先生研究成果，本文之觀點由本文作者負責，與李永剛先生無關。

### 一，中國目前互聯網的現狀及中國當局的管制

現有中國網民，今年已經達到一億二千萬人，佔總人口不足百分之十，可見發展空間仍大；網站數量：截至今年六月止是七十八萬八千四百多個；網民年齡：三十歲以下佔六成，或二十四以下的青年人佔一半；網民文化：高中、中專及以下佔七成；職業：學生佔三成六；行為：閱讀信息、網絡遊戲、網絡交流與交往、收寄電子郵件，從事商業活動等；上網地點：除家庭和工作場外，網吧佔二成九，學校佔近一成九，所以目前監控重點在網吧和學校。

2002年哈佛大學一個研究中心對二十多萬個網站的調查顯示，有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一個網站是對中國網民封鎖的，十分之一內容被政府過濾；現在的情況，只能比以前更為嚴重。因從事互聯網活被監禁的中國人，2001年及以前只有綦彥臣等四個，到2006年有陶東海、趙巖、鄭貽春、張林、許萬平、任自元、李元龍、咎愛宗等六十二個，居全世界前列。

到2006年七月止，全國人大、中共中央宣傳部、公安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信息產業部、文化部、新聞出版署和廣播電視電影總局等十四部門先後出臺了五十多部有關互聯網的法律、法規，成了全世界有關這方面法律、法規最多的國家。在記者無疆界協會二〇〇五年全球一百六十七個國家新聞自由度排行榜上，中國列第一百五十九位，其後是尼泊爾、古巴、利比亞、緬甸、伊朗、土庫曼、艾特



利亞和朝鮮。胡錦濤則被該組織連續三年評為全球最大新聞殺手之一。

2006年四月份，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直屬的千龍網等十四家網站發起了《文明辦網倡議書》，它們在自查自糾中，刪去了不健康文字、圖片二百萬條，關閉不良論壇六百多個，收到網民舉報一萬多件，警告用戶一百多名。這些網站本來就處在高度自律中，但在自查自糾中依然可以取得如此巨大成績；這一說明中國互聯網活躍程度，二說明中國互聯網管理難度。某網站催用一百多人自我監控信息，每天刪的文字量是百分三十，圖片量為百分二十。這說明管理十分嚴厲，但也說明有很多人在做讓管理者不喜歡的事情。

2006年六月二十四日廣東省公安廳稱本年度將重點打擊境內外插手內地維權問題。作為控制手段之一，深圳警方要求在網吧安裝視屏監控器材，直接由警方監察什麼人瀏覽不良網站和發佈不良信息。深圳市還在2006年一月一日率先推出「網上警察」，公開在網上巡邏；五月十六日公安部決定在全國推廣深圳市做法。「網上警察」是安裝在網上的兩個動畫人物：「警警」和「察察」，它們像幽靈一樣隨著用戶遊動，功能之一是對用戶造成心理威懾；之二是實際連接，一旦發現「不良行為」，便啟動舉報系統，立刻現身執法。

2006年六月二十九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言人說中國整治互聯網重點是博客、搜索引擎，因為中國當前有三千萬到六千萬人在網上書寫網上日誌，非常活躍。信息產業部長王旭東說：今後要加強技術能力研究，要為加強互聯網管理的保障而加大投入。

2006年中國已經全部實現過濾顛覆性、敏感性內容，古狗、啞虎、為軟以及中國本土搜索引擎，都已經不會有負面消息出現了。六月份又開始新一輪大規模整治運動，以論壇活躍聞名的《天涯》網、《世紀中國》網等分別在七月份內被關閉。古狗在2006年一月推出Google.cn，任何違背中國政府的内容都被過濾。在Google』s搜索「六四」時，有二百六十七萬條信息；但在Google.cn搜索時只有一萬〇二百條，可見被過濾幅度非常之大。Google.cn還有一個說明：「符合當地法律規定，本搜索結果已過濾部份內容。」這是古狗在中國的獨特做法。「雅虎中國」更被指幫助中國當局調查網上異見人士，導致師濤、李志被捕判刑。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於今年六月份在新浪等兩個網站上註冊了自己的博客，並在上面做測試中國輿論底線的有趣試驗。他先寫趙巖被抓的事，貼上去了；再寫「問胡總書記為什麼不推動政治改革」，也貼出去了；他接著寫六四事件，又貼出去了；於是他在《紐約時報》宣佈說：中國政府已經控制不了互聯網，已經管不了。可惜他說了這話之後，他的博客就被取消了。

有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等參與的「開放網絡促進會」在 2005 年四月發表的一個研究報告稱，中國網絡過濾系統是全世界最發達的、範圍廣、手法細緻、效果顯著。整個制度包括多層次的法律限制和技術控制，牽扯到眾多的國家機構，以及成千上萬的政府職員和企業員工。

## 二，「垃圾桶模型」與專項打擊

西方研究公共政策常用的「垃圾桶模型」也可以用來分析中國網絡管制的演變過程。中國政府管制互聯網的過程也是其政策學習的過程；因為這是一個嶄新的技術，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或當時五六十歲的管理者的第一個感覺：這是什麼？其次是新鮮；再後是恐懼；最後成立監察部門來管制它。

從無知到知，從知少到知多，所以決策模式非常混亂。互聯網到底應看重它的科技功能、商業效用呢，還是把它當看作犯罪工具、散佈不良信息挑戰意識型態？不同的部門、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場，評價都不同，於是形成混亂的垃圾桶模式：有人往裡扔，有人往外揀。一個老人的偶然生氣，一個部門利益的偶然被觸動，都可能引發一場大的整治。

自 1994 年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首次通過海底光纜接通了美國大學作為科研的計算機網絡起，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階段：

1，1998 年前是低度管制，或叫做救火式的消極管治。因為 1997 年互聯網人數才六十二萬，所以除封閉一些明顯敵對網站外，其他則是放任自流。

2，1999 年進入中度管制。打擊與預防結合，監管與治理同步；想到用法律約束和預防互聯網的負面效應。1998 年法輪功衝擊中南海及在互聯網上反彈，使中共當局第一次領教了異端力量利用科技的厲害。

3，2004 年進入高度管治、法例細化。因為非典期間政府表現了少見的開明而引發的網民參與熱情，在非典之後依然不減；特別是出現了如廣州市孫志剛事件、哈爾濱市寶馬案等幾起大規模網絡抗議和網絡維權運動，政府因恐懼而加大了壓制民間表達的力度；趁 2004 年夏天第一次大規模打擊網絡色情活動之機，對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網站實行嚴厲打擊和監管。從此「專項打擊」日益橫行於互聯網領域。

當局擴大網絡監察隊伍，加強網上輿論審查。網警超過三萬人，也有人說有三十萬人；這些網警除管制政治訊息外，也顧及經濟犯罪、色情、詐騙等網絡治安。

2005 年教育部規定在大學 BBS 實行實名註冊，以便於監管和追查在網上的言論；信息產業部設立「舉報網站」；各地政府招收的網絡評論員以普通網友身份為網絡「正確導向」，他們被稱為「互聯網政治工作者」，是拿錢的，每個帖子五毛錢；網民把網絡評論員叫做「五毛」，以示輕蔑。政府還僱請網絡監督員、網絡保安進行網絡監控，中宣部有老幹部組成的「網絡評論組」。從實名制、備案制度，到相互監視、自查自糾、行政處罰等一系列措施，實現了對人、對地點、對公司的嚴密管制。

管制總體呈現了密度漸強的趨勢，強化了心理空間控制權，阻止境外「有害」信息進入，包括外國、香港、臺灣的宗教、臺獨、藏獨、法輪功、反共的信息、小道消息，通通都不讓中國老百姓看到。同時阻止境內獨立信息流出，為安全起見一般人多在網吧裡發佈訊息，於是又開始管制網吧；內容供應商、論壇板主，都受到規範。區域之間、部門之間、系統之間的合作，使控制範圍越來越廣、越來越嚴密。

所有「敵對網站」都在廣州、北京和上海這三個國際信息入口處，根據黑名單過濾完畢，這就是所謂「防火長城」。當年曾因為封閉 BBC 等國外網站而引起隨布什來訪的記者們的抗議，當局則以「技術故障」搪塞，但當這些記者走後，那些網站又永久「故障」了。

2002 年以後實行敏感關鍵詞過濾，據統計有一千到三千個關鍵詞被列入黑名單，如「六四」、「法輪功」、「王丹」等，在龐大的掃瞄器之下的所有網頁，如有關鍵詞出現，便會遭短暫屏蔽。甚至使用「共產黨」一詞也被認為不懷好意，於是「共產黨」和它的一切替代詞，包括倒過來寫、拼音簡寫都在黑名單中；現在只有「偉光正」是例外，得以倖免；現在網民只好用「斧頭幫」來代替「共產黨」。

「不矢口□十麼日寸候，□奄口斤言兌言命土雲有□寸□慮白勺言兌□去，於是，□奄學會了□斥字。後來，□奄米青□申分裂了」，這是網民用拆字法對付敏感關鍵詞過濾；最近流行的「惡搞」，實際上是網民對當局管制互聯網的一種反抗，當然也是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如「八榮八恥」在網上有幾十個版本，完全消解了當局原有的「嚴肅」意義；連毛澤東、劉胡蘭、董存瑞、電影《閃閃紅星》等都成了惡搞對象，遍及文字、圖畫、影像。這說明管制越嚴厲，失控越嚴重。

還有域名劫持，你想瀏覽 A 網站，結果卻去了 B 網站；組織駭客攻擊海外敵對網站等。除國家大規模監控外，在各地網吧還安裝公安部開發的監控軟件，如果有人瀏覽或發佈敏感信息，該軟件就會發出警告或記錄在案。從控制人，尤其是活躍的異見人士(約談、騷擾、跟蹤、軟禁、恐嚇、毆打、抓捕、判刑)開始控制網絡

虛擬世界，控制的重點依次是信息、地址、人群。

### 三，中國政府在互聯網管制上的中國特色

中國政府在互聯網管制上也有強烈的中國特色：

- 1，普遍過濾與人工抽查相結合的預審查模式。
- 2，標準模糊與多部門介入的暗箱作業，五十多法例中什麼叫「有害信息」、「敏感信息」、「顛覆行為」？全無標準可循。
- 3，程序不透明和缺乏行政糾錯手段、司法覆核缺位。中國相當多網站被關閉或刪除內容，都難以尋求復議與訴訟的途徑。誰實施處罰、違反了什麼法律、依據什麼處罰都難以明確。一些學術、法律、維權網站尤其如此。
- 4，嚴控、嚴打大型抗議活動，有海外景的政治行動；此時當局則不會顧及國際影響，而只會考慮政權的安全。世界各國一般只管制網上詐騙、涉及兒童的色情之類，中東也只管制宗教內容，即使像古巴、朝鮮這樣專制國家也沒有像中國這樣多層次、多手段、多途徑、分佈式的過濾和管制體系。

### 四，在互聯網管制中，中央、部門、地方、機構、網民所扮演角色及其行動邏輯

1、中央政府是導向控制，是主導者；在全能國家治理慣性驅動下，產生了對權力效應的高度迷戀，以為什麼都能管好；一切可以通過計劃達到斧頭幫的境界。另一方面是對民間的普遍懷疑，以為不管一定會亂；把社會、市場通通都消滅，無孔不入地滲入到老百姓生活的每個細節。於是形成自稱「代表最大多數人」和根本不相信「所代表的人」的悖論。

主義國家靠意識型態的宣稱、灌輸，政績的宣傳，來維持國家穩定和政權的合法性；但這只有在封閉的狀態下，才能見效。所以就壟斷訊息、管制輿論：不讓你知道外國、外國人是什麼樣子。像朝鮮一樣，讓老百姓以為全世界都是饑荒，都在餓死人，只有自己最幸福。但開放的多元化，卻使人有了反省和獨立思考的可能；因為空話、大話太遙遠了，只有「改善我們的生活了嗎」才是實際的問題；這些來自民間的有時是隱藏、有時是噴發的壓力，理所當然地引起執政黨的焦慮。

由於不相信民眾自治能力，害怕異見力量，共產黨總懷疑敵對勢力在挑動。日常的管制壓抑了人們的言論、表達、抗爭和聚會的自由，於是互聯網就為革命狂歡、

快感衝鋒提供了空間，成了民眾參與的、能使事件放大的虛擬廣場；它挑戰「穩定高於一切」的最高價值觀。互聯網超強的動員能力，例如「銅須門」、虐貓事件、反日、反美等事件所引發的「道德民兵」的「網絡暴動」，也讓當局為之憂心忡忡。

2，部門與地方是政策管制的執行者，一面在問責機制下願意與中央保持一致，傾向於嚴厲管治；一面在經濟利益引誘下也樂於厲行管治，以使尋租機會增大；因為準入限制越多，利益越豐厚；如大量出售監控器材、安裝軟硬件、處罰等，都是生財之道。中共帝國早非鐵板一塊，而更像是一個財政聯邦制。可以說，這種財政聯邦制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原因，但也可能為打破輿論一律留下許多空間。因為，部門與地方沒有最高當局「江山永固」預期和「紅旗能打多久」的焦慮，只有仕途平安的利弊平衡，求得保住烏紗、陞官發財。

3，機構包括網絡服務商、供應商是管治的協助者；在權力警告和資本施壓之下，連跨國企業也本土化；為了巨大市場的財富誘惑、擴大贏利空間，使機構積極地投入到互聯網的管治中來。跨國企業如啞虎、古狗、微軟，最終都選擇了和中國政府合作，加入禁上自由言論、迫害記者的行列。

4，底層老百姓對政府多有怨言，但一遇到事情又都會想到他們並不相信的政府，而責問「政府為什麼不管？」這是由於在國家機器異常強大之下，民間力量異常軟弱的緣故。政治認同、政治冷漠、為了平靜生活而遠離危險，使非常龐大的沉默多數成了管治的參與者。網民高度自律、相互監視，為網絡監管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而使監管成本大大降低。例如金盾工程也就是八億美元。可見互聯網上的「萬里長城」不是建立在外部，而是建立在心中。所以，每個人都要自我反省。

## 五，管制互聯網之文化背景及在嚴密管制下的中國互聯網的前景

中共當局奉行的是父愛專制：這是以父母官自居，對子民不平等的先天設定；愛是當局自我邏輯定位：一切都是為了你們好，所以在「愛」的外衣下的專政就變得神聖而讓人無法拒絕。其次是革命鬥爭傳統，實際上革命鬥爭是屬於不和諧社會。共產黨總是設定「敵人無處不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一有風吹草動，它就咬定「民眾中一小撮是別有用心的，大多數人是不明真相的」。於是就把「一小撮」逮起來，然後去教育「大多數」。再次，共產黨總認為人民的頭腦是空的，他們不佔領反動派就一定去佔領。

去年發了超過三百億條短訊的四億部手機，將是當局下一個管治的目標。成千上萬的反美、反日遊行以及幾起「網絡民兵暴動」，都是通過手機發佈訊息、徵集簽名和召集隊伍；廣東發生沙士和禽流感消息也是靠手機短訊向外傳播。這些都



讓當局心驚膽戰、惶惶不可終日。現在已經有人民代表提出《管制手機的草案》：對手機實行實名制，購買手機電話卡要登記個人資料，要讓使用手機的人無所遁形。

威權日見碎片化的今天中國政府，已不是原來那樣的中央集權了；國家權力已經日漸向資本集團、知識精英、意見領袖那裡流失。例如中央的宏觀調控，各地方可以不理。如今中國是中央董事會與地方經理人之間利益博弈的黨控股份無限公司，中央董事會謀求長期利益，地方經理人只要短期套現。地方、部門利益比政治意識型態更重要，例如文化部和國家版權局可以為收取卡拉 OK 版權費大打出手。教育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衛生部也插手互聯網，籍管治來分一杯羹。

在發達國家強烈示範下，滿懷時間焦慮、人口焦慮的執政黨選擇了隱定、秩序，放棄了公正、自由、民主，小康、和諧早已成了畫餅。執政精英以新三民主義說詞和改革的小恩小惠來謀求弱勢群眾合作，對人數不多、嗓門較大的知識精英、經濟精神則以福利、地位來拉攏和收買；對不肯就範的一小撮則予以排斥、打擊。

由於共產黨對輿論信息的嚴厲管治，中國這個斷裂社會已經像個沒有出氣孔的高壓鍋；但對前途卻不必太過悲觀，因為禁令的背後也反映了當局權威的疲弱，中共中央對自己的統治越來越失去信心。像地區競爭有助經濟成長一樣，媒體、網站也以打擦邊球的方式為自由表達開拓了空間。立法管制也為管理者自己行為設下法律標準，使管理者有了走上守法的可能；也為依法維權、依法抗爭，準備了有利條件。技術進步是雙刃劍，在強化管治能力的同時，也強化了突破管治的能力。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動向》2006年9月號)



## 一個毀滅文化、毀滅人才，也毀滅了未來的時代

——跋石貝《一片冰心在玉壺》

武宜三

我認識石貝已經很多年，這是因為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兒，到處搜集反右派運動資料的我在《開放》雜誌上看到她紀念她父親的文章，於是我們有了互相通信的機會而成為好朋友。

石貝的父親歐陽靜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醫學專家、當過民航局醫院院長兼外科主任，是“中西醫結合”的創始者和第一個實踐者——和石貝的兩個姨丈嵇成武（福建農學院教授）、楊烈（上海復旦大學研究莎士比亞詩劇的翻譯家），三連襟都是右派分子。

石貝的三個舅父梁其田（上海美資電影院的經理人）、梁其昌（水產部高級工程師）、梁其琛（醫學博士，上海第二醫學院外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二級教授），三兄弟也都是右派分子。

石貝的媽媽梁其容則被打成中右分子，文革中升級為“漏網大右派”。

這樣，石貝的親屬親戚中就有七個右派分子和“同”右派分子了。第一個感覺是“奇怪”——六家親戚一鍋煮。後來才知道不奇怪，這類案例很多。

第二個感覺是惋惜、氣憤——他們都是優秀人才、社會精英，是先進思想、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的載體呀。

在中共政權剛剛建立不久、百廢待興的五十年代，這些人才本來是建設國家的依靠力量、寶貴財富，但是毛澤東一夥不此之圖，他們寧可置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也要把知識份子徹底消滅——僅僅因為知識份子有知識、會思考、想民主、要自由，便成了毛澤東及其一夥的潛在敵人、假想敵，必要除之而後快。

我的朋友，無論體制外還是體制內，都喜歡給我貼個“反共”的標籤，其實我和共產黨有什麼私人恩怨呢？好像談不上。

我痛恨的只是毛澤東、共產黨（其實只是共產黨中的一小撮反動派）與知識為敵、與知識份子為敵的野蠻、反動立場和禍國殃民的獨裁制度。

最初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受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特務的操縱，但是，那到底是由一批有知識，有抱負——要改變落後中國的熱血青年組成的。

自被毛澤東所劫持，一群土匪、兵痞、流氓、二流子代替了教授、大學生以後，中共這個“盧布黨”就進一步成了反文化、反知識、反民族、反國家的武裝賣國集團；從此，知識份子就長期被愚弄、被奴役、被迫害、被殺戮。

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是與知識、與知識份子為敵的反動綱領；而大開殺戒，則是他上了井岡山、抓到刀把子後，直到他去見馬克思，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整人、殺人：殺 AB 團、消滅社民黨、肅托、延安整風、暴力土改、鎮壓反革命、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批判電影《武訓傳》、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肅清反革命、反右派、三面紅旗（大饑荒）、四清（社會主義教育

運動)、文革(文革中又包含許多大大小小的運動——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破“四舊”、批劉鄧反動路線、反“二月逆流”、“一月風暴”、“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吐故納新”整黨運動、清查“五.一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教育革命……),臨死還來一個“四.五天安門事件”……他一生發動的所有運動,幾乎都是針對知識份子。

這些運動中,又以反右運動最惡毒、最卑鄙、最下流,後果最嚴重、影響最惡劣、為禍最深、流毒最廣。這個災難性的運動,不僅製造了一百八十萬到三百一十萬(包括中共黨員、各階層人士在內)賤民,這個運動還讓知識份子從此禁口、使掛著“中華”、“人民”、“共和”招牌的國家政權變成徹頭徹底、徹裏徹外的“黨天下”、“家天下”,使國家的政治文化科學技術停滯不前、長期落後,人民貧窮愚昧,也使共產黨的誠信逐漸破產,使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逐漸流失。

毛澤東的接班人鄧小平,由於是反右派運動的副帥、第一號打手,雙手沾滿無辜者的鮮血,就至死不肯為右派分子平反,仍然堅持毛澤東路線,把反右派運動說成“正確的”、“必要的”的、只是“擴大化”而已。一九八九年,這個冒充“人民兒子”的獨夫民賊乾脆把坦克車開進北京城,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血洗天安門廣場事件,徹底暴露了他與人民為敵的反動立場。

江泽民疯狂镇压法轮功,胡锦涛屠杀西藏人民、残酷压迫维权人士和弱势群体……

血跡斑斑的歷史和現狀,證明了這個時代是一個毀滅文化、毀滅青年,也毀滅了未來的時代。

沈寧在《休斯頓開講民國》中說：

“再看民國的學問家教育家胡適、蔡元培、王國維、陳寅恪、梅貽琦,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葉企孫、錢學森、華羅庚,都是民國造就的人材。還有藝術家趙丹、白楊、梅蘭芳、馬連良、吳祖光、新鳳霞、紅線女、常香玉,文學家魯迅、巴金、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從文、張愛玲,美術家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鴻,總而言之,大家扳手指頭數數,從民國時期之後,六七十年過去,到今天,有哪個中國藝術家、文學家的成就,能夠超過這些人。連說相聲的都沒一個比得了侯寶林。”

“巴金、曹禺、沈從文、老舍、錢鍾書、茅盾,離開民國時期那個環境,又活了好幾十年,可是怎麼樣?”

而更多的文化人、知識精英是被摧殘、被迫害、被肉體消滅。

他們或者不願意離開中國大陸,或者從海外回去(如歐陽靜戈),結果都錯上賊船,落得個悲慘的下場。

胡思杜,胡適幼子,不願隨父親去臺灣,雖然發表過《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一九五七年還是被劃為右派分子,“畏罪上吊自殺”。

知名學者曾昭掄與妻子俞大綱,一九四九年滯留香港,拒絕蔣介石的“搶救計劃”去臺灣,而回到大陸。“貴”為教育部副部長、民盟中央常委的曾昭掄,

一九五七年給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時俞大綱教授被紅衛兵用皮帶抽打，悲憤難抑，仰藥自盡。不久，曾昭掄也被折磨死。

化學家蕭光琰，一九二零年就移居美國，一九四九年，帶着辛苦搜集、翻印和整理的大量資料，幾經波折回到大陸，結果備受歧視和迫害，文革中受日以繼夜的殘酷毆打和侮辱，自殺身亡。三天后，妻子和女兒也自殺。

董堅毅，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一九五二年回國，一九五七年被定為右派分子送夾邊溝勞教，在大饑荒中餓死，周身皮肉被難友割食一空，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之上。

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歐陽靜戈等人為什麼要自投羅網呢？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熱愛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其次，他們相信了共產黨的宣傳。例如，一九四五年《新華日報》刊登《毛澤東同志答路透社記者中國需要和平建國》：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各民主強國的合作，這裏不需要橡皮子彈。” “羅斯福總統說過：‘吾人歷史上無時不表現美國人民準備作自由人民，且為此權利而奮鬥。’現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的力量來奮鬥，才能懷著信心瞻望將來，讓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殘，而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

諸如此類的謊言，欺騙了海內外的知識份子，使他們對共產黨和共產黨的統治抱有希望和幻想。

於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像歐陽靜戈這樣幾家親戚一鍋端的“知識大戶”、“教育大家”、“工商大戶”還有很多——

華中師範學院“韋黃家庭右派分子集團”，其成員有韋卓民（華中師範學院政治系教授），韋寶鏢（華中師範學院物理系副教授）、戴琦琛（女，華中師範學院教師）、戴世琛（華中師範學院物理系教授）、黃溥（原華中大學副校長、華中師範學院教育科學教研室主任、民進市委常委）、黃寄美（華中師範學院數學系助教、民盟盟員）；其中韋卓民、韋寶鏢是父子；韋寶鏢、戴琦琛，戴世琛、黃寄美是夫婦；戴世琛、戴琦琛是兄妹；黃溥、黃寄美是父女。

成都市周家，周大焯（教育家，當過成都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成都石室中學校長）被打成右派分子，大女兒周光瑩、兩個女婿——趙一明（民盟四川省委副秘書長，劉文輝、鄧錫候、潘文華等川軍將領“起義”的策劃者之一）、楊甯祖，兒子周光壁（南開大學學生）也是右派分子，全家裏裏外外五個右派分子。當過遠征軍、打過日本的大兒子周光垣由“歷史反革命”被“升格”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關押勞改十五年。其中，趙一明自殺未遂、楊甯祖受迫害致死。

湖南楊家，楊樹達是“毛澤東的老師”，他三個兒子楊德驤、楊德豫、楊德

嘉，侄子楊伯峻，外甥女兒彭慧、外甥女婿穆木天（均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彭慧、穆木天的兒子穆路易，都被劃為右派分子；兩個女婿袁久堅、周鐵錚，是右派兼反革命分子；大兒子楊德洪是楊樹達一再寫信動員回國的，而落个“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彭慧之妹彭玲、妹夫邱陵（總統侍從室秘書）因為接受彭慧的策動，放棄飛往臺灣的機票，留在上海迎接中共。一九五五年邱陵因潘漢年案入獄，一九五八年以歷史反革命判刑，一九六零年在死於上海提籃橋監獄。一個家族起碼有十個人遭殃，加上旁支，則“不計其數”，楊家就這樣由“知識大戶”、“教育世家”變成“右派大家”、“反革命大戶”。楊樹達本人死得早，否則也一定遭殃，其子楊德嘉慨嘆：“我认为父亲去世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重慶康家，“工商大戶”，三代人中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國幹、康國雋、康國傑、康宏道，再加康心之之女婿甘培根。

江南黃家，黃炎培三個兒子黃萬里、黃大能、黃必信，兩個女兒黃路、黃素回，一個外孫王實方，加上黃炎培本身是毛澤東禦封的不戴帽的右派，他家就有六個半右派分子。

上海楊家堪稱“法律之家”，楊兆龍（國民政府最高院檢察署前代理檢察長、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其長子楊任遠、次子楊定亞、女兒楊黎明，女婿陸錦碧，一家五個人都是右派份子。

甘肅的水家，也是“知識大戶”變“右派大戶”的典型。水梓，是中共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指名讓他“放毒”，一開口就打成右派分子。長子水天同，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圖書館館長，次女水天長，蘭州西北師範學院教師，四子水天中，甘肅省文化局美術工作室，都打成右派分子。三女水天光，因是右派女兒，不斷受到歧視和打擊。文革中，被批鬥、毆打，死在河邊，自殺還是他殺，不得而知。三弟水柵，一九五七年八月留下“士可殺不可辱”的遺言離家出走，至今生死不明。這一家六人遭殃。

重慶鮮家是“民主大戶”，川軍總司令部行營參謀長鮮英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就同中共打得火熱，他那座叫“特園”的公館簡直就是“土匪窩”，民主同盟成立大會就是在這裡開的；最後把特園捐給共產黨。就這樣，中共還是把鮮英，他的子女鮮繼堅、鮮繼平，一起打成右派分子。鮮家由“民主之家”變成“右派之家”、“黨與共和國的敵人”。

張澤石一九四六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一九四七年加入共產黨，參與地下學運、農運以及國共戰爭。一九五一年，入朝鮮參戰，因部隊陷入重圍負傷被俘；在戰俘集中營領導戰俘堅持“反迫害”、“反背叛”“愛國”鬥爭；發動綁架美軍杜德准將、震驚世界的巨濟島事件；主動擔任七千多名堅持回國戰俘的總代表。但是“祖國”給他的卻是長達一年的受審和被視為“變節者”的悲慘命運，受“開除軍籍、中共黨籍和終生控制使用”的處分。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送往農村監督勞動。父親、大哥、二哥、二嫂，都是右派分子，全家受了二十多年的苦難和折磨。

這就是“愛國”的下場。

四川省鹿邑縣醫院院長、基督徒孫丕奩一九四九年放棄去美國和臺灣的機會，一九五七年卻與兒子孫寶慶（四川省鹿邑縣中學校醫、四十多歲）、孫子孫勇烈（成都水利水電勘察設計院技術員、二十一歲）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孫丕奩憤而自殺未遂。

上海第二醫學院新華醫院、內科住院醫師姚曉衡和他的哥哥姚培衡（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刑警）、弟弟姚文平（甘肅省地質局資源勘察處四零四隊隊員），三兄弟在不同的地方被打成右派分子。

美國國際新聞社記者劉乃元拒絕隨美方撤離而留在中國，還和兄弟乃隆（地質部地質出版社副總編輯）、乃中（北京電影製片廠福利科長）一起，把滯留香港的父親動員回北京，結果自己卻成了“美國特務”，失業多年後剛剛調入新華社當翻譯，三弟兄就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對於這晴天霹靂，劉父對著牆上的毛像喊道：“毛主席！你知道嗎？我的兒子都是愛國的。他們冤枉啊！”又說要到天安門去喊；不久，劉父因心臟病猝死，醫生事後診斷為心臟栓塞。

三兄弟一起蒙難的例子還有不少，如汪崗（四川省《西南工人日報》編輯部主任、中共黨員）和他的弟弟汪士誠、汪三立等等。

樓乾貴，中央歌劇院演員，右派分子；他哥哥樓乾富，天津市人民銀行，右派分子；他的弟弟樓乾裕，一九六五年“投奔祖國”，從臺灣回來，馬上就變成反革命，抓去勞改。樓乾裕先生後來移居香港，常常參加五七學社的活動，兩年前歸主，思之不勝唏噓。

就這樣，文化被毀滅、學校被毀滅、教育被毀滅、知識被毀滅、人才被毀滅。以至於，一個十三億的“人口大國”，六十年來除了有兩個“政治犯”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個標榜“不說話（莫言）”的作家得文學獎以外，科學技術方面的諾貝爾獎項，一個也沒有。

所以，當真理部吹噓著什麼“輝煌大國”、“崛起大國”時，我想到只是“吹牛大國”、“愚昧大國”、“挨打大國”、“窩囊大國”、“污染大國”，還有就是“貪污大國”、“監獄大國”、“假洋鬼子大國”……

石貝《一片冰心在玉壺——記右派父親歐陽靜戈坎坷的一生》出版了，她把被殘酷踐踏得血淋淋的知識份子的心展現在讀者面前，請問讀者諸君：古今中外有比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知識份子更悲慘、更可憐、更無奈的嗎？

希望有更多的一九五七年受難者和他們親屬、後代，知情人，都來書寫當年的歷史。

“搶救記憶，保存史料”，讓有確鑿的證據告訴後人：不要忘記共產主義運動和毛澤東一夥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巨大災難。

中共新的領導集體要學習中國國民黨的勇氣，改弦更張，徹底放棄馬列斯毛以“鬥爭、殺人”為核心的絞肉機主義，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專門委員會，揭發、清查、批判毛澤東和他一夥實行獨裁專制的反動路線和罪行，清算九十多年來、特別是執政的六十多年來的一切反文明、反進步、反人類的罪惡，中國共

產黨中央委員會要向包括反右派運動在內的一切運動的受害人道歉、請罪並做出合理的賠償；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實現全國和解、正義轉型。

二零一三年一月於流浮山寨酒香書屋



# “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 对谈录（一）

武宜三

##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2008年2月份，华东师范大学孔祥骅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学作短期交流。期间他做了一个题为《饥饿的大学——60年代的饥荒记忆》的演讲，我曾侧身末座，洗耳恭听。

孔祥骅教授，山东人，好像是孔子的72代孙。身世坎坷，大学生时代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经历20年磨难，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坚持自学，刻苦研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说，后进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专注于中华文化，特别是孔子与儒学的研究。后又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任编辑、副编审、编审，直至退休。有《孔子大辞典》、《国学入门》等著作多部。

老实说，孔教授那天的主题演讲“饥饿的大学”，并不十分精彩；因为大学、特别是上海的大学，粮食供应有一定保证，虽然也是“饥饿”，但与农村中农民的那种饥饿是有天和地的差别的。当时饿死的4千多万人（最保守估计），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在劳改场所(农场、工地或矿山)做超强度劳役、受精神迫害的右派分子及其它如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似乎还没有大学生被饿死的案例。

3年大饥荒中，我和我的大多数家人靠吃芭蕉汁、稻草纤维、野葛等侥幸活了下来；只有我的母亲无法逃过那一场人为灾难，因饿而患了水肿病，不治而亡，年仅41岁。罪魁祸首当然是毛泽东和他的一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核心分子，直接杀手却是我的两个舅父、我妈的两个亲弟弟。两个舅父当时一是小队长、一是小队会计。在那饥荒年代，他们那点权力真的使他们到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境界，多吃多占，抢男霸女。我父亲因看不惯他们行径，说了他们几句；他们就趁我父亲所豢养的生产队鸭子的死亡事故，扣了我们家的口粮。我的两个舅父成了亲手杀死他们亲姐姐的刽子手。

于是，我在孔教授讲完后的讨论提问期间，就发了如下一通谬论。

——孔教授的老祖宗孔夫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实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在饮食、男女这两个人之“大欲”上，从来都存着严重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几十年，人们既受着饮食范畴内的饥饿、也受着男女即性方面饥渴的煎熬。孔教授讲了“饮食”，算一半；另一半，“男女”，我想作个补充。

## 孔教授讲了一半，我想讲另一半

——以我本人来说，从中共搞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就开始挨饿。在3年人祸期间，我妈被饿死了；我本人至今还有着严重的饥饿后遗症：老吃不饱，别人到香港一两年，饭量就变得小了；可我直到如今仍然是个大吃鬼；还爱吃东坡肉、

肥肘子，吃多少都不影响胆固醇的水平；再次，间中肚饿时会显得全身乏力，就像马上要昏过去的样子。同时，我又是一个性饥渴者。大学毕业后充军“大三线”，那里是重工业基地，而且还处在基建阶段；所以基本上全是男劳动者，女同胞极为稀缺。少数几个从工人家属中招来的少女，都愿意嫁给汽车司机、食堂炊事员、木工、电工等。我把毛泽东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改为“□□女儿多奇志，不爱瓦工爱木工”以记其事。因为木工可以帮未来的岳父母做家俱，而瓦工则百无一用。当时被称臭老九的大学生只能在工地当瓦工，砌砖盖房子。对大学生，即使有个别女孩敢于亲近，不是给她的父母劝止，就是受政工干部甚至是支左解放军所阻吓。在资源紧缺之下，“当了三年兵，见了母猪也觉亲”的军人，也不失时机地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和大学生们争夺女孩子了。

——屡战屡败之后，退而求其次。通过介绍人，回到福建讨了一个持农业户口的老婆，那时我已经 31 岁了。因为老婆是农业户口，生的孩子也是农业户口；农民也是世袭的，而且是严格的世袭；农业户口的人没资格迁入城市。虽然我的专业是工厂所需要的，我对工厂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两地分居问题却不予解决。无奈之下，只好在 1979 年申请移居香港，那年我 35 岁。我虽然从四川来了香港，但我老婆、子女因无钱、无门路行贿，仍困在福建，被拖到 1987 年才放行。这时我已经 43 岁了。

——中共是掠夺成性的武装流氓集团，他们抢夺、霸占所有的、包括性资源在内的物质、思想、文化、生活资源。他们尽管自己骄奢淫佚、荒唐无度，但对老百姓的饮食、男女问题却绝不关心；相反，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加以摧残、破坏。

——有一部电影叫《人到中年》，是写夫妻两地分居的，但实际情况比那严重得多了。我所在的冶金建设单位，从 50 年代在东北组建后先迁中南，再战西南，直到 80 年代，工人们的家庭团聚问题，从不被当局所重视。所以，工人的家庭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问题就特别严重。通奸、强奸、鸡奸、兽奸、乱伦、同性恋，时有所闻，造成许多家庭破裂，产生出许多社会问题，使许多人遭受不应有的痛苦。

### 右派分子又是中共权贵集团掠夺性资源的牺牲品

——这几年我在收集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史料、研究反右派运动，我发觉右派分子不但是个庞大的性饥渴群体，而且他们实际上是中共权贵集团掠夺性资源的牺牲品。诸多个案显示，许多人所以成了右派分子，是因为他们有个漂亮的妻子或女朋友。过去皇帝为了垄断性资源，把许多男人阉割了。现在，从毛泽东到中共支部书记，这些新中国的大小新皇帝，把许多男人打成右派分子，在政治上加以阉割，也同样保证他们对性资源的占有和垄断。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他的正常的婚姻注定受到影响。第一，在右派帽子未摘之前，基本上是不可能结婚的，要到摘帽以后才有可能结婚，而摘帽又不及时甚至是无限期的，导致许多人过于大龄晚婚。第二，即使摘了帽的，仍谓之“摘帽右派”，实际上的政治歧视

依然存在，有歧视，就有坏名声，于是，很难有正常的婚配。第三，由于右派中的特别坎坷的经历或心灵创伤过大者，往往终身不娶，或者结了又离；这在右派群体里的比例很大。

——有一份《北京市送 853 农场右派分子名录》，489 个右派分子中只有 12 名女性，仅占 2.45%；难道中国共产党特别惜玉怜香乎？当然不是。刘宾雁曾给丁抒讲了两个故事：其一，是一位中学校长看上了本校体育教员的妻子，将那教员定为右派送去劳改，进而将其年轻貌美的妻子弄到了手；其二是一位中学教员，因偶而撞见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女人的奸情，被扣上帽子后送去劳改。这份《名录》就是新中国的大小新皇帝掠夺、垄断性资源的证据。

——《北京市送 853 农场右派分子名录》中有大名鼎鼎的吴祖光，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艳亲王、评剧皇后新凤霞非“神童作家”吴祖光不嫁，也不知得罪了多少拜倒在她裙下的老干部、老党员、老革命，新凤霞甚至于对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老婆李伯钊这样级别的“媒婆”也不稍假辞色。请问，在党天下、权天下的新中国，吴祖光不当右派，还有天理吗？当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时，有多少人劝新凤霞离婚呀！垂涎已久的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更以为水到渠成、可以乘虚而入了；但正气凛然的新凤霞，想都不想就给予回击：“他是好人，我等他。”“薛平贵从军，一去 18 载，那么我等他 28 年。”于是新凤霞也成了右派分子。

——把你打成右派分子，就是在政治上施行了阉割术，剥夺了你的恋爱权、结婚权、性交权、生育权。当年在人民大学内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林昭和同为右派分子的甘粹情投意合，她认为，我没有行动的自由，但至少还有爱的自由……但林昭错了。在中共组织的眼里，两个右派分子怎么能相爱、怎么能结婚呢？右派都不是人，怎么可能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就这样，甘粹被流放，也带走了林昭心底最后的一丝暖意。

——报人、记者、全国剧协编辑张郁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四川省“领导人”以“不能在政治上沾污共产党要培养的红人”为由，逼着其妻、川剧名演员杨淑英与之离婚。

——戴煌在 1958 年 3 月因被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出中共的第三天，其妻就要与之办理离婚手续；她看到 1959 年冬天第一批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名单中没有戴煌名字，就决心与之藕断丝也不连了。

——张僖《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和高瑛《我和艾青》，都记述了林场的几位领导“这些人总爱和高瑛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们其实是想勾搭高瑛。”这种趁火打劫、横刀夺爱的勾当，绝不在少数。

——右派分子离婚率非常高，许多人家破人亡。一个人在外面受到打压，回到家里配偶不但不给些安慰，反而在家里斗争、批判、埋怨他。没有一个避风港，所以有的自杀了，有的人只好弯腰认错。

——出于掠夺一切，中国共产党除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外，控制、扼杀、破坏老百姓特别是所谓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也是处心积虑的。

农村中的地富反坏男性后代，绝大多数不能或不许结婚。这种惨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用尽包括亲情、爱情、性生活在内的各种方式、方法来折磨你。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灭绝人性、丧尽天良。这类电影和文学作品不少，如《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男人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齐家贞也是写这个题材的高手，《右派兄弟之歌》、《映山红和小沙弥》都写得哀艳动人、回肠荡气、刻骨铭心。还有高作纯、吴越《两个右派的苦恋》、李才义《可爱的人被圈入“右”网》等。

——现在来看上海交通大学送新疆劳教的右派分子具体情况：普遍结婚比正常人晚很多，这已不言自明，70年代后期，直至1979年改正时结婚的那部分就更晚了。如杨尚正、李昌斌、王宇伦、张犀等，而教师右派中待改正摘帽之时年龄就更大了，例如教师王某某1979年结婚时年届50岁，配偶是丧偶的嫂嫂，王本人婚后未育；教师徐某某1980年结婚时已59岁，配偶是丧偶的女教师，婚后未育。终身未娶的照不完全统计有：原交大校医王谿园（已于1996年在新疆逝世），原学生傅瑞榕、宋廉、汤永良、徐华望等（至少到90年代中期还没有结婚）。原学生右派大部分在摘帽以后找的妻子是来自四川、江苏、河南、甘肃等的的农业工人或是家属（指没有工作的女性），这跟《牧马人》中主角许灵均找的妻子李芝兰的情况无异，艺术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施绍箕《上海交大反右派亲历记》）

### “齐家贞命题”：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

我读章诒和的《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后写了两首打油诗。

（一）

英雄死去佳人老，  
空有余恨泪长流；  
爱情据说无价宝，  
怎奈东风不自由。（《千家诗》：“不向东风怨未开。”）

（二）

领袖御民有奇招，  
御民更胜御牲口；  
性欲食欲全铲净，  
人性灭绝好领导。

实在是有感而发。后来，我把这事对齐家贞说了，齐家贞回答：这就是我所指的“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是的，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苦难文学作家齐家贞在她的《一个非正常活着的生命——哭三弟齐治平》中写道：“我们经常提到中共建政50多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是8千万，真实数字可能更高，这种数目惊人的生命的毁灭当然是罄竹难书的罪行。可是，我们统计过吗，非正常活着的人数又是多少呢？像齐治平这样梦断童年（12岁），像我的大弟兴国梦断少年（17岁）、像我本人梦断青年（20岁）、像我父亲齐尊周梦断壮年（37岁），和那些梦断中年、梦断老年的……他们活着，但是，非正常地活着。这类人的数字绝对是

8千万的好几倍，比8千万多好几倍的人们，理想、智能、青春、价值、人生美好的一切全部被摧毁，只吊着一口气，这种数目更加惊人的生命的浪费怎能用数字统计？非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活着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快刀屠宰，后者是钝刀子慢慢割，都是灵魂的践踏，都是生命的浪费，它杀死了上亿个中国人，不可饶恕的罪行。齐治平是非正常活着的典型，灵魂死了，肉体在忍气吞声中熬了近半个世纪。”这话以前还没有人说过，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把“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命名为“齐家贞命题”，并在几个朋友中作了介绍，朋友们当然个个都赞赏有加。

我觉得这个命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刚好家贞大姐、云飞兄都来了香港，所以约了二位来想搞个对谈，后来曾国一先生也参加了；以后也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加入，发表高见。今天我先开个头。(2008年5月29日)

## 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

——在中华公民政治讨论会上发言（2013.1.12，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主编）

大家好，很荣幸能参加这个由中华民会、达赖喇嘛基金会、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共同举办的这个中华公民政治讨论会。

自从2009年以来，不到3年时间，西藏至少发生了100起自焚事件，这里面有民族问题，但是首先是暴政问题——是中共权贵暴力集团对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剥夺和压迫，这个剥夺包括政治权利、个人财产、人身自由和安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等。（请注意：这个权贵暴力集团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表中共的广大党员，广大党员不但享受不到权贵分子特别是个别头目的特权，而且也享受不到“党章”赋予他们的“党员权利”，甚至随时成为受害者，我稍后还会谈到，敬希广大中共党员同志不要“对错号入错座”。）

中共权贵暴力集团对人民的剥夺和压迫，是不分民族、不分党派的，大家回忆一下，中共建政60多年来的历次运动中，有多少人被逼自杀——跳楼、跳江、上吊、服毒，自焚也不罕见。陈毅曾经把被三五反运动逼得纷纷跳楼的资本家、中共各级干部，嘲笑做“伞兵部队”。

北京政府和西藏于1951年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这是西藏政府在武力威胁下的城下之盟，北京政府占尽了便宜，然而，中共政权仍然撕毁自己的承诺（协议内容），肆无忌惮地对西藏人民采取各种暴行。人为地制造了1959年的所谓“西藏叛乱”事件，并且以此为口实，野蛮、残酷地镇压和屠杀西藏人民，实行种族灭绝。

言而无信，背信弃义，是中共暴力集团的一贯作风，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号召国军将士，只要放下武器，不但既往不咎，而且还要量才录用云云。结果，言犹在耳，放下武器的国军将士，就大批大批的被杀害。

1952年，被欺骗、被以国家民族名义“争取”回大陆的7,110个志愿军战俘，几乎全部都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团籍，送到农村、农场监督劳动，还有些被送去劳改，更有些被秘密杀害。在我编辑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中就有一些是志愿军战俘，最有名的就是张泽石先生，他去年刚刚到过台湾。

1949年公布的《共同纲领》和以后所制定几部《宪法》，没有一句是被遵守、被实行的，以致于《炎黄春秋》的今年元旦社论竟是《**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至高无上的《宪法》居然还不是这个国家各阶层人士的共识。

中共为香港制定的《基本法》，承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也被糟蹋的不成样子，现在的香港就是京官治港，西环治港（西环是北京政府驻香港办公室所在地），港共（地下党）治港——暴力执法、挑动群众斗群众，北京官员动辄对香港说三道四，已经司空见惯。

现在我从中共官方出版的地方志中，找一些例子，来看中共是怎样迫害西藏



人民。

先看青海省尖扎县——

这个县 1951 年总人口只有 16,704，6 月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杀了 11 个“反共救国军”；12 月发生“暴乱”，“叛匪”就有 800 余人。

杀的结果，1952 年，总人口只有 16,148，少了 556 人。5 月又发生昂拉“暴动”，被歼灭的“匪徒”有 1,595 人（其中击毙 264，俘 864，投降 864），10 月份尖扎再“暴乱”。

1958 年，总人口有 21,075，这年又发生尖扎、昂拉、当顺“暴乱”，“叛匪” 618，占人口 16.9%。

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3 月仅康杨公社就“因营养、疾病”死亡 218 人，全县人口从 1960 年的 21,589 人降到 1961 年的 17,122 人，净减少 4,467 人，总数不见了 20.69%。（《尖扎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附带说明一下，这个 1957 年人口只有 19,994 人的尖扎县，生产力、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藏族区域，也抓了 11 个右派分子，真是阎王不怕鬼瘦。

尖扎县受到迫害的头面人物有：

赤列嘉措（1896—1958），藏族，赤卡寺活佛，投共后先后任县、州政协副主席，县、省人民代表，在 1958 年武装平叛中，受到州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批判斗争，愤而自杀，1979 年被“平反”。

项谦（1904—1959），藏族，世袭千户，投共后任县长、副州长、省政协常委，在 1958 年武装平叛中，县长、副州长、省政协常委职务被撤销，另委为州政协委员，家属、子女受牵连，1959 年“病死”，1979 年被“纠正”。

雄武才郎（1885—1968），藏族，投共后任县人民政府委员、副县长，虽然支持中共“平叛”，却没有逃过恶运，“四清”运动中，受到撤销职务、戴“帽”管制的处分，1968 年“病死”，1979 年被“纠正”。

雄吾旦周（1904—1975），藏族，祖上是世袭万户，投共后历任副乡长、县政协副主席，州政协委员、常委，“四清”中受迫害，撤销职务、没收财产，子女被株连。1982 年被“平反”。

更登（1901—1976），藏族，管家，投共后任副县长、州政协副主席、省人民代表，“四清”中受迫害，撤销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1976 年“病死”，1979 年被恢复名誉。

马玉清（1908—1959），回族，阿訇，投共后任县人民政府委员、副县长，1958 年以“破坏合作化”被捕，未经审判，1959 年“病死”看守所。1980 年被“平反”。（《尖扎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年）

再看青海省贵南县——

鲁朝勒嘉（1880—1958），藏族，千户，1953 被委任为县人民政府委员、副县长，1955 年，升副州长，1958 年在参加全省牧主头人学习班，以“叛乱”罪名逮捕入狱致死。1981 年被“平反”。

巷欠（1919—1958），藏族，千户，1953 被委任为县人民政府委员、建设

科副科长、副县长，1955年，任州农牧局副局长，1958年任县长。虽然支持中共“平叛”，仍然被送去“防叛集训”而死在其中。1981年被“恢复名誉”。

洛加（1902—1958），藏族，百户，1953年后任区长、副县长。1958年被送去“防叛集训”而死在其中。1981年被“恢复名誉”。

才加（1899—1958），藏族，官人，1953年任副县长。1958年在“防叛集训”中死去。1981年被“恢复名誉”。1981年被“平反”。

尼尔仓·罗桑克珠（1910—1958），藏族，活佛，1953年任、县人民政府委员、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在“防叛集训”中死去。1981年被“恢复名誉”。

贡哇喇嘛（1888—1958），藏族，1953年开始，先后任县人民政府委员、治安委员、区长、县政协副主席，1958年以“跟叛匪逃”被捕，死在狱中。1981年被“宣告无罪”，恢复名誉。（《贵南县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

我这里仅仅举青海省尖扎、贵南两个县，这些受到迫害的、被记载的仅仅是头面人物中得到平反的，但是被杀害、被伤害更多的是没有被平反、没有资格被记载的普通的藏族人民。

这些所谓县政协主席、县长、州长，实在也太过儿戏，朝是座上“官”，晚变阶下囚。中共根本没有把藏人看做自己人，哪怕有些西藏人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贵南县1958年一下子死了6个副州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其中5个人一起死在1958年的“防叛集训”中，这个“防叛集训”班就是监狱，而且比监狱还要黑。他们搞逼供信，活活的把人折磨死，不是死一个，而是死一批，普通的老百姓肯定更多。

中共地方一小撮官员为了搞“政绩”，杀良冒功，不惜逼死副州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这些头面人物。然后又拿他们的“口供”（如果有的话）作为西藏“叛乱”的根据，再对西藏进行种族灭绝。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骑兵团有个叫胡德南的兽医，他在甘南“平叛”中，看到有些军队干部“竟然将藏族孩子两腿抓住撕裂成了两半”，他觉得“太过分了”，就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讲了出来，于是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军籍，送甘南夏河县兽医防治站劳动改造”的处分，他的哥哥胡德海（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也是右派分子。（武宜三：《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

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所谓西藏“叛乱”是中共暴力集团的高压政策激发出来的，而更多的，是中共暴力集团“制造”出来的，它必须制造“叛乱”的借口，才能对西藏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中共暴力集团“制造”的假案，罄竹难书，举其大者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胡风反革命案、章伯钧罗隆基联盟案、彭德怀里通外国案、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刘晓波颠覆国家政权案……）二，中共暴力集团的镇压“叛乱”，从1949年就开始了，而且几十年从不间断。三，中共暴力集团对待西藏人民的手段比日本人对中国人更残暴、更无耻、更下流。

在“平叛”、“防叛”和大饥荒等多重灾难的摧残，社会结构、宗教、文化、

生态环境都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人口，李江琳女士说，藏人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仅仅在所谓的“平叛”战争的6年中，藏人在战场上被杀、俘的不完全数字是34.7万多，相当于1953年藏人总人口的12.5%。

再加上“镇压反革命”、“合作化”、“宗教制度改革”、大饥荒，藏人人口更是“惊心动魄”的被减少，如甘肃省的藏人人口，1957年是255,947，1959年降至188,050，减少67,897人，1961年再降到174,581，4年间共减少81,366人，为1957年总人口的31.8%。

青海省玉树州1957年至1963年，人口从159419降至93,483人，减少了65,936人，达41.3%。

果洛州，1964年人口比1963年减少49,753，即48.9%。（李江琳《在历史的非常时刻——〈赤风呼啸〉》）

这些来自官方文件的数字，是被大大缩小的，但的确是“惊心动魄”，而数字后面更是血迹斑斑、惨绝人寰。

当然，中共暴力集团对汉人和其他民族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暴力集团甚至对自己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你看毛泽东对彭德怀、对刘少奇、对林彪，刘少奇对高岗，邓小平对高岗、对江青、对胡耀邦，江泽民对赵紫阳，薄熙来对王立军，都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所以，中国的民主是包括广大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任务，中国没有民主、宪政，包括共产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在内的每一个**没有外国护照**的而且不和外国政府以及银行相勾结的中国人，都不会有安全感。

中共中央为什么躲在戒备森严的中南海？为什么当官的出来都要前呼后拥、如临大敌？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就是怕死。在中国，不要说总书记、总理、中共省委书记、省长，就是县委书记、县长，乡镇干部，也绝不敢像西方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那样深入民间，随便在马路上和群众握手、交谈，为什么，就是怕死，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民主，已经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行之有效的摆在那里了，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西藏流亡政府也做出了卓越的榜样。

达赖喇嘛为着解决西藏问题，以及使流亡藏人逐步走向自由民主制道路，于1960年成立了西藏人民议会，1963年颁布了《未来西藏宪法精要》；1991年制定《流亡藏人宪章》及其有关法律法规，使西藏人民议会逐步成为名符其实的立法机构；2001年开始流亡政府总理直接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目前，西藏流亡政府组织已经具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监督制约，并拥有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务员选拔委员会、审计署等独立部门的完善的民主机构。

邓小平1979年说：“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实际上中共利益集团一直不敢谈，它一定要给达赖喇嘛扣个“分裂祖国”的帽子而拒绝谈判，仅仅是因为对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的恐惧——就像害怕香港的全面选举一样。

但是，中共现在危机重重，许多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真是寇深祸亟，内（亡党之心不死的贪官污吏同志）外（“亡华”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朋友）交煎。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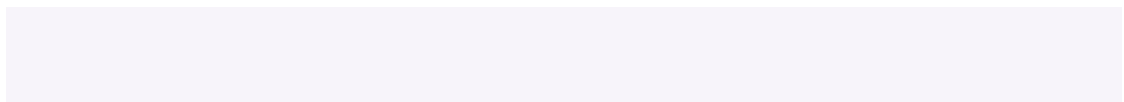
治改革、民主宪政已经无法再躲避了；如果再不赶快实行政治改革，“革命”就一定不可避免了。

是做推国家民族于苦难深渊的历史罪人，还是做民主时代开创者？习近平一班人必须当机立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几天，我的确看到了一点好苗头，1) 违宪违法、为国人深恶痛绝的劳教制度已经宣布停止执行。2) 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宣布会在3月份到北京参加两会时去看望刘晓波夫人刘霞；刘梦熊先生还敢于和中央宣传部唱反调，大声地说出——“舆论一致，祸国殃民”（《东方日报》）。刘梦熊先生是右二代，他的尊翁也是个右派分子。3) 在乌坎事件、《南方周末》事件中，官方似乎已经留意到“民心的向背”的问题。

我们必须与西藏人民共命运，支持他们的斗争，支持他们民族自治的诉求。我们应该明白，没有西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也一定不会有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汉藏蒙维回等民族真正的团结起来，守望相助，民主宪政离我们就不会太远了。



## 从反右倾思想 看中共反人民性

【导语：曾希圣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制造了几十万宗冤案，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三年人祸之中，又谋杀了至少 500 万农民；曾希圣分明是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刽子手。但是在“隆重”举行的“曾希圣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却被吹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希圣罪恶的一生成就了“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奋斗进取、开拓创新的一生。”真是颠倒黑白、无耻到了极点。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什么时候为饿死的 3,000 多万农民开一个纪念大会？什么时候也缅怀一下被迫害、被侮辱、被虐杀的超过 100 万计的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属？】

1957 年夏天，中国的知识份子又一次大难临头，在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中，许多人跌入水深火热的阳谋陷阱，正遭灭顶之灾。然而毛泽东一伙仍意犹未尽，还要激浪鼓风；唯恐水之不深、火之不烈。7 月 15 至 20 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反右倾思想、反温情主义会议”，认为“在当前，右倾思想、温情主义是比较突出的”，向各地、市委书记“传达了最近毛主席指示和中央电话会议精神”；对已进入反右派斗争的单位(分别不同类型)和尚未进行大“放”大“鸣”的单位(工厂、中学、县、区、乡、社等)分别作了研究和部署，要“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属“绝密文件”的该省《内部资料》当年第 47 期，以《安徽省各地、市委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正在走向深入》为题，通报了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精神。50 年后，有幸看到这个历史文献，对剖析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共产党人的人性以及反右派运动的罪恶，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下未注出处的引文均来自该期《内部资料》)

### 中共安徽省委和中共湖南省委，谁抓右派多

当时，安徽省反右派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并且取得了十分“伟大”的成绩。据同一期《内部资料》说，安徽省文联机关共有 50 个工作人员，除因公长期在外的 8 人和勤杂工 2 人外，实际参加运动的只有 40 人；但到 8 月为止，该处已抓了 10 名右派份子：戴岳、王影、钱锋、石青、耿龙祥、罗秋帆(以上为中共

党员)、刘俊明、吕伯涛、曹玉模(以上为共青团员)、吴文惠(白盾)。又点了“积极参与了右派反党活动”与“散布了一些严重的右派言论并亦参与了一定的反党活动,但尚不足以确定为右派份子”的吴晨茄、王思翔(张禹)、周觉钧、谢竟成、贾梦雷等 6 人的名字。

50 年后,舒影在《往事不堪回首——安徽省文联反右斗争 50 周年祭》中透露,这些“不足以确定为右派份子”的人后来还是当了右派份子。“文联反右小组把已确定为右派的 17 人名单寄给《人民日报》”,《安徽日报》在头版发了一条消息,公开点了吕岩、曹玉模、谢竟成、刘俊明等 4 人的名,说他们“是右派份子向党倡狂进攻”。这 4 人中吕岩、谢竟成,原先并未划为右派份子。这里,右派份子所占比例为百分之 42.5,超过了《新湖南报》社。

《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曾被称为“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145 人(汪澍白:《读〈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有感》),被打成右派的有 54 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比重是 37.5%。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 8 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湖南省志》说:“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是真的,因为“《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 3 倍多”。但是说《新湖南报》挖出的反党右派集团是“湖南独有、举国无双的最庞大的一个”,“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便不准确。至于“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朱正:《丁酉年纪事》)也值得研究。

安徽省文联所属的《江淮文学》一共 14 人,有 12 个人被打成右派份子,只有两人幸免;此比例更高达 83%。蚌埠市《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成了右派份子,包括组长张楔,则是全军覆没。这个记录是否“全国唯一”,仍待求证。但中国共产党和知识份子为敌的反智反人民本性,在这里已表露无遗。更可怕、可恨的是中共至今仍坚持这反动立场,毫无改弦更张的迹象。

### 恐怖气氛笼罩安徽省,笼罩全中国

当年,芜湖专区医院共 14 个干部,划了 7 个右派份子,占了百分之 50;蚌埠市财政局共 34 个干部,划了 15 个右派份子,比例为 40.7%。这两个单位虽被当作“面划得过宽”的例子,但我相信这些上了初榜的人仍逃不出当右派份子的命运;如前述的谢竟成,最后还是要戴右派帽子的。但究竟如何,希望有幸存者 and 知情人出来说明真相。以前以为“选举右派”是笑话,今天终于看到实例了;原来蚌埠市税务局就是用“群众投票”的办法“确定”谁是右派份子。共产党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自诩的“创造人间奇迹”的高手。

恐怖气氛笼罩着安徽全省。“据各地报告,截止 7 月 20 日止,共发现逃避斗争的 2 起(六安专区、芜湖市);自杀身死 1 起(蚌埠专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蚌埠铁路分局张祖英被责令“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和动机以后”投河,被指“假自杀、威胁组织”;逃跑 3 起(安庆市、淮南市、芜湖专区)”,其中安



庆市的龚兆庆(市民革主委、经省批准为斗争对象)和淮南市矿务局的张金荣,则“下落不明”。右派份子、民革安徽省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

谢泳先生对“新中国”的自杀现象作过很细致、很深入的研究,他在《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份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中指出:“50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当时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干部都习以为常,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甚至于还幸灾乐祸,推波助澜。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自杀事件更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一个高峰。谢泳指“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真是一针见血。

### 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

反右时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并不公开报导,作为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也只报极少的一部份,但已很触目惊心了:投北京大学未名湖自杀的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既未鸣放、也没反党言论,却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右派份子。云南昆明政协委员、资本家汤汝光本是反右派积极份子,不料仍“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跳河自杀。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的第一位署名人,被连续斗了3天后跳楼自杀。著名电影演员石挥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后,跳扬子江自杀。

自杀的还有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曾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江苏医学院陈少伯教授;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武汉医学院学生刘卓勋;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胡汉忭;辽宁省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姜陟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生陆立时(女)和工友施永丰等。为抗议刘宾雁、徐铸成被打成右派份子,《北京日报》戚学毅、《文汇报》梅焕藻跳楼自杀。西南农学院的右派份子李友霖表示要自杀;辽宁省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被认为“以死威胁”。

还有,清华大学陆续发生6起学生自杀事件,“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党把责任推给了它的助手)。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百分之80被斗,已有1个跳楼自杀。重庆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6人:其中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是1941年的中共党员,“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为肃反对像鸣冤;其妻(与中共)有杀父之仇”,因此全家3口自杀以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一周之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15起,其中自杀的有5人(1人得救)。

共产党各级头目对自杀者的态度也很值得注意。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投江自杀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

派斗争的进行”，于是院方“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籍，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中共山东省委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身死，《大众日报》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肃清刘建的影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毛共之贱视生命，冷酷无情，亦不自其时始；镇反时至少 50 万人自杀，中共中央的方针仍然是“不要过早纠正过度行为”。（《21 世纪》102 期 38 页）。其冷血、其狠毒，岂是“虎狼、魔鬼”之类所能比拟。

辽宁全省共发生自杀事件 19 起，已死 7 人，未遂的 12 人。值得注意的从 8 月中旬以来，自杀事件逐渐增多，在 10 多天当中即发生了 8 起。中共辽宁省委认为：自杀有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坚决反动到底的右派分子，以自杀来自绝于人民。另一种是右派分子以假自杀来威胁组织和群众。（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22）》）

### 反右运动，祸及农村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机关、企业、工厂、学校大抓右派份子之外，还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沿用土改斗地主的办法”，肆意作践农民。如吉林省，干脆把农业社员“划分为左、中、右三等，进行反右派斗争”；萧家社把伪警察、地富分子、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干活好拿轻躲重或说过落后话的社员都划为右派，列为反击对象；怀德县干部认为“落后言词就是右派言论”，划出了百分之 10 的落后分子和百分之 3 至 4 的不满分子，进行批判；白城县干部认为可以借反右宣传机会整落后社员。（新华社长春 1957 年 7 月 30 日讯）其恐怖程度并不亚于反右派，因此也发生不少自杀事件。

新华社郑州 1957 年 9 月 5 日讯，河南省信阳地区等农村有 18 人自杀，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 4 人，农民 2 人。（新华社记者在此故意用“畏罪自杀”来为中共开脱杀人罪责。）

天津市截至 1957 年 8 月底为止，已登报的 129 个的右派分子中，有 12 个自杀，已死五人，未死七人；逃跑的四人。

中共广东省委从七月下旬以来，在全省农村中，先后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以反右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全省各地普遍展开了对敌斗争，并且结合进行了粮食问题的大辩论……截至 8 月 19 日，全省各地斗争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各种坏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共达 16,323 人。其中，已逮捕法办的 2,083 人，重新带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帽子的 1,171 人，管制起来的 135 人。斗争非常的残酷，据惠来县统计，斗争对象中有 33%被打。有些地方还有非法拘留、带高帽子游街等现象。以致发生逃跑、自杀事件，据海南、韶关、高要三个专区的统计，自杀的 45 人，逃跑的 90 人。（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19）》）

江苏省吴县 6 天发生 3 起自杀事件，皆因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其中有富裕中农朱凤岐甚至跑到副社长朱相文家上吊死亡，以示抗议；泗阳县搞所谓“社会主义大辩论”，对农民采取罚站、罚跪、绳绑、打骂、关押、

抹屎吃、向脸上乱泼乱泼屎干粪等，以致有人逃亡，生死不明。泗阳县城厢乡把辩论会会场变成了公堂，十个合作社斗了五十六个人，其中二十九个人被绑、被打、罚跪，十五个人脸上被抹上了大粪。被斗对象除了百分之六十是地富以外，其余贫农、中农各有百分之二十。新沂县有两个社给十二个地富胸前挂上牌子，上面写某某社某某生产队地主某某、右派分子。该县因乱打乱斗，有两个地主自杀，一个富农出身的撤职社干失踪。这样搞的结果，群众不同情，影响了斗争的深入发展，并错打了自己人，搞乱了阵营。

山东省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继在乡、社全面展开。个别地区也出现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污辱人格等，因此造成自杀的严重事件。截止九月三日的统计，共已发生自杀事件 57 起（内未遂者 9 起），其中莱阳专区三十九起（内未遂者九起），聊城专区八起，菏泽专区三起，惠民专区五起，昌潍专区二起。另外，对于群众揭发出来的罪大恶极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未能采取措施，以至有的畏罪自杀或外逃。（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23）》）

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 12 天内有 11 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 2 人，汉民 9 人，地主 1 人，上中农 8 人，下中农 1 人，贫农 1 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但死了就死了，死者既无须可怜，更不用赔偿；作恶者也没有责任，更不受惩罚。

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据不完全统计，53 个县发生打人事件 105 起，死 95 人。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顽伪人员”外，富裕中农 4 人，中、贫农 19 人，军属 2 人，村、社干部 3 人。由于被斗争、打、拉等，感到无路可走。其他各省也不例外，不胜枚举。

可见反右运动，不仅知识份子倒霉，也祸及农村。实际上，从中共高级干部、解放军官兵，到小学教师、商店职员、工厂工人、乡下农民，各阶层、各群体，都被殃及。

毛泽东及其一伙正是以这种镇压一切反对者、异议者或假想和潜在的反对者、异议者，而制造人民对暴力的恐惧，达到他们维持、巩固独裁统治的目的。所以，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运动“急躁情绪也开始露头”、“面划得过宽”、自杀、逃跑事件频频发生的时候，仍然大反“右倾思想”，大反“温情主义”。

中共安徽省委怎样反“右倾思想、温情主义”？

“一、思想麻痹，认为本单位没有右派份子。六安地直机关部份同志包括少

数单位负责同志认为党外有右派，党内没有；一般干部中有，负责干部中没有。有些单位的中间分子对右派份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认为仅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对揭发右派份子的一些事实材料，有怀疑。”声称奉行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这样可怕地相信唯心主义：不但每个单位都有右派份子，而且还有一定的比例；不但“一般干部中有”，“负责干部中”也要有；否则就是温情。只要是“右派份子”，不管真右假右，其言论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管真反假反，就是“政治问题”，只要“揭发”就是“事实”，便不许“怀疑”；否则就是右倾。所以，20多年后，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百分之99.99要“纠正”的，实际上是百分之百冤案的100多万右派份子，就是如此逼出来的。

“二、怕搞错要纠偏。安庆市西市区区委书记钱福祥说：‘不要搞得过紧，三反、肃反都是这样，搞出问题又要纠正。’”不怕“搞出问题”，又不怕“纠正”，更可以免却温情、右倾的危险；那么，还有不大开杀戒的道理吗？（这位钱福祥先生应该是党内右派份子了，你看他“攻击”了伟大的三反、肃反运动。钱福祥先生是否还健在呢？我很想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

“三、畏难情绪。芜湖市公安局领导上怕力量不足，驳不倒右派份子，迟迟不敢交锋。合肥市有的单位斗了三四个回合斗不下来就束手无策；房产局的负责同志说：‘我们实在办法不多，请领导上说明我们想办法。’”天可怜见，当“驳不倒”、斗争“办法不多”被我党判为温情、右倾之后，中国人民的战斗力和创造性便达到空前的水准。驳，是文斗；既然文斗不行，就只好武斗，采用暴力；文斗说服不了你，就用武力来压服你。于是乎，喊口号、辱骂、罚站、罚跪、弯腰、关押、殴打、吊、绑、车轮战，直至肉体消灭。这套“逼、供、信”办法从江西苏区肃反、延安整风抢救用起，中经三五反、肃反、反右，从未间断，且应用裕如、花样翻新，到文革而登峰造极。这都是伟大的党和领袖耳提面命、不断督促的结果。

### **毫无人性的共产党，不打自招**

“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出乱子。芜湖市粮食局领导同志强调和风细雨，不要扣帽子。合肥市人民银行领导小组组长见群众画了很多反右派斗争的漫画，顾虑右派份子受不了。”如果有人说共产党残暴、毫无人性，不讲道理、乱扣帽子，在党内外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定被指为是敌对分子，是反共反华势力的反动宣传；然而，人们却从“保密”的共产党内部文件看到：“和风细雨，不要扣帽子”是属于温情和右倾，归入被批判、被打倒之列。算是不打自招。

“五、对搞深搞透的精神认识不足。有的只注意批判已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不注意深入揭发更多活动事实。合肥市有些单位当右派份子开始低头时，即认为差不多了，想草率收兵；有的单位认为经过一般的批判，只要右派份子低头就行，搞久了会影响业务。”共产党是以整人为乐、以杀人为乐；岂能以“批判已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右派份子开始低头”为满足。所以它预先设定了你有“更多活动事实”，正像镇反、三五反按比例抓人、杀人一样，早已“胸有成竹”。

“六、有些中间分子对右派份子不义愤、不积极斗争。蚌埠地直机关少数单

位的某些中间分子借口工作忙，不参加辩论会；有些人在小组会上不发言、不表示态度；粮食局有一党员科长不愿意整理本科右派份子的材料，怕影响关系，以后不好工作。”这一段话很有意思，证实了胡适先生的话，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通同作恶，当“不义愤、不积极斗争”都成了罪过的时候，叫做“革命”的这部杀人机器便开始疯狂转动了。其结果，包括这部杀人机器操纵者在内的任何人，都有被这机器绞进去的危险了。

### 李世农反党集团案

果然，1958年1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开除右派份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定》，这就是大反右倾、大批温情的结果，是反右运动的“深入”的伟大成就了。李世农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杨效椿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省检察长，李锐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也是这个“反党集团”成员。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革别人命的革命家，是手上染了别人鲜血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次也被绞进杀人机器，被打成右派份子、反党集团成员，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了。

1959年，曾希圣在庐山会议上逢君之恶，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回安徽后又继续“反右”，斗倒了张恺帆。张恺帆时为安徽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因纠正浮夸风，下令解散无为县公共食堂，被曾希圣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撤销副省长等职务。安徽的干部，都摄于曾希圣的威风，噤若寒蝉，连省长黄岩在他面前也是唯唯喏喏。1960年，曾希圣又兼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居“柯老”（[毛泽东](#)的好学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之后；再兼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俨然两省总督；真是圣眷日隆，势焰薰天。曾希圣不可一世、胡作非为的结果是，使安徽省饿死的人数在全国处领先地位。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回乡探亲时，听他的学界政界朋友估计，饿死者盖在200万与600万之间。身受其害的茆家升先生说是500万。

再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安徽省历史上，任期最长、权威最高、贡献最大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将军政要网》）曾希圣，也在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位置上也遭冲击。（遭了些少报应？）1968年死亡。

值得一书的是，2004年，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隆重举行曾希圣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为这位大抓右派和右倾分子的左王、大跃进的吹牛大王、致数百万人饿死的刽子手大唱颂歌，评功摆好，什么“共同追忆曾希圣同志革命战斗的一生”啦，什么“深切缅怀曾希圣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德”啦，什么“号召全省人民大力弘扬革命前辈的崇高精神”啦，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什么时候曾为饿死的3,000多万农民开一个纪念大会？什么时候缅怀一下被迫害、被侮辱、被虐杀的超过100万的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属？

安徽人民的罪人曾希圣在安徽省抓右派也是有其独创性的，他在毛泽东的“六条标准”以外又加了两条：反对他强制推行的所谓农业“三改”和反对本单

位领导的，都是右派。更卑鄙的是他在 1958 年教师暑期学习班中用考“是非题”的办法抓右派，凡是认为“党天下”是对的而画了“+”号的，都成了“储安平的应声虫”，定为右派份子。仅在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就囚禁了近 1,500 名右派份子。这些人除了中小学教师外，基本上就是各基层单位的办事员、小职员、业务员、营业员、保管员、送货员，甚至有扛大包的苦力。(茆家升：《卷地风来》)丧尽天良，一至于此。

### 中共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杀人凶手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发表“重要讲话”，把曾希圣吹捧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强调“曾希圣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奋斗进取、开拓创新的一生。”“不仅要缅怀他”、“敬仰他”，还要继承他的遗志。

王太华的讲话露出了中共“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马脚，这说明中共整人、杀人的本性没有变、也不会变，他们一定会把整人、杀人的事业进行到底，把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立党为贪污、立党与民为敌，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事业进行到底。

这或许就是重温中共安徽省委“反右倾思想、反温情主义会议”这个历史事件，重温《安徽省各地、市委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正在走向深入》这个历史文献的价值所在。

### 反右倾思想、反温情主义的源头是毛泽东

当然，“反右倾思想、反温情主义”并不是安徽省的独创。《人民日报》早在 7 月 8 日的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中就下了追杀令：“有一部份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们，对于反对右派的斗争还在将信将疑，还在抱着观望态度。他们在心里盘算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一些人甚至以为：这是不是共产党受不了批评，不想再整风，因而转移了目标呢？”“对于右派份子的温情主义……竭力原谅右派份子，把右派份子描写为中间分子，把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描写成为偶然的疏忽、修辞上的夸张、被人利用等等，不愿意同他们分清界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7 月 6 日江苏省《新华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摘要转载。7 月 7 日是卢沟桥事变 20 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写诗纪念。其中第二首是：

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哪许一丝丝！

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么魔倒大旗。

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

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



把右派份子当成入侵的日寇，当然“一丝丝温情主义”都容不得了。到了9月份，《人民日报》还在呼吁克服温情主义，反右派斗争颇为起劲的史良，在9月13日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基层还有不少右派份子没有被揪出来。有些人说，别的地方有右派，我们的单位中间不会有右派，用不着进行斗争。这种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击右派的面太广，时间拖得太久，主张草率收兵。”她号召：“必须认识，对右派份子姑息宽容。对斗争采取旁观或保留态度，就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必须克服右倾思想，克服一切温情主义，积极地勇敢地投到战斗中去”。（《人民日报》9月16日）

《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批判温情主义，甚至出动郭沫若、史良这些名人，或作诗，或呼吁，清楚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除右务尽，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到底的祸心。（首发《观察》）

## 这是一本“变天账”——为王誉虎《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出版而作

我在见到誉虎先生之前，就已经“认识”他的尊翁王药雨、两个哥哥王唯和王古白，以及差一点成了他泰山大人的杜镇远。因为收集和研究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史料的关系，这 4 个跌入毛泽东“阳谋”陷阱的右派分子，早在我正编写的《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中了。所以，我和誉虎先生也就“一见如故”。

誉虎先生的回忆录《一个企业主的 6.4 情结》要在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我当然很乐意。由于誉虎先生介入 1989 年天安门爱国民主运动，被清算，名字上过《北京日报》和几张国家级大报；在军事博物馆搞的《平暴展览》中，他借给学生用的轿车、打印机、复印机、无线电话和电脑，都写着“四通公司王誉虎”，而且还上了电视，所以他也是“名闻天下”的名人了。为“名人”出书，还有不愿意的吗？

这样的“名人”——因为被清算、被迫害、被批判、被坐牢，甚至被镇压、被杀害而“名闻天下”的，只有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下，才能被制造出来；也算是新中国的特产吧。

本来，王誉虎完全有潜质、有条件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人。例如：

他可以继承他父亲的衣钵，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一代名医。

他从小就热爱俄苏文学，熟读《战争与和平》、《苦难的历程》和《静静的顿河》等巨著，可以成为名作家、名教授。

他对哲学有深入的研究，敢于把批判矛头对着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指出两“论”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度，他有可能成为哲学家或者思想家。

王誉虎有做买卖的天赋，下海经商可谓得心应手，很快由“万元户”、“十万元户”进入“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行列；结果却因为天安门枪声，打破了改革的希望，使他的事业受到重大打击。

其实，即使在最艰苦的北大荒从事农业劳动，王誉虎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身强力壮、聪明过人，又怀抱远大理想，吃得苦、耐的劳，不怕累、不怕严寒，所以表现优异，很快被评为“五好职工”。可是，在新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的法西斯国家里，是容不下有理想、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五好职工”很快成了反革命，恋爱、结婚的权利都被剥夺，“妻被离，子被散”，终于被迫走上反抗的

道路。

中国共产党从井冈山到中南海，从始皇帝以降，几十年的伟大宏图，就是打倒过去，消灭文化、残害青年，断送未来。王誉虎一家的苦难遭遇、悲欢离合，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和毛泽东仇视知识、消灭文化、消灭知识分子的愚民政策，摧毁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王誉虎作为黑五类（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地富，简称“地富反坏右”）子弟，首先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连续两年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

“统治无知百姓易，领导知识分子难。”（马沛文：《鱼雁集》）中共和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关闭了全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最后让青年学生通通上山下乡，就是为了造就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自由也没有温饱，但却非常温顺的亿万农奴。王誉虎也和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被长期地、“自动”地在农村从事最简单、最原始的农业劳动；所以，他还是“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的受害者。

历代开国帝王例如朱元璋，都是在登上金銮殿、屁股坐稳了后，才开始屠杀知识分子。然而，把中国帝王术和外国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相结合，把独裁专制制度发扬到了光辉顶点的毛泽东，自落草为寇伊始，就在自己的阵营中大开杀戒。从江西苏区的杀“AB团”开始，到延安整风，再到篡政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铲除文化、铲除知识、铲除民主和科学，对知识分子实行阶级绝灭为目的：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无声的”黑社会团伙，把中国变成“无声的”大监狱。

秉承毛遗志的中共当局，至今仍不肯增加教育经费，仍在继续制造大量的文盲，仍在实行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拘押不肯同他们“保持高度一致”的意见人士。继续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继续迫害《零八宪章》的联署人，把有毒奶粉受害者关进监狱，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共一小撮权贵集团，在反文化、反文明、反人性方面，和他们的前辈并无两样。

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批判胡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肃清反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以后，接着就是更可耻、更阴险、更毒辣、更大规模的焚书坑儒——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这次运动预设陷阱，诱人犯“罪”：先是作虚怀若谷状，征求你的意见，还信誓旦旦作“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许诺；甚至以“不给共产党提意见，就是不热爱

共产党，就是和（共产）党离心离德”相要挟，一直逼到你说话为止。可是，你一开口，就是蓄意“向（共产）党进攻”了，于是立即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王家三父子就这样同时被推入陷阱，知识大户被变成右派大户，书香门第被变成罪恶之家。

这样的右派大户，著名的就有：

长沙市杨家，当过毛泽东老师的杨树达，他的6个儿子中有3个（杨德骧、杨德豫、杨德嘉）被打成右派分子，1个（杨德洪）“特嫌”（特务嫌疑）；两个女婿（袁久坚、周铁铮）是右派兼反革命分子。如果把旁系算在内（如侄儿杨伯峻，外甥女彭慧、外甥女婿穆木天等等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则家中的“阶级敌人”就数不清了。

兰州市的水家，教育家水梓和3个子女（水天同、水天长、水天中）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三弟水柵，当过兰州市社会财产管理委员会主任，1957年留下“士可杀不可辱”的遗言离家出走，生死不明。三女水天光，中学教师，因是右派分子女儿和妹妹，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重庆市康家，一家三代包括康心如和亲属共有6人（侄康国干、康国隼、康国杰，孙康宏道，侄女婿甘培根）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从抗战起就同情、资助过共产党，是周恩来的“老朋友”。

重庆市鲜家，鲜英和1子（鲜继坚）1女（鲜继平）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鲜英在抗战时就献出私宅“特园”作为中共进行统战和民盟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特园被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

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史讲师王尊一，于再三动员下，勉为其难的在《陕西日报》发表《向毛主席的呼吁》，即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两个儿子王怀祖、王忆祖（常流），妻弟常树清等，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还有江南望族黄家，黄炎培有3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即张全平、黄素回），1个女婿陈铨（黄素回之夫），一个外孙（王实方）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黄炎培本人则是毛泽东心目中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一门8右派，是目前已经知道的最高纪录。1945年7月，黄炎培和傅斯年、章伯钧等6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延安，掉进毛泽东的“民主”圈套，甘心情愿做中共的“尾巴”，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改变了他和他一家人的命运。

其他不知名的还有许多。例如：

湖南省衡阳市第二中学老师何伦，与三弟何侯、满弟何仰一起打成“三合堂”堂主、右派分子。

呜呼！仰望曾经漫天星光的夜空，名医王药雨、铁路专家杜镇远、文史大家杨树达、教育家水梓、银行家康心如、水利专家黄万里……随着红太阳的煎炙烧烤，早已惨然逝去。如今划过夜空的只有叫人眼花缭乱的扫帚星：政治骗子、窃国大盗、经济诈骗犯、学术小偷、江湖郎中。

王誉虎的《一个企业主的 6.4 情结》，实在就是一本“变天账”。它记下了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怎样打倒过去，消灭文化、以民为敌，断送未来的伟大功业；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土地辽阔、山河美丽、物产丰富、有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竟然会变成一个缺德大国、骗子大国、冤案大国、贪污大国、用八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的科学技术穷国、领海领土被人随意掠夺船员侨民被人随便侮辱杀害的窝囊国、把农民工血汗钱送给美国人花的冤大头国。

我们会努力大量出版这一类“变天账”，让子子孙孙记住共产法西斯主义、一党专政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2010 年圣诞之夜，写于金鳌岛避秦山庄  
(《纵览中国》首发)

## 性欲食欲全铲净，人性灭绝好领导——跋张淑芬老师《他们没有青春》

读张淑芬老师《他们没有青春》，第一个感觉就是，“没有青春”的岂止是“他们”，因为除了“他们没有青春”之外，你们也没有青春，我们也没有青春。“没有青春”的，不仅仅是“他们”右派群体。而是60年以来，“新中国”几代人通通没有青春。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监狱”里，从监狱长到到狱卒，从狱头牢霸到一般囚犯，几乎没有一个人有什么“青春”，几乎所有的人，不是非正常的死去，就是在非正常的活着。

以我家为例，我父亲年轻时，也是个热心“革命”的人，1947年就加入中共，成了游击队队员，对已经摇摇欲倒的民国政府，落井下石，踹了一脚，一个开始实行宪政的政府反而被赶跑了；然则，胜利之日，革命者又得到什么报酬呢？

后来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就有16字锦囊妙计在等着这帮地方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于是乎有些人，例如中共南京地下市书记陈修良，一个能干的红色女特工，解放军一进城，就被“安排”为市委组织部部长，连降3级；不久又“淘汰”到浙江省当代理宣传部长，最后在反右运动中，与丈夫、浙江省长沙文汉双双沦为右派分子——“消化”完毕。再有些人在土改、镇压反革命中与国民党残渣余孽、地主、恶霸一起被杀关管了。一次“杀”不完，再来第二、第三次……三反五反、肃反、内部审干，我父亲就是在三反中“遭”了，成了贪污分子被关进牢里，不久说是冤枉了他，把我祖父求爷爷告奶奶借了送去的“退陪”又原封不动的退给我父亲。当然，许多人可没有我父亲这么“幸运”。

这一次过关了，还有下一次。1957年，终于也被淘汰。我父亲和他城市工作部的战友都被打成“投机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在斗争、批判后，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在我父亲离开后不久，他的顶头上司、名字叫郑勇的副县长就吞枪自杀。

父亲的被“淘汰”，直接的影响就是全家陷入政治和经济的困境，我母亲在大饥荒中饿病而死，我因为“黑五类”子女，进不了好大学；我的弟弟妹妹干脆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他们既不能靠当农民吃饭，也没有本事到城市工作，成了一代没有文化的穷人。我的父母、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就是属于被剥夺了青春的群体。

前两年在读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时，写了一首打油诗：



领袖御民有奇招，御民更胜御牲口；  
性慾食慾全铲净，人性灭绝好领导。

牲口，为了让它们干活，还是要餵饱它们；牲口，除了个别需要阉割之外，它们的性生活并没有被限制、被剥夺。

可是，做为“新中国”的人，他（她）们的“大慾”——“饮食”（食慾）、“男女”（性慾）却被剥夺殆尽。“新中国”的人，比牲口更不如的是，他们可以随时随意被宰杀。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死在无产阶级专政屠刀下的共产党人和其他中国人，粗略估计接近 1 亿人，仅仅一场十年浩劫，共产党自己就承认死了 2,000 万，3 年大饥荒，饿死农民 3,600—6,000 万。

《他们没有青春》的主角戴真才 17 岁呀，就被丧尽天良的毛泽东一伙打成右派分子，从此成了贱民（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青少年——他们是大学生、中专生，甚至中学生，年轻干部、教师、军人，是数以十万计的）；她的爸爸也是右派分子（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姐妹，一家连坐的比比皆是），真是雪上加霜。

一个人一旦沦为右派分子，他（她）就永远跌入黑暗地狱，他（她）的一切权利包括生存权、性爱权，都被剥夺。许多右派分子在被送到沙漠地带、严寒地带、深山密林、落后山区、贫困农村去劳动改造的同时，已经结婚或者有异性朋友的，就千方百计的强迫或者引诱他（她）们的配偶、对象与之划清界线。这在精神虐待、人格侮辱、超强度劳役、长期饥饿的情况下，再施加格外的伤害，于是就造成大面积的死亡。

关押了 3 千多人的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到农场撤销的 1960 年，只有 200 多人存活下来，死亡率达 90% 以上。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 名右派、犯人饿死 1,000 人，没有饿死的 200 人中的 198 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顾雪雍（1957 年的辽宁省《旅大日报》文教部主任）后来证实，锦西煤矿这 1,200 个劳改犯，结果全部饿死。顾雪雍就是在这 1,200 人快死光的 1959 年被补充去的劳动力。全中国绝对不止一个锦西煤矿，共产党就是这样对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进行群体灭绝。

1957 受难者施绍箕先生在《上海交大反右派史料拾零》中，对未婚右派的婚姻问题做过研究。

第一，在右派帽子未摘之前，基本上是不可能结婚的，即要到摘帽以后才可能结

婚，而摘帽又不及时甚至是无限期的，导致许多人过于大龄晚婚。第二，即使摘了帽的，仍谓“摘帽右派”，实际上的政治歧视依然存在，有歧视，就有坏名声，于是，很难有正常的婚配。第三，由于右派中的特别坎坷的经历或心灵创伤过大者，往往终身不娶，这在右派群体里的比例较大。一般年届 50 岁，有的已经 59 岁，大部分在新疆的摘帽右派，找的妻子是来自四川、江苏、河南、甘肃等的农业工人或是家属（指没有工作的女性），这跟《牧马人》中主角许灵均找李芝兰的情况无异。有的女方年龄偏大已经不能生育，便“断子绝孙”了。

第二，从我接触流落到香港的 10 个右派分子看，还有夫妻名义的 4 人，其中 2 人的妻子由于长期的受苦受难受刺激，已经痴呆；一人与妻子长期两地分居。其余 5 人离异或者分居，1 人丧偶。不幸啊，“没有青春”的右派群体。

而“黑五类”的其余四类——地富反坏，婚姻状况，也大致如此。

被当作阶级敌人的“黑五类”固然倒霉，那么，作为专政主体的工农兵是不是就幸福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例如，50 年代，从东部调了一大批工人、技术人员支援中西部，一去就没有人理他们的死活了，在骗人“个人服从国家”的口号下，这些人只好长期地过着痛苦的两地分居的生活。

现在，进城的农民工，同样悲惨。自己到城市做苦工脏活累活，把妻子或者丈夫以及孩子长期留在农村，在他（她）们被迫牺牲青春的同时，许多社会问题就随着产生了。

中共专政 60 多年，为什么还不能解决老百姓的“饮食”、“男女”问题呢？我想起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还要继续外调粮食，省委书记廖志高解释说，省委已经向中央反映了，如果多调 1 亿斤粮食，会饿死多少人，“但是中央还是要调。”（东夫：《农民万岁》）

原来，老百姓饿死事小，保住权力事大。共产党为了能够永远爬在人民头上，永远为人民币服务，只有让老百姓永远贫穷，永远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没有性慾、没有求知欲，他们的政权才能永远保住。

所以，“他们没有青春”，将是中国人的永远宿命。是为跋。

2010 年 9 月 8 日于流浮山寨（《纵览中国》首发）

纪念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发表 50 周年

—— 兼评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

【夹边沟农场后来的张场长对王志说，“说句老实话，是死人救活了你们”。我想，能不能让这些死难的英魂唤醒我麻木的国民，让他们清楚只有还政于民，给予人民选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明天！】

### 中共的“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在 1958 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个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消灭知识分子”公开发表 50 年了。

“消灭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坚定不移的一条总路线，是一切战略、战术和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条总路线，一部中共党历史、一部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成了一盆浆糊。此所谓“纲不举、目不张”也。例如，川震中豆腐渣工程、大头娃娃奶粉、三聚氰胺奶粉、上学难、少儿失学率高扬、教育投入少且被贪污挪用、教育奴工（即被我的朋友刘飞跃揪住不放的代课教师问题）……这一切你怎么解释？当然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有了这条总路线，就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必须“从娃娃抓起”；消灭知识分子，就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之中”。

各位如不信，可看看流泪总理温家宝最近的表演，他说他对被迫过早曝光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感到不安”---他不是道歉，他也不会道歉！让日本人道歉叫“难”，让共产党道歉，叫“不可能”---因为全中国的娃娃还没有都“结石”，他老人家当然是寝食“不安”：所以他这回没有流泪了。

也许有好心人要批评我偏激了：不悛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共产党。但我只想问一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干的哪一件事不是伤天害理、不是断子绝孙呢？

### “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总路线

谢泳先生非常尊崇陈寅恪的新史料学。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的出土，将有特殊的意义。一、承先后后，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连贯性；二、是一把钥匙，可以解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可以解释许多人盘桓心中几十年的疑问，让他们死而瞑目。

这史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发掘出来的：云大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消息曾被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父亲说：“知识分子是改造的问题，不是消灭的问题，这简直是借寇兵资盗粮！”（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

云大，即云南大学。父亲，即李岫的父亲李广田，时为云南大学校长。这位仅仅对“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表示一下异议的诗人、作家、教育家，不久就被他的党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消灭——沉尸昆明莲花池了。在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的50年后，我也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它为我解决了右派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中共内部是否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条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的“革命路线”或“反革命路线”？中共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样丧心病狂？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穷一生而未毕的功业。他的这个宏圖大志，大约在1925年就定下来了。毛泽东在那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2月、《中国农民》2月、《中国青年》3月）就断言：“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引者注）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为“中产阶级”：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数学不及格的毛泽东居然会算出：全国4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100万人，“中产阶级”400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100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400万。让这400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500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毛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但他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修改稿”）中却把关于“高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种种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并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们分为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份——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份——左翼，欢迎（革命）。”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确是由来以久。

“修改稿”中虽然将这些可怕的文字删除，但删除的原因却非悔悟，而是出于掩盖和欺骗，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从来没有改变。（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以下仍有多次引用和转述，不再注。）

敌视知识分子方针早已定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在掌握权力、抓住刀把子，在井冈山，成为“朱毛赤匪”首领之后，才开始对知识分子举起屠刀、大开杀戒。

1928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需上级批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接着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李文林等数万人被肉体消灭；其中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杀光。1931年，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上“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达6,352人。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农村小知识分子）是“AB团”，胡耀邦本身因是读过初中的“小知识分子”，也被认定为“AB团”，险遭杀害；（陈利明：《胡耀邦传》）险遭杀害的还有陈毅、谭启龙、张爱萍等中共名人。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王实味被逮捕后，毛即把矛头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通过批斗、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大量“特务”。1943年，毛泽东在全校只有2,500人的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他认为，行政学院里“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李锐：《毛泽东的早年

与晚年》)象李锐这样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都成了当然的特务而遭到关押、整肃。中共甚至把一二九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不少地方把参加1.29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百分99点几都被抢救过，只有两个人幸免。(蒋南翔：《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不少人因此被消灭了。

## 连绵不绝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

从窃取全国政权后到寿终正寝，毛泽东所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荦荦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镇反”)、1951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清反革命(“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拔白旗”运动，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即发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6年又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

土改和镇反，把地主、富农等农村中的精英分子以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民国时代党政团军教人员消灭了几十万。胡风本是中共的“党外进步作家”，只因文艺观点与毛泽东相左，也在消灭之列。毛泽东毫无根据地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全国涉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者共2,100人，逮捕92人，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整死了多少，更不得而知。

反胡风运动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肃反。许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或被“揭发”出“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消灭对象，被冤杀或关进监牢。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打自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抗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同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

##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这个丧尽天良的政治流氓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请相邀，结果一二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之”了。

这一二百万右派分子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份还被杀害。从此中国人便没有了人性、个性、公信、诚信；中国也从此进入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交织的时代。如今，无官不贪，腐败横行，坑蒙拐骗，豆腐渣工程压死学生，毒牛奶祸害婴儿，其原因就出在毛泽东这个无仁无义、无信无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头子身上。

毛泽东趁反右运动余威，开始编造“大跃进”、“人民公社”神话，指使吴芝圃、李井泉、柯庆施等人伪造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卫星田”；四川省郫县还吹出824,525斤的牛皮。然后再按“产量”征购，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农民的粮食统统搜光、刮光，竟至颗粒不剩，才肯罢休；以达到对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屠杀。

毛泽东用饥饿的办法，从1959—1961的三年间，基本上不费一枪一弹就消灭了3,600万农民和在各地各种劳改场所（农场、工厂、矿山）服苦役的右派分子等被共产党所认为的敌对分子。然而毛泽东这个屠夫，却把一手造成的大灾难归咎为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事实上，这3年中国的气候基本正常，苏联并无逼债相反还且给予一定援助。

###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记录**

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旭副教授花了10年时间调查、采访，于1994年写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劳改基金会出版，香港田园书屋发行），蹉跎十多年后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人类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的一段历史的记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的罪证。本人仅向各位读者、各位朋友大力推荐：请看看《夹边沟惨案访谈录》，看看中国共产党怎样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看看中国共产党怎样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名义大面积地屠杀中国人民和它的知识分子。

对于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有和风鸣、杨显惠等人写过，赵旭也在他的小说《风雪夹边沟》反映过；可是，他还想有一个由夹边沟幸存者自己谈、自己回忆的，比较全面、客观、准确、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的文本。赵旭将1985年起采访的记录整理、补充而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夹边沟仅仅是中共屠杀反右分子的一

个屠场，全中国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

当然，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夹边沟农场、415 劳教筑路支队、峨边沙坪农场、白茅岭农场、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场、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兴凯湖农场、白城子农场、北京清河农场、茶淀农场等相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杀人魔窟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枪杀之外，许多人是在受尽打骂、凌辱、捆绑、吊打、关禁闭之中，在饥饿、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断地死去。

夹边沟农场关押的 3 千多人，最后按幸存者、甘肃农业大学孙枢统计，死了差不多 2,900 人，活着出来的不到 300 人，有的说只有 200 多人；死亡率大约 90%。1960 年 9 月转入明水滩农场的 2 千多人，到北京检查团来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时，只剩下 200 多人；死亡高达 90%。张掖专署共送 360 人到夹边沟农，只 80 人活着回来，死亡率为 75%。天水地区共划了 1,146 个右派分子，遣送夹边沟劳教的共计 238 人，生还 22 人，死亡率为 90.75%。

明水滩地处河西走廊，冬季气温只有零下 20--30℃，加上每人每月实际只有原粮 12 斤即每天吃不到 4 两原粮，大批劳教人员被活活饿死、冻死，除了用“谋杀”两个字之外，还有什么词汇合适？

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讲：“30 年代的饥荒是反人类罪，是有凶手的，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还没有找到任何罪犯……人们可能找到谋杀一个人的凶手，但是对于数百万人受害的事件，却没有人负责。这也许就是乌克兰今天难以恢复法制、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原因。”（《参考消息》2005 年 11 月 28 日）对此，赵旭指出：中国活活饿死几千万的三年人祸、灭绝人性的反右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人去追究责任，而且不让说、不让写。然而，赵旭顶着各种压力写了。只是写了以后没有地方出版，被拖了十年后，才在海外付梓。

### “消灭知识分子”宏伟计划如何被认真执行？

幸存者高学武回忆说：由夹边沟迁到明水有 2000 多人，在既无房舍又无粮食饥寒交迫的环境中，劳教人员在冰天雪地里延缓生命。他们从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因为遥遥无期的劳教，在饥饿、疾病、苦役下，逐步失望、悲观、堕落。那个时候，夹边沟的劳教犯人们衣衫破烂，五颜六色地套在一起，虚肿的脸上眼睛眯起一道逢来，头高高的扬起。看起来人非人，鬼非鬼，战士非战士，干部非干部，农工非农工，这是一群什么样的行尸走肉。1960 年 11 月份，每天死亡十多

人，到了12月份连降大雪，天寒地冻，人们每天吃不到4两原粮，而且没有任何油水，被熬干了的人开始大量死亡。死了的人只有二、三十斤，皮包骨头。我赶马车此时已没有生产运输任务，先是拉煤，后来就专门拉尸体掩埋。那时，明水滩的死人被埋到靠近兰新公路沙枣林南边的沙窝中。埋葬组埋尸体的人此时也骨瘦如柴，没有力量深挖坑，多数是将尸体用本人被褥一裹，两根草绳头、腰、腿一捆，一车拉七八具尸体，用车拉到沙窝中掩埋。埋时将尸体放入浅坑中，撮土为坟。后来无力挖坑，只有将尸体放在沙上，用锨将四周沙土撮起来放在尸体上，堆成一个沙冢。每批死者都在一处，白天看时，一条一条能够辨出……到了12月23、24、25这几天，三个站每天死亡都在40多人以上。这时，埋人的活人已没有力气埋了……死亡笼罩在明水滩，人们彻底绝望了，都在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谋杀计划是这样被精心的执行着：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原为解放军的军垦农场，土地贫瘠盐碱太大，只能养活300人，却被关进了3千多人；原来粮食由甘肃省酒泉市统一调拨，但仅仅拨了一年就让“自力更生”。关押的主要是甘肃本省的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大鸣大放中被揪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有右派言论的坏分子。但也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这些从外地来的犯人，由于没有接济，活下来的很少。

在饥饿的折磨下，人们吃沙枣树叶、死老鼠、蚂蚱、荒漠上的兽骨，吃癞蛤蟆、蜥蜴，吃死人的内脏、死人臀部的肉。他们约上两三个人一起去挖尸、剖腹、割肉，因为一个人害怕被狼吃了。甚至有犯人在大便里，尤其在干部们的大便里找东西来吃。甘肃省定西县粮食局右派分子邢树义，见地质队送来的贺守瑛的大便中有未消化的玉米颗粒，便抓起来用水冲一下就急忙送进嘴里咽了下去。（李景沅：《蒙恩历程》）所以，在饿死之外，还有中毒而死，暴食而胀死；为偷食被打死。

饿其体肤，同时劳其筋骨。夹边沟正常劳动一般都在12个小时以上，包干，打擂台，互相竞争，把人活活给争死了。幸存者计德成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夹边沟这么残酷的地方了，从古到今也再没有比这再残暴的暴君了。抬筐运肥打擂台，一抬八筐、十筐的掣起来，五六百斤，还要喊号子“嗨吆，嗨吆。”把人压得起不来，还要进行劳动竞赛。挖排碱沟，每天跳到零下30—40℃的排碱沟里挖沙子，挖上一阵子，腿就不知是自己的了，劳动回来后吃的又是菜卷子。挖沟、运肥，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本来就喝着菜汤汤，扣了“饭”后就活活饿死了。天天大量死人，到了1960年冬天，连埋都埋不及了，足有一二百具尸体在土坎下面码着。

更不忘苦其心志，凡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除了斗批打关饿百般折磨外，有配

偶的一定强迫配偶与之离婚；有异性朋友的一定强迫朋友与之脱离关系。许多人因受此打击而走上绝路。在云南省东风农场改造的郭家源（个旧县政府秘书）在离婚高潮期间，向天长叹：“难道用离婚可以改造人吗？天天说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难道我们都是十恶不赦的人吗？何必非要搞到权利终身、家破人亡……”（汪作民：《农场春秋》）郭家源先生，你如果早知道贵党有“消灭知识分子”的政策，你就没有这个牢骚，就可以死得瞑目了。

### “消灭知识分子”全国一盘棋

在区区几平方公里的戈壁荒滩上，聚集着一批党国高级干部、有功之臣，民主党派人士，党、政、工、团，农、工、商、兵各色人物，他们都学有所长，有的身怀绝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们中大多数人还对共产党怀着赤诚的心，对国家民族寄予无限厚望。只因一言之出，而大祸临头，落得如此下场。他们都说这是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和中共张掖地委书记安振做的孽，其实张仲良和安振不过是执行党的“消灭知识分子”方针罢了。安徽、河南、四川、广西等省市，那里并没有张仲良和安振，不是死人更多吗？

幸存者白育英认为，“夹边沟死这么多人与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有直接关系，从原则上讲，这些人的素质和结构很差，他们的水平低，品质也不好，包括刘振玉在内，都是认为夹边沟的劳教犯人是共产党为了达到目的，而采用的另外一种消灭的办法。”白育英说对了，这些“水平低，品质也不好”的管教干部也能正确领会和贯彻毛泽东的“消灭知识分子”政策。

副场长刘振玉在 1958 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列宁说过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枪毙人还要浪费一颗子弹呢。听了这话，幸存者邢德当时就明白：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哩。后来果然如此，大约 90% 的人死在这里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教养人员不被当人看，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实际上是按敌人对待。幸存者周孝理也听过这话，他当时心里就发毛，暗暗下了逃跑的决心。他看到场里要用饥饿和强体力劳动的办法把这些右派分子消灭在农场里；他逃跑了，他因此逃过一劫。

### “消灭知识分子”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水平低，品质也不好的夹边沟农场管教干部如此，水平高，品质更不好的几任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书记也都如此。李书成在《光明日报》发表“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在云南大学大抓右派、大抓右倾、大拔白旗，把校长李广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一任党委书记高治国把李广田赶到厨房劳动，并对他说：“谁让你

和我针锋相对，这叫君逸臣劳嘛！”1966年的党委书记胡洋生则说：“这次运动只搞李广田一个人，因为我们中间只有他一个人写文章，我们都不写。”

可见“消灭知识分子”不是一时的权宜，也不是一地的独创，更不是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它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是贯穿一切工作的总路线。

赵廷祺死在夹边沟，他的妻子悲痛欲绝，她说是书害死了丈夫，她将家中的书统统烧掉，并让她的孩子们再也不要念书了；并嘱咐女儿们，以后要嫁给庄稼人，千万不要嫁念书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消灭知识分子”这一条总路线，不但深入官心，而且已经深入人心。

毛泽东死了，“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总路线没有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知识分子的冷血、残暴、恶毒、下流，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安定团结”，造成数以千计学生、市民死伤的1989年六四至今不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们及六四死伤者的亲属仍然受到歧视和迫害。

在中共的监狱中仍然关满着知识分子，如王炳章、秦永敏、何德普、朱虞夫、刘贤斌、许万平、郭飞熊、陈光诚、胡佳、张林等，曾宏玲(杉杉)因发表《地震亲历记》被抓，奥运后听说已经释放，但至今下落不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独立中文笔会一些成员人身权利受到严重损害。数百名法律工作者受到中共非法骚扰，无法正常工作。土匪的习气、流氓的基因就这样代代相传。

### **“消灭知识分子”，也消灭农民、消灭一切反抗的老百姓**

我在评论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一文写道，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看过《墓碑》之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

“消灭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会思想；屠杀农民，因为农民已经开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县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户。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147起，参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闹分社的81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48起，闹粮荒的18起。江苏省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

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 12 个区、47 个乡、436 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五万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 62%。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伙退社的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 458 个社解散，共有四万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 85% 下降到 46%，其中有 6 个乡、366 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 26 个社基本保持完整。（沈志华：《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

毛泽东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气，而是用饥饿法、冷冻法。《墓碑》中有大量论述，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中也有许多例子。如张掖地区实际上民勤县饿死了 13 万人；张掖县饿死了 7.8 万人，全家死绝 98 户，人吃人的 58 户；高台县饿死了 5 万多人；全河西 14 个农业县饿死超过 40 万人。1959 年 10 月修迎丰渠时，一场大雪就冻死 3,000 多人。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有一个叫孙守勤的共军，他参加过镇压西藏人民的战争，是因为批评队长“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子”而打成右倾分子的。他说：“1958 年藏民造反时，我们被调去平叛。当时，打得很残酷，一个村一个部落人几乎被全部打死了。我跟着部队从甘肃一直打到了青海。”“我们当时只知道烧了藏民的寺院将铜铁交到上面……”

仅此数十字，就把毛泽东共产党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西藏人民、新疆人民……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必须得到也必定要得到彻底清算。

## 结语

最后，让我用赵旭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中国人民为了民主自由交出的学费太昂贵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对失败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在议事日程上，更没有让防止悲剧重演的民主宪政在中国出现的迹象。文化大革命时，林彪、五人帮搞封建法西斯浩劫的时候，高喊的是“枪杆子，笔杆子，革命靠的是这两杆子。”文革、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都是以“革命”、“跃进”、“共产主义”这些红色的外衣掩盖他们封建专制的面孔来蒙骗广大人民的，正是他们掌握“枪杆子，笔杆子”，所以他们可以信口雌黄、造谣污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枪杆子、笔杆子让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 1989 年的“6.4”遭到血腥镇压；枪杆子、笔杆子让 1957 年无数先贤生灵涂炭，至今还得不到彻底平反；正是这两杆子让一人一党之私利，代替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综观国际上，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波尔布特和一切对国内人民残酷镇压、对国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封建法西斯，之所以他们为所



欲为、猖狂一时，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枪杆子和笔杆子，所以他们的权利无限膨胀，没有任何力量对其制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多么迫切需要思想、新闻的自由化、军队的国家化、司法的独立化、文化的多元化，因为它是我们的民族走向民主、自由、富强、繁荣的关键。夹边沟农场后来的张场长对王志说，“说句老实话，是死人救活了你们”。我想，能不能让这些死难的英魂唤醒我麻木的国民，让他们清楚只有还政于民，给予人民选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明天！

2008年9月25日星期四于流浮山酒香书屋

# 慘絕人寰，罪在中共

【中共竊國集團利用農民當炮灰把政權奪到手中之後，又把農民打入十八層地獄。他們瘋狂歛財，瘋狂揮霍，慷慨向流氓國家輸血，卻無錢解決本國老百姓的教育、醫療等問題。例如中国政府于2008年5月3日向缅甸政府提供50万美元现汇援助和价值5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紧急物资援助。5月8日，中国政府又决定再向缅甸政府提供3000万元。据《新华网》快讯：温家宝24日说，中国再向缅甸援助抗灾款项1000万美元；而四川的災民仍在水深火熱中。中共對国际流氓小兄弟有無限愛心，唯獨對中國人冷酷無情。這篇是2006年的舊文，寫的是农民尤國英及其一家的悲慘情狀。】

## 活人被送進了火葬場

尤國英，一位從四川內江市永安鎮石板村來到浙江台州打工的四十六歲婦女。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突發腦溢血，生命垂危，送台州醫院路橋分院搶救。入院三天花去一萬多元醫藥費，這是全家在台州打工兩年的全部積蓄。因無力承擔鉅額治療費用，家人決定放棄對她的治療，十月二十七日辦理出院。但出院後出租屋的房東又忌諱「人死家中」而拒絕讓病人入住，走投無路之下，尤國英的親人，包括她的丈夫、女兒、女婿和兒子便決定將並未死亡的尤國英送進殯儀館，等待火化。（《新京報》）

把活人送去火化，而且送她去的人竟是她的至親的親人。這是怎樣的一齣人間慘劇！是誰製造了這齣殘酷、荒唐的人間慘劇？就是自稱是解放了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

尤國英一家人在農村種田、養幾頭豬，一年下來收入不到一千元。不得已，二〇〇三年，尤國英跟隨丈夫魏德明來到浙江台州打工。魏德明來台州後幫人分垃圾，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可以拿到二十元的錢。這點微薄的「工資」在魏的家鄉人看來，是一份「高報酬的好工作」了。於是，二〇〇三年底，魏的兒子、女兒和女婿也相繼從四川來到了這裡。一家人在台州打工兩年，存下二萬元，其中一萬多元還清了老家造房子欠下的債，剩下一萬元左右的積蓄，如今早已分文不剩。

尤國英悲劇折射出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在共產黨殘暴統治下的深重苦難。二〇〇五年兩會期間，衛生部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有約百分之四十八點九的居民有病不就醫，百分之二十九點六應住院而不住院。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

「為什麼不少農民最後都死在家裡？看不起病。」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奉化滕頭村黨委書記傅企平說：「小病扛、大病拖，實在不行就往家裡抬，在農村這是許多農民無奈的選擇。」中共權貴分贓集團統治大陸幾十年以來，除了對農民實行盤剝、壓榨、奴役以外，從來不管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死活，中共幾乎剝奪了農民所有的生存條件。中共對教育的投入為全世界倒數第一，早已騰笑國際；原來醫療的開支也是全世界倒數第二。

### 中共把農民逼上絕路

幸虧殯儀館負責人蔣雲龍發現了尤國英仍然是活人，就立即報警把尤國英重新送回路橋分院。蔣雲龍對周圍的人說，大家伸出援手，救救她！他帶頭向尤國英家屬捐助了一千元。十分鐘內，大家便捐了三千三百八十元。

當晚，魏德明和他的女兒魏珍哭了一整夜。最終拍板把沒死的妻子送往殯儀館的魏德明二十多天來，沒有合過幾次眼。這位老實巴交的農民癱坐在草蓆上，只是一個勁兒地喃喃自語：「我對不住你，沒讓你過上一天好日子。」其實對不住尤國英的不是魏德明，是中共竊國集團。是中共竊國集團在利用農民當炮灰而篡奪國家政權之後，又背信棄義地把農民打入十八層地獄。

尤國英被重新送回醫院後，台州醫院路橋分院的工會先後兩次發起了捐款，累計捐了一萬多元。路橋區政府撥出了一萬元專款，並要求醫院盡力搶救，台州慈善總會、路橋「善福堂」寺廟、在台州打工的老鄉和社會人士也捐了一些錢。現在尤國英的住院賬戶裡，各界捐助的善款已超過六萬元。值班醫生楊愛祥說，經過全力搶救，尤國英的病情已經有了好轉。

尤國英家人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悲劇並沒有結束，據醫院介紹，要保住尤國英的性命，醫療費用可能高達幾十萬元甚至更多，幾十萬對於尤國英一家人來說，意味著幾輩子的債務。按照目前一天二千元的治療費計算，社會捐助的六萬元也很快就會使用殆盡。尤國英仍將回到「無錢看病，回家等死」的窘境。「如果繼續替媽媽治病，我們肯定回不了老家了。」魏珍說，「而且，弟弟還要娶妻，自己還要生孩子，孩子還要讀書，萬一父親又生了病……」，魏珍不敢再往下想，擺在中國農民面前的真是一條絕路啊！

### 不顧人民死活 為流氓國家輸血

中國農民在二〇〇四年之前，除交了四十多年的「農業稅」外，還承受了剪刀差和各種各類的橫徵暴斂。據中國官方數字研究顯示，自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家的GDP增長成了當局到處吹牛的本錢，但廣大人口尤其是九億農民根本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民謠「買房子把你口袋掏空，上大學把你父母逼瘋，上醫院就是給你提前送終」，就是生動的寫照。尤國英的遭遇就是血淚的控訴。之所以如此，就是中共權貴集團一方面對國家資產肆無忌憚的瓜分，對人民的殘酷壓榨和對人民財產的瘋狂掠奪；一方面又慷國家和人民之慨，在大買軍火以「提高執政能力」之外，又大搞金錢外交，用民脂民膏為幾個流氓國家輸血，以壯苟延殘喘的聲勢。

例如胡錦濤二〇〇四年十月訪問古巴時因為慷慨送了大批美元，以致把卡斯特羅感動得高呼「中國萬歲」，並要坐輪椅到機場為胡送行。殊不知古巴人民的日子過得比中國老百姓滋潤多了。古巴人民享有全民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制度。古共中央的人告訴到訪的中國人說，哪怕財政再拮据，國家仍然堅持這些制度。

一方面瘋狂斂聚，一方面瘋狂揮霍。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不顧人民的死活。

(首發《動向》2006年2月號，署名戴雨山)

# 新中国为什么有人要吃人肉？

我在查閱 1957 年反右派运动资料时，看到了新华社 1960 年 4 月 14 日的一个内部报道说：甘肃、宁夏、贵州发生吃人肉案 17 起，吃掉活人 15 个，死尸 17 具。宁夏有一对夫妇竟然把自己 7 岁的女儿杀了吃肉。

当是时，中国的形势可是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呀；市场繁荣，物资丰富呀；鸡鸭鱼肉都吃不完呀；报纸、广播、书本上、当官的，都是这么说的。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要去吃人肉呢？党的喉舌这样解析：

- 1，中国人有吃人肉的悠久历史（习惯难改）。
- 2，受少数民族影响，他们野蛮。
- 3，人肉香（敌不住诱惑）。
- 4，人肉可以治病（不做东亚病夫）。
- 5，吃人肉可以长寿（可以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福）。
- 6，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煽动（地富反坏，原来不坏：他们希望贫下中农健康长寿）……

总之，千条万条，跟共产党、毛主席的关系一条也没有。

（资料来源新华社编《内部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教育部部长周不济先生将就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所谓“重建危校行”一事发表严正声明

据路边社 2007 年 1 月 15 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教育部部长周不济先生将就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所谓“重建危校行”一事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伙同一些来历不明的机构，搞了一个以蔡少芬小姐为爱心大使的所谓“重建危校行”活动，该活动声称：

“在贫困的中国偏远省份，有不少学校的校舍，残破非常，有些更是摇摇欲坠的危房，在这些破旧的土房子中，却有着千千万万的山区儿童在一个没有桌子、没有椅子、门窗狭窄、课室阴暗的环境上课。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重建危校行’就是针对此一情况的关怀计划，资助当地村民重建校舍，改善山区学童的学习环境。”

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教育部及对本人周不济先生的极大污蔑。众所周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江上皇和胡今上为两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早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超过美国也是指日可待。中国的孩子不是和胡锦涛同志一起快乐地扭秧歌舞，就是在温家宝怀里淌着幸福的眼泪，哪里还需要什么校舍？

为了实行奴隶主义文化侵略，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惜血本，花了无数民脂民膏在许多国家开办孔子学院，目前已有 78 所，仅美国就有 8 所。还有 30 多个国家的 70 多家机构正在我财政部拨款。只要看看遍布各国的、美仑美奂的孔子学院，就可以知道所谓中国还“有不少校舍残破非常，是摇摇欲坠的危房，破旧的土房没有桌子、没有椅子、门窗狭窄、课室阴暗”等是彻头彻尾的、别有用心的谎言。

过去 10 十多年中，该教会在“宁夏、陕西、内蒙古、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资助重连了超过 500 所危校，受惠的山区学童超过 10 万名”。加上“五饼二鱼”、重返校园及其他各种团体的助学活动，受惠的儿童更多。这些行为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严重伤害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官僚的感情。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基督比中国共产党更爱中国儿童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还是搞愚民教育。”所以我们宁可把几百亿、几十亿的钱送给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朝鲜、非洲，送给阿拉法特、萨达姆、卡扎菲，而绝不肯投入教育。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敌对行为，严重阻碍了我们愚民化的进程，破坏了我党全民文盲化的宏伟计划。因为有知识的人越多，越不利于我党执政能力的提高，越不利于我们革命干部对广大工农兵的奴役、压迫和掠夺。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声称，继续为“中国偏远山区的残破学校筹募重建费约 HK\$6,500,000，重建 40 间位于甘肃省、青海省、陕西省、贵州省、云南省、宁夏省及广西省的危校。”我正告香港基督教协进会，这是绝不允许的。

我严正要求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将这“湿湿碎”（广东话意指小意思）的小额款项拨归以下用途：

1、拨中国银行填补坏账。由于贪污、盗窃、受贿，使我国银行巨大亏空，濒临破产。HK\$6,500,000 虽然不够塞牙缝，但阎罗王不嫌鬼瘦嘛！或

2、拨公安部购买镇压群体事件的枪械。一枝进口拐弯枪单价 12 万美元，如果经办人不贪污的话，大约可以买五枝半，对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即屠杀能力不无小补。或

3、拨国安部充特务经费。从前我党在港台的特务经费由赖昌星提供，自朱镕基自断财路后，国安部便出了几千万的预算缺口。或

4、拨中纪委作入狱高级干部的伙食和召妓津贴。或

5、拨本部作广东省贫困县招待下乡支教人员的买酒经费。或

6、拨财政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染发费用。据焦国标教授考证，有的常委由于不及时染发，以至在一头黑发下露出一圈白色，极不雅观，严重影响了领导人和平“崛起”的光辉形象，这就是“再穷不能穷染发，再富不能富教育”。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必须迅速在以上各项中作出选择，否则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豫。特此严正声明。

2007 年 1 月 15 日 于北京(武宜三拟稿，未经中共教育部党组、中宣部审批)

## 從馮欽哉遭遇看中共背信棄義

今年九月五日，西安市的馮寄寧先生給中共當局寫了一封《申訴書》，請求為他在一九六三年就死去的祖父、「起義將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第一屆政協委員、國軍二級陸軍上將、右派份子馮欽哉，摘掉「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一九九七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已經廢除了「反革命」罪，為什麼到了二〇〇七年還有一個死人頭上還戴著「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呢？而且這個人已經死去了四十三年。

中共中央(1978)55號文件《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的通知》中，「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之「若干政策問題」第五條規定：「原屬起義、投誠人員，如因其是右派份子而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的，應在摘掉右派帽子的同時摘掉其歷史反革命帽子，仍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但為什麼偏不給馮欽哉摘掉「歷史反革命帽子」呢？

馮欽哉者，是一九〇九年就加入中國同盟會的資深革命軍人。袁世凱稱帝時，曾在包頭起義；曾受孫中山指示，奔走於上海、北京、天津、濟南間，聯絡革命。一九二四年後，入楊虎城部歷任營長、團長，作戰英勇，累功至師長。一九二八年，楊虎城赴日本，受命和孫蔚如共代軍長職。一九二九年，蔣馮戰爭中，全殲唐生智軍，獲蔣介石召見，並獲賞銀兩萬元。

一九三六年，在西安事變中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和劉峙、樊松甫等人通電全國，反對張、楊非法扣押蔣介石之「背叛黨國，背叛領袖，勾結共產黨作亂造反」行徑，表示「當即勉效前驅，一不做共產黨，二不擁護小張，三不與中央軍作戰。」在南京軍進迫西安時，被任命為討逆軍渭北司令。事變後，所部擴編為二十七路軍，任總指揮，轄四十二師和一六九師，自此脫離了西北軍。

一九三八年，所部編為第十四軍團，參與娘子關、中條山戰役，功勳卓著。一九四八年，遷華北剿共總部副總司令。在共軍兵臨城下時，不但拒絕登上蔣介石派來接運高級人員的飛機，反而與傅作義狼狽為奸，積極策劃投降中共。一失足成千古恨，累及所有部屬都遭中共殺戮、關押、勞改、管制、批鬥，亦使自己及親屬成為賤民，雖名其孫曰「寄寧」，卻至死不得安寧，而且死後四十多年仍不得安寧。悲哉！

投共後，馮欽哉即遭投閒置散，只得了個北京市政協委員的空銜。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份子；一九五九年，又因在「西安事變」時表現被定為「歷史反革命」，遭西安市公安局逮捕，從北京押回西安關押。一九六一年，得時為陝西省省長的趙壽山之力，保外就醫。

當時，其家被查抄，什麼也沒有了，又值三年饑荒時期，其慘可知；所幸趙壽山不忘舊誼，常來看望，有時還帶來一袋富強粉；有一次，與趙壽山說起「西安事

變」事：蔣被抓後，關到新城，不吃飯，只吃趙壽山送的羊肉泡。因問，「咱這樣吃不飽，比起(民國)十八年年饑來，怎樣？」趙一聲喟歎：「比十八年年饑還厲害，吃人哩。」一九六三年，馮欽哉病故於西安。

一九八〇年，馮欽哉的右派問題被民革北京市委根據中共的政策作了糾正，但使子孫後代深受其害的「歷史反革命」罪名，卻仍然掛著。其媳婦胡宜秋向西安市公安局提出為馮欽哉摘帽的要求，市公安局著其找檢察院；到西安市委統戰部投訴，市委統戰部也將投訴信轉到市檢察院；找市檢察院，而市檢察院又讓找市公安局，當胡宜秋拿著檢察院的通知找到公安局時，公安局搞接待的人便講：「民革的平反文件我們不認，你要拿共產黨平反右派的文件來。」至此，一個小小的西安市公安局接待員便把中共所謂「長期共存、肝膽相照」的謊話拆穿了；民主黨派、議政參政，不過是讓人臉紅的笑話耳。但拿到「共產黨平反右派的文件」時，又如何呢？請讀者耐心看下去。

不久，胡宜秋病故，為馮欽哉摘「歷史反革命」的擔子落到孫子馮寄寧肩上。二〇〇七年三月，馮寄寧終於在西安市檔案館「拿」到共產黨平反右派的文件了。當他拿著這個中共中央(1978)55號文件向西安市公安局要求為祖父「歷史反革命」平反時，市公安局又推托了，此事「不屬公安機關管轄，應向相關部門反映」。於是，馮寄寧只好又找西安市委統戰部，市委統戰部仍舊將材料轉交市公安局。二個月後，市公安局還是堅稱此「事項不屬公安機關管轄，應向有關部門反映」。「有關部門」是什麼部門呢？至今諱莫如深、無可奉告。

無奈，馮寄寧只好再找西安市委統戰部，但市委統戰部在與市公安局「協調不下來」的情況下，將馮寄寧寫的申訴轉到中共西安市政法委去，「請政法委協調解決」。又三個月，當馮寄寧到市委政法委詢問處理情況時，市政法委政策法規處王姓處長答覆說：「這事不應由政法委管」，讓他仍去找市委統戰部。公安局、檢察院不都是你政法委管的嗎？政法委、統戰部不都你共產黨一家的事嗎？共產黨不是領導一切的嗎？為什麼現在又不管、不領導了呢？

說到這裡，筆者真是怒火中燒：世界上有這樣王八蛋的執政黨？有這樣王八蛋的政府嗎？有這樣王八蛋的司法機關、執法機關嗎？明明你黨中央發的文件，而且已發了二十多年了，馮欽哉又是符合這個文件的規定。為什麼還要推來推去，把老百姓的痛苦當作皮球來踢呢？

中國共產黨竊取權力快六十年了，但仍然保留著土匪作風：除了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之外，不幹任何正經事。當年抓馮欽哉的右派份子、「歷史反革命」，是何等積極，何等雷厲風行呀！如今搞平反，卻如此推三阻四，世界上有這樣殘害人民、愚弄人民、與民為敵到底的政權嗎？

想當年，鄧寶珊代表傅作義與中共方面的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舉行了正式會談，並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協議》，《協議》明確規定：「起義人員，

一律不咎既往」。然而，背信棄義的中共和毛澤東，不但是既往必咎，還要栽贓誣陷，對民國時期的黨政軍特警，乃至教員、保甲長，大開殺戒；對大部份「起義、投誠」人員以鎮反、肅反等各種名義予以大批屠殺，之後又對其殘餘處以關、管、批、鬥，再使其中之不少人被打死、餓死、累死、病死。而且株連九族，令其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兒女等親朋戚友也淪為賤民。

同樣可憐的還有張東遜，這位現代魯仲連、國共雙方之間的調人，他既不容於日本人，曾坐過兩年多日本人的監獄；他對國民黨深懷不滿，當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時，每次開校務會議，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張東遜便說：「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然而他更不容於共產黨。

張東遜作為傅作義與中共談判的中間人和見證人，對北平和平易手是立了大功的。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寫信給劉仁：「請經妥人告訴張（東遜）符（定一）兩先生，我黨準備邀請他們兩位及許德珩、吳□、曾昭掄及其他民主人士來解放區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但是，共軍一進城，毛澤東就變臉了。這位曾經有功於中共的人，居然被誣為「美國特務」，而慘遭迫害，其次子、三子先後自殺。一代自由主義哲學家、學者一九六八年被逮捕，一九七三年死於秦城監獄中，時年八十七歲。世界上有這樣言而無信、忘恩負義的東西麼！

而馮欽哉受迫害，更由於他是抗日英雄。凡抗日者都沒有好下場，即如彭德懷，僅僅打了一場虛張聲勢的百團大戰，就被毛澤東批了幾十年，最後被害死於黑獄之中。從馮欽哉、彭德懷之遭遇，不但看出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是一夥背信棄義的無賴團夥，同時又一次證明瞭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確確實實是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的日本走狗、漢奸、賣國賊。

（《開放》2007年10月號）

## 中国民主化的挫败和反右派运动

—— 2010年6月26日在日本《今日论坛报》“中国民主化问题研讨会”上的讲话

大家好！谢谢《今日论坛报》社长原博文先生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关于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可以从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时间谈起。例如，可以从1919年五四运动谈起，可以从1942年延安整风谈起，也可以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谈起，更可以从《中华民国宪法》通过的1946年谈起。但是，我这几年在研究1957年中国共产党反右派运动历史，所以，我想从1957年的角度来谈。

1957年，不但是180—310万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子女的人生的分水岭，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命运的分水岭。1957年发生的事，是民主与专制独裁的大碰撞、大搏斗，是五四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1957年发生的事，是中共建政8年来各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是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争取基本人权、要求参政议政权利的民主运动。这次民主运动因为遭到比五四运动更残酷的镇压，也就必然导致此后几十年，直至目前的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毒瘤在中华大地生根、空前泛滥，导致社会大倒退，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灾难。

没有反右运动，就不会有大跃进、大炼钢铁、反右倾；就不会有三年大饥馑，饿死几千万人；不会有十年文革浩劫；就不会有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这一切，是反右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它的必然结果。终极的原因在制度、体制上——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没有成功，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没有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被镇压，被消灭了。

中国共产党在反右派运动的1958年，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个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消灭知识分子”，公开发表52年了。这件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历史学家所注意，但我告诉大家，这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件大事情。

“消灭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坚定不移的一条总路线，是一切战略、战术和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条总路线，一部中共党历史、一部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成了一盆浆糊。所谓“纲不举、目不张”也。例如，川震中豆腐渣工程、

大头娃娃奶粉、三聚氰胺奶粉、上学难、少儿失学率高扬、教育投入少且被贪污挪用、教育奴工……这一切怎么解释？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有了这条总路线，就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也必须“从娃娃抓起”；消灭知识分子，就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之中”。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的一生功业。他的这个宏图，大约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就已经形成：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确是由来已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修改稿”中虽然将这些可怕的文字删除，但删除的原因却非悔悟，而是出于掩盖和欺骗，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从来没有改变。

敌视知识分子方针虽然早已定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在掌握权力、抓住刀把子以后，在井冈山，成为“朱毛赤匪”首领之后，才开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

1928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需上级批准）。”

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李文林等数万人被肉体消灭；遇害者达6,352人。胡耀邦仅仅因为读过初中，也被认定为“AB团”，险遭杀害。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象李锐这样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都成了当然的特务而遭到关押、整肃。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99%以上都被抢救过，不少人因此被消失。

窃取全国政权后，毛泽东发动无数的政治运动来针对知识分子，荦荦大端者有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镇反）、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抓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清反革命（肃反）运动、反右运动、“拔白旗”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

土改和镇反，把地主、富农等农村中的精英分子以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民国时代



党政团军教人员消灭了几十万。胡风等本是中共党内、党外“进步作家”，毛泽东却毫无根据地诬指他们是“反革命分子”，“特务、反动军官、叛徒”，“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毛泽东 1958 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打自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 460 个儒，我们抗了 46000 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 100 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1957 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用丧尽天良的政治流氓手法，对知识分子实行彻底的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请相邀，结果 180—310 万的大小知识分子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之”了。

这 180—310 万右派分子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份还被杀害。从此中国便没有了人性、个性、公信、诚信；中国也从此进入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交织的时代。如今，无官不贪，腐败横行，坑蒙拐骗，豆腐渣工程，毒牛奶，杀害儿童，其原因就出在毛泽东这个无仁无义、无信无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头子身上。

毛泽东趁反右运动余威，开始编造“大跃进”、“人民公社”神话，指使吴芝圃、曾希圣、李井泉、柯庆施等人伪造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卫星田”；四川省郫县还吹出 824,525 斤的牛皮。然后再按“产量”征购，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农民的粮食统统搜光、刮光，竟至颗粒不剩，才肯罢休；以达到对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屠杀。

毛泽东用饥饿的办法，从 1959—1961 的 3 年间，基本上不费一枪一弹就消灭了 3,600 万农民和在各地各种劳改场所（农场、工厂、矿山）服苦役的右派分子等被共产党所认为的敌对分子。

以夹边沟为例子，夹边沟农场最高峰时的报表右派分子人数是 3,074 人。按幸存者、甘肃农业大学孙枢统计，死去的差不多 2,900 人，活着出来的不到 300 人，有的说只有 200 多人；死亡率大约 90%。

夹边沟仅仅是中共集体屠杀右派分子的一个屠场，全中国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

当然，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夹边沟农场、415 劳教筑路支队、峨边沙坪农场、白茅岭农场、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场、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兴凯湖农场、白城子农场、北京清河农场、茶淀农场等遍布大江南北的、数以千计的杀人场相比。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杀人魔窟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枪杀之外，许多人是在受尽打骂、凌辱、捆绑、吊打、关禁闭之中，在饥饿、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断地死去。

“消灭知识分子”不是一时的权宜，也不是一地的独创，更不是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它确实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贯穿一切工作的总路线。

毛泽东死了，“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总路线没有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知识分子的冷血、残暴、恶毒、下流，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杀 20 万，保 20 年安定团结”，造成数以千计学生、市民死伤的 1989 年“64 屠杀”至今不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们及 64 死伤者的亲属仍然受到歧视和迫害。

在中共的监狱中仍然关满着知识分子，如刘晓波、王炳章、刘贤斌、郭飞熊、陈光诚、胡佳、张林等，曾宏玲(杉杉)仅仅因发表 3 篇《地震亲历记》就被抓，奥运后听说已经释放，但至今下落不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独立中文笔会一些成员人身权利受到严重损害。数百名法律工作者受到中共非法骚扰，无法正常工作。中共土匪的习气、流氓的基因，就这样代代相传。

毛泽东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气，而是用饥饿法、冷冻法。如甘肃省，张掖地区民勤县饿死 13 万人；张掖县饿死 7.8 万人，全家死绝 98 户，人吃人的 58 户；高台县饿死了 5 万多人；全河西 14 个农业县饿死超过 40 万人。1959 年 10 月修迎丰渠时，一场大雪就冻死 3,000 多人。

回到我的结论：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没有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被镇压，被消灭了。要想中国民主化的成功，就要重新启蒙，重新培养像储安平、彭文应、林昭、冯元春、张春元以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为终极追求的知识分子群体。

就说这些吧，谢谢大家。

〔附录〕

一、在讲者和听众互动的的时间，有人质疑“消灭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总路线”的提法，认为中共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组成，也是有理想的，他们难道不考虑治理国家吗？

我回答：

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的确不乏理想主义者，例如陈独秀等等。但是，他们后来都被排挤出去了。

自从上了井冈山后，中共统治集团成分都变了。他们都是山沟里的土匪、地痞流氓，他们并没有什么治国理念，即使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不是被杀掉，就是被改造成奴才了。否则，60年来就不会把国家搞成这副模样。

中共建政后的大学院系调整，就是消灭知识分子的重大举措，他们不是要培养知识分子，而是要培养工具。现在大学里，他们不让学生知道反右派、不让学生知道大饥荒、不让学生知道饿死几千万人、不让学生知道文革、不让学生知道64、不让学生知道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学生能叫知识分子吗？

到文化大革命，干脆把学校通通关门，把教师、学生通通赶到农村去。他们考虑过治理国家吗？

二、一对只有14岁半的日本籍学生兄弟，先后提了两个问题。1，看来民主化并不那么好，例如日本民主化了，也还是有很多不好的东西。2，日本是二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民主化，中国能独立完成民主化吗？

我回应说：

民主制度只是最不坏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民主国家由于人们手中有选票，政府和官员不敢祸害老百姓。例如，日本绝对不会发生在风调雨顺下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日本也不会发生文革，日本也不会发生突然把你的房子拆了而且不给赔偿的事，等等。同时，民主国家由于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自由，制度会不断的被完善。

中国的民主化当然需要各国特别是日本朋友的关注。因为中日两国关系太密切，只有中国民主化了，日本才有安全感。

在日本大学研究宪法的李军先生补充说，日本在二战前，已经有了民主制度。二战后，美国只是帮助日本去除军国主义；中国与日本不同，完全是独裁专制主义。

（此文根据讲稿整理补充而成，《纵览中国》首发）

## 除三聚氰胺，奶裡還有什麼？

### （一）「調奶人」的「技術」

讀了《南方週末》記者徐楠發自陝西、河北的《亂象回溯：「調奶人」、「關係奶」和「傻子牛」》報導後，才知道除了三聚氰胺外，牛奶裡還有什麼！

文章說，在城市的超市貨架上，牛奶整齊劃一、包裝光鮮。循著生產鏈條向源頭看去，卻曾經演繹著奶站的收奶亂象、奶販神秘的「調奶」技術和奶農買牛養牛的無知無奈。

陝西省楊凌地區的周立社就是個「調奶人」；周立社的正式身份是奶源經紀人陳平和王利的運奶車司機。「調奶」，是為使牛奶的各項監測指標都能通過，而添加各種東西。

周立社說，10 噸的原奶要加 6-7 瓶雙氧水，20-30 盒慶大黴素，4-5 毫升的維生素 C，10-15 斤的蛋白粉，20-30 斤的乳清粉，4-5 斤的脂肪油，甚至有時候加鹼加過頭了，還會加點硫酸來中和。

因為添加的這些東西，六七個小時後就會失效，因此必須確保這些牛奶在一定時間限制內送檢。於是，雙氧水的罐子就放在運奶車司機的駕駛座下面，到了廠裡快要檢驗時，才打開蓋子往裡倒。

這一套技術，是陳平從涇陽縣請來的李自軍傳授的。李自軍是做獸藥出身的。蛋白粉、脂肪油、乳清粉、慶大黴素等主要添加用料，多半出自獸藥。

在涇陽，李自軍有一個響噹噹的外號「奶神」。（《南方週末》：《中國奶業危機溯源》）

朋友們，當你知道你喝的牛奶裡面不但有三聚氰胺，還有雙氧水、硫酸，你有什麼感覺？現在，這些為非作歹、喪盡天良的牛奶公司又在香港傳媒大賣廣告了。他們到底還有什麼理由讓我們相信他們呢？

2006 年 12 月，溫家寶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的會長約翰·桑頓說：

「中國的選舉一旦在村級取得成功就將向上發展到鄉鎮、區縣甚至省市。」在談到司法獨立的時候，溫總理說，必須要恢復司法的「尊嚴、正義和獨立。」溫總理還告訴來訪的美國人，「監督」就是問責，就是限制權利的膨脹，因為「絕對的權利會造成絕對的腐敗」。溫總理說，媒體和 1 億 1 千萬網民都可以參加監督。被溫家寶總理接見之後的美國人興奮異常，以為鴻鵠之將至：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將包括「自由選舉、司法獨立和以制衡為基礎的監督」。

兩年就到了，自由選舉在哪裡？司法獨立在哪裡？媒體和 1 億 1 千萬網民都可以參加監督又在哪裡？

中國共產黨不但是一個搶劫匪幫，還是一個詐騙集團。

### （二）我們養的是傻子牛

西安乳業協會秘書長王偉民說，現在養的很多是「傻子牛」。在奶牛市場，各種虛假、化裝、偽造的奶牛品種混雜，原本壁壘森嚴的繁殖譜系被徹底打亂。過去國營奶牛場的技術員，搞錯一頭牛的譜系編號，要罰一百多元；今天，牛爺爺和

牛孫女交配的事情比比皆是。根據乳業協會提供的資料，假牛、劣牛事件層出不窮。奶業打假人蔣衛鎖在不到兩年的養牛生涯，就因為買進 40 頭冒牌的良種奶牛，賠得一塌糊塗。

黑龍江省趙光農場引進 300 頭號稱新西蘭良種的奶牛，在隔離場隔離的一個半月裡，就有幾十頭出現乳房炎和不帶犢等問題，實際引進 238 頭。一年後，又有 51 頭發生了乳房炎、乳頭萎縮，22 頭有其他病症，3 頭牛在進場一週後死亡，原因不明；而產後不發情的，更是多達 109 頭。

在紛亂的民間販運中，摻雜著由黃牛、笨牛染色、豐乳、鑲牙而成的假奶牛。市場秩序混亂，亂發廣告、以次充好、坑蒙拐騙、敲詐勒索現象時有發生。

朋友們，當你知道你喝的牛奶原來是從假牛、劣牛、病牛身上擠出來的，是從患有乳房炎、乳頭萎縮，不知用什麼藥物豐乳的牛乳房裡擠出來的，你有什麼感覺？你還會冒險患難地用生命和健康來做他們是否改惡從善的試驗品嗎？

### （三）亞笛多星十大危機論與神七上天

亞笛多星認為，中共在 2008 年有十大要命危機的繩索，綁在它的脖子上：

- 一、煤與石油的危機；
- 二、金融危機，國民的養老錢危機；
- 三、權力的憲政危機，國民的養老錢危機；
- 四、新的《勞動法》造成勞動力價格失衡的危機；
- 五、土地危機；
- 六、各地頻仍的制度性造反危機；
- 七、日益惡化的環境危機；
- 八、中央和地方政府貌合神離的行政失責危機；
- 九、民族危機；
- 十、糧食危機。

作惡多端的中國共產黨如何逃得出這重重危機呢？

我借箸代籌，替共產黨想了半天：你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之流，躲在中南海，固然可以不吃含有三聚氰胺、雙氧水、硫酸的牛奶，你們的兒子、孫子也可以不吃；但能保證你們世世代代都不吃嗎？

我也看到現在黨國要人早把妻子、兒女搞到外國去了。然而外國便安全了嗎？外國還是含有三聚氰胺、雙氧水、硫酸牛奶的天下呀。於是，太空就必然地成了中共一小撮的最後避難所。所以，即使有那些塌壩、毒奶粉等千頭萬緒的事情要擺平，他們仍然火燒屁股地要把神 7 放上天去。

中國共產黨不但是搶劫匪幫、詐騙集團，還是個逃跑集團。

中國共產黨是逃跑集團，不是什麼新鮮事。當年，他們從江西、福建經雲南、貴州、四川逃到陝西、甘肅邊區。不久的將來，他們要從地球逃亡到太陽系。

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請拭目以待。

（2008 年雙十節於流浮山莊，首发《新世紀新聞網》）

## 武宜三与笑蜀山西黑窑童工事件对谈录

【提要：三年人祸期间，只听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没听说饿死了三千多万头牛或三千多万匹马。我们伪国家五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祸国殃民、是破坏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做人尊严！拆散美满夫妻、摧毁幸福家庭，最新例子是把师涛关起来，再逼他新婚三个月的妻子离婚！为了孩子的文盲、穷困、痛苦、愚昧而努力破坏教育，这只要看看遍佈各地的金碧辉煌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和破烂的中小学校舍，看看农村几千万儿童的失学、流浪和当血泪童工。山西黑窑童工事件是国家犯罪，是执政党违宪、失职！党妈妈原来就是狼外婆，牠和黑心窑主、黑心矿主本是一丘之貉。】

笑蜀：山西奴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令人瞠目，令人气结！

武宜三：更令人绝望，指对这个政权的绝望。但对上帝却充满着希望：因为这个政权已经疯狂到了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上帝让牠灭亡的日子还会远吗？

笑蜀：自认为自己的想象力并不差，尤其对黑暗的想象力并不差，对丑恶的想象力并不差，但黑暗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丑恶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仍然是自己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武宜三：那个后来成了诈骗犯的、红透了半边天的“儒商”就说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办不到的。人的想象力永远赶不上魔鬼的作恶，例如阳谋，例如教育产业化，例如稳定压倒一切，历来如此。

笑蜀：那样的监工，那样的窑主，以及躲在窑主背后的形形色色的后台老板，他们还是人吗？用禽兽来形容他们，我认为一点也不夸张。甚至禽兽不如，因为禽兽不可能这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吃人，并且把吃人形成为一个产业链。

武宜三：他们本来就不是人，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批“人性”批了几十年，所为何事？不就是为了把人变成禽兽吗？如果没有大规模的从人到兽的革命性转化，延安整风、土改、剿匪、镇反、三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血洗天安门、镇压法轮功，搞得起来吗？

笑蜀：而且他们吃的不是普通人，他们吃的是孩子，是那些乳臭未干，本来应该享受呵护、享受温馨的孩子。他们却被诱骗和绑架到黑窑，在监工的皮鞭下，在狼狗的环境下，披星戴月地劳作，饥寒交迫地劳作。他们连奴隶都不如，在监工的眼里，在窑主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会说人话的动物而已，不过是牛马而已。



武宜三：其实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眼中，中国人民统统都不过是会说人话的动物；是牛马？不对，此牛马还不如。三年人祸期间，只听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没听说饿死了三千多万头牛或三千多万匹马。

毛高帝教老百姓一要怕不苦，二要怕不死。甘肃省夹边沟劳教农场关押的三千左右的“囚犯”，有近六成被折磨死了，只有六百多人活着出来，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煤矿不断地、大批地死人，是为了建设非洲基地的需要；江湖污染，多少人死于癌症，是为了赶快捞钱的需要；多少农民、城市贫民有病不能治，只能等死，是为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永远健康的需要。所以再死几千个或几万个奴工或奴孩实在算不了什么。

至于孩子嘛，《人民日报》前记者、反右受难者刘衡老太太说：我没想到，1957年6月8日以后，党妈妈竟然变成了狼外婆，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吃掉自己的儿孙。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孩子、红色江山接班人，也在所不免。所以现在中共中央委员们据说都成了美国人的爸爸或爷爷了。

笑蜀：这是比奴隶制还要黑暗、还要丑恶一万倍的黑暗和丑恶。而这样的黑暗和丑恶，竟发生在现代文明世界，发生在当下中国！这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羞辱，甚至可以说，这是对整个世界文明的羞辱！

武宜三：恐怕未必，起码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章启月小姐们就一定不会这样认为。他们会像告诉亲爱的各国新闻记者“每一个被征地农民都得到合理赔偿、每一户拆迁都有合理安置”一样，也会一本正经地、庄严肃穆地告诉您：我国每一个工人和农民工都在幸福地干活着，并愉快地收取丰厚的报酬着。

笑蜀：就不提博爱了吧，纵然可以对他人的生死不闻不问，但，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能够容忍自己的孩子落到那样的境地？但只要那样的奴工产业链存在，谁又能够担保，自己的孩子不会突然哪一天从自己的身边消失，而落入黑窑的魔爪？

武宜三：我比起笑蜀同志来，算是马齿徒增；但总算见识了四十年前批《二月提纲》时把“博爱”批得狗血淋头的壮观场面；锦涛同志对此当然也是记忆犹新。现在您又来讲“博爱”，当心锦涛同志会送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给您载载，到时候看您还“笑”得起来不！

笑蜀：那样的奴工产业链，因此不止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羞辱，不止是对整个文明

世界的羞辱，更是对我们，对看起来与此事似乎不相干的每个人的潜在威胁，亦即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

武宜三：再威胁也威胁不到党的绝对领导，对于这一点，大家尽管放心。

笑蜀：没有哪个人应该置身事外。

武宜三：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拉屎和放屁。温家——宝宝同志不是说过，最小的事，乘以十三亿，都不是小事吗？请问，那些关系到“鸡的屁”的砖窑大业，我党领袖和干部们当然会事必躬亲、不会置身事外的啦。

笑蜀：不单奴役人，而且奴役少年儿童，这是对人道的彻底颠覆，这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这是一场叛乱，没错，这的确是一场叛乱，比打家劫舍更严重的叛乱，跟孙二娘与张青在十字坡开店卖人肉包子一样血腥的叛乱。

武宜三：孙二娘比起后来成了陶铸夫人的曾志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共产党搞叛乱的历史已有八十年了，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尤优为之，早就工多艺熟。开几座黑砖窑、黑煤窑，实在小菜一碟、游刃有余，值不得大驚小怪。

笑蜀：这场叛乱显然提示我们，当地事实上已经出于一种紧急状态。奴役罪——这个文明世界最重的罪——在当地此起彼伏地发生而得不到遏制，说明当地已经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治理，甚至已经不再属于文明世界，而已经沦陷了，成了那些吃人的禽兽们啸聚的山林。

武宜三：中华大邦不见文明久矣，五十年多来庙堂之上盘踞的不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山大王，就是自诩为“人民的儿子”实为残民以逞的刽子手；不是口称爱国实为卖国的苏俄奸蝶，就是口称“八荣”实为“八耻”的客里空。瀛台紫阁不过是当代的分金亭、聚义厅。

笑蜀：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基层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官员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适用举证倒置，如果当地基层政府以及当地官员不能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当地全部的奴役罪行毫无干系，那么我们就有权利宣布他们有罪，即便法律不这样宣布，我们也有权利在道义上这样宣布，我们就有权利，把当地基层政府、把当地官员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让他们的子孙千秋万代地为他们蒙羞！道理很简单，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没有公权力的配合，是完全无法设想的。

武宜三：在江泽民或胡锦涛绝对领导下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首长吴邦国委员长教训香港人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我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

香港号称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要看中央脸色，看“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而决定行止。山西没有一点自治权，而且就在天子犂侧，当地官员敢在整个事件中敢不看中央脸色吗？显然，这个黑窑，不，应该叫红窑，就像当年延安种鸦片一样，也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呢。笑蜀兄千万不要小觑则个。

笑蜀：所幸，毕竟是朗朗乾坤，那样的人类毒瘤不可能永远逍遥于舆论的阳光之外，那些令人震撼的黑幕，终于大白。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这固然是不幸中之万幸，但是这还不够。如前所述，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这不是普通的法律事件，这在本质上是一场叛乱，这场叛乱威胁着我们的公共安全，威胁着我们的社会秩序，威胁着整个的文明世界！对这样的紧急事态，必须运用雷霆之手段，予以迅速处置！

武宜三：涉嫌黑工、童工的砖窑、煤矿遍布山西各地，其它省如广东、云南也有，为时数年。最新消息是：丢失的孩子有几千人，多位家长结成的“寻亲联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有上海、四川、河北、安徽、山东的，还有来自新疆的。

批示表演？又热热闹闹开锣了：

胡锦涛批、温家宝批、吴官正批、李长春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批；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来批；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批、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批；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批；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山西省公安厅公安厅厅长杜玉林批，山西省公安厅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批；

你批、我批批、大家都批批批！

但是，从中共总书记到洪洞县太爷的批示，虽然有几百几十张，但赶不上一张擦

屁股的手纸顶用。山西各地的公安派出所和警察根本不尿他那一壶。

这不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是双簧戏。君不见，一面说尊重《宪法》，一面把陈光诚关进牢里；一面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一面又堵李昌玉的嘴……

笑蜀：换句话说，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对于所有后台老板，即便他们躲到九霄云外，即便他们老到风烛残年，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该进监狱的进监狱，该上绞架的上绞架，一个也不宽恕！

武宜三：我们贵国的暴力有的是，但那是用来对付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拆迁市民、闹事学生、上访冤民的，岂可用来对付亲爱的窑主、矿主。

笑蜀：国家的职责是什么？国家的职责主要就是保境安民，就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和基本尊严！为了每一个家庭的欢聚，为了每一个孩子的欢颜，国家机器的铁拳应该朝着黑窑高高举起，把它们砸成粉碎！

武宜三：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我们伪国家五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祸国殃民、是破坏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做人尊严！拆散美满夫妻、摧毁幸福家庭，最新例子是把师涛关起来，再逼他新婚三个月的妻子离婚！为了孩子的文盲、穷困、痛苦、愚昧而努力破坏[教育](#)，这只要看看遍佈各地的金碧辉煌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和破烂的中小学校舍，看看农村几千万儿童的失学、流浪和当血泪童工。

山西黑窑童工事件是国家犯罪，是执政党违宪、失职！

最后声明：笑蜀先生对本对谈及武宜三先生言论不负任何责任。

## 周恩来是日本人的好总理

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毛泽东、周恩来导演下，对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犯有各种罪行的日本战争犯罪的起诉和判决，完全是一场卖国、媚日的丑剧。

以下是李甫山《我参与侦讯日本战犯始末》中的一段话：

总理说：日本战败投降已有8年了……（武宜三按：日本战犯关了8年，周恩来同志就心疼了，而右派分子——到周恩来死那年，关了20年，可是他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周总理听了汇报后说：计划还得当，但关于经费的预算，你们再考虑一下。是否组织战犯和汉奸出狱到一些地方去参观，（武宜三按：右派分子就没有这个福气！）以接受社会现实的教育。这样的话，预算恐怕就不够了。周总理还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这些战犯的罪行比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要轻一些。（武宜三按：还没有开庭，就宣判。）对这一千多名战犯，我们不需一一审判，但要把他们所犯的罪行搞清楚。侦讯结束后，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武宜三按：对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不判死刑，却把老老实实的中国人杀了几千万——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林昭等8人……）”

周总理还指出：这些战犯在日本社会有不少的联系和影响。他们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而他们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有的也是家破人亡。（武宜三按：周恩来的心肠多好，可是，就是这个周恩来却独自或合伙制造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在侦讯工作中，通过耐心地争取教育，他们也可能改造成为反对侵略战争与争取和平的朋友。（武宜三按：可许多右派分子本来就是你的同志、战友和朋友。）

领会周总理的指示后，我在侦讯工作预算中增加了组织战犯与汉奸出狱参观、接受社会现实教育所需的经费。后经周总理批准于1954年2月起，由公安、检察及民政系统联合组织实施。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为了将周总理的指示及中央关于“惩办少数，宽释多数”（武宜三按：对右派分子却是“惩办绝大多数，宽释极少数”）的政策精神，贯彻到每位侦讯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中，高检在侦讯开始之前组办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班。

接下来，就是花费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演出了一场欺骗中国人民、讨好日本人的汉奸丑剧——宽待和释放全部日本罪犯。

参加“侦讯日本战犯”的两个假戏真做的主要角色：贾潜（最高人民法院庭长）、

李甫山(最高人民检察院二厅厅长),后来都成了右派分子,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个卖国贼还真替日本战犯报了仇。

-----

1949年后,1062名日本战犯中,1017名分批释放,只有40名罪行严重的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无一死刑。

国民党242名参加抗战的高级将领留在大陆的全被处决,其中有抗日名将,民族英雄。242名民国高级将领,其中上将与辛亥元老5名、中将78名、少将159名。

山西黑砖窑、人民公社、劳改农场、血汗工厂和北京奥运会，都是一脉相承论

【导语：山西黑砖窑案已经平安落幕了，张宝顺、于幼军，不但不须负包庇、纵容、渎职的罪责，还把自己打扮得一脸英明、一身正确。正如张三一言先生所说：我们那个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私有国，是奴隶国。是用民主、共和、国家、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等几乎所有道德与政治社会学正面词语一层又一层地密遮着它的污秽、罪恶、羞耻；又用它亮丽地把奴隶制国家包装成为人民共和国。山西奴隶砖窑，是这个奴隶国的具体和典型的体现。当然，它又不是孤立的，它与人民公社、劳改农场、血汗工厂以及北京奥运会都是一脉相承。】

### (一)山西黑砖窑案平安落幕了

山西黑砖窑案已经平安落幕了。这起惨绝人寰、天人共愤的反人类罪案，虽然惩处了 95 人，看起浩浩荡荡、阵容鼎盛，实际上全是以乡村一级虾兵蟹卒来充数或当替死鬼的；县一级也只有第二把手、洪洞县的县长宋延龄受处分，而且仅是免除职务。被采取司法措施的 6 人，全是广胜寺镇的工作人员。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当家的。只要有屁大点的“好事”，都忘不了“这是党英明领导的结果”，那怕到香港上个市、“招商引资”，签个意向书、合同什么的，也都是中共的省、市、区、县、镇的委员会书记挂帅带队。不信，请查查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上的大幅广告，凡是外出捞好处的活动，十居八九都是当地中共第一把手抢着出风头。但偏偏做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党委书记可以置身事外。至于省里、部里的官员更是“刑不上大夫”，事虽关己，仍能逍遥法外。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山西省长于幼军，不但不须负渎职、包庇、纵容的罪责，还居然当起“法官”来，把自己打扮得一脸英明、一身正确。

### (二)党国头目以“批示”欺世

山西黑窑事件张扬出来后，党国大小头目一直在那里搞“批示”欺世，开展新一轮的愚民运动，什么“震惊”呀，“高度重视”呀，“严肃处理”呀，装出一副天真无邪、如梦初醒的模样。殊不知这一类令作呕的表演搞得太多了，反而暴露了这伙人民公敌的残暴、贪婪、嗜血、无耻、昏聩、无能的真面目。只要是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明白，中共这个非法的、丧尽天良的流氓政权才是这一切罪恶的总根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三权分立不容讨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大于法、“稳定压倒一切”、GDP 挂帅、消灭新闻自由、破坏教育、迫害异见分子……几十年来的这一类倒行逆施，导致今日中国政治的日益糜烂，中国大地的罪恶丛生。山西黑窑是新生事物吗？原来不是。五年前，山西省万荣县六母村曾因使用河南籍童工被罚 14 万多元。五年后



的现在，《南方周末》记者在六毋村又发现，这里的六十余家瓦窑厂仍有童工，仅记者视野所及便不下 20 个。据曾三次赴山西采访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披露，在山西运城和晋城一带，这类窑厂至少有一千家以上，童工、黑工更不在少数。但他们都到哪儿去了？那一千多个失踪儿童都哪里去了？显然，在警方清理前，他们被连夜转移，甚至被杀人灭口了。到底有多少人被活埋，多少人被扔进搅拌器，多少人被封在小煤窑里？在铁桶般的山西乃至新中国，这都已经成了党国最高机密，永远没有人知道了。九年前的 1998 年 5 月，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的陈建教就已在山西省榆次和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西娅的黑砖窑解救出数百名“包身工”；工人们入黑厂后日夜干苦工，不准出厂、转厂，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并有 8 名打手日夜看守，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一名 15 岁的童工忍受不了折磨，逃跑 3 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有个老民工被贩卖 3 次，民工编了号，叫号不叫姓名；还有十几名弱智民工，不知自己姓名、来自何方；至于工资，砖厂根本没有打算给。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象山西、河北这样的黑砖窑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于是陈建教在 2006 年就上书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然而，这个动不动就掉眼泪的伪君子，仍然以“批示”来买空卖空，明明知道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明明“知道问题的根源何在，但就是不愿从根子上去解决”。以致使奴隶制在中国全面复辟，中国人民继续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挣扎。

### (三)大跃进时代的奴工

而几亿新中国的农民集体成为奴隶，可以认为是从高举三面红旗的时代开始。李锐先生在《大跃进亲历记》中记载：河北省徐水县由 480 名妇女“奋战”三昼夜，修成了一座一万三千立方米的“妇女水库”。七百名学生加四十名教员“苦干”一天，就建成了一万五千立方米的“红领巾水库”。这是以前的奴隶能做得到的事吗？当时的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就有办法叫他的奴隶们做到。奴隶总管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来收拾不听话的奴隶们。抓人、打人、服苦役是家常便饭。1958 年一年中，张国忠在三十一万人口的徐水县内，就抓了四千六百四十三人，其中一百九十人是生产队干部和中共党员，其余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许多人在他的劳改队中被折磨致死。大饥荒暴发时，徐水县有大批人被饿死，许多人要外逃讨饭渡荒，可是中共徐水县委却派人在各车站堵截，结果许多农民就在堆满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粮食的国家粮仓旁边活活饿死。当年任河南信阳地区专员的张树藩后来承认，到 1960 年 2 月为止，信阳地区有三十万以上的农民饿死。而全新中国则有四千万人被饿死，其中绝大多数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李锐被发配北大荒劳改时，亲眼看到村干部深更半夜突击性地挨家挨户，到农民家里搜查、抢夺粮食。东北的老头在向李锐诉苦时，“无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年喂牲口的东西也比现在好得多，真是人不如畜。”（《大跃进亲历记》）这种强盗式的公然抢劫，在大陆广大农村，随处可见。乡村干部向农

民征收苛捐杂税，一直是用这种办法。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陈桂棣夫妇《中国农民调查》中都有大量记载。现在，与时俱进，早已动用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征用”农民的土地和城市居地的房屋了。

#### (四)劳改农场里的奴工

更早些的奴隶，是劳改农场里的右派分子。甘肃省酒泉县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其中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坏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六十八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七十八人……但到了1961年所谓要“抢救生命”的时候，被抢救出来的只有六百来人了，而这些人在抢救过程中又死掉了不少。这样的杀人农场，甘肃省还有酒泉安西农场、酒泉边湾农场、饮马农场、小宛农场、酒泉十工农场、酒泉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敦煌棉花农场、玉门黄花农场、下河清农场、丁家坝农场、长城农场、新华农场等十四处之多；全中国更不计其数，黑龙江八五〇农场、北京市团河农场、四川四一五筑路队、新疆塔克拉玛干农场、马宗山煤矿、河南省万胜山林茶场、安徽省白茅岭农场……数以百千计的“右派屠场”遍布国中，不，整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新中国就是一座阶级灭绝的炼狱、就是一部滥杀无辜的搅肉机。黑龙江云山畜牧场新领导，经常拿着小镰刀在右派分子的身后和左右指指画画地进行“督战”。他们和朱麻子、尹队长等人一样，他们的口头禅是：“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北大荒的季节是春季来得晚，冬季来得早。每当7月底8月初抢收麦子的时候，才是它的“霉雨”季节。一天，又一场大雨滂沱。马车送来了午饭，武副书记和张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饭，强迫大家在雨中光着脊梁弯着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连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从两点钟起床吃罢早饭下地，干到中午12点已干了9个小时了。而他们自己，则穿着从日本进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还打着伞，空站着挥舞着小镰刀，对我们大嚷大叫：“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地里！”听了这种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很多难友怒火中烧。人人不是枯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结果直到下午一点多，才让右派分子吃午饭，吃完饭又接着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让收工回住地吃晚饭。右派们两点起床吃早饭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个小时。而且早饭与午饭、午饭与晚饭之间的各九个多小时，都不得不停地干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资本主义还要冷酷。（戴煌：《九死一生》）由于寒冷、饥饿、疾病、超强度苦役，加上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的虐待、迫害，劳改农场开始大量死人。作家郑加真在《北大荒移民录》一书中，也说到困难时期农场职工死亡情况：“有的职工死在山上，个别死在路上，不知因何而死，更不知死者为何人？死后善后工作也未很好处理。857农场有的职工死了40余日，尸体还停放在陈尸室内无人过问……死者有的

无棺材，用席子卷埋。”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和公安部始终都没有公布过。但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是啊，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这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度尤其如此。（戴煌：《九死一生》）

### （五）锦西煤矿劳改队，一千二百人饿死了一千人

曾慧燕小姐在纪念她父亲的《悲欢离合三十年》中说：“塞外的隆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在营房里，虽有热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时开始，都要外出劳动(十)四五个钟头。人们开始百病丛生，先是感冒，继而肺病、心脏病接踵而来。最可怕的是冻僵病，脚趾一冻伤，就要钳掉。幸运的，即使医好也变成残废；不幸的，染上破伤风，便要向阎罗王报到了。知识分子怎经得起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疾病侵袭，父亲的身体不到三个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晕倒，醒来才发觉躺在病床上……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来，同来的人中，死掉的已约有六分之一。”

辽宁省的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1,200名右派、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还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四川省“415”筑路支队，这个拥有五千名右派分子的劳改队，在“文革”前忽然解散时，大约不足一半的人活着回到了社会；二千多名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著名右派分子铁流先生是少数的生还者之一。直至今日，他仍怵目惊心、心有余悸，常有恶梦相伴。（《铁流文集》）正是这个铁流先生，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北京潘家园发现了一份《一九五八年中央各部和军委各部送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名单》，这份名单中的一千个才华卓著的青年俊杰，一千条活鲜鲜的生命，他们都把美丽的青春消耗在飞雪茫茫的北大荒，甚至许多人在那里断送了生命。

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面对黄海，1957年由上海市、江苏省公安、司法部门创办管理，占地20多万亩，有10多个水产、农副产品加工厂。这里原来是一片海水

冲积的盐土和沼泽地，当年是由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等省的右派分子开发的。高峰时有 4 万多名右派分子在这里劳动改造。2005 年一月还发生了一万多人的集体大暴动，造成五百人伤亡，有一千一百多服刑人员外逃。可见劳改农场的残酷、黑暗，也在与日俱进；逼得奴隶也只有揭竿而起了。

## (六)全国到底有多少劳改农场

现在再看黑龙江省，从 1950—1960 年 10 年间，就建了 38 个劳改农场：梧桐河农场、密山劳改管教大队(沈阳市密山农场)、青山农场(黑龙江省第九劳改管教队)、笔架山农场、香兰农场，后来又把梧桐河农场二分场扩建成鹤立河劳改农场。1955 年 8 月和 1956 年 4 月，经周恩来批准，北京市先后在密山县建立兴凯湖农场，在甘南县建立音河农场。当年为了安置浙江、辽宁两省的大部分罪犯，又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德都、嫩江、北安等县新建了 23 个劳改农场；开荒 100 万亩。同年 9 月又建七星泡劳改农场，1956 年开荒 27,2 万亩，播种 12,8 万亩。那年创建的较大型的劳改农场还有龙门、格球山、门鲁河、科洛河、尾山、引龙河、襄河等。当年开荒均在 20 万亩以上。1956—1960 年，全省又陆续创建永丰、依安、莲江口、北安、长水河等劳改农场，使黑龙江全省劳改农场总数达 38 个。兴凯湖、密山、音河、七星泡、山河、嫩北、花园、福安、龙镇、华山、永丰、长水河、襄河、莲江口、依安、老莱、海伦、绥棱、岔林河、泰来、凤凰山等都是当年受难者闻名丧胆的地方，是多少受难者家属的苦难记忆。至于全新中国到底有多少劳改农场？恐怕也是永远算不清了。劳改农场开垦了这么多的土地，种了这么多的粮食，然而，开垦、劳动的奴隶——右派分子们却活活地被饿死了。正如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然而却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奴隶队伍。据统计，眼下主宰新中国命运的 0.4%的奴隶主家庭占有了全中国 70%的财富，所以新中国的奴隶队伍只好要不断地壮大。

## (七)世界工厂是血泪工场

广东省东莞市法定最低工资为 574 元(人民币，下同)，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的调查：有的工厂底薪只有 330 元。旺季时每月加班工时超过 120 小时，每天工作 12—13 小时，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远超法律所规定；而且加班工时也得不到法定的补偿。节假日不许休息，连生病也不让请假，即使如此，每月也不过 600—1,000 元。淡季则被迫放无薪假，每月只有 300—400 元的收入，难以维持最低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工厂扣压工人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数量由两星期至一个多月不等，工人要辞工，即使按法律规定提前一个月通知厂方，也要受刁难、得不到批准，特别是生产旺季；工人要离开就得放弃被扣压的工资，工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完全被剥夺。大部份电子业工厂只与工人签订一至三个月短期合约，短期合约同时成为工厂逃避给工人福利和向工人负责的工具，如女工怀孕假、

产假等；工人没有安全感，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很多工厂都不为工人购买保险，或只少买。珠三角工人都面对严重不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毒化学物、金属粉尘、焊接烟雾、噪音、缺乏良好通风等，严重影响健康，职业病十分严重。大部份工厂没有为工人提供职业安全训练，没有提供保护用品。如冲压工人没有配戴护耳；金属打磨工人，没有面罩；压制机械亦缺乏保护装置；绝大多数职业病、工业事故伤亡，在官商勾结之下，都得不到赔偿或赔偿不足。（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墙报）珠三角等地关于工人集体被烧死、集体食物中毒，工人被打死、被打伤、被虐待、被逼下跪，劳资纠纷、工人罢工，都时有所闻；但在稳定压倒一切、金钱决定一切的黑社会主义新中国里，很快也消声匿迹了。

### （八）新中国的国粹：奥运奴隶

中国除了盛产农业奴隶和工业奴隶之外，还盛产名为“体育明星”的奥运奴隶。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现在正是奥运奴隶加紧魔鬼式训练、加码受罪的时候；但等他或她们拿到金牌，为党国领导人争了光之后，他或她就当垃圾扔掉了；1990年赢得48公斤级全国举重冠军的邹春兰，19岁那年又囊括了另外的四枚全国冠军头衔，但当她于1993年退役后，在举重队厨房干了三年多粗活，最后被要求离开。因为手无寸技、胸无点墨、身材畸型，连生育能也损失了；所以，她只能在工地上搬砖、在大街上卖羊肉串、在公共澡堂当女按摩师。他或她们除了成为货真价实的劣等奴隶被抛弃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据《中国体育报（China Sports Daily）》报导，中国近三十万退役运动员中，近80%在失业、受伤或贫困挣扎。许多运动员受到训练引致的运动损伤和健康问题的折磨。

还有，别忘了杂技奴隶和特种兵奴隶，在爱护动物团体要求取消马戏团以免动物受虐待的今天，河南、河北、江苏等所谓“杂技之乡”正有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以及为了保护权贵们的特种兵战士，正受着非人的折磨。这篇文章写了好几天，今天恰巧看到古德明先生也在谈杂技问题。古先生说：为了娱乐胡锦涛三分钟，几十个孩子辛苦排练了一个月高风险、高难度的“空中飞人”。排练中有多少孩子跌伤或跌死，没人知道；但知道，这些孩子为了排练和到处演出，是不用读书了。（《杂技里的国民教育》，〈苹果日报〉）唐文宗当年做皇帝时，只有十八岁，见到“迭踏以至半空”的百戏，尚有“恶其太险伤神”的不忍之心，“遂不复作”，不让再表演了。然而，65岁的胡锦涛却看得兴高采烈、欣然鼓掌。“上以风化下”，黑砖窑、黑煤矿、黑工厂、黑农场、黑戏班、黑兵种、黑狱遍布域中，自是顺理成章，不值得国人或“友邦诧异”了。

最后我想用张三一言先生的话来做我这篇文章的结束语：我们那个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私有国，是奴隶国。是用民主、共和、国家、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等几乎所有道德与政治社会学正

面词语一层又一层地密遮着它的污秽、罪恶、羞耻；又用它亮丽地把奴隶制国家包装成为人民共和国。山西奴隶砖窑，是这个奴隶国的具体和典型的体现，只是表现得太真实和赤裸裸而已。（《包装的奴隶国和赤裸的奴隶窑》）（首发《民主中国》）

## 比较史学：胡锦涛与朱由检

以前看吴晗的《朱元璋传》，对朱元璋的阴险毒辣、卑鄙下流、刻薄寡恩、恩将仇报、忘恩负义、杀戮功臣、大兴文字狱、大搞冤假错案等种种恶行恨得直咬牙；后来读了《毛泽东传》，赫然又是一个朱元璋，连打江山的手法也相似，朱不打蒙古人专打陈友谅们；毛也不打日本专打蒋介石。毛出于朱而更胜于朱，所以毛太祖高皇帝也很看不起朱太祖高皇帝，他宁可歌颂非我族类的成吉思汗，也不对同文同种的朱元璋稍假词(《沁园春》)色。

朱懿文太子早死，毛太子岸英亦英年殁于朝鲜防空洞。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把建文帝赶下台，本朝第二代核心邓成祖也把华惠帝废了。朱祁镇搞夺门之变把权从祁钰手里抢回来，本朝的邓正统或叫邓天顺同样发动生活会之变、天安门之变把胡景泰、赵景泰弄下去。明朝有不务正业的武宗皇帝，我朝也有唱拉吹弹扮小丑的第三代。何其相似乃尔？这叫历史有惊人的相似。

但更惊人的竟是今上与朱由检先生如出一辙，朱由检庙号“思宗”，今上锦涛同志则刚坐正屁股就“思宗”起来，忙不迭的去西柏坡、延安、井冈山、毛太庙胡想乱思一气。不但思毛高祖、邓太宗，还思胡中宗。不但思土宗，还思洋宗，在民生凋敝、教育贫血的时候投巨资搞什么劳什子马列主义工程。

读读李化鳞写的檄文：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公府，朝庭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竖悉齷糠，犬豕而借为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痛。

说的不就是眼下的光景吗？

今日苛捐杂税，农民不堪负荷；暴力征地、野蛮拆迁、强行下岗，以致去年估计有超过十万起的群体抗争事件，教育、医疗、房产成了中国人民头上新的三座大山；本朝与崇祯朝的均输、间架、新饷、边饷，其日日增，吏因缘为奸，以致逼民从贼，流寇蜂起，还有什么两样？

结论：中共王朝是朱明王朝变种，锦涛朝即“非典型崇祯朝”，非典型比典型更加棘手，“沙土”一疫已作证明。既然朱明亡于崇祯，那么中共王朝还拖得过第四代么？（首发《动向》2006年1月号）

（跋：这是我2006年的预测，看来我这个“业余算命家”的确是“业余”。但是，世事难料，虽然胡锦涛已经把就要爆炸的炸弹交给了习近平，但是，如果胡锦涛够命长的话，说不定宋徽宗、宋钦宗的命运还等着他们呢。2013.3.16）



海边得顺口溜二首，录送小乔指正  
武宜三

(一)

待字閨中有小乔  
英氣常使男儿羞  
谈文说道酒香在  
忘年相知真朋友

(二)

久慕俠女出徽中  
初见如沐海上风  
金杯美酒為谁醉  
要替民主做苦工

2009.4.28

## 武宜三：《中共到底掠夺了民族资本家多少财富？》

引言：本文以陈祖沛、荣毅仁、卢作孚、康心如等几个民族资本家为例子，从发家，到上共产党贼船；以大量事实证明从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本家资产在不断被折腾、被压缩、被掠夺；最后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意识的工人群众监督下，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被评为 24.1864 亿元，不及实际的十分之一。即使以此为基数，从 1966 年到 2006 的 40 年中，中共反动派便起码侵吞了民族资本家 36 千亿元以上的利息，遑论本钱被剥夺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伤害、迫害和杀害所带来的损失。

### （一）从陈祖沛看民族资本家是怎样发财？

陈祖沛 1916 年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让 15 岁的陈祖沛战胜众多竞争对手，做成一笔大生意；从此有了善于做买卖的美名，在商场上崭露头角。虽然如此，从 1929 年到 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仍数度失业。

1935 年世界经济复苏，陈祖沛为在广州的四家商号：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当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飞腾汽车公司营业主任；再兼光成行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几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时间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 9,000 元的两倍多。

1938 年，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再回广州。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以小洋 600 元作为股本在广州创办大成行。一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东南业一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所有工商企业都陷入困境时，陈祖沛把家乡新会著名土特产葵扇运到上海，获利过倍。大成行的资产，一下子从折值港币 10 多万元增加到 30 万元。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陈祖沛马上在香港设立大成分行，随即把总行从广州迁到香港，从此鸿图大展。资本家赚钱，除了本身聪敏、勤奋

之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岂是共产党的“剥削”二字所能尽道。

## （二）资本家做了共产党私家金库

陈祖沛因爱读《世界知识》杂志，而与其作者之一刘思慕相识，而刘思慕恰巧又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刘思慕早年留学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受共产国际派遣潜入国民政府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陈祖沛通过刘思慕又认识了许涤新、黄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汉夫、黄长水、费彝民、陈君冷等所谓民主人士、学者、工商界人士，并结为好友。

《华商报》复刊之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的复刊经费，原是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但有很大困难；在刘思慕动员下，陈祖沛立刻认捐港币 500 元，又替大成行捐 1,000 元，还动员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 100 元，又用订报的办法支持《华商报》。

为配合共军攻势，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陈祖沛捐助开办费 1 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 5,000 元。陈祖沛还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共军等等。1946 至 1951 年，陈祖沛捐献给中共的款项达 10 万多港元。

## （三）上了贼船，好心没好报

1948 年 10 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共军接管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准备工作。陈祖沛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三千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为中共解了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之经济困境。

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陈祖沛满载货物货轮上，秘密地回到中国去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把这一班人送上贼船的陈祖沛，最后也自投罗网。1950 年，陈祖沛随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的香港澳门工商界参观团回东北观光，走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之后，把资金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但后来名声很大的马万祺当时任副团长，便不上这个当，于是天壤立判、成败殊途矣。

噩梦开始了。1952 年五反运动一展开，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补税款”旧人民币 200 亿元；即使倾国内各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最后由香港分行汇 100 万港元回来凑足 200 亿元，才得脱身。

此外汉口的大成分行也是当地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中的残忍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但陈祖沛对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仍有信心；不料到

1957年又在劫難逃，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的陈祖沛，被戴上了“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划为右派分子。

1982年，陈祖沛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廖承志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党对不起你。”陈祖沛竟感动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一句轻轻巧巧的、一文钱不值的废话，便赚得陈祖沛一壳眼泪，把几十年的冤屈、羞辱、苦难，还有被剥夺掉的、数以亿万计的巨额财产，都烟消云散，一笔勾销，还说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陈乃良《商界奇人陈祖沛》、金陵《陈祖沛同志生平》等)

上了贼船，又跳出贼船的也有；其中最具传奇的莫如让陈祖沛送上了贼船的马思聪。1966年8月，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贼们打得遍体鳞伤、满脸鲜血，妻子儿女也受尽侮辱，便愤然决定全家逃往香港。为此，一家逃亡、几家受连坐，二哥马思武于1969年被迫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二嫂(法国人)于1976年忧郁而死；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严重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她才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12年徒刑、一个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恒、王友刚，王友刚之妻何琼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马思聪的一生》)一人上贼船，几家遭殃；这就是跟共产党跑的下场。

#### (四) “汉奸”、“右派”又变回“同志”和“奇才”

中共怎样迫害他们的恩人和追随者呢？1957年9月20日《大公报》有一篇文章《广东工商界揭发批判陈祖沛右派集团》，留下了很完整的纪录。为了打倒陈祖沛，中共为他罗织了一个人员遍布广东省、广州市、湛江市、韶关市、海口市的庞大集团，仅核心人物便有何信泉、林天帆、王伯雄等15人之多；把陈祖沛和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民建副主委毕鸣岐一起打成是章乃器的“两翼”：“为章乃器占领阵地、建立据点，为章乃器推销私货、抗拒改造，专找缺点、向党进攻”；是“章乃器在广东代理人”。

中共完全抹煞陈祖沛过去对它的慷慨帮助和奉献，居然揭发出“陈祖沛有一页罪恶的发家史，原是经济汉奸。”和日本“丸一洋行”、“台湾河”做生意成了“勾勾搭搭”，到泰国收购粮食成了罪状；把资金调回中国是为了“图利”、“牟取暴利”；“爱国”、“拥护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成了“谎言”。中共对陈祖沛进行了“历时十二天、包括七百多人的广东省民建和工商联的委员扩大联席会议”的残酷斗争、“穷追猛打”，逼得陈祖沛跳楼自杀，虽然未死、却跌跛了一条腿；随即革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等一系列职务，定为右派分子。

由于当局仍着眼于香港、海外大资本家，还给保留了一顶叫“政协委员”的帽子。不过现在，陈祖沛行情又看涨了；为了给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后代的“先富起来”鸣锣开道、树立样板，共产党把当年的“右派”、“汉奸”又吹捧成“同志”和“奇才”、一片溢美之声了。(陈乃良《商界奇人陈祖沛》、金陵《陈祖沛同志生平》等)

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中共本身就是一个汉奸组织，从王明到周恩来，从

毛泽东到江泽民，都是如假包换的卖国贼。

### (五) 陈祖沛命大活下来了，卢作孚却死了

三五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杀死，至今没有公布；在人命不值钱的伟大祖国里，没有人会关心这个数字；不把人(这“人”不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本人及其亲属子女，他们不但是人，而且命还特别珍贵；比如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摔伤了，邓小平就把聂元梓重判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当人的伟光正的党妈妈，也不会去理睬这个数字。

当时任上海市长、主持上海市三五反斗争运动的陈毅同志后来说，“全市共自杀 500 余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死了这么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据说爱民如子、爱和资本家交朋友的陈毅市长可有恻隐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没有！陈毅市长不但不同情、不设法阻止，反而幸灾乐祸；你听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何等轻佻，何等俏皮，何等幽默，何等开心。这样，刚刚为“抗美援朝”捐献过飞机大炮、刚刚上马路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只好继续当“空降部队”了。

共产党从江西时代起，就是以“打土豪”为旗号，先杀地主、富农、大商家，再杀贫下中农、小商人、手工业者，然后抢其“浮财”、共其产以充军饷。现在为苏联人、朝鲜人而和美国人开战，只好再一次杀鸡取卵，从资本家身上榨油水了。只好学李自成、刘宗敏在北京设“比饷镇抚司”的办法，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甲申核真略》)，制作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甲申纪事》)，“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明季北略》)，死者有一千六百余人(谈迁《枣林杂俎》)，“杀人无虚日。”(《甲申传信录》)

让郭沫若写过《甲申三百年祭》的毛泽东，当然比李自成高明一些；毛泽东虽也是“杀人无虚日”，但他却不让你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毛泽东也不说他没钱要问你要，而是说你有罪，你必须把财产交出来。拷夹(批斗)、严比之下，你就要乖乖交出财产，如果没有，便只好自杀。即使要自杀，还不可以跳江、坠海，否则尸体让水冲走了，亲属就要受牵连；所以，三五反时上海市及全国各地的资本家如不肯表演“空降部队”，那就要像卢作孚那样吃安眠药了。

### (六) 夺其财，又杀其人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一代船王；卢作孚不仅是实业家，还是思想家；他是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家、实践者，也是北碚新城及其经济特区和文明小区的策划者和创建者，更是西部科学院的缔造者和首任院长。卢作孚是实干家，也是理想主义者。但这样的一个人，却不容于他曾向往、并寄以希望的“新中国”。

1950 年冬至 1951 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干部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萧怀柱等被枪决，郭经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陈国光、刘子国、周雁翔被清洗，钱乔被捕出狱后自杀。而且朱树屏交代的民生内部特务

组织和反动团体竟有五六十个之多。(李肇基：《卢作孚之死》)

这些都是共产党、毛泽东为巩固权力、为掠夺财富而制造红色恐怖，滥杀无辜的冤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对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难以接受的；卢作孚当晚便自尽了。

卢作孚给妻子留下“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遗书的同时，更为“新中国”在海外保存了两千余万美元的资产，加上在大陆的资产，折成时价，当是天字数字了。但是，可爱的党把他的资产“国营”了，又把他的人杀了。现在到处把“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当作逸趣美谈，真不知是何心肝？

毛泽东听到卢作孚自杀消息时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是冷血的风凉话。卢作孚不死，等着他的除了是反右斗争、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还会有什么呢？与卢作孚一样的工商界头面人物，如重庆康心如，上海李康年、荣毅仁，天津毕鸣岐、董少臣，北京市吴金萃，江苏省钱孙卿、钱钟汉，广东省的陈祖沛等人的屈辱、悲惨下场都可以证明。

### (七) “改造”就是消灭、掠夺、抢劫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是要赶尽杀绝的。1952年9月，就已经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消灭私人资本了。为了利用税制扼杀私人资本，毛泽东把薄一波说成是被资产阶级“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一个靶子，首次将属于经济工作范畴的问题扩大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1953年，毛公开、正式地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改造，就是消灭、就是公然掠夺、就是公开抢劫代名词。

1956年1月，北京市连续几日夜锣鼓、爆竹声不断，到处张灯结彩，到处是庆祝公私合营的游行队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营工商企业户，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1月15日，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红旗飘扬，鼓乐喧天；戴着眼镜的、胖胖的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递上公私合营的喜报，喜报由毛泽东身边的彭真双手接过，毛泽东脸上全是笑容，毛泽东身旁的周恩来、刘少奇也是满面春风。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乐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板、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他不但带头把身家、产业、秘方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共产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很积极。6月15日，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两个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乐松生第一个发言，批判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只是他忘记了说，他本人也受到章乃器的迷惑，四个星期以前即5月16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

也说过“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私方交出企业后 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人民日报》5月17日）

九年后，乐松生终于被清算，大栅栏同仁堂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毁于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游街以后自杀了。还有人看到像他老母亲的一位老太太被关在笼子里受尽凌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惨地死去了。

### （八）荣毅仁是漏网大右派

和乐松生一样的还有上海市荣毅仁，1954年也向政府提出将企业公私合营的要求，所以也有“红色资本家”的美称。但周恩来的一席话却把荣毅仁的两面派揭露无遗，周恩来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可见，荣毅仁后来说的“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云云，实在是骗人的鬼话。

1957年，荣毅仁被揭发和盛康年等人搞反党小集团，大肆反攻倒算。据民建上海市常委、“临阵起义”的严谔声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检举：以荣毅仁、盛康年为首的“荣盛反党小集团”成员有：经叔平、严谔声、刘念义、胡子婴、吴中一、唐志尧、吴志超、蒋伯笙、蒋和盛、吴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荣鸿仁、王嘉元、简日林、韩志明、汪君良、雷平一、王懋德、车懋章、孙善章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广，涉及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联、上海市民建会、上海市政协等单位，遍布税务、财政、劳资、社会主义改造办等部门，“用钻进去、拉出来等手段向共产党、无产阶级发起猖狂的进攻。而汉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正是这个小集团的黑后台。”（新华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电）

“他们拉帮结派，密谋策划，在工商联和民建中排挤左派、打击积极分子；他们同情和支持章乃器”；荣毅仁更借“四明堂事件”煽风点火，“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作《要发扬民主必须维护法纪》的发言，把事情闹大，藉以攻击公方代表、攻击无产阶级、攻击共产党”，于是被左派们抓住不放；甚至希望能加入共产党，也被说成“不自量力，异想天开，想当恩格斯”。正当他们即陷于灭顶之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他们抛出了一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说了，你们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检查。”三人即为荣毅仁、盛丕华、向德（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向德最终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划为右派分子；对于向德，荣毅仁则较幸运。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孙更舵（中共党员）、市工商联副主任杜大公（中共党员、民



建抓整风反右的领导人)奉命出面保他,李维汉也派民建中央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孙晓村到上海救火。所以,荣毅仁对毛泽东真是感激涕零呀!

盛丕华是上海市副市长、资本家,他虽然过关了,但他的儿子盛康年却因附和康年的定息 20 年不变被揪住;盛康年在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盛康年先后写了十一次书面交代,大概也由于乃父的“面子”才得勉强过关;但“荣盛小集团”的黑锅却一直背着,以至终生闷闷不乐,于 1965 年患食道癌去世,年仅 51 岁。(计泓赓《荣毅仁与“荣盛小集团”的平反》)

### (九)从荣毅仁看共产党：一个伟大的实用主义的党

1966 年 8 月,章伯钧、章乃器在康同璧家里见面。章伯钧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它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脑震荡的后遗症长期不愈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荣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还是老账、新账被一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断;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并眼底出血,不予及时治疗致左眼失明,军代表仍责成其与经叔平一起打扫卫生,洗刷厕所;太太杨鉴清被打得死去活来,卧床不起;连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

然而,荣毅仁 2005 年 10 月 26 日死掉的时候,又极风光,被吹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是伟大的实用主义者,用得着你就捧你:1957 年,陈毅亲自推荐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60 年,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接着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9 年,邓小平叫他主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让无产阶级革命家家族“先富起来”开路;1985 年,被秘密拉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特别党员”;1993 年,77 岁高龄的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反之,用不着你了,就叫你当右派、反革命,甚至肉体消灭。

### (十)“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

1955 年,公私合营正大步前进,但毛泽东还嫌不够快。10 月 27 日、29 日,两次邀请全国工商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广发追命帖。11 月 1 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主任委员陈叔通借毛泽东讲话,催促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改造;并威胁要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1956 年 1 月,毛泽东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荣毅仁就把自己的产业无偿地交出去了。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洪流之中,私营工商业改造出现了从个别合营进入到全行业合营的高潮;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一些不甘被掠夺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写《祭厂文》,有人写对联“多年心

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以发泄怨恨。

抢了企业、工厂，又把手伸向农村。1958年，毛泽东见到《嵒岬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如获至宝”，亲自定稿：“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两年土改运动没收了富裕农民的七亿亩私人土地、房屋和财产，部份暂时分给了农民。现在江山坐稳，民心无所用了；於是，可以收天下工厂、土地、美女、金钱，为一党一帮一人所私用了。

五反时，陈毅对荣毅仁说：“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些？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是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是真话。”陈毅的“真话”早让毛泽东贪婪和无耻彻底拆穿。

### **(十一) 用你的利息“赎买”你的本钱：与强盗何异**

1950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除了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之外，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的余额。1953年，改为“四马(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和奖金，私营股东)分肥”：前三马占总利润的四分之三或更多，私营业主所得不超过四分之一，即私营股东所得红利从60%降到了25%。

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三条说：“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第九条说：“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但据1955年统计，公股在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比重只为40.6%。1955年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平均每1万元资本额，国家投资1,273元，每63个职工，国家派干部1人。在第四章“盈余分配”中，仍然是“四马分肥”。“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1955年11月以后，又据陈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报告，和《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对资本家采取赎买的办法。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生产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这就是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叫做“定息”。

怎样计算定息呢？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先对资方的资产按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清理，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核定。全国评估的结果，连同1956年以前合营的在内，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一共是24.1864亿元。然后根据股份、利率，每年付给资方固定的利息，这就是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后来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拿十年。(马立诚：《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202万元，几乎占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中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

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占 9,750,100 元，每年可得定息 487,914 元，即每月可得 4 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新华社 1957 年 6 月 8 日上海电）1956 年被定为资本家的、拿定息的大约 86 万人（保育钧：《呼唤理解》）

中国共产党是古今中外第一等无赖，且不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在层层压缩、级级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么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给 5% 年息十年之后，就永远霸占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还美其名曰“赎买”，这与强盗何异？

1976 年后，中央工作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决定落实政策，对于文革时期停付给资本家的定息予以退赔。按照情况退赔了 30 个亿，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是荣毅仁。（陈锦华：《国事忆述》）“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是荣毅仁”，为什么不是荣鸿三？与前面 1957 年 6 月 8 日新华社上海电的说法不同，不知何故？

### （十二）李康年为二十年定息被打成右派分子

李康年，上海市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1957 年 1 月间，他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建议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 22 亿元（减除 1956、1957 年二年定息），于 1958 年 1 月开始发行，分 18 年兑现，每一季度兑现 2,750 万元，每年 11,000 万元，到 1975 年第四季度全部兑讫；完成对资本家的“赎买”，从此全订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

这个以息率 5 厘，20 年收回相当于“老本”的利息后而放弃“老本”的主张，被作为“定息 20 年建议”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等人猛烈批判。李康年反驳说，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 60 岁了，难道我一定活到 80 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提出这个赎买存单年期分 20 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 22 亿元的建议，是根据 1955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千家驹说赎买应自 1949 年算起，这个主张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毛泽东 1956 年 11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 1955 年夏季以来开始的，1955 年夏季以前，至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人民日报》6 月 6 日）可惜这篇四千字的发言，只不过为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材料罢了。（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 （十三）毛泽东也不保荣毅仁：七亿人只有宋庆龄、郭沫若受保护

中共席卷大陆之际，荣毅仁何去何从？家眷早已去了香港，出去就是海外寓公，只是事业必须重头开始；留下又生死难卜。在无锡养老的父亲荣德生请朋友钱钟汉亲赴中共苏北根据地去摸底。钱钟汉在苏北根据地被告知：“转告荣先生，

我们是保护民族资本家的，务必请他留下，建设新中国。”

这个上窜下跳的钱钟汉也算风光过几年，当过民建中委、民建无锡市主委、无锡市副市长；到了1957年，不但自己成了右派分子，连他爸爸、民建中央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钱孙卿也成了右派分子。

至于，荣毅仁留下后“新中国”又如何对待他呢？据章乃器说，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唯一保护的是荣毅仁。但1966年8月20日，荣毅仁的女儿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涌到北太平庄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抢、批、斗、抄；当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钱之光向周恩来特急报告时，周恩来说：“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它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

毛泽东不再保荣毅仁了，周恩来“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当然只是废话。七亿人口只剩下宋庆龄、郭沫若受保护了；天地不仁，竟至于此。荣毅仁当时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落此下场。真是一失足“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而成千古之辱。

那个批判过李康年的左派分子千家驹，后来也吃尽“上了共产党贼船”的苦头，竟然要跑到香山去跳崖自杀。想到1948年，千家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时真是啼笑皆非。当时毛泽东对千家驹“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革命战争都失败了，即使胜利了也变了质，如刘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证农民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会变质”的回答是：“因为时势不同了，中国现在有百分之十的现代工业，有无产阶级，不要看不起这百分之十，这是中国能取得胜利、胜利后不会变质的保证。”（千家驹《自撰年谱》）

谁知中共却有比李自成、刘宗敏更厉害的“比饷镇抚司”：“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 （十四）工商大户和右派大户

说了广东、北京、上海，再说重庆。重庆的康心如是中國西南部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他除经营银行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蜀华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国民印刷公司、重庆利济财团、中国毛纺厂、中国兴业公司、四川绢纺厂、宝丰公司、兴华保险公司、天府公司、德丰公司、同春字号、嘉阳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业公司。（重庆市档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

1940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会议长；他倡议定重庆为陪都，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巨大贡献；他给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不少资助，康家被中共称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中共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出访欧亚十一国途经重庆时，专门去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及其妻子王棣华；周恩来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周恩来在康心远、贺龙等陪同下，一道前往重庆市工商联第四届委员会代表大会会场看望委员们；在见到康心如时，周恩来激动万分地说：“你老了。”然而几个月后，中共却将这个“老朋友”变成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

在民国时代康家是工商大户；到了人民共和国时代，康家却成了右派大户。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国干、康国隼、康国杰、康宏道，再加康心之之女婿甘培根，总数达七人之多；从此康家像新中国的牛鬼蛇神一起，受到歧视，受到摧残，受到迫害。毛泽东、共产党之忘恩负义，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四川美丰银行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1926年变为全华资银行；1935年，仅兴建七层高的美丰大楼便耗资49万余元。1937年，经五年的三次连续增资：资产便由1932年的25万元增至300万元。做为美丰银行主要操办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远个人资本，也随之不断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丰银行个人资本已拥有了60多万之外，还有个人名义在其它企业的投资及不动产，这样累积下来，总计不下100万元。至1948年资本总额为金元券200万元，在上海、南京、长沙、汉口、西安、昆明、贵阳、成都设置分支机构43处；投资达上百家企业公司。（张寿宁《敢为天下先》，重庆市档案局）

1949年11月重庆易手，1950年4月美丰银行宣告停业，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结束（《天涯小区》）。康家到底被共产党共了多少财产，现在连康家后人也不清楚了。但根据美丰银行分支机构之多、投资行业之广泛，房屋等不动产之遍布各地，资产清理工作时间之长，亦可略窥一二。可是当1976年上海市仅对于文革时期停付的定息，便给荣毅仁退赔30个亿时，康家却没拿到一分钱。推而广之，除了还有用处的个别花瓶之外，绝大部份的资本家并不能拿回他们的权益。

**（十五）“国民党四大家族”是陈伯达的造谣，共产党四大家族却是千真万确**

经历过当年公私合营评估资产的老人说，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评为24.1864亿元，是实际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资方资产按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所谓清理：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公方、工人、

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的行业合营委员会最后“核定”。且不说之前之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之类的折腾、敲榨、勒索，只看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的工人群众“监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幾希！

1939年就参加中共革命的老报人、《工人日报》前副总编辑和工人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胡甫臣在读十三大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统计出，毛泽东一生发动的全全国性运动有52次，而每次运动都是对私人财产的剥夺（《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真是至理名言。

当时上海市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有五户，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占975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新华社1957年6月8日上海电）1976年，赔给荣毅仁欠息便是30个亿，以第一名的975万元和第五名500万元平均推算，共产党在十年间欠下资本家的利息便超9千亿元；现在过了40年，不计复息，也不问年息是否合理，中共反动派便起码侵吞了民族资本家36千亿元以上的利息。（丁抒先生2007年11月13日来示：24亿，40年5%利息，应该是6.7乘以24。）

当年中共领导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用国家、用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强迫私人企业、手工作坊主甚至小摊小贩，还有当年地主、富农土地、房产和财产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又全部据为“国有”；文革被抄家的资产（据说价值达2,500多亿人民币，其后归还和赔偿的只有1,300亿）以及千千万万人在历次运动中受劫掠的财产，虽然作为党产可以予取予携，但还保留国有资产的名义。现在，则已经用经济开放改革、转制、私有化等名目，安全地、彻底地装到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子女以及有权力的共产党官员口袋中去了。

於是，他們就在2004年将“保护私人财产”写入《宪法》了。如果国民党“四大家族”是陈伯达造谣的话；那么，共产党的“四大家族”却是千真万确：邓、王、江、李，都是富可敌国。又岂止四大家族？现在有千千万万的吸血鬼在咬住中国人民的脖子。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共产暴政的受害者，都是毛泽东叫化子共产主义、邓小平权贵黑社会主义反动路线的受害者。

1957年1月16日，刘少奇在接见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曾明确地提出：“要讲买卖，必须给公私合营的资产阶级定息。不给定息，资产阶级就要造反了，斗得无产阶级自己也不能解放。从马克思的理论上看，要先解放资产阶级，才能解放工人阶级。不让人家好好地活下去，你能活好吗？”（师东兵《选择突破口》）

刘少奇的话不幸而言中，由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特别是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扼杀了资本主义，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的进程，造就了无法无天的骑在人民头上“为人民服务”的特权利益集团，现在工人阶级得到报应了。当年“不让人家好好地活下去”，如今自己也活得不好了：或下岗失业，或沦为奴隶被更凶恶、更残忍的官商买办所压榨，整个中国变成了血汗工厂、农奴国，退回到了极野蛮、极血腥、极黑暗的奴隶制时代。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的遮羞布也早已抛到垃圾堆里去了。于建嵘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映了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对现实的怨恨：“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保障。”

如果我们工人不再是领导阶级，你们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还是执政党？（胡平《从领导阶级到弱势群体》）奴隶们终于要觉醒，奴隶们在觉醒。

18Oct2007 于酒香书斋〔首发《民主中国》〕cehal1

附

### 宋燕把财产交出来

1956年1月，上海召开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聆听有关领导宣讲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政策。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与会者的穿着依然留有“旧时代”的痕迹，不失雍容与华贵，而她们的脸上却分明流露着对“新时代”的茫然与忐忑。（照片来自新华社）

1956年的上海，如果什么地方传来锣鼓声，那么多半是因为“公私合营”了。这年的木牌销路很好，大家都把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地方国营某某厂”或者“国营某某厂”。

上海的大潮来得算晚的，在这一年的一月15日，2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北京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

所谓“公私合营”，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照1956年高潮时的政策，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



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公私合营后，每年企业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 5% 的定息，作为分红，期限 20 年。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 年 9 月，国家停止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按照现在的观念，等于一夜之间私人股份被收归国有。

上海的“公私合营”是在 1956 年全部完成的，但开始则始于三年前的 1953 年。这一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成为总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资改造”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就是“公私合营”。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向中央的口头报告中提出，“上海是重点，可多搞一些”。“今年进行公私合营工作的重点应在上海，其他地区则可少搞一些。因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中心，对全国影响也大，各地资本家也都是看着上海的，因此，上海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定要稳重，并希望从上海取得一套工作经验。”

1953 年底、1954 年初，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影响下，不少私营工业企业及企业主主动提出自愿合营要求。从 1953 年底到 1954 年 3 月 15 日，共有 316 家私营工业企业向政府部门表示了合营要求，符合政府部门计划要求的有 93 家，其中不乏一些颇具行业代表性的著名大型企业。如大隆机器厂、上海水泥厂、浦

东电气公司、华生电器厂、信谊药厂、新亚药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大中华火柴厂、广勤纱厂、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美亚绸厂、章华毛纺厂、景福衫袜厂等等。一些企业在一次申请没有批准后又接着申请，以致终于被列入 1954 年扩展合营。如广勤纱厂早在 1953 年 12 月 6 日股东会通过争取公私合营决议后，次日即由董事长携三位股东会代表前往华东纺织管理局面陈合营请求；之后“因时隔已久”，又在 1954 年 7 月 16 日再次正式备函呈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请求早日批准公私合营，终获允准。

为什么“资本家”们这么积极？根据当时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的归纳和总结，“资本家在对待公私合营态度方面就已经申请的资本家而言，动机不一，有的是认为迟早要合营，看风使舵、迟走不如早走，争取趁头班车；有的看到别人申请，自己不申请不好顾面子；有的是通过申请进行试探；有的认为申请也不一定选到他，投机取巧；有的看到工作组或派员下厂，认为政府已看准，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漂亮，不如早申请；有的企业困难，希望通过公私合营，渡过难关；有的企图趁机放包袱。”

除了这些外，开始于 19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对“资本家”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据记录，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上海在“五反”运动中，四个月自杀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了 876 人。巨大的压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由于资本家阶级已经被列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的对象，因此无论他们对于合营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其根本的动机毫无例外的都被认为是出于私心的。如果积极拥护合营，有可能被认为是以积极换取政治资本；如果消极对待，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唯利是图；如果是抵触甚至反对，更会被认定是落后、反动。如某机器厂资方为高级统战人士，对公私合营求之不得。工作组即认为其是“要求合营是表示进步，以进步来取得党与政府信任和巩固其地位。所以想处处走在别人前头。这样，既有地位又克服困难，真是两全其美，名利双收。”

扩展公私合营中企业选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手中。只要企业被有关部门选中，资方以及私营企业最后终究会“自愿”走上合营之路。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是 1955 年自愿要求公私合营的，他们的“自愿”有着非常实际的动机。1953 年起，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食油、棉布等都进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国外的东西进不来，国营批发部又限制数量，永安公司的货架上很快就空空荡荡，无货可卖。1954 年相比上年，永安的营业额降了一多半，到 1955 年 2 月，他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永安采取了“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扶持永安公司，永安的批购比例达到了 80%，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轨道。当年秋天，永安的老板郭琳爽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11 月底获批。经过 50 多天的准备，1956

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营”。仪式当天，郭琳爽握着公方代表的手说：“我是在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心。”公私合营双方的代表、工会主席和若干员工在大门口迎候，祝贺的队伍捧上大红喜报，几乎都是热情地说：“祝贺你们一马当先，跨进了社会主义的大门。”这一天，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楼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货”卸了下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装上高达五丈八尺的“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

1966年，永安百货改成“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1969年时再度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年，永安第三度改名，改为“华联商厦”；到了2005年，又回到了永安百货的店名。

永安百货的老板郭琳爽在公私合营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总经理，后来还曾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等。文革开始后仍因资本家身份遭到批斗，1974年心脏病发作病逝。

时至今日，公私合营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于社会中。如数年前的“王老吉”品牌之争，就是公私合营时非物质资产未明确导致的遗留问题。

资料来自《中国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

## 对《温家宝 12 月 13 日在日本讲话》的批示

温家宝，你这个人太不要脸，你天天讲这些空话、套话、假话有什么屁用？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品格。”那么，哪一个民族又是畏艰险、一折就挠、不自强不息的？你们比你们爹亲娘亲的俄罗斯民族、大和民族来，又如何？

“我们在灾难中失去的，一定会从进步中得到补偿。”在你们的卖国灾难中，失去了几千平方公里的陆地、海洋，又从什么地方得到补偿了呢？地震中因为你们的贪污腐败、无耻无能，而致数以万计的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死亡，这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长又从哪里得到补偿了呢？

亏你还有脸皮说“这已充分体现在今年抗击特大地震灾害之中。”四川灾民，现在还有许多人在饥寒交迫之中呢。你为什么还在装聋作哑、当面说谎？

“现在应对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样需要这种品格和信念。”你们还有什么品格和信念呢？一伙杀人放火、卖国求荣的卖国贼，一伙把国库当作党库、个人钱包的窃国大盗，能有什么品格和信念？有的大概只会是贪污犯的品格，土匪流氓的理念吧。

“领导人对国家有信心”，真是越发不要脸了。你这个国家领导人是谁选出来的，你应该为权力的私相授受而感到羞愧。

你们应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地赶快下台，把权力交给中国人民，这样才能为“我们的民族和祖国赢得尊严！”

中国人民，被你们骗够 60 年了。你们以为中国人民会永远让你们骗下去吗？

-----  
【附】温家宝：万一“4 万亿”力度不够 更重拳随时会出

中新网 12 月 15 日电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12 月 13 日，刚刚在日本福冈参加了首届中日韩峰会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晚上乘专机回国前专门看望了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工作人员、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及留学生代表并发表讲话。

与以往一样，温家宝总理在 30 分钟的讲话期间，不仅利用这个机会向海外同胞介绍国内的最新情况，同时也在这个较为轻松、非官式的场合上，用生动的语言为国家近期推出的重要政策作出阐述、补充和宣传。

温家宝总理坦言，他对于中国应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信心十足，而且每天都在苦思“4 万亿措施”的力度够不够，万一不够，更重的拳随时会出台。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刻中国总理温家宝掷地有声的名言。此次，温家宝再一次谈到信心：“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品格。我们在灾难中失去的，一定会从进步中得到补偿。这已充分体现在今年抗击特大地震灾害之中。现在应对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样需要这种品格和信念。领导人对国家有信心，企业对投资经营有信心，个人对消费有信心，华侨华人对祖国有信心。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在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温家宝总理激情地表示：“经过克服这次困难，不仅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且中国的经济水平还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人是有这样的自信的，我们也会在这次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为我们的民族和祖国赢得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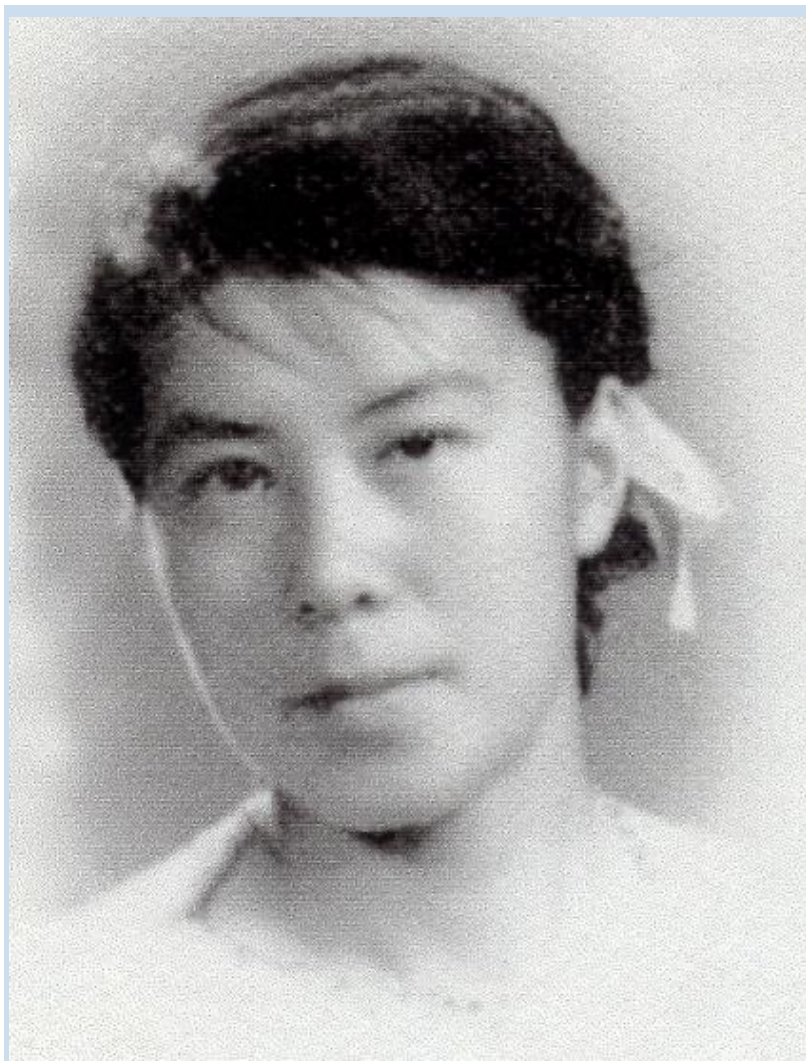
## 一个右派分子及其妻子、女儿的遭遇

【提要：记者、编辑、作家、环保活动家唐锡阳先生，生於 1930 年，在大好青春的 27 岁被打成右派分子；妻子郑兆南受到株连，不但在 1957 年挨过斗，更於 1966 年红色恐怖中惨遭红卫兵殴打致死。他的一个弟弟唐松阳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唐锡阳先生的右派问题被纠正后，调北京自然博物馆创办《大自然》杂志，并任主编；他在先后考察了中国、苏联、德国、瑞士、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等 50 多个国家、地区的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之后，痛感中国的大自然所受的摧残更甚於人，从此与绿化、生态、环保结下了不解之缘。写了大量文章，发表了许多环保讲话，至今 77 岁了，仍在为山、水、树木、走兽而奔走呼号；出版了《自然保护区探胜》、《天鹅之歌》、《珍禽异兽跟踪记》、《到自然保护区去》、《从世界屋脊到三江平原》、《环球绿色行》、《错错错——唐锡阳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等专著。】

1957 年 7 月的一天，斗争刘宾雁的大会要在《北京日报》社的四楼礼堂召开，他的同事戚学义为了表示抗议，就在开会的前一分鐘，纵身跳出窗外，摔死在麻线胡同的水泥地上。戚学义，值得大书特书，一、他杀身成仁的精神，他为了真理和友情，勇敢地以生命作抗争；二、中共的残暴和冷血，戚学义以死相諫，居然没有引发毛泽东及其同僚的不忍之心；他们视人民如蝼蚁，“虽杀千万人，吾往矣”；一部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史、迫害史、奴役史，証明了无论是先前的“为人民服务”、还是今天的“以人为本”，统统都是无耻的谎言，统统都是无耻的欺骗。

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唐锡扬先生虽然还留在《北京日报》社，但已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大会了。但是，他的也是《北京日报》记者的妻子郑兆南，还被允许出席。也许出於怜悯，也许出於好奇，也许由於联想到自己丈夫的命运，她趴在窗臺上呆呆地往下望了一会儿。马上有人把她告发了，《北京日报》社立即组织了一个批判她的大会；人们先是声嘶力竭地批判戚学义是“死反革命”，是“为右派分子殉葬”，是“干扰批判大会的丑恶表演”，是“敢於自杀，就敢於杀人的阶级敌人”；接著就批判郑兆南是“兔死狐悲”，“一丘之貉”，是“为右派分子唐锡阳哭丧”等等。〔1〕





郑兆南 36 岁被红卫兵打死

从唐锡扬被批判的那天起，夫妻之间就不敢互相交谈什么了。这天夜里她只是抱著丈夫哭了半个晚上，含含糊糊、喃喃不断地喊著：“我怕，我怕……”万万没有想到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她竟含冤受屈而死在乱棍之下。据不完全统计：在 1966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末的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万三千六百多户，强迫迁走“地、富、反、坏、右”八千五百多人。什么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以及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这

场浩劫所公开践踏的内容。这是二十世纪的一场大悲剧，一个右派分子的妻子和许多不幸的人，都在这场大悲剧中悲惨而屈辱地死去了。郑兆南，是 1930 年出生的，她只活了三十六岁。

1966 年夏天，她被关押在五十二中学一间阴暗腐臭的房间裡，受到殴打和各种折磨。经过几十天的残酷折磨，在 1966 年 8 月 24 日这一天被学生押送回家；被送回家的她，头髮被剪掉了，头部有伤，浑身浮肿，人完全变了形，满身还贴著字条。押解郑兆南的学生还野蛮抄了他们的家，房间被砸得面目全非，日用品、傢俱无一倖存。墙上也贴上“打倒右派分子郑兆南”，“打倒反革命分子郑兆南”的标语。〔2〕

郑兆南回家的头一天晚上，还对唐锡扬说了一些话。说她开始只是在学校监督劳动，还没有什么。武斗之风一起，该中学党支部书记就被打得半死，用凉水喷醒再来再打。

工作组挨批判后，郑兆南也开始挨打了，她觉得被打死不如自己死了好。因此在一次被拉去游街示众时，企图卧轨自杀。虽然自杀未遂，但她却被打得更厉害了，一连被打了三天，被木棍打，被链条抽，红卫兵让她在脖子上挂著垃圾箱，头上戴著很重的“高帽子”，天天游街，一边敲著一个盆，一边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



唐锡阳的女儿唐樺与小南

神”、“我自作自受”。游街时，身后还跟著一个红卫兵，手拿鞭子，不停地象抽打牲口那样抽打她。有时候让她在地上爬，有时候让她自己打自己。在最热的日子裡，架起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有的红卫兵还逼她跪著爬，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盂裡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她请学生拿便盆，学生要她交两块钱，她的手錶也被学生拿走了。还有学生还要向她“借

钱”。红卫兵把一个据说是“地主婆”的人打死后，对她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3〕

由於她伤势很重，眼看活不了啦。学校就通知唐锡阳领回家了。背上被打了一个大窟窿，肉烂了，伤口发黑。两条腿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点好肉，脚肿得特别厉害，连男人的袜子也穿不进。1966年9月8日，她开始吐血，送到街道医院，街道医院说治不了，要送大医院；到了北京第六医院，医生不给看，说要和学校联系好了才能治病。好不容易电话联系到学校允许治疗了，医生赶紧打强心针。针还没下去，郑兆南停止了呼喊，吐了口血，便断了气，散了瞳孔，她就这样死去了！她的学校决定把她火葬，并说“像郑兆南这样的人，不能留骨灰，家里人也不必去火葬场”。

郑兆南死后留下她的右派丈夫唐锡扬和两个分别十二岁、六岁的女儿，则继续遭受著极大的苦难。唐在单位写《检查交待》到晚上十点，然后骑半小时自行车，十点半到家，回家时孩子已经睡了；早晨四点半就得离家，赶在五点钟去扫大街。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他只好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指导女儿们如何生活，告诉她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要节省花钱，要和邻居小朋友搞好团结。

那时候发给他们父女的生活费每月只有45元人民币，但唐先生还是让她们买两隻小鸡养著，因为买不起玩具。可惜没过两天，小鸡死了一隻，他看到另一隻可怜的小鸡孤单地叫著。出於一种中年丧妻的悲凉心情，他在《日记》中告诉女儿：“你们再买一隻，小鸡应该有个伴。”

不久专政更严了，每星期只许週末回家。妹妹睡觉爱踢被子，姐姐睡得死没法照顾妹妹，所以妹妹老感冒。他想了三个办法：一是让她们睡时关窗户；二是让妹妹穿上件棉背心睡觉；三是把妹妹的被子缝成一个睡袋。两个月后，《北京日报》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转到市委党校搞运动，被专政的人员不许回家了。两个女孩一切生活只好自理。



1969年“初中毕业生”的大女儿去了内蒙古农垦兵团，家里只剩下妹妹了。小女儿最困难的是两件事：一是一个人睡觉害怕，所以她老把唯一的伙伴----一个简装的收音机放在枕边。一睡著了便忘了关机，半夜里闹得左邻右舍睡不好。“右派分子”漫画家李滨声的妻子也是长期孤独在家，正患精神衰弱症，实在经不起这种干扰，就起来敲唐家的窗户。



唐樺下放内蒙

虽然小女儿就睡在窗旁边，但怎麼也敲不醒。第二天就说她，说也没用；孩子嘛，没有声音她就是害怕。另一件事是邻居的孩子们骂她是“狗崽子”，这给孩子心灵的创伤是深刻的。以后有好几年她都不敢亲切地叫声“爸爸”，总是叫“你”或者什麼也不叫。唐先生说：“我那颗父亲兼母亲的心是什麼滋味，现在想起来都发颤……”

“她们刚刚失去母亲，怎能再失去父亲呢？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这两个孩子，我

早已自杀了十次。”“没有自杀的自由”，这是唐先生在回答外国朋友“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痛苦是什麼”问题时的沉痛答案。在无產阶级专政下的中国，自杀被认为是对抗、是自绝於党和人民的反革命行为；自杀者及其家属都要受到惩罚。自杀不遂固然得活受罪，医院拒绝治疗，或者治疗中不採取止痛措施。自詡“毛主席大警卫员”的罗瑞卿跳楼未死，就被装在箩筐里，抬去接受批斗。对自杀成功者也不会放过，同样开批判大会；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尸体上还給掛了块“死反革命”的牌子。死者家属则成“反革命家属”，好比在额头上烙了一个火印。这个办法很厉害，一些人就寧肯自己受罪，也不愿意遗害亲属。

这就是一个右派分子、他的妻子及其子女的苦难。五十多年来，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份子受了太多苦难，至今还没有办法讨个说法，这说明苦难并未远离我们，因为製造苦难的机器和制度仍没有受到什麼触动。

妻子惨死四十年之后，唐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何祚麻先生〈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及网上有关言论读后》中，特别指出“人吃人甚於虎吃人”〔4〕，真是把专政独裁主义的一切画皮都剥得一乾二净了。什麼“他为人民谋幸福”，什麼“三个代表”、什麼“新三民主义”，通通只不过是涂在

这部掛著“无產阶级专政”牌子的绞肉机外面一钱不值的油彩而已。

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从去年以来，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浙江等各地及海外健在的右派分子或其子女共一千多名发起签名上书中共中央、



环保活动家唐锡阳(后排中著白衫者)与志同道合者在一起

全国人大、国务院，提出彻底平反、作出物质和精神损失赔偿等各项要求。目前这股追讨经济赔偿、追究责任、要求惩办元凶和打手的浪潮正方兴未艾。然而中共当局一方面对反右运动受难者及其亲属的正义呼声、正当要求充耳不闻、装聋作哑；一方面又动用包括专政工具在内的一切资源，对右派分子及其家属软硬兼施，实行新的迫害。

例如山东大学附中退休教师、右派分子、著名网络作家、维权活动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昌玉先生，现在便正受山东当局的野蛮骚扰：他的住宅被非法搜查，他的电话通信被非法监控，他的电脑被非法收缴，他的著作一千多本被非法扣押，他的行动被非法限制，他到重庆探亲和到美国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权利被非法剥夺；当局还要“动员”他的弟、妹、子女来“劝阻”他，这种以李昌玉的亲属为人质的恶劣行径，而使中共当局自己成了实质上的绑匪。

我严重抗议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们的法西斯暴行！

---

註 1：《在美国最后一个夜晚的谈话》（〈环球绿色行〉，唐锡阳著；Kxj.cpst.net.cn）。

註 2、3：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遇罗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唐飞霄日记》，唐飞霄乃唐锡阳长兄，披露在唐锡阳著作《错错错——唐锡扬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之中。

註 4：《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何祚麻先生〈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及网上有关言论读后》（《错错错——唐锡扬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唐锡阳编著）。

首发《开放》二〇〇七年六月号

# 打油詩一首 貼《關於保護生物基因的一封信》有感

愛國才知賣國好，你說氣惱不氣惱？  
沒賣之前原是草，賣了之後就變寶。

-----  
附：關於保護生物基因的一封信

XX 教授：您好！

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讓我感動。除了三江流域之外，我也留意到重慶金佛山等各處也有類似問題。目前破壞速度太快，而考察調查、檔案建立、產權確定、專利注冊、規則訂立等保護措施則來得太慢。所以我傾向：只要不是惡意破壞，採集標本應不受任何限制，像彌猴桃變奇異果、廣柑變加州橙，有什麼不好？否則叫水庫水一淹，或推土機一推，就悔之晚矣。

我反對把到雲南省採集生物標本的日本人抓起來。尤其那些人居然把抓捕行動吹得像偵探小說一樣，故弄玄虛，一付愛國英雄模樣。幾十年來濫砍濫伐、濫捕濫撈、亂修水庫、與水爭地、燒山開荒、進軍草原，也不知毀滅了多少珍稀動植物呢！如今收斂了麼？我以為要解決保護生物基因這個問題，還是一靠傳統，二靠制度。而傳統的改造、制度的改革，却是眼下中國最難最難的兩件事。

中國人歷來有煮鶴焚琴，破壞一切美好東西的壞傳統，只是於今為烈罷了。從項羽燒阿房宮、毛澤東拆北京城牆，到現在到拆古城舊巷，不是一脈相承嗎？何祚庥當年助紂為虐，批判梁思成，說故宮阻礙交通；今天又叫囂“人類無須敬畏大自然”，幾十年一貫制，算得上一個典型了吧。

“我得不到的，你也別想得到”這個可惡的流氓心態代代相傳。從蕭繹燒十四萬卷藏書，張獻忠殺盡四川人，到本朝與知識分子為敵，莫不如此。千方百計把海外知識分子“統戰”回來，再一批一批地收拾、甚至肉體消滅掉，所為所事？吳世昌是 1962 年響應周恩來號召上了賊船，不但斷送了自己，還毀了兩個女兒。老舍簡直就是回來找死。

在 1968 年，中共组织部长郭玉峰在党代会上发表的《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指 74 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 159 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 47%。高級知識分子建筑学家梁思成、生物学家童弟周、桥梁专家茅以升便在其中。(万之：《为什么我们要像狗一样的出国？》)



三十年前鄙人在西南某工業基地，聽說日本人要高價買我們的尾礦，但當局偏有無產階級硬骨頭精神，“要自己研究，不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修了尾礦壩、搞了沙泵，結果還是益了海龍王，順着金沙江、長江，直衝上海市、崇明島。最後財物兩失，更加遺害無窮。

去年北京民族文化宮圖書館地下書庫、博物館地下文物庫大面積進水，數十萬件珍貴文物包括四萬多頁的《大藏經》通通泡湯，如果當年斯坦因、斯文·赫定、特林克勒、貝格曼等人把它們“掠”走，或讓國民黨拉到臺灣去，豈不萬事大吉！寧可讓它們爛在北京，也不讓它們風風光光、平平安安地在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呆着，就是愛國？有人說抗戰老戰士是“國寶”，但直到現在還不是讓他們自生自滅！

華羅庚算是混得最不錯的知识分子，被拉進了政協，但從沒有對政治發表過只言片語。抗日時期在西南聯大，物資極度緊張，住在豬圈旁邊，依然碩果累累。可一九五零年以後，生活條件好轉了，只能搞搞優選法。被他指責為“貪圖享樂不歸國”的同齡人陳省身卻成了大數學家，獲得了數學界最高榮譽之一：沃爾夫獎。（萬之）

人如此，江河大地也無不如此。試想如果沒有俄國政府和哈巴羅夫斯克市民的抗議，松花江下場就不是第二條淮河？張左己還敢說“第一口水我先喝”？我想哈爾濱和沿松花江老百姓倒應該感謝《中俄北京條約》了。

臺灣因為美國帝國主義插手，香港、澳門由於是英、葡殖民地，那裡的人民、文化、山河大地才躲過了被流氓政權的蹂躪、逃過了幾場劫難，才成就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幫了鄧老爺子一個大忙；才為中國保留了許多寶貴東西；才為中國留下一點復興的希望。

總之，什麼東西讓中國人抓着，都不過是一棵草，而且還得是死草；只有到了外國人手裡，才有機會變成一件寶，而且是活寶！話雖偏激，却是事實。交淺言深，就此打住。

即頌

教安！

武宜三敬啓

二〇〇六年x月x日於流浮山酒香書屋

## 武宜三：為吳三桂平反

吳三桂被人罵為“漢奸”，罵了三百多年了。真是冤哉枉也！

最近空軍副政委劉亞洲將軍又一次提到吳三桂。他說：“漢族是沒有愛情的一個民族。別看漢族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它沒有愛情。外國因為愛情可發生戰爭，中國行嗎？吳三桂算是為愛情打仗的男人了，偏偏又是個漢奸。”言下不無遺憾。顯然劉將軍對為愛情而打仗的吳將軍不勝豔慕，敬仰有加。可惜他為了從眾，不得不加個尾巴——“偏偏是個漢奸”，使劉將軍這個率真的男子漢形象，失色不少。

去年本港有人應邀去美國出席參議院聽證會，就被富商、英王御封爵士胡應湘指為“是吳三桂，是漢奸，引清兵入關”，去美國出席聽證會是否就成了吳三桂且不說，但把吳三桂當作漢奸，肯定大錯特錯。引清兵入關乃愛國行徑，決非賣國行為。所以吳三桂是愛國人士，是愛國分子的老祖宗。況且胡應湘本身受了英王的冊封，如今“登上城頭罵漢人”，居然罵的還是“漢奸”這兩字，實在極具諷刺意味。

吳三桂同志請清兵入山海關，是 361 年前，即西元 1644 年(甲申)四月的事。此時離開他原來所效忠的明朝中央政府的垮臺，已經一個月了。明朝的國家元首兼政府總理兼三軍統帥的朱由檢主席，在李自成大順紅軍進北京城的三月份，就上吊殉國了。吳同志本想投靠李自成的大順朝革命新政府，可惜李自成們賊性不改，不但沒有“三大紀律”，沒有“八項注意”，更不懂收買人心、亂開期票的統戰伎倆，反而縱容各級幹部大搞腐敗，劫掠姦淫，抓了吳三桂的老爸不算，還搶了吳三桂的漂亮二奶，硬生生地把吳三桂同志推向了大清國。

其實，大清國的滿族同胞，也是大明帝國大家庭的一個成員。當年明帝國中央對滿族同胞實行的也是“一國兩制”，“滿人治滿”，封愛中、愛朱又愛滿的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建州左衛都督”——滿洲特區行政長官，時為萬曆 11 年(西元 1583 年)。比董建華當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還早 414 年呢。

鄧小平說“一國兩制”是他的“發明”，分明胡說八道，是盜竊前人版權的侵權勾當，是貪天之功為己有。自漢唐以來，中央政府就開始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有別於內地的管治政策，讓當地少數民族的首領、頭人或土司充任行政首長，當年滿洲的努爾哈赤不就是今天香港的董建華、曾蔭權或澳門的何厚鏞嗎？

後來因為明王朝越來越腐敗，努爾哈赤才開始造反，鬧獨立，搞滿獨，建“大金國”，自稱皇帝。這如同上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共產黨在“中華民國”裡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樣：不過是國中之國，屬父子或兄弟之爭。實在稀鬆平常，沒啥了不起呀。“大金國”變“大清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一碼子事，這就是“歷史驚人相似”之處呢。

吳三桂參加滿清革命隊伍，引進“威武雄壯之師”，也同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將軍把中華人民解放軍請進北京城一樣，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不一樣的只是吳三桂封了個“平西王”，裂土分茅，坐鎮雲南，威風八面。而傅作義則完全被共軍繳械，不但不能“共管北京”，還差點要以“戰犯”之身送軍事法庭受審；後雖蒙毛澤東開恩，撈了個有職無權的水利部長，可也沒幹幾年就投閒置散了。

再如施琅同志，原是“民族英雄”鄭成功手下將領，叛逃後當了大清帝國海軍的東海艦隊司令員。他在以康熙皇上為核心的偉大、光榮、正確的清中央政府英明領導下，組織和指揮了平定臺灣的戰役，用非和平的方式，“確保臺灣入版圖”。雖然居功厥偉，300多年來卻也被當作“漢奸典型”，備受唾罵。前幾年時來運轉，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他平了反，把他的畫像豎立在天安門廣場，追封“解放臺灣，統一祖國”的大英雄，從而含冤得雪，吐盡了一口烏氣。

所以，吳三桂和施琅、傅作義一樣，都是實實在在的為新生革命政權立新功的功臣，都是如假包換的愛國者，劉亞洲、胡應湘卻誣之為“漢奸”，您說他們該不該打屁股？

試想，當年吳三桂如果不幫大清國消滅李自成流氓政權，肅清腐朽的朱明王朝殘餘勢力；那必定出現“一邊一國”或“東一國、西一國”、“北一國、南一國”的分裂局面：關外大清國，關內大順國加大明國，使祖國的統一事業大遭挫折。那吳三桂才真正是千古罪人，成為不折不扣的漢姦呢。請問劉將軍、胡爵士：你們願意做這樣的罪人和漢姦嗎？

寫到這裡本應打住，只是想到兩個問題，就順便請教一下胡爵士：

一·閣下在大陸大辦電廠，大建高速公路，猛刮人民幣，好象總沒有賺夠的時候。可我記得閣下卻把巨額美金捐給一間帝國主義的大學，讓它多多培養顛覆社會主義陣營的反中、反共、反革命的知識分子。請問閣下：這種吃裡扒外、劫社濟資、劫中濟美的反骨行為也叫“愛國”麼？

二·閣下肩著敵對國家賜封賜的爵號，卻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大會堂裡和馬力、鄭耀棠等紅五類一起參加“管理國家事”，是否有角色衝突，心裡是否發虛？

(《议报》2005,5,17)

## 武宜三先生与陈奉孝先生访谈录

——中国共产党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必须清算

【引言：陈奉孝先生，是当年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右派分子、民主活动的杰出组织者，现在是活跃的网络作家和维权活动家。陈奉孝先生五十年前提出的四项主张：一、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政治课必修；三、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以考试平等竞争；四、开辟自由论谭，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直至今今天仍然是中国人民永不枯竭的话题和遥不可及的希望。】

### 一，中国共产党背信弃义，历来如此

武宜三：陈先生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是学理科的，为什么对政治、社会问题感兴趣呢？您为此吃了 20 多年的苦头，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可谓九死一生。

陈奉孝：这是因为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是镇反，1951 年镇反时我才 15 岁，正上初中三年级。当时我有两个中学老师和两个同学的父亲被枪毙了，三个老师被抓起来了。潍坊刚“解放”时，共产党的报纸一直在宣传，我们共产党人绝不搞报复，号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出来登记。有些人当年是被国民党硬拉进去的，集体登记入了国民党、三青团的，根本没干过什么事；但一登记，有的就给枪毙了。

我同班很要好同学于宏易的父亲于兴初，是个资本家，解放后是潍坊工商联副主委，正主委是李会芝。淮海战役时国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当时带第八军在潍坊，所以认识于兴初、李会芝；1949 年一月徐蚌会战失利，他们给李弥开了路条，帮他化了装，让他逃走。李弥逃到青岛后，青岛市《民言报》用大标题《潍县民心不死，送李将军返青》作了报导，这事被青岛的中共地下党查到了，镇反时就把他们杀了。后来李弥等人被俘，一个也没有杀嘛，为什么放走李弥的于兴初、李会芝要杀掉呢？可见共产党之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这事让我记住了！

其次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作用太大了，苏联肃反杀那么多人，斯大林犯了那么多罪恶，以前不知道。看了《秘密报告》震动很大。我联想到中国镇

反、肃反也杀了那么多人，想到中苏情况差不多。这就是我后来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础。

武宜三：当初你们是从北大图书馆看到《秘密报告》的？

陈：我在北大图书馆外文期刊阅览室看的是《英国工人报》，还与英语老师任大熊、陶懋颀一起，三个人把它翻译出来。准备在《广场》上发表，但太长，要出专刊，结果《广场》出一期就给封了。

## 二，早叫的公鸡被扼杀

武宜三：学理工科的思维是不是更缜密一点？近代中国好像有自然科学家论政的传统。你们当时提出的问题都非常有前瞻性呀。

陈：是，当时我们提的问题都非常尖锐。例如我和张景中、杨路等四位同学合写了大字报要求，一、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政治课必修；三、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以考试平等竞争；四、开辟自由论辩，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

物理系王国乡提出了从斯大林错误中吸取教训，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化学系张锡锷同学指出三害根源在于制度，必须改变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这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提出的一些主张是一致的。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就早说了二三十年。

武宜三：成了早叫的公鸡，被杀掉了，太冤枉。

陈：现在都在说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也是我先提出来的。

武宜三：他们侵犯了您的版权。共产党专门干这种事：像毛泽东把朱德“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诀占为已有，邓小平把廖承志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统统变成自己的“伟大理论”和丰功伟绩。你后来感到民主在中国没希望了，才想跑出去？

陈：想到外面看看。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站岗，进不去；又去了英国代办处，也不行。外国大使馆门前都有中国警察岗楼，任何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都不可能进去。甚至你想往外国大使馆打电话也不行，因为电话都由门口的中国警察岗楼往里转，他不给你转。我也这样做过，当时公安部还没让抓人，后来就不行了。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被抓后认识的两个人，就是往外国大使馆打电话被判刑的。还判得重，一个12年，一个15年。后来又去了南

斯拉夫大使馆，它不在东交民巷，在后圆恩寺一条小胡同里，一般人不知道，是别人告诉我的。正门当然也不行，我在一个拐角处，爬上一棵大槐树，翻墙进去的。结果让人家送了出来。

最后准备在塘沽新港混上外国轮船，那天晚上码头停电，看不清哪有外国船。正在转悠，被两个人当我是小偷给抓住了。送到派出所一搜身，原来是大右派陈奉孝，那时候都登报了。当夜被送到北京草岚子看守所，接着被逮捕，判刑，送黑龙江省兴凯湖劳改农场，后来又转内蒙札赉特旗乌兰农场。刑满后去了龙江县采石场、大兴安岭林场，又回乌兰农场。

武宜三：您这回是第一次出境——北京当局心目中香港、台湾还是外国，而且是属于敌对势力的——来香港后有什么感受？

陈：我们来要先办证。以前我在广州看人家办个《港澳通行证》，只要5元人民币；可我在山东省潍坊要花200多元。办了证还不行，好像怕你跑了不回去似的，结果我一个学生刚好在旅行社，帮我在香港旅行团报了名，这才出了来。

武宜三：是呀。你们北京大学的贺卫方不是说了吗？“中国看起来是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是四分五裂的”。这每一个地方都有个土皇帝，每一个地方都有个土政策；老百姓不胜其扰、不胜其苦。胡锦涛哀叹政令不出中南海，不是客气话。

### 三，党权高于《宪法》成腐败的根本

陈：我在市场看了一下，物资很丰富，看起来很贵，一般的东西比山东贵四五倍，但香港人工工资高，比如清洁工，这□一个月有七八千元，我们那里只有四五百元。算下来还是便宜得多。

武宜三：最重要的，香港的假冒伪劣没有中国那么严重。

陈：这都是让贪官污吏带坏了社会风气，老百姓都跟当官的学，于是也坑蒙拐骗；这假冒伪劣，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大陆无官不贪，胡锦涛知道不知道？我在北大博客里告诉共产党，你现在有两个危机：一失掉了信仰，共产党员根本不信什么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了，也没有什么信念道德了；二是你自己管不住你自己了，因为党权高于《宪法》；党权高于《宪法》成了腐败的根本。

武宜三：他当然知道。但他现在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总代理，就决不肯放弃一党专政。而不放弃一党专政，不实行民主宪政，这两个危机也就没有解决希望。您对中国的现状还有什么看法？

陈：从中国的民情来看，中国老百姓是非常驯服的，也就是奴性十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搞了几千年；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造反。封建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相通的，过去叫明君贤相，现在叫伟大领袖、人民救星。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西方先进国家搞不起来，在中国这种封建主义传统浓厚的地方就畅通无阻的原因。

邓小平抓住中国老百姓特别知识分子的弱点。所以，在 6.4 事件后就搞经济，就对知识分子实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收买知识分子，一给地位、二给名誉、三给金钱；但不许乱说乱动，把舆论、宣传控制得严严实实的。天天鼓吹学生经商，大学毕业生，去年有 410 万，今年有 495 万名；今年起码有 240 万大学生要失业，就用拚命鼓吹经商的办法减轻就业压力。四，凡中共历史，都成禁区

戴：您对右派问题彻底平反和经济赔偿，有什么期望？

武宜三：对反右、对文革，现在都不让深入研究，都被划为禁区。文革，首先是刘少奇问题必须研究，可是一研究，问题就来了。因为刘少奇项目组组长是周恩来，周恩来现在还是共产党的神；如果把文革、把刘少奇问题揭开了，就要扯出周恩来，周恩来再垮了，共产党如何自处？有个电影叫《周恩来》，我也看了；王光美看了一半就走了，说那是“剪出来的嘛”。反右问题同样如此，反右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毛泽东，但邓小平、彭真，还有其它许多人都有责任的。中共的全部历史，现在干脆都不让讲了。

武宜三：中国共产党头面人物中恐怕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了，陈毅、陶铸、贺龙、黄克诚、彭真、罗瑞卿都是助纣为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陈毅在反高饶、反潘杨、在外交部抓牛鬼蛇神，是何等的心狠手辣呀？我正在收集资料要写篇《陈毅是好同志吗？》。

黄克诚在湘西剿匪，陶铸在广西和广东剿匪、土改，都是杀人如麻，尸横遍野；林昭就是罗瑞卿亲自抓走而遭杀害的，罗瑞卿在镇反、肃反中，把数百万人的鲜血、头颅当作自己的政绩。中国共产党欠下中国人民这一笔笔血债，不知何时可以清算！

陈：中共现在还掌握着一切资源，还在尽力掩盖历史，有的右派分子心有余悸，对平反、追讨赔偿的签名还有恐惧；但是，大趋势已经无法逆转了。所以，我对未来的民主、宪政，还是有信心的。

2007 年 5 月 4 日整理（首发《议报》304 期，署名戴雨山）



# 聞一多的詩和何銘思的退黨聲明

——讀司徒華《塵土雲月》(之二)

“世事通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司徒華先生寫文章似是信手拈來，其實不然。他的書中有生活小故事、有天下大事，有關於中國、有關於外國，有歷史、有文學，有考証、有辯難，有詩詞、有歌賦，有情、有義，有愛、有恨，有血、有泪。總之，包羅萬象、博大精深。華叔有他在幾十年教育生涯中練就的講故事本領，加上他不斷的學習、吸取新知識新資訊，朋友遍天下，所以他能做到厚積薄發、收放自如、深入淺出、老少咸宜，能在小小的千多字的框框中把信息量豐富、清新活潑、引人入勝、啓人思索的精品貢獻給他的讀者。

這種才能、這種功夫豈是那靠炫耀官位、靠耍官威、倚勢壓人，在美女面前賣弄“二十八字”、冒充詩人的惡霸所能望其項背的。

華叔一個老左派朋友去大陸參觀“老革命根據地”，見到頹垣敗瓦、貧窮艱困、落後閉塞、毫無生氣，而感觸流泪；華叔一個教師朋友說大陸某山區教師不但被積欠薪金而饑寒，連港人送的 200 元春節“利是”也被土幹沒收。華叔聽到後馬上想起聞一多的《發現》來：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着血淚，

“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我來了，因為我聽見你叫我，

鞭着時間的罡風，擎一把火，

我來了，不知道是一場空喜，

我會見的是噩夢，那裡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夢掛着懸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愛！

我追問青天，逼着八面的風，

我問，(拳頭擂着大地的赤胸，)

總問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嘔出一顆心來，——在我心裡！

這是聞一多在 1925 年從美國回來時寫的一首詩，八十年過去了，中華仍舊是噩夢，而且更加恐怖。滿腔熱忱的愛國者，所“發現”的依然是不那麼值得思念的祖國。“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中華已經成一小撮權貴的私有財產。當江澤民、胡錦濤在一本正經地講“三個代表”、“兩個務必”的時候，當溫家寶假惺惺地擠着眼淚的時候，他們的子女、家族、同伙早已身家億萬，並且繼續張着血盆大口，繼續吞噬着血淋淋的尸骸。

江山是老子打來，豈容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

生死非閻王注定，且看我今天殺人，明天殺人！

這是聞一多 1946 年被暗殺時，有人寫給他的輓聯。六十年過去了，民主更加成了違禁品。殺人規模也更大，手段更高明。昨天天安門廣場，今天河北定州、汕尾東洲鎮。

現在坐江山的，已不是當年打下江山的人了，但卻儼然閻王，“今天殺人，明天殺人”。他們為這坐着的江山做過什麼？(《老革命根據地》)

華叔讀書之廣、之認真，藏書之多、之豐富，在他關於聞一多的兩篇文章中也可看出苗頭。他在所訂的長春出版的《雜文選刊》中看到《“腰斬”聞一多的原因》後，又立即找出《聞一多年譜長篇》、《新文學選集第一輯·聞一多選集》作對比、查証。指出聞一多《最後一次講講》被刪的主要句子是：

“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

司徒雷登是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痛罵過的人，所以只好對聞一多大動手術，以讓聞一多與毛澤東“保持高度一致”。共產黨的歷史、文學……一切出版物都充斥着這一類無恥的刪節、篡改、隱瞞、歪曲、欺騙。這真是中華文化千古未有的大災難！

聞一多據中共說是被國民黨暗殺的，我現在有點懷疑。共產黨對自己的同志都可以痛下殺手或向國民黨告密，干過不少插贓嫁禍的事，安知聞一多不是又一個被犧牲者。這是題外話，以後再說。盡管聞一多因此被塑造成是“偉大的愛國學者、詩人、民主鬥士”、吹捧“他一生高昂的民族氣節，不屈的鬥爭意志，是以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深層理解為根基的。”但還是把他不中聽的話，“許多重要的話都刪掉了。”（《聞一多被“腰斬”》）

其實從聞一多被“腰斬”的惡劣事例中，又一次證明了毛共是中國人民的公敵，是一伙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賣國賊。他們反對的是像司徒雷登這樣的“中國人民的朋友”，這樣“一個和藹可親的學者，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朋友。毛澤東為了做兒皇帝，不顧民族、國家的利益，拋棄朋友而投靠世仇。一邊倒地投入佔我國領土、侵我主權、殺我同胞、掠我資源財富、奸我婦女、變我國家為殖民地的蘇俄帝國主義的懷抱。

內地一位前輩看了我的《“詩人”楊文昌》後，垂詢“支聯會”是否由叛變的中共地下黨在1989年“六四”後組織的？我答曰：當時叛變的不但有地下的，地上的也不少呢。如金堯如先生、何銘思先生等。

何銘思當年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現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的顧問。

“六四”當晚他一家人對電視機的直播畫面，看到血和火，看到死亡和屍體，看到人民的吶喊，他忍不住哭了，他老伴哭了，他女兒也哭了，孫女看到他們哭，也跟號啕大哭。他痛心，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一個混亂錯誤的局面。第二天他去中區參加百萬市民的大集會，並決心退出中國共產黨。他在《文匯報》、《信報》刊登了《退黨聲明》。《聲明》是這樣寫的：“我無法接受中國當權者以武力鎮壓人民的血腥事實，這完全背離了共產黨過去所宣示的宗旨，我決定退出中國共產黨。”（何銘思：《別再用“六四”把自己裝扮成愛國者》）開了海外退黨的先河。

何銘思去年在《信報》連續幾天寫文章揭發中共貪官怎樣敲榨、打壓、排擠霍英東的惡迹。在港澳呼風喚雨、德高望重的霍英東，在內地卻受盡鳥氣、任人宰割、有冤竟無處訴。霍英東在南沙開發了東發碼頭，中共番禺縣委書記、土霸王梁柏楠却硬逼霍英東掏2,000萬元給他搞個同樣的南偉碼頭，並交由梁柏楠的親信管理，貨物就往自己的碼頭運送；霍英東想把港前路修到地方所屬的山後面成環島

路，錢交出後沒有下文，對方說是用作“搬遷費”了。霍英東要建個小型的蒲洲花園，對方在鄰近山腳挖來了一堆黃泥，在山上拔來一堆小草，栽幾棵小樹，便拿走了 1,500 萬元。霍英東說：“我一生搞工程，從未見過這樣離譜的事。”

何銘思說，霍英東投資 400 多億元開發番禺和南沙，連一分錢也收不回來，還受盡欺凌，需要忍氣吞聲。如果不是樑柏楠東窗事發，他恐怕還要忍下去。這就是愛國的報應，這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寫照。

支聯會負責人司徒華、李柱銘都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也都是深得北京信任的才俊。至於其中有多少地下黨，則暫時未知。中共幾十年來幹的大抵都是這一類“為叢驅雀，為淵驅魚”的勾當，最近更不斷有重量級間諜、情報人員叛逃、被策反；更有的大鑽中共給他們“偽裝反動”的空子，乘勢不斷大爆中共的黑暗內幕，起到一般批共人士和民運分子所起不到的作用，這叫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信請看《xx 電視》、《xx 刊》。中共反動派離眾叛親離的日子真的不會太遠了。

因郵件亂碼，只好在此順便奉告。(2-feb-2006)

# 種植鴉片販賣鴉片和“八榮八 耻”

——並簡談《父母早日書》的多學科價值

李南央女史和她夫君巴悌忠先生，以及他們的朋友、作家奚青先生，用了八個月的功夫把她父母近八百封、逾八十萬字的信件和少量日記編成了《父母早日書——李銳、范元甄 1938 年—1960 年通訊、日記集》(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3 月第一版，香港)，真是功德無量。用句套話：即“利在當代，功在千秋”。

正如為本書作《序》的朱正先生所說，這是“一部活的黨史”(上冊 p9)，“是一份極為難得的史料。從這個相當典型的個案的原始材料中，人們可以具體地了解到當年整風運動怎樣進行，人怎樣被改造……這些歷史的奧秘。”(上冊 p7)

也正如李南央自己所說，這些信件和日記，“所敘述的不僅僅是家務事，這些文字映射出抗戰初期始、經延安、解放戰爭、解於東北繼而解放全中國，接管政權創建新國家，直到廬山會議後止於 1963 年，中國共產黨在此四分之一世紀中，每個大歷史階段的指導理論和行為。”(上冊 p9)

在個人敘事方面，本書的主題可以說是“‘特殊材料’是怎樣煉成的”(上冊 p2)黨和領袖怎樣在延安那個紅色獸圈中，用暴力和謊言把單純樸實、追求自由、胸懷理想、朝氣蓬勃的革命青年改造成了為獨裁者所驅使的“馴服工具”和殺人機器；那種靈魂被閹割、被壓抑、被扭曲的痛苦，那種怕被組織所拋棄、所疏遠的恐懼，非在那種黑暗非人世界中煎熬過的人，是無法理解的。

這本書除了作為黨史、政治史、思想史、經濟史、輿論宣傳史之外，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心理學、性心理學教材。當年兩位年青人曾經熱烈地追求過愛情、後來又為了革命而異化愛情，其中有性壓抑、性饑渴、性苦悶、性虐待、性解放，甚至性勒索，有深入研究的價值。

本書內容之廣泛、材料之豐富，有如一座多元共生礦，為各類研究者提供各種各樣、而且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

例如，1937 年 9 月 26 日，毛澤東給晉西北的八路軍指示：“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北京三聯書店 1982 年出版的前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官員羅滿寧(奧·鮑里索夫)的《蘇中關係》(1945--1980)》關於毛要求八路軍“用一分力量和日本周旋，

用二分力量和國民黨鬥，用七分力量來發展自己”的說法，在本書中也得到了印證。

李南央在《編者感言》中寫道：前方在抗日，後方延安的最高學府----馬列學院在激烈討論“在土地革命的十年內戰中，有沒有統一戰線？”而不是當前如何組成統一戰線共同抗擊外來侵略者，真有些讓人難以理解。長時期以來，人們評價毛澤東在抗日時的策略是保存實力，不與日軍正面作戰。還傳毛說過感謝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否則國民黨不可能暫時放棄叫共產黨必予除之的決心，共產黨因而得以壯大。史實究竟如何呢？至少從我母親的信和日記中看不出當年延安馬列學院共產黨的“精英”們把抗戰當成那麼一件必須時刻銘記在心的需“天天講”的事。從父母延安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是毛澤東全力地在整肅內部那些抗日熱血青年，看不到是如何地通過他們，即而領導全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打贏那場戰爭。(上冊 p201)

范元甄和李銳由 1939 年 12 月到延安，到 1945 年 10 月離開延安；六年中唯一談到日本的是寫於 1941 年 12 月 9 日的一封信，而且是談日美太平洋戰局對“中國政局”的推動，想到也只是“趕快掌握英文”之類。難怪李南央也疑惑：“身處那個時期，何以與那場戰爭如此隔膜？生活在延安的人是如何對那場戰爭做出貢獻的呢？”(上冊 p237)

當然李南央說得很委婉，實際上中共對抗戰不但沒有什麼貢獻，相反的是在破壞抗戰。毛澤東共產黨從江西蘇區開始，幹的就是謀殺國府、資敵賣國的勾當！（“謀殺國府”是一位大陸學者的提法，非常形像。）

再如，延安種鴉片、販鴉片。有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灣種鴉片、張思德死於煉製鴉片的窯洞中之類，早已在海外有不少報導，我雖然感到驚奇，但還是不怎麼相信。最早是臺灣方面傳過來的，現在想起來可能是陳永發教授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我卻疑之為是反共謠言；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的《延安日記》中也講了鴉片問題，我亦以為是蘇修抹黑而未予深究。可見我中毒之深、共產黨宣傳之厲害！然而對李銳、范元甄這兩位資深、忠貞的中共黨員兼高級幹部所留下的當年信件，我就沒有理由不相信了；於是《父母早日書》成了摧毀我頭腦中對中共最後一座迷信堡壘的最後一顆精神原子彈。

據說，這在中共黨內也不是什麼秘密，畢竟參與其事的人不在少數；但為什麼從沒有人對此持批評態度呢？一位研究解放軍史的專家告訴我，這種事是可以理解的。原來如此！為了一人一幫的私利，種毒販毒，可以理解；殺人、放火、賣國、通敵，可以理解；圍困長春以幾十萬老百姓為犧牲、以中國一半人口作核戰爭賭

注、餓死四千萬而拒絕認錯，也是可以理解。

既然如此，我可不可以問一句：這樣一個沒有了任何道德底綫的黑幫團夥、流氓集團，今天到底還有什麼資格在那裡臉不紅、心不跳的奢談“八榮八耻”呢？現在我把《父母早日書》中關於共產黨販賣鴉片的段落摘錄如下，以嚮同好。

《父母早日書》中關於共產黨販賣鴉片的段落——

1，范元甄信，1946年11月19日〔下冊 p17〕

我帶的代金還未動用。

這次幹部帶大烟的人多極了，夏淑賢等都是廿、三十兩。僅在白城子就沒收了一千多兩，未查出的還更多。

〔原註〕代金：指鴉片。從延安出發時，幹部帶了一些鴉片以代現金之用。

2，李銳信，1946年11月17日〔下冊 p25〕

聽說你們的大烟都沒收了，很担心你沒錢用。

3，李銳信，1946年12月8-10日〔下冊 p29〕

你說對節省有了新的覺悟，這非常要緊。代金不需用就暫不用它，除非將來要離開東北再換。

4，李銳信，1946年12月27日〔下冊 p36〕

有好小說記得捎些。代金聽說熱遼這邊比東北價還高，如有移動，打聽情況後再脫手。

5，范元甄信，1947年2或3月xx日〔下冊 p52〕

為苗看病把帶來基金換了，下次帶點錢給你。你用，再給買些藍(深)蔭丹士林布帶來。這邊布貴(東北錢七千至九千一尺)，我可用以換花布苗穿。

6，李銳信，1947年3月16日〔下冊 p55〕



經理部送你和苗三丈多布，加上我買的，共約(藍一丈，藍三丈四，白一丈二)五丈六尺與你。代金全換了是可惜的，約八兩普通可換一匹布。不知你如何換的。希望你還是節省，“為苗舍得花錢”作風並不贊成，還是要適當……

7，范元甄信，1947年4月30日〔下冊 p80〕

這裡家屬隊有不少太太，成百兩的烟土，我覺得調查一下她們的經濟來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幹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話。

8，編者感言〔下冊 p81〕

記得那年在科羅拉多隨父親參加中國問題研討會，有一位臺灣來的陳永發教授的論文《生存與主義之間》，講的是陝甘寧邊區種鴉片的事。當時頗感新奇。從母親的信中，方知這在共產黨不是稀罕事。從熱河撤退到東北的家屬攜帶了大量“代金”(大烟)。“這裡家屬隊有不少太太，成百兩的烟土，我覺得調查一下她們的經濟來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幹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話。”那些大烟變成錢時，想必是讓毒品流到了民間——禍害了人。可是連父親都說：“代金聽說熱遼這邊比東北價還高，如有移動，打聽情况後再脫手。”母親似乎還存有清高，“代金即使作價低也不願留它，免得精神上不痛快”。但是“為苗看病把帶來基金換了”。真是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且要生存得更好些的誘惑是巨大的。主義呢？共產黨應該是最痛恨鴉片的呀！其實都是人，人不會因為有了一面共產主義的大旗裹在身上就自然變得比別人純潔和高尚。

(6Aug2006 於流浮山莊)

# 武宜三：二十八字令

——读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有感

(一)

英雄死去佳人老，  
空有余恨泪长流；  
爱情据说无价宝，  
怎奈东风不自由。(注)

-----  
〔注〕《千家诗》：“不向东风怨未开”。

(二)

领袖御民有奇招，  
御民更胜御牲口；  
性欲食欲全铲净，  
人性灭绝好领导。

太平天国 157 年春三月月光如水之夜  
写于流浮山水寨

**【附】欲将心事付瑶琴，弦断有谁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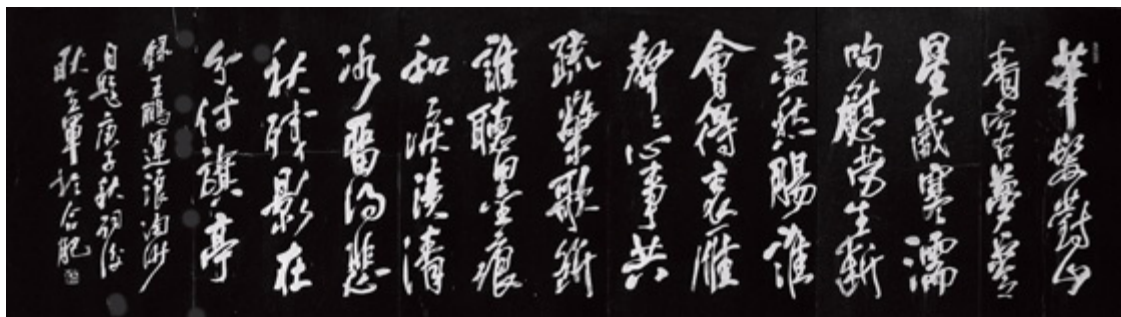
——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所摘引词曲完整版

吴洪森看了章诒和《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之后说章大姐的初恋是罗隆基，章诒和笑骂“胡说八道”；但她又在《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中写道：“中国有几个像罗隆基这样杰出的政治家？有几个像他这样懂得女人的男人？于我而言，唯一的遗憾，那时岁数太小！”然则，“岁数不小”又当如何呢？

欲将心事付瑶琴，弦断有谁听？《泪祭罗隆基》中所摘引的词曲无不哀艳凄绝、荡气回肠，我把这四首词曲完整版录出，供大家凭吊。

(一)、浪淘沙·自题《庚子秋词》后

〔清〕王鹏运



华发对山青，客梦零星，岁寒濡响慰劳生。断尽愁肠谁会得？哀雁声声。  
心事共疏檠，歌断谁听？墨痕和泪渍清冰。留得悲秋残影在，分付旗亭。

## (二)、北南吕·骂玉郎带过感皇恩采茶歌·仕女图

〔明〕黄峨

〔骂玉郎〕一个摘蔷薇刺挽金钗落。一个拾翠羽，一个捻鲛绡，一个画屏侧畔身斜靠。一个竹影遮，一个柳色潜，一个槐阴罩。〔感皇恩〕一个绿写芭蕉，一个红摘樱桃。一个背湖山，一个临盆沼，一个步亭皋。一个管吹凤箫，一个弦抚鸾胶。一个倚阑凭，一个登楼眺，一个隔帘瞧。

〔采茶歌〕一个愁眉雾锁，一个醉脸霞娇。一个映水匀红粉，一个偎花整翠翘。一个弄青梅攀折短墙梢，一个蹴起秋千出林杪，一个折回罗袖把做扇儿摇。

## (三)、双调·庆东原·京口夜泊

〔元〕汤式

故园一千里，孤帆数日程，倚篷窗自叹飘泊命。城头鼓声，江心浪声，山顶钟声。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

## (四)、双调·寿阳曲

〔元〕贯云石

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

## 頻頻出現小毛澤東的疑惑



下面內容和照片取自《湖南日報》和《中新網》，它們除讓我噁心之外，還讓我想到：為什麼單在衡陽就出現三個小毛澤東？湖南有，廣東有，沈陽也有。相信各地還陸續會有。為什麼沒有形似彭德懷、張聞天一類的人物頻頻出現呢？

### 僅衡陽就有三個人像毛澤東

2006年4月，從長沙回衡陽的列車上，一位旅客對易曉健凝視片刻後惊呼：“他太像毛主席啦！”易曉健是繼衡陽縣政協原主席周傳福、衡陽師院學生處原副處長陳寶材之後，衡陽市第三個外形酷似毛澤東的人，今年45歲，現任衡陽市工商局雁峰分局副局長。

易曉健1960年出生於衡陽縣曲蘭鎮，他當兵時的戰友以及轉業後的同事都說他長得像毛，但他並不以為意。後來說的人多了，才在鏡子裡仔細瞧瞧自己，發現自己的體型、外貌還真有點像毛。

易自言從小就非常崇拜毛，喜欢看有關毛的電影，讀毛的文章和詩詞。易家的客廳、臥室、書房和辦公室都掛有毛像。他先在動作、神態等方面開始模仿毛，易覺得模仿毛要達到三個境界：一是形似，包括相貌和語調；二是神似，包括說話的神態、走路的姿勢等，有“豪氣”；三是精神境界，要領會毛的思想，學習他的“崇高品德”。可見已到走火入魔地步了。

為了模仿毛澤東，易曉健買了幾十張關於毛澤東的影碟，有空就看，模仿毛澤東的湘潭口音和有特點的動作，例如揮手、看書等“招牌”動作。如今，他能用“標

准”的湘潭话背诵三十多首毛诗词，逼真地模仿毛讲话等。今年5月易身着中山装跑到韶山，在毛旧居、纪念馆和铜像前，用浓重的湘潭话模仿毛在开国庆典上讲话及背诵毛的《沁园春·雪》，吸引大批游客观看。易晓健先后在长沙、衡阳等影院、宾馆及机关单位、广场，义务演出三十多场次。(朱章安：《湖南日报》)

### 廣東也有小毛澤東

自幼勤学、酷爱、熟背、苦练毛诗词和书法而形象又酷似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广东惠州市文联副主席安想珍，笔名安民，在当地连日的书画拍卖会上大出“风头”。两幅仿毛體書法共拍卖十五万八千八百元人民币云。(中新社惠州五月十五日电)

為什麼有類似毛主席的人頻頻出現呢？令我疑惑。(6-jun-2006《新世紀新聞網》)

# “詩人” 楊文昌

——讀司徒華先生《塵土雲月》

在維多利亞公園年宵花市支聯會攤位買了本司徒華先生《塵土雲月——〈三言堂〉的“一言”之十二》，算是新春伊始的自我獎勵。自從陶傑離開《明報》後，我就不看這張報紙了，所以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楊文昌先生與司徒華先生在該報的筆墨官司是看了《塵土雲月》才知道的。上網一查，《博訊》上也貼有楊文昌《我不得不說話》，可見以前沒留意。

看完楊文昌這篇《我不得不說話》之後，發覺楊文昌完全不是他本人所標榜的什麼“一名外交工作者”，倒像是一個十足的惡霸。原來，“閱讀中國的古典詩詞”、“寫詩”，只是他的“小兒科”，他的“大兒科”是當官作老爺。“披荆斬棘闖五洲，不為封疆萬戶侯。閱盡人間大千色”，把他一副躊躇滿志、沐猴而冠的自得之神態表露無遺了。

按道理說，香港第一把手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同志，高同志相當於過去的總督或駐藏大臣和今天的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中共黨委書記；第二把手是特區長官曾蔭權，相當於過去的巡撫和今天的省長、直轄市長或自治區的主席；像他們二位這樣總攬一省、市、區軍政大權的大員才算得是傳統上的封疆大吏或諸侯。至於外交部駐港特派員，雖然是黨官、京官，但也只能和駐軍司令員、港府各司局長等列入司局級層次，稱外交師爺或外交幫辦，比江素惠小姐當年“駐港大臣”還要低好幾級呢。可笑的是，他居然在江素惠小姐面前以“封疆萬戶侯”自炫，臉皮實在太厚。

中國的官老爺，特別是黨老爺，向來是批評不得的，否則就是冒犯了他的官威。司徒華先生不過指出他“小詩不注意平仄的韻律”，他便勃然大怒，說司徒華是“惡意挑剔”、是“奚落”他、是“恨”他。連批評的時間也成了問題，難過“二〇〇五年新伊始”就不能批評人，一批評就壞了楊大人的彩頭？“時過二十一天”也不對，當天立即指正便可以？大概也是喝狼奶長大而又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緣故吧，楊文昌寫道：“我從未與司徒先生晤面，我與他之間也從未發生過筆墨官司，不知他恨從何來？”唔了面就可以批評？“發生過筆墨官司”的，才有階級恨、民族仇？楊文昌先生，你這樣蠻橫不講理的架勢，才“真讓人哭笑不得”呀。

共產黨人从毛澤東到楊文昌，都是死不認錯的，強不知以為知的。像王若水先生所說，他們總是用第二個錯誤來掩蓋第一個錯誤。“共产党的狂妄自大，成天逼

着大家承认它伟大、光荣、正确，就决定了它成了‘高贵者最愚蠢’，越来越没有自知之明，不断地犯错误，不断犯下新的罪行，而且越来越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陳世忠語）楊文昌也是如此，他用“李白、杜甫兩首膾炙人口的絕句”來證明他的“根本不存在統一的平仄規律”的偉大理論，反而進一步暴露了他的無知、他的孤陋寡聞、他的死要臉，因而丟了更大的丑。

幸好“李白如今聽不到你的高見了”，如果李白聽到你的高見，他都替你害臊的呢。既然“是一名外交工作者”、“寫詩，完全是小兒科”、是業餘、不會在死板的平仄韻律上下那麼大工夫，那麼在平仄問題上有些出入，原也不是什麼可耻的事情嘛，那何必一經人指出便“氣鼓鼓的”暴跳如雷呢？

中國人，特別是共產黨人，以為當了官便無所不會，而且以為官越大就本事越大。例如毛澤東，黨政軍固然內行，工農商教、三百六十行也是天然的裡手行家，終於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江澤民胡亂作詩，李鵬到處塗鴉，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出乖現丑。以為自己是香港的太上皇、是封疆大吏、是萬里侯的楊文昌居然敢在國學根底深厚的江素惠小姐面前班門弄斧，賣弄他一竅不通的、毫無文采、毫無詩意的“二十八字”！所以一經司徒華點破，便以為在美女前面面子全失而惱羞成怒。

更要不得的是楊文昌既因此要封司徒華的嘴巴，要司徒華犯不□“說那麼多多餘的話”。還“寫這篇短文，對他反唇相譏”：“人老了，退休了，在家讀讀書，看看報，或者外出散散步，找朋友聊聊天，逸享天年，比什麼都好。何必一天到晚總是氣鼓鼓的，看著別人的一切都不順眼呢？”（2005年1月9日《明報》）

楊文昌現在雖然在香港權勢薰天，對不順眼的司徒華也暫時還沒有辦法。但已經令香港人背脊驚出冷汗來了。有分析認為，楊文昌可能是項莊舞劍，表面針對司徒華，實質是敲打一切不聽話的人。楊文昌的惡形惡相清楚明白的告訴香港人，為了不讓姜維平、師濤、王炳章、高智晟、焦國標、盧雪松、李大同、唯色……的命運降臨到香港人頭上，香港人只能趕快起來，爭我們的民主、爭我們的自由、爭我們的普選！

（丙戌大年初三於深圳灣畔）



## 【编余小记】武宜三：右派分子袁炳南的罪状

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教授袁炳南，于1957年被中国共产党打成了右派分子。他有什么罪过呢？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在编辑《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时，为袁炳南的“右派言论”加了一段《编者按》：

“袁炳南，男，数学系教授。袁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一贯与党对立，如三反中污蔑三反是政府为了逼黄金以买外汇，是敲竹杠，是公开绑架；学习总路线时污蔑学习总路线是为了动员买公债等。这里发表的材料是西师数学系四年级一班同学根据袁在各种场合下的言论综合整理的。”

下面就是袁炳南的“右派言论”了：

- 1·农民生活无改善，是由于干部多，要工业化，（粮食）多去换了机器。
- 2·党只要别人歌功颂德，而且歌颂慢了，还不行，犹如狗吃屎，慢了还要打狗，在军医大时，就因为歌功颂德慢了，所以受了打击。
- 3·现在不如国民党时民主。国民党时骂了，还起作用，现在骂了也不起作用；在选举时，不同意也要强迫同意，实在是强奸民意，犹如强奸女人，还要女人自脱裤子；以前选伪国大时，由于张洪沅请吃了碗面，故选（他），现在是由于要检查户口，怕怀疑为地主、反革命分子，故参加选举。如要诚心扩大民主，只要诚心听人的话就是民主。
- 4·党只能在政策方面领导，如同英国女王那样。
- 5·新疆石油公司等，初期为中苏合办，这是苏联大国主义的表现。
- 6·学习苏联问题，硬是学得一团糟，如组织疗法的学习，硬是乱来，样样都来个组织疗法，给你花（划--武注）个口口放一块肉进去。
- 7·斯大林没啥错，就是有点喜欢拍马屁，这是人之常情，遇到斯大林这样的人物，拍拍马屁也好。
- 8·政治课，教育课为豆芽课。
- 9·建议老党员进养老院，年轻党员降二级，毕业生中的党员都派到边区去。
- 10·党委制治校也好，教授治校也好，根本问题要党有诚意。
- 11·封建把头正在形成，是领导宠之太过之故也。
- 12·中国的问题是人口多，故穷，艾德礼说中国人多的趋势，不无侵略，是有道理的。〔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

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

读了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按语》和《袁炳南右派言论》后，我真的非常感谢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当年西师数学系四年级（一）班的同学，他们当年真的以为中共这个党是多么的伟大，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党人是多么的圣洁，袁炳南又真的是有罪的人呢。所以就为我们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史料。（只是，当年参与“综合整理”的西师数学系四年级（一）班的同学，至今还有几个健在吧，他们会不会为自己做过的坑人勾当而羞愧呢？）

如果，换了今天，中共宣传部绝不敢再如此“如实”的记载这些反动言论了。相反，今天如果还这样公开这些言论，就要犯扩散罪了。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共领导集团比他们的太祖、太宗更没有自信了，已经不堪言状了。例如，他们抓了刘晓波，是绝不敢说是因为他参与了《零八宪章》。

其次，当然佩服袁炳南教授的洞察力。“三反是为了逼黄金以买外汇，是敲竹杠，是公开绑架”；“学习苏联问题，硬是学得一团糟”；“选举实在是强奸民意，犹如强奸女人，还要女人自脱裤子”；谁说不是？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现在不如国民党时民主。国民党时骂了，还起作用，现在骂了也不起作用”，实在说的很高明。

这是国民党还讲一点脸皮的缘故。共产党则干脆是流氓无赖，根本不要脸皮，而且历来如此，于今尤烈。看看他们公开的抢掠，公开的男盗女娼，公开的卖国丧权，公开的把自己的国民（冯正虎）扔在日本国的门口一个多月——已经毫无羞耻之心了。

然而肯“骂”的人，多少还是与共为善的；如果连骂也不骂了，人们就要用刀、枪和火来说话了。例如杨佳，例如胡文海，例如瓮安人，例如通化人。

星星之火已经遍地，那么离燎原的日子还会远吗？

有人说，不要戈巴乔夫，就要来陈胜吴广了。

据说，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党内终于有人想改革了，我是乐观其成。

因为革命终究对谁都不是好事。

# 反右派運動與整人傳統——序胡显中：《纵论国是续新篇》

武宜三

## (一)

根據維基百科《各國諾貝爾獎得主人數》顯示，中國在四種科學獎項中基本上空白，因為屠呦呦其實是“中華民國”的產品；而周邊國家地區——日本 22 個、俄羅斯 16 個、印度 6 個、台灣 1 個、香港 1 個。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德國、蘇聯等，都拿到“四種科學獎”。中國的創新遠遠落後於世界水平，除了複製外國先進產品之外，從奶粉到航空母艦，沒有一樣讓人放心，這不是“新中國”人的恥辱嗎？

為什麼中國的社會科學不行，物理、化學、醫學、數學也大大的落後呢？

一、“歸功”於毛澤東在 1957 年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從此，“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行之有效的辦學經驗被徹底拋棄；外行領導內行，文盲、泥腿子橫行霸道，大學和科學機關淪為製作“螺絲釘”的生產線，文革期間居然把所有大學、中學、小學一起被關閉整整十年；現在更變成養豬場，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除出盛產貪官污吏、叛黨叛國分子之外，離它們天天吹牛的“第一流大學”也不知道還有幾萬幾千公里！只是這些不知羞恥的官僚仍然尸位素餐，假裝睡着。

天天吹噓“崛起”、標榜“世界第二經濟體”，但是錢到哪裡去了呢？一、世界銀行報告顯示，中國大陸 1% 的家庭掌握了全國 41.4% 的財富，高收入的國營企業高級主管與社會平均工資差距達 128 倍（RFA2010-06-09）。這是 2010 年的數據，現在當然更加嚴重。即使“北京、南京等地城鄉低保標準”也不過每人每月 710 元（北京）或者 700 元（南京）人民幣；結果，老百姓仍然是“看不起病、讀不起書、買不起房子”。

就是這一點可憐的低保，仍然被層層克扣，造成農民的極度貧窮、絕望。甘肅康樂縣 28 歲農村婦女楊改蘭在 2016 年 8 月 26 日用斧子砍死 4 個年幼子女後，服毒自殺；8 天后，楊改蘭的丈夫李克英也上吊自殺。而造成如此惡性案件的政府官員僅僅受到“留黨察看一年”甚至“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中共官員工資福利取自民脂民膏，受處分卻享受團體的保護和照顧！）

二、滿世界撒錢，中國援建斯里蘭卡的馬特拉機場、港口等工程，耗資 20 多億美元。中國援建烏茲別克的“亞洲最大隧道”和公路，耗資數百億。中國投資在利比亞的 300 億美元、伊拉克的 200 億美元、委內瑞拉 500 億美元，在敘利亞、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的巨大投資，都無望收回了。

一帶一路修往歐洲的 43 條鐵路幹線，42 條沒有貨物可拉，都在賠錢，各省市政府必須給每節車皮 3500—5000 美元補貼，以保持各鐵路幹線的繼續空轉……

這些都是反右派運動後“大躍進”傳統，不要內行，不要科學，不要人大批

准。

在《世界各国人均月收入一览表（已折合为人民币）》的 70 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 70 位，連保加利亚等前“社會主義國家”都跑在中國前面；可憐也夫，可恥也夫：

- 1 列支敦士登 46,520
- 2 卢森堡 46,123
- 3 挪威 37,435
- 4 阿联酋 31,137
- 5 冰岛 31,055
- 6 爱尔兰 29,479
- 7 瑞士 28,502
- 8 丹麦 27,806
- 9 美国 24,921
- 10 卡塔尔 23,539
- 11 瑞典 23,359
- 12 芬兰 22,283
- 13 荷兰 22,274
- 14 奥地利 21,827
- 15 日本 21,814
- 16 英国 21,410
- 17 圣马力诺 21,236
- 18 比利时 20,799
- 19 澳大利亚 20,377
- 20 法国 20,191
- 21 加拿大 19,930
- 22 德国 19,610
- 23 科威特 18,865
- 24 意大利 17,486
- 25 西班牙 16,370
- 26 欧盟 16,164
- 27 新加坡 15,828
- 28 中国香港 15,366
- 29 新西兰 15,358
- 30 汶莱 14,235
- 31 塞浦路斯 12,509
- 32 希腊 12,449
- 33 以色列 12,109
- 34 巴林 11,796

- 35 中国澳门 10,924
- 36 斯洛文尼亚 10,016
- 37 葡萄牙 9,944
- 38 韩国 9,574
- 39 中国台湾 8,889
- 40 捷克 7,305
- 41 沙乌地阿拉伯 6,884
- 42 匈牙利 6,436
- 43 阿曼 5,989
- 44 斯洛伐克 5,257
- 45 克罗地亚 5,074
- 46 墨西哥 4,379
- 47 智利 4,221
- 48 利比亚 4,022
- 49 波兰 3,903
- 50 俄罗斯 3,868
- 51 马来西亚 3,344
- 52 南非 3,208
- 53 委内瑞拉 3,184
- 54 土耳其 3,069
- 55 阿根廷 2,796
- 56 罗马尼亚 2,665
- 57 巴西 2,464
- 58 哈萨克斯坦 2,264
- 59 保加利亚 2,182
- 60 阿尔及利亚 1,854
- 61 秘鲁 1,711
- 62 安哥拉 1,709
- 63 哥伦比亚 1,675
- 64 伊朗 1,666
- 65 突尼斯 1,660
- 66 泰国 1,591
- 67 厄瓜多尔 1,581
- 68 塞尔维亚 1,536
- 69 阿塞拜疆 1,185
- 70 中国 1,155

經過反右派、大飢荒、四清、文革，中國政治環境一一步惡化。

終於到了“人人生活在恐懼之中”，從國家主席、總書記到販夫走卒，概不

例外。

把知識分子、把青年、把擁護自己的老百姓、把同志戰友當作敵人，對他們搞陰謀詭計(即使詭辯是“陽謀”，又有什麼區別呢)，“誘敵深入，圍而殲之”，把幾百萬人推入火坑，在條件嚴酷的勞改場所，造成知識精英、優秀黨員和幹部的大面積死亡，因此帶來的文化斷層、人才斷層至今仍然無法修復。

反右派運動不是孤立的，它成了一個傳統、成了一種慣性，從井岡山殺 AB 團、延安整風、1949 年的思想改造、(巫寧坤興冲冲的从美国回来，就赶上了。) 土改、批判胡適、批判胡風、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政治運動多如牛毛。

一生都致力於打倒傳統、毀滅文化、摧毀教育、破壞學校、消滅知識分子的毛澤東及其一夥，為什麼對中國、中國人民有如此刻骨的仇恨呢？

(二)

但是整人是有报应的——

商鞅、李斯，作法自斃，自斷後路，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

未俊臣、周興，沒有好下場。

李韶九、夏曦，殺人無數，功勞如山，最後死於非命。

康生、謝富治，僥倖善終，骨灰還是被扔出八寶山，禍延子孫。

文強、王立軍、何挺、丘進、馬建、周永康，九九歸一，結果都是階下囚。

陳紹基、朱明國、周永康，都是雙規別人的人，如今被人雙規。

斯大林的衛隊長從雅哥達、叶若夫到貝利亞，中國的從楊尚昆到令計劃、孟宏伟，心狠手辣，“忠心耿耿”，到底只保衛了別人，而不能保衛自己。

“陳泊、陳坤案”是 1949 年開國後公安系統最大的人為冤案。廣東省公安廳幹部被抓 700 多人，廣州市公安局幹部被抓 300 多；被酷刑審訊，羅織構陷，給黨國帶來巨大傷害；雖葉劍英也無法保護其手下愛將。

因為羅瑞卿拿的是毛澤東的尚方寶劍，親自南下廣州抓人辦案。

到 1966 年，意氣風發的羅瑞卿也被逼得跳樓自殺，這時不但劉少奇、鄧小平熱嘲冷諷，葉劍英也吟詩湊熱鬧：將軍一跳聲名裂。羅點點含恨至今！

羅瑞卿接班人李震自殺、謝富治被秋後算賬。公安保衛，權力太大，也最危險。權力太大，奉旨殺人、隨心殺人，殺人沒商量，血債太多，難免有報應，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手執鎮壓之權的人，你們的後背不發涼嗎？

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林彪、張霖之、田家英、吳晗.....固然被整死；但是，毛澤東一死，江青、毛遠新即被下獄。毛澤東立馬成了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家屬”，為天下笑，報應之快。翻掌之間。

毛泽东当年在《沁园春·咏雪》中發的正是帝王复古梦。有人批評他是黃巢、李闯之流，没错，毛澤東是成功了的黃巢。民间傳說“黃巢杀人八百万”，已是“空前”，却未能“绝后”，被毛杀死、害死、饿死的中国人是八百万的十倍八倍。毛澤東在庐山会议上又哭又闹：“一个儿子在朝鲜死了，另一个疯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说得好，也是现世报应！毛澤東肯定“空前”了，但是否“绝后”？就看我們能否彻底清算毛澤東和反右派運動。

想劉少奇攜妻王光美，到處吹捧“桃園經驗”，得意洋洋；1966年還“依樣畫葫蘆”想在學生在學生中抓右派，真是利令智昏。

昨天還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親密戰友”、“可靠接班人”，今天成為“反革命分子”、“走資派”或者腐敗分子。

昨天如果你反對他們，犯的可是“攻擊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陰謀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罪，今天，他們被打倒了，你卻不一定能翻案。例如，林昭、劉文輝、張志新，雖然被“平反”了，卻仍然不能見光。

內鬥不斷，殺人如麻，殺的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什麼不學習香港、台灣的成功經驗——公佈官員財產、開放輿論監督、把選票還給老百姓呢？



# 【清史研究】新加坡清史研究學會 Qing History Society—Singapore2014.7.24

## 武宜三：《“吳三桂不是漢奸” 论》

吳三桂被人罵為“漢奸”，罵了三百多年。真是冤哉枉也！

最近共軍空軍副政委劉亞洲將軍又一次提到吳三桂。他說：“漢族是沒有愛情的一個民族。別看漢族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它沒有愛情。外國因為愛情可發生戰爭，中國行嗎？吳三桂算是為愛情打仗的男人了，偏偏又是個漢奸。”言下不無遺憾之意。顯然劉將軍對為愛情而打仗的吳將軍不勝豔慕，敬仰有加。可惜他為了從眾，不得不加個尾巴——“偏偏是個漢奸”，使劉將軍這個率真的男子漢形象，失色不少。

去年本港有人應邀去美國出席參議院聽證會，就被富商、英王御封爵士胡應湘指為“是吳三桂，是漢奸，引清兵入關”，去美國出席聽證會是否就成了吳三桂且不說，但把吳三桂當作漢奸，肯定大錯特錯。引清兵入關乃愛國行徑，決非賣國行為。所以吳三桂是愛國人士，是愛國分子的老祖宗。況且胡應湘本身受了英王的冊封，如今“登上城頭罵漢人”，居然罵的還是“漢奸”這兩字，實在極具諷刺意味。

吳三桂同志請清兵入山海關，是 361 年前，即西元 1644 年(甲申)四月的事。此時離開他原來所效忠的明朝中央政府的垮臺，已經一個月了。大明國的國家元首兼政府總理兼三軍統帥的“朱姓權貴黨”朱由檢主席，在李自成的大順紅軍進北京城的三月份，就上吊殉國殉黨了。吳同志本想投靠李自成的大順國革命新政權，可惜李自成們賊性不改，不但沒有“三大紀律”、也沒有“八項注意”，更不懂收買人心、亂開期票的“統戰”伎倆，反而縱容各級幹部大搞腐敗，劫掠姦淫，抓了吳三桂的老爸（勒逼錢財）不算，還搶了吳三桂的漂亮二奶，硬生生地把吳三桂同志推向了大清國。

其實，大清國的滿族同胞，也是大明帝國大家庭的一個成員。當年明帝國中央對滿族同胞實行的也是“一國兩制”、“滿人治滿”，封愛中、愛朱又愛滿的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建州左衛都督”——滿洲特區行政長官，時為萬曆十一年(西元 1583 年)。比董建華同志當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還早 414 年呢。

鄧小平說“一國兩制”是他的“發明”，分明胡說八道，是盜竊前人版權的侵權勾當，是貪天之功為己有。歷史事實是：起碼自漢唐以來，中央政府就開始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有別於內地的管治政策，讓當地少數民族的首領、頭人或土司充任行政首長，當年滿洲的努爾哈赤不就是今天香港的董建華、曾蔭權或澳門的何厚鏞嗎？

後來因為明王朝越來越腐敗，努爾哈赤才開始造反，鬧獨立，搞滿獨，建“大

金國”，自稱皇帝。這如同上世紀 20 年代毛澤東共產黨在“中華民國”的江西省搞了個“中華蘇維共和國”一樣：不過是國中之國，屬父子或兄弟之爭。實在稀鬆平常，沒啥了不起呀！“大金國”變“大清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一碼子事，這就是“歷史驚人相似”之處呢。

吳三桂同志參加滿清國革命隊伍，引進“威武雄壯之師”，也同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將軍把中華人民解放軍請進北京城一樣，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不一樣是，吳三桂封了個“平西王”，裂土分茅，坐鎮雲南，威風八面。而傅作義則完全被共軍繳械，不但不能“共管北京”，還差點要以“戰犯”之身被送軍事法庭受審；後雖蒙毛澤東同志開恩，撈了個有職無權的水利部長，可也沒幹幾年就投閒置散了；傅作義在文革中的 1977 年死去，許多部屬被殺被關被管

殆盡。親弟傅作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留美水利專家，（武宜三按：經過專家

指正，傅作恭先生沒有去過美國。2019.3.13）傅作義勸說其回國支援祖國社會

主義水利建設，1957 年在甘肅省成了被引出洞的大蛇而打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極右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做超時間、超負荷、超體能、超過極限的苦役，受盡侮辱、折磨，在大饑荒的 1960 年被餓死，連屍首都沒有找到。大女兒傅冬菊雖然在出賣民國、出賣父親，勸說傅作義投共中立了“大功”，在《人民日報》當個只會說假話而不會說真話的害人記者，也備受冷落，鬱鬱而終。

區別只是吳三桂已經是君死國亡、無國無君的“游離分子”，他愛去哪里就去那裏，所以乾隆並沒有把他列入《貳臣傳》，而傅作義的效忠對象——中華民國政府還在南京，看來傅作義要入《貳臣傳》的了。

再如施琅同志，原是“民族英雄”鄭成功手下將領，叛逃後當了大清國帝國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他在以康熙皇上為核心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大清中央政府英明領導下，組織和指揮了平定臺灣的戰役，用非和平的方式，“確保臺灣入版圖”。雖然居功厥偉，但 300 多年來卻也被當作“漢奸典型”，備受唾罵。前幾年時來運轉，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他平了反，追封他為“解放臺灣，統一祖國”的大英雄，把他的畫像豎在天安門廣場，從而含冤得雪，吐盡了一肚子烏氣。

所以，吳三桂和施琅、傅作義“一樣”，都是實實在在的為新生革命政權立新功的功臣，都是如假包換的“愛國”人士，劉亞洲、胡應湘卻誣之為“漢奸”，您說他們該不該打屁股？

試想，當年吳三桂如果不幫大清國消滅李自成流氓政權，肅清腐朽的朱明王朝殘餘勢力；那必定出現“一邊一國”或“東一國、西一國”、“北一國、南一國”的分裂局面：關外大清國，關內大順國加大明國，使祖國的統一事業大遭挫折。那吳三桂才真正是千古罪人，成為不折不扣的漢奸呢。請問劉將軍、胡爵士：

你們願意做這樣的罪人和漢奸嗎？

寫到這裡本應打住，只是想到兩個問題，就順便請教一下胡爵士：

一·閣下在大陸大辦電廠，大建高速公路，猛刮人民幣，好象總沒有賺夠的時候。可我記得閣下卻把巨額美金捐給一間帝國主義的大學，讓它多多培養顛覆社會主義陣營的反中、反共、反革命的知識分子。請問閣下：這種吃裡扒外、劫社濟資、劫中濟美的反骨行為也叫“愛國”麼？

二·閣下肩著敵對國家賜封賜的爵號，卻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大會堂裡和馬力、鄭耀棠等紅五類一起參加“管理國家事”，是否有角色衝突，心裡是否發虛？(《议报》2005,5,17)

〔2014.7.25 註〕今天重讀這一篇 9 年前的舊文，雖然結論仍然正確，只是形勢已經大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大會堂”裡坐著的多半(官方有具體數字, 一時做不到) 早已經都是外國人和外國人的親屬——一批真正的漢奸了。(新加坡清史研究學會 Qing History Society – Singapore 2014.7.24)

## 这是一个毁灭文化、毁灭青年，也毁灭了未来的时代

——序周光壁老师《路在何方？——一个书香大家庭的悲欢离合》

作者：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

〔按：本书因故没有出版。〕

周光壁老师的《路在何方？——一个书香大家庭的悲欢离合》要出版了，他让我写几句话，我当然“义不容辞”。

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收集、整理和研究反右派运动的资料。推介受难者的有关著作，自然成了我重要的任务。

由于本书编辑的介绍，这次与周老师可算是“不期而遇”。

但是因为《路在何方？》的原始版本《直面人生》、《花落花开》、《岁月悲歌》我都早已经拜读，所以又是“如见故人”。

这个经过补充、修改，附了很多照片的海外版，仍然让我看得气愤难平：

一个大好的知识大家庭被摧残的七零八落、家破人亡；一个翩翩佳公子被流放山区农村受尽折磨、九死一生；本来对国家可以有大贡献或者更大贡献的一代青年学子却无端被迫害、被扼杀；“革命”功臣、抗日英雄被打成反革命，被消灭；棒打鸳鸯、如花美眷被拆散……

能不痛心疾首？

周光壁老师的一家，是“知识大户”、“教育世家”，转眼间，变成了“右派大户”、“反革命世家”——除他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外，他的父亲周大娘、大

姐周光莹、两个姐夫——赵一明（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起义”的策划者之一）、杨宁祖也是右派分子，全家有5个右派分子。当过远征军、打过日本的大哥周光垣由“历史反革命”被“升格”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劳改十五年。其中，赵一明自杀未遂、杨宁祖受迫害致死。

像这样的“右派大户”还有许多：

最著名的有国军上将王缙绪一家。

王缙绪将军是“起义”将领，1957年看到许多朋友被打成右派分子，要申请去香港，结果自己被害，儿子和孙、曾孙辈也有十多人受到残酷迫害：

长子王泽浚（国军中将，曾任第9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任44军军长），王泽浚追随父亲王缙绪出川抗战8年，父子俩率200多万四川子弟兵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粤赣边区和西峡口会战等战役。父子二人都获称为抗日名将。在淮海战役中，因头部重伤被俘，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26年，1974年被打死于狱中，是唯一未被特赦的“战俘”。

王泽浚发妻胡伯媛（1904 - 1964）也是死在监狱里。

王泽浚共有三个儿子：

——长子：原名王凤昌，改名王复加（人民出版社编审），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劳改共22年。

——二子：王凤灵（成都医科学院脑外科主任，医学专家），运动初期被整

死。

——三子：王凤翔特级教授（航空院校高级教授及高级科研专家），被打成右派兼反革命分子。

王缙绪二子：王泽汉，被运动惊吓病亡。

王缙绪三子：王泽资〔王大虎〕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

王缙绪四子：王泽重（工程师）以反动学术权威，被打成右派分子。

——王泽重的儿子王凤律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王缙绪五子王泽东（王立新），1932年出生，194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22期，安排台湾东南长官公署工作，未去，改调贵州宪兵十二团任少尉队长，刚任职就被捕入狱30多年，至1981年出狱，已成60岁的老童男，因工作年限已过，无职，居成都，已故。

王缙绪七子王泽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关押数年，死在狱中。

王缙绪八子王泽嘉，在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后已故。

王缙绪九子王泽绵，在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23年，现居成都。

王缙绪十子王泽庸，是在重庆大学三年级学生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现居重庆。

一家竟出了十多个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只有第六子王泽远，16岁考入海军，在美军十三航空队工作，后随军到台，1955年以少尉军官退伍。后成为台湾著名作家（高庸），得善终。

重庆康家，“工商大户”的康家三代共有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国干、康国隽、康国杰、康宏道，再加康心之之女婿甘培根，总数达7人之多。

江南黄家，黄炎培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一个外孙王实方，加上黄炎培本身是毛泽东御封的不戴帽的右派，他家就有六个半右派分子。

上海杨家，杨兆龙（国民政府最高院检察署前代理检察长、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及其长子杨任远、次子杨定亚、女儿杨黎明，女婿陆锦碧，一家5个人都是右派份子。

湖南杨家，杨树达一家也是由“知识大户”、“教育世家”变“右派、反革命大户”，儿子杨德骧、杨德豫、杨德嘉被划为右派分子；两个女婿袁久坚、周铁铮，是右派兼反革命分子；侄子杨伯峻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自杀身亡；大儿子杨德洪是杨树达一再写信动员其回国的，而落个“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外甥女儿彭慧、外甥女婿穆木天，均是教授，双双成了右派分子；一个家族起码有九个人遭殃，加上旁支，则“不计其数”。杨树达本人死得早，否则也一定遭殃，其子杨德嘉慨叹：“我认为父亲去世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甘肃水家，也是“知识大户”变“右派大户”的典型。水梓，是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指名让他“放毒”，一开口就打成右派分子。长子水天同，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次女水天长，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教师，四子水天中，



甘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都打成右派分子。三女水天光，因是右派女儿，不断受到歧视和打击。文革中，被批斗、殴打，死在河边，自杀还是他杀，不得而知。三弟水柈，1957年八月留下“士可杀不可辱”的遗言离家出走，至今生死不明。这一家6人遭殃。

中华书局副总编、古籍出版社副总编章锡琛（开明书店老板）和他的五弟章锡洲（中国图书公司）、次子章士敦（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第四部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次媳妇王清华、侄儿章士寰（中央军委总干部部）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鲜英是“民主大户”，从1938年开始就同中共打得火热，他那座叫“特园”的公馆简直就是土匪窝，民主同盟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开的；最后还把特园捐给共产党。就这样，中共还是把鲜英，他的子女鲜继坚、鲜继平，一起打成右派分子。鲜家由“民主之家”变成“右派之家”、“党与共和国的敌人”。

现在移居加拿大的女作家石贝，她父亲三连襟，她舅父三兄弟，6个人都是右派分子：欧阳静戈即石贝尊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医学专家，民航局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两个姨丈，一嵇(ji)成武是福建农学院教授，一杨烈是上海复旦大学研究莎士比亚诗剧的翻译家。三个舅父：梁其田，美资电影院的经理人；梁其昌，水产部高级工程师；梁其琛，医学博士，上海第二医学院外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二级教授。这可都是社会精英呀。

其他父子、母女同榜，兄弟、夫妻联袂，师生、师徒同科的，不计其数。丁抒先生在《阳谋》中举了不少例子。楼乾贵，中央歌剧院演员，右派分子；他哥哥楼乾富，天津市人民银行，右派分子；他的弟弟楼乾裕，1965年“投奔祖国”，从台湾回来，马上就变成反革命，抓去劳改。楼乾裕先生后来移居香港，常常参加五七学社的活动，两年前归主，思之不胜唏嘘。

周光壁所在的四年级 80 多名同学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者就多达 14 人。魏力仁、刘文辅二人系极右分子，“犯罪情节极其严重，态度恶劣”，被开除学籍，处劳动教养处分；张士清、朱元祯二人“罪行情节严重，认罪态度不好”，给予保留学籍，下放农村劳动察看处分；周光璧、张炳泉、傅维潼、刘宇、王石生、王文彬等 7 人受保留学籍，留校查看处分；卢尔德思罪行情节较轻，态度较好，免于行政处分。张乐仁、张兴仁，因有一门学科成绩不及格，受勒令退学处分而离校。

就这样，文化被毁灭、学校被毁灭、教育被毁灭、人才被毁灭。以至于一个 13 亿的“人口大国”，六十年来除了有两个“政治犯”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个得文学奖以外，科学技术方面的诺贝尔奖项，一个也没有。

最初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受到莫斯科和苏联特务的操纵，但是，那到底是由一批有知识，有抱负——要改变落后中国的热血青年组成的。

自被毛泽东所劫持——一群土匪、兵痞、流氓、二流子代替了教授、大学生以后，中共就成了反文化、反秩序、反知识、反民族、反国家的武装卖国集团；

从此，知识分子就长期被愚弄、被奴役、被迫害、被杀戮。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与知识、与知识分子为敌的反动纲领；而大开杀戒，则是他上了井冈山、抓到刀把子后，直到他去见马克思，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杀人：杀 AB 团、肃托、延安整风、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三五反、反胡风、肃清反革命、反右派、三面红旗（大饥荒）、四清、文革（文革中又包含了许多运动——批“三家村”、扫“四旧”、批刘邓反动路线、反“二月逆流”、“一月风暴”、“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临死还来一个“四五天安门事件”……他一生发动的所有运动，几乎都是在对付知识分子。

而反右派运动则是最严重、影响最恶劣、为祸最深的一次灾难性事件，这个运动不仅制造了 180 万到 310 万、包括中共党员、干部在内的各阶层人士成为贱民、使知识分子从此禁口、使挂着“人民”、“共和”招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彻头彻底、彻里彻外的“党天下”、“家天下”，使国家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停滞不前、长期落后，人民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也使共产党的诚信破产，使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逐渐流失。

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由于是反右派运动的第一号打手，双手沾满鲜血，就至死不肯为右派平反，仍然坚持毛泽东路线，把反右派运动说成“有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而已。1989 年，干脆把坦克车开进北京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血洗天安门广场事件，彻底暴露了他与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血迹斑斑的历史和现状，证明了这个时代是一个毁灭文化、毁灭青年，也毁灭了未来的时代。

《路在何方？——一个书香大家庭的悲欢离合》出版了，我希望有更多的1957受难者和他们亲属、后代，当年的知情人，都来向周光壁老师学习，都来书写当年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我们不写谁写？

“抢救记忆，保存史料”，让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告诉我们的后人：不能再搞这种既害人又害己更害国家民族的所谓政治运动了。

我希望中共当局学习国民党的勇气和气魄，改弦更张，放弃马列斯毛以“斗争、杀人”为核心的绞肉机理论，加快政治改革步伐。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成立专门委员会，彻底揭发清查批判毛泽东和他的一伙反文明、反进步、反人类的独裁专制的反动路线和罪行，向包括反右派运动在内的一切运动的受害人道歉、请罪并做出合理的赔偿。

(首发《纵览中国》2012.10.10/2019.11.20 补充)

## 《拒絕遺忘——香港丁酉反右六十周座談會論文集》校對小記

——武宜三

《拒絕遺忘——香港丁酉反右六十周座談會論文集》終於由陳愉林先生編輯完成。

陳愉林先生是當年最優秀、最富有理想的知識青年之一，可惜他被他所獻身的黨和領袖所出賣，毀了他寶貴的青春和事業，如今已經 80 歲高齡的陳愉林先生，仍然拖著有病之軀，為自己和整個右派群體申冤辯白，討還公道。真是天理何在？！

我從 1957 年讀中學時就開始看右派分子的文章和批判他們的文章，到今天整整 60 年。初則驚訝，繼之疑惑，再之恐懼，最後是憤怒！

毛澤東的反右派，絕對是古今中外最下流、最無恥、最噁心的行為，“一國之君”、“偉大領袖”竟然可以利用人們對他的愛戴來下套、挖陷阱，“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反復無常、食言自肥，用心之惡毒、手段之卑鄙，一下子毀滅了中國幾百萬知識精英，從此毀滅了中國的教育、毀滅了中國的大學、毀滅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傳統道德，也徹底破壞了毛澤東和共產黨自己的被信任度，從此中國再沒有“誠信”，中國成了謊言的世界、互害的社會，因此造成的大饑荒至少餓死 3,600 萬農民、因此引發的文革讓所有中共幹部（從劉少奇、鄧小平、林彪、江青到生產隊隊長）統統被打倒；劉少奇、林彪、彭德懷、賀龍固然死無葬身之地，毛澤東也成了全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家屬。

60 年後的今天，中國的大學離“世界第一流大學”越來越遙遠，不但沒有培養出一個大師，也培養不出一個諾貝爾獎得主（技術、醫學、經濟學等）；卻培養了數目巨大的假博士、假教授，培養了無數的貪官污吏、叛徒、賣國賊！（為此，我建議解散教育部，把歷任教育部長送上法庭！）

最後，我舉一個例子，看看當年這個反右派運動到底怎樣浪費人力、糟蹋人才。

沈君翹，是公私合營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的一個右派分子。

沈君翹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79 年被糾正。22 年之間，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合肥市，到安徽省的無數個機關、無數個人員，為他寫了至少 14 個等因奉此的“文件”——

中國共產黨公私合營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委員會：《062-01-0143-024 對右派分子沈君翹結論處理意見 19580213 中國共產黨公私合營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委員會 1》

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整風領導小組：《062-01-0143-002 對右派分子沈君翹的結論處理意見 19580213 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整風領導小組 1》

中國共產黨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畜牧業支部委員會：《062-01-0143-016 對右派沈君翹的一年來工作簡要彙報 19610131 中國共產黨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畜牧業支部委員會 1》

中共合肥市委改右辦公室：《同意摘沈君翹右派帽子的批復 1962.9.27 摘字 [1962]5 號》

合肥市紡織工業局：《062-01-0143-003 確實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審核表 19620924 合肥市紡織工業局 2》

合肥市紡織工業局：《062-01-0143-004 報告中提出三點要求：對他的問題作一次核實；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在農場事情不多，要求回場勞動 19620821 人信字第 384 號合肥市紡織工業局 2》

合肥市紡織工業局：《062-01-0143-007 關於右派分子沈君翹的材料 19620618 合肥市紡織工業局 1》

合肥市紡織工業局：《062-01-0143-008 關於右派分子沈君翹的材料合肥市紡織工業局 1》

合肥市紡織工業局：《062-01-0143-011 右派分子沈君翹主要悔改表現 19620926》

合肥市紡織工業局：《062-01-0143-012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沈君翹的悔改表現》

中國共產黨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畜牧業支部委員會：《062-01-0143-014 同意給右派分子沈君翹取消右派分子帽子報告 19620923 中國共產黨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畜牧業支部委員會 1》

安紡總廠監督小組：《062-01-0143-015 對右派分子沈君翹的檢查材料整理 19620923 安紡總廠監督小組 4》

中共合肥市委改右辦公室：《同意摘沈君翹右派分子帽子批復 1963.12.25 摘字[1963]5 號》

合肥市紡織局：《關於對沈君翹同志劃為右派問題的改正結論 1979.1.20 紡複字[1979]3 號》

而安徽省把 31,472 人打成右派分子，另外還打了 7,500 人反社會主義分子。（樂亭文化研究會）

多麼精緻的龐大的整人系統，多麼威力無比的無產階級專政，至此，我終於明白，中國為什麼沒有大師、沒有諾貝爾獎，甚至連奶粉也做不好，火箭會中途掉下來，遼寧號為什麼是烏克蘭的破爛，還跑到香港來冒黑煙……

現在，習近平主席冒著亡黨亡國的危險，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大舉清除貪官污吏，以法治黨、以法治國，欲挽狂瀾於既倒！只是我以為，陷入信任危機的執政黨，必須正本清源，兌現 1945 年以來對中國人民作出的承諾，尊重憲法，一切政黨和個人都必須在法律以內活動，向包括右派分子在內的近百年所有政治運動、軍事行動的受害者道歉、作出合理賠償，這樣，中國才可以長治久安，民富國強才有希望。（22017.8.8 於吉隆坡）



《孔令平和他的巨著〈血记三部曲〉》(2009年10月10日)

重庆市的右派分子孔令平先生于2013年10月9日上午去世了，这是重庆的朋友告诉我的。突然看到这则电邮，禁不住流下眼泪来。我的朋友说：“他虽然性子急躁，也得罪了不少人，但他一直在抗争，在同当局战斗，眼下像他这种右派并不多，中国又少了一个斗士。我明天去他家为他送行。”我们都为孔令平的逝世感到非常难过。

是的，前些日子山东省的右派分子李昌玉先生刚刚走，孔令平先生是我知道的最近的第二位。之所以很难过，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网络上“认识”很多年了。现在他走了，永远没有机会再见他了。

他的确是个勇敢的右派分子，他不断的批判毛泽东，批评当局，坚持维权。当然，所有右派分子都有古怪脾气，他也有。他给了我两部书稿《血记三部曲》、《一个苦难的灵魂——我的母亲方坚志》，我们除了在出版问题、写作方法上，有过不同意见外，我在“钓鱼岛问题”上曾经批评过他，在他儿子某些问题上，我也没有更多的去安慰他——我应该向他说句“对不起”。

由于经费问题，我只为他出版了《我的母亲方坚志》，因为销售得非常不好，没有办法出版《血記三部曲》，于是只好到处介绍朋友给他，希望能完成他的心愿——把苦难的历史留给后人。结果引起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注意，于2012年成功出版《血記三部曲》。

孔令平先生1937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7年在重庆大学机械制造系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因为抗日战争，从小跟着父（孔祥嘉）母家人到了重庆。

1949年，父亲决定离开大陆去台湾，却由于母亲的反对，未能成行。母亲认为她和当年的同窗和老师曾在重庆一同参加抗日的活动。而这些同窗多半都去了延安，已经成为中共所依靠的各级干部，她完全可以在中共占领全国以后，重新找到安静的生活。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个家——像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家，从此跌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没有任何罪过的父亲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捕。

1948年，在顾毓秀举荐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校长的父亲，一介书生。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逮捕，1956年瘐死狱中，一个没有任何罪错的教育家就这样被毁灭了。虽然父亲的被害直到30年后的80年代，经过一再追问，才被告知，但是这并不妨害他母子成为“反革命家属”而受到迫害。

以为自己应该是中共统战对象和“盟友”的母亲方坚志，于1941年创建了嘉陵中学，一个对教育、对学生无限爱恋的教师，连“有一口饭吃”的卑微的梦想也破灭了。33岁就成了“寡妇”、“反革命家属”，从此生活在恶梦和苦难之中。

1957年，正在重庆大学读书的孔令平和母亲一起跌入毛泽东的阳谋陷阱，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方坚志在领导的诱导下，委婉曲折、小心翼翼地“向党组织”提出关于孔祥嘉被逮捕和去向不明的疑问，便被划为右派份子，送去“监督劳动考查”，每月仅22元生活费，上携年过七旬的老母，下牵年仅13岁的小儿子。在

重庆大学读书的孔令平的罪名是：“趁党整风之际与母亲密谋策划共同为反革命父亲翻案。”孔令平母子犯的都是株连罪。

1960年，孔令平被逮捕，判处18年徒刑，送去劳改。1961年，孔令平的外婆在饥饿和挂念大外孙的痛苦中死去；跟着，母亲和弟弟被送到一家农村医院去接受改造，受尽屈辱、折磨甚至殴打。

十年浩劫期间，孔令平因为直呼“打倒毛泽东”，被申报死刑(没有批准)及加刑至20年。1967年，年仅23岁的弟弟无故被枪杀，母亲痛不欲生，自杀未遂。

1979年，孔令平虽然被“平反”了，但入狱20年的工资一直没有补发。1999年，母亲逝世。孔令平至此成孤家寡人了。

以下是孔令平“劳动改造”的经历。

1955年毕业于重庆市第十三中学，并考入重庆大学机械制造系。

1957年11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因受到父亲的“殊连”），同年5月由学校押送到南桐矿区丛林煤矿劳动考查，1960年1月被南桐公安局逮捕，同年8月由南桐法院判处18年徒刑，1960年9月去重庆市第二监狱（孙家花园）“劳改”。

1962年3月放逐到四川省甘洛彝族自治县“劳改”，1963年2月流放西昌盐源县969信箱“劳改”，同年6月押赴该农场古柏分场“劳改”，并于7月进行了为期4天的第一次绝食以示抗议。

1963年8月押赴二道沟分场进行了一年的禁闭反省。1964年9月放出小监，进行为期10天的第二次绝食抗议。

1966年3月关押于盐源农场第六中队，并叫去成都参观农业学大寨的图片展览。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疯狂的斗争会上孔令平直呼“打倒毛泽东”，1966年10月，六中队管教何庆云宣布场部管教已因其狂呼反毛泽东及反文革，申报了死刑（后来该队队长郭川小告诉孔令平，因农场第一把手高德胜反对，死刑没有准），并于1967年4月21日召开宣判大会以加刑至20年了结此案。

1968年6月在农六队进行了连翻斗争，为抗议斗争孔令平进行为期7天的绝食抗议。

1974年被管教科再次警告孔令平，再反对毛泽东定杀不赦。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共产党却偏偏“得天下英才而毁灭之”。一是毁灭作育英才的学校和教师，二是毁灭可以成英才的青年、少年甚至儿童。孔家就被毁灭4个：两个教师，两个学生。

总之，1949年时不肯离开中国或者1949年以后主动以及非主动回到中国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所以，中共一伙所谓“辉煌60年”，只不过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无耻的自吹自擂罢了。

孔令平留下的作品有：《血纪三部曲》、《我的母亲方坚志》及许多网上文章。

我写挽联寄去——

孔令平先生不朽

沉冤未雪六十年

血泪千秋两部书  
香港五七学社武宜三并全体同仁挽  
2009年10月10日于避秦山庄  
(《揭露》首发)

## 又一个香港市民被没收《回乡证》

2009年10月26日，“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刘家仪在北京机场过关时，遭到中国边防公安拦阻及扣留，被以触犯所谓《国家安全条例》，危害国家安全，从事国家及政府不允许的活动为由，遭拒绝入境及没收《回乡证》，即日遣返香港。

“天安门母亲运动”于10月27日特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披露被拒绝入境中国及没收《回乡证》并即日遣返香港的过程。

刘家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从2003年‘七一游行’后，自己的入境情况发生明显变化，例如边防人员会查询很多问题，但从未被拒入境或扣查；直至今年5月31日，在广州入境时，边防公安以上述同样的理由，即触犯《国家安全条例》，危害国家安全，从事国家及政府不允许的活动，拒绝本人入境，并立即被遣返。”

但是，究竟触犯了《国家安全条例》的哪一款，哪一条？中国方面一直却拒绝回答。也没有拿出刘家仪“危害国家安全，从事国家及政府不允许的活动”的证据。

刘家仪认为：据其所知，有些从事经济纠纷的一般市民亦遭到这种对待。希望特区政府不要再漠视香港人的权利被剥削而无动于衷，应主动协助市民，并与中国政府交涉此问题。

刘亦表示：凭其过往经验推论，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则以“天安门母亲运动”为主。该组织要求中央政府人道对待“六四”受难者家属，以及支持她们为自己孩子讨回公道，主要的活动是在香港从事人权教育，与市民一样，以良心、道德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如果这样都被打压，中央政府就是滥用《国家安全条例》对香港人作秋后算帐。

因为刘家仪在中国除了读书上学，就是旅游。从来没有在中国境内做过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

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民主党总干事陈家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发表讲话。他们各自介绍了自己被无理剥夺回国权利的历史，一致谴责中国政府对《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粗暴践踏，把手伸到香港，企图干涉香港人的自由，用限制出入境的不正当手法来干预、惩罚香港人在香港境内所进行的、符合香港法律的言论和行动。

他们认为刘家仪小姐如因参与“天安门母亲运动”而被拒绝回国，这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因为中国政府于1997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89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故中国政府违法的行为也是严重违反国际准则的，更是对一国两制的打击，对香港人信心的打击。

在会场散发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一份《声明》要求：

1. 中央政府应清楚交代拒绝香港人入境及没收其回乡证的原因；

2. 特区政府必须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协助市民，并与中央政府交涉。

3. 中国已签署《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因此，中国政府应立即发还回乡证，恢复他们的回乡权利。特区政府亦应该捍卫香港人的基本人权。

“天安门母亲运动”正考虑以下跟进行动：

1. 联络其它被没收《回乡证》的人士，包括从事经济纠纷的一般市民；
2. 采取法律行动，循法律途径要求中央政府发还证件。

记者注意到，二十多年来，除民主派人士，民主党和支联会成员被没收《回乡证》以及拒绝发给《回乡证》以外，香港市民被没收《回乡证》也已经司空见惯了；耳熟能详的有，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苹果日报》记者蔡元贵等。没收《回乡证》的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人数越来越多。

现在，连持有效《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也要被拒绝回国了。

最近，上海维权律师冯正虎手持有效《中国护照》从日本回国，多次被自己的祖国拒之门外。一星期前，以小乔为笔名的上海作家李剑虹同样持有效《中国护照》回国，两次被深圳口岸无理地拒绝入境。

一个拥有几百万军队、几千万警察和特务的强大政权，为什么会这样害怕一个书生，害怕一个弱女子呢？真是莫名其妙。

难道，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的要应验到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头上来了？

一方面是不让小乔等人回家，把自己的国民当作包袱摔给西方国家，为国际社会制造麻烦。另一方面，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廖亦武，几年来多次申请出国而不可得；冉云飞和艾晓明前些日子都被堵住，不让出境。

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怕人家进去呢还是怕人家出来？

这个毫无章法的执政党和它的政府，是不是真的要发疯了？

# 反高铁，反官商勾结，香港人第二次包围立法会

【中国信息中心 2010 年 1 月 8 日香港电】由于今天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第二次辩论、审议高铁 669 亿元高铁拨款，反高铁停拨款大联盟、80 后反高铁青年等团体今天继续发起在立法会大楼外集会，再一次包围立法会大楼，以阻止财委会通过拨款；主办团体在立法会门外放置两部大屏幕，直播财委会会议的情况。下午开始，立法会大楼周围歌声、口号声不断，而且一浪高过一浪。入夜后，人数越来越多，据主办方声称超过一万人。80 后反高铁青年的“五区苦行”由湾仔苦行至立法会，然后围绕立法会继续苦行。

交友网站 Facebook 多个群组发起今天的行动，青年人充分利用电子网络的动员功能，“全民 Big 爆立法会”群组据说有接近 5 万人参加。更有人要“准备暴动及流血”；还有报道说，有人声言已经准备打火机要焚烧区旗及国旗，甚至在投票前攻占立法会，或者在若财委会通过拨款时，再度冲击中联办。

所以警方十分紧张，在立法会大楼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港岛总区冲锋队、其它区的蓝帽子警员亦会候命出动，以应付突发事件。

受高铁影响的菜园村、大角咀等处居民也参加了今天的行动。菜园村居民今天摆了多个摊位，销售当地传统食品，还别出心裁地把茶叶蛋叫做“功能组别议员滚蛋”以示讽刺。

废除功能组别，是香港人深恶痛绝的政治肿瘤。示威团体还把这些政治乞丐的尊容予以公开示众，可惜，这帮被豢养的家伙，竟然都是厚脸皮，没有一个知耻而退。

今天也有工程、旅游、餐饮等人士打着“要工作，要养家，要吃饭”的横额，在立法会外支持政府兴建高铁，促请尽快展开工程。但是人数不多，故得到警方刻意的保护。

香港人，集会游行原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然而元旦的 3 万人大游行却引起左派议员郑耀棠以为有稻草可捞。公开表示“港人冲击中联办做法让北京震惊，会让当局认为香港已经失控。”

郑耀棠言论引起各界的批评及反弹。

元旦大游行发生的一点冲突，完全是中联办、北京当局“与民为敌”的态度和香港警方执行的一贯政策所引起的。警豪阻止示威者放置抗议物品假棺材于中联办，才演变成冲击的。

我不禁要问郑耀棠，你在强权和弱势之间，投靠了强权；在专制和民主之间，你选举了专制。你难道要做香港的陈希同，也要用人血把你的顶子染得更红吗？

在议会内，至少有 24 名议员提问及发言，由于群众抗议。经过 6 个多小时激辩后，广深港高铁拨款案再一次议而不决。示威人士取得临时性的胜利！（武宜三报道/摄影）



## 穷人比富人更容易堕落吗？什么话！

武宜三

四川省雷波县一些山民，把痴呆人员杀死在矿井下，以诈骗煤老板的赔偿金。有论者以为，这是因为穷人，尤其是最穷的人没有任何能够抵御堕落的资本，所以穷人比富人更容易堕落。

对此，武宜三先生则不敢苟同。1966年，北京那些丧尽天良的高干子女、红色衙内，如宋要武们的所作所为，是因为穷吗？

本朝太祖高皇帝，富有天下，威加四海，集全国工商企业银行土地森林于一人而挥霍之，聚各地之美女佳丽于几处而奸淫之，可谓不穷矣，“能够抵御堕落的资本”可谓丰厚矣。然则他的高尚又在哪里呢？

不就是他先后把结拜兄弟高岗、接班人刘少奇、亲密战友林彪推下矿井了吗？

更恶劣的是，他亲手挖了个叫做“阳谋”的陷阱，把起码180万的大小知识分子推了下去。跌入陷阱的右派分子们或死无葬身之地，或家破人亡，或妻离子散，或九死一生。雷波县山民能望我太祖项背？

时间过去50多年了，到得今上和宗谱皇帝，他大做“草泥马”贸易，虽然搞得到处鸡毛、遍地是灾（贪污、腐败、污染、豆腐渣、沙尘暴、矿难国、艾滋省、铅毒县、癌症村、红色湖、黑色江），却也赚了一些钱。如今还成了世界第三经济实体，不可不谓有钱吧。然而他的道德底线又在哪里呢？

朝廷既不给右派分子们彻底平反，赔礼道歉；又不做经济赔偿，连扣发20多年的工资也不肯补发。诸位看官老少爷、老少奶奶们，你们说无赖不无赖？

武宜三先生不学，在四方朋友的帮助下，收到了超过一万例的右派分子个案。几乎每一个案例都是一部血泪史，本人在《武宜三文集》之《陈毅是个好同志吗？》中介绍过许多例子。五七学社同仁申渊先生《右派列传》1—4卷，也收集了一千多个悲惨的故事。

孙勇烈和他的爷爷、他的父亲，一家三代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早在丁抒先生的《阳谋》中看到了。今天则收到更详细资料---原来又是一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痛悔；又是一个爱国有罪的悖谬逻辑。

原来，孙勇烈的爷爷是个医生，1949年，曾经有美国的同事动员他去美国或者香港，然而孙爷爷太爱自己的国家了。他要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结果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与儿子、孙子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自己自杀未遂，不久父子就先后死去了。

孙勇烈本人当右派时才21岁，劳改十几年。他现在70多了，正患重病躺在医院里，真是风烛残年了。可是，被欠的20多年的、三代人的工资，申诉了一千零一次，至今还是没有人肯还给他们。

诸位看官老少爷、老少奶奶们，请你们比较一下我朝历代皇上和雷波县的穷人，到底谁堕落的更彻底呢？

而且，又是谁让雷波县（以及无数的类雷波县）的山民（农民）如此贫穷呢？

不是辉煌了60年吗？

一个杀人放火、背信弃义、卖国保权、男盗女娼的权贵集团，领导出了一个不讲公义、违背诚信、欠缺同情的社会，还要一味靠暴力、靠谎言，就真的能维持“稳定”吗？永远骑在人民头上，永远掠夺，永远特权下去吗？

现在一方面，不断出现暴力抗拆，暴力维权；一方面又有人欢呼重庆是“解放区”，“薄xx万岁”，这就是社会撕裂、民心军心警心思变的症状。

暴风雨，也许就要来了。

## 哀悼陈英泰先生逝世 武宜三（香港）

被喻为“民主台湾人权战将”的陈英泰先生，于民国 99 年 1 月 18 日辞世，享年 82 岁。告别式已于 1 月 30 日举行。香港五七学社致送《唁电》、武宜三先生致送《挽联》，表示哀悼和崇高致敬。

### 一、唁电

建元教授转英泰先生子女亲属：惊悉英泰先生逝世，不胜悲痛。

香港五七学社以及全体同仁沉痛哀悼英泰先生，并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们部分同仁曾经有幸聆听过英泰先生的报告，和英泰先生一起讨论过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问题。英泰先生对专制主义反抗，对台湾民主化的推动，都是我们深感敬佩的。

特别他的两部巨著《回忆---见证白色恐怖》（上、下册）、《再说白色恐怖》，把个人的苦难和思考，变成了历史，变成了社会和人类的财富。英泰先生对民主事业和普世价值的伟大贡献，将载入史册。

虽然英泰先生走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奋斗精神，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对于还在追求民主，争取自由的中国人、香港人，英泰先生和台湾一切民主斗士的榜样效应，必会与日俱增。

英泰先生永垂不朽！

香港五七学社武宜三（执笔）并同仁陈愉林、陈元华、张成觉、陈诗、麦明等

### 二、挽联

英泰先生千古

白色恐怖，红色恐怖，恐怖不是好东西，两家没有分别  
台湾民主，中国民主，民主才能有人权，彼此应该呼应

香港五七学社武宜三敬挽

# 打油詩四首並序

我在四川泡了十年，視之為第二故鄉。巴山蜀水，鍾靈毓秀，人文匯萃，孕育了無數的才男佳女。因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前奉召回去而認識的楊沙力小姐，便是一個典型的豪放任俠、秀外而慧中的川妹子。後來，大約由於她的令堂和令妹早已經是香港人的關係，沙力小姐和她的老公、兒子一家子也來了香港。有一次她約我和她的家人去合和大厦跳舞，我雖然是舞盲也欣然赴會。其間，沙力賢姐妹輪流拖着我在搖洩的人群中穿插，如踉蹌於山陰泥濘小道；樂而歸，以打油記之。今偶然翻出舊稿，才想起未見沙力久矣。真是，詩情猶在，舊夢已渺，奈何！

(一)

姐名沙力妹小慧，香花美草使人醉；  
腹大不遜蘇學士，也摟蠻腰舞幾回。

(二)

彩虹為裳雪為肌，羊腸小道生妙姿；  
輕歌曼舞誰先識？柳腰欹擺總是詩。

(三)

楊家女兒有俠氣，蜀水香江故事多。  
惜欠生花如椽筆，為爾譜出恩怨歌。

(四)

深山幽谷有奇葩，清新脫俗人淨誇；  
瑤池一別三千年，叫我如何不想她。

2006年十月抄正

武宜三：《我们应该怎样感激日本鬼子和德国法西斯》（2009）

张翼星先生是 50 年前的北京大学学生右派分子，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所知道的黄中奇》（《观察》2009.7.13）是张教授为纪念他的被杀害的同学、右派难友黄中奇而写的。

文章中重现的黄中奇被陷害、被虐杀的情景，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是不忍卒读的。太恶毒、太卑鄙、太残忍、太丧心病狂了。

学校，本来是传承知识、培养青少年，省思过去、研究现在、憧憬未来，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快乐园地。然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却把学校也变成了杀人的屠场；变成了埋葬过去，摧毁未来的血腥衙门。

中共成立 80 多年来，到底干了多少好事？我以为只有两件。一是“杀人放火，卖国求权”，二是消灭知识和消灭知识分子。

特别，窃国篡政 60 年来，干得更起劲、干得更变本加厉。以北京大学为例，这个学校在反右派运动中，至少把 811 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近全校人数 10%。这些右派分子无辜的受了 20 多年折磨，许多人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些人还含冤而死。

被饿死、害死于劳改农场中的右派分子有胡稼胎、黄恩孝、刘奇弟、朱祖勋等。

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不久就失踪或者自杀的有孙敦新、郑光弟、周铎、朱家玉等。

十年文革中，仅仅在学校内遭到迫害，被殴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的教授、讲师、助教、干部、学生、职员，直至家庭妇女，共有 63 人。（王友琴：《63 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

被共产党专政机关直接枪杀的有林昭、沈元、任大熊、顾文选、张锡琨等。

中共怎样灭绝人性的迫害和虐杀林昭，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却不知中共杀害任大熊、黄中奇的残忍度，也不遑多让。

任大熊等被执行死刑以前，都被五花大绑，放在卡车上，在大同市游街示众；每个人的下巴都被弄“脱臼”，使他们无法开口说话；写有他们姓名的标牌从脖子后面直插肉中，鲜血淋漓。（王友琴：《三名相关联的文革受难者—任大熊、莫兴龄、章汉夫》）

我在收集 1957 年反右派运动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右派分子朱绍文的名字和行状。

官拜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赐“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顶戴的朱绍文原来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同期同学。

1985 年 4 月 28 日《经济日报》发表朱敏《中曾根和他的中国同学》的报道说，朱绍文中学毕业后，东渡扶桑寻找救国之路。在日本攻读学业长达 11 年之久。他先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再入该校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学习期间，朱绍文组织同学宣传抗日救国，

于1944年5月22日被东京宪兵队拘捕审查。后在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努力干预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与弟弟朱正文及其它十多位留学生不久被无罪释放。

1945年回国后，朱绍文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投入中共怀抱，为中共夺取天下大出牛马力。

毛共王朝建立，朱绍文因功赐民建中央委员、民建北京市委秘书长职。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跌入十八层地狱，当了22年贱民。

1979年，朱绍文被“纠正”后应邀重渡东瀛，当年保释他出狱的恩师、原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大河内一男问他：“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你曾经当过22年的右派？”朱绍文却说：“想当年，为了在留学生中间宣传抗日，我在贵国蹲了半年的大牢，什么苦都尝过了，当个右派算不了什么。”

朱敏马上吹捧说：朱绍文“表现了一个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襟怀。”好一个“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襟怀。”

其实错了。甘地说过：“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

对于朱绍文、朱敏这一类“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东西，只是比秦晖所说的“伪民族主义”（《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分子更不堪的奴才，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症患者。

他们既不真的爱国，也不正直。

朱绍文还是个说谎者，我绝对不相信他在日本蹲半年牢，就“什么苦都尝过了”。许多革命家都同时坐过日本、国民政府、共产党的牢，从他们的话语中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的牢最难坐。”例如贾植芳先生，“他呆了四次监狱，每换一个朝代都要呆一次监狱。北洋军阀的，日本人的，国民党的，还有共产党的。说起来，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呆得最苦了。”（舒瑜：《先生之风》）

再说，真的“当个右派算不了什么”吗？也许朱绍文有由于出卖同伙而立功等原因，被从轻发落，所以在他是“算不了什么”。但千千万万右派分子，却没有朱绍文这样的幸运，千千万万右派分子血泪斑斑的苦难史说明了“算不了什么”是无耻的谎言。

还有一个刚刚去世的季羨林，1935年至1945年留学德国；他自己说，1940年12月至1941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为什么再没有过呢？他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却知道，他自从回到可爱的祖国、得到了伟光正的眷顾之后，就只有被洗脑、被改造、被批斗、被关牛棚的份儿了。然而，当朝廷给了他“国学大师”（虽然他并未笑纳）的光环后，他便忘乎所以的鼓吹起“孔教该成国教”来了。他与主流保持高度一致，对中共数十年的倒行逆施、文化专制，居然不置一词，他本人也没有一点反思的意思。

明明是狼外婆，偏偏叫它“党妈妈”；明明它在要你的命，你却自作多情的说是“妈妈打孩子。”

毛泽东感谢日本人，是因为日本皇军帮他打倒了蒋介石，帮他颠覆了国民政

府。我也要感谢日本人，是因为日本的大学校长和老师，保护了他们的学生，哪怕这些学生是来自敌国，哪怕这些学生在反对本国政府。

我也要感谢德国的希特勒政府和他的人民，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却给了中国的学生以良好的学习条件，给了季羨林先生以“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使他有机会做了中国的“大师”。

反观中共独裁统治下的新中国，在和平的环境中，却大肆迫害、大量屠杀本国的，甚至是本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在风调雨顺的年岁却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饿死4千万中国人民，其中有数以万计的在各劳改农场、矿山、工厂被迫接受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

我想，中国人应该记住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尤其受过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恩惠的人，不要成天尽说昧良心的话去取悦窃国团伙，为他们的永远爬在中国人民头上、永远奴役、压榨、镇压中国人民制造舆论。

中国的大学校长本来也有保护学生的传统，例如蔡元培、胡适，都有反对政府逮捕学生，从警察局把学生要回来的动人例子。

然而，新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却成了统治者的帮凶，有的本身就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如陆平、蒋南翔之流。或者是掩盖历史、篡改历史、与民主科学为敌的帮凶和帮闲，如吴树青、任彦申、周其凤等等。

以甘当鹰犬为荣，以毒害、迫害、杀害青年学生为政绩的新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我诅咒你们！